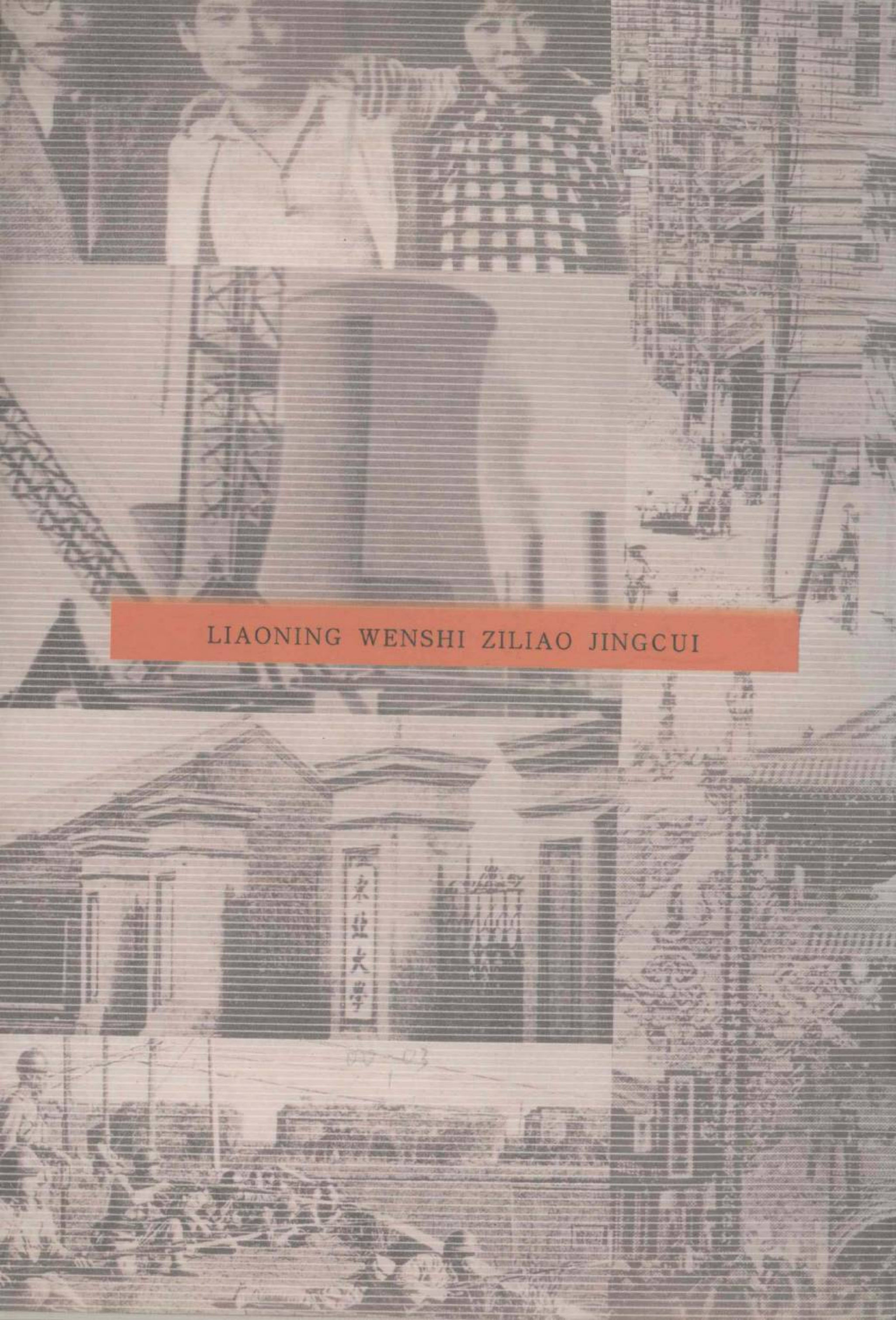

辽宁文史资料精萃
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


LIAONING WENSHI ZILIAO JINGCUI
東北大學

辽宁文史资料精萃

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

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宁文史资料精萃/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9

ISBN 7-205-04637-8

Ⅰ.辽… Ⅱ.辽… Ⅲ.文史资料—辽宁 Ⅳ.K2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9611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500000 印张：137

印数：1—2000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于 虹 版式设计：王珏菲

封面设计：杜凤宝 责任校对：陆 仁

定价：240元

辽宁文史资料精萃

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

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　编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序

孙 奇

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之际，由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编辑的大型史料丛书《辽宁文史资料精萃》问世了，这是我省人民政协事业的一项盛举，对文化界、史学界，也是一件值得称誉的事情。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倡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省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始于60年代初。在“文革”前，编印了5辑、近60万字的《辽宁文史资料》，虽然仅限内部发行，但却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保留了一批珍贵的辽宁近现代史史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人民政协恢复工作，政协文史资料的征编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我省历届政协领导的关怀下，文史委员会(现合并为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以及广大文史工作者遵循文史资料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指导方针，保持文史资料工作的“亲闻、亲见、亲历”特色，团结协作、辛苦耕耘，迄今为止，省政协共征编出版了50辑、近1000万字的文史资料。这部《辽宁文史资料精萃》就是从中精选出的有一定代表性、典型性的文章编辑成册的。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部内容丰富的《辽宁文史资料精萃》中所展现的辽宁近现代史斑斓多姿的历史画卷，起于上个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止于本世纪90年代，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华侨、社会等诸多方面，独具特色，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了政协文史资料补史之缺、匡史之谬、详史之略、续史之遗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珍贵的史料，在进一步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增强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向心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以及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这部《辽宁文史资料精萃》不仅是一部很好的史料丛书，同时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从戊戌变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中，历史事件错综复杂，众多历史人物纷纷涌现。通过这些史料，既使我们多侧面地看到中华民族遭受的无穷苦难和中国人民所经受到的重重压迫，又使我们看到任何苦难也不能阻止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通过具体、形象地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近现代史上革命志士的爱国主义情怀，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所有这些，都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营养剂。我相信，《辽宁文史资料精萃》的出版和其中的许多内容的传播，不但有助于广大读者对东北，尤其是辽宁的近现代史的认识，也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辽宁、热爱辽宁，激发人们的爱祖国、爱家乡和振兴辽宁的热情，更有助于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最后，希望我省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者，以这部《辽宁文史资料精萃》的出版为契机，为把我省的文史资料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不懈努力。同时，也希望就此引起社会各界对政协文史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编辑体例

一、本书的选稿范围，是从辽宁省政协自1962年开展文史资料工作至1999年底以前公开编辑出版的50辑文史资料图书刊载的文稿。

二、本书内容的时限，上起戊戌变法，下迄本世纪90年代；所选用的文章，以《辽宁文史资料》刊载文章为主体，部分文章为编辑整理过程中将同作者同类文章合并而成；部分文章在本次选编中对某些已确定的史实予以了补缺匡谬。

三、本书依据政协文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原则，选用“三亲”史料占绝对比重，并适当选用一些非“三亲”的整理史料，以补缺憾。

四、本书所选用的人物史料，以辽宁籍人士在辽宁的经历为主；为了便于读者对某些重大史实和重要人物的了解，适当选用外籍人士在辽宁有较大影响的事迹史料。对记述同一事件或人物的多篇文稿，本着择优精选的原则作了编选。

五、本书共分为六卷，各卷的编目次序，采取纵（时间先后）、横（领域、行业）相结合的方式，第一、二、三、四卷侧重以时间先后顺序编目；第五、六卷侧重以领域、行业分类编目。

六、本书中所选用的数字，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4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统一处理。



七、为便于读者查阅和利用，本书特在每卷卷首设分卷目录；在第六卷卷末设《辽宁文史资料》第1—50辑总目录。同时，在选用文章末端用方括号注明。

《辽宁文史资料精萃》
编 辑 委 员 会
1999年5月17日

目　录

张作霖在高坎

○张　晏

张作霖生于1875年3月19日。1895年前，年轻的张作霖在营口市高坎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从1962年起，我开始搜集有关张作霖的传闻。当时，高坎街有位86岁的赵锡彬老人和另几位高龄的郎会元、李连中、马福贵。他们和张作霖共过事、打过交道，提供了较翔实的情况。后来又走访了近20名老人。我以赵锡彬等4位老人提供的情况为主，记述张作霖在高坎的活动如下。

张作霖来高坎只有14岁。他是高坎的商人去盘山做买卖跟随而来的。来这里无亲无靠，给人家做点零活、打点短工维持生计。曾到过的村庄有大黄家店、太平堡、丁家桥、大弓弯、大房身等。后来张作霖到高坎北碴子泡村。碴子泡有家姓孙的财主，雇有二三十伙计，专设“饭堂”。张作霖常来饭堂找饭吃。开始，觉得他是小孩，到饭堂就管饱，以后去常了就拒之于门。孙家主妇是寡妇，为求积德行善可怜无以投靠的小孩，便命管事人带到饭堂吃饭。张作霖这才混上了饱饭吃。他自动给孙家放猪、扫院子，还管主妇叫干妈，赢得孙家高兴。后来张作霖发迹，当大帅，对这位干妈仍念念

不忘。1924年张作霖得知这位干妈死了，派人赶到磙子泡，为其送钱立碑。这件事由孙家四儿子（外号四瘸子）经办。原定修一座碑楼，因款被四瘸子入了私囊，仅竖了块石碑。此碑高8尺，宽2尺多，上写有“节烈松钧”4个大字，另一面刻有碑文。落款为张作霖和孙家儿孙的名字。这块碑，在“文革”时被推倒。又被一队社员修井时，砸成几块砌在井口上。

张作霖16岁离开磙子泡，到黄家店村一孙姓、外号孙鬼子的财主家干零活、放马。因孙家丢失一匹马，责难张作霖没看住，受到东家的打骂。张作霖因之患了重病。孙家见他孤身一人，又奄奄一息，在风雪之夜，将他抬出扔在路边沟里。幸而被一位姓樊的老者发现，救他回家去，经一个多月治疗休养，才好了。张作霖感激万分，在樊家白干活以报恩情。

张作霖恨透了孙家。后来在他当兽医时，通过治马结识了“钻天燕”——匪首。一天夜里张伙同钻天燕一伙抢劫了孙家。抢光又放了把火，使孙家遭场浩劫。

张作霖结识了另一财主樊某某，时常到高坎给樊家买日常用的东西。高坎有商店、车店、当铺、油坊、饭馆等，是个热闹的集镇，这个地方吸引了张作霖，他离开黄家店村来到高坎。张作霖原来跟继父学点兽医，又在樊家学些兽医知识，已成为半拉兽医，能粗略地看牲口病。这成了他下一步谋生之资本。

张作霖到高坎，没有固定职业，给商店、车店收拾院子，所谓打杂。后来出现在赌场，端茶倒水，赢者赏其一点小费。随着年龄增长，张作霖给人劁猪、治牲口病，自称是河西段先生徒弟，赢得一些人的信任。开始行医时，他住在马乡约

大车店里，治好了何家油坊一匹大马而出了名。

匪首“钻天燕”找他治马，实际等于抬高他的身价。后来，辽西巨匪杜立三亦找张作霖治马。这在高坎人眼中，张作霖今非昔比。他穿上时新衣服，腰里揣着钞票，进出赌场。

高坎街上还有一位有财势的于六，为马家搞阴谋嫁祸张作霖而不平。张离开马家就与其合开兽医桩子。张常常是赌场的“座上客”。赢了钱便大吃二喝，极度挥霍；输了钱就东拆西借。于六的小婆娘二兰子主动借钱给张，结果也输光了。由于二兰子同于六年龄相差悬殊，她暗中钟情于张作霖。后来，张作霖外出购药，二兰子假借回娘家探亲，携带细软追赶张作霖去。二兰子追上张作霖，约他逃往异乡。张作霖觉得于六待他天高地厚，岂能沾朋友之妻？拒绝了二兰子要求。于是，二兰子恼羞成怒，打心里恨张。张作霖买药归来，二兰子请张喝酒，把他骗到自己房子里。当张进了屋，二兰子扯开自己上衣，高喊起来。于六和家人闻声赶来，没容分说，将张狠打一顿，并绑在大榆树上，准备夜里把张作霖冻死。就在这时，在高坎开小车子店的常掌柜（则春）看到，上前问明原由，将张解了绑绳，领回店中，终算得救。

张作霖在常家落了脚，干些零活杂役之事。张仍出没于赌场。他一输再输，发现高坎有些赌徒合谋搞他，非常气愤。一次，张作霖输给他们，他们起身要走，张作霖忙把他们拦住，说回去取钱再赌。张作霖到街上卖肉案子取一把侵刀，回到赌场。赌徒们不禁大吃一惊，欲走不能。张作霖撸开裤筒，嗖地一刀，将腿肚子皮割一块，摔在桌子上作为赌注。赌徒们吓得不知所措，只好将赢得的钱全数退还他。事后，这几个赌徒总觉不是滋味，憋口气，寻机报复。有一次在六大娘家聚赌。六大娘半老徐娘，守寡，放赌。她为此专门找一撑

腰大汉，此人叫王兆玉，号称王三五。这天，张作霖先赢后输。赌徒们激他说："你上次输钱割肉，这回该割狗头吧！"张作霖恼羞成怒，便和众家动起手来，寡不敌众被按倒在地。有一个人拎来一把大砍刀，要朝张的屁股砍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大汉王三五窜将上来，一把把那人手腕掐住，大喝："住手！"六大娘上前制止了这场搏斗。

张作霖暗暗想练点拳脚功夫，他常到高坎东朝阳观，拜一位老道叫刘福航的为师。每天早起练剑，天长日久也学到些"剑术"。

1893年夏，有一次张作霖在高坎一家杂货店买东西，见到两个风流俊俏的姑娘。这两个姑娘是姐妹，姓祝，称大菊、二菊，是高坎街上的"美人"，已被于二爷霸占。于二爷扬言："谁敢惹她们，拿命见我。"张作霖没听这个邪，在一天晚上，溜达到祝家，想会会"二菊"，正好于二爷也去了，张没正面相撞，悄悄走了。于二爷从"二菊"口里知道此事，第二天，拎宰猪刀找到六大娘那儿，张作霖见势不妙，从窗户跳出跑了。于二爷在后面猛追不舍。张作霖跑到常家，于二爷追到常家。常家屋小无处躲避，遂把炕上几个行李卷打开，把他卷在里面。于二爷赶来，里外搜索，没找到张作霖，老常头假说张作霖往东跑了。

一直躲了几天，不敢露面。老常头便和张作霖商量，采取请客认错的办法，解决同于二爷的问题。老常头出面，又找不少头面人物，从中说情，才算了事。

这件事弄得张作霖抬不起头来，一股急火，又病倒了。正好病倒在老于家大门洞。被于天朗母亲看见，将他救到屋里，抚养3个多月才愈，张作霖感恩不尽，认了于母为干妈，在高坎又多了一门亲戚。



张作霖为赌博借了许多人的钱，其中有个叫黄木匠的，向张索取，张无力尝还竟被黄木匠打了两个耳光。张作霖思前想后，觉得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想一走了之。于是向老常头谈了，得到常的支持。常家又凑了些路费，把张作霖打发走了。这时，张作霖腿生火疖，行走困难。常则春把自己的毛驴送给了他。并说盘缠不足时，可把驴卖掉再走。

赌徒们听说张作霖离开高坎走了，还骑走了老常家的驴，忿忿不满。他们来到常家小店，谴责老常头，并鼓动老常头把驴要回。目的想把张冻死在路上。老常头在众人的蛊惑之下，披上旧皮褂追赶张作霖。张作霖骑驴走至东高坎，被黄木匠拦住了，要他还钱。张作霖见老常头来了，必定有事。便口称干爹："有什么事吗？"老常头话到唇边，不好意思说要驴，支吾地说是给他送皮褂子，张作霖正冻得难耐，穿上常干爹送的皮褂，骑上毛驴辞别而行。

张作霖离开高坎，辗转数载，在绿林草莽之中称雄，几经招抚，从匪到兵，一步一步爬上了官兵二十七师师长宝座。当师长后，他又到高坎一次。

高坎人听说张作霖要回高坎，便由高坎街头面人物出面，从凤凰甸到高坎修一段路，花了很多人力物力，把路修得又宽又平，迎接张的到来。

张作霖带一个卫队，三四十人。当来到凤凰甸村，他便命令部下下马，步行进高坎，只有他自己骑着马。并宣布："到高坎不准碰一草一木，不准有任何不轨行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高坎街上过去曾同张作霖闹过别扭的，打过他的，暗中陷害过他的人，听说张作霖回来了，吓得要命，以为这回非报仇不可，轻者挨打，重者要命，纷纷躲起来。

张作霖到了高坎，大家迎上来，毕恭毕敬。张作霖很客气地与大家相见，一概不提过去的事。他命人到老常家小店，把老常头请来，见面很是亲热，给老常头行了军礼。老常头看了半天，才认出，上前拉住张作霖的手："老三，你还真的出息了，我以为你早死了呢！"

张作霖不咎既往，宽宏大量待人。把黄木匠、马掌柜、于六、于二爷等都找来，将他们请到客室，张作霖以客相待。并说："咱们哥们，年轻时闹过摩擦，算个什么？我早忘了。老实说，没你们打我，我还没有今天。"张作霖走后，高坎人都称赞："张作霖有度量，报恩不报仇。"

在张作霖当了大帅时，老常头曾去沈阳找张作霖，在帅府住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派人把他送回高坎，并资助他开了"三畲当"、"三畲车店"、"三畲杂货铺。"后来常家拥有长工三四十人，250多亩土地，成为这一带财主，管事的大都是黑山县张作霖岳父那边的人。老常头年迈，坐享股金，生活极为豪富。1928年，随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老常家的买卖也逐渐萧条冷落了。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5辑〕



张作霖在辽西的片断

◯ 姜向春

一、脱离毅军办大团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驾掌寺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其父名张有财，无正当职业，在本村开个小商铺，收入甚微，主要靠设赌抽红过活。因为家境困难，张作霖无力上学，时到村塾看别的孩子读书。塾师栾某见他很聪明，准许他免费来学习。因此他读了几年书。不料14岁那年，他父亲外出夜归，被仇人拦路杀害，经村人发现后，由乡约报官检验掩埋。他们母子生活不能维持，乃去外祖家就养。外祖在黑山县，也并不殷实。母亲叫他做小生意——卖烧饼。这时他学会了赌钱，遇到看纸牌的总想参加。人家不算他，他就笑嘻嘻地恳求，终于获得同意。但是卖烧饼的钱连本都输光了。母亲又叫他改学木匠，他认为拉大锯太累，很苦恼，也不好好干。后来乃改学兽医。20岁那年他在营口大高坎村开设兽医桩。这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毅军宋庆部队由河北调驻辽西。由于医治军马的关系，常和军

队接触。他很羡慕军队生活，参加了毅军的骑兵队，给一个叫赵得胜的营管带当勤务兵。后来升任哨长，白马红缨颇为得意，乃与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结婚。

第二年，即1895年，李鸿章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战争遂结束。同年9月，毅军回防河北，张作霖就脱离了部队。这时辽河下游失业群众或散兵游勇到处抢劫，乡里很不安靖，遂有保险区（也叫大团）出现。张作霖因岳父协助，也在赵家庙成立了大团，当上二十几个人的小头目，负责附近七八个村子的治安。所有花费，都由地方筹措供应。张作霖在“保险区”内还是比较守规矩的，平时不乱抢乱夺，如有胡匪和散兵游勇来抢掠，他就去联系说服，也就停止了骚扰。村人得到一时苟安，对他很称赞。在他的保险区以外，也有些村子请他去保护，他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增加到二十几个村子。但他有时也向境界外开捐，让大户送钱送粮成为变相的掠夺。

在赵家庙西北，还有个金寿山大团。金寿山原是北洋新军的一个哨官，因为不惯受军队纪律束缚，回到家乡。见时局不靖，便想浑水摸鱼，啸聚一些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他能说会道，不到几天的工夫，就集合了一百余人，在北镇称王称霸。大团总部就设在该县最大的乡镇中安堡，周围二十来个村庄在他的保险区内。金寿山这个人品质恶劣，在他保险区内，除征粮征饷外，还公开勒索强抢，比一般胡匪都厉害。中安堡人民不堪其扰，就派人见张作霖，请他保护。张作霖带领喽罗打跑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这时他的保险区扩大到27个村庄，团练部移到中安堡，练勇也增加到四十余人。这是1900年初冬的事。

但是金寿山失去了这块地盘很不甘心，无时无刻不想报

复。后来想出一条妙计，叫他干儿子打入张作霖内部，探听虚实动静，以便大举进击，一鼓歼灭。1901年2月（农历腊月三十），欢度新年的时候，金寿山的干儿子看张作霖杀猪宰羊，准备过年，毫无戒备，就假称回家欢聚，借机向金寿山报告。金寿山认为这是复仇的机会，马上集合大小喽罗，并借了帝俄一小队兵，把中安堡包围。夜半枪声四起，张作霖以事出意外，情况不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乃仓惶突围。由汤玉麟背着张作霖的妻子赵氏，孙大虎背着张的大女儿首芳，张作霖在后面掩护，一直跑到台安北面的姜家屯。此时天已大亮，正是旧历正月初一。看到后面没有追兵，决定进村休息，然后再作主张。姜家屯很小，姓赵的最多，恐怕张作霖抢劫绑架，请读书人赵贡九出面接待，给他们包饺子吃，并把马喂好。张作霖以为这里不是久居之地，想到高坨子和冯德麟[①]会哨（合伙）。当时盘踞辽南的保险队以冯的帮头为最大。他们打着杀富济贫的幌子，纠集散兵游勇和一些游手好闲的号称千人。在绿林中他算是老前辈了。张作霖认为可以托身，遂于上午出发。

从姜家屯到冯德麟处，须经过八角台。八角台（今台安县）当时是一个大集镇，有五十多家商号，其中两家烧锅。保卫工作非常森严，雇用炮手三十余人，张景惠是炮手头目。武器也比较齐全，有洋炮10支，洋抬杆3只，快枪数十支。土围子修得像城墙一般。张作霖估计，从这里经过不容易，如果不事先说好，必然会遭到阻击。于是他派人拿自己的名片去联系。当时八角台的商会会长叫张程九（紫云），是个秀才、地方绅士，是镇里东烧锅的财东，大事小事说了都算。他听

① 冯德麟是保险队最大的帮头，驻小北河、黄泥坎、庙儿岭、韩家峪一带约二百四十余村，还驻海城、腾鳌堡、牛庄周围一百余村。

说张作霖来了，就召集各绅商开会。他在会上说："张作霖的名誉很好，借道的问题可以商议。"当下把张派来的人叫来问："有多少人，多少枪，都是什么枪？"送信的人答称："一共四十多人，每人一支枪，都是疙瘩搂（洋枪的土名）。"大家商议一会儿没有主张打的。最后不但要借道，而且要欢迎一番。于是张作霖的人马平安地进了八角台。张作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很会说话。人们送给他个绰号叫"万人喜"。张紫云见了谈得很投机，叫他休息两天，把他的喽罗安排在自己的两个烧锅里住。过了两天索性不让他走了，留他保卫地面，加入本地的大团。按照冯德麟的办法，每垧地抽两角钱，作为该部的薪饷。张景惠本来是八角台的炮手头目，这次扩编的大团[1]，以张作霖的人数较多，意气又很相投，就让张作霖作团练长，自己甘居副职，地方的绅商也都同意。张作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在八角台落了脚，有众七十余人。

二、收编后任巡警游击马队帮带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字。10月，那拉氏回北京；但帝俄侵入辽西的军队并没有撤退，地方秩序仍很混乱。地方政府名存实亡，失去统治能力，土匪和散兵游勇不断滋扰。这种局面持续二年之久。张作霖的实力逐渐扩大。到1902年，秩序渐渐恢复，大团失掉存在的条件。张紫云以为团练是一时的武装自卫组织，经常养兵是国家大事。地方太平了，团练就该遣散。但这股人马要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家种地，也不会安分守己，对于治安也不利。同时他还认为张作霖几年

---

① 大团也叫团练或保险队，有的比较规矩，捍卫乡里，有的也乱抢乱夺，人们不加分析，总名之为绿林。

来在地方上还不错，私人关系也不坏，最好给他找一条出路。当年8月，就找杜泮林（恩波）商议。杜泮林也是个秀才，又是黑山的绅士，与张作霖很要好，他也同意张紫云的意见。两个人商定把这些武装交给政府。遂一同去新民府见知府增韫（子固），将要把团练交给政府的话说了一遍，而对张作霖也大加赞扬。增韫说："二位同年，你们都是士绅，我太相信了。把张作霖领来给我看看。"他们回去以后，领张作霖来见增韫。张、杜二人经过府考，介绍时称增知府为老师。张作霖听了也叩头拜增为老师。增知府看他很儒雅，样子挺聪明。问他："你多大年纪？"张说："28岁。"又问："有多少人？"答"一营人。"按当时清朝兵制，一营要有500人，可是一般都是不足数的，有八成就算很好了。每营有五哨，每哨最少40人，那么一营还需要200人。实际上张作霖只有百十来人，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给后来扩充力量留有余地，就以少报多。增知府漫不加察，告诉他，把部下整顿一下，听候命令，带到新民点编。张作霖叩头称谢。

原来庚子变乱时，盛京将军增祺把他的家眷送回北京了。第三年地方秩序恢复，他的家眷又由北京回奉天。那时京奉火车没通，且有匪徒拦路行劫。增祺的夫人十分害怕，骡车走得很慢，每天不过六七十里路。到沟帮子附近的新立屯，就住在店里。张作霖派人保护，并见了将军夫人。将军夫人早听说张作霖是个"红胡子"，以为他很凶恶。接谈以后，却觉得温文儒雅。张把将军夫人安慰一番，又派人送到新民。随带财物分毫未损失。这给增将军留下好印象，所以准许新民府收编。

张作霖见了增韫知府后，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从事组编活动，吸收辽西一带其他小股匪帮。那时有义县的张

作相，黑山县的薄振声、叶景全、薄芳庭几伙人，都集中在八角台，作了张作霖的班底。此外，还招募一部分人马，凑足400之数，开到新民府点编，成立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任张作霖为帮带，归总巡李洪亮、朴玉管辖，统率五个哨。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薄振声等，分任前、后、左、右哨官，另以黄锡九为中哨哨长，张自兼中哨哨官。队伍仍驻八角台，维持地方治安。翌年整理队伍，正式任为管带，乃以张景惠为帮带。不久移驻新民，剿杀辽西各匪帮，如王六哨、杜立山等。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

我所知道的张作霖

〇周之风 **口述** 沈 述 **整理**

一、从绿林到管带

中日甲午、日俄两次战争前后，东三省处在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时候。当时我家族六伯父周向阳（字风双）正任胡云铭翼长的总文案。胡是依克唐阿将军的部队，驻防小黑山镇（今黑山县城）。当地发生一起巨案，但拿不到正犯，而依克唐阿又限期紧迫，责成胡军破案。这年张作霖才19岁，正在所谓“通京御路”的羊肠河大道上，抢劫行人，被胡军逮捕。此时掌文案的周向阳便将他纳入此巨案之中，并将自己家中饭馆（庆美园）17岁小工友霍小三同时逮捕，强指他俩是案中从犯，不惜构成冤狱，解送盛京将军衙门，置之死地，以了此巨案。

霍小三屈打成招，冤死于奉天狱中，张作霖则拒不承认，案无实据，成为未决犯。次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正犯在吉林自首，张作霖便以无罪释放。回家不久，便投向宋庆的毅军，但为时不久又脱离毅军，重操绿林生活，拉起

小帮来，成为辽西“红胡子”队之一。首先为夥的就有汤玉麟，当时称为汤二虎，活动在高山子和阜新一带。

1900年又发生义和团运动，帝俄军侵入东三省，以刘永和为首的组织忠义军，在珲春、海龙一带进行抗俄活动。辽西的一些“红胡子”队伍也起而响应，组织了保险队，以今黑山县属的姜家屯镇为指挥中心，公推洪辅臣为首领，陈锡九为副领，队伍约有千余人，分数股。姜靠天股驻八角台；苗子新、杜立山两股驻小黑山羊肠河；王兰亭股驻半拉门，张作霖一小股驻中安堡镇。此时，冯德麟也在海城组织“大团”抗拒俄兵。

不久，洪辅臣被陈锡九所刺杀，苗子新也被杜立山枪杀，将其队伍吞并。而后，杜、陈又互相争权，发生火并，王兰亭（绰号黄眼珠子）便趁机杀了陈锡九。当时广宁东部的抗俄队伍，就由王兰亭、杜立山所指挥。辽西成了半兵半匪的地界。

洪辅臣等股的抗俄结合，是由当地的两个举人，所谓“关东才子”中的刘东阁和李龙石两个人作谋主的，这些大小头目，也都拜刘、李为师。刘是一个学者，李则因上控昌图某知府贪污金银，被西太后下令革了举人学衔，在不得志之下，欲有所举。但看到他们互相火并，也灰心退步了。

此时，张作霖驻在中安堡镇，欲想拜当地有名的进士李维桢（子栋）为师，为己出谋划策，遭其谢绝。后又到八角台（今台安镇）叩当地拔贡张程九之门，从而接洽李龙石，移防八角台，分取王兰亭、杜立山的领导权。

此时，八角台先推当地豆腐匠兼李龙石的学塾差役张景惠为民团团练长，张作霖带队前来，张景惠即主动将团练长让于张作霖。此时，姜靠天正告退。义县的张作相也率队来

投，于是，张作霖势力扩大，占有广宁东南部。

这时，占据黑山、盘山一带的王兰亭、杜立山两部，又拜黑山四间房村优贡杜泮林（恩波）作谋主，扩大势力，割据一方。杜立山本名杜天义，是杜泮林宗族侄子，自杀苗子新之后，日益猖狂。王兰亭结合黑山东部胡家窝棚、孙家窝棚一带势力，欲以原伊乔将军总文案秦子庆作谋主，为秦所谢绝（王是秦的内表弟）。这样，杜、王、张三部暂时得以互不侵犯，各据其地。

1901 年，小黑山北老河身屯村武巡捕出身的赵尊五（字文清）以一部分力量，保护出逃的盛京将军增祺回到奉天，并向俄军交涉，赵之表弟孙烈臣亦随同保镖。次年，清廷以辽河西岸的要地新民亭，改设新民府；以小黑山镇设镇安县（今黑山县）；彰武台门设彰武县，均隶新民府。首任知府为增韫。

这时张作霖正准备向清政府投降，于是枪杀了绿林好友海沙子，击破田玉本等五大哨，抢先在冯德麟、金寿山等将要归顺清廷之前，向新民府知府曾子固投降，当上了骑兵管带，这年他才 29 岁。

二、从营管带到前路巡防统领

张作霖一步登天，当上了新民府巡防营骑兵营管带，便带着几十名的马队，来镇安县城（今黑山）访问周向阳住处，大有欲报先仇之意。此时，周正充任县商务会文牍，知张前来凶多吉少，于是由会长魏玉奎（璜壁）联同所谓南韩、北杜两绅士（杜泮林、韩文潮），出面与张洽谈。结果，张作霖必欲到周家登堂拜母，结为兄弟，当时认周母（笔者族祖

母）为义母，呈现银元20块为寿礼。但此后笔者全家对张作霖敬而远之，断绝关系。

张作霖不但化仇为友笼络了周向阳，而且又乘机拜杜泮林为义父，结杜的儿子杜恺元为义弟，为进一步解决杜立山打下基础。同时，他又和韩文潮结为儿女亲家，以其兄作孚女儿，嫁与韩之次子，即后来担任张大帅卫队团团长的韩松寿。他又经韩的介绍拜识了黑山的两个举人刘荫桂（樾轩）和孙鸿猷（号芝堂老叟），为进一步解决王兰亭作了准备。

果然，他经杜、韩、刘、孙的关系，与王兰亭过从甚密。又经王兰亭、杜泮林的疏通，得与杜立山会晤。但他奉有曾知府密令，在杜泮林的宴会席上，捕杀了杜立山，当场宣布"已诛凶匪杜天义"。此事深为杜泮林、王兰亭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不久，又听说王兰亭在新民返黑山道上被人暗杀，不知行凶者何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后，赵尔巽任盛京将军，张锡銮总办奉天营务处，调升张作霖为前路巡防营统领，辖步、骑营，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任营管带，移驻郑家屯。此时，他结识了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字兴权）拜为兄弟。又同郑家屯商人于老板（字文斗），结为儿女亲家，于以其女凤至妻张学良。

不久盛京改为奉天省，徐世昌首任东三省总督，调张作霖部移驻洮南府。升张作霖为前路巡防统领，调驻洮南镇，吴俊升为后路巡防营，进驻郑家屯。

新调防的张作霖、吴俊升两军，担负起所谓"进剿"内蒙陶克陶的责任。从1906年到1910年打了5年，大小仗打了104次，换得功名。

张作霖自打败陶克陶之后，更自命不凡，在洮南一带和蒙古各王府拉拢关系，把女儿许配给达尔罕王之子。同时也积极和各烧锅、粮栈的财东大老板们，结金兰，拜弟兄，巩固其政治、经济地位。

但张作霖不满意驻防洮南，嫌距奉天省垣太远，不如吴俊升驻防郑家屯，距奉城较近，得以“近水楼台”，因此他屡次要求调防，未达目的。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东三省的革命志士们，也密谋举事，特别是同盟会骨干分子张榕、商震等集合在省城，组织“急进会”，联合省咨议局议长吴景濂（字莲伯）等，进行奉天省独立活动，以达到推翻清廷的目的。一部分革命军人和同盟会会员又组成“军人联合会”，准备联合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发动武装起义，众推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侦知情况，又接到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的暗中告密，便急调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星夜带兵来奉监视新军。

驻洮南的张作霖得此电召，高兴百倍。便先带500骑兵，连夜赴奉。

张作霖仅以500骑兵入沈，深知兵力单薄，故采取虚张声势之计，在未入奉之前，就派人到东西南北关客栈、商号和大民宅，贴出前路巡防营哨兵房间，大有数千兵马源源而到之势。这一花招，吓跑了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张作霖到奉天后，赵尔巽便接受了各派的意见，挂出“奉天国民保安会”的招牌，以赵为总会长，吴景濂为咨议局议长，第二十镇第二十九协协统伍祥祯为副会长，一切人员都是旧官僚。

在开会时，张作霖摆出红胡子的面孔，跳上讲台开口说道：“大家都知道我姓张的是干什么的？”并把手枪掏出来，一

下放在桌子上。在如此胁迫下，会议推举袁金铠、张榕为参议部正副部长，聂汝清、张作霖为军事部正副部长。

同盟会员随之也正式组织联合急进会，推张榕为会长，张根仁、柳大年为副会长，吴景濂、钱公来、左拯之、袁金铠为参议，杨大实为总务部长，汪谦为秘书部长，赵中鹄为执法部长，辜天保为军务部长，洪东毅为交通部长，赵元寿为侦察部长，主张响应南方革命，推翻清廷，宣布独立。

此时，“联合急进会”派人分赴复州、庄河、宁远（兴城）、辽阳、安东、凤城等地，运动军警，组织民军，进行起义。在奉天仅留张榕等掌握中心指挥工作。

接着辽阳、复州、庄河等地纷纷起义。赵尔巽便指示袁金铠、张作霖对付革命党人。一天晚上，袁假意宴请张榕于奉天大西关平康里德兴楼，饭后袁托辞先去。张榕一出门，便身中枪弹，当即死去。同时，奉天回民画报社编辑田亚赟和张榕好友宝昆也被暗杀。此后，张作霖军队每夜分头烧杀抢劫，东西南北关时有枪案发生，遇有剪发易服者，便登时杀死，无能幸免。当时，奉天省城一片恐怖气氛。

三、从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到奉天督军

民国成立后，将全国军队改编为师、旅制，张作霖升任陆军二十七师师长，驻省城；冯德麟任二十八师师长，驻北镇；吴俊升任中央第二骑兵旅长，驻洮南，马龙潭部仍驻东边一带。张作霖的二十七师辖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第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邹芬、赵恩臻分任二十七师各团团长。在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中的大小军官，十个有九个是黑山人，当时有“武黑山”之称。这时张冯两人

矛盾很深，已成对立之势，主要是冯的资格老，不甘居于张次之故。

张作霖驱走段芝贵攫取奉天督军兼省长之位后，发生了第二十七师师长的继任问题。张以当时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粗野无知，第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深沉有智，乃向北京政府拟保孙烈臣。正在所候批示之际，汤玉麟以为和张有生死之交情，便持枪索取师长任命，为张所拒。不久，汤又手持黎大总统任命和段陆军总长指令汤为二十七师师长公文两纸，欲行接任。张便向中央电询，复电并无其事，令张查此伪证，依法处办。同时，任命孙烈臣为二十七师长之公文已到。

果然，北京方面查得伪造此项公文之人证、物证，原系汤派其旅部书记官梁维新（字栋臣，黑山小梁家窝棚人，和述者父亲系同学）到京伪造官印文书，以夺取师长地位。此时，梁与刻字匠已解送奉天，交张法办。张决定逮捕汤玉麟。汤闻知此事后，便指使全旅哗变，惟团长汲金纯等人不支持，汤玉麟便带同刘景双等三营步骑兵队，叛出奉天，经过新民、彰武、黑山、北镇一路烧杀抢掠。汤军中途被冯德麟二十八师迎接，进驻北镇青堆子一带。

汤问题结束后，张趁机向冯德麟过问二十八师纪律、饷额等等问题。冯自知不安，便与热河都统姜桂题结成儿女亲家以自固。

1917年复辟事起，冯、汤又抱着张勋的尾巴，参加丑剧。失败后，冯、汤遭到通缉，张作霖便趁机电保五十六旅旅长汲金纯为二十八师师长，而又惹起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的不满，但未敢动。

此时，张作霖又感到东边镇守使马龙潭军队非其本系，欲以改编调动。马龙潭（字腾溪，河北庆云人）是张锡銮旧部，

年岁已老，深知不安，便与吉督孟恩远结成儿女亲家，暂为自保。但张调马为四洮铁路督办，撤其兵权的同时，增设洮辽镇守使吴俊升的兵力，以防吉林孟恩远。吴此时亦自培地方关系，与蒙古某王结成儿女亲家。

此时，奉天军事已完全属于张作霖所有。张作霖便又从经济方面着手，首先改组东三省官银号，以其亲信军需彭贤为总办，吴恩培为会办，掌握整个奉天省金融，发行钞币，与在奉天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相竞争。同时，又设“奉天公济平钱号”，发行铜板票，操纵市场金融。

张另一个亲信钟承之为张私人经理商业和钱庄。在新民县开设三畲油坊，囤收大豆，运向营口卖给洋商。在黑山县姜家屯镇开设三畲当、三畲粮栈。

钟之子钟恩，又在奉天为张经理边业银行和三畲粮栈。张的亲家于汇川（字文斗，系于凤至父亲）在郑家屯也为张经营商业，张的岳母王老太太也在奉天有商业，放款。张的义父杜泮林也在黑山镇开设“复元公商号”，发行纸币。矿业方面，弓长岭等煤矿，张均有投资。农垦方面，洮辽的东西片荒，张也占了许多未垦土地，并与日本大仓财阀勾结，收买郑家屯大片土地。林业方面，鸭绿江采木公司，张派其亲信、军需乔汉章任理事长，大有收入。

其次，从政治方面，张尽量任用奉天人，以于冲汉所荐金州人王永江为奉天财政厅长，后长为奉天省长。以其小姨夫、台安县人宋文郁为奉天警务处长，掌握政警大权。

同时，张作霖请北镇县老进士李维桢为自己讲四书，黑山县老秀才张兰合讲《纲鉴易知录》，学会了“天理人心”四个大字。



四、从东三省巡阅使到蒙疆经略使

在张作霖任奉天督军时，吉林督军孟恩远、代理黑龙江督军许兰洲（河北南宫人）都和张作霖不同派系。民国6年（1917年），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在驱逐朱庆澜（字子樵，浙江人）之后，代理督军。又有英、巴两旅长，争起驱逐许兰洲之举，张作霖便趁此机会，请求北京政府派当时陆军学堂堂长鲍贵卿接任黑督。

鲍贵卿，海城人，是天津小站练兵处兵弁出身，在北洋军界20年，后升任陆军次长。张以同乡关系，请任黑督，又结为儿女亲家。同时，任用袁金铠为督署秘书长，王树翰为龙江道尹。

1920年秋，张作霖兼任东三省巡阅使，但吉督孟恩远究非奉系。孟不去，吉仍非张所拥有。张乃调张九卿为延吉镇守使，以分孟之势。张久卿，字相臣，黑山大夏家窝棚人，出身农民。青年时参加北洋小站练兵处，以兵弁积功至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虽非奉系，张以同乡关系，调至吉省亦纳入奉军系统。

1919年秋，张作霖以吉督孟恩远外甥、吉军第一师长高士傧有抗命行为，出兵讨吉。孙烈臣督黑，张作相接任第二十七师师长，住锦州。并请免吉林省长郭宗熙（湖南人）职务，以吉林人徐鼎林代之。如此，所谓“东北人治东北”，张如愿以偿，但这不是他最终目的。

1920年夏，张作霖联合曹锟、吴佩孚，反对安福系，出兵入关，连败段祺瑞的定国军，拥靳云鹏组阁。请以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汲金纯为热河都统，绥

远的马福祥亦附入张的范围。次年春，张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

这年冬天，张作霖宠爱的五夫人王雅君正在娩期。返奉途中，他在京奉路上历家窝棚车站下车，赴姜家屯镇（今黑山属）下榻于三畲粮栈。商请经理钟承之老板，纳聘北镇县沟帮子附近某女成婚。载去沈阳。

此归，偕去姜家屯三畲当副经理杨荫普（黑山王大包屯人），任奉天“三畲银号”经理。

未久，在姜家屯镇所婚之六夫人，遣归，并赠以数千元了事。

我在这次看到了赫赫一时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因为家父在姜家屯区立小学教书，得省亲之便，在大街上看见他。其身材不高，白面黑发，头戴呢礼帽，身着黑缎褂，银灰色绸子皮袍，足蹬礼服呢棉鞋，一手撑手杖，一手拿纸烟。态度典雅很像文人，不类武夫。同行有俞沐谭、钟承之及黑山、北镇、新民三县知事、警察所长、地方绅士等。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作霖二三事

○赵兴德 **口述** 沈一言 **整理**

一、生财有道

张作霖当上第二十七师师长之后，非常跋扈。当时的奉天都督张锡銮，自己手里并无队伍，所以张锡銮虽然是奉天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一切则以张作霖的马首是瞻。张锡銮为了拉拢张作霖，使其子张什隍与张作霖拜把子。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二十七师师长，在财政上单靠二十七师规定的军饷，未免不够开支，并且张作霖对于军队，向不克扣。于是他就想了以设赌为由，代人谋事的办法来抓钱，其办法是专门介绍县长、税捐局长和警察所长。因为当时要想当县长、税捐局长和警察所长这三种肥缺，非得有势力的人推荐不可。而当时奉天最有势力的就是张作霖，因之想走张的途径的，就各方面打听接近张的办法，经熟悉情况的人介绍，惟一的办法就是到张的公馆去赌钱。张对各种赌博（推牌九、打麻将和押宝等）均很精通。初去赌钱的人，张向来不问你姓名，坐下就赌，每次输赢都很大，动则现大洋数千

元，甚至几万元。到张公馆赌钱的规矩是去赌的人钱不输光不散，也就是张作霖不赢够不散。同时张还不怕欠账，因为谁欠他的输赢账，到什么时候都得还清。如长春道尹孟秉初，在奉天输给张作霖二三万元，孟回长春后，很久没送给张，于是张作霖就派人到长春去要，结果要来了事。如果某人在张公馆赌过几次钱，而每次都输给张很多钱，这时张作霖认为你输的差不多了，于是就留你吃饭。在吃饭时他才问你姓甚名谁，做过什么事，并问你哪有这样多的钱输？于是你就可以趁此机会，要求他栽培，并且也可以说明自己的愿望。这时张作霖就会叫你当面写个简历表，有时还问你希望到那一县去，最后则向你说，待我说说看，可不一定保准，你听候回信吧！第二天张作霖就拿着那个输钱人的简历表找张锡銮介绍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很有能力，可以当县长或税捐局长或警察所长，同时还说，这个人请都督提前发表，请注意不要忘了。如果过了三五天还未发表时，张作霖就到张锡銮处，大兴问罪之师，质问他为什么还不发表？张锡銮与张作霖虽然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张锡銮对张作霖则是惟命是从，所以张作霖要介绍人和要什么缺，是每说必准的。当时人们对于张作霖的这个生财有道的办法，叫做“大吃县局”。

张锡銮每次召开军警会议，研究有关地方治安问题时，如果事先未与张作霖商量或未取得张的同意，张作霖则经常拍桌子，气势汹汹地反对，当众给张锡銮下不来台。这时张锡銮只好以长辈的身份，很和蔼地对张作霖说：“雨亭，你又喝醉了吧！不要上火，请到小客厅里休息休息。”于是就亲自陪着张作霖到小客厅说：“这次会议都是为的你，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人，你干好啦就是我好，我干好啦也就是你好。”如此这

般，张作霖才能顺顺当当地回到会议室再开会。

二、抗上袒下树立权势

1915年春，张锡銮调湖北省，继任者为段芝贵（安徽人）。在其到任不久的一天上午，奉天大北关隆泉美钱号（晋商）派一个青年外柜拿羌贴（俄币，当时在东北通用，每元抵奉小洋1元4角）数万元，送到其他商号，走在大街上被一个当兵的抢去了。他当即报告岗警，岗警就吹哨招集邻岗追捕。那个抢钱的兵，跑到小西关某处，掉在一个枯井里被警察捕获。当时出事的地点在大北关，属于警察第四署管界，而捕获抢钱者的地点又在小西关，则属于警察第五署的管界，于是将抢钱的兵带到第五署。署长见是军人白日行抢，乃亲自审问。正在审问时，不料第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亲自带弁兵10余人，闯进第五署，硬将抢钱的兵抢走。警察第五署署长即时报告省会警察厅厅长宋文郁（张作霖的连襟），宋即用电话质问汤玉麟，并向汤要人，汤答复说，兵已经枪毙了，于是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不久段芝贵召集军警治安会议，省城驻军营长以上和警察署长以上人参加，段芝贵亲自主持会议，军警人员分左右对坐两旁。宣布开会后，段首先问宋文郁，青天白日抢钱案，你警察厅长应不应负责？宋答复说应当负责。这时张作霖听不入耳，于是一拍桌子大声对段说："你不知道奉天的情况，出抢案这是常事，不但警察厅长负不了责任，就连我当师长的也不能包干呀。"段接着说："雨亭，抢钱案那么应该怎样办呢？"段的这句话，触动了张作霖的火气，抬起屁股就走出了会场，并且边走边说："这个会议是找老道会气，我不参加。张的部下见他走出，也都跟着走了。宋

文郁看到张的人都退出了会场，他也和各署长都退席了，于是就把段芝贵冷落在会场里。

张作霖回到师部后，宋也跟到师部，张对宋说："他（指段）休想摧残我的人，这次我不把他赶走，我不姓张，你以后遇事不要理他。"在当日的下午，段派一青年人张某（据说是河北人，科举出身，很有才学，原在北京政府中任职，前曾因公来过奉天，与张作霖见过面，很得张的赏识，所以此次段将他带来，以便与张作霖发生难题时，好使张从中缓冲）见张作霖。张某见到张作霖后说："今天上午开会，由于发生了误会，才不欢而散。事后上将军（指段）很觉抱歉，特意派兄弟来请师长到军署吃晚饭，因兄弟素蒙师长青睐，故敢冒昧前来，想师长是不会拒绝的。如果师长不肯赏脸，我也没有颜面呆在奉天，只好今天晚车回到北京去。"张作霖感到此人说的委婉动听，盛情难却，于是就与他同到段处吃了晚饭。段与张见面后，段向张说："我们与宋墨林（宋文郁的号）都是一家人。不过在会议桌上，不能不稍严肃些，为的是他对下边好约束一些，不想你未等我把话说完，就发生了误会，发了脾气，这个事应该由我负责，还请你原谅才好。"张听到段说的和蔼恳切，也就无话可说。当张作霖夜间回到公馆后，宋文郁正在他家，他对宋说："这下子他已叫我治住了，你回去安心干吧。"

原来段芝贵此次召开军警治安会议，是另有用意的。当段由北京来奉时，就带来他的同乡张宏舟，准备接任后，即发表张为奉天全省警务处长。但警务处是个空架子，并无实权，于是想兼省会警察厅厅长。这个打算，外边已有传闻，故在开会时，段想借大北关隆泉美钱号的抢案，大作文章，不料张作霖来个先发制人，就把段芝贵吓住了。张宏舟想兼省

会警察厅长的打算，也只好作罢。

三、张汤反目

当赵尔巽临离开奉天时，曾对张作霖说过，你要想作一番事业，对国对民能有所作为，不能单凭军队的武力，同时还要注意政治，特别重要的是要用人才。目前奉天可称人才的有袁金铠和于冲汉、王永江等，你都应当延聘过来。所以，在 1916 年夏季，张作霖取得奉天省的军政大权后，首先宣布军人不能干预政事，军队应严守军纪，不准扰民害民，如敢故违，即以军法惩治。继则将他支持多年的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宋文郁调换。宋文郁与军队的各高级军官大多认识，张恐宋在维持省城秩序和纠察军风纪上，碍于情面，不能严格执行命令，故经省议会的同意，调省府参议王永江为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王永江接任后，对于张作霖的命令贯彻到底，但为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所反对，汤自恃是张作霖的老朋友和老部下，不但不严格要求部下，反而自己公开设赌抽头，并放纵部下扰民，以致各处常出抢劫案。同时汤还屡次向省内各行政机关强行荐人，大有效法张作霖对付张锡銮时的作风，而各行政机关的主官，又不敢向张作霖报告，因而汤玉麟就越发无法无天。当时独王永江不听汤玉麟的那一套，汤虽屡次向他介绍人，并指名要某某县的警察所长，均被拒绝。于是，汤玉麟恼羞成怒，在是年冬的一天晚间，汤自带数十人撞进警务处抓王永江。王闻讯后由后墙跳出，跑到张作霖处报告，张作霖当时大怒，即用电话将汤大骂，并令汤速到军署来，但汤反抗不服，也不来见。过了几天，张作霖虽几次派张学良和夫人等到汤处请

汤，汤仍始终避而不来，势成僵局。此事发生后，汤玉麟即利用张作霖与冯德麟间的矛盾，暗中与冯勾结，以第二十七师的名义，连同第二十八师共同驱张。民国五年（1916年），张冯合谋驱逐段芝贵时，是由第二十八师出面的，而第二十七师只是暗中协助。但段走事成后，全省的军政实权，均为张作霖一个所独得，冯仅得一个空头的军务帮办，因之冯和第二十八师的人员，都很气愤。故此次经汤勾结后，全师赞成共同驱张。与此同时，汤又假用第二十七师全体官兵的名义，电北京政府，控告张作霖的种种阴谋。当时张作霖见四面楚歌，已扬言允将省长和第二十七师师长让出，自己只任督军。但汤冯等仍不妥协，坚决表示非将张赶走不可。当时汤玉麟将本旅的亲信官兵千余人拉到北镇，准备与张硬拚，还大招土匪扩充部队。兔子阎王（姓李）、老二哥（姓韩）等股匪共千余人，均为汤所收编。

当汤玉麟在沈阳与张作霖相持不下时，汤的外甥刘景双营长，曾向汤出主意说："如果张作霖不答应我们条件时，我们就先打日本站，惹起中日交涉，使张作霖也干不成。"但汤玉麟未听刘景双的话，于是刘景双就自带数十人，想投到南方革命党去，走到营口未待上船，就全数被捕，解到省城正法。

张作霖在汤、冯勾结最严重时，曾派人到北京政府请求段祺瑞内阁援助，段曾允许出兵平乱。同时张作霖又派人疏通后路巡防统领吴俊升（当时兼中央骑兵第二旅旅长）出兵协助，事成后保吴编师。因此吴同意出兵支援。这时第二十七师的骑兵团长张景惠和炮兵团长张作相（都是张作霖的嫡系）表示愿意为张作霖效命，并且即带部队赴北镇讨伐汤玉麟。同时，又联系全体二十七师的官兵电告北京政府，揭露

以前给中央的电报，均是汤玉麟所捏造，现在全师官兵一致拥护张作霖。冯德麟见第二十七师的官兵仍然拥护张作霖，同时又知北京政府和吴俊升北镇均允出兵助张，于是中途撤消协助汤玉麟驱张的合谋计划，仅由驻黑山县新立屯的第五十六旅旅长张海鹏带骑兵一团，到北镇将汤玉麟拉走。从此，汤离开军队投到冯德麟处。

民国六年（1917 年）夏，张勋发动复辟，第二十八师长冯德麟响应，并带百余名卫队由北镇乘火车赴北京。当冯行至兰州车站时，即被讨逆军东路司令段芝贵所劫获，解至北京寄押。这时汤玉麟也跑到北京拥护复辟，面见溥仪，被口封为“虎将”。复辟失败后，冯被释放住在北京，汤则徒步跑回阜新县老家隐住。冯德麟离开北镇后，所遗第二十八师长一职，由张作霖兼任。不久，张作霖将二十七师长一职交给孙烈臣，将第二十八师长交给第五十七旅旅长汲金纯接任，将吴俊升部编为二十九师，并由其任师长。至此，东三省的三个师，均在张作霖的掌握之中。

四、保用王顺存

张作霖当奉天督军后，常对他的左右说，我们武人不懂政治，要想国强民富，必须选用人才，特别是行政部门。就是军队，我们也需要请人才。目前全省的军队，我虽然可以统一指挥，但官兵莨莠不齐。很多军官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甚至还有败坏军纪扰民害民的情形。地方虽军警林立，但土匪仍然到处为害，目前本想肃清匪患，但没有得力的人。事后他想起了 1900 年在海城当过县知事的王顺存（号理堂，河南商城人），勤政爱民，治匪有方，曾将张海鹏的亲兄弟土匪

报字“二连子”，捕获正法。张海鹏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带了数十个土匪，将他姑母家男女老少18口都打死了，王顺存下令追捕凶手。海城发生这个巨案时，张作霖正在新民府捕盗营当哨官，曾随知府到海城会验，故对此事知之甚详。同时，张还听说民国二年（1913年）王顺存在黑龙江任清乡督办兼全省警务处长和省会警察厅长时（当时朱庆澜任黑龙江巡按使），在三年内肃清了全省匪患，当时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称。同时，还开垦了很多荒地，安置了许多户人口，为此朱庆澜得到当时总统袁世凯的嘉奖，称黑龙江省的政治为全国之冠。王顺存以后又随朱庆澜调任广东省任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于1917年辞职回籍。张作霖知王顺存是个有才能的人，但并不相识，于是让其秘书长谈国桓去电邀王来奉，拟委为全省警务处长兼清乡督办。王顺存复电同意来奉就职，张惟恐张海鹏反对，于是在王未到奉之前，张即召集各高级将领开会，说明需用人才的道理，并说为了肃清匪患，已电邀请王顺存来省，拟委为全省警务处长兼清乡督办之职。果然张海鹏立时起来反对说：“叫他来吧！请大帅替我报仇。”张作霖当即驳斥张海鹏说：“你们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时你是私，王理堂是公。他身为县知事，职责就是为地方除害。当时不论是谁，只要是为匪害民的，被他抓住了都是难逃法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都当官了，有时也要杀些犯法的人，那些被杀的人，对我们来说能算私仇吗？”这几句话，说得张海鹏自知理屈，于是跪在地下痛哭流涕向张作霖说：“大帅既不与我作主，我就辞去旅长的职务，以私人的身份对付王顺存。”双方当场闹成僵局，虽经孙烈臣等将张海鹏拉走，会议还是闹个不欢而散。在会议的第二天，王顺存果然来奉，当晚即由谈国桓报告张作霖，张即将开会时张海鹏要报仇的

情形，告诉了谈，并且很发牢骚地说："我想用一个人都不能随便，我现在没有脸见王公。请你通知他赶快离省，张海鹏凶恶手黑，说得出就做得出，他手下的人在省城很多，如果王公出什么意外，我张作霖更对他不起了。"谈国桓于第二日早即将张作霖的意思转告王顺存，王随即乘当日晚车赴大连转回原籍。王到大连后，住于友人鼎新昌商号内。事后听说，张海鹏知道王顺存由沈去大连的消息，果然暗派一个差便到大连刺王，并应允如果刺王成功，刺客即晋升营长。但张派的刺客到大连后，因王住在其友人的商号内，并且在日本租界内，故未敢动手。1919年秋，孙烈臣当黑龙江督军时，感到土匪很多，剿不胜剿。正在苦无办法时，其左右向孙建议说，从前朱庆澜任黑龙江巡按使时，土匪很多，后经清乡督办王顺存清剿，不久即告肃清，所以王顺存在黑龙江省的威望很大。现在如能将王请来，予以重任，则江省的匪患，不难平定。王如能来省，一个人能抵一师的兵力，于是嘱米春霖和潘桂庭二人去电邀王，王得米、潘电后，即复电愿来。当王途经奉天时，适孙烈臣也在奉天，于是孙偕王见张作霖。张很客气地对王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于是电请北京政府，任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王顺存为人刚正，作风锋利，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又得张作霖的支持和信任，因而从前通匪济匪的地方势力，都不能掩护和包庇匪类。加之军警征剿得力，所以在三年内，将各地土匪肃清，王顺存调为东边道尹。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三次训教的追忆

〇王翔畴

我于1925年7月供职奉天省署一科，郭松龄反奉时曾被调充帅府秘书厅录事，耳闻目睹了张作霖的一些事情，但已年深代远，遗误难免，望知者予以补正。

向军、省两署职员介绍梁士诒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大获全胜，其势力括有满、蒙、京、津、直、鲁、皖、苏、沪、宁，为张氏极盛时代。

张以时机未熟，推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为讨好张氏，继以李景林、张宗昌为直鲁两省督办后，又秉承张氏意旨，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并派最高顾问梁士诒来奉天传达任命。梁士诒于袁世凯任总统称帝号时任财政总长，1922年因出任国务院总理，酿成第一次直奉战争。在直派曹锟任总统时，梁遁居美国，二次奉直战争后他又回到北京，欲重温总理旧梦，此次来奉，期在借重老张，请他上台。但这时张氏已别有良图，对梁虽礼遇有加，其实已是“敬而远之”了。



1925年7月中旬，张作霖在奉天省公署楼下大厅，向军、省署职员介绍梁士诒。

张作霖时年51岁，丰神饱满，意漫悠闲，着白色夏布长衫，套青纱团花马褂。他陪梁士诒登台落座后，指着梁用缓慢低沉的语气说："这位是前国务总理，现政府最高顾问梁燕老，你们都能闻名吧。燕老此次前来，第一代表执政对我有所指导，代表政府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省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省督办（时直、鲁两省督办已发表）。另外接受我的邀请，我对他有所领教。"说到这，他伸出手来向全场挥动一下，提高了嗓门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燕老是世界名流，是国家元老，此次到我们奉天，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今天燕老对你们要发表训话，传达政府对我们东北的期待，希望大家要精心领教，不要辜负燕老的热心。"

我当时来自农村，据父老传闻，张识字不多，出言粗鲁，"妈了巴子"是他口头语，开会讲话，照稿宣读，有一次把"扩充"念成"广允"，被传为笑柄。后来我问同人这次讲话稿子是谁写的？难得他念的那么熟练，不经思考即自出口，同人们讥笑我说：将来你给他写稿子吧，这次他是独出心裁。后来才知道张氏主要讲话，虽有底稿，但他总是约略一看，讲话时向来没拿稿宣读过，倘遇节会庆典"祝文"或致词，需要宣读时则由别人代读。

张作霖对教导队官佐大骂"郭鬼子"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率所部东北军精锐，于河北滦县倒戈东上，出榆关破锦州，直捣奉天。张学良拼凑留奉残部于巨流河布阵防御。张作霖一面将家眷财物迁往日租界，

准备必要时逃往大连；一面拼凑留奉残余，并招募兵员开赴前线抵抗。

11月26日（或27日）凌晨，驻北大营教导队大队副王瑞华，应召集合全部留守官佐来府。早8时左右，张作霖身着蓝缎灰鼠皮袍，套青缎高领坎肩，戴红桔四喜皮帽，穿高腰棉鞋走进来。台阶两侧架着机枪，前后院警备禁严，面对着百十左右名身着灰军装、徒手鹄立准尉以上的官佐，满脸杀气地厉声说："找你们来，我不说你们也都知道，郭鬼子反了！""怎么，你们教导队就这些人吗，我命令你们连司务婆子（司务长、准尉）都给我带来！"王瑞华在老张还没站稳时就发口令："敬礼"，这时他又前进一步举手敬礼说："报告大帅，教导队的官佐学兵大部都调走了，剩下这些人都来了。""你们他妈的为啥没走？要他妈的里勾外连吗？"

王又敬了个礼说："不敢、不敢。"

"把枪炮发给你们就敢了，我马上发给你们武器，让你们和鬼子里应外合，咱们干一场子，我张作霖要离开帅府一步，就是丫头养的！我知道你们都和鬼子勾通一气，你们回去告诉鬼子，让鬼子进来我等着他，我姓张的和他比试一下，把刀子插在胸口上和他干！我要眨个眼儿，就不是人留的。"

"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他妈的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死后也要入十八层地狱，脱驴变马去还人家。"

"我年轻时候，也当过兵，到朝鲜去打过仗。大清国那些官，就会喝兵血，见了洋鬼子，就跑的泞泥坑子冒烟，我怎能听那些王八蛋指挥，所以我不干了。"

"八国联军进北京，西太后带着皇帝逃到了关里大南边，后来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别的不算，单是赔款，咱们每一口人得拿一两银子。后来俄大鼻子赖在满洲不走，大清国许

可人家在这里修铁路。这时候我们一些青年小伙子，眼看着国破家亡，没有保障，才自个儿想办法让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成立大团，保护地面。有人说这就是胡子，对，我们那时候是不服天朝管的。”

“我们起初单凭血气之勇，当然免不了吃亏，军人使用快枪，我们只有洋炮。后来日俄又在辽东半岛打起仗来，在战争中洋鬼子也受利用。那时候我是得抢就抢，得骗就骗，但目的是为了武装自己，保护地面，世界上那有这样的胡子。”

“有了我们这样的胡子，东三省老百姓才吃上了太平饭。后来我们感到不和政府合作，成不了大事，我跟从大清，参加民国，是为了有政府作后盾才能保境安民呀。”

“我进奉天后，有人说对付洋人，老一套办法不行了，这才成立讲武堂，号召有志青年投笔从戎，保卫我们祖先留下的江山。我让小六子（张学良）出去和大家共同去保卫地面，收回主权。后来郭鬼子到讲武堂当教官，小六子说他是个人才，几年功夫就当上了军长，我哪一点对不起他？他认为自己有功，没得着地盘，我他妈的像陪送姑娘似的，得一个一个来，我是想让他掌握全局，将来还能没有他当督军的地方吗？哪曾想他人面兽心，干出这个丧尽天良的勾当！好，这回我把奉天让给他，看他能呆多久？王瑞华让你们这帮人和他里应外合，看你们能干多久?!”

王瑞华又挺胸敬了个礼说：“报告大帅，鬼子的亲信，早就调走。我们都是大帅、少帅的人，我们有天良血性，请把我们武装起来，我们去和叛徒决一死战！”

张作霖松了松脸，用和缓的语气说：“你们都能这样？”大家齐声说：“能够！”

老张接着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是鬼子的亲信。王瑞华，

我任命你为混成旅长，晋级少将。这些人（他用手指着那群人）每人都晋升一级，回去马上造成一个官佐编制名簿，明天就送上来。咱们有的是好武器、崭新的服装、上好的给养和银元大洋，马上招兵，越多越好，星夜操练，开往前线！好，带回去！”

在东北军善后会议上讲话让贤斥子

1925年12月29日（或30日），张作霖在帅府办公厅召开东三省军事善后会议。这时奉郭之战虽以胜利告终，但大乱初平，创痛正深，军事政治，百端待理。张于战争期间，为应付对方指责，曾通电承认连年参战，影响国计民生，并表示此次战争结束后，引咎辞职，还政于民。因而于战争后不得不有所表示，以符前言。另外，东北军在郭变之前，正酿成新旧两派对立局势，而此次打败郭军又以吉黑两省旧派军队出力较大，特别是擒郭者是黑龙江骑兵团长王永清。

参与此会者有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杨宇霆、王永江、袁金铠、王廷五及各厅处长等数十人。张作霖入场后摘掉四喜貂皮帽放在大案上，向会场环视一周，然后用低沉的语气说：“今天这个会，虽还由我主持，但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待的。”他望着袁金铠说：“四哥，你把通电先宣布一下，明天就发表。”袁即高声朗诵了通电，大意是“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因而“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政治交王公岷源（永江），军事交吴公兴权（吴俊升）二人主持，请中央派贤能前来主持东北大局，本人甘愿避让贤路”。袁还未读完，吴俊升起来摆手摇头说：“唔……（吴口吃）我一天也担任不了，你不干，咱们一块儿撂下。”王永江也接着站起来说：

"永江代理一省政务，也不称职，但有大帅在，我可以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误民。现在吴督军不肯负责军事，我又不胜任政治，东北大局，实不堪设想。倘国人招致内忧外患，大帅实有负国家人民倚托之重。"

杨宇霆站起来说："苏皖挫败以致牵动全局，招致叛变，我是罪魁祸首，理应明正军法。但蒙大帅宽容准许戴罪立功，这完全是从大局着眼。现在李芳林已退出天津，冯玉祥正挥军东下，我们应该赶紧收编郭军残部，封锁辽西要塞，然后派劲旅，策应直鲁联军，击败冯军，占领京津，以安定北方大局。在这种危急存亡之际，决不是大帅隐退休养的时候。"

杨发言后又有许多人发言，大意是，自民国以来内战连年，关内各省民不聊生，只有东北三省在大帅保护下，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这次事变，仅一个月就平定了，全仗大帅洪福……因而劝张不要隐退。

张作霖听后，起来让发言人坐下。他说："依大家意见，我只好勉为其难，将来如有人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避让贤路。"张作霖又向四周环顾一下说："常荫槐来没来？"常荫槐从后面角落里站起来说："我在这里。"张作霖忽然厉声说："常处长（军政执法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把张学良给我抓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常荫槐才想转身，吴俊升站起来摆手说："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张作霖怒气冲冲地对吴说："你有什么说的？"吴说："过去没有张军长还将就，现在没有他一天不行，一天也不行！""你胡说八道！"老张跺着脚说，声震屋瓦，全场震动，"唔……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二万人在山海关，马上和冯玉祥合了股，合了股一定要卷土重来。这股生力军，要比新民的郭军力量大上几倍。

打过来，奉天就不容易挺住。唔唔唔现在应该赶快收编郭军败兵，马上封锁山海关，这个任务没有张军长谁也不行。谁也办不到，唔唔我可不敢去，大帅去也不行，非张军长不行。唔唔，他一摆手那些人都回来了，冯玉祥来啥也不捞不着，那时直鲁军才能抄冯军后路。张军长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掌中了，到那时候我才敢保你进北京。”

这时张作相又起立要发言，老张大声喝道：“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这不是张辅臣吗，是你（用手指着张作相）三番五次向我说小六子行，让他带兵打仗，练达练达，谁想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他妈拉巴子讲武堂教导队，这些年花了几百万现款，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装腔作势，这帮杂种，‘天下好’（指王永清，骑兵团长）带一个骑兵团就打的他蒙头转向。鬼子、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瞧不起于兰波（于芷山。据说老张这是第一次称他们号），我的天下就是这样人打的。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李芳辰、张效坤、许兰洲这些人都是外来的，和我素无瓜葛。郭鬼子这人鳖羔子，到奉天来，一肩行李，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一个才，能忍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2000元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动得五体投地。这不是我二哥吗！（手指汤玉麟）谁不知道我们是穿着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的兄弟，讲阶级和郭鬼子拉平辈了。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功劳大？小六子上了贼船，鬼子教他学李世民清君侧，我不亲自枪毙他，对不住在座诸位，对不起阵亡的将士，对不起东三省父老兄弟。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你！”

这时杨宇霆站起来说：“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张军长现在一身系东北大局安危，为大局计，对张军长不但

不能法办，还应该授权给他统帅全军。一面收编旧部，一面进攻冯玉祥直鲁联军，会师天津，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咎一人。”

王永江站起来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休会，未决问题改日另议。”

这时，张作相、吴俊升二人上前每人扶老张一支胳膊强其退席。老张被拉起后还连说：“张学良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作霖家族及家产

◯ 张志强

家　　族

(一)

张作霖姐弟五人：同父异母的姐姐一人，为张有财前妻邵氏所生；同母异父的哥哥一人，系王氏由李家带来的，名作泰；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三人，即作孚（二哥）和另一个妹妹。在男孩里他大，排行老三。

张作泰在家务农，不幸因患痨病，20岁病死海城乡间。张作孚帮人办过“保险队”。张作霖去中安堡镇办保险，就是经他二哥和乡绅们推荐的。宣统年间在黑山一带，担当巡防队长。一次与杨花子股匪在吴家窝棚处交火，被流弹打死，遗下二子、三女，及年轻的媳妇。长女年方二十，长子学成（字铸卿）、次子学文（字右卿）刚近少年，其余的两个小女年尚幼。

张作霖当时正在洮南剿匪，听到此信不胜悲愤，派人来家乡探视。张作霖对其二嫂及侄男侄女还是很关心的。张任



奉天督军时，安排他们住在督署内宅，嫂夫人及学成、学文在西院有专门房间。二个侄男长成后，分别送国外留学。在家乡又指令专人，买好地600亩，供嫂夫人养老送终。

张学成、张学文少年时与张学良同受家庭教师启蒙教育。留学归来后，学成担当过张作霖的卫队营长。皇姑屯事件时，他正在山东做第七十师师长，隶属张宗昌部下。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大汉奸。当凌印清伪军被我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消灭后，张学成仍很猖狂。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任命他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他搜集了凌之残部，使用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伪旗，与王殿忠、李寿山等汉奸勾结，扬言要“揭旗西进，与锦州驻军炮火相见”。当时，张学良组织的临时辽宁省政府，就驻在锦州交通大学院内。

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这就使荣臻、米春霖等东北军指挥官觉得不好处理。张学良接报后，大义灭亲，特派第二总队长庄景福率二个总队，乘大车在高山子下车，转赴辽中。交战中，张学成及其日本顾问均被击毙。

张学成遗女闾华早亡，遗子闾庸由张学良一直抚养到西安事变（现住天津已退休）。

张学文，留学日、法两国，曾在东北军任团长，西安事变后解甲经商，现侨居南美巴西，有子三人，均在国外。

（二）

张作霖本人共有正式妻妾六房，即元配赵氏、继配卢氏（有称安夫人者）、三房陶氏（有称戴氏、王氏者）、四房许氏、五房寿氏（又名王雅君）、六房岳氏（亦称马姨娘、岳姑娘）。

张作霖从办保险队到督理奉天称王东北，张对这些家眷都是以排行相称，即三太太、四太太、五太太等。张作霖进

兵关内，进入中南海，自封大元帅的时候，由寿氏倡言，以娘家姓氏称，改称卢夫人，寿夫人……。

张作霖共有子女 14 人，其中女儿有：长女张冠英（即首芳）、二女张怀英、三女张怀瞳、四女张怀卿、五女张怀曦、六女张怀敏，儿子有：长子张学良（字汉卿）、次子张学铭（字西卿）、三子张学曾、四子张学诗（后改学思）、五子张学森，六子张学俊、七子张学英、八子张学铨。

张作霖的这些子女是五位夫人生育的。赵夫人生长女首芳、长子张学良、次子学铭；卢夫人生次女怀英、四女怀卿；许夫人生三子学曾、四子学思、三女怀瞳、五女怀曦；寿夫人生五子学森，六子学俊、七子学英、八子学铨；岳夫人生六女怀敏。

张作霖多儿女，总排行是按生年月日大小排列的。即：首芳、学良、怀英、学铭、怀瞳、学曾、怀卿、学思、学铨。他们的年龄相差很大，1898 年生首芳，1925 年生学铨，前后相差近 30 年。

（三）

张作霖之元配赵夫人，系黑山赵家庙人氏，年轻时性情刚烈，但富于感情。后经木匠高老惠（曾作过张作霖的学徒师傅和掌柜）作媒嫁给张作霖。张对赵氏一直是比较好的。张从赵家庙办保险起，经中安堡、八角台、新民府、郑家屯、奉天（沈阳）、洮南府、再奉天，赵氏一直跟随张之左右，为张排难解忧，调整张与其众义兄弟的关系，做的都很好。汤玉麟曾说："嫂子贤德，多少大事多亏了老嫂子啊！"后来张作霖地位高了，对赵氏渐渐疏远，赵氏乃返回新民县旧居，后死去。当时，首芳 13 岁，学良 10 岁，学铭 3 岁，张作霖厚葬赵氏。学良、学铭和首芳则由卢氏抚养。

继配卢夫人，北镇县人，名寿萱，长的美貌，又通文字，张作霖喜欢她，一直伴随左右。“九·一八”事变后，长期居住天津，1974 年 5 月病故，生二女。

陶夫人，亦是北镇县人，与张作霖结合很勉强，积虑在心，寡欢，后进庙当了尼姑。

许夫人，出身于天津教坊，性情刚直，遇事有见解。对子女要求较严。其女儿在奉天女师读书时，穿蓝布大褂，同学们都感意外。“九·一八”事变前，即迁居天津。“七·七”事变后移居美国。其子女除学思外，均长期侨美，并入美籍。解放后，只身回国，1976 年逝于北京。

寿夫人是满族旗人，世居奉天，单名为懿，有人称为张寿懿。黑龙江将军寿山的一个外室（王姓女子）的女儿，受过教育，长期伴张左右。在帅府，她占有多处住室，在商埠地张特为她建豪华府第。“九·一八”事变后，移居天津。解放前夕，离津赴沪转台湾，1966 年病故。

岳夫人，名叫月清，亦是奉天人氏，系寿夫人的贴身丫环。被张作霖看中，经寿夫人同意纳为妾。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她的包厢起火，脚趾被烧伤。她随同寿夫人，直到同去台湾。1975 年病故于台湾。

（四）

张作霖对其子女的婚姻，一手包办，具有封建政治色彩。长女冠英，嫁与鲍贵卿之女鲍毓才。“九·一八”事变后居天津，“七·七”事变后迁西安，”八·一五”光复后重返沈阳，全国解放前夕，又迁北京，1954 年病故。

次女怀英。1907 年嫁与蒙古达尔罕王之子为妻。当时张作霖率部驻防洮南（郑家屯），极力巴结有极大影响的清代蒙古王爷而促成的，不想此举给二女造成极大的苦恼。原来王

爷之子系先天呆傻，无力生活，因此婚后不久即回娘家居住，直到张作霖被炸身亡，才得离婚，嫁陈友涛，寓居上海。解放前返回天津，与妹怀卿同住。

三女怀瞳，1909年生，许给赵尔巽（两度督奉）的儿子赵天赐，"七·七"事变后迁居美国。

四女怀卿，1911年生，由张包办嫁给张勋（民初搞过复辟的督军）之子张梦潮。张梦潮患精神病，"九·一八"后依法离婚。怀卿居天津，现任天津市政协委员。

五女怀曦，1913年生，被许给靳云鹏（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之子，未结婚。张作霖炸死后，乃退婚。"七·七"事变后，随母赴美侨居。

六女怀敏，1924年生，毕业于辅仁大学，与翟文选（曾任辽宁省长）之孙翟元坤结婚。1948年随母去台湾。

长子学良（从略）。夫人于凤至（比张学良大6岁）吉林省梨树县人氏，名门旺族，与之结合门当户对。夫妻感情甚笃，生一女三子。女为大，名闾瑛，现居美国。长子闾玗、次子闾珣，均先后在美国去世，三子不满10岁，死于肺炎。

于凤至钟爱张学良，一直跟张学良由沈阳而天津而北京。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被扣，于凤至到溪口去陪伴张学良。"七·七"事变后，定居于美国。于尊重基督教义，与张学良离婚，促成张与赵媞小姐1964年补行婚礼。

赵媞（赵一荻），天津人氏。与张学良相识于北戴河海滨，一见钟情，来沈就读于东北大学。张学良很喜欢她，常与她一起到万国高尔夫球场（今沈阳北陵大街一段）打球，在北陵别墅度假。帅府花园门外的那座洋式小楼，就是张专为她修建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她一直追随左右，辗转浙、赣、皖、湘、黔、川等地，直至台湾。赵与学良生有

一子，名闾琳，现在美国，系太空署工程师。

次子学铭，赵氏所生。1911年冬，赵氏携学铭到奉天找张作霖，因家庭纠纷，于次日返回新民，竟成永别。张学铭曾作过旧天津市长，在北京病故。

其元配姚夫人，生一女，名闾娥。学铭出国后，姚氏与女儿长期生活在一起。

朱夫人于1933年与学铭结合，一起周游西欧及美国。太平洋战争以后，学铭在香港被劫而回国，住北京，有二子，长子允冲在港经商、次子鹏举在天津工作。

三子学曾，生于1911年，曾留学英国。二次大战后去美，在联合国工作。有二子一女。长子闾璜攻化学，在美国石油发展公司工作；次子学美术。

四子学思，性格直爽，有正义感。早年在东北军任职，黄埔军校毕业。西安事变张学良在南京被囚于宋子文公馆时，他曾苦求门卫而不得见。他经国民党中央军干团训练后，又被送往内战前线，几经周折，投身革命。东北光复后，曾出任辽宁省长，后致力于人民海军工作，被授予少将军衔。学思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鼓励。但不幸的是，十年浩劫期间，受迫害而死。

其妻谢雪萍（中共党员）在延安与其相识结婚，生有二男四女，男孩名先毅、仲群；女孩名晓晓、啸啸、乐然、子京。

五子学森，1920年生于沈阳，曾留美学飞行，光复后回国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少校秘书。1948年去台湾，后去夏威夷等地。有二女，闾衡在港经商，芳芳居台湾。

六子学俊，1922年生于沈阳，曾在辅仁大学肄业。光复后曾在国民党军统有关单位工作，1948年去台湾。

七子学英，1924年生于沈阳，一生无正式工作。1948年去台湾又转香港。1983年病逝于台湾，无子女。

八子学铨，1925年生于沈阳。当时由于郭松龄反奉，闹得奉天内外动荡不安，张作霖也六神无主，几次想迁居大连，并拟把家眷迁到别处。学铨出生在南满站（今沈阳站）日本铁路附属地日本顾问松井家中。学铨刚出世，张作霖就接到前线打来的电话说，郭松龄已被处决。于是张作霖高兴了，一拍大腿，就给学铨起了个小名，叫太平。“九·一八”后迁居天津。1943年到东北解放区，曾在营口税务局工作。天津解放后退职回津。1960年由周恩来总理过问，始安排工作，在五十五中学任教。退休后任区政协委员。爱人马蕴兰，有一女，名闾琪。

张作霖家族庞大，仅就张作霖本人而言，有8子6女；10个孙子，9个孙女。现在国内者9人。

家　产

张作霖的家产，和中国许多达官显贵一样，凭借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手中权力的扩大，其财产也就愈发恶性膨胀，很难用数字计算。

张作霖起家，大抵是从中安堡开始的。在这之前，他手中有浮财，在赵家沟买过土地。当他在中安堡办保险队以后，除继购田产外，又在姜家屯开办油坊和当铺。继而到八角台办大团，又营造宅第一处。迨到张受清廷招抚改编进驻新民府、当上巡防营的管带时，则是他敛财的起点。

张作霖平定五大哨匪帮，人马据为己有，各帮掠劫之金银财宝全部落入私囊，光是诱杀杜立三一伙匪徒，即获沙俄

“金卢布”400余万元。清政府旋又赏他白银1000两。此外还有日本东亚义勇军送给的经费和赏金，其数目外人不知道。这时候，张在新民县又建一所住宅，并开办了三畲油坊，新民当时是水旱码头，大豆及豆制品是出口商品，张为当地的军事长官，有权有势。金库里的钱，用句文雅的话来说，像辽河的水滚滚而来。

张作霖在新民，为了获取上级的欢心，送给张锡銮的赌款，一次即达20000两白银。

张以新民府为基地，不动资产急剧增加，三畲当、三畲粮栈和油坊相继开业；在营口大高坎、海城、黑山、姜家屯均有三畲当；在黑山又购地500多垧；在北镇购地1000余饷；在高山子营造宅第（后改别墅）一处。为了照管这些财产，张委派大批人替他经管，其中规模最大、买卖兴旺的要算后来在沈阳设立的三畲粮栈了。这个粮栈在皇姑屯车站附近，以经营军粮为主。也就是说，张作霖的几十万大军，每年耗粮数额巨大，统由张作霖所垄断。

到了张学良时代，又成立了三畲公司，除在皇姑屯设址外，在商埠地又另辟新址，大发其财。

张作霖以奉天的三畲当为总号，下设分号，遍布各地，以经营衣物、古玩、金银首饰、杂物典当为主，但是枪支弹药他们也接收。干典当买卖，有盈无亏，典价很低，获利甚巨。张作霖不以此为满足，在奉天又开祥钱号一处，专营货币买卖。

1907年，张作霖率部去郑家屯剿匪。适省府丈放土地，开垦荒地，在达尔罕亲王、博克图亲王、科尔沁亲王手下，除套购一大批土地外，并大做其军火买卖。办法是这样：将剿匪得来的一部分军火，以高价卖出去，再剿再卖，如此循环

不已，张作霖手中的黄金、白银、珠宝、外币源源而来。

在奉天，张作霖由中前路巡防营改编为二十七师师长，当了督军、巡阅使直至独霸三省而称王，权越大，财越多。

1916年，张在奉天盛京通济仓附近建起二进四合套宅第一座，青砖对缝，雕梁画柱，十分豪华。两年后，又营造了罗马式大青楼一座。在商埠地五经街一带，又为寿夫人、岳夫人分别盖了豪华的三层洋楼各一栋。

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地位不稳，准备南下大连，以27辆汽车，载着金银财宝送日本南满站货栈保存。与此同时，还打发五姨太太寿夫人和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携带5万银元，到东北医院慰问受伤官兵；以10万元招募新兵，与郭松龄背水一战。而这些，对张作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1919年，天津最早的纺织工业——恒源纺织有限公司，是由恒源帆布公司和直隶模范纱厂合并而成的，当时直系的大头目曹锟、曹锐（直隶省长）控制这家公司。张作霖为了挤进这家全国有名的新式工厂，曾参与公司的发起，但由于曹锐怕张的股份太多，有被其独吞的危险，对张的投资加以限制。结果，张作霖仅以海城三畲堂的名义，投入500股（每股100元）。几年后，张以官商合办名义，出资450万元建立奉天纺纱厂（今沈阳纺织厂）。

1919年，张作霖以30万元借给政记轮船公司，并以东北官商名义，加股200万元资助张本政渡过难关，获得从日本等地运送军火或物资的特权，大发财源。同年，张作霖在大连兴建别墅一座。

也是在1919年，黑山八道壕煤矿内部不和兴讼，这个由阜新县人刘甲三等开的矿行将破产。张作霖竟乘人之危，投资于此矿，聘阎廷瑞为第一任督办。继之又以王正黻（外交

总长王正廷弟，系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毕业）为总办，以70万元投资于该矿。民国20年又增资200万元，日产原煤250吨。后经张作霖同意，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东北矿务局，吸收西安煤矿资本220万元、复县复州湾煤矿资本200万元、海城大岭滑石矿资本10万元、集安县马宝州金矿资本4万元，阜新煤矿、兴城高儿沟煤矿亦入股，张作霖投以大股，与其抗衡。并投资于奉海铁路、大通铁路、东北银行、大亨铁工厂，乃至惠临火柴公司、肇新窑业公司，都或多或少有张作霖的资本。

20世纪20年代，张的政治势力上升，军事势力膨胀，张作霖以官商合办或官民合办名义，投资于工商业，大发其财。

张作霖对新兴的民族资本工商业，均投资，坐分余利。更有甚者，民国9年，张作霖以泰来的400万公顷土地，与日本民间财团巨擘大仓喜八郎，共创中日合办兴发公司，经营粮食、畜牧和土特产品。这在当时，东北土地出租外国问题尚未解决，张作霖却抢先一步做成这笔买卖，出卖主权，与日本人快乐分肥。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我的一家

○张怀英 口述 胡 滨 整理

我父亲张作霖，字雨亭，原籍有说是山东，也有说是河北。据说在清代道光初年由关内逃荒，流落到海城县落户。祖父生有三子，长子张作泰，次子张作孚，三子便是我父亲。父亲年幼时家境贫寒，仅读过私塾，不久即辍学，改学兽医。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营口参加了清军。因父亲精于骑射，又会相马，很快即被擢为哨长（排长）。战争结束我父解甲还乡，不久即与赵家庙（今属北宁市）村农民赵占元之次女结婚。婚后曾一度到营口附近大高坎镇开一兽医桩子，为人医马。其后又回到赵家庙组织“保险队”，充当小头目。因“保险队”不断扩大，嗣被清廷招抚，到新民任清军管带。以此为起点，我父平步青云，逐步由清军巡防营统领进而升任民国陆军师长，奉省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

我父共有妻妾六人，生有八子，六女。妻妾六人是：元配赵氏，即赵占元之女，二房卢夫人，三房戴夫人（后出家为尼），四房许夫人，五房寿夫人（亦称五夫人），六房马夫人。过去对这些眷属均以排行相称。称大太太、二太太……。我父亲进入北京中南海居住后，家属也随之搬入怀仁堂。寿

夫人首先提议，今后统以娘家姓氏相称，不再用三太太、四太太这类称呼，经我父亲同意，以后均按姓氏称呼。

六个女儿是：长女张冠英（首芳）、二女张怀英、三女张怀瞳、四女张怀卿（亦作青）、五女张怀曦、六女张怀敏。长女为赵夫人所生，二、四女为卢夫人所生，三、五女为许夫人所生，六女为马夫人所生。

八个儿子是：长子张学良、次子张学铭、三子张学曾、四子张学思、五子张学森、六子张学浚（亦作俊）、七子张学英、八子张学铨。张学良、张学铭为赵夫人所生；张学曾、张学思为许夫人所生；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为寿夫人所生。

赵夫人是我的东房妈，什么时候去世，我记不清了，据说是在张学良 11 岁时因病去世的。后来，随我奶奶王氏的灵柩，一同移葬在辽宁省锦县（今凌海市）驿马坊。卢夫人在天津去世，骨灰盒还放在天津。亲属曾有将之和我父亲合葬的想法，由于多种原因，至今也没实现。许夫人在北京去世，葬在北京八宝山上。寿夫人、马夫人都在台湾逝世。

家中儿女婚事，均由父亲包办，儿女必须从命，学良 15 岁结婚，于凤至大于学良。我及笄后被许与蒙古达尔罕亲王之子。此人有神经病，非常粗野，我含泪多年，常住娘家，直至父亲在皇姑屯被炸去世，才解除这段包办婚姻，另与陈箓之子陈友涛结婚。其余各女婚姻亦均在父亲包办之下而成，父亲去世后，始获自主。如五女张怀曦，原与靳云鹏之子订婚，双方并无感情，最后也解除了婚约。

我父亲平日总是身着长袍马褂，抽旱烟袋。他最喜欢打麻将，斗十胡（纸牌），不论是在奉天（沈阳）或在北京、天津，总有一伙人陪他打牌。有时在家里犯牌瘾，便把子女晚

辈叫来陪他玩。

1928年父亲由北京返回奉天，乘坐的车是当年慈禧太后所置备的专车，车内装潢极讲究。一间大客厅，一间大卧房，车内全用金黄色丝绒装饰，窗帘、座椅皆为黄色。当时马夫人随行，在卧房内为父亲烧制烟炮。专车自北京动身时，奉天即接到电报，吴俊升特地赶到山海关去迎接。吴俊升登车后，在客厅与我父亲相对而谈。专车上除马夫人随车服侍外，另有医官杜泽先和理发师陈师傅。杜医官自18岁即为父亲看病，每赴各地，必随侍在侧。父亲在皇姑屯被炸，据杜医官诊断，是脑震荡过重，流血过多，所以等抬到大帅府时，人已奄奄一息，只是，口中仍不断咒骂："小日本真可恶，我知道是谁干的。"我父亲说这话事出有因。从北京出发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我父亲签字（要求兑现"日张密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我父亲受伤后由张学曾、杜泽先、齐恩铭等抬至大帅府，不久就去世了。但对外严格保密，不管谁来探望，只告大帅伤势轻微，正在治疗。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进去，家人一律不准啼哭，不穿孝服。从外表上看，非常镇静，一如往常。日本领事馆每天都有人来探视，概由杜医官代见，以病人需要安歇不能会客为由婉言谢绝。我家所住的大帅府，前院是一幢小楼，后院是一幢大楼，我们在院中经常发现有日本人在城墙上用望远镜向院内窥视，因院内安静如常，所以他们疑信参半，摸不清底细。

我大哥张学良，于父亲死后半个月才回到奉天，是化装混在闷罐兵车中回来的。他面色黝黑，胡须和头发都很长，身



上穿了一身灰布军装。直到他开口说话时，我们才认出。我大哥在灵前失声痛哭，我们也随之哭起来，积闷于心中10余日的悲恸，这时才得以号啕出来。即日，对外发表大元帅不幸逝世的讣告，日本政府还假惺惺地派来一个特使林权助到帅府吊唁。

我父亲死后，是从外边请的木匠拢的棺材。来人在帅府吃住，不准外出。棺材是阴沉木的，打完后漆了好多遍，又黑又亮。入殓后，灵柩曾停在元帅府内。因“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奉天后，我们全家人都跑到北京去了，后来把我父亲埋葬在锦县（今凌海市）驿马坊和我东房妈赵夫人葬在一起。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

在帅府居住过的张氏眷属

◯ 杨景华

1912年，张作霖举家迁入奉天，先租赁荣厚在大南门里的住宅。当时随迁的家属有：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张作霖的二夫人卢氏（名寿萱）、三夫人戴氏、四夫人许氏（名澍旸）。及子女：长女首芳（冠英）、长子学良、次女怀英、次子学铭、三女怀瞳、四女怀卿、三子学曾。以及张作霖二哥张作孚的妻子和长子学成、次子学文和三个女儿。

从1916年三进四合院落成，一直到1928年张作霖去世，居住在张氏帅府的张作霖的眷属情况如下：

1. 张作霖的母亲王氏。黑山县人氏，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十二日。卒于民国二年（1913年）8月23日，享年77岁。同年10月13日葬于锦县（今凌海市）驿马坊。有资料说，民国五年张作霖将其显妣由黑山县移葬在驿马坊。此说不准确。袁金凯所撰写的碑文中明文写着："太夫人生于道光丁酉年正月十二日，卒于癸丑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寿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十三日，葬于锦县（今凌海市）东北七十八里之驿马坊"。民国五年是张作霖重新在基地立碑的时间，根本无移葬之说。

2. 张作霖的二夫人卢氏。张作霖的元配夫人赵氏，系黑山县赵家庙人，赵氏性情刚烈，富于感情。与张作霖同岁，21岁时与张作霖结婚（1895年）。生一女（首芳），二子（学良、学铭）1912年4月病故于新民。未进奉天居住。

卢氏夫人在赵氏去世后扶为正室。卢氏北镇人，名寿萱。1900年秋与张作霖结婚为二太太。卢氏有文化，性情温和，待人宽厚，赵夫人去世后，卢氏待张学良姐弟三人如己出。一直伴随张作霖左右。“九·一八”事变后，长期居住天津。1974年5月卒于天津。生二女（怀英、怀卿）。

3. 张作霖三夫人戴氏（亦有说陶氏、宪氏、王氏者说法不一）。戴氏原北镇县内捕盗班头之儿媳，貌极美，被张作霖看中后，请杜泮林设计说媒，终用重金，将戴氏娶为已有。先在外边居住四个月，后于1906年与四夫人同日进门。戴氏性情暴躁，有洁癖，与张作霖结合很勉强，婚后郁郁寡欢，无子女，后离家入佛门。

4. 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氏。许氏名澍旸。河北宛平县人，随母逃荒流落到新民县，以给人家缝补浆洗为生。一日，正在井台打水，被张作霖看中，强娶为四姨太。1906年与三夫人同日进门。许氏性情刚直、宽厚，遇事有见解，教育子女有方。生两女（怀瞳、怀曦），两子（学曾、学思）。“九·一八”事变后迁居天津，“七·七”事变后移居美国多年。解放后，许夫人毅然只身回国。1976年于北京病故，葬于八宝山。

5. 张作霖的五夫人寿氏。寿夫人，满族旗人，世居沈阳，单名懿字，故人称张寿懿。系黑龙江将军寿山的一个外室王姓女子所生。又名王雅君，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水平。精明能干颇有见识，但有些跛扈。长期伴随张作霖左右，最为张作霖宠爱。1917年入帅府。生四子（学森、学俊、学英、学

铨)。“九·一八”事变后，移居天津，1948年离津赴沪转赴台湾。1966年在台湾病故。

6. 张作霖的六夫人马氏。马氏名月清（亦作马岳卿），人称岳姑娘。马氏出身贫苦，从小被卖到天津南市广兴里天宝班作艺妓。1923年被张作霖相中（时年18岁），经五太太寿夫人同意，从天津接到奉天，先以五夫人贴身丫环名义居住帅府，以消除妓女舆论。不久由五夫人出面张罗，收为六姨太。生一女怀敏。皇姑屯事件中，脚趾被烧伤。她始终追随五太太寿夫人，直到1948年同去台湾，1975年病逝于台湾。

7. 张作霖长女首芳。又名冠英。1898年由赵氏所生。她在兄弟姊妹中最长，许配给原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之子鲍育才为妻，婚后随鲍育才驻扎营口。“九·一八”事变后居天津，“七·七”事变后迁西安，日本投降后再迁沈阳，全国解放前迁居北京。1954年逝世。生三女二子，长女鲍毅生前为一机关干部，女婿王雨农也是一机关干部。鲍毅1973年逝于北京，鲍毅之长女王秦在社科院中国近代史所工作，专攻东北军史。

8. 张作霖长子张学良（略）

9. 张作霖的长儿媳于凤至。生于1897年5月8日，梨树县人，由双方父母包办于1916年春与张学良结婚。婚后张学良一直以大姐呼之。因于凤至受过教育，人又十分贤慧，婚后夫妻感情倒十分和谐。1916年底生女儿闾瑛。1917年生长子闾珣，1918年生次子闾玗，1919年生三子闾琪。闾琪于1928年底因肺结核早逝。

10. 张作霖的二女儿张怀英（卢夫人生）。1907年生。两岁时其父母包办许配给蒙古达尔罕王爷之子为妻。王爷之子先天性呆傻，因此婚后不久即回娘家长期居住，直至张作霖死后，依法办理离婚，后改嫁给陈箓之子陈友涛。寓居上海。

全国解放前到天津与妹妹怀卿同居，无子女。

11. 张作霖次子张学铭。字西卿。1904 年生。1923 年 5 月与东北医院姚院长女儿姚小姐结婚，这门亲事也是张作霖一手包办而成。1925 年生一女儿取名闾娥。后张学铭出国留学，姚氏与女儿长期生活在一起。居天津。闾娥原在天津第二中心医院工作（图书馆管理员），现已退休。爱人何炳辉为天津医疗器械公司工程师，生二男二女。

1933 年张学铭与朱洛筠结婚，并周游西欧各国及美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学铭夫妇在香港被迫回国，曾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建国后为全国政协常委，1983 年去世。张学铭与朱夫人生二子。长子允冲在港经商，次子鹏举在天津市政工程局工作。

12. 张作霖三女张怀瞳。1909 年许氏所生，由父亲包办嫁与赵尔巽之子赵天赐，婚后夫妻感情融洽。1937 年“七·七”事变后迁至美国至今。

13. 张作霖四女张怀卿。1911 年卢氏夫人所生。由父亲包办嫁给张勋之子张梦潮。梦潮患有神经官能症，婚后感情不合。“九·一八”以后依法办理离婚手续，一直住天津，为天津市政协委员。1990 年 6 月 5 日来帅府参加张学良 90 寿辰祝寿活动，并题词“福寿康宁”。

14. 张作霖的三子张学曾。1911 年许夫人生。学曾少时顽皮，争胜好强，在帅府中是惟一敢向父亲提出要求的人。1937 年“七·七”事变前出国，留学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赴美国。在联合国工作任普通职员，现已退休。生二子一女。长子闾璜，在美国学化学，现任美石油研究发展公司研究人员。次子学美术。

15. 张作霖的五女儿张怀曦。1913 年许夫人生。由父亲

包办许配给原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之子，未结婚，张作霖死后解除婚约。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母赴美侨居，在华盛顿工作。1991年7月10日其子张永琪偕妻子许秋玲、儿子张东安来帅府参观，并题词“多谢家乡父老还记得张将军。”

16. 张作霖四子张学思。1916年许夫人生。学思原名学诗。性格直爽，有正义感，聪明好学。早年在东北军任职，黄埔军校毕业。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囚禁于宋子文公馆时，他曾苦求门卫而不得见。他经国民党中央军干团训练后，又被送往内战前线，几经周折，投身革命奔赴延安，在延安与谢雪萍相识而结婚。东北光复后，率部进驻沈阳，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后致力于人民海军工作，任海军副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等职，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学思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接见，鼓励。但不幸在“文革”期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学思有二子四女，长子光毅，次子仲群。女儿依次是晓晓、啸啸、乐然、子京。1990年6月5日，谢雪萍同志来帅府参加张学良90寿辰庆祝活动。1992年7月29日，张光毅来帅府参观，并题词：“盼大伯早日还故里，盼内外亲友早团聚。”

17. 张作霖五子张学森。1920年寿夫人生。是张作霖最宠爱的儿子。曾留学美国学航空飞行。日本投降后回国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少校秘书。1948年去台湾，后去美国夏威夷，在某航空公司工作。现已退休。生二女，长女闾衡在香港经商，次女闾芝在台湾。1992年9月19日，张学森偕夫人和女儿闾衡、闾芝来重修后的帅府参观。对帅府修复工作很满意，再三对辽宁省政府表示感谢，并由闾芝拍摄全部录相转送给张将军。张学森题词“六十年后又回故里”。

18. 张作霖六子张学俊。1922年寿夫人生。40年代曾在

北京辅仁大学肄业，日本投降后曾在国民党军统有关单位工作，1948 年去台湾。

19. 张作霖七子张学英。1924 年寿夫人生于沈阳。一生无正式工作。1948 年去台湾又转赴香港，50 年代末又回台湾，1983 年逝于台湾。无子女。

20. 张作霖的小女儿张怀敏。1924 年六夫人马月清所生。1947 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与翟文选（原奉天省长）之孙翟元堃结婚。1948 年随母去台湾至今，在某大学家政系任教。翟元堃为某单位总工程师。生二男一女，男名鲁平，芸台，女名海蒂。

21. 张作霖的老儿子张学铨。1925 年 12 月生于沈阳，寿夫人所生。当时由于郭松龄反奉，闹得奉天内外动荡不安，张作霖六神无主，几次想迁居大连、火烧大帅府，并把家眷迁到别处。学铨出生在南满站（今沈阳站）日本铁路附属地日本顾问松井家中。学铨刚出世，张作霖就接到前线打来电话说，郭松龄已被处决。张作霖十分高兴，一拍大腿，就给学铨起了个小名，叫“太平郎”。“九·一八”事变后，随母迁居天津。1943 年后由天津到东北解放区。营口解放时进城，在税务局工作。天津解放后，退职回天津。1960 年经周总理批准由天津市安排在 55 中学工作。现已退休。任天津区政协委员，爱人马蕴兰在先锋幼儿园工作，生一女名闾琪，在天津十二幼儿园工作。1991 年 6 月 5 日学铨夫妇携女儿来帅府参加张学良 90 寿辰庆祝活动，并赠寿联四幅。

22. 曾在帅府生活过的张作霖的孙子，有张闾珣、张闾玗、张闾琪。（有资料把长孙闾珣写成闾琪，是错误的；还有的说三孙闾琪早在 1925 年时就夭折，这些都不准确。此文采用资料是张作霖哀挽录中引状一文记载。从此文中可以证明，

在张作霖去世时，闾琪仍在。）

此三人均系张学良的儿子。是于凤至所生。1928年底闾琪夭亡。闾珣、闾玗早年随母于凤至赴美国定居，各先后在美国去世。

23. 在帅府生活过的张作霖的孙女有2人：即张闾瑛、张闾娥。

闾瑛系张学良、于凤至之长女，生于1916年，随母赴美国定居，嫁陶鹏飞为妻。

闾娥系张学铭与姚氏小姐所生，一直随母居天津。

24. 在帅府居住的张作霖其他眷属还有张作霖二哥张作孚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现将其两个侄儿介绍如下：

张学成，字铸卿，从小丧父由张作霖抚养，与学良一同入学受教育，并送国外留学，回国后担当过张作霖的卫队营长。皇姑屯事件时，他正在山东任第七十师师长，隶属张宗昌部下，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成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当了大汉奸。当凌印清伪军被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消灭后，张学成仍十分猖狂。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任命他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他收罗了凌印清的残部，与汉奸王殿忠、李寿山等勾结向张学良组织的临时辽宁省政府驻地锦州进攻，扬言“扬旗西进，与锦州驻军炮火相见”。因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使荣臻、米春霖等东北军指挥官觉得不好处理。张学良得知后，大义灭亲，特派第二总队长庄景福率二个总队乘火车在高山子下车，转赴辽中，将张学成及其日本顾问击毙。张学成遗女闾华早亡，遗子闾庸由张学良一直抚养到西安事变后止，现居天津，为天津化学工业公司会计师，曾任科长，现已退休。

张学文，曾留学日本、法国多年。1933年张学良将东北

军所属各旅改为师制，卫队统带部为一〇五师，张学良兼师长，张学文任第三旅第九团团长。1987年偕夫人王文瑞、子张彤光，儿媳杨冈英参观帅府，题词“故园依然”。西安事变后被迫弃甲经商，曾定居巴西。生三子，长子间纲，美国力学博士，任职芝加哥大学副教授，在阿岗原子能研究所作科研工作。次子间宁，美国力学硕士，任职美国西屋公司核子发电研究所工程师。三子彤光，曾任巴西某大学电影系讲师，富乐斯多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现经商。曾于1980、1987、1993年多次参观帅府。1992年9月张学文的长儿媳张临芃携两个女儿来帅府参观。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37辑〕

张氏帅府建筑群沿革

〇 杨景华

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8号的大门两侧，挂着“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和“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两块牌子。这个由青砖高墙围起的建筑群及东侧、东南侧的建筑群，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故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张氏帅府。

张氏帅府，又称“大帅府”，也有人称“少帅府”。是奉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其长子，“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的官邸和私宅。

张氏帅府建筑群，从1914年开始兴建，到1933年止，逐步形成了由帅府中院、东院、西院和院外四个部分组成的风格各异的建筑群。张氏帅府总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6万平方米。该建筑群的产权归张学良将军私人所有，由沈阳市人民政府委托房产部门代管。1985年3月，沈阳市人民政府将张氏帅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2月，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7月，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文，把张氏帅府建筑群列为全国优秀近代建筑群之一。1993年8月，辽宁省政府向国家

申报，要求把张氏帅府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12月，辽宁省政府成立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张氏帅府的保护和维修工作亦由该馆负责。到1992年3月底，张氏帅府的中院和东院在租用单位搬出后，也划归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管理，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维修复原，张氏帅府基本恢复原貌。并先后举办了《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业绩展览》和为张将军88寿辰、90寿辰祝寿书画展览。部分房间复原展览，也于9月中旬全面对外开放。

笔者是张学良旧居陈列馆馆长，在修复张氏帅府时，曾走访过当年知情者，查找过大量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帅府建筑的实地考察，综合整理出关于张氏帅府建筑群沿革资料，以供广大观众读者和文史工作者参考。本文按张氏帅府建筑群建筑时间顺序和分布，记述如下：

一、帅府中院——三进四合套院

1911年，张作霖已担任奉天前路巡防营统领，驻扎在洮南府。10月10日，武汉爆发辛亥革命。奉天革命党人在张榕等领导下也在酝酿武装起义。张作霖于26日率部星夜赶至奉天，为赵尔巽“勤王救驾”。率部先住在奉天城大南的来升店。逼走蓝天蔚，计杀张榕，屠杀宝昆和田亚赟。张作霖踏着革命党人的血泊，进了奉天，当上了保安会军政副部长、第二十四镇统制、“关外练兵大臣”，掌握了奉天的军事大权。1912年9月，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而后，张作霖开始安置家眷，置办产业。先在大南门里，通天街左侧租赁了道台荣厚的一套旧宅居住。1913年底，将荣厚旧宅买下来，同时又将西侧的江浙会馆购买下来。1914年夏，

将这两处旧宅全部拆除。于秋天开始动工修建这座三进四合套院和西院北部的两组四合院。三进四合院是吸收奉天城清朝各王府建筑特点，遵循张作霖家乡辽南的生活习俗而建起的。1915年秋基本竣工后，又进行了室内外装修。1916年秋，全家搬进四合院。

三进四合院建成后，张作霖已升任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人们开始称张作霖为“大帅”，知近者称“雨帅”（当时中国的官场都称各省的督军为大帅）。因这新三进四合院即是张作霖的办公官邸，也是家眷居住的私宅，故此，人们习惯称其为帅府。

三进四合院坐北朝南，呈“目”字型，青砖珑瓦，飞檐兽吻挑脊，雕梁画栋，朱漆廊柱，石鼓柱础，石条台阶，方砖方石铺地，是砖木结构的仿王府式建筑。全院占地3900平方米，房屋共13栋，计57间，建筑面积1460平方米。

正门前院是一个东西长百米，南北宽16米的长方型大院，东侧开有东辕门，中间二门，西侧开西辕门。正房门迎门处是一面中间高两侧低并扇开的挑檐起脊、青砖磨砖对缝的大影壁，影壁正中镶嵌着一块雕有“鸿禧”二字的汉白玉，影壁四角雕有凤凰和雄狮。两面侧壁都有精美的砖雕图案作装饰，十分雄伟。正门前青石板铺垫门阶，门阶两旁立有上下马石。正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上卧的大狮子抱着小狮子。正门房由7间组成，中间为门洞，中3间为回缩门廊，廊柱上部木雕彩绘雀替和镂空雕花。朱漆大门扇上绘着秦琼、敬德两个门神，门洞内侧上方悬一块横匾，上书：“治国护民。”

一进院是大块方青石板铺地。门洞两侧各3间，东3间为警卫室（2间）、传达室（1间）；西3间为电工室（1间）、电话室（2间）。一进院有东西厢房各3间。东厢房是帅府的

内账房，掌管帅府内的财务开支。西厢房是帅府承启处，设文武承启官，专门接待、禀报、引进前来帅府公干或拜访的文武官员。

厢房南端两隅各有六角月亮门，门内各有 3 间耳房，东耳房为帅府厨房，门前有一个手压的水井，供厨房用水和帅府院内用水。以后因帅府人员增加，又在东花园内靠厨房后边加盖 5 间瓦房与厨房连接。西耳房为厨房仓库和厨师休息室。

与二进院相间隔的是一面 7 米高的磨砖雕饰的高墙，中间开有大门、门口透雕垂花顶饰门楼，方台浅阶，称为垂花仪门。两门柱有护柱抱鼓石，和石狮伏立的石鼓门枕石。门内有一座两重木屏壁，木屏可以对开。两侧可以沿回廊绕行入内。此处仪门是张作霖当年迎接贵客时举行仪式的地方。遇有重要客人到来，木屏重门中开，张作霖出迎，客人可从中开的重门拾阶而直入二进四合院。帅府人员和普通客人都从木屏两侧绕行沿回廊入内。

二进院，呈长方形，比前院大些，方砖铺地，周围有起台回廊四合。30 根笔直廊柱环列于鼓形柱础上，绘栋彩方，庭院幽雅。二进院是张作霖搬进院后办公和会客的地方。正房 7 间，中间一间为过厅。门前，修一雕花门楼，门楼正上方悬一横匾，上书“望重长城”。正房东 3 间依次是张作霖的卧室、办公室。北侧有一走廊，走廊尽头和卧室的交叉处有一小单间，是张作霖的洗澡间。西 3 间，两间为一大屋是会客厅，一间为书房。

东西厢房各 5 间，东厢房中间为厅，南屋为秘书长室，北屋为内收发(即机要秘书室)。西厢房只有北两间处一道间隔，不设厅堂，是一般秘书室。二进院正房东西两侧山墙处都起

台建有回廊，各有角门通往三进院。东侧回廊外的东围墙处开一个角门，通往东院帅府花园和小青楼。在东院，角门被花园假山山洞所隐蔽，是帅府花园中的曲径通幽一景。

三进院与二进院形制相同，是帅府的内宅，张作霖的家属大都住在此院。正房为7间，中间厅堂供奉张家祖宗灵位。东屋为张作霖的二夫人卢氏居住（张作霖元配夫人赵氏于1912年去世，尚未进帅府）。西屋原为三夫人戴氏居住，后因其弟在帅府任侍卫时，醉酒以枪击路灯，被电灯厂告发到帅府，张作霖将其弟枪毙，戴氏含愤出家为尼，不久郁闷而死。1917年张作霖娶王雅君为五夫人，改名为张寿懿，居住此屋。小青楼建成后，五夫人携张作霖几个较大的女儿去小青楼居住。东厢房为四夫人许氏居住。张学思同志生于此屋。

西厢房是张学良与于凤至居住。四合院落成后即为张学良与于凤至举行结婚仪式，新房就设在西厢房的北屋。张学良的女儿闾瑛和三个儿子闾珣、闾玗、闾琪均出生在此屋。三进院正房东西两侧各有两间耳房，是帅府的仆人居室。

1922年以后，大青楼建成，张作霖搬入大青楼一楼办公。家眷也大部分搬入大青楼内，三进四合院改成巡阅使署办公处。

帅府中院的建筑是典型中国传统的古典式建筑。在细部处理上既沿袭中国传统的民间风俗，也呈现了东北，特别是辽南风土民情。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建筑的雕刻上。

二进院和三进院的正房窗下墙裙处，都镶嵌着1米高的砚石石雕各26幅。一、二、三进院厢房和门房、山墙的础石也都镶有多幅寓意深刻的石雕。石雕题意多为富贵吉祥、功名利禄的内容，也有历史典故。东北农村盛产的萝卜、白菜、茄子、辣椒、高粱、谷子，乃至辽南西部张作霖老家盛产的

芦苇、河蟹等都作为题材，雕刻在石上、砖上和木头上，用来镶嵌帅府的建筑。还有几幅虽放在不太惹人注目的地方，但其寓意揭示了房子主人的雄心报负，甚至一反帅府以狮子、马为中心题材的惯例，竟以龙饰纹作为陪衬。这些石雕画创作，是张作霖当师长的时候，而题材竟是“吃各国”、“握环球”，让“外国进金钱”的内容，已大大超出一般民间习俗了。

帅府内的雕刻，集中三进四合院，这些栩栩如生的作品，在东北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就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艺术水平之高，在全国也属罕见，是研究帅府的重要资料。

二、帅府东院——帅府苑

帅府东院，原是帅府的后花园。也称帅府苑。四合院建成后于 1915 年即开始修建帅府花园及小青楼。1918 年小青楼落成。1922 年大青楼落成。

花园内有假山 3 处。一处在东南端，山上有八角亭，亭上有开阖门窗，内设几座，地下有方窖。这座假山北端落角处是东大门，门房 3 间，中为拱形门洞，可通汽车，两侧为门房。

花园正南面是荷花池，池内养鱼。荷池北与小青楼之间以怪石修建花圃亭台。小青楼与四合院二进院东角门相连有一处假山，假山有一山洞将二进院的东角门掩蔽，洞长两丈许，可直达小青楼廊门。此处假山其余部分沿花园两墙向南延伸与帅府厨房相接。假山上布满青苔、异草和树丛。

花园北部与三进院正房平行向，有一处东西向横卧的假山，山上奇石丛垒，花木间杂。假山在正对大青楼正门台阶处，修一山门洞，洞阔可通小汽车。门洞上额有张作霖自题

石匾。现南侧为“天理人心”，北侧为扇形石匾，上题“慎行”。假山上有石阶走道，东侧山峰上有怪石堆立的亭洞。四周长满了梧桐，花椒和皂角树。花园里用青砖和青瓦铺砌成甬路，甬路两侧栽满了奇花异草和东北民间花草。

依据辽南民间习俗，在房舍的东北角都修有祠堂、家庙或狐仙堂。张氏帅府也不例外，在东院的东北角建有一处3间瓦舍家庙，并用青砖围墙围定。张作霖尚武，尊崇关帝，因此在家庙的正中一殿，建有关羽塑像，两侧分别是关平和周仓，四季供奉香火。正殿东侧一殿，是张家的祖宗灵位。西殿供奉有关关公的书画，以及张作霖与绿林兄弟磕头时所换的兰谱。

在四合院的东北侧，也就是大青楼后西北角（现省图书馆俱乐部）建有狐仙堂，里边供奉胡三太爷和胡三太奶（已毁掉）。

小青楼位于帅府东院花园的中心，也叫园中花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两层砖木结构小楼。楼体呈“凹”字形。层顶、山墙、门楼、两层回廊是中国传统式建筑。门窗、楼的后半部，以及楼内设施，则采用西洋式建筑手法。最为典型的是窗口的砌筑风格。砌口的正中上方一块砖雕（叫镇石），设计方法是西式的，而砖雕艺术、方法、风格则是中式的。全楼共30个窗户2个门，其中有砖雕镇石的31个，砖雕图案各异。

小青楼建筑面积45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西屋为会客厅，东屋为五夫人的卧室。楼上为张作霖的几个女儿居住，所以此楼人们也称“小姐楼”。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就安顿在此楼一楼会客厅里谢世。以后灵柩一直停厝在东门的东厢房里，直到“九·一八”事变。



大青楼位于花园北侧，1918年开始筹划，1922年建成。面积约2460余平方米。此时张作霖已成为东三省巡阅使，而后入京改组内阁，问鼎中原。因公务纷繁，眷属增多，房屋不敷使用。张作霖决定建造大青楼，特地从天津请来有经验的李木匠，仿照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在天津公馆——曹家花园的样式，设计建造。因该楼用青砖而建，故称谓大青楼。此楼三层，楼顶是大穹顶阁楼，下有半地地下室。一层前出列柱遮荫廊，柱顶饰垂穗。前廊正面及东西两侧共有石阶三道降入庭院。一层、二层及楼顶都有宽敞的阳台。登楼顶凭台眺望，奉天城全景尽收眼底。每当中秋节赏月，张氏帅府全家，登此楼顶赏月，北与故宫凤凰楼相对，是当时奉天城两个最高点之一。升门阶入楼内，中间一直角走廊连通各房间。东头三个客厅，第一客厅在正南面，张作霖去世后，改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办公室。第二客厅在正东，第三客厅在东北角。大青楼建成后，当时任东边道镇守使的汤玉麟，给张作霖送来两只老虎标本，摆放在客厅内，因而人们也称此厅为老虎厅。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就在此厅。

进楼左侧（即西南角）一大一小相连的两屋，为张作霖办公室和卧室。张学良主政时为秘书长室和秘书厅。正对着楼门靠北面较大的房间是宴会厅，多用于宴请宾客之用。二楼也是直角形走廊，正南面一屋是张学良主政时期的办公室。正北面是张学良的藏书室兼书房，西南面一大一小相连房间为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卧室。正东、东北角和西北角房间，分别为张学良子女居住。三楼为张作霖几位夫人及佣人居住。

大青楼自建成到“九·一八”事变，一直是张氏父子两代的官邸和私宅，融办公与居住为一体。期间历经两次直奉

大战、张学良承接父任、东北易帜、处决杨常、南京政府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长官、接受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信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等重大军政活动。

大青楼是一座西式建筑，楼墙正面的墙壁上，雕塑着张作霖任镇威上将军所佩带的绶带、文虎章与嘉禾章等装饰。文革期间这些浮雕均被铲除。此楼建筑工艺考究细致，一楼走廊及宴会厅的墙裙上，均镶有法国进口的花瓷砖。一楼南侧房间都是落地窗。一、二楼内的主要房间，都饰有壁画橱窗。这些壁画皆出自当时奉天绘画高手、从师于郎士宁的民间艺术家蔡东陀（字晓坡）先生。至今已 70 余年了，这些画大部分保存完好。在一楼宴会厅里的北侧建有一个铁梨木的木雕枋。雕刻精致，装饰豪华，是一件典型的中式设施。木雕枋的后边摆放着两只烟榻，是张家宴请宾客时，请宾客在烟榻上吸鸦片使用的。

大青楼当时是帅府的象征，权力的象征。

三、帅府西院——红楼群

帅府西院占地 11017 平方米。1914 年，在兴建帅府中院的同时，修建了西院。西院南半部建有 7 间瓦房屋，瓦房南侧到帅府西辕门则为卫队营训练操场，7 间瓦房是帅府卫队营营部。北半部以青砖围墙与卫队营相隔。以东西并行建设两组四合套院，每组套院均以正房、门房、厢房各 5 间，为一个四合套院。两院各走独立门户，以与卫队营界墙北侧胡同为共同通道，与中院、东院相连。在中院的北墙处，建有一处网球场，这个球场东连大青楼，西接西院四合院，属于西院建筑。张学良带领弟弟妹妹经常在这里打网球。

西院的四合院，西边一套是张作霖的二哥张作孚的夫人及孩子张学成、张学文居住。东边一套是张学良的其他弟弟居住。1918 年，张学良和于凤至曾一度住过。1927 年，张学铭与姚氏结婚时，新房就设在此四合院。

张学良主政东北以后，眼看自己的弟弟一天天长大成人，就决定拆掉西院四合院和卫队营房、操场。请国内一著名设计师设计了 7 栋北欧式三层楼房，准备分给每个弟弟一幢。1930 年秋天，在国际上招标，最后选定正准备给葫芦岛施工的荷兰建筑公司承建，双方签定了合同。1931 年春季荷兰方面开始施工，打好地基并完成了地下室工程。此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大帅府连同东北一起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中。张学良将军只好通知荷兰方面停止修建。然而荷方以签有合同为口实，执意要张学良赔偿全部损失。当这个要求被回绝之后，荷兰建筑公司诉诸于国际法庭，张学良只好派员赴日内瓦出庭申辩。辩词的大意是：我本人全部财产——包括施建工程已被日本当局强行霸占，因而，也就不该由我继续承担债权债务。荷方迫于张学良将军的据理陈词，日本方面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只好接手履行建筑合同，由它向荷兰建筑公司支付全部建筑费。于是荷兰建筑公司继续施工，于 1933 年建起了西院红楼群。

从实际意义上讲，即使日本付了建筑费，那钱不也是从帅府边业银行的金库中夺去的吗？这片楼房还得说是张学良将军所建，也是整个帅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张将军只见过设计图纸，还没见过这片楼房，在沈阳市房产登记档案里，这片红楼群的产权归属栏里，仍赫然写着“张学良”的名字。

这里还要提及一点是，日本假借修建红楼群之名，在帅府也干尽破坏帅府的坏事。他们炸掉了中院正门前影壁墙的

两扇侧壁，在外院拆毁了二门，建起了百米长的库房。它们扒掉了小青楼前的两层门楼。毁掉了中院后面的狐仙堂，盖起一栋俱乐部。又在大青楼后盖起了一栋3层楼的特藏库房。为方便入库，扒掉了大青楼北侧老虎厅外走廊尽头墙壁，开了一个大门。筑起台阶堵死了通向老虎厅的走廊，完全改变了大青楼的格局。

西院红楼群建成后，被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占住，成为兵营。

四、帅府院外建筑群

张氏帅府的院外建筑群，包括帅府办事处（帅府舞厅）、边业银行和赵四小姐楼。

（一）帅府办事处。

位于帅府大院的东南侧，占地3291.2平方米，建于1925年。总建筑面积2996平方米。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获胜，成了北洋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来奉天拜访张氏父子的人物日益增多。张作霖决定在帅府院外操练场马棚区东侧，修建一所专门接待客人的“招待所”，取名叫帅府办事处。因其主楼内有一个两层楼中空的豪华舞厅，人们也称之为“帅府舞厅”。

帅府办事处是一处回型建筑群。中间主楼是一座罗马式砖混结构带地下室的三层青砖楼房。楼房坐南朝北，楼内有两层中空、四周回廊、装饰十分豪华的跳舞大厅。每层回廊后面都有客房包间。二楼回廊宽阔，可摆大餐桌或麻将桌，仍不影响行人走动。三楼仅是四角突出建起两个房间。中间楼顶是透明玻璃铺设的平台，可以一直看到一楼舞池。地下室

是食堂。主楼大门台阶两侧立有八根爱奥尼水泥柱，蓬起卷棚式屋顶，构成一座风格独特的舞厅门楼，两侧安有柱灯。

主楼东西两侧建有拐角式中式瓦房，每侧13间，北侧接拐角房以铁栅栏，正北开院门。南侧临城墙根（今临南顺城路大街）建有一栋两层青砖楼房。

帅府办事处接待了来帅府吊唁的各地官员和政客；接待了游说或阻挠张学良易帜的各路说客；接待过中原大战各方的特使。五省联军头头孙传芳曾寓居此处两年多，杨常事件后才不辞而别，去往大连。

（二）边业银行。

位于帅府大院正东。东临朝阳街，南临帅府办事处，西北是赵四小姐楼。四周有道路环绕，占地4967平方米。该建筑是一座东西合璧式建筑。正门有6根直径1米的巨型罗马式门柱，是由花岗岩石雕刻而成的，直排到三楼。三楼以上又是一座西式门楼，亦排列6根小一点门柱作为装饰，柱顶饰花垂穗。门前有11级石阶形成的高大平台，平台两侧装有华丽饰灯，使此楼十分壮观。前楼为四层，后楼依次为三层、二层。二层楼部分是四方环型，使院中形成天井。南侧有门洞与外面相通。此楼有异常坚固的地下室作为银行库房。总建筑面积为5603平方米。建于1925年。

边业银行最早始建于1920年。北洋政府秘书长、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认为边疆地区各种事业不发达，缺少金融机关，提议在库伦设立边业银行。该行是股份制组织，资本额定为1000万元，收足到1/4即250万元，即行开业。当时股东最多的是曹锟。该行开业不久，从苏联流窜到蒙古境内的白俄，勾结蒙匪陶克陶胡再次举行叛乱，致使边业银行停业。1924年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了曹锟、吴佩孚。开始筹

办新的边业银行。张作霖收买了全部民股，又招募新股，改资本额为2000万元。实收资本共现大洋525万元，其中张家500万元，吴俊升和阚朝玺各10万元，北京政府财政部官股仅5万元。1925年4月10日边业银行正式成立，任命张学良为总经理。总行暂设天津，在奉天修建边业银行。1926年6月，边业银行总行移到奉天，在这座新建的大楼内开张营业。除办理存放贷款、贴现、汇兑等一般银行业务外，还拥有发行货币和代理国库之权，成为与东三省官银号并驾齐驱的东北最大银行之一。此时资本总额已超过2000万元，张家股份已占95%以上，实际上边业银行已成为张氏父子的私家银行。现在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里展出的张家金柜中，有一只内盖上写着："计开，放未发行两角票三十包……"等字样，足证明，边业银行拥有发行权，也证明是张家的私行。

（三）赵四小姐楼

在边业银行西北角，帅府大院的东墙外，有一座与小青楼遥相呼应的日本蒙古包式二层小楼，这就是著名的赵四小姐楼。两座小楼相比，格调各异，小青楼色调青青，清秀而典雅；赵四小姐楼，颜色赭红，秀气而华贵。赵四小姐楼占地547.2平方米，四周围以赭石红的水泥围墙，错落的檐脊，绿色的望板，仿佛是一座独立的城堡或庄园。此楼建筑面积428平方米，内有十余个房间。一层是接待室、舞厅、餐厅等，上层是会客厅、卧室、琴房、起居室、卫生间等。装修豪华别致。

1928年夏，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相识，并于同年秋在北陵别墅同居。心胸大度、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的真情，力主在帅府东侧建起这幢小楼，并亲自督工设计装饰，使小妹尽量居住的舒适一些。年底竣工后，赵四小姐即搬入此楼居住。

赵四小姐把自己的卧室设在西北角，这里虽然比其他房间阴冷一点，但抬眼就可以望见大青楼里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在这里她和张学良将军有了惟一的儿子。

五、饱经沧桑的张氏帅府

张氏帅府建成至今已经七八十年了，可谓历尽劫波，饱经沧桑了。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占领帅府，抢走了一切能抢的财产和家俱，抢不走的全部砸毁，扔在帅府院中的水池中。偌大的张氏帅府，除了房子之外，被日本军队洗劫一空。1990 年 6 月和 8 月，张学良将军在台湾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的采访，提到了他财产受损失情况，摘录如下：

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听说，本庄将您所有的个人财物运去北京，这究竟是不是事实？您本人有什么意见呢？

张：我私人的，但不是所有财产。送来两列火车，派一个人来见我。我对那个人说，我绝不收。我说，我俩虽是朋友，但现在等于敌人。这样待我，等于羞辱我。这时我讲个故事，当年华盛顿作战，有人保护他的房子，他说我是军人，你们这样等于羞辱我。当时我想起这件事，对本庄的人说，你把我的东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车站烧了，羞辱你。后来他们运回去了。

这段谈话可以看出，日本从帅府掠走多少财物，整整两列火车。这还不是张家的全部财物。

从这段谈话也可以得知，为什么张学良旧居陈列馆里除了照片以外，实物那么少的原因了。

人们不禁要问？本庄繁送去北京两列车财产，张学良将

军没有收，他们都运回去了，运到帅府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列车没等出山海关，就被沿途的日本军洗劫一空。帅府里只剩下张作霖的灵柩，停厝在帅府东院的东门房里。就连这具已经停放三年的尸体，他们也不放过，很快给挪到大东门外的珠林寺里。

国联李顿调查团来沈阳调查时，为了掩人耳目，日本军队撤出大帅府，派了大汉奸于芷山（原奉军将领，东边道镇守使，辽宁省防军第一旅旅长）作为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进驻帅府，以给国联调查团“奉人治奉”的假象。

西院红楼群竣工后，于芷山等搬到西院，中院、东院成了伪奉天国立图书博物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沈阳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混乱，帅府无人管理。当地流氓、地痞和一些无知百姓，乘机冲进帅府各院。能扛门的扛门，能拆窗的拆窗。帅府又遭一场浩劫，满目疮痍。

同年9月16日，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率5000余人率先进入沈阳，并把司令部设在大帅府内。9月19日，曾克林陪同中央派来东北工作的领导人彭真、陈云等来沈阳，并把东北局设在大帅府的大青楼内，当时中央确定的东北局委员有：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彭真是书记。9月19日，彭真、陈云在帅府主持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伍修权、叶季壮、程子华、朱其文、焦若愚、刘成栋（刘达）、段苏权、曾克林、唐凯和李运昌。会议决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将军，协同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万毅等同志，率领冀热辽部队也来到沈阳。彭真和林枫同志对张学思同志说：“如今你回来了，大帅府也该物归原主了。我

说，你就还住原来的家吧?”张学思同志不肯，他说：“14年前，我从家出走的时候，曾发誓，要永远离开那个封建的大帅府。党委我以重任，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回家看着那些旧屋旧物，徒然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怀旧情感。家里人现在都不在了，我回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更主要的是东北是在人民手中光复的，大帅府所有权应归人民所有，我没有资格再做它的主人。如果需要把房产归还张家，那么有权接受它的应该是我的大哥。”彭真同志说：“复土还乡嘛，回家看看总是应该的吧!”张学思情思无限地回答：“我已经回家了，东北的故土就是我的家，东北的人民就是我的亲人。如果有朝一日，我的大哥能获得自由，重返故里，那时，我再陪大哥一道回家看看，那样更有意义。”

张学思同志在光复后任过辽宁省政府主席，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为人民立下了累累功绩。但他没有等到陪同大哥回帅府的那一天，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迫害致死。

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张氏帅府由“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委会图书馆”使用。国民党市政府对张家财产作了登记，张氏帅府作为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私有财产予以登记认可。

1948年11月3日，沈阳解放后，东北图书馆从哈尔滨搬迁到帅府。张氏帅府的房产重新认定为张学良将军私有，由沈阳市人民政府代管，并在帅府各房上挂上代管房产标志。帅府院外的边业银行和帅府办事处划归辽宁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使用。

1949年、1950年，房管部门对遭受严重破坏的帅府西院楼群进行了彻底修缮，并增添一些用房，将6幢红楼连接起

来，以方便图书馆使用。对四合院，大小青楼的沉陷作了处理，换掉了沉重的顶瓦，重新做了防水。

1957年，图书档案分家，帅府东院为东北档案馆。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氏帅府实行了军管，使张氏帅府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冲击破坏，院内建筑的石雕、砖雕、木雕保存基本完好。居住在小青楼内的一些老同志为保护小青楼的石雕、砖雕不被破坏，悄悄用水泥掺白灰将这些雕刻抹起来。

“文革”后期，省文化厅为解决走“五七”干部回城住房问题，在帅府东院小青楼南侧，建起了一栋拐角式五层家属宿舍楼，严重地破坏了帅府的景观。在此楼的影响下，居住在帅府东院的省文联、作协等单位也雨后春笋般地建起违章建筑。小青楼左右，大青楼左右及西墙内，乃至院中心，大青楼的一楼平台都盖满了临时住房，市园林部门拆走了东院的假山。帅府又一次遭到“建设”性的破坏。

1991年初，省政府和沈阳市政府投资300余万元，1992年省政府投资1100万元动迁了使用帅府中院和东院的各单位及50余户居住在违章建房里的居民，由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组织维修张氏帅府。拆除了包括日伪时期的全部违章建筑，彻底修复了被损坏的部位，恢复了主体部分的原貌。仅剩文化厅建的那座五层红楼，因经费不足而没有动迁。

到1992年9月中旬，张氏帅府的主体部分——中院和东院，已全面恢复原貌，并正式对外开放。当年接待海内外观众20余万人次。张氏帅府，已成为海内外瞩目的观光胜地。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37辑〕

张 氏 家 庙

○ 崔景和

北宁市高山子镇南的赵家村，至今仍有座遗址尚存、围墙完好的封建式祠堂建筑——张作霖的家庙。

张氏家庙始建于1923年3月，1925年8月竣工，历经两年时间。该庙建筑规模宏大，造型雄伟可观。庙基占地13000平方米（20亩耕地），四周是用青砖砌成的7米多高、6米宽的围墙，围墙上有枪口，四角设瓮圈型的双层炮台。围墙南北长130米，东西长100米。在东西围墙的中间，是宫廷式门楼，红漆大门，笔直的沙石路贯通东西甬道。此门非大帅、少帅、夫人进庙祭祀是不开的，一般人从两侧边门出入。

家庙式样是按北京顺承王府设计的。院落铺垫2米多高地基。正门甬道北侧，建筑三个不同风格而又互不联系的四合院套，大有江南园林建筑之特色。

进正门，路北第一个院落是张氏祠堂。计有正殿3间，两厢配房和前殿各3间，别致的门楼青砖作壁，绿色硫璃瓦盖顶。正殿内砌有神台，神龛用檀香木雕成，高8尺，宽5尺。龛内有红绫幔帐两幅，内供檀香木牌，上书：供奉张氏门中先远各代宗亲考妣之主位。两厢配房内壁绘有“岳母刺字”、

“孝子图”壁画。院里耸立着两通汉白玉碑，其一铭刻着赵尔巽为张作霖家庙所撰写的碑文（碑已毁，字迹不清）；另一碑正面是张氏家庙碑文，刻的是张作霖的生平事迹，背面刻的是大帅勋勉告诫张氏子孙的训词。

院外，竖有两个斗式旗杆，尖端用锋毛铜铸制，耀眼夺目。门的对面，路南建了一座长20米，高六七米的绿硫璃瓦压顶红漆面的影壁。

中间院落是客厅，为大帅来庙祭祀时住宿之用。正、厢、门房各5间，皆为青瓦房，雕梁画栋，其屋顶稍低于祠堂正殿。这个四合院是家庙的最好建筑。院内方砖铺地，东西配房置有名人书画，还有张作霖秘书谭国环的题词贺联。正厅中间放有2米宽、3米长、1米高的方桌，在镶有水晶石桌面的里边，装有“中八仙”人物模型，扭动开关，人物自由活动。白玉石和檀香木雕刻的三国志人物画像，装饰着两厢屋壁。门洞两壁用白灰石雕饰“三顾茅庐”、“草船借箭”人物像。汉白玉雕塑的两只雄狮立于门外左右。“斋庄忠正”四个金色大字镶嵌在门楣正中。院后是家庙花园。

最后一个院落，是为来祭祀时侍卫人员和平时佣人以及经营庙产的伙计准备的住处。豆腐坊、厨房、仓库等设施，亦在此院落，所以房间多于前两个院。院门路南盖有马棚和农具库等。

该庙建筑时的技术人员是从关内招聘来的。其力工、车工多半是当地佃户出的义务工。据说建筑需用的贵重材料和石碑、石狮等，是从北京顺承王府运来的。家庙兴建过程中，共动用人工万人次以上，耗费奉票（一说银元）40万元。

平常祭祀的费用和庙内的佣人开支，依靠庙产收入。

家庙建设过程中，张作霖亲临两次。一次是破土动工时，

张从奉天专程来此，为家庙奠基并指点修筑计划，没有兴师动众，仅在庙基地后边的 5 间草房处住了一宿。第二次来此处时，为 1925 年春末，时祠堂与客厅已竣工，在前有马队探路，后有侍卫军护随下，张作霖乘坐小车直达赵家村。此行为表示不忘乡亲父老，他接待了造访的各屯乡老。据见到张作霖的人说：大帅是个个头不高，不胖的小老头，脸膛黑黝，留着小胡子。他吩咐卫士赏给前来谒拜的百姓每人一圆奉票。可惜，承情的人并不多。这次张作霖来赵家村住了 13 天。

家庙落成后的一年秋后，张学良乘火车到田家窝铺（距赵家村 3 华里）下车，来到家庙。他此次亲临，一是瞻仰家庙，祭祀宗亲；二是探望奶母赵老太太（据说就住在家庙的西院），以示不忘养育之恩。他这次来没有惊动地方和百姓，即日返奉。

平常的祭祀，除张作霖的元配夫人赵氏（本村人）来过外，历年逢节均是派的代表。

“九·一八”事变后，帅府来庙祭祀中断了。一个名叫“四十万次郎”的日本人霸占了张氏家庙。遂之将庙内的珍贵藏品和器皿古物偷运回日本，并把家庙的东西正门堵死，另开南门。张氏祠堂作了仓库，客厅辟为“四十万次郎”家眷内宅。西院除留给“少帅”奶母居住外，余者或作为“四十万”经营庙产雇工们的住处，或为存放马匹农具的地方。从此整个张氏家庙被破坏了，院内杂草丛生，树木凋零。

“八·一五”光复后，该庙又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房屋木料全被扒走，残留的砖瓦石块被抢劫一空，院内树木也被砍倒运走。仅有的两块石碑，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视为“四旧”打断三截，掀翻在地。今仅有“张氏家庙碑”可辨其意（村政府已保存起来），另一石碑碑体已不全了。

现在当地政府和赵家村村民，为保留这座张氏家庙的旧迹，加强了围墙和尚存遗物的保护。并在院内建起村政府、商店和小学校。茂密的树木笼罩着新的建筑，一派生机。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 作 霖 墓 地

◯张显华　聊　卿

张作霖驿马坊墓地，去锦州市39公里，离张作霖生母王太夫人黑山老家不远，今属凌海市。

墓地位于东北三大风景名山之一——医巫闾山余脉石山的山脚下。石山古称十三山，因有十三座山峰得名。《奉天通志》载："十三山高一里余，周二十里，峰峦罗列，大小相错，凝岗积翠于大荒中，若远若近，宛若图画，海山之奇观也。"清康熙帝东巡经过此地曾咏曰：迤逦峰连大道间，凭空青削十三山。乾隆帝也曾诗称：自是闾山行尽处，画图云拥十三峰。墓园的花岗岩墓墙就取于十三山而垒砌。

究其实，这里不该是张作霖长眠之处。初时，纯系为王太夫人而建。后来，张作霖发妻、张学良生母赵夫人殁，亦葬于此。再后来，即张作霖谢世9年后，竟也下葬在这里，这座墓园成了张作霖墓地。

封建时代，群众对埋葬老人茔地的选择与确定，是非常重视的。无论贫富，都要聘请名高望重的在勘舆上很有造诣的风水先生，为之相地势，看风水，以期后代的官禄显赫，以定将来的福寿绵长。张作霖的墓地，据驿马坊73岁的齐子荣

介绍，民国初年，有一位风水先生，乘车看相驿马坊附近的山形地势。摇罗盘、弄仪器，选相了有风水的地处，才确定了墓地。安葬的方向，是头西脚东的乾山巽向。坟茔地的西南山上，有一方形平面玉石，每当旭日东升，方石闪耀发光。山的后面，有一山尖远望似猴，栩栩如生。这个奇相，必须在墓门前的小桥上才能清晰可见。确系难得的茔地。

民国五年，张作霖将其显妣由黑山县移葬此茔地，立为主坟，以后依次埋葬。那时张作霖小有发迹，对茔地未能大兴土木，只是把茔地稍具轮廓，植种了一些松树而已。后来其妻去世葬入该茔地。茔地约占地 20 余亩。当张作霖由师长而督军再兼省长时，官运亨通，窃以为是茔地之灵。于是大兴土木，美化茔地，以壮观瞻，更增加茔地气势。在茔地的四周，砌成花墙。墓门前边，立了牌坊及凉亭，并立有粗大石柱子，石柱顶上饰有石狮。茔地坟前立有石碑（碑文见后），碑前设有长方形石桌，可供摆祭品之用。茔地外边盖些房子，以供看坟的居住。看坟的人选最可靠的人或至近亲友，带家属长期住在这里，看守茔门，任何人都不准进入。看坟者并耕种茔地附近的土地，收获归己。

1928 年 6 月 4 日，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被炸身亡之后，张家选中了铁背山麓为其营造“元帅林”，准备安葬。在元帅林初具规模时，适逢“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是翌日被迫停工。张作霖下葬之事，只好搁置下来。

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张学良旧部荆有岩亲睹，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因元帅林尚未竣工，灵柩停于元帅府。“九·一八”事变后，荆有岩跟张学良到北京做财粮。走时，亲眼见到棺材在元帅府，以后是否移到竹林寺，就不清楚了。但他确知，张的灵柩是经张景惠（当时黑龙江省省长）、张海

鹏（伪满陆军部长、总理大臣）他们操办，移葬锦县（今凌海市）驿马坊的。

原张作霖的军需处长栾贵田也曾记述：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停柩奉天东关竹林寺待葬。在抚顺修治陵墓，没待完工日本侵入奉天，破坏了正在修治的陵墓。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致电张学良，帅府所有财产及父陵均妥善保护，如派人索取均将如数归还。

1937年6月3日，正值张作霖被炸9年忌日，由张作霖旧部出面，将其亡灵在奉天行“慰灵祭”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到石山车站。日本官兵有二三十人，其他工作人员很多，还有和尚、老道、喇嘛等。张氏的灵柩下边有四个轱辘。下车后，由车站去茔地的行列，约有一里多长，其中挽联、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一应齐全。由奉天带来的僧侣鼓乐，以及由锦州来的僧侣和鼓乐，待灵柩由石山车站起行时，一起吹奏起来，场面甚是壮观。每过一村，也要吹奏，浩浩荡荡，非常热闹。

事前由地方雇民工，傍其妻坟的南侧，打一个比棺材大些的墓子，然后在三面用砖石砌墙，灌以水泥。灵柩下安，再以水泥板封口，然后与其妻共同培成一个大坟。当时报纸曾以“张氏遗骸埋葬，协和会之美举”为题，作了报道。从此，这里亦成为张作霖的墓园。这是张作霖本人始料不及的，亦出于族人和僚属意料之外。

墓园大门座东朝西，正对十三山的中峰。门前百余米处，原为一南北流向小溪，现今雨季水汩，平日多涸。

墓园由墓门、墓墙、墓碑和冢丘组成。墓门原为三柱式石质牌楼，早年圮废，现整修为水泥砖石结构的门柱。门外，两根高2.2米的方形石柱，分立南北。柱面阴刻正楷宋体楹

联：佳兆千秋开驿马；孝思百代仰慈乌。此联系曾任奉天书院教授、奉天通志副总编修的袁金铠拟撰。联语中的慈乌幼知反哺，人称孝乌。

墓园中立有两通九眼透龙碑，通高3米，宽0.9米，厚0.3米。南面一通为宣统皇帝之诏书，张作霖将其以碑立于家母坟前，为示光宗告慰。

屹立北侧的石碑立于1916年5月。此时，张作霖已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决非老母辞世时师长之职可比。于是以慈乌之情，整修驿马坊墓地，刻石勒碑。命“关东大儒”袁金铠拟出洋洋洒洒547言碑文，“以彰懿德而垂后世”，此碑文由谈国楫挥毫，张公权执刃。

屈指算来，此碑已栉风沐雨70余载。铭文虽不乏浮夸之词，但不失为研究张作霖生平的重要文献。内中言称张作霖“生而最少，早孤，而家又贫。流离颠沛之中，赖太夫人以长，以养，以至于成人”。从中不难体悟到张作霖的身世，以至王太夫人含辛茹苦的一生。

墓园里的青砖甬道，直抵冢丘。冢丘共计两座。东面为王太夫人宿地，西面为张作霖与赵氏合墓。

据传，张作霖父张有财遇害故去后，因为家境贫寒，张作霖以木柜葬之。葬后逢水患吞掉坟土，柜棺随水而下时遇到树木掩挡。张家称此为“天地兆应”，于是就地复葬。张作霖发迹后，认为应了此说，所以“兆已得吉”后，为免遭风水破坏，“仍其旧兆”，父坟未迁，王太夫人独葬于此。

墓地原种松树百棵，1958年因患松毛虫害，所以伐去。1963年复植千株果木。树木掩映的墓园的西北隅，盖有三几间砖舍，原为看守墓园人住所，现今房舍犹存。

十年动乱期间，这所墓园相对而言还算幸运。仅门前石

柱被推倒，墓门和部分院墙有些破坏，主体均未触动。这不能不使人称道村民纯朴敦厚古风，以及对张学良将军仰慕思念的情怀。附近的驻军当年为保护墓园免遭破坏，也曾做出努力，至今仍为人们称誉。

“文革”前，这座墓园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 年被列为锦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市里为整修墓园拨了专款，重建了大门，新铺了甬道，培砌了冢丘，并增置了铁链围栏。

1987 年 5 月，正值张作霖安葬 50 周年之际，由张作霖抚养成人的张学文，即张作霖次兄长张作孚之子，携夫人王文瑞及家属，在张作霖四子张学思夫人谢雪萍陪同下，专程至驿马坊墓地祭奠扫墓。张学文一行到驿马坊祭扫祖母王太夫人和叔父张作霖墓时，正值雨后初晴，园内果树花盛。他心情激动地说：“我 7 岁离开崔家窝堡去大帅府前，曾来过此地。当初这里只是几个土坟，如今旧貌新颜，“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同辈中，我是第一个回故里扫墓，真是喜极而泣。不是政府的关照，张家个人是无力如此修缮的。”他眼含泪水，频频向陪同的领导和周围群众鞠躬致意。

（附录碑文）

奉

天承运

皇帝制曰沛酬庸之庆典茂对皇庥敷锡类之殊荣曲成臣孝尔张有才乃郎中衔加五级张学良之祖父箕裘绍绪诗礼垂声贻厥孙谋树芳规於珂里绳其祖武奏茂绩於彤廷兹以覃恩赠尔为通奉大夫锡之诰命於戏□□构以培基德钟家庆沛丝纶而锡命泽渥泉台

制曰德门衍庆渊源早裕夫孙谋盛世推恩纶綍载扬夫母范

尔王氏乃郎中衔加五级张学良之祖母高门毓德华阀传芳有谷贻孙赖同心於内助自天中命□异数於中闺兹以覃恩赠尔为夫人於戏光生褕翟常昭彤管之辉德媲珩璜允著徽章之色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王太夫人墓碑

太夫人黑山王氏处士讳文礼次女归海城张氏为处士讳发第三子妇处士讳有才继配生子男三人女一人孙六人长男作泰早世次作孚镇安予警总长击匪捐躯赠守备给云骑尉世职次作霖盛武将军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将军生而最少早孤而家又贫流离颠沛之中赖太夫人以长以养以至于成人迨将军既绾虎符躬司军旅太夫人犹及身而亲见之当世荣而称焉太夫人生于道光丁酉年正月十二日卒于癸丑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寿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十三日葬于锦县东北七十八里之驿马坊从形家卯山酉向丙辰之岁将军绾军民两篆政绩懋著去太夫人之逝已三年矣军佐僚属相与议曰太夫人教子于家有功于国是故福全德备者今墓门有石无文甚不足彰懿德而垂后世遂合辞以请将军将军曰报本返始余岂敢忘虽然余无文余不敢为也遂以属金铠既□不获辞则谨叙之曰张氏为海城旧族至将军既孤始随太夫人移徙黑山黑山海之邻邑也相距二百里遥比太夫人歿遗嘱葬于驿马坊勿归祔且用形家言将军考有才公兆已得吉甚不宜于迁祔故将军之考仍其旧兆而太夫人独葬于是太夫人以二十五岁适有才公佐理家政勤劬耐苦后更灾□备历诸艰以将军乘时崛起自困而享性情慈厚饶有远识辛亥之岁将军力任保安驻兵省垣遣人至黑山迎养太夫人曰汝已致身为国矣国家多难恋我何为比再三请始肯就养然终以致身为国之言以勖将军将军所以功望益隆为吾奉□民之保障□太夫人之教也是可称已辽阳袁金凯撰文沈阳张之汉篆额沈阳谈国楫书丹盛武将军陆军二十

七师师长奉天督军兼署省长特加上将衔陆军中将勋三位一等大绶嘉禾章二等文虎章男作霖立石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元　帅　林

◯赵　杰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张氏家属为选墓地，请了众多风水先生遍察辽沈名山大川，其中周姓风水先生选中了抚顺东面30公里一个村落。

这个名为高丽营子的村落，留有1300多年前唐太宗东征时的旧迹。其南面有一个小山岗，自北向南突出(人称老龙头)，浑河环绕其东南西三面而逝，隔水与山崖垂立、拔地而起的铁背山相望。努尔哈赤当年在此修筑界藩城，居住一年有余。风水先生称此地：前照铁背山，后坐金龙湾，东有凤凰泊，西是金沙滩。

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及张作霖五夫人(寿夫人)、张作相、汤玉麟，在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亭与周姓风水先生陪同下，一行由奉天乘车至铁背山站，雇用三辆马车抵达此处实地勘定。站立山岗放眼，浑河水如白练环围，铁背山似绿色屏障壁立，山岗若龙头探入水中。此地不仅气势不凡，而且有铁路直通，遂决定在该地营建墓地。在张学良主持下，成立了大元帅墓葬工程处，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亭兼总办，石辑吾为经理，大帅府处长郑发顺、总务科长王运丰等负责建陵事宜。

1928年秋，开始元林林勘测设计，共占地1200亩，征用土地范围内的十几户人家房地产，均作价购之。住户大都迁入北高丽营子和营盘各村中(现时仍可得寻)。

1929年5月，元帅林工程开始动工，预定3年竣工。6月21日(即张作霖谢世公开发表日期)，奉天举行周年祭典。据《盛京时报》载，祭典会议决定，为厚葬大元帅，预算经费计1400万元(大洋)，大帅府拨款500万元，东三省共捐资800万元；辽宁400万元、吉、黑两省各200万、热河100万。随后工程全面开展，在岗北增设元帅林火车站，向南修筑火车道和大车道与沈吉路相通。墓葬工程大批招聘木、瓦、石能工巧匠，仅在附近雇用小工就达1000多人。砖、瓦、石、木料均精心购置。

1978年，抚顺市博物馆曾查实，元帅林石刻大多源于北京西郊石景山区五里坨隆恩寺，及附近明太监墓和清绕余敏郡王墓地。绕余敏郡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七太子，即阿巴泰。安郡王为阿巴泰第四子，名岳乐，号安，封其勒，故称安郡王。死后均葬于北京隆恩寺。据北京故宫老石匠刘荣章介绍，他从老古董商处闻知，当年仅从该寺拆走的牌坊就有8架，100多农工，费时8个月，拆下的石刻用麻绳缠绕后，安置在由几十匹马组成的链车上，转运到北京王家店火车站后，再装车运至东北。据《圆明园》一书记载，还曾从圆明园运走一批汉白玉石件。这些石刻，大都出自明代和清初，用整块汉白玉雕饰而成。

砖瓦也为专制。1981年张作霖外孙女由国外来此拜谒，见琉璃瓦背面烧制着“安国军张大元帅林专用”的字样，当即求索一块，将其包好，准备带往美国，交由八旬老母，以资纪念。

张学良对元帅林工程十分关注，多次亲临视察。曾任辽宁

省政协副主席的卢广绩，当年就曾两度陪同。

元帅林工程，规模宏伟，东起老龙头，南抵浑河岸，西至二道沟墙，北达火车站。整个陵园座北朝南，由方城、圆城、墓室三部分组成，依地就势而建。方城顺依地势，南低北高，为了便于守护，四角还建有炮楼。方城前门直抵浑河北岸，仿明清建筑，为单檐歇山式，精工彩绘。门为三洞绿琉璃瓦顶。越前门有百米甬道直达中门。两侧排列石刻。中门建筑与前门无异。入中门，有殿堂 5 间，为设置灵牌、祭祖器物之所。殿堂东路两侧各有配房 5 间，以方墙围之。过殿堂后，便抵山岗脚下，依渐高地势。筑有 120 蹬青石参道（台阶）。高约 15 米的方锥形华表分立两旁，上嵌五角军徽。清代石雕双狮蹲立阶前。参道分为正道与左右侧道。两道之间，置有石栏。拾阶而上，顶端平台迎立四尊文臣武将石雕塑像。左为文臣，右为武将。其后便是圆城正门。

圆城辟有三门，即正门、东门、西门，皆为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顶。两侧嵌有石雕影壁，正门尚坐立石刻双狮。步入圆城正门，穿越高十数米，4 柱 3 楼的汉玉牌坊，便为宝顶。

宝顶的三道石门均为汉白玉，穿过与地表同一水平面的 15 米墓道和 7.8 米的二道墓，即为单窟墓室。墓室内上端两侧依壁塑立小天使，拱顶呈穹窿形，上面彩绘日月星辰（一说小天使头部为银质，日月星辰为贵重的飞毛铜而嵌）。环围拱顶绘有水浪浮云图案。

宝顶共为三层，第一层为主体，高 2.4 米平台围墙原为黑色大理石（奉复印板石矿公司提供，产于复县）。宝顶平台东、西、北面辟有台阶，环围金属护栏。台面步道以正南为中心，用彩色卵石对称镶嵌成蝙蝠、鹿、麒麟等吉祥图案。

整个建筑风格既沿袭历代帝王陵寝规制，又显现西方文



化影响，可谓中西合璧。

1931年秋，元帅林工程粗具规模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事变翌日，“大元帅墓葬工程处”经理石辑五急速派人赴奉天请示后，即停止营建。原预计在老龙头立的三甬石碑，虽拟碑文，却未及完成，已成无字碑。众多石料散落在荒草中、道路旁，甚是凄然。

1954年，因修大伙房水库，元帅林山下部分地处淹没区。大坝合拢前，石刻尽数搬迁至山上，后置于圆城内，安定在宝顶周围，计64件。粉碎“四人帮”后，省、市有关部门不仅拨发专款进行了维修和测绘，而且设立了元帅林文物石刻管理所，对此加以保护。

1982年，张学良将军胞弟张学铭先生来此谒拜，曾介绍了有关情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致电张学铭，帅府所有财产及父陵均妥善保护，如派人索取，将如数归还。为此，张学良在北平官邸顺承王府召集大姐冠英、二弟学铭、三弟学曾、四弟学思、堂弟学成共议此事。张学良气愤地说：“国土都沦陷了，还要那些破烂(指张家财物)干什么！只是父陵要葬。”最后议定，将父灵柩迁出竹林寺，暂葬驿马坊，待复土后再安葬到元帅林。1937年张作霖下葬驿马坊，至今已整整50年。

行前，张学铭无限感慨地说：“想不到祖国光复，东北复土，大哥却没有回来，安葬父陵更无法实现。”

1987年5月，张学良堂弟张学文拜谒元帅林时，闻听国家先后费资100多万元修缮，深表感激地说：“这是政府对张家的关照，张学良为民族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榕被害前后

○ 张连久

张榕，原名张焕榕，参加同盟会后，改名张榕。他是我的远族族伯。其父张钦善，家居抚顺市，是辽东有名财主，广有田产、商号、烧锅和当铺，分布辽东各县。仅在奉天就置有房产一二百间，商号也很多。因其家中富有，故聘请先生在家设馆专教其姊弟谈四书五经。1904 年日俄战起，我们家乡沦为战场，清政府却无耻地宣布为中立国。张榕目睹家乡受战火摧残，父老姊妹被烧杀奸辱，痛感欲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非推倒昏庸无能的清政府不可。乃辍学奔走革命，利用其父叔在辽东各县之财力和声望，于 1904 年到新宾与王阁臣、丁开璋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并向清政府请求备案，被盛京将军赵尔巽勒令解散。张榕乃到北京，此间结识了吴樾。1905 年二人在北京车站谋炸清政府五大臣，吴樾壮烈牺牲，张榕被捕入狱。多亏好友黄中慧之父黄永思与太监李莲英交好，经其姊张桂由奉天带来巨金，交由黄永思转贿李莲英跪求西太后，遂由死刑改为永久监禁。又由其姊重金买通狱长王璋，得以越狱东渡日本。到日本后张榕会见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与其堂兄张焕相同在日本士官求学。张焕相劝



他放弃革命，专心从宦以求飞黄腾达。张榕拒其劝，毕业后，奉孙中山命回奉天与新军各统制中的同盟会同志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等共同策划反清事宜。

张榕回国后很受奉天将军赵尔巽器重，委为营务处提调，后升为参赞，又是保安会副参谋总长，又是急进会的会长。他当时若当机立断发动起义，胜利希望是很大的。万一起义失败退保辽东，以各县联庄会和绿林为支柱，还是有广阔天地的。但他将希望寄托在赵尔巽政治态度转向独立及新军的起义。对张作霖被袁金铠拉拢投靠赵尔巽又估计不够，丧失应有的警惕。以致新军三领袖吴禄贞于石家庄被刺；张绍曾滦州起义失败；蓝天蔚起义前，被部下向赵告密被迫出走。这时张榕已成孤掌难鸣之势，与此同时，赵尔巽则安插保安会会长袁金铠为坐探，里勾外连。1 月 23 日袁金铠设下圈套，谎称张作霖有意革命，鼓动张榕请张到平康里德义楼吃饭。因张作霖的真实面目还没有暴露，张榕对他抱有幻想。宴罢，袁先辞去，二张同出德义楼，要找一所客房谈话，尾随其后的张作霖的便衣侦探于文甲掏出手枪，将辛亥革命在东北的先驱张榕暗杀，其年 29 岁。

张榕被害次日，张榕及其兄张焕柏的全部家产均被没收，其姊张桂带其侄张多禄、张多喜化装逃到大连，其兄张焕柏也逃到大连。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时，张桂领其侄儿由大连到了上海，经张榕生前知友黄中慧向上海都督陈其美介绍，再由陈其美写信向孙中山证明张桂是张榕烈士的胞姊，孙大总统在南京为张榕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其姊张桂在会上散发了张榕生前遗留的诗词、书画遗作以纪念。孙总理给了张桂一笔钱，作为遗族的生活费。张桂与其胞兄还多次向北洋政府控告赵尔巽、张作霖、袁金铠杀害张榕的罪行，要

求法办凶手。可是对手握东北兵权的张作霖，北洋政府又奈其何？北京政府总理赵秉钧及最高法院多次批示张作霖发还张榕被抄财产。张宁愿以赠送的名义拿出比被抄财产更多的钱财，也坚决不承认抄其家。而烈士的兄弟却拒绝赠送，而坚决索讨抄家的财产。后由于张焕相向张学良将军进言，张学良将军默认其父张作霖欠了我们张家的血债，愿化除积怨。1924年由张榕的族侄张连波经手，送给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张榕亲侄张国纯、张国弦500元赠金，并于1929年送张国纯到日本士官学校深造。1930年张榕侄国纬由美国军事学校毕业回国，张学良特将其委派到他的骑兵卫兵营（营长是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任职，这一系列措施都是经代理东北空军总司令张焕相从中斡旋的。从中也足见到张学良将军补过的心情，他未采斩草除根之行，这一点是令人称许的。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作霖的崛起与覆灭

○陈崇桥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既非名门”出身，又“无特别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仅一草莽英雄，受清廷招抚后，由一清军管带而至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后，因缘时会，又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省督军、东三省巡阅使，进而称兵关内，问鼎中原，最后竟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居然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当年，张作霖真是个炙手可热，红极一时，驰名中外，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

一

张作霖的崛起是和他手中有一支武装力量分不开的。早在 1900 年他就在辽西北镇一带组织“保险队”，开始掌握一支武装，后与张景惠合股，逐渐扩大，竟成为辽西一带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随着武装力量的扩充，张作霖的政治野心也日益膨胀。他图谋以手中实力为资本，换取清廷招抚，敲开升官发财的大门。适值清廷有“化私团为公团”、“化盗为良”的计划。于

是，张作霖受清廷招抚，奉命率部北上至新民，被编为骑兵营，驻扎新民镇，张任管带（营长）。从此，张作霖由绿林首领一跃而为清政府的军官。

张作霖受抚以后，依靠他手中的武装力量，在剿匪中特别卖力气，因而颇得清朝统治者的重视。1907年清廷特发上谕："予都司张作霖等五员奖叙"①。不久，又被提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由新民移驻郑家屯和洮南，所部多达3500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东北三省的革命志士密谋响应。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急调张作霖到奉天省城拱卫。张闻讯，星夜离开洮南，奔赴省城，晋谒赵尔巽，表示愿以"保卫大帅，镇压地方"为己任。赵听后非常高兴，索性将驻防铁岭一带的中路巡防营统领也派张作霖兼任。这时，张的兵力已达15营以上，俨然成为掌握奉天省城大权的军事首领。这是张作霖爬上高位最关键的一步。

11月12日，奉天咨议局局长吴景濂用"保安会准备会议"的名义，召集开会，拟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在会上，赵尔巽表示反对。革命党人据理力驳。张作霖自恃手中有一支军队，立即跳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大叫："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会场四周，布满携枪之人，大有火并之势。革命党人见此情形，均气愤离去。与赵尔巽、张作霖串通一气的大劣绅袁金铠以咨议局副局长的身份，宣布继续开会，"公举"赵尔巽为保安会会长，并举张作霖兼任保安会军政部副部长。

清朝覆灭，袁世凯上台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张作霖又一

① 《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戊戌。

变而为袁世凯的拥护者。原中路、前路巡防营奉令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陆军中将、二十七师师长。

1912年清帝退位后，赵尔巽曾一度任奉天都督，不久由张锡銮继任。张锡銮名义上是奉天都督，实际上处处受张作霖的胁迫。其后，袁世凯任命段芝贵接替张锡銮。段芝贵是袁世凯最大的亲信，其实权远远超过张锡銮，他和以前东三省总督一样，除督理奉天军务外，还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奉天巡按使一职，也由段芝贵兼任。尽管段芝贵官位很高，但他对握有兵权的张作霖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消息，一经公开，举国上下一致声讨。云南护国军发动之初，张作霖即申请出兵征伐西南，段芝贵想乘机把张作霖调开，免受挟制，密请袁调张领兵入湘。张作霖应袁电召到京，商量出兵问题，张作霖满口答应，只是提出补充饷械要求。可是当他把饷械领到手后，又表示不愿离开奉天。张作霖饷械到手，更加有恃无恐。扬言袁若不退位，奉天将宣布独立，并要查段芝贵的账，说段动用奉天公款数百万元。因“张拥兵万余，而段之卫队不逾一千之数，势不敌”。段在张的胁迫下，无计可施，只好从奉天狼狈逃回北京。当时，袁世凯的宝座已摇摇欲坠，不敢得罪张作霖，故于1916年4月间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至此，张作霖成为名副其实的奉天最高统治者。之后，张作霖又靠手中的枪杆子，先后兼并了黑、吉两省，统一了东北，张作霖在北洋军阀中居然取得了与直皖两系鼎足而立的地位，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军阀。

从上可见，张作霖之所以取得重要地位，完全是因为其手中有一支武装力量。张作霖统率的这支军队，名义上是国家的正规军，实际上是张作霖的家兵家将，兵将之间有根深

蒂固的封建隶属关系。生杀予夺大权，均操诸张作霖一人之手。这支军队，只听张一人指挥，国家是不能指挥和调动的。他手下的各级军官，都是当年绿林时代的旧部，有着结义兄弟的封建关系。当时中国名义上虽有个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毫无权威，中国正处于“有军则有权”，“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力大”的时代。张作霖正是利用这一混乱局势，以手中的武装为工具，才得以平步青云，成为“东北王”。

张作霖不但重视军队，而且也知道军队需要改革，这是张作霖之所以能争霸关内的重要原因。

奉系军阀统一东北后，接着就把矛头指向关内。1920 年 7 月参加直皖战争。1922 年 4 月末 5 月初，又与直系操戈，史称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一触即溃。在溃退中，除张学良、郭松龄等所部能有秩序地退却外，其他奉军均狼狈不堪，仓皇溃逃，张作霖亲到落垡督战，也无济于事。后幸有奉军的新派坚守阵地，致使直军难越雷池一步，最后双方才达成停战协定，此皆具有军事知识的新派之力。在这次战争中，奉军的兵力、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并不次于直军。只是由于“绿林”式的奉军，素质太差，“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特别是各军官佐大多不学无术，固步自封，不懂现代军事，他们平时愚昧而好自用，战时又任意瞎指挥，致使第一次直奉战争一败涂地。

遭此挫折，促使张作霖开始懂得：正规作战不同于绿林式的打仗方法。“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而无学识之将校，尤不足任指挥。”① 于是他发誓对奉军加以改革和整顿。1922

① 吴相湘：《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传记文学》（台湾版）第 31 卷 4 期。

年 7 月底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姜登选、韩麟春等学有专长的留日士官派一跃而被提为“副监”，负实际责任。为严格对部队教育训练，又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派陆军大学毕业的人员任教育长和教官，负教育和训练军官之责。为把张学良和郭松龄所领导的三、八旅建成示范部队，其中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绝大部分换成军校出身的人。为提高奉军的文化知识素养，特规定严厉整饬军官，凡未具学历的分期入学讲武堂。“全军和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参谋长、团副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此外，“军需、军械和军法等也都做到了独立”。

除整顿和充实陆军之外，张作霖又竭力筹建海军和空军，为培养空、海军专门人才，设立了航空学校和海军学校。张作霖还大力扩建兵工厂。军工建设，更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才，所以张作霖又任命杨宇霆兼任东北三省兵工厂督办，任命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制炮专家韩麟春为东北三省兵工厂总办。杨、韩到任后，延揽大批“兵工人才”，“大量购买了德国机器”，仅二年多时间，东三省兵工厂之规模就扩大了数倍，“在奉天建造了号称‘东方第一’的兵工厂”①。

由于张作霖毅然决然重用新派人物，广收全国军事人才，锐意整军经武，仅二年左右的时间，就使奉军的面貌大为改观。

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奉军经过整顿，素质提高，加之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京，发动“政变”，结

---

① 猪木正道著，吴杰等人译：《吉田茂传》，第 291 页。

果张作霖大获全胜。

但奉系自从郭松龄倒戈反奉以后，不但“使奉军元气大伤，也使张作霖对奉军内部的改革停顿”。从此，奉军便开始走向衰落之途。

在郭松龄倒戈反奉之后，张作霖仍连年发动战争，结果军费开支，远远超过经济负荷能力。王永江是个理财能手，“在其初掌度支时，开源节流，省库充实，东北财政赖之以固”①。可是后来“王氏稍加整顿，一有起色”，杨宇霆就为扩军备战，大购机械军火，以扩充兵工厂。郭松龄反奉之后，王永江力陈战争不能再来，力主缩减军费，裁撤军队，节省兵工厂开支，减少张作霖的个人机密费等。王永江的意见无疑对奉系是有利的，但张作霖却偏听偏信杨宇霆的意见。王遂愤而辞职，他在负气而走的时候，曾上书劝张：“以兵足自卫为度。”宜“将兵工厂缩小一半，改营生产事业，汰粮秣厂之冗费，去骈枝之机关，节用以养民，停发钞票，以救金融，均度支以兴庶政。”张作霖对这个意见听不进去，仍一味扩军备战。结果，终因战争扩大，战费日增，致使奉票日益贬值，出现财政空前混乱而无法收拾的局面。

张作霖本靠枪杆起家，后因过分迷信枪杆子，到头来又为其所累。

二

张作霖对于肯为他卖力气的人才，特别重视，而且也有一套驾驭之术。无疑这也是张作霖的“霸业”兴盛一时的重

---

① 《新民晚报》，1929年1月20日。

要原因。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作霖从洮南进入奉天，其手下如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虽能在奉天帮助他获得和维持统治权于一时，但这些人都是才学浅薄、胸无远见，不足以助张成大事之辈。及至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以后，张作霖就积极搜罗人才，为己所用。段芝贵被逐之后，张作霖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奉天最高统治者。张作霖初秉奉政，便语左右曰："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厚币以招之。"随后便任命袁金铠为秘书长；孙百斛、关海青、曾有翼、谈国桓为秘书；杨宇霆为参谋长；王树翰为财政厅长。这些人都是关外"知名人士"。袁又荐王永江"才堪大用"[1]。不久，张便将王永江调到奉天，王晋见张作霖时，"作霖迓于阶下曰，公来何迟？"[2]

张知王曾任辽阳警察局长，故任命王为全省警务处长兼警察厅长，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其后，王永江又代王树翰而为财政厅长。"树翰与永江，并称奉天二王，皆以善治财赋名"。1922年，张命王永江"以财政厅长兼代奉天省长"。张作霖初掌政时，"奉省岁入，初不过千万，亏累积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自起用王永江任财政厅长后，"数年聚敛，岁入增至四千万"，"内外债渐次偿清"，顿"开东省未有之局"，从此以后，王"益得张作霖之倚任"。

张作霖常说："我是一个武人，不懂政治。"不了解张作霖的人，也往往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其实他久经世故，最"善于明察利弊"，对待部下也有

① 金毓黻：《袁金铠别传》。
② 金毓黻：《王永江别传》。

一套驾驭之术。不念旧恶、不咎既往是张作霖用人的一个特点。张作霖与王永江曾有过矛盾。1912年张作霖以巡防营统领，升任陆军二十七师师长时，手握重兵，驻军奉天，一时间成为军政重心，“人竟趋其门，求一识为荣”。当时，王永江亦在省城任职，可是王公事毕，“则闭门读易，独不与通”，张作霖甚恨之。张作霖取得奉督以后，急“需有匡时之略者为之佐”，故对王“易倨为恭，以期永江能为己用”。

杨宇霆于1916年被张作霖任命为参谋长。1918年张作霖应皖系之邀，于军粮城设立奉军总司令部。张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在此期间，杨、徐勾结，有偷用奉系军费和武器另招募军队之事。事为张作霖发现，以渎职罪免除杨宇霆职务。杨流落京津，“越三载”。后张作霖深感继任参谋长“处理军务不称意”时，“思宇霆才可用”，常向左右说：“你们办事，都赶不上邻葛。”1922年2月，张又召杨回奉，任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所有一切军政大计都由他代张作霖主持和签署”。杨聪明过人，“凡是张作霖想作的事情，不待说明”，“便会意办妥”。

尽管王永江、杨宇霆都和张作霖有过矛盾，但张作霖一经认为这两个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捐弃前嫌，大胆使用，信任不疑。

张作霖用人不分畛域，也很得人心。他驱赶段芝贵时，曾提出“奉人治奉”的口号。迨张攫取奉督后，便抛弃了这个口号。张在招揽人才方面采取了“不分畛域，惟才是举”的方针。特别是东北地处关外，文化水平较低，人才较少，张作霖采取这个方针，更显得重要。诸如韩麟春、戢翼翘、臧式毅、于国翰、熙洽、王树常、沈鸿烈、于珍、于学忠、邢士廉、何柱国、荣臻等都先后到奉系军政部门工作。

张作霖不搞株连，也是文武官员人心安定、愿为奉系效力的重要原因之一。1925年郭松龄起兵反奉失败，郭松龄被杀，“其军长刘伟、刘振东、范浦江等，皆束身来归，拘置一所”。当时，凡平素与郭松龄有过从者均忐忑不安，人人自危。后张作霖向诸文武问以处分之法，吴俊升起而言曰：“刑乱用重，此辈叛徒，不宜轻恕。”张作霖转询张作相：“子意云何？”作相对曰：“公宜下令罪己，郭氏夫妇以外，不戮一人，则众心安而奉局定矣。”张作霖表示同意张作相的意见，“故诸将得不死，且任用如故。时有统军在关内者闻之，皆不待招谕而来归。”[1] 由于张作霖“不咎既往，因此，漫天烽火归于平息”[2]。

张作霖对其所任用的部下，一般都放手使用，并给以支持，不许亲朋干扰。王永江任奉省警务处长兼警察厅长以后，很快就和奉省军界以绿林蛮勇汉著称的汤玉麟发生了冲突。汤早年横行辽西一带与张作霖乃莫逆之交，谊“如昆弟行，且久共患难”，时任奉军五十三旅旅长兼省城密探队司令。汤在省城，目无法纪，乱用军权，深为市民所恶。王永江就任警务处长，仿照日本法改革警政，于省城各处设派出所，严厉执行检查制度。“遇有兵弁违警，悉绳以严法，无所回避”。当时，军阀横行街市，已成习惯，忽有警察出来干涉，大起反感。汤玉麟要求张作霖撤掉王永江，遭到张的断然拒绝，且骂他们：“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为此，张作霖同汤玉麟彻底闹翻，张下令免汤旅长职。张作霖对这件事的处理，不但使不法之徒大为收敛，奉省社会治安日趋好转，而且也深得愿为奉系效力的各种人才

① 金毓黻：《郭松龄别传》。
②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台湾版），第4集第378页。

的好感。凡是张认为有才干，全心为他办事的，他都放手让他去干，很少限制和干预。如王永江兼任省长之始，“曾与雨公（张作霖字雨亭）约，凡省内大小官吏，悉由己任命，不许雨公作干预。”张当即允准。因有约在先，所以在王永江代柄省政期间，“从未见军界将领帅府亲戚，敢来省署找王求情托事者”。

张作霖对部下工作一般是支持的。常荫槐原任军警执法处处长，后又兼京奉铁路局局长。当时京奉铁路相当混乱，特别是军人无票乘车，无人敢过问。常任局长后，制定规章，严格稽查，“执法至严，不畏权贵”。一次，最为张作霖宠幸的寿夫人之厨师某，搭乘京奉路火车，据头等包厢，未买票，事为常发现，令执法队推之下车，该厨师恃势傲慢无礼，常令执法队即在站台杖责之，重致不能行动。厨师归，即向寿夫人哭诉，寿夫人亦以常目中无人，太跋扈，遂报告张作霖。张听后非常高兴，霍然而起曰：“乃有这等事？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小子，真有种，我正需要这种铁面无私的角色呢！”自此以后，常荫槐官运亨通，屡荣迁。因张作霖能为常荫槐撑腰，京奉铁路经他大刀阔斧地整顿，路局面貌迅速改观，一跃而为中国的模范路局之一①。

张作霖是个封建军阀，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从实践中认识到，为扩大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绝不能忽视人才。因此他对有真才实学者，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过去和他有多大矛盾，只要向他屈服，肯于为他卖力气，他就不分畛域，不计出身，不咎既往，不拘小节，一概容纳，大胆使用。这在军阀当中，确属少见。

① 陆云山：《简述张雨帅之事迹》。《传记文学》（台湾版）第31卷，第4期。

张作霖毕竟是个封建军阀，他绝不是对所有的人才都信任，他所大胆信任的只是那些肯于为其封建统治出力的人，是对他绝对忠诚的人。凡具有革命色彩或能危害其统治者，则持坚决镇压的态度。辛亥革命时期，张作霖在奉天城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张榕、宝昆、田亚赟等。1927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 20 多名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北京著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只因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亦被杀害。张作霖是个封建军阀，在他心目中，生杀予夺大权，完全根据个人意志决定。据金毓黻写的《张作霖别传》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一日（谢）荫昌抱决囚牍至堂上，作霖略加研诘，即手批一死字。荫昌争曰，其人罪不至死。作霖笑曰：吾军中杀人如麻，目不曾一瞬。汝辈书生见之，吓欲死矣，此本常事，何喋喋为。"如果需要，他"对部下手头"又"很宽"，几乎是"挥金如土，从不顾惜"[①]。只要部下不贪生怕死，肯为他卖力气，他可以给你连升三级，让你终生感恩戴德。张作霖的这套所谓用人之术，基本上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恩威兼施权术"，并带有浓厚的市侩习气。他和部属的关系，并不是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探讨总结张作霖关于重视人才方面的一些问题，绝不是忽视张作霖的封建军阀本质。

三

张作霖的崛起和覆灭都和日本有密切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谋士后藤新平曾对张作霖有过分析。他说

---

① 《顾维钧对民国史几个问题的自述》。《传记文学》（台湾版），第 29 卷，5 期。

张“在满洲有一种特殊之地位”，“张离满洲，则失其地位，故满洲为张之惟一地盘”，张“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顺从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有此特别地位，具有此思想之张作霖，则满洲之事，生杀由我，不仅一张也”。日本认为张作霖是个最理想的工具，当然就要加以扶植。

张作霖则认为“满蒙”是日本势力范围，要想取得“满蒙”的统治权，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必须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持。

早在1912年12月，张作霖就向日本献殷勤。当年日本关东都督福岛路过奉天，张作霖闻讯主动前往拜见，并卑躬屈膝地说：“如果福岛有何命令”，他“愿按日本的指示行动”。

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奉省也和全国一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运动。张作霖非但不支持人民的爱国行动，反而令警厅留意查访，根究散发传单之人，“严密查拿”，以示镇慑。1919年5月，爆发“五四”运动，张作霖竟致电北京政府，竭力为日本辩护，说日本是“力求亲善”的“友邦”，诬蔑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愚民之妄动”，他要求北京政府“严惩肇事之徒，以遏乱萌，以全邦交”。

日本对张作霖的扶植也是不遗余力的。张作霖攫取奉督，曾得到“日本的好意援助”。张作霖的几次入关，日本都大力支持。直皖战争，段祺瑞垮台后，日本更全力扶植张作霖。特别是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若没有日本的帮助，张作霖早就垮台了。

张作霖和日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他们之间既有相互勾结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特别是从张作霖率

部进关以后，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日趋尖锐，最后甚至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日本原以为支持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他一定能顺从日本，解决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满蒙悬案”。所谓“满蒙悬案”，主要是指 1915 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部分。1925 年郭松龄反奉时，日本曾向张作霖提出以承认“二十一条”① 作为出兵援张的条件。张作霖当时表示同意。但事过境迁，张作霖认为这些条件过苛，如果照章履行，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抗，而且也将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制于人，严重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张作霖表示拒绝履行前约。另外，张作霖进入关内后，他已不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小军阀，而是据有北京政权、占有半个中国的大军阀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有日本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更多的国家支持，才能在北京站住脚跟。同时，张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贪得无厌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挣脱出来，以便获得较多的独立自主权。

张作霖不顾日本之反对，于 1924 年成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开始筹建东北铁路网。张作霖以“自行筹款”，陆续建筑了奉海、吉海、打通等路。张作霖还准备建筑葫芦岛港。其计划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联接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物税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我东北财富的掠夺。这一作法，无疑是张作霖企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②。

日本对张作霖的上述措施极为不满，认为张作霖修建的

① 指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部分。
② 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 2 卷 3 章 3 节。

铁路是"南满铁路平行线"，严重影响其在"满蒙的权益"，曾向张作霖多次提出警告和抗议。张作霖对日本的抗议和警告，采取或推拖、或拒绝等手段应付之。从此，张、日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

1927年6月，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所谓"满蒙积极政策"，以加强对奉系军阀的控制。

"东方会议"之后，田中内阁先后派遣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等，用软硬兼施的手腕，对张作霖展开了索取"满蒙"权益的交涉。

10月10日，山本到了北京，15日订立了所谓"满蒙新五路协约"。根据这个协约，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敦图线（敦化——图们江）、长大线（长春——大赉）、吉五线（吉林——五常）、洮索线（洮常——索伦）、延海线（延吉——海林）。

按"满蒙新五路协约"第十条规定，"本协约签字后，尚须派两国代表正式签字"，方能生效。故协约签字后，日本又要求张作霖向日本外务大臣和日本公使送交满蒙交涉公文，以便"将上项密约，先改成政府间的正式协定"。

如"满蒙"新五路建成，将意味着什么，张作霖是清楚的。张作霖与日本订立"满蒙新五路协约"，绝非出于自愿。所以张对日本将密约变成公开的正式协定的要求，则坚持私人密约就止于私人密约，不肯把它变成立即生效的承造合同。后来日本见张作霖在北京的政权已危在旦夕，1928年5月7日，田中义一再次派山本条太郎秘密到北京，逼张签订满蒙新五路"承造合同"。

北京大元帅政府交通部代部长常荫槐避往天津，“坚不作日人工具”。日人乃向张作霖坐逼，张无奈，乃派赵镇以兼次长再兼代部务之命令，与签订合同。据日方资料说于15日由赵与日本签订了吉敦延长线和长（春）大（赉）线的承造合同。13日，由张作霖本人与日本签订了延（吉）海（林）、洮（南）索（仑山）承造合同。商定在签字后三个月着手动工。吉（林）五（常）线铁路的签字，决定将来在奉天签字。张作霖、赵镇是否真的签字，尚无旁证。如其属实，亦是密约。个人签字的密约不同于政府间的协定，充其量只能属于预备性合同或草约而已。日本也深知仅有密约是不够的，所以山本条太郎曾电告其助手江藤丰二要中国方面“将全部合同于极端秘密中交国务会议审议，取得承认；然后将此意旨由中国政府履行通知芳泽公使的手续，云云”①。

5月31日，江藤丰二访常荫槐，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涉，均被常拒绝。尽管张作霖有时被迫同意密约，但他始终拒绝公开或办理政府间的正式手续。其实这正是张作霖准备事过境迁留有交涉与推翻之余地。

1928年4月间，蒋、冯、阎、桂等新军阀，组成一、二、三、四集团军，对张作霖发起了进攻。奉军在前线一败再败，北京政权危在旦夕。当国民党军队迫近京、津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迫张及早离京。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当且有效之措施。”此时，日本侵略者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索取“满蒙”的权

① 满蒙调查部：《新满蒙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

益。日本除迫张在铁路密约上签字外，又进而提出“解决满蒙诸悬案”问题。

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答应。面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张声色俱厉地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叫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对日本照会，通过外交总长罗文干答复日本政府：“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满洲及京津地区，现为中国之领土，事关主权，不能默认，特此声明。”6月3日，张作霖离开北京返回东北。在张离京前夕，日使芳泽谦吉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①。张作霖对日本的这种趁火打劫行为，极为气愤。他说：“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当奉军屡次败北，蒋军将近济南时，日方曾和张宗昌密议，愿以日军两个师团，改穿直鲁联军服装，参加作战，并另以炮兵进攻蒋军。事为张作霖所知，急电召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张指使“鲁省对于此案”亦应有抗议表示②。张作霖在其势穷力竭之际，能毅然拒绝日本的诱胁，不肯降身卖国倚恃外援以自保，这一点无疑是可贵的。

多年来日本想在东北实现其“二十一条”的侵略计划，但始终没有得逞。如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问题，日人“尝胁作

① 指郭军反奉时，张答应日本的条件。
②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公署档》。

霖履约”，张作霖非但不应，而且“急饬地方官员不得以房地外赁，违者处以重辟”。“日人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终使“二十一条等于废纸”。正是根据这些，芳泽谦吉于战后写的回忆录中称张作霖“是一个倔强的人”，是个“不服输的刚毅的人”①。

田中义一意欲留张使其变成一个“小作霖”，让他充当傀儡，“以完成其分割满蒙之计划”。

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张作霖曾受日本培养，但却忘恩负义”，已“成了日本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障碍”②。故决心狠下毒手。

早在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已经开始酝酿策划谋杀张作霖的方案了。

1928 年 6 月 4 日早 5 时许，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经过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道口时，日本安装的炸药爆炸，去山海关迎接张作霖同车回奉的吴俊升（黑省督军）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当日上午 9 时 30 分即死去，终年 54 岁。

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姑屯一炸，即可证明张作霖“其对外强硬，不肯丧失主权，致见恶于彼族，此乃真正爱国之表现，盖棺可以论定矣”。其实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用自己的言行写成的，事实怎样，就是怎样，不能因皇姑屯一炸就把张作霖的屈辱的一面一笔勾销。当然，张作霖被炸虽不足以说明其一身清白，“从未丧权辱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作霖对日本的侵略要求，也确有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的一面。正因为这样，日本帝国主义才把他视为“眼中钉”和“障碍”。这又表明张作霖没有丧尽良心，尚知卖国可耻，还有一

① 陈天鸥译：《芳泽谦吉在华回忆》。《传记文学》（台湾版）第 1 卷 5、6 期。
②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 271 页。

定的民族意识。不管张作霖从何动机出发，也不管对张作霖一生作如何评价，就这一点来说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作霖吞并黑吉两省经过

◯赵兴德 **口述** 沈一言 **整理**

张作霖当第二十七师师长后，就有统一东三省的政治野心。1916年初，暗中指使驻黑龙江的第一师师长许兰洲，找机会将黑龙江将军朱庆澜驱逐出省（因朱庆澜在奉天当统领时，很看不起张作霖，以致二人意见不合，张记恨在心，故有此举），事成后答应保许继任朱职。于是许兰洲就怂恿住在江省城的旗人吉祥、庆仁庵等10余人，发起在已关闭的八旗工厂（在许的师部后边）开设旗人生济会。在是年的3月17日晚间，旗人各处散发传单，通知所有旗人，在3月18日上午8点钟，均到八旗工厂开会。是晚许兰洲则出动军队，宣布戒严，并将邮政局和电报局封锁。当时警察厅发现满街传单，生济会事先并未呈报警察机关而擅自集合，有违警章。于是在3月18日早晨，即先派警察在八旗工厂四周戒备，监视来开会的是些什么人，待侦知开会的内容后，再定处理办法。此时警察事先已侦知许兰洲的师部将有行动，并报告给了朱庆澜。

在3月18日上午8时前后，果然有些为首的旗人，或乘马或乘车来八旗工厂门前。他们见到警察戒备，惟恐干

涉开会，故未敢进到工厂里面，所有的代表均跑到许的师部躲避起来，所以会未开成。这时许兰洲表面出来调解，实则指示旗人代表联名电北京政府，攻击朱庆澜的左右，如政务厅厅长涂风出，高等审判厅厅长周斗钦，龙江道道尹何南荪等8人的种种罪行，一时人心惶惶。朱庆澜派人到哈尔滨，将许兰洲鼓动旗人闹事的阴谋计划，电报袁世凯。袁接电后，即电责许兰洲不准乱来，言称如果朱庆澜发生意外，则以该师长是问（许兰洲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卫队，因会武术为袁所赏识，以后随倪嗣冲出任江省民政司使同来齐齐哈尔），这样许对朱才不敢无礼，相持一周有余。袁世凯电调朱庆澜入京，遗缺暂由许兰洲护理。不久，袁惟恐再惹起如民国二年宋小濂为黑龙江都督时，因省政主持无人，招致外人的干涉事故，于是派毕桂芳（在民国二年曾一度任黑龙江都督）到黑龙江省代理军民两长，许兰洲则仍回师长原职。

许兰洲未得黑龙江省的政权，仍不死心。这时张作霖已取得了奉天的政权，向北京政府说话很有力量，故许仍托张作霖保他，张也答应设法。许因急于求成，乃派他的参谋长尚某为代表，长住在奉天与张作霖联络。尚某在奉侦知张作霖虽然表面向北京政府保许兰洲，但实际则保他的亲家，即当时任北京陆军讲武堂中将堂长的鲍贵卿。于是尚某将张的两面手法，密电给许兰洲，在密电中有“雨帅有袖手之意”，但这个电报被奉天检查机关所扣留，并译出给张作霖。张这时已能认识几个字了，但把“袖”误认为“抽”字，他在看完电文后，很气愤地说：“我姓张的明人不做暗事，说我抽手，我就抽手。”乃正式保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是年夏袁世凯死后，经黎元洪总统发表鲍贵卿为黑龙江的督军兼省长，

并将许兰洲的第一师调驻奉省。

黑龙江的巡防统领英顺和巴英额二人，原曾与许兰洲合谋驱逐朱庆澜的计划，事成后，黑龙江省的军政大权，由他们三个人掌握。不料现在朱虽走，而黑龙江省的大权并未到手，而且许兰洲还被调离江省。二人实不甘心，他们见鲍贵卿虽是督军兼省长，但无实力，与朱庆澜同是空筒。于是二人合谋驱鲍，一时调兵遣将，有所行动。鲍贵卿得知情况后，急电张作霖求援，张即派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到黑龙江省进行武装调停。孙到江省见鲍后，即到英、巴二人的驻防区呼兰县，与英、巴见面说明利害，面告如果对鲍有何举动，奉天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同时孙又允许给他二人编旅，英、巴二人见有张出面干涉，因而不能抗拒，当即达成协议，并随同孙烈臣到奉天面见张作霖，解释误会。不久英、巴二人均晋升为旅长，于是驱鲍的一场风波，才告平静。

张作霖经徐世昌总统任命，升为东三省巡阅使后，急于统一东三省。于是电请徐世昌将吉林督军孟恩远他调，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所遗黑龙江督军职务，保孙烈臣继任。张的这个电报，获徐世昌批准。孟恩远在吉林数年已财物足矣，故得此消息后，本想交任了事，但为其参谋长兼旅长高士傧和旅长高凤城二人反对，扬言想要督军先打打看。于是张作霖即派孙烈臣为征吉总司令。当孙的先头部队进入吉林境内后，孟恩运见势不佳，也不顾二高的反对，电张作霖将吉林督军交出，但求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作霖与孟恩远是拜把子弟兄）。张作霖当即复电，如能和平交出督军，保证你安全回天津（因孟恩远是天津人）。二高见孟不敢抗拒，也放弃了部队，身着便装由海参崴乘船回到天津原籍。于是

孙、鲍分别到黑龙江和吉林接任督军，至此东三省才为张作霖所统一。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奉 军 沿 革

◯ 姚东凡

奉军沿革，亦即奉军集团之发展史。写奉军沿革是与奉军首领张作霖一生及其子张学良的经历相联系的。

张作霖字雨亭，辽宁海城县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父名有财，小商人，嗜赌，设局抽红，成为当地一个流氓。张作霖14岁丧父，幼年读过书，后学兽医。1894年投入驻营口的"毅军"[①]宋庆部下，当初级兽医。旋退伍自设兽医庄，常与当时帮匪联系。和黑山南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次女结婚后，由赵占元之协助纠集些流氓"拉大团"，又名"保险队"，为赵家庙一带地主保镖，有时也远出劫掠财物，是一支极小帮匪。后有滦县汤玉麟、义县杂木林子张作相先后入帮，又有张景惠带些人马入伙，从此成为辽西一支有力的马胡子（东北土语称胡匪为马胡子）。1901年新民知府增韫呈请盛京将军增祺批准收编张作霖匪帮为新民府游击马队。张作霖从清

① 毅军是李鸿章创建之淮军的一个支派，1894年中日甲午之役战败从朝鲜退到营口的。当时流传这样几句话：依不打（盛京将军依古唐讷不打），常坐坡（吉林将军常顺向后坐），宋庆一败二百多（毅军统帅宋庆，人称宋大帅，他一败率部退200多里。

光绪二十七年由“拉大团”至此就变为地方队伍了。张作霖被收编后出力剿平新民境内匪徒，特别是剿灭辽西巨匪杜立山。1902年盛京将军锡良整编奉天省巡防为五路，计中、前、左、右、后五路，每路辖三五营不等，设统领一员，张作霖被任为前路统领。1906年中路统领朱庆澜调除，遗缺由张作霖兼任。张这时拥有步兵五营，骑兵七营，已从新民移防驻守洮南一带，为当时奉天省地方一支强悍队伍。辛亥（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当时驻奉天省城北大营的陆军第二混成协（旅）协统（旅长）蓝天蔚密谋起义响应，另有奉天优级师范校长、省咨议局议长吴景濂，辽南有商震，安东有刘德馨（刘多荃父），沈阳有张榕、宝昆（人称恒六）等人策动革命。当时盛京将军赵尔巽急电调张作霖所部星夜来沈镇压，蓝天蔚、吴景濂等被逼离奉南逃，张作霖捕杀了张榕与宝昆、田亚赟诸人。沈阳市民对张之残暴嗜杀，人人自危，人人侧目。赵尔巽为酬张之功，力荐张部编为陆军第二十三镇。但由于1911年10月民国成立，中、前两路巡防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为中将师长，伊荣廷为五十三旅旅长，孙烈臣为五十四旅旅长。未几，伊荣廷病故，由团长汤玉麟升任旅长。同年以左路巡防编为陆军第二十八师，任冯德麟为师长，汲金纯、张海鹏为旅长。1913年后路巡防改编为骑兵第二旅，任吴俊升为旅长。

1913年3月张作霖赴京晋谒大总统袁世凯，袁蓄意称帝，对张特表优遇。张乘机力表效忠于袁。

1915年袁世凯急于称帝，将奉天的镇安上将军张锡銮调京，另调嫡系段芝贵从湖北接任奉天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吉、黑三省军务。段芝贵到东北后，遭到吉、黑两省的部分军队反对，特别是驻在辽西的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反对。

因为段芝贵献袁世凯筹备称帝的经费，竟窃取奉天省库大宗银两（据传 20 万两，也有说 60 万两的）。张作霖阴谋唆使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藉此大肆排段，段遂离职。张作霖表面装作好人，故示拥段。当段被排离奉之际，他还特派其旅长孙烈臣由京奉铁路护送入关。段芝贵到京后，向袁盛称张之忠心。袁为皇帝迷梦所使，于 1916 年春特任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并任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为奉天军务帮办。

1916 年袁世凯自称洪宪皇帝。83 天忧患而死。副总统黎元洪接大总统位，遭北洋系军阀反对，张也参与各省督军策划倒黎。

1917 年安徽大军阀人称“辫帅”的张勋，在江苏徐州召开所谓“督军团”会议。张派军署参谋长杨宇霆代表出席。杨携军署少校参谋秦华、郭松龄随行。郭松龄到天津向杨预支薪金，遭杨批驳，郭一怒之下竟不辞而别，南去广东。据秦华后来透露说：“督军团”会议公开内容是倒黎元洪另举江苏督军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但内幕真实的密谋是为清朝复辟。4 月间张勋率其辫子兵（张勋所部官兵蓄发）入京扶持废帝宣统重登帝位。段祺瑞誓师马厂命第八师声讨张勋。在北京城内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陆锦为团副）开始向张勋的辫子兵攻击，炮毁张的住宅。张勋逃入东交民巷，由荷兰使馆保护起来，结束了他的军阀生活。同时奉天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因参与复辟活动被撤职。师长缺，张作霖荐该师的旅长汲金纯升任。同年张辞去第二十七师师长兼职，提升旅长孙烈臣升为第二十七师师长，递遗旅长缺由该师炮兵团团长张作相升充。

1917 年扩充骑兵第二旅为陆军第二十九师，张保吴俊升

为师长。石得山、耿玉田为旅长。

1917年奉军集团先后扩展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三师实力，对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师之指挥大权在握的张作霖来说是名实相符了。

袁世凯任大总统初年，有地方官必须迴避本省的规定。也由于奉天省文化落后，一向极少为官作吏的。张作霖兼巡按使，为了军民分治，大力培养民政人材，便用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不畏权贵，执行警法，严惩盗匪，禁止赌博。为设赌的汤玉麟旅长所不满，与王永江发生冲突。汤玉麟人称“二虎”，盗匪积习未改，迁怒张作霖信用文人，竟弃职率部队叛变。但张作霖对王永江的不畏权势敢于负责的精神更加重视，委以财政厅长，全权代理奉天省长。王亦励精图治，不负张之所托。

1923年6月13日，大总统黎元洪携印企图逃往天津，不料为直系侦知，派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于京津途中火车上夺回印鉴，演出有声有色的夺印一剧。直系军阀以吴佩孚、冯玉祥为首，拥曹锟为总统。但总统选举必须由参众两院履行选举手续，考虑到两院中非直系议员反对，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经手，密议用收罗的办法给议员每人5000元，以保证顺利通过两院的选举，曹锟继任了大总统职，史称为贿选总统。

1917年6月许兰洲又逼走督军毕桂方，而许也为江省的英、巴、袁等旅长所不容。许只得率其师一部投归奉张，后以援陕开赴豫西。张作霖力荐曾在王占元师任旅长、当时的北京陆军讲武堂堂长、张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为黑龙江省督军。奉军集团又增添了新的势力。

1918年春，皖系徐树铮通过奉天督军署参谋长杨宇霆的

同学关系（在日本士官学校徐七期，杨八期先后毕业）得与张作霖联系。徐煽动张派军入关开往北京，张作霖自兼关内奉军总司令，徐为副司令，代行张的职权。奉军入关，从这时起出入于京津路上为一般人所侧目。同年徐侦知冯国璋大总统为扩张直系军力，从日本订购大批军械，将船运于秦皇岛交付。徐唆使张出兵截留，时人称为“劫械”。1918年张作霖集团由于劫械得有大批军械，成立了一个师，又先后五个旅，其编组如下：

暂编奉天陆军第一师师长张景惠

暂编奉天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梁朝栋

暂编奉天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

暂编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蔡平本

暂编奉天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王良臣

暂编奉天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刘香九（兼）

张作霖拥护段祺瑞再出组阁，并命张景惠率所部奉军南下援湘。许兰洲率所部奉军援陕，扩大奉军声势，实际为皖系段祺瑞发展政治力量。

1918年9月，内阁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由于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外甥、吉林第二旅旅长后编为吉林第一师师长高士傧宣布反对，张作霖乃命第二十九师吴俊升率部进军吉林农安县。1919年夏，北京政府为免吉省战祸，免去吉督孟恩远本兼各职，调黑龙江省鲍贵卿为吉林督军。特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江省督军，遗第二十七师师长由张作相调充。

1919年徐树铮改任西北筹边使，参战军改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瞒着张作霖私自编组五个三团制的旅，另为杨宇霆所荐的于珍编一个旅驻洛阳。张作霖调查出副司令徐树铮

由段内阁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0余万元，奉军实收只180余万元，其余款项徐都挪用于编练参战军上。张作霖大为不满，撤徐副司令职，并迁怒杨宇霆，杨也遭撤职。遗参谋长职务由秦华升充。

1920年夏，直皖战起，张作霖袒直，皖系大败，吴佩孚缴编皖系之西北边防军三个整师和西北筹边使徐的五个整旅，获胜的吴佩孚当时声势赫赫。

1920年冬吉林督军鲍贵卿去职，由江督孙烈臣调吉。张荐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升任黑龙江省督军。至此张作霖掌握了奉、吉、黑三省军政大权，形成巩固的奉军集团。当时三省军队组成如下：

奉天军：除已编建的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暂编第一、第十六师与五个旅外，于1920年至1921年间又新编：

暂编奉天第六混成旅旅长鲍德山

暂编奉天第七混成旅旅长先汤玉鳞后李景林（汤玉麟时由右路巡防马龙潭部改编）

暂编奉天第八混成旅旅长郭松龄

暂编奉天第九混成旅旅长牛永福

暂编奉天第十混成旅旅长赵恩臻

暂编奉天第十一混成旅旅长汤玉麟

吉林军：（外有北洋陆军第十九旅由鲍贵卿兼，后由张焕相接任。）

暂编吉林：

第一混成旅旅长丁超

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玉昆

第三混成旅旅长于琛徵

第四混成旅旅长杨遇春
第五混成旅旅长蔡永镇
第六混成旅旅长郭瀛洲
第七混成旅旅长李桂林
暂编黑龙江军：
第一旅旅长李庆禄
第二旅旅长张明九
第三旅旅长巴英额
第四旅旅长张海鹏

在 1920 至 1921 年间，奉天陆军计五个师 11 个旅。吉林七个旅另第十九旅计八个旅。黑龙江计四个旅。共五个师 23 个旅。

奉直两系都想操纵北京政府，因而发生磨擦。1920 年 9 月奉张推荐其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又荐其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1921 年大总统徐世昌特任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12 月，为进一步控制北京政权，张作霖支持亲日派的梁士怡组阁，遭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公开反对，相持不下。双方调兵遣将，1922 年 4 月间终于爆发了直奉之战。

奉军分四路进兵：（一）西路以第一、第十六两师为第一梯队，张景惠为司令；郑殿升第二旅，牛永福第九旅为第二梯队，占永定河迤南相机进攻保定。（二）第三梯队以第二十七师为主力，张作相为司令，占领安次廊坊迤南地区防敌。（三）东路第二梯队以三、八旅为主力，以张学良为司令，从胜芳迤西与直军主力第二十三师激战。（四）东路第一梯队由骑兵穆春、张奎武两旅，步兵李景林第七旅组成，骑兵许兰洲为司令，由马厂迤北地区袭击直军右侧背。黑龙江骑兵旅

旅长人称双枪手张奎武未战即溃于天津东灰堆，不放一枪，全旅枪马被天津警察厅杨以德的警察所缴。张景惠不主战，与敌接触不利，即撤回南苑。张作相一战而溃，经由热河逃回关外。郭松龄指挥的三、八旅击败正面来攻之敌。陆军部次长韩麟春来张学良司令部参与调动策划，但终因全局失败所关，率部撤退。奉军占领山海关与敌作最后一战，团长王兴文阵亡，奉军惨败撤军关外，北京政府下令免张作霖的本兼各职。6月间，东三省议会公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驻吉黑两省的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张宣布保境安民，整理军队。设陆军整理处，由吉林副司令孙烈臣兼任总监，姜登选、韩麟春、张作相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整理军队，训练军官军士，扩充讲武堂教导队；扩建兵工厂，整顿被服、粮秣两厂，实行军需独立；改变任用私人恶习；截留中央之关余盐余，充实军费。

战败后的张作霖励精图治，延揽人才，改变非本帮不用积习，由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山东、直隶远来报效的陆军大学、日本士官和陆军速成、军官、军需、军医、讲武堂等出身的军人，委以军、师、旅、团、营长及军务重要职务。奉军声势又振。

张作霖处心积虑欲雪战败之耻，于是又与皖系重修旧好，并与北上之孙中山结成孙、段、张三角联盟，进行全面的对直系作战准备。

1923年直鲁豫巡阅使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徐世昌下台。

1924年吉林保安副司令孙烈臣病故，吉林副司令由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升任。递遗第二十七师师长由张学良兼任。但第五十四旅李振声由张作相带吉林。奉系军队经整顿后计编为27个旅如下：

第一旅旅长阚朝玺　　第二旅旅长张学良
第三旅旅长张宗昌　　第四旅旅长裴春生
第五旅旅长于芷山　　第六旅旅长郭松龄
第七旅旅长汤玉麟　　第八旅旅长丁　超
第九旅旅长陈玉昆　　第十旅旅长于琛徵
第十一旅旅长巴英额　　第十二旅旅长赵恩臻
第十三旅旅长吉　兴　　第十四旅旅长杨德生
第十五旅旅长万福麟　　第十六旅旅长齐恩铭
第十七旅旅长张明九　　第十八旅旅长张焕相
第十九旅旅长高维岳　　第二十旅旅长杨遇春
第二十一旅旅长李振声　　第二十二旅旅长石青山
第二十三旅旅长李爽垲　　第二十四旅旅长邢士廉
第二十五旅旅长蔡平本　　第二十六旅旅长李桂林
第二十七旅旅长温玉璜

骑兵：

第一旅旅长穆　春　　第二旅旅长彭金山
第三旅旅长苏锡麟　　第四旅旅长李冠英
第五旅旅长梁忠甲

炮兵：

炮兵旅长邹作华　　炮兵团长穆纯昌
炮兵团长璞炳珊

工兵：柏桂林

辎重：牛元峰

迫击炮厂：李宜春

1924年秋，张作霖以声讨曹锟贿选为名，编组东三省军队为六个军，改称镇威军。镇威军总司令为张作霖，参谋长为杨宇霆。奉军分六路向关内直军进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

发。奉军的战斗编组和攻击目标以及战斗经过如下：

计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率第四旅裴春生，十二旅赵恩臻，十六旅齐恩铭进攻九门口、义院口长城间，占领石门寨，向北戴河之敌进攻。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率李爽垲、邢士廉、张宗昌、于芷山、蔡平本各旅经朝阳向承德进攻。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指挥二、六旅、温玉瓒、宋九令、十九旅高维岳各旅向山海关城暨其附近要隘之直军彭寿莘师猛攻不下，损失亦大。后由副军长郭松龄率该军一部，经九门口、石门寨攻克秦皇岛，与关外部队夹击榆关，直军张福来、彭寿莘军全部被缴。由于出兵热河之直系军冯玉祥曾与张作霖秘密协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各军转回倒吴。冯玉祥回军北京，囚禁大总统曹锟，枪杀曹之军需总监李彦青，直军全部崩溃。吴佩孚从秦皇岛只身乘军舰辗转逃回洛阳。

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率吉省丁超、于琛徵、杨德生、李桂林等旅在营口盘山间为总预备队，防敌登陆，扰乱后方。

第五军军长吴俊升指挥阚朝玺、张殿九两旅及刘德权骑兵团经通辽、开鲁、建平、凌源直向承德进击。

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指挥穆春、苏锡麟、梁忠甲等旅搜剿热河境内残敌。

由于冯玉祥倒吴回京，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顺利攻进冷口、界岭口摧毁直军王维城部沿滦河南下。李乘机进入直隶津东地区，占领天津。副军长张宗昌率部直捣山东。奉军大部开驻关内。以张学良为津榆驻军司令，设司令部于天津。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后，张作霖、冯玉祥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执政。此时张作霖统率之奉军冠以镇威军之名号，设

镇威上将军公署于沈阳。张还报请段执政任命李景林为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任张宗昌为山东省军务督办兼省长职，并任阚朝玺为热河都统。

1925年夏，张作霖因奉军势力扩展，将原奉军的27个旅扩编为两旅制的师20个，冠以东北陆军排列。兹将师号与师长姓名列下：

东北陆军第一师师长李景林
东北陆军第二师师长张宗昌
东北陆军第三师师长阚朝玺
东北陆军第四师师长张学良
东北陆军第五师师长赵恩臻
东北陆军第六师师长郭松龄
东北陆军第七师师长高维岳
东北陆军第八师师长蔡平本（病故后由丁喜春升任）
东北陆军第九师师长汲金纯
东北陆军第十师师长齐恩铭
东北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汤玉麟
东北陆军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
东北陆军第十三师师长张九卿
东北陆军第十四师师长穆　春
东北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张作相
东北陆军第十六师师长于琛徵
东北陆军第十七师师长万福麟
东北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吴俊升
东北陆军第十九师师长李爽垲
东北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

附直、鲁、热各省军之编组如下：

直隶省：

第一师师长李景林　一旅窦联芳　二旅王宾

第十九师师长李爽垲　四一旅朱同勋　四三旅荣臻

第一旅旅长王丕焕　第二旅旅长马瑞五　第三旅旅长张宪

第四旅旅长胡玉坤　第五旅旅长朱益清

山东省：

第二师师长张宗昌　第三旅旅长褚玉璞

第二十八旅旅长程国瑞　第二十九旅旅长许琨

第三十二旅旅长毕庶澄　卫队旅旅长方永昌

第五十旅旅长徐源泉　第一梯队方振武

热河省：

第三师师长阚朝玺　旅长袁永朔　旅长刘山胜

1925年秋，段执政任命奉系杨宇霆为江苏省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省军务督办。此时，张作霖拥有奉、吉、黑、直鲁、皖、苏、热8省地盘，并因各省军队亦有扩展，同时编成六个方面军团列下：

镇威军第一方面军团长李景林，镇威军第二方面军团长张宗昌，镇威军第三方面军团长张学良，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长姜登选，镇威军第五方面军团长张作相，镇威军第六方面军团长吴俊升。镇威陆军第三方面军团由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三个军组成。张学良军团长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为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为第十军军长。由张学良、郭松龄、裴春生、齐恩铭、赵恩臻、高维岳六个师编成。

1924年—1926年间，冯玉祥驻军北京，威胁执政，终于迫使段祺瑞下台。

1925年秋，奉系势力已扩展到长江流域。遭冯玉祥、孙

传芳、郑俊彦等不满。10月间他们突然发起军事行动讨奉。驻防于上海、南京间之奉军第八师丁喜春、第二十师邢士廉两师全部被孙传芳部击溃缴械。杨宇霆、姜登选先后退出苏皖。

1925年津榆驻军第六师师长郭松龄垂涎李景林、张宗昌得到直鲁两省地盘，遂派其亲信刘伟旅与少将参谋彭振国开进安徽，谋占皖省地盘。而张作霖竟荐姜登选督皖。郭已不满，称病入院。同时张作霖又派韩麟春为第三方面军团之第九军军长，更激怒郭。郭向张学良申诉："明知我与姜、韩不协，竟派韩同在一个军团，一个槽拴两个叫驴，我不干了。"郭阴与冯玉祥、李景林密谋倒张。更使郭不能忍受的是奉张又发表于珍为第三方面军团副军团长。郭向张学良力争公开反对。张学良即时专车回沈，拟劝乃父收回成命。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乘张学良回沈即出离天津医院，赴滦州召集各师旅长会议，发出反奉通电，要在张作霖左右"清君侧"。同时撤销裴、齐、赵、高四个师长职并押解去天津。因为他们都是张氏父子的老人。郭并枪决了专车过境的前安徽督办姜登选。复派兵围剿驻昌黎的汲金纯师，双方激战，汲师退往榆关。郭军先头部队出关占据万家屯车站，驻榆关之第五方面军团在不明情况下与汲师撤向绥中迤东地区，时人称为郭军反奉。

1925年11月下旬张作霖之总参议办公室，突接铁路报告："关外头一站万家屯车站被情况不明军队占据，交通断绝。"举座鹜疑。傍晚，张学良来办公室接胡若愚从意租界电台发给张亲译密电。张在阅电时，两手颤抖，震电纸作响，人皆惊其精神失常。事后始悉胡告郭反奉杀姜撤四师长的情况。郭松龄改编第三方面军团部队为四个军一个预备队。现将改编成郭军的各军主官姓名列下：第一军军长刘振东，第二军

军长刘伟，第三军军长范浦江，第四军军长霁云，以魏益三为预备队司令。郭率全部军马出关，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锦西之连山，始遇占领葫芦岛——连山车站——连山以北地区之汲金纯残部和张作相一部吉林军与江省梁忠甲旅，双方展开激战。郭军之富占奎团乘海水落潮绕袭汲金纯之右侧背，汲部全部溃散，张作相军、梁忠甲旅亦皆败退，张、汲、梁三部人马在渡女儿河时皆有损失。

郭军连山一役大获全胜，直趋锦州。此时日本关东军派人到锦，诡称要支援郭军，实则乘机要挟郭作卖国行动，为郭拒绝。因为突然发生外交问题，以致郭军迟于东进。日本军方对郭的要挟未成，旋与奉张之杨宇霆协商要求实行袁世凯以前答应的二十一条。日军方并绘图通知张郭两军不得横越南满铁路线和进入距铁路两侧 20 公里以内，这就保障了奉张的沈阳基地和维护了张之政权。

张学良接胡告密电后，即率朱光沐、姜化南、鲍文樾几个幕僚经大连乘军舰赴秦皇岛邀郭松龄与之见面，被郭拒绝。张认为局势难以挽回，即转舵由营口上陆，改乘火车与郭军前方部队谋取联系，亦少效果。仅携由山海关被撤职的团长张廷枢和起义归来的富双英团、刘荫厚营开到新民巨流河左岸铁路两侧，张学良设第三方面军团司令部于兴隆店车站。收编军团后方部队，以四个团编成第十九旅，委张廷枢为旅长。以三个团编为第十二旅，以富双英为旅长。张旅占领巨流河左岸铁路迤北与腰高台子第五方面军团联络。富旅占领巨流河左岸铁路迤南地区。各团、营、连构筑半永久阵地，并公布两旅士兵从 11 月起按月发双饷，以示鼓励。

沈阳方面拼凑北大营教导队编为第五旅，委升教导队队附王瑞华为旅长，开往兴隆店西大王家窝堡与于芷山骑兵旅

一部联合严阵防敌，调升新编成的刘辅庭旅为预备队，以中将朱继先为总预备队长。

由连山败回之张作相军，占领新民东北方腰高台子，防郭军绕袭沈阳。指定江省吴太来师之第二旅占领大民屯迤北地区，堵击郭军夺占马三家车站，围攻沈阳。张作相、张学良、吴太来各部互相策应，并肩作战。另由第六方面军团长吴俊升率万福麟第十七师全部攻占大虎山向新民进攻，切断郭军背后联络。

1925年12月中旬，郭军全部进入新民境，令其第一军向腰高台子张作相军进攻，被张军反击溃败退入新民县城。吉省军乘胜进剿新民迤西铁路要点，进迫新民。郭之第二、第三两军，只展开炮战，双方官兵皆无斗志，形同东西两军演习（第三方面军团部秘书处长刘鹤龄归到兴隆店）。

在新民郭军内部的陈再新利用在新民日本领事馆的电话向沈阳张作霖密报郭军不稳情况，更重要的报告是郭松龄已偕妻坐大车经大民屯企图逃至南满路东车站奔赴大连。张作霖获得这个密报后，立即严令骑兵穆春师全部搜捕郭松龄务获究办。终为穆师团长王永清部的排长于大民屯北某村将躲藏在农民家菜窖里的郭松龄及其妻韩淑秀捕获。在解往沈阳途中又接张作霖命令就地将郭夫妇枪决，曝尸于沈阳小河沿。

郭、姜、韩之积怨，始由学派相互轻视（陆大与日本士官），继以指挥意见不协，终因人事弄权，结不解之仇。1924年姜、韩攻九门口，其炮兵指挥官陈琛请姜、韩军长撤免不听命令之阎宗周营长职，郭坚决袒阎。后又因联军会议郭与姜、韩意见不同，席间冲突。郭松龄激愤之下竟不辞而别，擅离副军长职回沈，为张尾追劝回。后来不知从何人传给郭说："姜、韩向张学良说像这样军人，为军法所不容。"因此郭与

姜、韩之间结不解之仇恨。此种豆棚瓜架之语，姑妄言之，写在这里。

1925年12月底，郭松龄事件平复后，张作霖宣布韩麟春为第四方面军团长。并将东北陆军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军合组成为联合军团，设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司令部，任命张学良、韩麟春为军团长，重整各部队，准备再向关内发展。

冯玉祥、孙岳所部号称国民军，乘郭反戈出关之际，撕毁冯郭间协定以前的密约，冯玉祥悍然击溃李景林军，与张宗昌的鲁军对阵。另方面冯玉祥又进军迁安、乐亭、滦河地区，逼近榆关。

1926年1月，张韩的联合军团陆续入关，与严阵之冯部国民军隔滦河展开了攻防战，张韩军团以其第六旅刘伟旅于迁安县南强渡滦河，击散冯部守兵，国民军遂全部撤退到北京附近。

张韩军团联合司令部由锦州进驻芦台，迫冯玉祥退守南口。第三、四方面军团遂进驻北京，改编李景林所部委荣臻为第十七军军长，胡毓坤为师长，旋升委胡毓坤为十六军军长，编组第十六、十七两军为联合军。

1926年夏，张作霖晋京与蛰居洛阳之吴佩孚弃仇修好。张改东北军为安国军，共讨冯玉祥，展开南口之战。第三、四方面军团之第十军于珍所部攻南口正面及其迤东山地之敌。吴部靳云鄂之高汝桐军攻南口迤西之敌。原属奉系之魏益三部布防于涞源县北，防敌南窜。张作霖派第六方面军团吴俊升率穆春骑兵军为主力，以汲金纯一部和新编第十六军军长王树常进兵热河，驱逐冯系之宋哲元军，战于多伦之野。张吴修好合力讨冯。复得山西阎锡山的支援，冯军全部经张家口、绥远向甘肃败退，冯玉祥只身经外蒙避居苏联。张作霖

任汲金纯、高维岳为绥远、察哈尔都统。

1927年初，张作霖第10军军长兼北京卫戍司令于珍率戢翼翘、郜汝廉、刘翼飞、赵鸣皋等旅渡黄河占领开封，人称“东北军下河南”。于军被河南地方土著军靳云鄂、马及第、马朝凤、米文和等部逆袭，刘、赵两旅败溃。于珍退守黄河北岸。3月间张韩军团长令第十六、十七军沿京汉路渡过黄河与以靳云鄂军为主力以及马及第、马朝凤等大战于郑州城郊。靳军高汝桐军长阵亡，靳军败溃而逃。

1927年12月，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宣布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同年6月张作霖在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等人推戴下，在北京怀仁堂就任大元帅。大封功臣，用策群力，张韩军团长撤于之本兼各职。委陆军部次长军团部总参议王树常接第十军军长职，与第十六、十七军并肩追敌。于许昌以南，在漯河、西平间与北伐之国民党张发奎军遭遇。张、韩另派赵恩臻之第十一军重占开封为东路军，南下朱仙镇鄢陵，收缴据守鄢陵之刘培绪全师军械。再南进上蔡县，与国民党张发奎军之一部激战于上蔡城附近。旅长富双英暨其王团战败被俘。第四十六旅旅长陈琛所属团长甘宗训因擅自撤退，军团遂按军法枪决。第十一军所属三个旅仅其中之第六旅较完整。又以第八军万福麟部及郜汝廉、王瑞华、赵有光各旅开赴洛阳，防御进出潼关之冯玉祥军。在巩县以西与冯部石友三军遭遇，激战后，退守巩县北黄河北岸。

1927年5月张、韩军团长认为，南阻于国民军，西受阎锡山威胁，而东路山东方面张宗昌部连连败仗，几不成军，遂决心全军各部撤退黄河迤北新乡间整顿待机。

军团为鼓舞士气，壮声势，凡属于第三、第四方面军团之各旅，一律付与师的称号（仍为三个团制）。

第三、四方面军团所属各旅暂编为三个团制的师，兹将旧旅与新编师的番号列下。但旧旅长、新师长和旧旅新师已记忆不全，盼知者予以补充。

暂编第十师原第四旅

暂编第十一师原第二十三旅

暂编第十二师原第二十九旅

暂编第十三师原第四十五旅

暂编第十四师原第四十九旅

暂编第十五师原第二十四旅

暂编第十六师原第八旅

暂编第十七师原第六旅

暂编第十八师原第四十旅

暂编第十九师原第五十旅

暂编第二十师原第二旅

暂编第二十一师原第十二旅

暂编第二十二师原第二十一旅

暂编第二十三师原第三十七旅

暂编第二十四师原第二十七旅

暂编第二十五师原第四十八旅

暂编第二十六师原第四十六旅

暂编第二十七师原第十六旅

暂编第二十八师原第五旅

暂编师长在改编以前旧旅长中，军阶有中将、少将之分，但改编为师长一律为中将。此次改编之后新升的师长仍为少将，兹将当时及以后的师长姓名列后：

中将师长：

刘翼飞　　张廷枢　　丁喜春　　何柱国　　黄师岳

应振复　　郜汝廉　　王以哲　　安锡古段　王瑞华

少将师长：

苏炳文　　富葆衡　　孙兆印　　杨正治　　郭殿举

孙德荃　　李振唐　　赵有光　　韩光第

各军所属旧旅新编师仍按原编组，新编第二十九军以戢翼翘为军长。第十一军赵恩臻去职，以该军第六旅新编的第十七师中将刘伟升充军长，刘病将十一军部取消。兹将各军新编师号列下：

第八军：第十一师、第二十四师、第十七师。

第九军：第十六师、第十八师。

第十军：第十师、第十二师、第二十一师、第二十六师。

第十五军：第十四、第三十六两旅。

第十六、十七军：第十四、十九、二十、二十七、二十八师。

第二十九军：第十三、十五、二十三师。

预备军：七个补充团。

1927年秋，山西阎锡山和在河南之冯玉祥合谋与国民党北伐军呼应。晋阎首先向东北军发难，将北京派出的以于珍为检阅委员长，在路经大同赴绥远时予以扣留。阎锡山出兵石家庄与察哈尔边境，并遣傅作义旅潜袭直隶进占涿州县城。第十六、十七军堵击石家庄北犯晋军，以第十军布置于阜平及其迤北山区。以第二十九军掩护荣、胡军左侧，该军之何柱国师攻占定县城袭晋军背后，亲来前方指挥之阎锡山险遭活捉。以第十五军在保定、望都间为军团预备队。第五方面军团并指挥察哈尔第九军布防于北京迤西由紫荆关——蔚县沿直晋边境据守要点。防晋军出关窜扰。

1928年4月，冯玉祥命令韩复榘部渡河占据彰德北进，

张韩军团长令驻北京之预备军改为第十一军之富双英部开赴彰德，围攻韩部。同时由湖北襄、樊投到军团之于学忠部亦参加此役，围攻彰德北面。韩复榘终于弃城退守新乡。

1928年4月，国民党北伐军占安徽，长驱迫攻山东，张宗昌退守济南与国民党军展开济南街市战。

从青岛西进之日本军福田师团，以护路保侨为名，实则是庇护垂死之张宗昌妄图挽回危局，延长中国之内乱。日军竟悍然占据了济南，大肆屠杀。

1928年5月间，号称大元帅的张作霖鉴于华北形势，南有新兴之国民党北伐军的压迫，日本方面又乘机多方要索，大加胁迫，遂决心将全军撤出华北。张作霖也退出北京，乘专车回奉。车行皇姑屯站东方、京奉与南满铁路交叉点处，被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预先埋设的炸弹击中。前赴山海关迎接的吴俊升当场炸死，张作霖进入他的官邸后亦因伤重故去。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4辑〕

张作霖其人

◯常　城

张作霖是中国旧军阀中的传奇式人物。他由一个“绿林”头目，受抚为清朝营官，一跃而为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统治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是民国初年统治中国北方最久的军阀。

一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光绪元年），生于奉天海城小洼村。其先祖河北大城人，后迁到东北。父亲张有财，好赌，不安于农，带妻子儿女到海城驾掌寺，开小商铺，设赌抽红。张14岁时，父亲被赌徒打死，家庭难以为生，随母至镇安（黑山）小黑山外祖家寄食。作霖因受父亲影响，从小即游手好闲。母亲送他到私塾读书，他不受约束，辍学而归。后来跟继父医马，并作过货郎、小卖等杂业。不久，流浪到大高坎镇，与赌徒流氓厮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投入清军宋庆标下当兵。战后不久，离队至小黑山（今北宁市）赵家庙，与地主赵占

元次女结婚。当时，辽河下游散兵游勇到处抢劫，"绿林"帮伙风起。22岁的张作霖也铤而走险，拉起大帮在辽西活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沙俄侵占全东北，盛京将军增祺逃跑，辽西兵匪交加，陷入无政府状态。土匪割据一方，与当地富豪结合，组织"大团"，号称地方"保险队"，向居民摊派，为绅商保镖。张作霖在赵家庙纠集20余人，也组织起"保险队"，逐渐扩大"保险区"。后来移至北镇中安堡割据。1901年除夕，张的"保险队"突然被亲俄股匪金寿山袭击，张逃至台安八角台，与张景惠"保险队"合伙。张景惠见作霖足智多谋，推作霖为首领，从此二张结盟，活动于八角台一带。此间，汤玉麟、张作相先后来投，于是形成了以张作霖为首的二三百人的大帮，雄踞于辽西。

张作霖善于勾结地方豪绅，以求自己的发展。他广交地方绅商"名士"：新民府烧锅彭掌柜、八角台富商戴春荣、商会会长张紫云等，均系张之好友。张作霖并非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而是勾结权贵，"为权贵所赏识"的匪帮。

张作霖野心很大，并不甘心"吃绿林的黑饭"，急欲投靠官府，以求升发。义和团运动过后，当清廷以"剿抚兼施"手段平服匪患时，他主动求抚。1902年9月，张作霖经当地18屯绅商代表作保，晋见新民知府增韫，受抚改编。受抚后被任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其同伙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被编为帮带或哨官。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张作霖倾向俄国，为俄军搜集粮草、情报。后以"俄国间牒"嫌疑，被日军逮捕，要处死他。日军参谋本部参谋田中义一等，见张机智可用，为张"斡旋"说情，使张获释。当时，张发誓："愿为日军效命"，并在誓约上按了手印。

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命营务处总办张锡銮将奉天旧军改编成前、后、左、右、中五路。任张作霖为前路巡防营统领，调驻辽源（郑家屯）、洮南，追剿蒙匪。张剿匪有功，不安于漠北，急思南调奉天。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关内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东北革命党人积极活动，酝酿东北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惊慌万状，欲逃往北京。这时，奉天咨议局副局长袁金铠为赵出谋划策：调张作霖进奉天，镇压革命。张接召令后，率所部3500人，星夜急驰，开入奉天。当时，赵尔巽和袁金铠等正筹划成立装点门面的“奉天国民保安会”，以保反动统治之安。1911年11月12日，赵尔巽在奉天召集了由各方代表和革命党人参加的“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大会。在会上，赵大发议论，反对东北宣布独立。当革命党人打断赵的发言，要求响应武昌起义时，张作霖跃上讲台，出示手枪大叫：“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在张的蛮横威胁下，革命党人纷纷离散，“保安会”宣布成立。稍后，张在赵尔巽指使下，与袁金铠合谋，于1912年1月23日以请客为名，骗杀了革命党人张榕。接着，张在奉天连日捕杀革命党，“剪发易服者，无一幸免”。至2月初，“遭其毒手者，不下四百余人”①。恐怖气氛，笼罩了奉天省城。因镇压革命有“功”，清廷授以“关外练兵大臣”，他受宠若惊，主张“武装勤王”但清廷迅即覆亡，保皇成了泡影。

民国建立后，张深恐对他不利，为寻求后台，不惜勾结日本。同年2月下旬，几次往见日本驻奉总领事落合谦太郎，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选译》第213页。

乞求日本支持。1 月 26 日，他对落合说："当此时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① 当袁世凯"派密使两人"劝张改变保皇立场，并许以重任时，张立即"软化"，致电袁氏，"赞成共和"，表示对袁效忠。9 月被袁任为民国的中将师长——二十七师师长，驻防奉天，开始攫取了奉天军权。在辛亥革命时镇压革命，是张作霖崛起的关键。

二

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之后，依靠自己的武力，上结袁世凯，外靠日本帝国主义，施展权谋，步步升发。

1913 年 3 月，袁世凯在谋杀宋教仁之后，急于向南方用兵。为免后顾之忧，特召张作霖入京，"鼓励"他镇压革命之"功"。要他"振刷精神"，为袁效命。张返奉后，竭力镇压革命活动。这时，赵尔巽下台，张锡銮任奉天都督。张作霖排挤张锡銮，袁对他很不放心，欲调其到内蒙，张作霖进行抵制。1915 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深恐作霖有所"异动"，特派亲信段芝贵为奉天督军，兼管吉、黑军务，并"阴嘱芝贵"注意监督张作霖。张深知袁意，竭力拥袁称帝，密电袁氏，决心为帝制出力，"如帝制不成，誓不再生"。但袁世凯称帝时只封他二等"子"爵，他立即反目，对袁威胁。在全国反袁称帝的高潮中，见袁必败，在奉天立即提出"奉人治奉"的口号，逼走袁的亲信段芝贵。四面楚歌的袁世凯为笼络张，于 1916 年 4 月，只得任他为奉天将军（称盛武将军）兼巡按使。6 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段祺瑞分任总统、总理，张作霖被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选译》第 77 页。

任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取得了奉天的军政大权。

张作霖督奉后，招贤纳士。在他“绿林”起家的老伙伴之外，又网罗一批文人：请袁金铠为军、政两署的秘书长；聘留日士官生杨宇霆为军署参谋长；王永江被请为警务处长，后转任财政厅长和代理奉天省长，成了张手下的“文治派”首领和“理财能手”。这样在东北就开始形成了以张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

张作霖一上台，立即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当时，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曾有一派人支持“宗社党”搞“满蒙独立”，要建立“满蒙帝国”。这派人（川岛浪速）等，曾在奉天谋杀张作霖（未成）。另有一派人，主张支持张作霖为日本所用。1916年10月，日本寺内正毅组阁，反对支持“宗社党”，力主支持张作霖。他们认为：“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既无特别官历，又与中央政府无密切因缘。其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张认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权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顺日本之有利。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张作霖……满蒙之事，日本皆可畅行无阻。”① 从此，日本积极支持张作霖。

张作霖为发展自己的势力，主动结交段祺瑞（亲日的国务总理），谋划称霸全东北。为此，他首先控制奉天省。当时，在奉天有冯德麟二十八师（驻北镇）。冯实力雄厚，又是张的“绿林”前辈，不甘居于张下，和张展开了斗争。因而1916年5月至1917年上半年，在奉省发生了张、冯间的“两虎斗”。张作霖软硬兼施，斗垮了冯德麟，吞并了二十八师，统一了奉天军权。

---

① 后藤新平：《关于在满洲日本军队之行动》。

此后不久，张作霖又乘黑龙江内部政争，把势力伸入黑省，向北京政府（段祺瑞）保荐其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省督军。接着，他又对吉林伸手，但遭到了吉督孟恩远的抵制。

这时，统治北京政府的直、皖两系正明争暗斗。在对待广东护法军政府问题上，皖系段祺瑞主战，直系冯国璋主和。1918 年春，皖系政客徐树铮，通过杨宇霆拉张助段。要张出兵入关，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张作霖为扩展奉系势力，在秦皇岛劫持大批军火，扩编奉军，派兵入关。同年 3 月，5 万奉军开入关内的津、京、湘、鄂一带，显示奉军军威。9 月，张以拥段有“功”，被授予东三省巡阅使，取得了东三省的最高职位。

1919 年 7 月，张出兵包围吉林。奉、吉两军对峙于吉、长一带。当两军对峙时，日本在长春制造了“宽城子事件”，迫使吉军退出长春。在日本的协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孟恩远被迫下台。结果，奉张势力伸入吉林，鲍贵卿被调为吉林督军。张的另一亲信孙烈臣，接任了黑龙江督军。至此，张作霖统一了全东北，成了“东北王”。

三

张作霖称霸东北之后，野心益炽，又称兵关内，问鼎中原。

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助直倒皖，派兵入关。结果皖系军阀大败，直、奉共掌北京政权，张作霖进入北京。这时，张作霖把势力伸入热（热河）、察（察哈尔）、绥（绥远）三大特区，身兼蒙疆经略使。

不久，直、奉军阀互争地盘，矛盾日剧。为对抗直系军

阀，张作霖支持梁士诒（亲日派），组织亲日内阁，压制直系，推行亲日政策。直系实权派吴佩孚电斥梁内阁，痛骂张作霖。美国赞扬吴佩孚称之为“新中国的大英雄”。在日、美操纵下，奉、直关系日趋紧张。1922年4月末，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奉军素质太差，又发生哗变现象，不到一周，即败回关外。张作霖遂在日本的支持下，割据东北，宣布“东北自治”。经其御用工具东三省议会的推举，又就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为向直系军阀报复，设“陆军整理处”，大肆整军，推行“精兵主义”；聘用日本顾问，扩建兵工厂；并筹建海军、空军。又联合孙中山、段祺瑞和浙江督军卢永祥（属皖系），结成反直“三角联盟”。同时，又秘密拉拢冯玉祥，以分化直系势力。

1924年9月，由于直系势力的扩张，江浙战争爆发。浙督卢永祥兵败逃奉。张作霖乘机举兵，于9月15日指挥六个军向山海关、热河出动。在山海关、九门口等地展开混战。由于奉军战斗力提高，又有日本的支援（派顾问团、支持军火、提供情报），加上冯玉祥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改所部为“国民军”，向吴佩孚进攻，直系军阀惨败。吴佩孚浮海南逃。

奉军战胜后，大举入关，进占天津和津浦路北段。当时，冯玉祥本欲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因奉军势力强大，冯被迫与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1924年1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支持下，离广州北上，来到天津，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对此，张作霖表面欢迎，实则反对。在天津，他亲自与孙会晤，劝孙“取消三大政策”，“不要反对外国人”。并自报奋勇，愿代替孙中山来疏通外国人的感情，孙中山气愤不已，肝病复发，不久在北京逝世。1925年春，段

祺瑞为协调张、冯势力，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统辖西北地区及京汉路北段。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允其向津浦线一带发展。8月后，奉军大举南下，由山东向江苏、安徽进军，一直进入上海。当时，"五卅"反帝运动遍于全国，奉张对之大施镇压，人民"怨声载道"。

张作霖的扩张，使直系势力大受威胁。浙江督军孙传芳（属直系军阀），联合东南五省（浙、苏、闽、赣、鄂）的直系旧部，组成五省联军，于1925年10月，发起反奉战争，并暗与冯玉祥联络。在湖北的吴佩孚也遥相呼应（但意在反冯）。同时，上海、北京等地的学生、群众也掀起了反奉斗争。

在"五卅"以来的反帝革命运动影响下，奉系军阀内部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将领郭松龄（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暗与冯玉祥联合，于1925年11月23日，在滦州倒戈。反对张作霖穷兵黩武，为害东北人民，要张作霖下野，拥张学良主政，以改造东北政局。12月，郭松龄指挥奉军的精锐万人，出山海关，占锦州，势如破竹，指向奉天。张作霖惊慌失措，通电下野。在千钧一发之际，日本援助了他。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亲到奉天，向张提出下列条件：允许日本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享有"商租权"；将吉林延边行政权移让日本；延长吉敦铁路与朝鲜铁路接轨；在洮昌道（洮南地区）开设日本领事馆等①。如能答应上述条件，日本将出兵援助。张立即应允，在草约上签字。结果，日本出兵干涉，郭军惨败，郭氏夫妇被枪杀。但郭军反奉对张的打击是沉重的，使张在军事上、经济上，特别是政治上江河日下。

但张作霖不顾自己的困境，继续进兵关内。1926年3月，

①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1979年）。

他和吴佩孚弃嫌修好，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联合夹击国民军。3月至8月间，冯部国民军退至西北，张作霖又控制了京、津、直、鲁等地。张、吴占领北京后，大肆镇压革命运动。“革命的民众领导概被通缉，左倾的进步报馆被查封，左倾的进步记者被枪毙”①，各校进步教职员“被列名通缉者四百人之多”②。

在张作霖进攻冯玉祥，镇压北方革命之际，北伐战争开始了。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1926年10月10日攻下武汉，11月初平定江西。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国民军全部参加北伐军。不到一年，北伐军即打垮了盘踞在华中的吴佩孚和据守在长江下游的孙传芳。革命战争的发展，预示着张作霖末日的来临。

为对抗北伐军，1926年12月，张作霖吸收直系军阀的败将残军，组成了“安国军”，对抗北伐军。张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叫嚣“反共反赤”。1927年2月，出兵河南，但只抢占了吴佩孚的地盘而无所作为。这时，帝国主义看到北洋军阀已无力对抗革命军，又鉴于过去武装干涉苏俄的失败，乃从内部瓦解革命。1926年冬至1927年春，他们积极奔走，策动张、蒋联合，共同反共，以“政治南伐”对抗革命的军事北伐。此间，英国公使蓝浦生先后到武汉、天津，策动张、蒋配合反共。日本外务省交涉局长佐分利等，奔走于广州、南昌、武汉之间，宣传蒋、张的“妥协点”，煽动南、北“共同反赤”。1927年春，“南北妥协”之风，甚嚣尘上。张作霖发表宣言：“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一时间，蒋、张之间信使往来，

① ②《响导》第151、154期。

商讨联合反共之计。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在北方，张作霖遥相呼应，搜查苏联大使馆。4月1日，绞杀著名的共产党员李大钊，镇压了30多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想藉此来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取得和蒋介石的联合。6月18日，张在北京成立了“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此来安定北方政局，和便于以对等的地位与蒋谈判议和。6月25日，张以“大元帅”名义下息争令，自称系中山的“多年老友”，和蒋无“政见之殊”，想继续与蒋言和。当时，蒋介石很想联张，并有所行动：在南京政府中，曾有过“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的提案①。只是因为冯玉祥、蔡元培等反对和事态发展，蒋、张联合才没成功。这时，张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已无力维持北京政权，他的末日即将来临。

四

当张作霖的统治行将没落之际，日本田中内阁上台。这个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内阁，不满前若槻内阁对华侵略的“软弱”政策，一方面加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出兵山东，阻止蒋介石的北上；一方面对濒于没落的张作霖采取了新的策略。鉴于张已无大作用，对他采取了加强控制、“卸磨杀驴”的政策，以便日本吞并东北。

同年6月，田中送张“人形”一具，暗示张作霖：“汝为小儿，我可玩汝股掌之上。”同月，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在其《有关中国时局对策考察》的报告中，明确提出

① 张友鸾：《张作霖向南京政府求和失败记》，《沈阳文史资料》第12辑。

了日本的对策。《报告》中说，我们对中国南方的“稳健分子”（指蒋）要给以“精神上的援助”；对张作霖则不能再加援助，而应迫其下台，换以其他亲日人物。木村说：“从张作霖的现状来看，他在中国国内的各政治家、各团体、各军人之间已威信扫地……现在恢复他的政治威望，不过是空想。”“按照卑职的看法，及早把张作霖一身的沉浮和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维护，加以截然区别考虑，并付诸实行的时机已经到来。鉴于张作霖的苦境，我们只要不予援助，他的自我消亡已是时间问题……对他不但要绝对不予援助，必要时对他施加以相当压力，亦在所不辞。”并建议以王永江或杨宇霆作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①。接着，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又提出了“满蒙政权傀儡化的设想”。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这次会议，是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的新发展。其重点是“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为了掩人耳目，“给它包上了东方会议的糖衣”②。

“东方会议”后，田中内阁立即对张作霖展开了索取东北权益的交涉，想乘张还掌握北京政权之际，向他索取“满蒙权益”。田中先后指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对奉天省长莫德惠和张作霖本人施加压力，提出各种侵略要求。侵略者的主要要求是：（一）要在东北借日款由日本承建7条铁路；（二）扩大铁路的附属地和“商埠区”，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商租权”、“营业权”（即日本可随意在南满和东部内蒙租房租地、营业）；（三）延长本溪湖矿山的合同期限；（四）抗议东北当局修筑与“满铁”平行的铁路；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98页—100页。
② 山浦贯一：《森恪》转引自《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62页。

(五）在临江设立日本领事分馆。此外还要签订《治安协定》，由日本军警参加东北的治安工作等等。

上述要求，早在“东方会议”前，即已提出，但张作霖对日本的要求或推延或拒绝，不愿按日本的要求行事。张作霖认为：在他未入关以前，不能不依靠日本；但在掌握北京政权之后，对外单靠日本是不够的，也要争取美、英的支持。因而在“东北交通委员会”建立（1924年）后，即向英、美借款和自筹资金建立了打通、奉海、吉海、呼海诸路，并开始筹建葫芦岛港，从而和日本发生了矛盾。

更重要的是，日本逼张索权的行动，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激烈反抗。1927年秋，东北人民反对日本“临江设领”、反对日、张“满蒙交涉”的斗争如火如荼。在奉天25000人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反对日本侵略主义”。在如此的群众反日斗争前，张作霖怎敢答应日本的侵略要求？

在日、张交涉遭到东北人民的强大反抗之后，田中内阁又密派“满铁”总裁山本潜入北京，与张进行“满蒙交涉”。山本先通过张的日本顾问町野等与张密谈后，于10月12日亲到北京见张。这时，张为取得日本的支持，不得不答应日本的铁路要求。10月15日，和山本密订了《满蒙新五路协约》，议定由日本贷款承建下列5条铁路：①敦图路（敦化至图们）；②长大路（长春至大赉）③吉五路（吉林至五常）；④洮索路（洮南至索伦）；⑤延海路（延吉至海林）。经过曲折的交涉，最后于1928年5月13日、15日，由张作霖和代理交通次长赵镇分别在4条铁路协约上签字。剩下的吉五路，待日后再议。这一密约，是张死前和日本订立的丧权辱国协定。张原想拖延、应付日本。后见日本出兵济南，阻止蒋军北进，认为日本还能支持他，才亲自签约的。

这时，蒋介石正在北伐张作霖。至5月中旬，蒋、李、冯、阎四个集团军，已向京津迫近。张的统治岌岌可危。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会见张作霖，劝张早日撤回东北，否则，败军逃回，日军将在山海关一带解除奉军的武装。张听后"不乐"、"严词拒绝其请"①。18日，日政府又以"觉书"（通牒）分致北京和南京政府，声称："如战乱波及满蒙"，日本为"维持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即动用武力）。警告双方不能在东北作战。张对日本的"觉书"极为恼怒，25日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干涉。但因前方败局已定，奉系新派人物（张学良等）又"急盼张（作霖）速去，以望与党（蒋）方合作"②，张作霖不得不退回东北。5月30日张召集亲信，研究战局，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以茶话会与外交使团话别"，会上大谈"讨赤"的老调。同日命许兰洲将"陆军大元帅"之印、旗、国务院印信运往奉天。次日发出"出关通电"。在张离京前夕，日使芳泽又来密访，向张提出"条件十款"，逼张正式签订郭松龄反奉时双方所订之密约。对日本这种趁火打劫的行径，张极为恼火，拒绝会见芳泽，并隔室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并说："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③日、张矛盾已尖锐化。

这时，田中内阁的计划是：迫令张作霖回奉下野或使之傀儡化。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却决心谋杀张作霖。5月31日，村冈密令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

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判书》第268页。
② 1928年6月12日《时事新报》。
③ 《天津文史资料》1979年第2辑。

晴少佐，赴京刺杀张作霖。竹下的行动，立即为河本所探知。河本认为，在京有“各国监视”，耳目很多，刺杀张作霖不易掩匿。不如待张归来时，中途炸车。河本选定了炸车地点(初在巨流河桥，后改皇姑屯两洞桥)，作好了一切爆炸准备。对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参谋长斋藤是知情默许的。

6月3日凌晨，张作霖的专列由北京出发。4日清晨5时许，当专列行至奉天西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和南满路交叉点的铁路桥洞时，一声巨响，铁桥被炸药炸塌，张所乘车厢被炸得粉碎。同车迎张的吴俊升当即丧命，张作霖身受重伤，被救回帅府后，10时左右死去，结束了他军阀的生涯。张作霖之死，标志着北洋军阀的覆灭。

长期以来，日本侵略者为了侵略的需要，积极扶植、利用张作霖。张为自己的霸业，依靠日本、利用日本。但到张的统治末期，日本侵略者鉴于他既无重大利用价值，又不完全听从摆布，并与英美勾结，就暗下毒手，卸磨杀驴，借以制造混乱，早日吞并东北。张作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日本军国主义杀害的。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奉系军事集团的形成与扩展

○荆有岩

1920年，奉系军事集团的领导人张作霖将其东三省巡阅使公署卫队旅——即奉天陆军暂编第三混成旅交予其子张学良为旅长。同时张作霖又扩编奉天陆军暂编第八混成旅，以张学良保荐，曾任卫队旅参谋长代理第二团团长、在吉林剿匪有功的郭松龄为旅长。当时三、八两旅联合办公，日常工作由郭松龄负责。两旅编组时，委用官佐均采用军事学校毕业生。我从北京陆军军需学校毕业，即参加了这个部队。经过1925年郭松龄反奉，后来又随张学良办理奉系集团的金融和财务。我与张、郭当时是部属关系，和杨宇霆亦有些事务接触。姑就所知作如下叙述。

一

奉系军事集团初期首脑人物的组成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人，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家贫幼年无力就学，得塾师帮助粗通文字。曾学兽医，后入清军宋庆属下马玉昆部为兵，不久离开。时当清室

末季，正值甲午、庚子之乱，甲辰日俄交相侵略之际，辽西一带萑苻满地，清廷无力维持地方治安。张作霖结识一些散兵游勇，先后同汤玉麟、张作相等纠合20余人，在赵家庙、中安堡等处，划定范围，成立霸据一方的保险队，于所在区外常从事捐大户。张作霖一伙在中安堡为另伙金寿山驱逐到八角台（今台安县），投靠另伙张景惠。时张景惠实力较厚，仍推张为首而甘居次，两伙合流后则有六七十人。1901年，新民府姜家屯洪福臣，拥有百余人，号称五大哨，以保卫地方不受外来侵扰为名，亦兵亦匪，由当地百姓供应一切。其势力颇为雄厚。适时帝俄军队横行东北，蹂躏百姓，人民痛恨至极。洪福臣专打俄人，惟洪性残忍，严酷嗜杀，众怨所积，其哨官陈荫棠、张明九（后皆任奉军旅长）等，杀洪归附于张作霖。张作霖羽毛既丰，势力亦固，有意归正，经他们保险的地方豪绅杜泮林为介，请新民府知府增韫（子固），呈请盛京将军增祺，允准招抚之。1903年收编任巡防营骑兵帮带。张归正后，相继诱杀悍匪杜立三，摧毁辽中匪田玉本，蒙匪六十三等。因有功绩，乃升任巡防前路统领官，花翎补用游击。

奉天巡防统领原分8路，计为中、左、右、前、后、副左、副右、副后。张作霖的前路统领是1906年将绥靖三营并辽、复、海、盖各巡防队归成马队两营、步队两营，再由西路拨添步队一营共5营。

奉天五路巡防统领官：中路统领官为王怀庆、帮统褚恩荣。前路统领官为张作霖、帮统李蓬瀛。右路统领官为富尼稚干、帮统吴庆桐。右路统领官为许兰洲，帮统叶玉标。后路统领官为吴俊升、帮统冯德麟。

张作霖任统领官后驻防洮南、辽源一带，又破蒙匪白音

太来，擒牙扦，征陶什陶（1910年），一胜再胜，颇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垂青。辛亥革命发生后，赵尔巽令其率部由洮南兼程来沈，捍卫省垣，助赵抵制奉省的辛亥革命运动。时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驻沈北旺官屯(通称北大营)，1911年11月12日蓝等在省咨议局召开“奉天国民保安会”，时宣传东三省独立。张挺身而出以手枪恫吓，维护清廷的正名。当晚蓝天蔚逃出奉天，聂汝清继为协统。赵尔巽保奏“张作霖骁勇善战，过于张国梁，请朝廷破格升赏，以资鼓励”。旋奉廷谕“任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适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赵尔巽改任奉天都督，原巡防营奉命改编，张作霖与冯德麟分任第二十七和二十八师师长。张以汤玉麟为第五十三旅旅长、孙烈臣为第五十四旅旅长、张景惠为骑兵第二十七团团长、张作相为炮兵第二十七团团长。其余团、营、连长均是张在绿林时的同伙，于是形成了奉系军事集团。

二

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调赵尔巽去京任清史馆长，以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张锡銮作过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那时张作霖和冯德麟分任前后路巡防营统领官，均为其老部下。张锡銮深知这两个人桀骜不驯，要求袁世凯为之调转。袁亦有意将张作霖以护军使将军等职衔，作调虎离山之计，但为张所侦知，电段祺瑞谓“受谗夫之排挤，鸟尽弓藏，思之寒心”等语表示拒绝。

1915年8月28日，袁世凯将张锡銮与彰武上将军段芝

贵对调。段芝贵是袁的心腹，其父在张作霖受抚时，曾出过力，袁认为段到奉天可以得到张作霖的拥护。段离开湖北时随带卫队一团，留驻在京畿滦东一带。到奉时即下榻于张作霖第二十七师司令部，以表示对张的亲密无间，张对段极尽逢迎。当段为袁世凯帝制在奉天举行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亲自带领大队人马监视投票，结果全部投票赞成君主制。是年9月，当段芝贵联合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等24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正大位"之际，张作霖亦密电袁世凯劝进。袁称帝，封张为子爵，冯德麟为男爵。冯结怨于段，因而欲得机驱段。1916年春，袁世凯取消帝制，段在奉坐卧不安之时，张态度骤变，声言欲查段之账，说他挪用奉天公款数百万元。且嗾使省议会正副议长佟兆元、李友兰等联合绅商法团，倡立自治期成会，提出以奉人治奉的口号。段芝贵迫于形势不得不作离奉去京之计。又虑冯德麟驻军辽西，恐其为难，只得求助于张作霖。张乃令旅长汤玉麟带兵送段。冯果拟劫段于沟帮子，以雪封爵不平之恨，但慑于汤之兵众，未敢动手，段遂安抵北京。段临行时委张代理其本兼各职，此际袁世凯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无力再派人去奉，于是在4月22日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6月6日袁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于7月6日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冯德麟与张作霖同为辽西草莽人物，实力比张雄厚。张督奉后，冯任军务帮办，不肯为张下，但部下两旅长汲金纯、张海鹏又倾向于张。冯曾数度给张以难堪，张屡次容忍，并挽赵尔巽斡旋，得以相安无事。1917年夏，张勋统兵入京复辟时，冯德麟参加了活动，得赐紫禁城骑马。复辟失败，冯被押监狱，张乘机把冯德麟所辖第二十八师收归，以第五十

六旅旅长汲金纯为师长。又趁北京政府黎、段府院相争之际，与段祺瑞沆瀣一气，将洮南镇守使吴俊升的巡防营扩编为第二十九师，吴俊升为师长。是年7月，黑龙江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联合驱逐黑龙江代理护军使许兰洲。经张保荐，北京政府段祺瑞令鲍贵卿督黑。鲍与张是儿女亲家，张以实力压服英、巴，鲍又托张恕（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开原人），以师生关系疏通其间，鲍始得赴任。11月，张令吴俊升率领第二十九师由郑家屯开入齐齐哈尔，于是奉军势力伸入黑龙江省。斯时，奉省军队计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个正规师，还有驻东边一带的马龙潭巡防营，总共兵力约4万人。

三

奉军的扩张和黩武

张作霖掌握了奉黑两省，继而又向北京伸展势力，1918年春，段任内阁总理，醉心武力统一南方。但北洋军阀实力不足，此时冯、段因和战问题闹得很僵，湖南战况又十分不利，乃派前国务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徐树铮以接洽防务为名，到奉天与张磋商：调奉军进关担负主战派的帮凶。张作霖的督署参谋长杨宇霆，在日本与徐树铮是士官学校同学，恰作媒介。张以时机可乘，慨然许诺。决定编组八个混成旅。这年2月颁下动员令，25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进驻滦州。张景惠协同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持徐树铮在陆军部次长任内窃留的陆军部空白护照，将日本政府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运给中国的第一批步枪2700余支劫走，运回奉天。26日段祺瑞电张交还原物运京。张在同一

天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只因缺少军火，未便开拔。这次提取一批军火，事前并未请示，原因是“呈报则需时日，运京而复运奉更费周折”。27 日，张并复段电说：“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3 月 12 日，张作霖、徐树铮联名宣布，在距离天津 50 里的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孙烈臣为副司令。张得大批军械后，即在奉天先编了三个混成旅：暂编第一混成旅，旅长邹芬；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阚朝玺；暂编第三混成旅，旅长梁朝栋。编制就绪，未经训练，即分批南运湘、赣毗邻地带，对广东军政府作战，当时称为援湘之役。当在这新军未编成之前，张作霖已先由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个师中抽调两旅一团，由孙烈臣率领，前往湖南醴陵、株洲，参加对南军的作战。新编的三个混成旅开赴南方后，先抽调去的部队撤回奉天，归还原建制。同年 3 月下旬，第三批由日本运来的军火，又在塘沽为奉军所截留。于是张作霖又扩编四个混成旅：暂编第四混成旅，旅长郑殿升；暂编第五混成旅，旅长蔡平本；暂编第六混成旅，旅长王良臣；暂编第七混成旅，旅长刘香九。新编队伍均是在奉省招募或由各县警察编充的，沈阳城及各县到处有招兵旗帜。编成后，除第七混成旅刘香九部留驻奉省东边一带外，其他三个混成旅即陆续开进关内。

1918 年的所谓奉军援湘之役，乃是支持皖系军阀征伐广东军政府，企图统一中国。沿京汉线南下的奉军，共有步、骑、炮等五个旅，约 32 个营，按北洋政府参陆处（即参谋部和陆军部）参谋长徐树铮的计划，将奉军分为三路：第一路以第

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司令，杨宇霆副之，率兵15营，计二旅一团。邹芬部在醴陵，阚朝玺部在株洲，梁朝栋部在长沙，湘东司令部设在长沙荷花池。第二路以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司令，黑龙江省第七旅旅长许兰洲副之，正面布署在鄂西。第三路以第二十八师师长吴俊升为司令，张作相副之，经津浦路南下，正面布署在赣西。孙烈臣所部在湘东参与战斗多次，而汲、吴两路并未到前方。南军由川进攻鄂西，许兰洲旅进驻宜昌。南军退后，许旅又转进潼关，嗣即入陕，帮助陕督陈树藩攻靖国军于右任、郭坚、樊醒民等部。此即所谓奉军援陕之役。

1918年9月，南军陈炯明攻福建，北洋系闽督李厚基派代表翟溥泉来奉向张求援。张作霖派在河南新编成的补充第二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率领所部高维岳、潘森两团，转道由浙入闽，此即所谓奉军援闽之役。王永泉为天津人，日本士官4期学生，为徐树铮所援引，以后留闽为兴泉镇守使，脱离奉系，改任北洋政府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后任福建军务帮办。奉系两团长高维岳、潘森均返回奉军。

1918年8月，张景惠在长沙将所部扩编为奉军暂编第一师，自任师长。北京政府复于8月31日任命邹芬为奉天陆军暂编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阚朝玺为第二旅旅长。1919年2月28日南北和议开始，为调整驻防地点，第一师张景惠部驻北京西郊及南苑一带，第六混成旅鲍德山部驻廊坊，其余大部调驻冀东、马厂或返回东北。以上所述，是奉系军事集团扩军黩武的第一个阶段。

四

奉军的军事费用概况

奉军扩编部队所需费用为300余万元，由北京政府参陆处拨给。每旅的常年经费每月为6万元，出征时有特别费2万元，亦由参陆处拨给。奉省财政自张作霖主政后，任用理财能手王永江为财政厅长（兼代省长），除向商民大肆征集外，以“整顿”田赋为名增加亩捐，就原有各县税捐局，增加税收项目。初各局多浮收，并无统一税率、税额；又辗转交给劣绅恶警征收，浮冒苛派为弊滋甚。王永江用规定税额，严惩贪污，优奖提成办法，使税收大幅度增多。他还调整金融，限期取缔市面通用钱钞，而由东三省官银号统一发行纸币，运用纸币政策，采购土产外销，所得至为丰盈。此外，开荒、放地号、设垦务局，王永江派其助手刘效琨为局长（于原1915年1月成立之土地清丈为人民所反对而停丈放，又建立起来以裴焕采为奉天土地清丈局总办，孙祖昌、林成秀为会办）。另外，增设商标广告捐、营业所得税、当票印花税、房地产清查登记税、房捐等，以供应军资。东北地旷人稀、物阜民丰，军需索要虽浩繁，尚不甚拮据。从1917年8月16日起，开始使用奉大洋为货币本位，到1921年第一次奉直战，东三省官银号的奉大洋发行额为4991万余元，金融尚属稳定。

五

驱逐孟恩远统一东三省

张作霖自1918年9月7日晋升为东三省巡阅使以来，梦

寐以求的就是兼并吉林，驱逐孟恩远。1919年7月，藉徐树铮在中央为内援，先由北京政府任命吉林督军孟恩远为惠威将军，调京供职。7月6日，徐世昌下令调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署吉林督军，未到任前令吉林省长郭宗熙暂行兼署。同日，令孙烈臣署黑龙江督军。8月11日，再令孙兼任该省省长。张作霖虑孟抗命，即以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南路司令，进军怀德，以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为北路司令，由大赉向南推进，作南北夹击势以威胁之，孟恩远被迫离开吉林省。鲍贵卿督吉、孙烈臣督黑，于是奉系军人集团统一了东三省。是年双十节，北京政府授张作霖以勋一位，1920年元旦实授陆军上将。

北洋军阀自袁世凯死后，直系冯国璋与皖系段祺瑞时有摩擦。冯国璋1916年任总统，段居内阁首揆，府院之争大形显露。1920年6月，皖、直双方互相调兵遣将，已达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北京政府徐世昌总统电召张作霖于19日入京作调解人。张确是皖、直间举足轻重的人物，到京后即与徐世昌、段祺瑞分别交换了意见。复于22日亲往保定光园与曹琨磋商，携有条件又回北京，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段的灵魂人物徐树铮野心大、阴谋多，手段卑劣，曾经杀害过直系的幕后权威人士陆建章。曹、张都深恶徐之为人。徐背张以奉军副司令名义暗在河南编三个补充旅，复以奉军名义，将参陆处领来之款隐匿，不明者达300余万元，张曾掀起算账风潮。徐助张驱孟恩远，亦以孟婿为陆建章之子，并在吉省握有实权，以免后患为由除之。因此曹、张动机以除徐为关键。7月4日，徐世昌命令罢免徐树铮西北筹边使，用以和解直方，不意段更加咆哮。6、7两日张作霖均赴团河段住所做最后努力。7日夜晚，徐树铮设下鸿门宴，拟对张暗下

毒手，张随行旅长汤玉麟持枪握段臂要挟，安全送张脱险。张带从者由南苑团河奔赴北京东车站，隐于敞车内，行至廊坊转军粮城，随即通电，对皖、直之争，表示局外中立。9日回到沈阳，次日致电段祺瑞电称："徐树铮罢免筹边使职，原为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辈妄造蜚语，归罪作霖。此次在京，备患奸人百计害我三省。作霖忍无可忍，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11日，致曹琨电谓：已派遣第二十八师进关，继派第二十七师一部进驻天津浦路马厂及军粮城一带。关内奉军以张景惠为司令，并向曹保证"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适逢有姚步瀛者13人，携款及定国军（段称号）证件，在东北招募匪徒，扰乱后方，为地方警宪捕获。供认为姚震、曾毓隽所派遣，于是益坚张作霖出兵之决心。

皖、直之战是1920年7月14日开始的。17日，皖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为直军所俘，奉军又声明参与战斗，适18日直胜皖败的局势已定，在收拾战局之际，奉、直两方争先恐后收编皖军的残兵败将。奉军在小站，勒令龙济光所部新振武军缴械遣散；将西北边军宋子扬旅改编为奉军，移驻通州（该部不久哗变解散）；改编李景林部；收容邹作华带的野炮营、陈琛带的重炮营、范浦江带的步兵营、蒋斌带的无线电信队各部。张景惠奉军第一师原驻京郊，因就近缴获军械，装备较为优先。空军物资设备为奉军所得，探照灯为直方所得，奉方追索，直方大为不满，曾一度发生纠纷。9月21日，北京政府发表张景惠为察哈尔特区都统，兼任第十六师师长。后来，十六师师长一职，张作霖令邹芬继任，调驻京西一带。是年双十节晋授张作霖为镇威上将军。1921年5月，在天津所开的军阀四巨头（曹琨、张作霖、王占元、靳云鹏）会议上，

张作霖以援库问题（外蒙于2月4日第二次宣布独立）为理由，于5月30日兼任蒙疆经略使，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均归其节制，并获得援库军费200万元，开拔费100万元。奉系军人集团于皖、直之战再度进关，增添部队和地盘，扩展势力，拱卫京师，与直系分庭抗礼，掌握北京政权。这是奉系军队黩武的第二阶段。

六

奉系军人素质不良　纪律败坏及其后的转变

张作霖自1916年在奉天建立独立王国以来，足迹所至几达半个中国。他掌握的军权班子底，旅长、师长以及督统、督军都是起家时的伙伴，如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郑殿升、张明九、阚朝玺、张海鹏等，以及其所属各层官佐，内中鲜有学术兼全、智勇齐备之士。他们虽名为军官，但不事训练，纪律极坏。驻扎防地，地方上供应和摊派、粮秣、给养、需求颇巨，不脱当年“保险队”习气。他们以护兵、马弁为亲信，每次外出护弁跟随，招摇过市，令人侧目而视，他们反以为荣。士兵中尤有甚者，四出剽劫后回避营内，地方官亦不敢究诘。地方有句谚语：“白了胡子掉了牙，没见过这样军队来驻扎。”1918年8月，援湘南下。过郑州时，因交通为水所阻，小作逗留，商民不堪其扰，相率罢市以避其锋。驻京畿的张景惠、邹芬、鲍德山（子扬）各部，纪律也十分坏，设在化石桥的司令部、军警督察处、宪兵等机构，也莫能如何。北京人士一提奉军，如同谈虎色变。奉军当时之所以能发展存在，是由于北洋军阀政治势力，皖、直两系所属军队其纪律亦复如斯，或略胜无几。

奉系军队纪律松弛，态度强横，但后来几次进关，占有华北绝大部分，军队素质和纪律大有所改变，关键在于张学良能任用郭松龄。郭松龄，字茂宸，沈阳城东人，毕业于北京中国陆军大学，曾在北京讲武堂任教官及广东军政府等处工作。护法运动失败后，经奉天督署参谋长秦华推荐，任东三省讲武堂战术教官。适张学良以巡署卫队旅第二团团长身份在讲武堂就学（卫队旅旅长张作相辖两团，第一团团长李长荣、第二团团长张乐山，时张乐山他调，以张学良接充），张对郭生活朴素、教学认真负责，深为器重。遂向其父张作霖推荐为卫队旅参谋长，代理其第二团团长，时为1919年。此时亦是张学良、郭松龄在奉系军人中崭露头角的开始，亦即奉系军人集团新派力量的发展时期。

七

张作霖第三次扩军与三、八旅

1921年春，郭松龄剿匪回奉，驻在沈阳北大营，张作霖授命扩编军队。初张作霖任巡阅使时，以一旅兵力为卫队，遂将原第三混成旅改为巡署卫队旅，以张作相为旅长。此时将该旅仍改回原番号，即奉天陆军暂编第三混成旅，以讲武堂第一期刚毕业的张学良接替张作相为旅长。另外新招募一旅为暂编第八混成旅，以郭松龄为旅长。三、八两旅为混合编组，除三旅一团团长李长荣仍旧外，以第二团的剿匪有功人员为基干编组之。营长温瓒玉、宋九龄分别升任第八旅一、二团长；裴东阁因吸食鸦片被黜。其余新添补官佐自连、司务长以上，一律任用受过军事教育的学生。在沈阳小南门里（图书馆旧址）设立差遣处，收纳保定军官、北京军需、军医、

兽医各校毕业生，在未分配职务前，每人月补助奉大洋40元。东三省讲武堂、卫队旅军士连学生则早已按级任用。当时第三旅只有少数行伍出身的军官佐，第八旅司务长准尉以上无一行伍出身者。显然与张作霖旧有的其他部队有所不同。

这里尚须提一下，张作霖于接任奉督时，即任命当时军械局长杨宇霆为督署参谋长。杨为日本士官学生，亦向张推荐了一些留日学生，如参谋处长于国翰、军械局长丁超、宪兵司令陈兴亚、被服厂长王大中，办理军事教育的熙洽、张恕以及毛逮凤、于珍等。1918年奉军援湘南下，徐树铮和杨在河南暗编几个补充旅，有丁超、于珍等参加。嗣为张知，一度罢免杨督署参谋长职。

皖、直战后，西北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李景林归奉，张作霖令他接任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邹作华的野炮营，蒋斌的无线电信队，均归第三混成旅。陈琛的重炮营，拨归第八混成旅。范浦江步兵营，编为第八旅第一团一营。三、八两旅的编成是1921年8月，于是新生阵营在奉系军事集团中独树一帜。两旅除正规训练外，还设有军士教导队、各兵种教育班，实行官佐轮流集训，增进和熟练军事技术。旧军队部队长官视军需部门为私有账房，予取予求惟意所为。郭松龄编组三、八旅伊始，即将军需系统独立，在后勤方面一扫部队长官与军需合一的陋习。并设立军需教育班，学员经过训练后统一分配，这是旧军工和国民党其他队伍所不可比的。郭平素以大多时间放在人事和训练上，除校官以上就商张学良决定外，其余虽军士（上士以上）亦必亲自考核拔擢。笔者曾数度担任郭部校阅委员，随郭到各部队校阅，见其对三、八旅的上士以上人员姓名情况都能概略指出，遇有渎职、业务低劣当即惩处，不待事后。其作风如斯，所以部属爱戴，张

学良极为信任和依重。

张作霖在增编第八混成旅的同时，又在关内编了第九混成旅，旅长牛永福和其他官佐都是从旧军队中调拨的。该部纪律不良，驻通县。

1921年5月10日，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授张作霖以勋一位，张学良以勋五位。

八

第一次直奉战争

（一）战争的导火线

1920年直、皖战后，北京政府实权操之于直、奉两系之中，两派争权夺利，忽而妥协，忽而紧张，至1922年初，终于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张作霖的亲家靳云鹏任内阁总理，因财政枯竭、点金乏术，不得不鞠躬下台。张又推举交通系梁士诒组阁。梁素有“财神”之名声，惟冀求日本财阀支持。未得施展妙计，即受直系中坚分子吴佩孚攻击，说他有卖国之嫌，不能担任内阁总理。4月1日从洛阳发出电报，限梁于7日内去职。

（二）两军的配备

当时论军事实力，直系优于奉系。但张作霖拉拢一批皖系下台军人，煽动他们的旧部倒直。段祺瑞于2月13日在日本的保护下，由京逃至天津，张又令其巡署副官处长李梦庚（字绍白）到广东，与孙中山先生洽商北上讨直，所以声势较为有利。4月3日，直系军事头脑齐集洛阳，以祝吴佩孚生辰为名，制定对奉作战计划。并调陕、豫直系军队北上，做先发制人准备。奉军决定应战，奈以孙中山先生北伐受实力派

陈炯明阻碍，不能有所作为。皖系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都在直军势力范围内，实力又薄弱，发动不起来，因而奉军不得不独立与直军作战。张作霖以镇威军总司令名义，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以杨宇霆为参谋长。从4月初起，奉军以保卫京津为名，陆续开进山海关。当时奉军实力共有30万人，而在关内者已达7万人。继续进关者为张作霖、张学良、郭松龄、齐恩铭、阚朝玺、张荣、张奎武等各师旅，许兰洲、王永清等骑兵部队，总共作战部队约在10万人以上。

奉军的布署分为东西两路，各辖三个梯队。西路在京郊和京汉线，以张景惠为总司令，以张景惠直属的第一师为第一梯队，张自兼梯队司令，分防卢沟桥、长辛店；邹芬的第十六师为第二梯队驻在西苑；郑殿升的第二混成旅，牛永福的第九混成旅为第三梯队，郑殿升为梯队司令，布防于北京东郊通州一带。东路：京津、津浦两线，由军粮城镇威军总部直接指挥。计有张作相的第二十七师、二十八师的张作涛第五十五旅、鲍德山的第六混成旅、齐恩铭的第五混成旅。此为第一梯队，张作相为梯队司令，防守永清、固安之线。张学良、郭松龄所部三、八旅及蔡本平的第四混成旅为第二梯队，张学良为梯队司令，驻津西信安镇。李景林的第七混成旅及阚朝玺的第一混成旅，第二十八师一个骑兵团为第三梯队，李景林为梯队司令，防守马厂达天津之线。另有许兰洲骑兵集团，所属为张荣奉天骑兵第一旅，张奎武黑龙江骑兵第二旅，王永清的巡署卫队骑兵团，驻大城、青城一线。

（三）奉军西线崩溃及其影响

4月11日，吴佩孚到保定见曹锟，军事会议决定，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下分东西两路。东路以张国鎔为司令，兵力有本部二十六师，彭寿莘的第十二混成旅，董政国的第十

三混成旅，吴佩孚第三师的一个旅，防守子牙河、大城、任丘等处。西路以王承斌为司令，兵力有本部的二十三师，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孙岳的十五混成旅，防守固安琉璃河一带。冯玉祥为后方司令，率阎治堂、河南、湖北各一个师，守郑州、洛阳，为各方呼应。

4 月 28 日夜，直军进攻西路奉军。因为张景惠主和，对直作战无决心，开战后始赴前方。其第二旅梁朝栋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一旅张乐山部战局，一时呈现混乱状态。邹芬第十六师驰往增援，由于从蒙古刚刚调回即马上开赴前线，深感疲于奔命战斗力削弱。其三十一旅旅长缪承良战败自杀，邹芬受微伤由前方退回，军心大为动摇。第三梯队郑旅、牛旅在丰台至南苑以南一带激战，为直军李鸣钟部击败。牛永福潜逃，奉军西路全线陷于崩溃。战局至 5 月 4 日仅有一星期，即告结束。

接连奉军西线的为东路第一梯队，其主攻点为直军重心的牛头镇。这一梯队为一师两个旅，后又追加齐恩铭一个旅，在奉军六个梯队中兵力算是最雄厚的。惟军队素质不良，缺乏训练，战斗初起即喊兵力单薄，总部派齐恩铭旅增援。该梯队原计划：以主力攻牛头镇，占领固安；奈以西线不利，故希图自保，梯队参谋长熙洽即急作退却准备。

5 月 4 日，张作霖率参谋于国翰等，乘专车到落垡督战，与张作相通电话，愤怒地说："辅忱！叙五退下来啦，你怎样也不能退。你要退下来，我们梦里见吧！"张在电话说完，即赴西路。车到廊坊，前面铁路已被破坏，遂返回军粮城。夜间直军把西路的兵力转移到东路，张作相的压力更大了。5 月 5 日下午，张作相不顾张作霖的嘱咐，命令前线全部撤退，偕同张作涛旅经丰润、玉田、宝砥、遵化逃出喜峰口。

东路第二梯队张学良部和第三梯队李景林部，在津西胜芳和马厂、姚马渡一开始就大胜直军。吴佩孚对张学良防线特别重视，用嫡系精锐部队第三师第六旅及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压迫之，还自乘汽车督战。吴对部下说："打孩，娘出来，我痛击张学良，看张作霖出来否？"但奉军东路第二梯队在张、郭两旅长指挥下，以蔡旅为预备队，战况始终占优势。三、八两旅共四个团长，负伤者3人，八旅一团二营的营长连续阵亡3人，战斗非常激烈。直军终于溃退了。奉军夺取胜芳、大城、青县进逼霸县。但张学良负伤，此时加之奉命全线撤退，张学良乃去滦州总部。郭松龄和蔡平本带队，由北仓走河西务、玉田、宝砥之线。

东路奉军第三梯队李景林部，军容比较整肃，团营长李壕凯、张宪、窦联芳都能独当一面。战争开始偕同阚旅缪团，在姚马渡大破直军张国鎔的第二十六师。姚马渡在子牙河岸，此役是第一次在直奉战全线开始的战斗。张作霖得到此旗开得胜消息，非常高兴，认为李景林是奉军中一员战将，特记大功一次。该梯队配合骑兵集团在大城、青县一带与直军激战，不断获得胜利。5月4日，西路奉军败耗传至，李率部队先退独流、保良、王庄，后抵达滦州。骑兵集团在撤退时为直军截击，张奎武一部和王永清团退出关外，张荣部溃散，回奉后张荣愤郁而死。

1922年5月上旬，郭松龄带梯队越过胜芳，向霸县追击直军时，韩麟春由总部亲来通报后撤。适时，张作霖总部已退至滦州，各路友军联络均已中断，情况极为混乱。天津的杨以德警备部队，尤为退路上的威胁。张学良决定自己随韩去滦州，二梯队由郭松龄、蔡平本率领，避过天津，经北仓到河西务，再选退路。郭松龄于胜利追击中突然转进。直军

正在布置守霸县，初不知奉军撤退，待发觉后亦未追击，因此郭退的较为从容。按4路纵队经武清、达河西务，乃决定走玉田、宝砥、遵化之线，并派上尉参谋吴荫棠化装赴滦，探听总部消息。郭在撤军行进中，严明纪律，不准官兵脱离队伍，白日行军避免通过村镇；夜间宿营绝对不入民宅。给养的主副食除自行携带外，只许军需、副官进村镇采购。先数日张作相第二十七师及张作涛五十五旅，曾经此路出喜峰口，部队擅入民宅，恣意掳掠。此间居民闻奉军又至如大祸来临。郭知此情况，乃令军队绕村而行。

郭松龄带队在遵化休息3天，吴荫棠由滦州返回，得知奉军总部撤退情况。张作霖在滦县令郭将军队由遵化南行，经榛子镇、丰润而达唐山。继奉命再东撤，经卢龙、抚宁而抵山海关以西的指定阵地。

奉军准备在山海关以西与直军作据守战。第三梯队李景林部先到，受命在抚宁、临榆迤北一带构筑阵地。齐旅、阚旅在九门口两侧。第二梯队，四旅靠海滨北戴河；三旅居中，八旅在右，临石门寨，和李景林阵地相衔接。6月初，直军王承斌的三十三师、彭寿莘的第十四混成旅追踪而至，两军时有接触。

这时直奉双方均再无战意，吴佩孚纵然战胜，而后方却不稳定，因河南有赵倜、赵杰之变，乃将东进军事委之于王承斌。王乃奉天兴城人，与奉方耆宿多有往来，加之奉军尚有一定实力。他看到也不易取胜，所以有意媾和。奉系以新败之余，急需调整充实，以利将来再战。因此，和议为双方共同的要求。张学良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名誉会长，与英美人士多有往还，奉天英国传教士德康脱尔·杨克及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普赖德，在英美两总领事的同意下，跟

开滦矿务局总办英人聂赛一起，向直奉双方提出议和意见，几经商谈，双方始于6月15日实行停战。16日中午，由英人聂赛为中介，张学良与王承斌会晤于秦皇岛车站。17日，奉方以孙烈臣、张学良为代表，直方以王承斌、杨春芳为代表，假秦皇岛英国军舰喀尔号为会议地点，正式签订和约。直军即从秦皇岛向后移动，奉军亦于21日完全撤到山海关外。奉系军事集团扩军黩武第一次大内战，到此结束。

这次出动，都属张作霖的嫡系部队，占他嫡系实力2/3，占奉系军事集团总兵约1/2左右。号称5师10旅之众，共计战斗部队10万以上。其将领除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部有军事学识官佐外，其余多属张作霖新民改编时的同伙人，或为差弁（鲍德山），或为司书（阚朝玺），行伍出身者则既无军事学识，又乏纪律，乌合之众，驱之而作，临阵而脱逃，乃是事物规律。此后奉军以齐恩铭第五混成旅驻绥中；裴春生第四混成旅驻兴城；设兴绥驻军司令部于绥中，任姜登选为司令，以防直军来犯。

1922年5月27日，张作霖回沈阳，用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名义宣布“自治”，张作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6月4日在沈阳就职。

九

奉系军队的整饬和第二次奉直战争

1923年，奉系军事集团鉴于对直战争的挫败，军队素质急需加以整顿。故夏间于沈阳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其任务为划一奉、吉、黑三省军队番号，统一指挥，加强训练，形成东北军的系统。整饬包括：扩大东三省兵工厂，年预算为

200 万元（奉省 100 万元、吉林 60 万元、黑龙江 40 万元）。将原有的航空处（1921 年成立，乔赓云为处长）扩大范围，处长改称总办，由张学良兼任。调整机构，修建机场，并设立航空学校，从事人员训练，要求有 20 年代的空军雏型规模。保安总司令部内设航警处，以沈鸿烈为处长，统辖吉、黑两省江防舰队。招收航海将校学生班，又在葫芦岛设航警学校（后改东北海军学校），训练海军军官。为轮训各兵种校尉官员，还增加了东三省讲武堂名额和班次。

张学良、郭松龄的三、八旅，改称二、六旅，扩大编制，增补兵额。野炮、重炮均由营扩编为团，工、辎皆由连扩为营，还设立迫击炮厂。建立基础教育机构，即军士教导队。选送各兵科在国内军事学校毕业有成绩者，留日进专科学校深造。郭松龄经常校阅各部队，学术两科日求增进。这两旅仍是奉系军事集团中的柱石，对其他部队亦有不少的好的影响。

1924 年春，第二十七师师长吉督孙烈臣死，遗缺由张作相接充，所遗二十七师长由张学良继任，仍兼领二、六两旅。该师有军事学识的如刘伟、朱继先等都得到超级擢用。

1923 年奉系军事集团正在整军精武，而直军系的曹琨、吴佩孚北京政府却搞得乌烟瘴气。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以每票 5000 元高价，为曹包办总统贿选。10 月 5 日，曹琨攫取了总统宝座。吴佩孚又滥用武力，各地兵连祸结。1924 年 9 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趁机派兵入关。吴佩孚为继续压迫奉方，在四照堂点将，扬言出兵 20 万，两个月内平定奉天，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又起。有了两年准备的奉系军队，计有 4 个师 13 个混成旅，约 15 万人应战。编为 6 个军，每军 2 万至 3 万人。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总司令”。第一军正副军长为姜登选、韩麟春；第三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两军组成一、二

联军司令部，在山海关正面布防，即由海滨迄九门口迤北之线。第四军正副军长为张作相、汲金纯，所部在兴城、绥中一带，为榆关战线预备队。第二军正副军长为李景林、张宗昌，所部集中朝阳、凌源地区进出于冷口。第五军正副军长为吴俊升、阚朝玺，集中开鲁、赤峰地区，拟进出承德。第六军正副军长为许兰洲、吴光新指挥3个骑兵旅，协助二、四两军在朝阳、赤峰之间，向建平、平泉之线进出。直军方面比上次直奉战所用武力更为煊赫，其实力优于奉军甚大。双方主力在山海关以及冷口、界岭口方面。奉军经过整训，士气较为旺盛。

战斗序幕首先在热河揭开。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部队，一路由北镇经义县入热河，一路由东北边境入热河，迂回长城的冷口、界岭口。9月13日，在热河朝阳等一带与直军接触。热河地方军队为老毅军米振标部，素质极差，遇战即退，因此奉军以破竹之势占领朝阳。同时奉军第五军黑龙江部队占领开鲁，进趋赤峰。9月末，李景林、张宗昌占领建平、凌源，先头部队抵冷口附近，对直军形成大包围形势。

山海关方面，直军未取攻势，彭寿莘凭倚雄关，严阵以守。奉军郭松龄于10月初率二、六旅猛攻，久未能下。10月下旬在一、三联军军事会议上，郭主张率部突袭九门口，此时姜登选部已将九门隘路攻陷大半，因此郭、姜发生龃龉。但郭终于突袭九门口成功，扼彭寿莘部于榆关。此时，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部队冲过冷口、界岭口，到达滦州。直军右翼已无退路。直系内部发生分裂，赵倜残部扰乱河南，冯玉祥接受张作霖200万元（郭瀛州为介），班师于京师，曹琨被囚。吴佩孚首尾不能相顾，遂致溃败，仓皇逃走。

九门口突袭一役，郭松龄带宋九龄旅溃敌，追击至山海

关，直军后方的海阳镇、北戴河，及东路彭寿莘部五六万之众，驯服地缴了械。除愿归家者发给路费外，大多数为奉军改编。原来的二、六两旅扩编为四、六两师，张学良为四师师长，郭松龄为六师师长。裴春生的第四混成旅编为第十二师；齐恩铭的第十六混成旅编为第十师；赵恩臻第十二混成旅编为第五师；原二十七师旅长高维岳所部编为第七师。是时，张学良、郭松龄的直属部队，包括原有二十七师共 7 个师及穆春、张复、王宝田、张树森 4 个骑兵旅；邹作华炮兵第一旅；魏益三炮兵第二旅；柏桂林工兵一个团（计 5 个营），兵力达 10 万人以上。部队的官佐均为二、六旅所培养，素质比较好，郭松龄的威信亦愈为增高。军队编组就绪，驻军京榆一带。将一、三联军改称津榆驻军，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设津榆驻军司令部于天津河北蔡家花园（军阀蔡成勋的住宅）。时在 1925 年夏季。第二次奉、直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历时两个多月。

十

奉系军事集团又一次大举入关与冯玉祥交战

1926 年 1 月，奉系镇威军第三方面军团，处理郭松龄事变后，将军团部由新民移至锦州，与韩麟春的第四方面军团联合，称为三、四方面军团。两军团长不分正副，人事上多由张学良主持。张学良派人招收郭的魏益三部，魏未肯，自动由榆关西撤。该部辖步兵两旅及炮兵一团，其军官中东北籍者纷纷返回军团。魏为直隶枣强人，其旅长郝梦龄为魏外甥，主持魏部事务。魏仍用国民军第四军番号，但未依附冯玉祥，后来魏投靠吴佩孚，适奉、吴合作，张曾向吴索要魏

携去的炮械，但无结果。吴失败后，魏投归蒋介石，调驻鄂皖边区，同张宗昌旧部徐源泉、孙传芳旧部上官云相，皆隶属蒋记武汉行营何成濬部下，称之为蒋记杂牌军。

当魏部西撤时，三、四方面军团部队，随即进驻滦河以东地区，与冯玉祥国民军隔河对峙。

在直隶省境内，主要对方为冯玉祥的国民军。二次直奉战期间，张攻曹锟、吴佩孚于外，冯倒曹、吴于内，使直系军阀为之崩溃。张、冯一度修好，捧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及冯、郭联合倒张，关系又形破裂。直隶督办李景林亦被郭拉拢。当郭倒戈时，冯以援郭为名，假道天津，李景林认为冯来意不善，遂与张宗昌合作，称直鲁联军，同冯系国民军大战于北仓、杨村一带，双方都有巨大伤亡。经过半月多的激战，冯军攻入天津，此时郭军已失败于新民。另一方面，直系吴佩孚又重整旗鼓于武汉。吴对冯玉祥囚曹，谓为以下犯上深恶其人，于 1 月 20 日通电讨冯，先攻破与冯联合的河南国民二、三军邓宝珊、岳维峻部，然后沿京汉线北上。吴复与奉系重温旧好，联合讨冯。吴通电斥冯谓：“世无纵叛奖乱之国……，”“伦纪所关，宁断腕以全身，不养痈以贻患。”张作霖亦同时通电斥冯谓：“人中妖孽，世界凶徒。”并令直鲁军反攻天津。奉系三、四方面军团进至滦河以西。此时直隶省境内，奉军成为联吴驱冯形势。

奉系军事集团在鲁南、皖北方面，有直、鲁联军，以张宗昌为总司令，李景林为前敌总司令，协同吴佩孚部靳云鄂，驱逐国民二军；孙岳部于沧州，摧毁国民三军，岳维峻部退出河南、皖北。1925 年 11 月，张宗昌部队与孙传芳部队激战于宿县、夹沟之间。嗣以奉、冯间战况紧张，张作霖令张宗昌保存实力，退守山东。孙传芳于 11 月 8 日又占领徐州，复

因吴佩孚为孙疏解，张宗昌与孙传芳始得相安无事。

1926年初春，张、吴联合讨冯，吴佩孚沿京汉路北上，奉系直鲁联军同时向津浦路冯部进攻。2月19日至23日，李景林部队先后占领沧州至马厂一带。张宗昌派褚玉璞军参加战斗，直鲁军逼近津郊。奉军派出渤海舰队11艘军舰，运送直鲁军6000人，由北塘登陆，将冯军击退。冯军封锁海口，不准任何船只驶入大沽口，以致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北京外交团谓系违反"辛丑条约"，提出严重抗议。3月12日，日本驱逐舰2艘，炮轰大沽口炮台，同时奉系军舰4艘驶入港口。日海军与冯军开火，互有伤亡。15日，参加"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联合提出最后通牒，作苛刻的要求，限两日内承认。日本则单独提出：谢罪、惩办守军、赔偿损害等要求，限18日正午答复，因此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齐集天安门开会。会后游行，往国务院执政府请愿，与段政府卫队冲突，造成历史上的"三·一八"惨案，死伤约160余人。

奉、冯两军滦河之战

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队进驻滦西各县后，为配合直鲁联军进攻天津。1926年3月11日，军团指令刘伟第六旅为主攻部队，进袭冯军。该旅3个团，附有工兵、骑兵。以李福振的第八十五团及刘振翮的第十七团，夤夜强渡滦河，姚东藩的第八十团为预备。滦河西岸龙山，为冯军唐之迈师据点。刘伟趁对方熟睡夺取龙山，经激烈战斗奉军占领了龙山，团长李福振负重伤，同时高维岳军占领芦龙，双方伤亡惨重。

第三、四方面军团部队攻克滦西各县后，于3月21日占领唐山。22日，直鲁联军进入天津。26日，吴佩孚直系田维勤进入保定，冯军步步向北溃退。28日，直鲁联军进占丰台、通州，北京冯军陷于被围状态。29日，张作霖召集将领会议

于秦皇岛，表示仍与吴佩孚合作，共同讨冯，以及主持北京政务各事宜。李景林以参与郭变为张作霖所不容，经各将领说情虽释前嫌，但直隶军务督办一席，只得让与褚玉璞。张作霖于 31 日回沈阳，第三、四方面军团部进驻芦台（张志潭住宅）。4 月 6 日，奉系汤玉麟军队，由朝阳进占热河，冯军宋哲元部退到张家口。

冯部驻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临退前，对执政的段祺瑞拟仿冯囚曹故技，但段已预先逃避了。奉系军人斥冯谓：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可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鹿钟麟率部于 4 月 15 日退出北京，据守南口。22 日，奉系三、四方面军团部和张宗昌部队进驻北京。6 月 28 日，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京会晤，继续进行讨冯之战。

奉、冯南口之战

冯系国民一军，训练比较有素，虽与奉、吴各军多次作战，实力尚称雄厚。退守南口后，倚凭长城险峻，筑有防御工事，实为易守难攻。吴佩孚统筹进攻南口军事，直鲁军亦归其指挥。不久，吴部田维勤军发生变乱，湘鄂据点又遭受北伐军袭击，形势极为不利。吴不得不遄返武汉，策划抵御，将进攻南口军事定于 7 月 19 日，让归奉方负责。直鲁联军褚玉璞部队和第三、四方面军团第九军高维岳、第十军于珍部队，以及炮兵邹作华旅、骑兵郭希鹏旅，共计 10 万余人，自 8 月 1 日起，向冯军猛烈攻击。14 日，于珍部队攻入南口；同时黑龙江吴俊升部队也由东北西进，占领沽源，威胁冯军后方。8 月 19 日奉军占领张家口，冯军被迫总退却至陕甘境内。

阎锡山晋军乘势占领包头，令商震为绥远都统。奉系军事集团又复奄有热、察、京畿以及直鲁全境。张作霖令第九军军长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北京政府则由吴佩孚支持的颜

惠庆内阁改为顾维钧；而地方军警宪首脑，多为张宗昌所委派，如宪兵司令王琦，京师警察总监李寿全，北京警备司令王翰鸣等。第三、四方面军团长张学良接管交通、财务方面，派郭恩海为京汉北段铁路局长，于国辅为该路统货税捐局长，陈再新为京奉铁路警务处长，沈振荣为该路统货税捐局长，胡若愚为崇文门税务监督，张振鹭为张多关监督（原“张虎多”关），税款归该军团部接收移作军用。滦东10县为军团部队驻地，县长亦归军团委派，并截留其税收。

冯军控制北京政府时，与新闻界人士颇接近。冯军撤退后，报章文字倾向于冯军，而对张宗昌则有诋毁，直鲁联军乃大兴文字狱。《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均被杀害，并封闭其报社。张宗昌军纪败坏，大肆抢劫，有甚于张景惠京畿之时，群众对奉系军人颇为不满。

十一

奉系军事集团的扩张

1926年下半年，京汉沿线的保定、大名地区还为直系吴佩孚所占有，吴的主要据点在长江中游两湖及河南一带。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逼走湖南赵恒惕，直趋武汉。吴佩孚于9月7日放弃汉口，退至信阳。长江下游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本属直系，曾归吴佩孚指挥。吴于武汉失败时，孙坐视而不救。吴败，北伐军以主力向孙进攻，江西、浙江、福建相继失守，孙传芳只得退守南京。1926年冬，吴、孙两势力大大削弱，因而直接影响全面战局，与奉系军事集团有切身利害。

吴佩孚撤离汉口次日，奉系军事集团即在沈阳召开军事

会议，讨论吴败后的对策。老军人吴俊升、张作相、汲金纯，文人王永江等均以为郭变为时不久，实力还未完全恢复，不宜向南扩展。而张宗昌则力主援吴，并要南下收复宁、沪各地，以雪被孙传芳袭击之耻。褚玉璞则急于收回保、大地区，完整其直隶省辖境。最后，张作霖决定，作南下援吴军事布署：以张宗昌为援吴军总司令，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张学良、韩麟春的第三、四方面军团在京汉线伺机南下。及孙传芳溃败，张宗昌又向张作霖提出派兵援孙的要求，他说："援吴援孙应当双管齐下，不可观望自误。"11月中旬，张作霖在天津蔡家花园召开奉军首脑会议，讨论当时军势情况，并于11月15日举行将校联欢大会，少将以上官员均参加。这次大会决定为团结北洋派系，派军南下。援孙由直鲁联军负责，援吴由第三、四方面军团负责。在11月19日蔡家花园的会议上，不意孙传芳竟化装商人，着布大褂，微服来津，亲自投靠张作霖。孙本是临急抱佛脚的，经解释前嫌后，张作霖对他这样作风大为欣赏，许以"光明磊落不乘人之危"。孙即在津参与会议。他说："我们北洋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团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会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于墙，今天要外御其侮。"并说："愿作张的部下，听从指挥。"

嗣于11月30日的会议上，为统一指挥，张宗昌和孙传芳用直、鲁、豫、苏、皖、赣、浙、闽、热、察、奉、吉、黑等十五省区首脑名义，由孙传芳领衔，联合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军政府大元帅，即于12月1日在天津蔡家花园举行就任仪式，并通电全国。张旋即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任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任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

总参议。孙传芳令其军队由徐州进到长江南岸，张宗昌军队进驻长江北岸为孙军后援。第三、四方面军团由京汉线援吴，并负责警备京津。吴俊升、张作相所部吉、黑部队巩固后方。热河汤玉麟，察哈尔高维岳率所部防范冯军再进。安国军总部驻在天津。奉系军事集团因孙传芳的依附，势力又将达到江南五省地区。

奉军下河南之战

“下河南”为当时奉军内最流行的辞汇。奉军南下部队属于以张学良、韩麟春为军团长的第三、四方面军团，主力部队为于珍第十军，赵恩臻第十一军，荣臻第十六、十七军，故又称“奉军三臻下河南”。当时军团所属部队及将领概略如下：

第八军军长	万福麟
第九军军长	高维岳
第十军军长	于　珍
第十一军军长	赵恩臻
第十五军军长	汲金纯
第十六、十七军军长	荣　臻　胡毓坤
第二十军军长	于学忠（1927年吴败后投归军团）
第二十九军军长	戢翼翘
第三十一军军长	郑泽生
骑一军军长	窦联芳
骑二军军长	马占山

第八军驻保定一带，第九军、骑二军驻察东一带，其余各军分驻石家庄及冀南各县。派遣援吴、下河南部队为第十军，军长于珍，带领十旅戢翼翘、第十二旅部汝廉、第二十一旅刘翼飞、第二十六旅赵鸣皋等部队。于珍司令部设在顺德，先头部队在磁县。此时冯玉祥国民军已于10月初由甘肃

向陕西出动，12月初，东出潼关，进入豫西。吴佩孚在洛阳处于行将崩溃境地。奉军下河南是一个巨型的战役，名义上是援吴，阻止北伐军前进。但吴佩孚并不同意奉军南下，他认为这是假道于虞以伐虢。1927年2月初旬，于珍部队开到新乡，渡黄河占领开封。吴部兵力最大的是靳云鹗部，靳指挥王为尉、田维勤等军，向奉军进行袭击。奉军于珍部队在黄河南岸复受地方军马朝风、米文和的干扰，因之，刘翼飞、赵鸣皋两旅溃退，于珍全军遂退回黄河北岸。不久张宗昌部孙殿英师攻占兰封后，又复占领开封。于珍部乃再渡黄河，进攻郑州。张学良派荣臻、胡毓坤十六、十七军渡河助攻靳云鹗。3月中旬，两军大战于开封、中牟之间。靳云鹗的主力军十四师师长高汝桐，在反攻郑州时，为奉军铁甲车的炮弹击毙，于是靳军败退。在靳军反攻奉军的同时，吴的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寇英杰降奉。张作霖任命他为安国军第十一方面军军团长，令其收抚吴军的败兵。吴佩孚力穷势蹙，狼狈南逃，7月13日经鄂西山路至巴东入川，依附于四川军阀杨森。靳云鹗投靠冯玉祥，后为冯消灭。

1927年4月，第三、四方面军团以于珍在下河南作战不力，撤消其第十军军长，遗缺由王树常充任。该军协同十六、十七军追击靳残部至西平、遂平一带；赵恩臻第十一军占领开封。第三、四方面军团于吴部覆灭后，占领河南大部地区。张学良请示张作霖，派军团政务处长张济新在开封代理河南省长。但豫西的红松会，豫北的天门会，一些地方武装各据一方，政令难以下达。6月中旬，武汉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等部进至周口镇。奉军与之激战，阻其前进。万福麟第八军部队进驻洛阳，防御由潼关东上的冯军。河南奉军，南与北伐军，西与冯军成对峙局面。山西阎锡山响应蒋介石北伐军，

向娘子关出兵，威胁三、四方面军团右侧。东路孙传芳、张宗昌两部，为蒋介石北伐军所击败，节节后退。6月末，孙传芳军退守海州，张宗昌直鲁军退守徐州，形势极为不利。于是第三、四方面军，决定缩短战线，放弃黄河以南地区，退守黄河北岸新乡一带。因而武汉北伐军于5月30日占领郑州。同日蒋介石北伐军亦占领徐州。时国民党内部有宁、汉之争，南北军事小有停顿。

十二

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与被炸

奉系军事集团内部张学良、韩麟春、杨宇霆等主张与南方国民党议和。在河南混战时，张学良与参谋长鲍文樾到过一个被战火殃及的农村，深有感触，主和最力。张作相等旧军人主退出关外，惟孙传芳和张宗昌积极主战。1927年6月16日，奉系军人首脑在北京顺承王府举行会议，杨宇霆强调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南方势力，故各省军队应有统一指挥。孙传芳进而说不仅军事上，政治上也要统一，服从指挥。最后决定成立安国军政府，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内阁总理由大元帅任免。即日发出求和通电，声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前提，不特前此之敌此时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大元帅就职仪式，并发表以潘复为内阁总理的阁员名单。财政困难，委托梁士诒帮助筹划了从天津银行业凑得500万元，发放薪饷，鼓舞士气。

为统一军号，将镇威军、直鲁联军、五省联军等一律改为安国军。其番号、排列顺序及驻地如下：第一方面军，军

团长孙传芳，驻在济宁一带。第二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驻在鲁南一带。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驻京汉线及豫北一带。第五方面军，军团长张作相，驻晋北及绥远一带。第六方面军，军团长吴俊升，为总预备队。第七方面军，军团长褚玉璞，驻鲁西及大名一带。

第三、四方面军团各军原所辖单位为旅，一律改为三团制的师，旅长改称师长，师长以资历分中将、少将级别。

1927 年夏，奉系军事集团已开始走下坡路。斯时，孙传芳第一方面军团退至长江以北、济宁一带，有 13 万人。张宗昌、褚玉璞的第二、七方面军团，一向是兵员多多益善，无确实数字。奉军嫡系部队第三、四、五、六 4 个方面军团而言，总共有 150 多个团，兵员约为 50 万左右。并拥有海军江防舰队、渤海舰队、航空部队、后勤五大厂（兵工厂、迫击炮厂、粮秣厂、被服厂、飞机厂）。拥有海陆空全面作战的能量。论其素养孙传芳已成强弩之末，张宗昌，褚玉璞所统乌合之众，兵力虽多，实不能担当一面之重倚。仅张学良、韩麟春所统帅的第三、四方面军团，系属训练有素、较有教育基础的部队。

7 月初，孙传芳和张宗昌率部向蒋介石北伐军反攻。8 月 8 日，孙传芳重占徐州，蒋军由蒲口退至长江南岸。南京至镇江一线，成为南北两军隔江对峙形势。8 月中旬，孙军曾一度过江占领镇江及栖霞等处，但以寡不敌众，经过苦战伤亡颇重，终为蒋军击败，退回江北，据守蚌埠。

在鲁南方面，张宗昌之程国瑞、王栋、徐源泉等军，在滕县击溃蒋介石军王天培部，于徐州与孙军会合。在鲁东、豫西方面，同冯玉祥交战。10 月中下旬，张宗昌军占领归德，擒获冯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后又退出；在砀山一带数度和冯军

激战。

张、韩第三、四方面军团，撤退到黄河北岸，由彰德继续撤至直隶南部。冯军追踪而至，由军团的第十六、十七军和二十九军击退之，复追击至安阳。此时，善看风势的山西阎锡山，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于10月1日沿京汉、京绥两路，进攻奉军，致使奉军措手不及。晋军徐永昌部击退奉军汲金纯师，占领石家庄、正定，继而又占领新乐、定州。奉军第十六、十七军退守望都。10月2日，晋军商震部由晋北出兵，占领柴沟堡，前进到宣化，晋军两路仍甚得势。张学良令军团王树常第十军由阜平南下反攻，从豫北撤回的戢翼翘第二十九军何柱国师，攻占正定，击晋军侧背，晋军溃败。10月7日，阎锡山在石家庄督战时，几被奉军擒获。京绥线上，由张作相第五方面军相继收复被晋军占据的原有阵地，并进驻天镇、阳高等地封锁晋军。这一战役时称奉晋之战。

晋军徐永昌部第四师师长傅作义，担任挺进军，占领涿州后与徐永昌失去联系，为第三、四方面军团万福麟第八军团围攻。涿州城池坚固，又有奉军于芷山师王之佑旅仓促撤出时，未及焚毁的大量囤粮。傅作义藉之得以困守。万的部队曾数次攻坚，挖掘地道，布放地雷，还由讲武堂北京分校调来十余员战术和筑城教官，协同攻城，均未能奏效。而晋军主力缩回省境，涿州也已形同孤岛，早已弹尽粮绝。张学良意在说降，当时奉军中与傅作义保定军官五期同学者不乏其人，如刘翼飞（师长）、柏桂林（工兵司令）等，经过多次奔走，终于1928年1月6日，傅出降涿州城，到松林店万福麟军部。万同他到保定见张学良，颇得优遇，安置傅住在军团参谋长鲍文樾家。傅师原只有两个团，至此时除死伤外，人

数所余不多。12日在傅部出降后，拿出酒糟掺高粱的饭团以示人，说明已至绝境。涿州傅军约7千人，改编为第三十六师，以白儒清为师长，徒手调赴黑龙江，归吴俊升管辖，不久遣散。涿州攻守战自1927年10月15日，迄1928年1月12日，为时将近3个月。

1928年4月1日，第三、四方面军团部由保定临时移驻邯郸。此时，第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因1927年冬患半身不遂症，返奉治疗，张作霖已于1月24日委派杨宇霆继任军团长。4月2日张、杨在邯郸开军事会议，令于学忠第二十军、戢翼翘第二十九军、富双英第十一军、窦联芳骑兵一军、马占山骑兵二军、邹作华所部的炮兵旅，向冯军驻地丰乐镇一带猛攻，迫使冯军退到漳河以南。戢军复由丰乐镇渡河，击溃冯军孙连仲部，俘获甚多，随即围攻安阳。

4月上旬，在攻冯军的同时，进攻晋军。荣、胡第十六、七军占领井陉，进入娘子关。王树常第十军逼近五台，张作相第五方面军占领大同。西线对冯、阎的作战都是节节顺利的。

在鲁南、苏北方面，孙传芳第一方面军团，曾反攻蒋介石军至徐州附近。张宗昌第二方面军团的孙殿英部与冯军方振武、孙良诚两部，在鲁豫交界处作拉锯战，没有决定胜负。但因许琨军失守韩庄，影响东线战局，不得不向济南撤退。1928年4月9日，北伐军向孙、张两部总攻击，逐步北进。孙、张两部的泰安、界首两据点，相继于4月下旬失守，孙部将领郑俊彦、李宝章、上官云相；张部军长徐源泉等接连投靠蒋介石，孙、张两部不得不放弃济南北撤。蒋介石于5月1日入济南。日本帝国主义为保护其所谓权益，趁张宗昌军撤退，即出兵侵占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

褚玉璞第七方面军团以山东战斗不利乃放弃大名，向天津撤退。第一、二、七等三个方面军团纷纷后撤。张作霖见形势不利，津浦沿线混乱，京津为之震动，急令张、杨第三、四方面军团和张作相第五方面军团向滦河以东及关外撤退，以保实力。并于5月9日发出通电，主张息战，声称：国内问题听候国民解决。蒋、冯、阎等已胜利在望，置之不理，积极向北推进。张作霖见息争无望，准备撤离北京，退回关外休整。

5月17日深夜，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访问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声称：中国战争即将波及北京、天津。如果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适当的有效的措施，但是对于交战双方仍严守中立。据知，芳泽携有秘密条件，如张允许，日方可以出兵相助，为张拒绝。芳泽直至18日凌晨3时始退去。张在芳泽去后当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5月21日，日本公使武官立作川又警告张，如果奉军败退出关，日军将解除其武装。扬言任何军队不得进入东三省。5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移驻沈阳，同时日本第十三、十四师团的一部开抵南满线一带。

5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日本觉书声明：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自当尽力保护外国侨民，断难承认日本觉书中所称的“适当、有效措置”，“请勿蔑视中国领土、主权，干涉中国内政”。

第三、四方面军团先撤退在豫北作战的部队，继撤攻击晋军的部队，以军为单位，逐步退至滦州以东。军团部5月中已移驻北京西城光明殿。适时张作霖出京后，军团部于6月6日又退驻滦县城内。张、杨军团长驻滦河东的北山大觉寺。京奉铁路载运部队的车辆，头尾衔接长达一二十里。

第五方面军由张作相率领，于5月19日放弃张家口。5月末，各部队分别向马兰峪、凌源一带撤退。第三十军第四十七旅鲍毓麟部留驻北京，维持秩序。

张宗昌和褚玉璞残部驻滦河以西一带，孙传芳残部驻芦台一带。张、褚一度宣言“班师”回奉，后来受张学良和白崇禧部夹击溃散，残部被白部收编。

张作霖退出北京前作如下的布置：5月30日召集会议，委托王士珍组织维持会，维持北京治安；政务由国务院代行。

6月1日，张作霖在居仁堂接见各国公使和总商会长，告以将撤离北京，北京秩序已委托王士珍负责，政务由国务院代行。外交团和商会要求留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外交团并保证该旅将来可以安全退出关外。2日，张作霖通电全国，略谓：“不忍穷兵黩武，爰整所部退出京师。此后政治问题，听国民裁决。”2日晚，日使芳泽再往见张作霖，张于春藕斋与何丰林、李律阁等谈话。接见时，芳泽提出，日本出兵济南，阻南军北上，奉军不要撤退，防守黄河北岸。张默不作语。不多时芳泽复以命令口吻要张考虑。张愤然以烟杆敲于茶几说：“我已决定退回老家去，不再考虑了！”（据当时在张左右侍卫官温守善对笔者所说）。3日凌晨2时，专车出京回奉，车过榆关，留守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团长吴俊升来迎接，同车回沈阳。

4日清晨，张作霖返奉专车行至沈阳之皇姑屯，经过北两洞桥（京奉路与南满路的交叉点）时，中了关东军所预置的炸弹。一声巨响，专车和铁桥均被炸毁。吴俊升当场毙命，张作霖受重伤，亦以震动甩出车外，以脑震荡未几死去。

张作霖生于1875年2月10日（农历三月十二日），终年53岁。其一生机警创业，扩军黩武，竭尽东北财力，从事内

战，进出华北、华中一带。外有强寇，时而互相利用，终至不可救药。东三省官银号会办彭贤为之集荣哀录一册，文人吴树彤为之传。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1辑〕

我所知道的两次直奉战争

○常玉林

第一次直奉战

1920年，段祺瑞任陆军部长，曹锟任七省（豫、冀、鲁、晋、鄂、皖、苏）经略使。该年夏季，发生了直皖战争，因双方旗鼓相当，僵持不下。于是双方先后各派代表，请求奉军出兵资助。张作霖考虑利害关系，毅然资助直军，出兵关里，共将皖军击败，直奉两军大获全胜。战争结束之后，曹锟执政。曹召集军事会议，参加人员有直奉两巨首（曹锟和张作霖），还有吴佩孚、张作相等人。会上为了掠夺和占领皖军的胜利品及地盘，双方发生了争执。其中吴佩孚争执最甚，张作霖在会上对吴佩孚的意见大加批驳和责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张作霖认为奉军出师30多万帮助直军，才取得胜利，且奉军官兵伤亡以及枪械、弹药、军用物资损失极大，如今直军竟独吞了战利品及地盘，这不是奉军被直军利用了吗？因此痛恨在心，深怀此仇必报之心。

奉军回东北后，即整军经武，加紧训练，成立讲武堂和

教导队，大量培训军事人才。对精干有为的青年，选送日本士官学校深造。收聘保定军校的教官以及其他军事人员，如何柱国、王兴文、杨正治、陈森等，都委以重任。

张作霖对直系的曹锟、吴佩孚等，仇恨入骨，决心消灭之，以占领直隶，进京执政，统治全中国。于 1922 年把奉军部署分为东西两路，各编为 3 个梯队，其中东路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配属兵力有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及丁喜春旅、缪旅等；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配属兵力有第三旅、第四旅、第七旅、第八旅、第十六旅等；第三梯队李景林为司令，配属兵力有二十九师及于旅、汤旅等。

第一梯队奉命进入喜峰口、西铺村、迁西、丰润、丰南之线待命。第二梯队兵力集结杨柳青及王庆坨之线，并构筑简单工事。于公历 4 月初，全梯队向信安镇、中口村、胜芳及霸桥之线开始总攻。梯队司令官张学良、郭松龄命王兴文代理第八旅旅长，配属炮兵一团，于拂晓前攻击中口村及胜芳之线的直军。

当时的直军第三师，是吴佩孚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很强。王代旅长根据当时的直军情况，决定用中央突破的战法，突破点选在中口村，全旅及炮兵一个团，又由第三旅一团调来机枪连。那时我是机枪连第三排排长。拂晓攻击开始了，我连掩护步兵前进，和守军展开激战，双方互有伤亡。八旅的温、宋两团长负伤。营长以下的伤亡估计约有 500 名以上。我连的排长有两名负伤，班长伤亡 7 名，士兵伤亡约有 30 名。在直军既据中口村之险，又有坚固的工事、负隅抵抗的情况下，而我军伤亡很大，一时难以攻克。代旅长王兴文以必胜决心，命令炮兵团用燃烧弹摧毁中口村。炮兵团奉命，以全团的炮火，集中射击中口村。当时中口村硝烟四起，火焰弥

漫，不仅所有防备设施全部摧毁，就是百姓的房屋建筑统统变成瓦砾和灰烬。至于直军和百姓，也都几乎全部炸死烧死了。我旅部队乘势向直军发起冲锋，直军溃逃，遗下的被烧死炸死的尸体不计其数。我旅进占了中口村。梯队右翼攻击信安镇的第三、第四两旅，已把信安镇全部攻下来了。我第二梯队的进攻任务，已全线胜利完成了。

第一梯队在西铺村、迁西、丰润、丰南之线。奉军发动全线总攻，直军据险防卫，奋勇阻击，苦战一昼夜，奉军终未得进展。直军除正面努力防守，勿使攻破外，以马良一师的兵力，由第一梯队的右翼大迂回，包抄第一梯队的后路，使二十七师及缪旅腹背受击，无法应付，只有败退。这时张作霖亲临滦州车站督战。见第一梯队被直军击败，即令其退守长城的喜峰口、冷口之线。又见第二梯队虽是节节胜利，战果辉煌，但毕竟是孤军深入。为了免遭危险，亦急令二梯队即速转移，脱离直军，撤出战场，经永平府退至山海关、九门口之线。直军跟踪追击，一直到喜峰口、山海关奉军退守之线。长城内外，两相对峙，虽有小的接触，也无大的变化。

我第三旅，退守山海关以北疙疸岭、二郎山之线，筑有坚固工事。于5月初，我军即准备有所行动。第三旅的第一团团长是王兴文，团副张熙光，第一营长焦汉武，第二营营长王德印，第三营王营长。某日晚9时开始行动。第一营为先头营。直奉两军阵地相距约有15华里。在黑夜行军，先头营与本队失掉联络，直插直军阵地内部。而团长所率领的本队二、三两营及迫、平炮连迷失方向，走有4小时之久，时将拂晓。此时已经走到直军阵地背后小山上，只听重机枪不断射击。团长王兴文找机枪连长霍永胜问："这是否是我们的枪声？"那时我在团长身旁，霍连长说："不像我们的枪声。"

王团长大惊，当时又听对方阵地内大喊："哗过来吧！"这时有很多官兵围在团长附近，正说话间，直军重机枪向我们射击，王团长、王营长及其他数人当即牺牲。我们急于撤退，但天已拂晓，两营官兵伤亡很重。王团长及王营长的尸体已由随从抢回，后又听说第一营全部为直军俘虏。这次偷袭未成，反而折兵损将。尔后双方各守原阵地，虽然时常有零星接火，但大局未变。相持有一个半月之久，经北京绅士王士珍出面调停，以长城为界，全线停战。以后各自退兵。其他在关里所驻的奉军第一师、第十六师，以及各铁路线所驻的混成旅，多被直军收缴。奉军损失之大，超过直军以上。这就是第一次直奉战的部分情况。

奉军返回东北以后，整军经武，加紧训练，以复一次直奉战失败之仇。

第二次直奉战

奉军返回东北后，张作霖立有卧薪尝胆之志，整编东北军，设陆军整理处，以姜登选为训练总监，管理教育军队及扩编军队；扩大讲武堂，成立教导队，组织军事高级研究班及军官教育班；大量收用军事人才，暗中派代表与天津段祺瑞联系。张作霖经过几年整顿和总结教训，认为东北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可以一试了。于是把东北军整编为六个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第一军以姜登选、韩麟春为正副军长；第三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两军合署为一、三联军。其所属部队有第二旅、第四旅、第六旅、第二十四旅、第二十七师、二十七旅及十六旅等；第二军正副军长李景林、张宗昌，其所属部队有第七旅、第三旅、丁旅、汤旅及白俄

骑兵军；第4军军长张作相，其所属的部队有第二十八师、丁旅、李杜旅、阚旅、于旅；第五军军长吴俊升，其所属的部队有第二十九师、孙旅、马旅。这五个军整编完了以后，于1924年秋全部集结在奉天，经张作霖分别向各级军官训话后，即开往前线。

一、三联军占领九门口、三道关、乌牙城、山海关之线。第二军占领喜峰口至冷口之线。第四、五两军为预备队，第四军位置于兴城附近，第五军位置于锦西、建昌附近。一、三联军以火车输送，由奉天到绥中下火车。我三团在姜女庙前构筑工事。右翼的部队是十六旅，旅长齐恩铭，占领九门口以北阵地。守九门口的是直军的独立旅，旅长是冯玉荣（冯玉祥的弟弟）。10月某日，直军吴佩孚招集营以上的军官开军事会议。我十六旅旅长齐恩铭得知直军开会的消息后，命令炮兵向直军阵地射击，试探直军的动静。此时直军所据守的九门口附近的阵地，由于主管官没在，无人指挥，士兵顿时混乱，狼狈不堪。我炮兵在炮队镜里发现直军动摇，齐旅长命令以全力向九门口进攻，直军溃退，我十六旅进占了九门口。直军会议以后，吴佩孚得知九门口失守，当即将冯玉荣旅长枪决示众。并将冯玉荣的首级挂在山海关城门上，以示军威。由此吴佩俘与冯玉祥有隙。

直军守山海关的师长是彭寿莘，与我二、六两旅对峙。某日拂晓，联军命令总攻，我旅第一团团长王德印攻击红墙子，第三团团长刘维勇攻击三道关。三道关之高，足有200米以上。长城虽经数千年的风雨侵蚀仍未坏损，直军居高临下。我那时是三团机枪连的排长，随步兵进攻到长城近前。直军防卫火力凶猛，手榴弹乱投。我排进攻到距长城约三四百米处，我右小腿被炮弹片炸伤，就地利用大石头掩蔽用绑腿带包扎

伤口，有本排上等兵刘永清扶我下山，打算退出火线。刚走约 200 米时，我的大腿又着一枪，这时我再也不能走了，等日落后，由刘永清背我到后方，乘火车到锦州陆军医院。

奉军对三道关及角山寺的进攻，由于城坚山高，实难攻下，所以每天都用炮轰和飞机投弹扫射，并施以波浪式的冲锋。虽然这样，我二、六两旅伤亡甚重，激战数十天毫无进展。这时奉军方面暗派代表郭仙桥（原系东北军二十八师旅长）密去冷口与冯玉祥（郭与冯有旧交）联系。约有十数天，奉军又命令第二次总攻。这次攻三道关的是二十七师三十团。团长刘伟命令：团副指挥全团的重火器连，由正面佯攻，自己率领三个步兵营，找当地人为向导，走山道绕出十数里之外，由长城缺口迂回直军后方。但直军在长城缺口守兵过多。三十团不得突进，且伤亡很重，终未完成迂回任务。正在久攻不下的时候，我第二军由冷口进占滦州，而冯军在北京倒戈。冯玉祥军全部开进北京城，曹锟被囚，北京陷入混乱状态。冯玉祥的倒戈，致使直军全线溃败。吴佩孚由秦皇岛乘舰逃走，后来在河南鸡冠山收容旧部，有靳云鄂、刘佩绪、高汝桐等部约有七八万人，准备东山再起。

从冯玉祥、胡景翼的部队撤出直奉战线，直军其他部队见大势已去，有的仓惶逃窜，剩些尚未得机逃走以及一些残余部队，都由东北军混成旅缴械。

冯玉祥倒戈进北京，囚禁了曹锟，即电请天津的段祺瑞来北京执政。张作霖打垮直军之后，即破关直入，势如破竹，浩浩荡荡，百万大军逼近北京城。当张作霖进到北京的第二天，即与冯玉祥等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掌北京政权。后来，段、张勾结把冯玉祥挤出北京。

张作霖进入北京后，一方面插手政权，另一方面指挥东

北军长驱直入，占领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张宗昌直取上海。1925年，是东北军的势力最狂妄的一年，直至冬季郭松龄倒戈，东北军的气焰才有所收敛。后因遭孙传芳、吴佩孚、冯玉祥等军三面包围，才被迫撤回东北。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军　旅　札　记

◯ 赫慕侠

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我是第四混成旅的上士。第四旅在东路战场，属张学良第二梯队，战线在津东霸县胜芳镇一带。旅长蔡平本，所属步一团团长于芷山，步二团团长丁喜春，炮兵营营长王起升，另外还有骑、工、辎兵各一连。司令部设在黄家柳子。

战斗很激烈，步一团团长于芷山被炮弹炸片打伤。他有个日记本挺厚，放在右上肩军衣袋里，炮弹炸片正好打在日记本上，给挡住了，只是皮肉受伤。

还有一个晚上，混成第十一旅的团长张龙文向第一线增兵，行至第四旅部附近，误认为是敌人而开枪射击。旅部的预备队李营长也开始还击，旅部夹在当中。我当时怕在院子里受包围，跑到附近一个柳树林子里去了。旅长向梯队部挂电话，才弄明白了是误会，张龙文团长来向蔡旅长道歉，旅长还是很生气。

旅部的军械处长空缺，旅长叫我代理，但郭忠元副官长不同意。说我年轻，不像个处长样，因此就派一个二等兵见习上士李叔翘代理，还叫我帮他的忙，任务是领发弹药。

张学良名义上是梯队司令官，实际上是郭松龄指挥作战。郭腿上扎裹腿，穿布洒鞋，手拎个小棍，背个图囊，只带一个勤务兵，时常到第一线的战壕里视察。遇到问题，马上解决。

一天晚上，接到命令，三、八、四旅由郭松龄指挥开始向山海关撤退。敌人没有追上来。通过京奉路时，看到直军的火车向东开，旅长蔡平本立即命令步一团的营长田德胜准备攻击这列火车。敌人也发现了我们，就把火车倒开西行，田营长就在现地掩护全军通过后，再跟进。我记不住走了几天，到了山海关就听说，我们奉军撤退到这里，决不能再退了，要和直军决战到底。

说实在的，我们东路是受两路的影响而退却的。直军的进军很迟缓，等着奉军都部署好了，才开始进攻，没有发生过白刃战，只是双方的炮火很猛烈的，互有伤亡。直军无力继续进攻，奉军也无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议和停战。

1922年6月，第四混成旅开赴沈阳西关，整编为第二十五旅，旅部同步一团于芷山驻齐齐哈尔，步二团丁喜春驻富拉尔基。新增编的第三团长姓张，他的外号叫“外国鸡”，驻博克图。他的性情暴烈，对部下不好，动辄骂人、打人，激起兵变被打死。还新增编一个骑兵团，团长王永清，在奉天东边剿匪。

回到沈阳后，看到同事们都荣升高就，而我依然是一名上士，顿生退志，就回到鸡冠山同族赫春林家私立的荣耕堂小学当教员，藉以维持生活。

奉军战败后，曹、吴独霸北方，控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本着曹锟与吴佩孚的意旨办事，下令免张作霖本兼各职。因张在东北统治多年，仍掌握一定实力，没有被北京的一纸

空文动摇；东三省的省议会，依然听命于张作霖。通电全国拥护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遂宣布东三省“独立”，重整军备，以图再战。设立陆军整理处，淘汰老弱官兵，补充新生力量。对原有的军官加强教育，并收揽人才，充实骨干，提高教育和指挥战斗的能力。军队统一编制，废弃师制，采取旅制，缩小目标，减少敌方注意力，并扩建兵工厂，增加炮火威力。

为了孤立直军，扩大势力范围，张作霖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复与退居天津的皖系首领段祺瑞重修旧好，又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取得联系，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奉张对直军采取的外围工作完成后，进一步对直军内部采取分化工作，派郭瀛洲等拉拢冯玉祥反直。

当张作霖锐意整军备战之时，直系曹吴已把国事搞得乌烟瘴气。曹以贿选而当总统，秽声洋溢全国。吴佩孚专横跋扈，乱用武力，兵连祸结，反直浪潮峰起。1924年9月江浙战起，张作霖趁此良机，立即响应浙沪通电讨直。

奉军攻击热河方面的战斗部署，第一师师长李景林任第二军军长，第三旅旅长张宗昌任副军长，第二十五旅旅长蔡平本拨归李景林指挥。

1922年9月，我在家乡凤城县鸡冠小学当教员，蔡旅长由黑龙江齐齐哈尔来信，叫我回去，当旅部中尉副官。1923年，我又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第二次直奉战争动员时，我由沈阳讲武堂直接归还原部队，随军参加战斗。二十五旅编为第二总指挥部时，我任上尉副官。

战斗开始时，李景林令蔡旅攻击前进。蔡感到任务重，兵力不足，把这个实情向李汇报。李不满意，在发给张作霖电

中说："蔡未战求援。"蔡是张的心腹，张作霖恐怕蔡李不和，影响战事，就派郭瀛洲到前方来，了解情况。并授意采取适当方法处理，为了不再发生意见，把蔡旅拨归张宗昌副军长指挥。

张宗昌把蔡旅编为第二、第十两梯队，蔡任总指挥。

第二军攻击进展很迅速。李景林部占领承德后，留恋热河地盘，迟滞不前。张宗昌野心很大，猛攻前进。在前进中，我们发现直军师长阎治堂所坐的轿车都遗弃在途中。在攻击榆林山（鱼鳞山）战斗中，白俄车队上校有战功，张宗昌为了鼓励他，在战场由军衣袋里掏出一付少将级的肩章，亲自给上校换上了。那个白俄军官恭恭敬敬地给张行了军人举手礼，眼泪都流下来了。张不但有白俄军队，张的工兵队长还是个日本人。我过去认为张宗昌是个大老粗，其实不然，他对作战很有经验。他的部下褚玉璞倒是个大老粗，不过很勇敢。张一直挺进到滦州车站，威胁直军的侧背，这时直军的增援部队还未下车就被缴械了。

李景林知道张宗昌占领滦州车站，就昼夜兼程起来。

直军正面在九门口被突破，侧翼被包围，再加上冯玉祥回师北京，把曹锟软禁起来。吴佩孚看到大势已去，乃乘舰逃走。

张宗昌第三旅和蔡平本第二十五旅占领滦州车站后，第二十五旅奉命开往芦台。路过唐山附近时，遇见陕西军胡景翼的部队。这个军队的装备和一般的差不多，但它的运输工具与东北军不一样，没有辎重队，全靠骆驼运输。过去是敌军，现在变成了友军。

到达芦台后，奉张作霖的命令，旅扩编为东北陆军第八师，其他的旅，大都扩编为师。因为胜利了，扩编军队好晋

级，以示鼓励。蔡平本任第八师师长，第二十五旅步二团团长丁喜春任第二十五旅旅长，营长钱忠山（于凤至娘舅）、郭忠元任团长。第二十五旅步一团团长田德胜任新编的第三十三旅长，步一团中校团附廖弼宸、步一团的营长姜凌云均任团长。

师直属的工兵营、辎重营是由原来的连扩编而成。还有骑炮各一连仍照旧，没有变动。

新编的第三十三旅和工辎两个营扩编的士兵，大部由俘获的直军士兵补充。

当第二十五旅进攻热河，占领凌源时，蔡旅长命令我负责维持后方治安。我感到在战地维持军纪比较困难，知道蔡旅长很重视军纪。记得在出发前向锦县集结时，步一团的营长刘连玉所属的第七、八两个连路过开原时骚扰商民。要好吃的，被蔡旅长查知了，全旅到锦州后，蔡召集全旅的军官训示，要注意维持军纪，并当面询问第七、八两个连长，是谁在开原骚扰商民，破坏军纪。但谁也不承认，因此蔡发脾气，要用军棍责罚两个连长。营长刘连玉眼看两个连长要挨揍，就向旅长求情。这一下子更触怒了蔡旅长，就不责罚两个连长，而命令副官处长岳蔼堂责罚刘营长五十大棍，把个刘营长打的直嚎，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我就向蔡旅长建议，立战时军纪三条，维持地方治安：一、不准私入民宅，凡强奸妇女和抢劫财物者，立即执行枪决；二、公买公卖；三、不准抓夫和征用车马。这些得到蔡旅长许可，马上布告周知，以此维持治安。

热河境内天主教盛行，有许多商民跑到天主教堂避难。因此，我找到天主教堂讲明了我军负责确保治安的目的，并把布告贴在教堂门外，以便群众周知，早日回家，安心生活。

热河山地很多，骑兵和车马的蹄铁，要经常的补给，因此我把铁匠炉的打铁师傅们组织起来，给军队打蹄铁，照市价付钱。因怕奉票毛荒，便以面粉作价，发给现品。这样，很快就恢复了市面秩序，其他的友军也到这里来购置东西。

我把旅部留守处临时设在凌源银行。我与银行的夏经理商议，把库存的纸币切为两段，并声明作废。还有几麻袋的铜板，由银行封起来，再用第二十五旅的条子加封，把废票子、铜板统统锁在库内，钥匙由夏经理保管，库房的门由双方加封。

军部的交际处长王琦到凌源视查，认为第二十五旅的军纪好。所以，旅扩编为师时，我升任少校副官并代理副官处长的职务。

1924 年冬，张宗昌把津浦线的货车改装成铁甲车，沿津浦线开始南下。第八师仍旧由张宗昌指挥，由芦台出发跟进，在南进的火车中度过的除夕。第二天越过长江到下关，这时张宗昌部已向上海进军，其先头部队已达苏州，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已达常州。原江苏督军齐燮元逃走，其所属的江苏军队不战而降。张宗昌部占领上海时，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到达苏州。苏州的城门不开，怕军队骚扰，城墙上站有民团防守；城门外，设有支应所，军人买东西，由支应所代购。蔡师长同意地方的处置，还下令不让官兵外出，准备战斗，主力驻常州，策应上海。

张宗昌占领上海财富之区，自然心满意足了，但他没忘记他的本钱是什么，还是先把主力控制在龙华，尔后又把海军掌握起来，派他的部下毕庶成当海军司令。其次派王琦掌管财务，包括捐税等项在内。又与上海的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等结为朋友，因此他的随护兵等可以携带武器进出租界

地内。还侦探到浙江的孙传芳没有军事行动，就令第八师驻南京。师部同第三十三旅和工辎两营及炮兵连等均驻南京城内。第二十五旅及骑兵一个连驻溧水、溧阳一带，以上两地与浙境毗连，这是对邻境的戒备部队。

蔡师长渡过长江后，郁郁不乐，感到孤军深入，退无归路，更顾虑的是祸在肘腋之间。如降服的第四师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两个师的主力均驻在南京城内，浦口以北乌衣车站还驻有第四师的一个营的兵力。狮子山要塞司令唐少将，也是江苏省的原有军队，江苏省的警察头目王桂林也是齐燮元的旧部。在南京城里的武装部队就比东北军第八师的兵力多好几倍。这还不算，江北还有很多地方部队，如宫邦铎、白宝山、马玉仁等，他们都是多年来盘据江苏各地的镇守使。以上的部队和警察，都是直系的残余势力，他们的降服不是真的，而是惧怕东北军的势力大，不敢抵抗，为了保存实力，而暂时降服，遇到机会难保不有所行动。蔡师长根据当时情况作了以上分析，又因为连年战乱不已，引起厌战情绪，因此给张作霖上了五不可战条陈。并回沈面见张作霖，要求把他调回去，但没有达到目的。

第八师的弹药库，蔡不让运过江来，叫存在浦口车站货物房子里，派了一连工兵保管。他还叫他第二个儿子蔡雨时同我到狮子山要塞与唐司令交往，并叫我们注意了解要塞内部的情况，预防不利的时候向浦口撤退。

蔡师长到南京后，陈调元、郑俊彦、王桂林等都讨好拉拢他。陈调元不断地给蔡送礼，送过印度大头土（鸦片烟），江西瓷器两棹，瓷器上还印有陈调元敬赠的字样，又送廿四史等。蔡明白他们对他拉拢的目的。蔡还说过，他们是朝秦暮楚，我是玩不过他们的。

张宗昌钻进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住在英租界三马路会中旅馆。因为蔡师长派我和他联系，因此我也去过上海。

张作霖怕张宗昌挥霍无度，更怕他扩大势力范围，就以鲁人治鲁的名义把他调回山东当督办。张宗昌虽不乐意，但羽毛未丰，不敢违抗，只得惟命是从。他由沪返鲁时，路过下关，在花园饭店休息，蔡师长因身体不好，派我代表他迎送张宗昌，张还要看望蔡师长，我给他挡了驾。张对我说："你们师长由盐渔款里经我手借去现大洋5万元，我不要了，你们师长怎么处理都好，我不管。自己留下也好，发给部下也好，我还不过账，不报告张大帅。另外，你们师长经我手代买的德国武器巴尔克满手提式轻机枪6支，每支800元，我也不要了，送给你们师长。你们全师的军饷，仍按六四折合现大洋发放好了。"这时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也在座。就问张，他们师也按照这个折合发放行吗？张答："我向后转了，不管。你们等杨督办来另行核计吧！"我回去向蔡师长汇报后，他当然很满意了。

东北军占领沪宁后，于1925年9月，由张作霖向段执政推荐姜登选任安徽督办，杨宇霆任江苏督办。东北军势力伸展到东南财富地区，致使被曹锟政府任命为浙江督办的孙传芳感到威胁。因此，他一面联合闽、赣、鄂、苏等省的直系旧部，特别与驻在南京的江苏帮办兼第四师师长陈调元和第十师师长郑俊彦等密谋内应，先发制人。并暗中与冯玉祥联合，酝酿共同反奉，拉拢江苏资产阶级张謇、张一麟等地方代表人物制造反奉舆论。孙把以上的密谋与策略布置好后，就在10月间以秋季军事演习为名，将闽浙兵力集结起来。接近上海时，突然袭击驻在上海的东北军第十师，师长邢士廉猝不及防，遭到失败，遂仓惶逃走。经津浦路时，又遇到陈调

元部驻乌衣车站的一个步兵营堵击，团长张铭谦战死，邢逃走后回到沈阳。新到任不久的第二十师的旅长刘一飞与孙军抵抗了几个小时，看看不支，就渡到江北，化装成和尚，逃回沈阳。第二十师另一个旅长赵鸣皋。因在京养病未来就任，至此第二十师瓦解。

当孙传芳军袭击驻在上海的东北军第二十师那天，杨宇霆由南京惊惶出走，为了缩短战线，命第八师渡江北返。

原第八师师长蔡平本于7月间病故于南京，张作霖任命骑兵第五旅旅长于芷山继任第八师师长。但在蔡故去时，第二十五旅旅长丁喜春与蔡的旧属密谋，以蔡的遗嘱与全师官兵的名义，致电张作霖，拥护他当师长，张因念故旧情深义重，遂改任丁喜春为师长。团长钱忠山任二十五旅旅长，营长刘连玉任团长。

蔡师长生前，因陈调元等部驻在南京，视为肘腋之患。因此我向师长建议，由各部队选拔青年战士300名集中到师部训练，特别注重学习武术，由副官王俊升领导，做为蔡的警卫。丁师长到南京后，与陈调元等相交游，吃喝玩乐，不像前师长那样戒备，并把300名战士解散，各回原部队。

杨宇霆出走后，第八师师长丁喜春令第二十五旅由溧水、溧阳向南京撤退继续渡江，又命第三十三旅旅长田德胜以及其他的各部队，由南京城内小营子向下关出发，准备渡江。当第三十三旅的前卫营长董国华刚到仪凤门时，城门关闭，被陈调元的第四师伏兵堵击，董营长等被俘。一时枪声四起，乱成一团，后闻师旅长多人被俘。

蔡平本故去时，由我把故师长的灵柩及其家属送回锦州原籍。时第八师参谋长富葆衡由沈阳回南京途中，到锦州下车，在蔡宅和我见面。他告诉我说，他在沈阳和张学良见了

面报告防务情况后，张将军指示，给第八师新添编一个炮兵独立营，张任命我为营长。我把事情办完后，回到南京。

炮兵营驻在小营子。我刚到营部这天晚上，就接到师部命令，炮兵营拨归第三十三旅旅长指挥，随旅准备渡江。就在这天晚上，在双方乱打的时候，我在珍珠桥附近与团长廖弼宸、姜凌云、中校团附岳如升会在一起，想要突围而出，但因南京城墙坚固，又被敌军包围，眼看就要束手被擒。这时廖团长想出了个脱身法子，他说珍珠桥附近驻的第四师工兵营长赵萃田和他在保定军校是同学，可以找他把我们接出去。因此我们就来到一家民宅里，这家女主人的丈夫，是在褚玉璞部下当差的。廖掏出他的名片，在上面写道“我们在此被困，请派人把我们接出去”，然后由女主人雇人给赵送去。很快赵就派他的勤务兵带着便衣，把我们接到他的营部去了。见面后他说这是上头人的意见不合所致，对于我们个人没什么关系。其实我和赵也认识，他当过第四师的副官处长，我当第八师副官处长时常见面，共同办过事。我们呆在他的营部感到不方便，廖又领着我们上城内青年会找他的同学张达夫，我们就住在张的家里。廖的家属在南京，他去找他的家属去了，剩下我们 3 人，一面买好了便衣，一面买船票，准备停当后，乘江轮到达了上海。由城里到下关经过大街小巷时，看见了许许多多的孙传芳军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是中式正襟的小褂，卷裤腿，穿草鞋，戴草帽，背雨伞。这样的服装是适合南方多雨的气候的。还看到报上说，浙军攻打江西，师长谢鸿勋腿部负伤等消息。

再说第二十五旅。在该师被缴械那天晚上，旅的先头部队由溧水、溧阳赶到南京城的南门外，没有叫开门。他们判断形势不好，就转向采石矶渡口急进，渡过了长江北岸。因

为旅长钱忠山、团长郭忠元、刘宝山先开小差了，以致群龙无首，一部分自行解散，各奔他乡。有一个营长叫刘道生，他没有脱离他的本营，还收容了其他的官兵们，由他率领绕道至山东，投奔张宗昌去了。1926年在南口时，我看见他时，已任直鲁联军的旅长。

回到沈阳，很快又发表了新的军队编制。我被任命为第九十二团第一营营长，团长是刘连玉。

我们九十二团先到北镇准备编制军队，后又奉命回到沈阳。这时第四旅驻沈阳东陵兵营，第三十七旅驻沈阳东山咀子兵营，兵源由各县抽壮丁补充。这时的任务就是教育训练新兵，准备战斗。

孙传芳夺取沪宁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军人纷纷通电响应讨奉，并电请吴佩孚与孙传芳共同主持讨奉“大计”。东北军见势不妙，即放弃苏皖两省，将军队集中于徐州，与张宗昌部汇合，准备反攻。

11月初，孙传芳亲到蚌埠督师，与张宗昌反攻部队交锋。在安徽固镇以南的战役中，俘获张宗昌前敌总指挥山东帮办军务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并把他处决，11月中旬在徐州召开了庆功大会。同月底，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兼任江苏总司令，聘章太炎为顾问，蒋方震和日本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这是孙传芳一生中极盛时期，成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五省实际统治者，也成了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

当孙军胜利北进时，吴佩孚在武昌复起，自封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与孙相策应。再加上冯、张之间的矛盾重重，已形成对立状态，因此郭松龄看到时机成熟，遂决心倒戈反奉。

在郭松龄反奉前，张宗昌出动所部鲁军8万，在徐州以南地区与孙传芳军队激战，张放弃徐州，退回山东。接着河南国民二军派李纪才攻鲁西南，张与李战于曹州至寿安地区。吴佩孚派靳云鹗率部增援李纪才军。靳、李两军一度推进到济南附近的八里洼。但不久，吴准备联奉反冯，指示靳云鹗转回河南做准备，于是张乘机反攻，保持住了他在济南和山东的地位。

与此同时，直督李景林在天津与冯玉祥交锋，李被逐出天津，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1925年12月初，张为援李合组直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褚玉璞带兵北上，与国民二、三军相持于德州、沧州之间。

郭松龄反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再度入关，夺取京津。1926年初，张作霖与吴佩孚双方取得共同“讨赤”（反国民军）的谅解，张宗昌代表张作霖，靳云鹗代表吴佩孚在泰山签定合作条约。张作霖派直鲁联军北进与奉军合攻津京一带的冯玉祥军，并派其渤海舰队北上助战。3月下旬，冯玉祥鉴于形势不利，被迫退却。直鲁联军与东北军占领天津，并于4月进入北京，冯军退南口至大同之线防御。

其时，第十军沿京奉路续进，经兴城、秦皇岛，进至北京。九十二团驻西直门天坛。军长于珍将九十二团长刘连玉撤职，以林郁文补充。第三团驻东岳庙。

第十军第三十七旅由北京向南口开进，任务是攻击南口车站，经虎峪至太平庄的西北高地红土工事之敌。由南口本站起，东至老公庄，是第三团攻击之线；由老公庄起，经虎峪至太平庄西北高地红土工事，是九十二团攻击之线。九十二团第二营左翼与步三团相接连，其右翼与第一营相接连，第一营的右翼与第三营相接连。

第三十七旅的右翼三十陵方面，是第十二旅长富双英的攻击方向。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指挥骑兵集团军经多伦向张家口迂回前进，威胁冯军侧背。南口以西地区归直鲁联军张宗昌总指挥，还有吴佩孚及阎锡山等军，从三方面攻击冯玉祥军。

我是九十二团第一营长，奉令由天坛进至京东七间房附近，待命进攻。在开进时与敌接触，迅即占领郝庄，第一连张少尉连附战死。占领郝庄后，炮兵军的李团长到达郝庄，在郝庄设观测所。

九十二团第三营攻击太平庄灰山（影壁山）时，敌人由太平庄出击，第三营溃退。我以第三、四两个连的兵力向东展开，猛攻敌人侧背，敌被迫退回阵地，因此，第三营得以重返阵地。

全军攻到敌阵地前，敌人凭藉着坚固阵地顽强抵抗，因此我不得已停止前进，也构筑阵地，就这样变成了阵地战。从春至秋，白天休战，夜间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了节约兵力，用第一、二两连与敌对峙，以三、四两连作为预备队，有时各连调换休息。我总是要保持两个连的生力军，必要时使用。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阵地生活。时间长了，战士们想出办法，用手榴弹当地雷，把许多手榴弹拴在高粱棵和苞米棵上，敌在夜袭时被炸死不少，在阵地前发现过敌军胡连长等 40 余具遗弃的尸体。

总攻击那天晚上，军部派来工兵营长到阵地和我联系，他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电网，确保攻击顺利。但到了拂晓攻击开始时，看不见他了。我们就在炮火掩护下，全营出击，先夺取敌人阵地，利用敌人前进阵地与本阵地之间的交通壕，向主阵地猛攻。占领了虎峪阵地后，立即转向南口车站进攻。我

们营首先占领了南口，这时南口正面，敌我双方还在激战中。

冯军受到三面攻击，感到危险，于是主力先行撤退，留一部掩护，此部后被歼灭。冯军退却，军团长张学良派第二旅旅长陈再新追击。

我这个营因南口战役战绩受到表彰。战争刚一结束，陆军大学的学员们就到现地参观，旅部令我给他们说明战斗过程，接着军团周副参谋长又来旅视察，叫我做战斗汇报。在南口休息一个星期后，我们移驻沙河镇训练。

在9月间，调我任第八师第一旅五十四团中校团附，在沈阳东山咀子训练新兵。10月间，张学良军团长在芦台电召我会面，询问我北京宪兵司令王琦邀我当他部下团长，是否同意，我表示不干，仍愿留在东北军内。

1926年7月，当南口战场还在激战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国民革命政府已经誓师北伐了。北伐军节节胜利，8月初进抵湖南岳州，10月初攻下武汉，给盘据两湖的吴佩孚致命打击。

1927年2月张作霖以援吴佩孚为名，派张学良军团入河南，先夺取了吴佩孚的地盘。

张作霖与南京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京搜查苏联使馆，逮捕并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20余人，借此向帝国主义讨好，并希望与蒋介石谋取妥协。由潼关出来的冯玉祥国民军与武汉革命政府派出的唐生智北伐军会师郑州，南京方面的军队也北上攻徐州，张作霖乃于此时企图分化对方，要造成以黄河为界的局面，以便南北两方可以对等议和。其目的在于联合蒋阎，以对付冯唐。从6月底到7月中旬，冯玉祥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继蒋介石之后，也走上反革命道路。在此之前，善于投机的阎锡山也投靠南方，于是张所希望的

蒋阎奉联合落空，而成为“蒋阎冯”联合对奉的形势了。

1927年东北军的兵力部署概要如下：

津浦线与陇海线方面：直鲁联军与孙传芳军。

京汉线方面：张学良军团（奉军）。

京绥线方面：第五军团长张作相（吉林军）。

在张作相军右翼北至雁门属于汤玉麟第十二军，在张作相左翼属于第三十军于芷山军长，三十军的左翼李盛唐师，属于张学良军团。

山西阎锡山组织三支挺进军，傅作义军向京汉线涿州挺进，李服膺军向京绥线门头沟挺进，郑泽生骑兵军向京奉线三河县挺进。

第三十军第八师第一旅旅长王之佑，指挥第四十七团、第六十团和五十四团第二营，先在迁安县剿匪，以后奉命进驻涿州警备。王之佑旅长先到的涿州，正和商务会人员接洽时，傅作义的军队进入涿州与王之佑的军队在街上遭遇，一个是深入敌境，准备战斗；一个是还当做后方，没有敌情观念，没有戒备，结果演成一场巷战。第一旅被击退，傅作义军遂占领涿州。涿州四门为傅作义军抢占，王之佑旅长带着幕僚们由城墙上用绳子系下来的。王因畏惧军长于芷山对他不利，因此躲避起来，六十团长高疯子晋升旅长。军长于芷山因遭到失败而恼怒，把六十团的阎营长处决了。以后令高旅长带两个团回奉天通化剿匪。

傅作义军占领涿州威胁后方，于是令第八军长万福麟围攻，久攻不克，只有围困，卒至弹尽粮绝，傅才投降。投降后，把他安置在军团参谋长鲍文樾的公馆里。傅乘机逃回山西，仍从事军事活动，鲍因此受到记过的处分，并通报各部队。

郑泽生骑兵军挺进到三河县，据说被东北军收买。

1927 年 7 月，五十四团奉命由沈阳东山咀子调进关内，先到南口车站，还没下完车，又调到门头沟，归北京宪兵司令王琦指挥，在王平村布置防御。这时五十四团欠第二营，该营在迁安县剿匪尚未归还。团到达王平村，立即将第一营和第三营的第十一连派出警备，第三营为预备队。日暮时，又接到王琦由板桥车站发来命令，要五十四团增援。这时团长刘连玉有顾虑，不愿意去，要给军长于芷山（在北京）打电话，请示后再决定。我向团长进言，既已拨归王琦指挥，就应听从王琦的命令，于军长无权过问，请示也白费事。可他不听，非要请示不可。他到车站去打电话，没有打通，在回王平村途中，被枕木绊倒摔伤不能行走，就找椅子往回抬。这时王琦派来的火车已经来接我们了，因此不能再拖延。我和团长商议，他在王平村休息，我带第三营长于禧麟去。他顾虑兵力少不放心，我说，山地战可以节约兵力，没关系。就这样我带着第三营到板桥车站见到了王琦。在第二次直奉战时，他是张宗昌的交际处长，因为过去认识，加之又在战场上再见，所以感到非常亲近。当天晚上就在车站宿营，第二天拂晓我就用这三个连的兵力，把他一个团还有白俄雇佣军的防线接过来了。后来这个团在大寒岭防御时，被山西军击退了。

敌军的师长是李服膺，正面的敌人是朵团长，占领阵地千军台。五十四团在庄户村之线展开，与敌对峙。3 天后，刘团长才带着第一营和机迫连及通信班等到来，我把第一营布置在庄户村以南之线，第三营布置在庄户村以北之线。紧接着第二营由迁安县剿匪也归还了，即以其为预备队。

有一天晚上，八十九团在青白口的战斗很激烈，炮火一

直落到板桥车站附近，王琦的司令部把重要的东西都搬到了车上。沈参谋长通知说，八十九团在青白口战斗不力，叫我们团准备转移到清水涧布防。当时我们离北京只40华里，再向后退，北京更受影响了。况且30多万大军，正在津浦、京汉两线作战，后方如受到威胁，肯定会影响第一线士气。此事关系全局，我要把这个通知给刘团长看了，他非主张撤退不可，那可就坏了。我立刻给沈参谋长提意见说，五十四团的正面，不会让敌人前进一步的。我还拟明日拂晓攻击前进，给敌人严重打击，以此支援八十九团，而挽回不利之势。我为什么敢这样做呢？因为事关全局，危亡之时五十四团应负重任，何况我们还是有战斗力的。另外，还有一个营的预备队没用，因此我有决心和信心这样干。第二天拂晓，攻击开始了，用4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集中火力射击，全线展开进攻。第一营营长张学龄虽然负伤，还是继续率队攻击。在此形势下敌人只是坚守阵地，没敢出击。

青白口方面八十九团岳如升团长，把退却的李福连长枪决了，恢复了原来占领的阵地，就这样转危为安。以后敌人退却时，我才把沈参谋长叫我们准备转移的通知交给刘团长看。

在一个晚上，发现大寒岭上有灯光，判断敌人有退却的可能，因此开始攻击。确实是敌人退却了。当追到谢家堡子时，接到于军长的命令，叫五十四团回板桥待命。见到于军长后，解除了王琦的指挥，归还原建制。刘团长请病假回家休养，令我补升五十四团团长。

在千军台的战役中，除了第一营营长张学龄负伤外，还有第十二连傅连长负伤，第四连王连长战死。我们追击路过千军台村时，发现敌人战死的也不少，都埋在村庄外边地里。

第三十军的编制

军长于芷山　参谋长廖弼宸

第八师师长于芷山（兼）

第三十三旅旅长田德胜

所属三个步兵团

第一旅五十四团团长赫慕侠

第二十九师师长孙绪昌

所属两个旅

军长于芷山率二十九师由京绥线下花园经桃花堡向山西进军。

军参谋长廖弼宸同少校参谋李春润指挥五十四团，由板桥出发经斋堂、蔚县，出松子口进平型关，向山西繁峙县大营镇进军。

第三十三旅旅长田德胜率三个步兵团经松子口，出平型关向山西进军。

张作相的第五军团攻击桃花堡时，敌人顽强抵抗。曾电请张作霖督促第三十三旅迅速进击松子口，威胁敌人的侧背，配合桃花堡正面攻击，但因田德胜旅长进军迟缓，惹得张作霖恼怒。因此，田旅长受到电责："该旅长为何迟滞不前，须知军法俱在。"这时田旅长有病，不能骑马，用椅子抬着随军前进。

第二十九师为右翼，师长孙绪昌进驻岱县，指挥进攻。

第三十三旅旅长田德胜为左翼，率所部三个团进攻。

五十四团为军的总预备队，第一营驻下汇村，我带领第二、三两营驻大营镇。除担任驻地警备外，还加紧教育训练。

山西军占据五台山麓，构筑阵地，据险防守，并在阵地前沿，泼水结冰，防止我军接近，双方相持不下。

1927年末，于芷山军长到张作相军团那里去联络。回来说，辅帅（张的字辅枕）讲决定胜负的不在山西军方面，而在津浦线上，我们把阎老西子的军队牵制住就行了，不要做过多的牺牲。军的左翼李盛唐师长，有时也和于军长联系，他的团长唐君尧和我是同学关系，也来过大营镇联系。

据说，在京汉线的张学良军团长，曾先后三次由第一线回到北京面见张作霖陈述意见，要求早日与蒋介石“讲和”，均遭到张的斥骂，每次都是哭着回到前线的。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总司令，国民党编成一、二、三、四集团军，重新分配了北伐任务，在各条战线上对奉军展开了攻势。

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决定从各线上撤退，于5月9日通电停战息争，做退回关外的安排。5月30日，张召集其亲信开会，研究战局形势后，决定下总退却令。

第三十军奉命撤退，以五十四团为掩护部队。我把第一营由下汇村集合到大营镇，迅即到平型关占领阵地，掩护军队撤退。第三十二旅撤退到平型关后，由该旅接替，五十四团沿途占领要点，逐次掩护撤退，经紫荆关、京西芦沟桥而行。渡香河时，尚闻敌人的炮声。到卢龙后，稍事休息，在卢龙学校由杨宇霆召集三十军和炮兵军官们讲话，说的是解决直鲁联军经过。还说直鲁联军向东冲击，在朱各庄战斗，奉军有一名团长负伤。杨是偕同孙传芳去的，由杨介绍孙联帅讲话。孙说了几句，大意是整顿后待机而动。此后三十军由古北口入热河，在平泉、凌源两地住了一个时期，徒步行军到北票乘火车到沈海线朝阳镇下车，待命待编。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1辑〕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回忆

〇荆有岩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笔者在奉军郭松龄旅充任军需，对于经过情况有些耳闻目睹，但知道的还不够全面。今年3月访问曾任郭旅团长的宋九龄老先生，又同当时在第一梯队的李汝舟，在第三梯队的穆文煜，作了回忆和参证。特缕述于次，以供参考。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起因

第一次直奉战争，是北洋时期军阀战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它和国际帝国主义有极为密切的联系。1919年巴黎和会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积极向东方发展，中国是帝国主义的重要市场，英美在华南已攫得优越地位，而华北一向在日本垄断之下，因此形成英美和日本的尖锐矛盾。它们为扩充和巩固对华的侵略势力，都在中国军阀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中国的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抢夺北京政权，明争暗斗，也不惜向帝国主义投靠。英美与曹锟、吴佩孚的勾结，段祺瑞、张作霖成为日本运用的工具，足以说明：帝国主义的矛盾具体

反映在军阀的纷争上。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开始，奉系的张作霖并未直接参加，只以庞大的兵力威胁在直皖双方的侧翼。段祺瑞料到张作霖团河会晤[1]之嫌怨未除，必将趁隙出动。迨7月8日，段芝贵率定国军向保定进发，直皖战争以起。7月12日曹锟、张作霖就联名声讨段祺瑞。7月14日北京附近有战事，双方正在激战决定胜负时，张作霖借口武装调停，驻北京的奉军便向南苑出动，这时皖系的边防军为直军压迫已趋不利，精神上受很大的打击，未几即行溃败。

奉军趁势先入南苑搜缴军械。张作相带一部军队驻南苑十五师师部，派赵椴斋带讲武堂学生10名接收北京东直门里的徐树铮部库房；汤玉麟于西苑接收邹作华等所带的炮兵，还有蒋斌的无线电讯队一队，范浦江的步兵一营。奉军所获不赀，但张作霖犹以为未足。南苑缴械时，邹芬部所获有空军探照灯二只，落入直军之手。张作霖向直方追索甚急，因而引起直系不满。当时曹锟说："张雨亭（张作霖字）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这两个灯还要。"吴佩孚更为气愤。嗣后张作霖和曹锟在天津曹家花园会晤，吴佩孚亦在座。张对吴佩孚不稍假辞色。吴为曹锟的灵魂，刚愎自恃，更加衔恨于张，从此直奉军阀间的嫌隙日深。吴氏对北京政府措施不断干涉，政客张绍曾乘之（张绍曾为吴的亲家，后被暗杀于天津）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张作霖坚持反对，终未实

---

① 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奉总统徐世昌召，入京调停时局。张借调停，窥察直皖两方实力，操纵其间，以收渔人之利。7月3日为压皖系徐树铮气焰，曹锟、张作霖、李纯通电宣布徐的罪状。7月7日晚，徐假段祺瑞名义招张至团河会晤，拟不利于张。张至，知事不妙，要段送出，急驰而去。徐一计未逞，又拟令廊房驻军截击；张得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赴津，幸免于难。后来张回奉时，甫下车即慨叹云"我又回来了"。

现。由于张、吴的相忌，矛盾日益加深。

1921年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奉军驻京司令，在张、曹之间不断奔走，尚能苟安一时。是年4月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奉内阁总理靳云鹏之约赴津。王占元为抵制吴佩孚势力向南扩展，曾和张作霖潜结于前，三使在津会议实系共谋分配权益，于是曹、张、王三角均势以成。又加吴佩孚远处洛阳，因而直奉情势较为和缓。乃为时不久，湘鄂、川鄂战事勃起，吴佩孚率师南下连胜湘、川，遂取王占元而代之。这时吴佩孚势力奄有中原以及长江上下游，三角均势遂破，奉系对之自然不洽于怀。张作霖乃南结孙中山，北与段祺瑞复修旧好，成立孙、段 张的三角同盟，以对付直系的扩张。张作霖复拟以张作相代田中玉为鲁督，以便南与段派的上海何丰林、浙江卢永祥联成一气。乃竟事成画饼①，张、吴之间矛盾日形尖锐。

是年12月，张作霖拥旧交通系梁士诒为内阁总理，安福系亦趁机抬头，政客策士视军阀为工具，不惜煽动其间，张、吴敌对形势日益险恶。梁在华盛顿九国会议时，与日直接磋商山东问题，对赎回胶济路表示让步。吴佩孚于1922年1月5日通电，指责梁士诒为“卖国媚外”②，迫其去职。张作霖以吴干政过甚，乃向曹锟提出：吴佩孚撤出洛阳，赴武汉就两湖巡阅使，免去直鲁豫副使（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职，梁

① 鲁督田中玉属北洋系，与曹锟很接近，去田，曹不同意。

② 华盛顿9国会议，中国三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正廷，力争筹款赎回胶济路，12年分期付款。英、美有支持意，日政府不同意，令驻中国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当时内阁总理梁士诒答小幡时有这样几句话：“中国对于胶济铁路，无借款铁路以上的希望，只要能将该路变为借款铁路，中国已甚满足。”洛阳吴佩孚起而反对，有支电谴责梁士诒，“罪莫大于卖国，祸莫次于媚外”。梁以微电剖白；吴复有歌电详申其罪状。梁又以虞电驳吴，而吴又发庚电，矛盾愈演愈尖锐。

士诒、叶恭绰、张弧三长始能下台。而吴则谓，如张离开沈阳，前往库伦或恰克图就蒙疆经略使，我即辞两湖巡阅使亦无不可。双方各逞意气，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为战争的导火线。

奉军作战的全面部署

1922年春初，张作霖召集部下将领，商议对曹、吴作战问题。当时内部意见不统一，张景惠、张作相均不主战。张景惠认为奉军力量不能掌握北京全局，不如捧曹为首，自居实力地位。杨宇霆、张学良主战最力。张作霖最后表示决与直系一决雌雄。但张景惠犹竭力奔走沈、保之间，弥缝两方恶感，以此为张作霖所不快。张作霖指示：西路军事由张景惠主持。张景惠回京后和战不定，犹豫未决，遂构成后来奉军西路战事不利的因素。张作霖既决心主战，乃于1922年3月编组军队开始军事行动，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孙未随军前进，留沈代张坐镇），杨宇霆为参谋长，王树常为参谋处长。此外，总部设有军需、军医、副官、牒报、密电、交通、文书、运粮等处。令王大中组织总兵站，王宗承组织野战医院。各部队均于4月中旬到达指定地点。总部设在军粮城。阵容分为西、东两路，沿北京西南长辛店迄固安、永清、天津迤西信安镇以达静海、马厂，进取京汉铁路，围攻直军大本营保定，战线长达240余里。另外，令张宗昌编补充队，下设五个队，以陶佐臣、刘俊卿、单玉龙、于振东、阮世英等分任队长，每队1200人。

（甲）西路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长辛店，分为三个梯队，所指挥部队为：

第一梯队司令张景惠兼，率其直属部队暂编奉军第一师。

第一旅旅长张乐山　　芦沟桥

第二旅旅长梁朝栋　　长辛店

第二梯队司令邹芬，司令部在西苑，率领其直属部队陆军第十六师。

第三十一旅旅长缪承良

第三十二旅旅长齐占九

第三梯队司令郑殿升，司令部在通州，率领部队为：

1. 郑殿升直属暂编奉军第二混成旅，由东明开赴通州。

2. 牛永福的暂编奉军第九混成旅，驻通州。

对方直军主力在琉璃河、固安一带，以王承斌为西路总司令。配属有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冯玉祥的第十五混成旅李鸣钟部、张克瑶的第一混成旅、吴佩孚的第三师一部。

（乙）东路军分为三个梯队，直隶于军粮城总部。另外附以骑兵集团。

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司令部设永清，所辖部队有：

1. 张作相的陆军第二十七师

第五十三旅旅长赵明德

第五十四旅旅长李振声

2. 张作涛的陆军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五旅

3. 鲍德山的暂编奉军第六混成旅

4. 作战中增援的齐恩铭暂编奉军第五混成旅

对方直军主力在固安、牛头镇一带，属西路直军总司令王承斌指挥，计为董政国第十三混成旅、彭寿莘第十四混成旅、孙岳第十六混成旅。

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司令部设信安镇，所辖部队有：

1. 张学良的暂编奉军第三混成旅

2. 郭松龄的暂编奉军第八混成旅

3. 蔡平本的暂编奉军第四混成旅

对方直军主力在田家口、胜芳一带，为直军东路总司令张国鎔的二十六师一部，吴佩孚第三师一部，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四十七旅。

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司令部设马厂，所辖部队有：

1. 李景林的暂编奉军第七混成旅

2. 阚朝玺的暂编奉军第一混成旅

3. 汲金纯的第二十八师骑兵第二十八团

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参谋长常荫槐，所率部队为：

1. 张荣的奉军骑兵第一旅

2. 张奎武的黑龙江骑兵第二旅

3. 王永清的巡阅使署卫队骑兵团，配属独立机关枪连。

骑兵的使用方向，为东路第三梯队的左翼，在大城、青县之间。

对方直军主力在大城、沿子牙河、津保汽车路之线。为直军东路总司令张国鎔的二十六师一部，葛豪第十二混成旅，张福来第二十四师一部。

至奉军运输最繁忙的期间为1922年4月上旬和中旬。我们第二梯队的三、八两旅于4月12日开始出动，每旅先领开拔费奉大洋两万元。张学良、郭松龄于4月17日动身。笔者当时是八旅一团三营的军需长，我们这一营（营长是霁云），是4月18日出发，五、六百人恰好占一个列车。全旅在天津西杨柳青下车。

奉军两路作战的经过

一、奉军西路作战及溃退情况

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对直军作战无决心。由奉天回到北京，对军事未作准备，仍时常和直系军阀首脑相往还。1922年4月中旬，东路各梯队已到达指定地点，张景惠才开始作部署。等到张作相到达落垡车站和他联络军事情报，前方情况已显得紧张。这时他才将司令部进驻长辛店，在军事行动上已落后直军一步。4月28日夜战事开始，由直军先行进击。张景惠于29日上午方乘车出京，到前线指挥。直军向奉军右翼迂回，在良乡、长辛店间的南岗洼发生激战。琉璃河直军亦趁势猛扑，奉军陷于苦境，不得已后退。张景惠率卫队60人督战，始得恢复旧有阵地。当时在长辛店车站附近有预备军队及炮兵，多数尚未参加战斗，一时呈现混乱状态。

29日战斗，张景惠第一师的张乐山旅及朱益清的骑兵团迎击直军，一鼓作气，迫使直军后退。30日梁朝栋旅战斗不力（有谓梁朝栋阵亡），邹芬第十六师驰援。邹师由蒙古刚刚调回，马上开赴前线，深感疲于奔命，士兵颇有含怨情绪。邹芬受有微伤，由前线运回，一时军心大为动摇。缪旅长看军队不战自退，畏惧自杀。另一部哗变，向张景惠的第一师阵地发炮乱轰。奉军受此影响，不能支持，乃退守芦沟桥。直军于30日夜占领长辛店，奉军郑旅、牛旅在丰台至南苑以南一带激战。旋直军李鸣钟部由京西北大灰厂、三家店、门头沟绕奉军侧背，吴佩孚又增新兵力由榆垡冲击奉军，至5月4日奉军西路全线陷于总崩溃。第九旅旅长牛永福潜逃；张景惠由前方徒步逃至南苑，王怀庆派车接至北京卫戍司令部。西

路战事仅有一星期即告结束。

张景惠与张作霖本为庚子时期在八角台合柱的结义弟兄，关系至为密切。以主和不遂怏怏不自振奋，影响军心。及退至芦沟桥、丰台实力尚在，乃竟弃军而去，谓其背叛张作霖，不为言之过甚。后来战事结束，他仍寄居北京，未回奉天。曹锟优礼相加，贿选登台后，发表他为全国国道督办，月给经费两万元。

二、奉军东路作战及退却情况

第一梯队

东路第一梯队的部队除鲍德山的第六旅原驻廊坊外，他如张作相、张作涛的部队均于4月中旬在落垡车站集合，分赴前方阵地，其主攻地点为直军重心的牛驼镇（即牛头镇）。这一梯队军队的素质和西路张景惠的部队相等，缺乏训练，疏散成性。尤其二十七师为张作霖发家的亲兵小队，关于物资补给一向充实，而军事训练、精神教育则较差。因此，在战斗初起时，即纷纷叫喊兵力单薄要求增援。该梯队原计划以主力占领固安，奈以西线不利的压力骤显紧张。张作相向总部要求补充兵力，总部派齐恩铭旅增援。在战斗间，第一零六团团长齐大有连报右翼紧急，张作相派少校参谋张佐忱前往督饬，回报齐大有正在阵地吸食鸦片。这一梯队的伤亡不大，而告急报告则如雪片飞来。一些部队长官出身差弁，无军事知识，升官以来，生活优越，一见敌军，纷纷自保，欲其不败是不可能的。

5月4日张作霖率参谋于国翰等乘专车到落垡督战。第一梯队后勤联络员李汝舟驻在车站，张与张作相通电话，两手颤动，切齿愤恨地说："辅忱！叙五退下来啦，你怎样也不能退。你要退下来，我们梦里见吧！"将电话放下又说："我

到西路去。”专车开到廊坊，先将机关枪放在站上。其时铁路已断，廊坊以北 6 里许的铁桥已拆毁不能前进。郑殿升旅的营长萧国庆（别号萧老帮子）向张跪请勿再前行。张作霖怒愤之下，一脚将萧踢倒在地；但他的专车却退回，过落垡未停，即直驶军粮城而去。

此际，张作涛的五十五旅由落垡前进，距直军尚有 60 里，前方战事不甚剧烈，伤亡亦不大，梯队参谋长熙洽即作退却准备。齐恩铭旅增援到来，因畜力不足，以人曳炮车，行动颇为迟缓。

驻廊坊的鲍德山旅不听指挥，竟而按兵不动。当前方酣战之际，鲍着大礼服，戴长缨帽，率差弁数十骑，往梯队司令部见张作相。张怒加以斥责：“什么时候，你还穿大礼服来见我。”鲍不悦，返回廊坊仍未行动。张作相令参谋刘伟去鲍处送命令，告以右翼责任重大。鲍说：“什么责任，什么命令，扯王八蛋。”刘伟无可奈何，复命。后鲍为张作霖枪毙于狱中。

第一梯队由于内部恐慌、西路溃败的影响，战斗意志不强，而直军又把攻打西路的兵力转移到这方面来，张作相感到压力更大，于是全线撤退。在撤退时未与其他梯队联系，亦未得到军粮城总部的指示。5 月 5 日午后 3 时，张作相偕参谋长熙洽、稽查处长杨宝山，参谋刘伟、朱继先、傅鑫等退到落垡。这时第五十三旅旅长赵明德到来，向张作相陈述兵力单薄、援军不到的苦况。张作相听了，指示后勤联络员李汝舟说：“大帅打电话你都听见了吧！赶紧要车，将军佐等非战斗人员和军需装械不好携带的东西运回奉天。”李说：“步兵、骑兵可以由这方面撤退，重武器怎么办？不如用火车运回，我可以向铁路局长唐文高要四列车，在拂晓前 3 点左右到来。”熙洽不同意。晚 7 点孟昭田的炮兵第二十七团撤退到落垡，炮

车拥挤在站台上，到12点才撤退完毕，由杨泽新的骑兵第二十七团为掩护。夜半张作相带他们向东退去。

翌晨唐局长派来的列车到落垡。李汝舟通知非军事人员登车，并将军需物品装上。军需处长王鸿宾、秘书处一等书记官荣梦枚、李华亭随行。车开到军粮城，张作霖已退滦州，遂又直驶滦州。

第一梯队撤退时，第一零五团团长阎玉成防守永清以北的永定河堤岸，警戒固安方面直军，未得张作相的撤退命令。阎得知全部退去，一时情急，带队抢上火车，先达滦州。在火车到站时，又和张学良车争先进站。张作霖见其先退回，未随同张作相在一起，认为不服从命令，将阎就地枪决，其混乱情况如此。

第一梯队撤退时，直军并未追赶，所以部队大致尚称完整。张作相率部队经丰润、玉田、宝砥、遵化出喜峰口，经过热河到绥中县集结。但部队的纪律很坏，任意向村镇征发粮食，强拉人民牲畜，勒索金银首饰，翻箱倒箧，洗劫一空。有的脱离队伍，为热河地方联庄会枪击，伤亡或失去下落。因此到绥中后，需要补充整编，未参加山海关防守战，事后调驻锦州东大营。

第二梯队

东路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指挥原有部队三、八两旅及蔡平本的第四混成旅，一切部署多由郭松龄计划，4月中旬分别由铁路输送到天津西杨柳青、韩柳墅一带，下车后赴前方指定地点。梯队司令部设在信安镇，三旅司令部在王庆坨，八旅司令部在唐二里，四旅为预备队。主攻地区为直军据点田家口、胜芳之线。直军吴佩孚对这路特别重视，除嫡系精锐第三师的一旅及一营外，于5月4日又将西线王承斌 的二十

三师调来，以压迫奉军。他还自乘汽车督战，进攻信安镇。吴对部下说："打孩，娘出来。我痛击张学良，看张作霖出来否？"

这天两军相接触，骑兵先在煎茶铺小有冲突，不久吴的大队接踵而至。郭松龄带第三旅迎击（时郭代张学良指挥第三旅，三旅参谋长王兴文指挥第八旅），战斗至为激烈，第一团团长李长荣负伤。第二团团长崔宝山畏敌坠马，伪称负伤，鏖战情况，可想而知。时第三旅在右翼，第八旅在左翼，四旅殿后，对直军取包围形势。吴亦针锋相对，用反包围策略，阵势互相纽绞，两军反复纠结，不相上下。八旅一团团长温瓒玉、二团团长宋九龄亦皆负伤。第一团第二营营长阵亡，由连长补充。第二营四个连长，第五、六两连连长接充后相继阵亡，七连连长不敢接，后由第八连连长廖弼臣接充，这时战况稍稍稳定下来。奉军的炮火优于直军，直军的伤亡更为严重。

张学良将梯队司令部进驻唐家铺，遭受直军骑兵的袭击。他站在梯队部的房上指挥，令梯队部的卫队及幕僚（全部不足 200 人）散开迎击。梯队参谋长萧其萱令行李车后撤，职员亦有奔逃者，适敌骑来骚扰，但未到唐家铺。张指挥时谓从者曰：战事危急，我能动乎！宁死于此，亦不复动。张不满意萧指挥行李车后撤，而众以主将不去，皆坚忍支持，终于将来敌击退。嗣张令梯队部撤回信安镇。次晨大风，两方阵势无甚变动。午后直军由信安镇西南之田家口前进，奉军连发巨炮，屡进屡击，歼直军千余。

张、郭料吴军来袭，必在胜芳、崔庄之间，乃乘夜以两旅伏唐家铺左右。5 月 3 日拂晓，直军果由胜芳突进，至唐二里地方伏发，将直军冲断，直军退守胜芳、崔庄。在信安镇西北的直军，不敢取道田家口为胜芳应援，只有在张庄进攻。

围困胜芳之奉军，分兵将张庄直军击散，仍回攻胜芳。4日晨，胜芳、崔庄同为奉军攻下。直军在信安镇以南者被扫荡殆尽，直军又有一团来援，亦被击散。是役掳获直军大炮及炮弹甚多，王承斌的二十三师为奉军八旅的正面，已溃散不能成军。

当时我随军至距胜芳东北5里的一个小村，在一个里巷的墙隅，见有数十个直军尸体。多系依墙坐死的，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据说是全连正在退下休息，为炮弹所击中，大军仓皇退走，无人掩埋。吴佩孚痛恨奉军炮兵，标出赏格，能得奉军一炮兵者赠2000元。作战以失旗为大辱，此役奉军夺直军大旗四面，又俘其官兵甚伙。吴佩孚临阵用机枪督饬士兵，退者立毙。并大肆宣传，调奉军对来降者皆铡之。因此直军士兵不敢退亦不敢降，死伤之多，实由于此。

当唐家铺大战之际，奉天盛传张学良负伤，且见诸报端。张作霖令韩麟春（时韩在京任陆军次长，尚未回奉天任事，第一次直奉战结束始任兵工厂督办）、张敬尧偕同日本顾问本庄繁赴信安镇探视，并商洽军事。遂决定突击一点，于突破追击，中途撤退。韩、张等稍事停留，即赴军粮城总部，军事统归郭松龄指挥。

奉军乘胜向霸县追击，直军退霸县作防御阵地。我旅即在距霸县不远的前进途中后撤。虑沿京奉铁路撤退，受天津杨以德警察部队的威胁，遂决定由北仓、河西务走玉田、宝砥、遵化出喜峰口，并沿途观察形势。到河西务派上尉参谋吴荫棠化装和尚赴滦州探听总部消息。

第二梯队的撤退，是正在胜利追击中的转进，一切部署比较从容。在撤退途中，军纪整肃，照四路纵队队形行进，秩序井然，除军需副官采购物资外，一律不得擅离队伍。经河西务时一部行李车为王怀庆部队所袭击，粮食物品略有损失。

第三旅军需官周长魁离队先行，在热河途中为联庄会活埋。此外一切行军都称顺利。但人民见军队到，都惴惴然如大祸来临。郭松龄乃通令官兵不准离开队伍，以释群众恐惧。我们部队到遵化休息 3 天，粮食用尽，进行采购。前派探听消息的吴荫棠已归来，知张作霖在滦州，于是转道榛子镇、永平、迁安至滦州。

第三梯队

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率所部第七旅及阚朝玺的第一旅，汲金纯师的骑兵二十八团，张奎五的黑龙江骑兵第二旅。梯队司令部设在马厂。

对方直军为东路总司令张国鎔的第二十六师，葛豪的第十二旅，张福来二十四师的一部，主力在大城。战斗阵地在子牙河两岸。

第三梯队军容整肃，团营长李埬凯、张宪、窦联芳都能独当一面。4 月 27 日午后 2 时，直军张国鎔以第二十六师及补充旅一团向奉军攻击，三面包围马厂，势甚猛烈。奉军经调第七旅一、二两团及第一旅缪团、骑兵各营，在姚马渡原地抵御。适奉军大队骑兵赶至，内外夹击，激战一昼夜，张国鎔向大城溃退。斯役直军伤亡数百，被生擒者数千，奉军稍有伤亡，惟第一旅缪团长右臂略受微伤。

姚马渡在子牙河岸，这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全线开始的战斗，也是奉军胜利的战斗。张作霖于 4 月 28 日由奉天进驻军粮城，得此旗开得胜消息，非常高兴。他认为李景林是奉军军官中第一健将，特记大功一次。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第三梯队在大城、青县一带与直军激战，不断获得胜利，迫使直军张国鎔部退守津保汽车道。5 月 4 日西路奉军败耗传至，李率部队先退独流、良王庄。再东退时为直军优势兵力所追

击，颇有损失。但终能整理队伍抵达滦州，6月上旬，李景林第七旅转赴抚宁、临榆一带，和张学良、郭松龄、蔡平本的三、八、四旅共同作保卫榆关的战斗。

骑兵集团的张奎武旅于姚马渡之役，参加战斗夹击直军，颇著功勋。此后大部骑兵在撤退时，于天津附近除王永清团能得完整外，其余多为直军所击散。回奉后，骑兵旅长张荣愤郁以死。

山海关据守与和议

第三梯队李景林部先于第二梯队到达滦州，遂即受命赴抚宁、临榆迤北一带构筑阵地。我们第二梯队因绕道遵化，且停留3天，到滦较迟，及到滦州未令停留即转赴留守营以东，沿北戴河东边的石河构筑阵地以迄于海滨。初奉军总部拟在滦州、昌黎之线整顿队伍，以期再战而决胜负，时海军司令杜锡珪、第一舰队司令蒋拯等通电助直讨张，率海筹、海容、晋安、楚有4舰北上，以扼奉军退路，奉军颇受威胁。张宗昌所带的便服军亦不得在山东登陆，张作霖遂放弃滦州、昌黎之线，而退守榆关以西的险要阵地。奉军总部撤到绥中。原第二梯队的三个旅在榆关阵地的部署是：第四旅靠海滨北戴河，第三旅居中，第八旅在右，临石门寨和李景林阵地相接，为南大寺、临安镇、石门寨、深河驿之线。布置就绪，复将北戴河以西的京奉铁路第88、85两号桥拆毁。6月初，直军的王承斌二十三师、彭寿莘第十四混成旅，亦即追踪而至，并占据昌黎、留守营、卢龙三处。

6月上旬两军时有接触，但无进退，亦无剧烈战斗，仅一次出击中，参谋长王兴文转任团长，于战斗间阵亡。又于夜

间或拂晓听到枪声，以为直军出击，后经侦知直军用鞭炮置于煤油桶内燃放，以诱惑奉军消耗子弹。奉军如法炮制，夜间枪声大作，及晓而止，真可谓恶作剧。

这时双方均无进攻之意，吴佩孚甫战胜奉军，即有赵倜、赵杰5月5日河南之变①，纵为时甚短遂行平定，而忙于善后，未遑再战，乃将东进军事委之于王承斌。王承斌认为张作霖仍拥有实力，未可计日取胜，意在主和。奉军以新败之余，急需调整充实，据险以守乃为上策。因此“和议”成为直奉双方共同的迫切要求。

初，5月上旬盛传张学良负伤，张作霖乃令他回奉以安人心。张学良为奉天青年会的名誉会长，与英美人多有联系，希望他们出来调停。奉天英国传教士德康脱尔·杨克及奉天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普赖德，在英美两总领事的赞许下，跟开滦矿务局总办英国人聂赛一起，会同直奉双方进行和谈。同时，奉方与王承斌接近者，亦以乡谊关系周旋其间。和议之事告成。

先，直方提出要求：奉方不得在山海关40里内驻军，后经谈判放弃这项主张。遂于6月15日实行停战。16日中午12时由英人聂赛为中介，张学良与王承斌会晤于秦皇岛车站。17日奉方以孙烈臣、张学良为代表，直方以王承斌、杨春芳为代表，假秦皇岛英国军舰喀尔号为会议地点，正式签订和约。直军即从秦皇岛向后移动，奉军亦于21日完全撤到山海关以外。和约重要的条款是：

1. 直奉两军为维持大局，统一国家的目的，双方同意罢

---

① 赵倜时为河南督军，倾向奉系。姚马渡之战胜利，张作霖要他在直军后方发动。后听传说，吴佩孚战死，以为机不可失，与其弟赵杰出兵攻郑州，为冯玉祥击败。

兵。

2. 奉军自6月18日午前9时撤去前线阵地。

3. 奉军于6月19日午前6时撤废二郎庙迤南阵地。直军则于午前5时集合于后方留守营。

4. 直奉两军自20日午前6时开始撤退。

5. 直奉两军自开始撤退起，3日内完全撤竣。

6. 双方自签字后，若某方部队有不本此规定而自由行动者，则此方之签字人员须负完全责任。

（孙烈臣、王承斌、张学良、杨春芳署名）

6月24日奉军驻榆关、热河方面的军队完全撤出，以齐恩铭旅驻绥中，裴春生旅驻兴城。设兴绥驻军司令部，以姜登选为司令，以备直军。直军于7月4日大部随吴佩孚回驻洛阳。以彭寿莘部扩编为陆军第十五师留驻滦州，以防奉军。至此直奉第一次战事乃告终结。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第二次直奉战九门口战斗的回忆

○ 荆有岩

九门口战斗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当时我充任奉军第三军第六旅军需官，参加了这次战役，有一些亲身经历和见闻。今春到锦州访问宋九龄老先生，又作了共同回忆。现在把它写下来，以供各方面参考，并求指正。

一、战争的原因和双方的阵容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得胜利，曹锟、吴佩孚为巩固北京政权，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迷梦，首先要消除张作霖之势力，以免后顾之忧。乃于1924年9月陈大兵于山海关，以彭寿莘为总司令，作主攻部署，是为第一路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出朝阳，是为第二路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出赤峰，是为第三路军。吴佩孚自为讨逆军总司令。除彭寿莘部队原驻扎滦、榆一带外，其余各军同时出发。奉系军阀张作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企图东山再起，整军经武仅有二年，力量尚未充实。就军队数量而言，相去直军甚远。但

大敌当前，为雪战败之耻，不能不出而应战，于是把三省军队编组为六个军：

第一军正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辖裴春生第四混成旅，赵恩臻第十二混成旅，齐恩铭第十六混成旅。

第二军正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辖李景林第一师及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进军朝阳、凌源之线，出冷口。配属空军一个队。

第三军正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辖张、郭的直属部队第二、六两混成旅（二旅旅长温瓒玉，六旅旅长宋九龄）。另外有张所率领的二十七师（欠一旅）。

又组成第一、三联军司令部，攻击山海关正面至九门口迤北之线。配属空军两个队。

第四军正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辖张作相所部吉林一师（第十旅李杜，第二十六旅李桂林），汲金纯二十八师一个旅，配备一、三联军，驻兴绥一带为预备队。

第五军正军长吴俊升，副军长阚朝玺，辖吴俊升的二十九师及张明九第十七旅，阚朝玺第一旅由西喇木伦河东岸进军开鲁、赤峰之线出承德。

第六军正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辖穆春、于芷山、王永清三个骑兵旅，协同第二、四军进朝阳、赤峰之间，出建平、平泉之线，威胁直军侧背。

直奉军阀双方阵容部署大致如此。在战争过程中，实际只有山海关方面和冷口、界岭口方面两路有激烈的战斗。奉军第四、五军均与敌接触不大。尤其第四军为预备队，系防止海上直军登陆，故未得直接参加战斗。张作霖利用冯玉祥与吴佩孚的矛盾，策动冯玉祥班师，发动北京政变，使吴佩孚遭到摧毁性的打击而惨败。两方使用兵力：奉方计 4 个师

及13个旅①，不足15万人；直方计11个师1个团、11个旅②，约在20万人以上。奉军的两路战场，自战事开始以来，即采取主动攻势。直军方面则初用攻势后改攻为守，更由守势转为溃退，以至一蹶不振。

二、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九门口的形势

直奉军阀双方都以其精锐主力部署在山海关一带。奉军第一、三联军乃张作霖父子所亲自统驭编练的部队，是奉军的精锐。第一军由学识、经验俱长的姜登选、韩麟春为统帅，配属有裴、齐、赵等旅，虽系旧派军人，但都能为张氏效命，服从指挥。第三军为张学良、郭松龄亲手编练的新派军队，第二、六两旅及二十七师尤属精良。所以第一、三联军是奉军的最精锐部队。其布阵属于第一军者自榆关北的角山寺，经九门口，至荒山口迤北，迄义院口之线。属于第三军者有温瓒玉第二旅，自角山寺南向，经二郎庙、姜女庙、红墙子迄铁道之线；宋九龄第六旅自铁道南向，经606高地，俄国兵营，迄海岸姜女坟（在海滨）之线。第二、六旅的野炮团邹作华团长（二、六两旅部队向系联合指挥），设观测所于姜女庙；配山炮营（营长金镜清）于宋旅。二、六旅的重炮团陈

---

① 奉军李景林一师，张学良二十七师，吉林张作相一师，黑龙江吴俊升一师及两个旅，阚朝玺混一旅，温瓒玉混二旅，张宗昌混二旅，裴春生混四旅，齐恩铭混十一旅，宋九龄混六旅，赵恩臻第十一旅，汲金纯二十八师一个旅，骑兵三个旅。

② 直军山海关方面：彭寿莘第十五师，吴佩孚第三师一个团，张治功陕二师，冯玉荣混十三旅。吴佩孚增援部队，靳云鹗十四师，张席珍第三师第六旅，杨清臣二十四师。张福来增援部队，曹瑛二十六师，田维勤混二十六旅，程希圣新编第一旅，河南省军李治云第一旅，林起鹏第二旅。直军冷口方面：王怀庆十三师，董政国第九师，阎治堂第二十师，时全胜混十四旅。直军界岭口方面：王维城二十三师，胡景翼陕一师，葛树屏混十二旅。直军古北口方面：冯玉祥一个师，三个混成旅。

琛团长，配属于第一军作战，二十七师高旅为第三军预备队。1924年9月初布置就绪。笔者当时充任第三军第六旅军需官，随同旅长宋九龄，经火车运输部队，由沈阳至高岭站下车，前进后设旅司令部于万家屯，距山海关19里。一、三联军司令部位置在前所。

直军方面在山海关战线的第一路军是吴佩孚的嫡系部队，这军的总司令彭寿莘，也是直军中久经战阵的名将。山海关两翼为彭寿莘的第十五师，其第三十旅旅长郭之桢在榆关南侧，面对奉军宋旅；其二十九旅旅长郭敬臣在榆关北侧，面对奉军温旅。直军第十四师靳云鹗的一部，在二郎庙、角山寺，面对奉军温旅、裴旅。直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在九门口、荒山口，面对奉军裴旅、齐旅、赵旅。此为山海关直奉两军主力布阵的大致形势。

三、战斗初期已有破竹之势

战斗序幕首先在热河揭开。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部，一路由北镇经义县入热河；一路由东北边境转入热河，迂回长城东北的冷口、界岭口，路途遥远，势必先发。1924年9月13日，在热河朝阳寺一带开始接触。热河地方军队为老毅军米振标部，素质极差，毫无战斗能力，稍作接触，即节节退却。因此，奉军以破竹之势，于10天内，占领朝阳。张宗昌带一部由白俄组成的军队行动迅速，随进随即收编，军队的声势愈大。同时，奉军第五军黑龙江部队亦占领开鲁，进趋赤峰。9月末，李景林、张宗昌占领建平、凌源，其先头部队抵冷口附近，奉军对直军大包围的形势已成。

山海关方面的主力战斗，起初奉军动手较晚，有利地形

为直军彭寿莘所据①。彭寿莘凭倚雄关，以山势之峻，长城之险，居高临下，严阵以待，可攻可守。奉军初拟在山海关以东30里前所一带构筑阵地，诱直军出击，一鼓而歼之。所以我旅初开到时，即在高岭站下车，嗣改变计划，逼近山海关构筑阵地，遂将旅司令部设在万家屯。山海关战斗，两军自9月28日夜开始接触，29日夜至30日晨，奉军占领了直军阵地以东2000米的敦台、龙王庙、黄场子、杨家庄等高地。此后，在第三军方面动作不大，主要是巩固阵地，以防直军出击。在第一军方面，为争夺九门口入口处的高山山口作为立足据点，一开始战斗就很激烈。在九门口东口入口处2里许，有一独立山峰，形势险要，经强行袭击后占领。随后裴旅占领九门口东口北首的鹦鹉山，以南首的蛇山子。于是，奉军在九门口的东口占得立足据点，对这次激战取得胜利有重大意义。

10月6日夜，奉军第一、三联军全线出击，战斗至为猛烈。时笔者随六旅司令部进驻距海5里的李家寨。夜间枪声密集，迫击炮与海潮齐吼，真是震撼山岳，响彻云霄。天明稍息，继之以炮战，隆隆之声震耳欲聋，难作细语。奉军炮火优于直军，遥望直军阵地烟尘弥漫，遮天蔽日。7日夜，奉军占领小河口、石门子、无名口、黄土岭、九门、贺家楼、俄国兵营、姚家山之线，迫使直军在九门口以南者放弃长城外两道阵地，退据关上。但直军退到关上以后，凭借长城，高沟深垒，阵地巩固，继续激战数日，奉军未能越雷池一步。直军飞机在上空飞翔，一日向六旅司令部李家寨投弹，除炸毁一民间柴垛外，一个小孩被弹片将鼻、眼揭去，血肉模糊，惨

① 奉军方面的山海关有利地形为在关内十数里，北戴河迄柳江矿间的石河以西阵地，即第一次直奉战奉军所据守之点。

不忍睹，不久即死去。

10 月中旬，第一军方面已突进九门口，占领荒山口。郭松龄为在山海关作正面突破，以利于速战速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命宋九龄旅长选精兵千人，组织敢死队，以十八团团长刘翼飞为队长，猛袭山海关南侧临海之线直军五眼城阵地。10 月中旬某日拂晓开始攻击，手枪与白刃交织，终以直军火力旺盛，死伤过多而止。此后宋旅长亲自督励战士，由海滨轮番突击，亦未能得手。在第二旅方面，于 10 月 10 日攻入三道关，一度在二郎庙、角山寺之间，攀越峻岭，袭击山海关背后最近之山口，亦旋即退回，而角山寺阵地仍为奉军所固守。自开始至此，激战约在半月以上。第一、三联军全线迄未稍停，火线上部队由预备队轮流替换，补充队随时补充。伤兵运送拥塞于途，绥中、前卫一带布满野战病院。虽然如此，奉军气势尚相当旺盛，久攻不下榆关，亦未显出气馁。彼时，郭松龄在前方奋臂疾呼，姜登选只铺一毛褥夜宿战壕督饬奋战，齐恩铭则仅着一汗衫，提鬼头刀在后督阵奋战，张学良亦在前方鼓励士气。这就是山海关正面奉军战斗的初期概略情况。

四、姜登选与郭松龄的龃龉

10 月中旬末，山海关正面奉军与直军形成相持局面，奉军数次猛攻未下，而直军亦无出击意向。在九门口、荒山口方面第一军已占领九门口过半，推进到口西部沙河寨。在推进当中，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争夺的，响水、猪熊峪都有激烈战斗。战斗进入白热化的地步。此时直军方面第十三混成旅已溃败逃散，旅长冯玉荣畏罪自戕于獾子营。第一路军总

司令彭寿莘移总司令部于石门寨，亲自督励陕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功反扑九门口内的猪熊峪。10月18日午前绕过石门寨后山的赵恩臻旅潜至石门寨西南地方黑山窑。这时吴佩孚的援军第三师自秦皇岛登陆，拥有兵力三个团，炮七八门，进行猛烈反攻。赵旅四十六团团长窦伦阵亡（窦系由二旅三十九团一营营长升任团长）。直军增派优势援军，九门口的战斗愈益紧张。

10月22、23日前后一个晚间，奉军第一、三联军首脑会议席上，郭松龄主张突袭九门口。姜登选以第一军裴、齐、赵旅已收到得大战果，不同意郭将山海关正面部队调出转用于这方面。两人争执不下，竟至发生口角，涉及战斗间人事调换的问题。初，二旅的炮兵陈琛团配属于第一军，在九门口作战。营长阎宗周素与陈不睦，战斗间陈谓阎作战不力，报告于姜、韩两军长，遂被撤职。阎乃述苦于郭；郭怒，以陈为郭部，亦下令撤陈职。前嫌未释，会上郭、姜争执互不相下，奉军内部派系矛盾即有所表露。盖姜、韩为日本士官系，与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接近；而郭为陆大系，在将领中也有一些同学。陈琛系士官出身，郭疑其与姜、韩合。阎宗周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所言亦易为郭所听。因此，在会议间，郭不顾张学良的劝解，竟致拂袖而去。姜向张言："茂宸此举，有犯军法。"

是夜鸡鸣时分，郭松龄率刘伟等数骑到宋九龄旅部，面带不悦之色，令宋负责指挥军队后撤，阵地由高维岳旅接收。少顷，郭同刘伟等数骑向后方而去。宋即布置军队，作背进移动，高旅亦迅速前来接防。晨八九点钟，张学良急骑而来，嘱部队停止移动，并问郭何往。宋指示方向，谓已去二三十里，张急追去。宋遂集合队伍在沟中和隧道中休息。郭去，行

约十数里即停止，坐大树下，刘伟等方在劝解。张学良追至，两人见面痛哭，经张挽回，回到宋九龄旅部。休息用餐，时在午后4时左右。张责郭："你搞的什么事，我应当打你嘴巴。你若不是我哥哥[①]，一定狠狠打你一顿。"郭默默无语。张遂去南山汲金纯师部。

五、奉军突袭九门口成功

张去后，郭、宋会商指挥军事问题，决定亲自率领第六旅三个步兵团、一个山炮营，向九门口急进。宋带范浦江、刘翼飞两团及金镜清山炮营在前；郭带刘震东团为预备队随后。夜间行军，白日休息。次日晚抵九门口山下。当时九门口内前线在沙河寨，裴旅在口内南侧山上，齐旅在北侧山上。27日夜宋旅到，裴、齐两旅让开九门口一条路，裴旅向南山推进，到里峪、外峪、响马峪压迫刺儿沟敌 人。齐旅在山北侧，向西北推进，绕石门寨后背。赵旅于10月21日占领石门寨右翼距山海关铁道5000米的安民寨。九门口是一个长压腰葫芦形的山口，纵深有20多里，中有石河，宽阔处如响水、猪熊峪、沙河寨等处只有几户人家。两侧高山峰峦重迭，断崖峭壁，状如剑阁，而比剑阁洞路为长，山炮勉可通过。炮弹需马背运行，一马只运4弹，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入之势，实为军事重地。时在重阳节后，深秋霜月与山上青松、岩间红叶相映衬，加以响水滴泉，美丽清幽无比，行军至此真是别有天地。郭令军队于晨4时突击九门口、沙河寨敌人。宋旅长于3时即作好突击准备，笔者随后催运给养、弹药。战斗

① 郭松龄与张学良有金兰之谊。

开始即异常激烈。裴旅运输伤兵的担架不绝于途。九门口入口处并不宽阔，停放裴旅两个阵亡官长灵柩，余暑未消，臭气熏蒸，令人难以通过。

当郭松龄于军事会议后闹这套把戏时，军队集结沟内和隘道甚众，阚旅接收阵地，人声不无嘈杂。直军侦察认为奉军增加正面兵力，把注意力集中在山海关的防守，而忽略了九门口的实力。另方面，由于奉军高级将领争吵，各部队休息了一天，无形中为次日小行军和第三日搏斗创造了有利条件。郭松龄在激愤之下，督队前进，势如破竹。守九门口的直军张治功部招架不住，阵地迅被突破，大败于猪熊峪。少顷，沙河寨全线溃退，不能成军。宋九龄令山炮营长金镜清紧跟步兵之后，显示出震慑威力。29 日拂晓即占领九门口内重镇石门寨。石门寨西南山上有一簇人马正在布置阵地，宋令山炮射击，即行窜散。自石门寨至山海关内重镇海阳镇，沿路直军一枪未发，枪械、子弹遗弃遍地。在距海阳西北十数里的獾子营，直军遗下有法国造的 6 个子步枪 1 万多支，棉大衣 30 多堆，馒头 30 多大篓。足见直军战败，非粮械不充也。在追击中，直奉两军相距甚近，官兵有乡音相同者互作传语。奉军说："老乡过来吧，这边有粳米、白面。"那边回答说："我们这边也有烙饼、馒头。"午后，郭、宋会聚于海阳镇，两人复带队伍分头前进。午后 5 时，宋占领北戴河，郭占领秦皇岛。夜间郭留军一团于秦皇岛，自赴北戴河。裴旅、齐旅、孙旅都继续向前推进，以扫荡直军。时为 10 月 30 日也。

10 月中旬，山海关、九门口战斗正在紧张之际，吴佩孚乘军舰巡视海上，拟以控制的一部嫡系部队，作敌后登陆。迨九门口、荒山口战事不利，形势濒危，彭寿莘连电告急，吴

乃将这部军队增援前线。随后直军援军总司令张福来，带领二十四师杨清臣部，二十六混成旅田维勤部及河南省军两旅到达，在柳江煤矿，沿小铁道至安民寨之线固守阵地。但为时已晚，受前线败兵冲动，已感立足不住。迨奉军大队突至，援军不战自乱，纷纷溃退。彭寿莘部及张福来的援军，被奉军包围在北戴河留守营以东者不下5万余人，犹如瓮中之鳖，很驯顺地被奉军缴了械。其在奉军包围圈外，柳江煤矿小铁道线上的张福来援军及撤退到留守营以西的约二三万人，亦为奉军骑兵于芷山部所截留缴械。

六、海阳镇的一夜

笔者随军前进，于某日上午到达石门寨，沿途敌军死伤遍野，间有尚在呻吟而未及抢救者。九门口是一狭隘途径，多军溃奔，道路拥塞，后边追击，伤亡自多，残酷情况实难描述。石门寨居民几百户，有集市，为炮火所毁，到处碎瓦颓垣，石砾满地，百姓逃散，十室九空。由石门寨到海阳镇约30余里，平地宽阔，间有隘道。笔者带一勤务兵，两骑向海阳走去。见军事联络人员来往传递信息，不绝于途。傍晚，距海阳尚有五六里，西侧山上，突然射来排枪甚密，我们策马奔入海阳镇。在途军人有的还击，有的伏于隘道。不久枪声停止。始悉为赵旅部分军队，由荒山口绕来，想不到我军行动如此之速，以致发生误会。到海阳见败退的直军，有如洪水下泻，不可遏止。直奉官兵相遇，并不敌视。我到此已黑夜，不敢再向前行进。虽未追上队伍，但知第五旅旅长齐恩铭在此，遂往见。齐告我，海阳有他的队伍防守，并截留了溃兵械弹。郭军长现在北戴河，战斗基本上已停止。我们遂

在一家商店过宿。是夜四周喊声不绝，枪声时断时续。有的喊，我是二营八连的；有的喊是七连的；有的喊在哪儿集合，混乱成一团。这些溃退直军并不知海阳镇驻有奉军队伍。下级官兵只知是垮了，怎样垮的却不知道，怎样撤退亦不知道。齐旅守军向他们大声喊叫：丢下枪，向旁边走。岗哨虽然严密，也有不少窜入海阳镇内的，打门、要水、求宿。我们将窗门关得紧紧的，在门内喊告：我们是奉军。他们也就走了。这一夜在混乱惊惶中度过。翌晨情况渐稳定，大部直军渐被收容。我们继续向北戴河行进，约 20 里左右，就找到六旅司令部。

七、战局结束

在郭松龄率领第六旅突击九门口的同时，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部，已先后击溃冷口方面的直军董政国部，界岭口方面直军王维城部。沿滦河南下，进占滦州，断绝直军退路。在这以前，即 10 月 22 日夜，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因与吴佩孚有矛盾，复受张作霖 200 万元的诱饵，回师倒吴，进据北京①。冯于 23 日率 15 将领发出漾电。吴佩孚时在秦皇岛，十分惊慌，遂于 24 日急遽遄返天津。奉军郭松龄部以破竹之势，兵不血刃进占秦皇岛。直军上下以大势已去，咸无斗志。援军总司令张福来搭轮仓皇遁走。彭寿莘亦化装乘渔船逃去。一般官兵见前无退路，后有追兵，均自动放下武器。11 月 1 日午前 1 时，奉军一、三联军司令部由前所进入山海

① 冯玉祥虽为直系，对吴佩孚久怀不满，皖系乘之拉拢反吴。同时张作霖亦由张树声、马炳南的居间牵引，继之有傅兴沛、郭瀛洲的信使往还。张给冯 200 万元，由皖系贾德耀经手过付。

关，驻天泰栈。第二次直奉战事，为时计一个半月，至此乃告结束。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3辑〕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宁　武

1919年秋，我奉中山先生电召由福建到了上海，中山先生给我讲述了当前革命的新方略："在国际上要联俄，按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这就是当年所称的"三角联盟"，或"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合作"，也是中山先生的一种策略。接着中山先生指示我的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

当天晚上，朱执信、张孟杰找我商量，才知道跟段祺瑞合作已有头络了。与段祺瑞合作，当时是有不少人反对的。但中山先生却认为，段祺瑞反袁（世凯）称帝，不失为爱国的军人，可以和他联系。如果他跟我们革命到底更好，否则等我们有力量再解决他，同志们也就没话说了。关于如何和张

作霖接上头的问题，我们几经研究的结果，根据确息，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开办葫芦岛海港，就决定拿这个题目作为进身之阶，并分途进行准备工作。1920年夏，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到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我就带了华侨资本家的信急赴天津。

运用社会关系，经过不少周折，通过张景惠介绍，我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张作霖对华侨投资表示十分欢迎，坦白说出：“我要开办自己的葫芦岛海港，就是为抵制日本的大连港口，我们一定要办好这件事情。”我乘机说明：华侨投资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外面讲传直、皖两系又要动刀枪了，时局不定，华侨是不敢来的，因为他们不愿把钱往海里扔呵！”又拐弯抹角扯了一阵，我开始试探说：“听说段祺瑞已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好了，合力推翻曹、吴，如果各方面能协同动作，安定大局，华侨投资就好谈了。”张作霖就直率地问道：“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我只有笼统地回答：“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张作霖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大概和幕僚计议过了，约我再去谈话，但仅含糊地表示，他已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的话，大帅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我去见孙先生，问我可不可以，我当然同意。

中山先生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这次是孙、张初次

的直接联系，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我则留天津静候下文。

这年秋间，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我去京会谈，在顺承王府见面。张作霖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他一高兴就聊起天来了，谈到一件有趣的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他发议论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我问是谁，他笑着说："同你一个名——宁武。"（在辛亥革命以后，我已化名为宁孟言。）我只好撒个谎，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话还没有谈到正题，值日官报告曹锟来了。

后来听说，曹锟一进门就嚷："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行三）呵？"张极力否认，劝曹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于是曹拿出杨庶堪、宋大章邮寄我的两信，信里牵涉到宋文林，作为证物。张也能随机应变，就把责任完全往宋身上一推，随即给张景惠打电话，臭骂一通，命令把宋文林扣押起来。张作霖敷衍曹锟走后，通知宋文林和我去见他。我担心张要变卦，又怕宋吃亏。而宋却认为这是大帅亲自交办的事，不要紧，我才放了心。我先向张作霖说明，我们往来的信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过去没有出过岔子。并告诉张，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搭，可能信是他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他叮嘱我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我，这里有些不方便，请我

回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去了。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倒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当然，张、曹间的权利之争是基本的东西。

1921 年 2 月，我到沈阳，先和杨宇霆、张学良谈了，再去会张作霖。他明白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去先联络一下。"后派定旅长李少白同我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本。

在桂林大本营，我同李少白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问了东北情况后，着重讲述了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和开发北方港口的计划。李非常惊奇，表示五体投地的敬佩，因为他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建国计划呵！我也曾向中山先生谈及我的看法："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中山先生自然更清楚，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所以中山先生即电上海伍朝枢代表他去东北报聘，同时在交我们带给张作霖的复信中，也提出联合讨直的问题。

因为香港海员罢工，我们在香港等了一个礼拜的船。我亲眼看到家家户户放花爆，庆祝罢工胜利，很高兴。可是我忽见报载张作霖派代表某某赴桂林密商，拥护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的消息，甚为惊讶，又出乱子了。到上海才知道是安福系政客造的谣，捣的鬼，我因事在天津停了一日，李少白先回奉天。

张作霖一见李少白，不容分辩就破口大骂："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

马上又命杨宇霆发电报不承认李是代表和他所说的话。张作霖又自言自语："南边人我们斗不了，什么合作，算了罢。"我第二天到了，得悉上述情形，知道张作霖有了误会，不能不作解释，就去看他。他余怒未消，先说了一大篇话："李少白这杂种，胡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岂有此理！现在是共和国，你们革命党明明知道总统是选出来的，不是我张某一个人说了就成啦，为什么要登报造谣言？伍朝枢这个年青人，还实在，肯说老实话。他告诉我：两广遍地是匪，孙文没有力量北伐，至少几个月内办不到。我和曹锟是儿女亲家。他想做大总统，出卖东三省，我就不答应！他对英国公使说，他上了台，京奉铁路的借款合同可以延长。再对日本公使说，他上了台，二十一条也可以考虑。我姓张的就不赞同。看来还是我自己动手打姓曹的罢，胜败都不管，什么与广东合作，算啦！算啦！！"

我慢慢地跟他解说："报上的消息完全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耍的是挑拨离间之计。李少白在桂林根本没提过什么大总统问题，这样的大事，他没向大帅请示，敢自作主张吗？"当年的官僚政客常玩这一套把戏，张作霖也不是毫无经验的，一经提醒，他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于是我又说明："伍朝枢久居上海，两广的情形他并不熟悉，现在已不是那个样子了。李少白刚从那边回来，只要问问他就明白了。"孙先生还托我转达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张作霖听了颇感动，态度立刻变转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要我密报中山先生。1921 年 4 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中山先

生为大总统。中山先生旋驻节桂林，准备亲率大军北伐。但是，内因粤督陈炯明与直系勾结从中阻挠，外因湘督赵恒惕不肯假道，拖到1922年3月，中山先生乃免陈炯明职，移大本营于韶关，改道北伐。5月，中山先生誓师出兵，战事进展顺利。6月6日不料陈炯明在广州叛变，8月中山先生始脱险至沪。北方，自1920年7月直皖之战，直系战胜皖系后，就形成了直奉两大势力的直接、正面的冲突，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大战。由于张景惠的驻北京的两个师，未经正式开火就被直军全部解决，奉军又节节失利，终于败退关外。

张作霖倒不气馁，也不怪中山先生。他说："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 。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救国大计多想办法，这班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中山先生平安到沪后，张作霖找我去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住。"我晋见中山先生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中山先生要我婉言代为辞谢，思索了一会儿又问我："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我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中山先生也认为妥当，并给张一封致谢的信，暗示他如筹到款，即可戡平叛乱。张作霖见到我，先问孙先生的生活情况，我老实告诉他，经济很困难。他又是那句老话："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10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同时，就韩麟春赴杭州拉拢浙督卢永祥之便，带去赠送中山先生的10万

元。

我把中山先生派汪精卫、路孝忱为代表的回电告知张作霖，他兴奋地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先生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汪精卫、路孝忱来了，在将军府大厅欢宴，张作霖身着大礼服出席招待，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主人客人都讲了话，真是个盛大的宴会。几度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粤军回粤军费50万元，由许崇智派其兄许功武来奉领去。以后，又陆续补助过几十万元，确数现在记不清。

在这里要附带一提的，汪精卫曾带来中山先生给我的亲笔信（解放前已交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保存）。杨宇霆坚持要将这信送大帅一阅，我也同意。因为信内有"此次派精卫、孝忱来奉，已而嘱他们，关于军国大计，未得吾兄同意之前，毋许作自我活动"的话，我想让张作霖知道，心中有数，可以防止他们的私人活动。而杨宇霆因信内有"雨公所赠2万元，我已分给各同志矣，烦代致谢"的话，想借此惩韩麟春一下。果然，张作霖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并说："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8万！"

许崇智率部回粤，击溃陈逆叛军，1923年2月中山先生就大元帅职，继续清剿残逆。同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张作霖通电反对贿选。奉张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面积极整军，一面与冯玉祥密使往返，协议联合倒曹。1924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直系瓦解。中山先生离穗北上，并先派孙科往晤张作霖说明他对时局的主张。

在天津张园，中山先生和张作霖作了第一次的会见。张作霖曾表示："作霖系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

指示。"翌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就结束了"孙、张"合作的一段历史。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41辑〕

郭松龄的崛起

○赵　毅[①]

一、投身奉军，矢志改革

（一）独树一帜，成为一派领袖

1922年第一次奉直战争，奉军失败，狼狈退回关外，张作霖引为奇耻大辱，日夜想要报仇雪恨。但感到老兵老将暮气太深，非重整旗鼓加以训练不可，乃在沈阳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派吉林督军孙烈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负责战后整军工作。从此，新派人物受到重视，内部矛盾也随之俱来。

旧派（老派）以张作霖为当然的领袖，以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吴俊升等老伙伴为骨干，分别掌握东三省的军政实权。

新派（少壮派），都是军校出身的，当中有"土"、"洋"两派之分。杨宇霆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资格老，地位高，主意也

① 郭松龄反奉期间，赵毅任张作相第五方面军参谋处参谋，旋即升任炮兵营长，直接参加了巨流河阻击郭军之役。

多，得到张作霖的无比信任，因而形成为“洋派”的中心，日本士官留学生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荫槐均属之。郭松龄系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因有本领，能苦干，得到张学良的倚重，独树一帜，成为“土派”的领袖，奉天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多属之。“洋派”多系上层，权势较大。“土派”遍及于各阶层，实力雄厚。但这两派都是围绕在张氏父子周围，在张氏父子周围各显神通，而张学良则煞费苦心地周旋于此两派之间，并为其父作桥梁以自重。

（二）改革军队，总揽大权

郭松龄氏颇具军事学识，敢作敢为。民国8年(1919年)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时，更表现了他的艰苦卓绝精神。工作认真负责，不畏强势，不但敢于严格管教学生，还毫不客气地约束队长、区队长(按当时习俗，教官是不能管队长的)。又因其躯干魁梧奇伟，胸挺颈直，态度严肃，同事们赐以“郭鬼子”绰号。张学良彼时正在讲武堂做学生，很钦佩郭的为人和作风。张学良出校后，藉父亲的庇荫升为卫队旅旅长，便向其父保荐郭氏为该旅的参谋长，这是郭氏受到当年“少帅”张学良将军的垂青和倚畀的开端。

1920年秋，吉林省东边地区土匪猖獗，占据了有名的佳木斯等城镇。郭氏奉命率亲自训练的卫队旅前往剿匪，迅速肃清匪患，收复了所有被占的城镇。在这次军事行动期间，郭氏有车不坐，有马不骑，身带全副武装，与士兵同甘共苦，全体士兵大为感动。由于纪律严明，大大扭转了旧时官匪到处扰民的恶劣风气。从此郭氏不仅为官兵所悦服，亦为沿途地方所拥戴，声名鹊起，更加受到各方的重视。

几年的时间内，郭氏被拔擢为团、旅长。1921年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实行扩编军队，任命张学良为奉军步兵第三旅旅

长,郭松龄为步兵第八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郭氏负实际责任。1922 年第一次奉直战后,张作霖整编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以“东北军”番号,取消师制,改为旅制。张学良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北军精锐“二、六旅”。在这期间,不但更加体现了郭氏的非凡才干,也巩固了张学良氏对他的信任。

郭氏凭借张学良的支持,在军事改革上颇多建树。他的作法:第一,办教育,有步骤的整顿讲武堂,创办军士教导队、军官教育班以及军事、军医、兽医、军械等教育班,还创办过步兵学校。大批吸收青年学生和调训部队优秀干部,培养各种军事人才,以为改革军队的基本。第二,校阅军队,除了随时到各部队视察外,每年春秋两季,正式进行校阅,一面考试军官佐学、术两科,一面检查部队训练和纪律。有成绩太差的当场撤换,如有出身学校的随行人员,即时补充,大刀阔斧,毫不有所袒徇。这样,逐渐剔除了一切陋规恶习,风气焕然一新。

郭松龄的一切作为和成就,是与张学良对他的逾格信重分不开的。张学良氏常常向人表示:“我就是郭茂宸(郭的别号),郭茂宸也就是我。”交谊之深,倚畀之殷,确出常格。但郭氏为人刚愎自用,作风跋扈专断,不为张作霖所重,独赖张学良多方向其父讲好话,终于使郭得以畅行其意志。更因张学良年轻,兼职多,郭氏代替张氏负重担,因而总揽了军事大权。

第二次奉直战时,奉军(东北军)共编六个军。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姜登选、韩麟春(均系临时指挥作战)任第一军正副军长,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以魏益三为参谋长,这就是当时东北军主力部队“一、三联军”,郭松龄不仅统辖第三军,还同时统辖第一军。第二次直奉战后,张作霖极力提高“少帅”的权位,而郭氏便在张学良的倚畀之下,统帅了奉

军的全部精锐。即除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和个别老派将领所统带的部队以外,所有当时属于奉天的军队,都在郭氏指挥统率之下。

二、为"老派"所妒嫉,与"洋派"相水火

(一)与杨、姜、韩的宿怨

郭松龄最早在上将军公署任中校参谋时锋芒颇健,曾受到当时调任参谋长的"洋派"首领杨宇霆的排斥,从此两人种下了恶根。

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将原归郭氏指挥的军队分拨一部,编为姜登选、韩麟春指挥的第一军,与郭氏并肩作战。因撤换营长阎宗周、团长陈琛的问题,双方意气用事,各不相让。郭氏在山海关正面与直军处于相持状态,第一军突破九门口直军防线一角,遭到直军的顽强抵抗。张学良征得姜登选的同意,秘密由山海关抽出八个团,派郭统率加入九门口。郭氏奉命到达后,要求接替第一线,姜、韩认为郭氏争功,言多讥讽,使郭氏所率部队充作预备队,郭氏内心怏怏。张学良氏也激于姜、韩二人的攻讦,对郭氏略有责难。郭氏乃大发脾气,立将部队撤离战线,率之东归。张学良闻讯,驰马30里外始将郭氏劝止,返回战场。姜除电告张作霖外,并对张学良说:"郭茂宸(郭的号)如此违抗军令,应当军法从事。"郭氏与姜、韩的矛盾,至此已达到尖锐程度。

(二)权位之争

石门寨、黑山窑一役,是奉直两军胜败的转折点。奉军把直军击溃后,郭氏就冒弹雨直冲到海洋镇,绕出山海关的背后,切断直军的退路。李景林、张宗昌的第二军突破冷口,威胁

直军的左后方。而属于直军的冯玉祥，复在热河途中宣言“班师反吴”。结果直军大败，山海关、秦皇岛间直军主力，全部被奉军缴械。郭氏在这次战争中间，奋勇当先，指挥适当，建立了极大的功劳。然而战后论功行赏，郭氏却一无所得。

李景林打到天津后，驻兵不动，抱着“齐王自为”之心。张宗昌打到山东，大喊“鲁人治鲁”。张作霖不得不顺水推舟，就让李、张分别任直鲁两省的军务督办。不久，奉军继续向南扩张，夺得江苏、安徽两省地盘，张作霖竟派了郭的死对头杨宇霆、姜登选两人为苏皖军务督办，使郭氏最感忿懑。

1925 年 10 月奉浙战争爆发，孙传芳组织起浙苏皖闽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向沪宁的奉军进攻。奉军被迫撤退，大部被缴械，杨宇霆狼狈逃出南京，姜登选也被逐离开蚌埠。这时候奉军既要制止孙传芳的进攻，又要预防冯玉祥的侧击。张作霖命令张宗昌、李景林在津浦线对付孙传芳，令张学良和郭松龄在津榆一带对付冯玉祥。杨、姜二人希图恢复苏皖地盘，极力主战，老张也因争夺权势（保大和北京），不肯与冯玉祥善罢甘休，战事似已无可避免。

郭松龄氏鉴于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惨景，与张、杨、姜等的意见发生尖锐的分歧。为争夺地盘而战，殊非其心所愿。

三、决心反奉

（一）与冯、李结成三角联盟

1925 年秋，郭松龄代表奉系赴日本观操时，与冯玉祥派去的代表韩复榘会面，郭、冯之间开始发生了联系，渐渐与冯秘密信使往还，走向进一步合作的默契。

11 月间，奉冯两方的关系虽然时张时弛，但基本矛盾的

地盘之争无法解决，最后兵戎相见乃是不可避免的。郭氏此时正驻在天津国民饭店，因与张作霖父子意见龃龉，托病入医院养病。冯玉祥派他的参谋长熊斌（与郭是陆大同班同学）到天津和郭举行秘密会谈。结果签订了一个郭、冯和李景林的“三角同盟”协定。

（二）态度明朗化，决心提前行动

正当奉冯双方已经剑拔弩张之际，张作霖突于11月13日派张学良到天津与冯玉祥举行谈判，对冯方作了一些让步，将保大地区让与冯玉祥。同时派于乙之去山东，观察张宗昌动向，形势一时顿现缓和。11月17日，国民军第二军接防保大时，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张作霖闻讯后大为震怒，责骂冯玉祥不守信用，要下令动兵，与冯一决雌雄。

郭氏在天津向张学良说：“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很多，可以开发经营，不应再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这是我和芳辰（李景林别号）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他还说历次战争的坏主意都是杨宇霆出的，上将军吃了多少苦头还不觉悟，到今天为什么还听信他的坏主意？郭氏的态度至此已经明朗化了。

11月20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氏回沈一行，张学良也劝他回沈去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氏认为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沈一定不怀好意，遂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当天，郭氏向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他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革东三省局面，他愿竭诚拥护。张学良氏骤然听到郭氏的这番话，不禁骇然。但他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

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上也因张学良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轻内部反抗。但郭氏立逼他“大义灭亲”，实为当时年仅25岁的张学良所难能接受。

四、班师反奉

（一）滦州会议

11月22日深夜，郭松龄由天津发出三个通电。第一电（养电）让张作霖即日下野，拥护张学良继承大任。电文长达数千言，系饶汉祥氏的手笔。第二电是让杨宇霆下台。第三电是宣言奉国（冯）两军停止行动。这三个通电，就是郭氏反奉开始行动的信号。

11月23日晨郭氏出了医院，率领司令部人员和卫队乘专列火车东上到雷庄车站，旋又转去滦州。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班师回奉，倡导和平（滦州会议时间应为11月22日——编者）。当场将不肯签名附和他的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等解职软禁，送交天津李景林看管。姜登选恰在此时经过滦州回沈阳，被郭氏截留，因反对郭的行动，于26日遭到枪决。郭松龄杀姜以后，曾发表通电，说是“以为穷兵黩武者戒”。但因姜为人尚较和平，在奉系中很孚人望，被杀消息传出后，很多人认为郭氏度量狭隘，不免有失人心和威望。

郭氏在由天津出发以前，已下令所有京津线和津浦线的奉军星夜赶向滦州一带集中。会议确定了新的组织机构和新的作战部署。其主要人员如下：

甲　总司令部：

参 谋 长　邹作华

秘书处长　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秘书长)

政务处长　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参谋处长　王静轩

副官处长　郜汝廉

军需处长　鲁穆庭

外交处长　王正廷(未到任，由殷汝耕、齐世英负责)

兵站处长　张振鹭

航空司令　彭振国

乙　部队：

前敌总指挥　宋九龄

第一军军长　刘振东

第二军军长　刘　伟

第三军军长　范浦江

第四军军长　霁　云

第五军军长　魏益三

这时候郭氏下达命令，仍与张学良共同署名，即为表示拥戴张氏，也为了釜底抽薪软化内部的反抗。直至11月30日，郭氏始在山海关发表通电，正式把他所统的军队改称“东北国民军”，以后即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了。

25日，李景林、冯玉祥都发表通电响应郭松龄，要求张作霖下野。惟其出乎郭氏意料的是，“三角同盟”并未彻底实现。李景林初虽标榜“中立”，尚采取默中援助态度。旋因国民二军抢夺保大，冯玉祥又急于取得天津海口，李景林才被迫一变而为拥张反冯、反郭，把郭氏送押的四个师长释放东归，以示与张和好，同时与冯军发生了战争，“三角同盟”遂解体。

郭氏原与冯约定，他出院之日就是反奉行动的开始。所以冯氏接到郭氏通电以后，立即发表通电，虽亦标榜“中立”，但劝张作霖下野，并且措词强硬，不啻一篇讨伐檄文。同时派兵出喜峰口，趋承德、热河，使奉系都统阚朝玺不得不自行撤走。不过因冯氏与李景林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他在对各方察风观色，以致援助郭军的行动并不积极。冯玉祥除不劳获得热河地盘之外，并无进一步的援郭行动。这样，郭军一开始就形成无后方的作战，反而对李对冯都不得不作戒备，这对郭军的反奉军事是极为不利的。

（二）山海关前哨战

11 月 25 日由魏益三率领先遣队两个混成团，搭火车潜行开出山海关外，到距山海关附近 20 里的万家屯附近下车。一面构筑工事，一面破坏电线，企图把山海关至昌黎间的张作相吉林部队三个旅和汲金纯的第九师截留在关内，予以解决。

原来，吉林军队和汲金纯部并不知道郭松龄反奉的消息。及看到兵车一列一列地向东开和到万家屯的部队又构筑工事，破坏电线，遂大起疑心。在此千钧一发的形势下，旅长李杜和参谋处长王之佑，本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语，立即下令对魏军采取行动。当天郭松龄派张廷枢由滦州到山海关，向其父张作相联系合作，保证出关后维持其地位和财产。此时张作相已去沈阳不在前方，张廷枢将郭军反奉的情形完全说出，乃更加强了他们打击魏军的决心。趁魏军尚未站稳脚步，实行先发制人，一举将其击溃，两团人大部被缴械，魏仅带少数人逃脱。但是，郭军的实力是强大的，吉林军队和汲金纯部队并没有抗拒的能力，遂主动急行撤出山海关，向东后退。11 月 27 日，郭军进占山海关，29 日占领绥中，沿途并未遭到任何抵抗。郭军总司令部于 12 月 1 日移驻绥中。

正当郭军大举向关外进发的时候，张学良氏于11月26日，带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副官谭海等，乘“镇海”号炮舰到秦皇岛（张氏一行住在舰上），电邀郭松龄面谈。郭松龄氏在滦州指挥部队，拒未应召，但他接连给张氏捎来两封信。前者表示对张氏的一片忠诚和竭诚拥戴之意，说：“龄一身所有，皆公之赐，故拼将此身，仍以效忠公为职志。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后者则历述主张班师的六项原因和要求张氏反省的四点。这时张学良氏进退维谷，既怕其父责难，又在幻想着郭松龄能扭过头来，不走向极端。因此在秦皇岛徘徊一天多，不得已遂于28日悻悻而返，绕道去大连。

郭氏与杨宇霆是水火不容的，郭氏所说“清君侧、除群小”，明指是杨、姜等人。所以当郭氏举兵东向之前，张作霖即将杨宇霆的总参议职免除，另行委派王树常代理。杨也就称病躲去大连，冀以缓冲郭军的行动。但实际杨宇霆去大连，是与日本关东军秘密勾结，及张学良到大连时，杨宇霆已与日本达成秘密协定。于是张、杨二人一同搭南满铁路火车，在29日晨6时许返抵沈阳城。

由于杨已取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援助，张作霖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后，一面发表“讨伐令”，悬赏通缉郭氏，并决定最后的防守作战计划，一面向各县征兵积极扩编军队和调集吉、黑两省军队。

（三）连山（锦西）战役

张作相的吉林部队于琛澂、李杜、李桂林三个旅和汲金纯部第九师的两个旅，由山海关内安全撤出，退到连山一带后，即遵照张作霖的命令，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的奉军第二道防线，组织部署防击。汲金纯部在左翼，由铁道两侧至南海边

白马石之线；吉林军队和黑龙江省的梁忠甲旅在右翼，占领铁道北至笊篱山、二道沟之线；张作相由沈阳赶赴前线，设司令部于老官铺，负责指挥阻击郭军作战。

郭军先头部队，于12月3日即开始与防守连山的奉军接触。向奉军阵地发动进攻的夜间，正赶上天降大雪，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士兵当时尚着单衣单鞋，在战壕里多披羊毡以御风雪，冻坏手脚的很多，负重伤未能抬下火线致死的亦不少。

郭军对铁道线及其以南地区的进攻是很顺利的，对奉军右翼地区（吉林部队）的进攻，却出现了投降事情。第一次投降是第十二旅的富双英团长，他是郭军最先头的团，率领全团官兵投降奉军。张学良正在锦州指挥作战，乃责成富双英在火线上进行招降郭军的工作。富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郭军营团长大多为其同学。火线上"白旗"往来（使者持白旗为记，不得对其射击），等于把郭军阵线打开一个缺口，一营一营投降奉军，大约有四五个营之多。同时，于琛澂和李杜吉林军队防守亦甚力，郭军在这方面的攻击一时顿挫，士气大受影响。

但奉军左翼的汲金纯部队，防守则不坚强，在白马石被郭军突破，即纷纷向东溃退。同时郭军又向奉军右翼猛攻，吉林军队亦不得不放弃连山阵地，经虹螺岘向义县方向转进。奉军撤退时多将铁道桥梁炸毁，因而迟滞了郭军长驱东进的行程。

连山战役共打了两天，奉军的防线就被郭军突破。原拟在石山站一带再行组织防击，因郭军尾蹑，由连山退下的吉林军队和汲金纯军队无立足之地，遂一直向新民方向退去，放弃了石山站阻击计划。郭军于12月7日进占锦州，为了整顿军容和补充装备，并未及时前进。但因连山战役已获胜利，下一目标即在沈阳，所以士气还很旺盛。

自第二次奉直战后，奉军精锐10余万人，全部开进关内，名义上由张学良指挥，实际上由郭松龄总揽大权。所以郭氏在天津发出“养电”后，不啻晴天霹雳。山海关、连山相继失守，奉天省城更陷入兵荒马乱之状。大商行、金店、银行、富户，纷纷迁移日本租界避难。张作霖乱蹦乱跳，又气又急，虽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干涉”上，实际上连他自己也并无信心。因之曾表示“愿意和平交出政权”，同时也作了“出走的准备”，上将军公署参谋处已把地图捆起来了。“大帅府”已经预备汽油，准备最后逃走时烧掉。老张的家眷逃往沈阳日本租界。省城地方团体已经准备欢迎郭军入城了。

当时奉天省长王永江对地方团体代表讲话说：“政治好比唱戏，老帅（指张作霖）和我们唱的不好，当然可以下台。郭松龄要唱，我们可以变为看戏的，你们可以去欢迎他！但要请他不要因为我们唱的不好，连戏台都砸毁不要。”奉天省城的狼狈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四）巨流河战役

当杨宇霆于11月末由大连回到沈阳时，张作霖决计利用日本的援助纠集所有力量，在辽河左岸设防，跟郭松龄背城一战，以决最后的胜负，防击作战计划是在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参加下制定的。

张氏派张学良和韩麟春为中央路军正副司令，鲍文樾为参谋长，司令部设于距省城西60里的兴隆店车站。利用巨流河南北堤坝之线，征集大量民工帮助军队，星夜构筑防击工事，准备与郭军作最后的决战。

巨流河的正面防军：

卫队——队长姜化南，约一个团的兵力。

预备军——军长朱继先，指挥三个旅。

第二十七旅——旅长王瑞华，由教导队编成，辖三个团。

第十二旅——旅长富双英，由郭军投降部队编成。

第十九旅——旅长张廷枢，原属郭军魏益三部一团编成。

同时，张作相的吉林部队三个旅和汲金纯的两个旅，由连山陆续撤退到新民县。张作相设司令部于腰高台子附近的安福屯，负责右翼指挥。另外，穆春、张九卿、万福麟和于芷山等骑兵，也先后到达巨流河加入防击部署，担任两翼警戒和机动作战。及至郭军将要向巨流河阵地进攻的时候，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恰好赶到大民屯一带担任左翼地区的作战。总计奉军参加巨流河防击的兵力不过五六万人，但这些旧派将领都是老张的嫡系，亦都与郭氏有矛盾，他们的战斗意志比较坚强。又因张作霖是倾全力跟郭氏决斗，只求打败郭军，不惜牺牲一切。所有士兵都发给新棉衣、皮大衣、面包、罐头、香烟等，物资供应异常丰富。连兵工厂储藏的大批新枪、新炮、弹药，全部发出使用。兵工厂的技工、技士都做了炮兵的射手。因此奉军的装备比郭军的精良又充足，而士气也比较旺盛。张作霖复派张景惠以宣抚使名义，到前线慰劳奉军部队，宣布参战的官佐各晋一级，士兵每人发"恩饷"两月，全发银元，用以振奋士气。

当时在防击配备上，张学良与韩麟春曾有不同的意见。张氏认为："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硬往哪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取得胜利。"韩很不以为然。后来郭军果然用主力从正面进攻，韩才表示佩服张的预见。

在连山战役后，阚朝玺的部队已由热河到义县附近。他原定"勤王"——拥张，后因看到郭军声势浩大，沈阳难保，遂突变初衷，与郭松龄取得联络，向郭氏要求吉林督办位置为合作条件，被郭氏拒绝，乃率部北上到昌图县八面城观看风色，态度暧昧。张作霖大为痛恨，战后撤职，永不叙用。

日本帝国主义是袒张拒郭的，这是郭军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原来对张作霖和郭松龄两方，并无绝对的爱憎，骨子里是，哪一方真正强大起来都非其所愿。他们惟一的方针是："谁对它的侵略政策有利，就支持谁。"杨宇霆由大连回沈阳后，日本的态度就完全明朗了：一是因为日本内阁仍然认为张作霖是其满蒙方面最好的代理人；二是因为郭氏宣布改称"东北国民军"，日本认为与它的侵略政策相抵触，乃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相反地处处对郭军进行威胁和阻挠。12 月 8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发生战斗"，实际上旨在阻止郭军行动。以后日本关东军又派中佐浦参谋到锦州向郭军送达通牒，谓"东西两军不得进入南满铁路 20 华里以内，否则日本守备队将解除其武装"。日本关东军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因为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附属地和铁路两侧 20 里内不准郭军进入，无异于把这条南满路作为张作霖的保护靠背，而不让郭军进沈阳。

郭军在攻破连山防线以后，曾在锦州略作休整，然后即按下列部署大举东进。

中央纵队：第一、第二、第三各军，沿北宁铁路东进，目标指向新民，突破巨流河后，直趋沈阳城。

右翼别动队：派第二军马忠成旅由沟帮子经盘山，目标指向营口。

左翼纵队：第四军霁云部由义县经阜新直趋彰武，扫荡奉军背后，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另外，因为三角同盟已被破坏，冯玉祥和李景林已开始军事冲突，李景林复向奉张表示要在关内夹击郭军。郭松龄乃派魏益三率第五军留守山海关一带，专为巩固后方，防备冯、李

偷袭。郭军因沿途桥梁多被破坏，不能利用火车护送，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徒步行军，行动异常迟缓，致使奉军得到调兵遣将和布防的余裕时间。郭军沿途并未遭到任何抵抗。12 月 12 日占领大虎山，13 日先头到达白旗堡。18 日郭军的总司令部移驻白旗堡，这就是郭军最后失败的地点。

郭军右翼马忠成部亦于 13 日到达营口。但因日本擅自宣布营口为“中立区”，不许郭军进入市内。日本守备队长洓内勇中佐更不许郭军在营口的河北站渡河（辽河）。这样，营口便由日本替奉张所保有，阻遏并限制了右翼别动队的攻势活动。郭军不得已退往田庄台，陷于进退维谷境地。

南满铁路只给张作霖从吉、黑两省调运军队，却不准郭军靠近，而沈阳“南满站”及铁路要隘，则有日军挖掘堑壕备战，并对郭军进军加以限制。因此，奉军得以集中全部力量在巨流河一线，使郭军全部行动遭到无比严重的影响。

郭氏曾于 15 日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提出抗议。日本伪善地训令关东军严守“中立”，不得偏袒任何一方。但又重申“双方不准在附属地和铁路 20 里内作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完全暴露了。

郭军因政治、外交等等的进一步措施，在白旗堡一带休整数日。于 12 月 20 日开始行动，占领新民县城。22 日，主力军已在巨流河及新民以北之线展开，准备开始总攻。

这时，奉军右翼的吉林军队李杜、于琛澂部，于 22 日夜暮向川心店（新民县以北）一带正面的郭军发起猛烈的袭击。郭军站脚未稳，伤亡很大，约一个旅的全部兵力被缴械，旅长安玉珍被俘。这是奉军方面争取主动，放弃阵地出击，打败郭军的开端。

22 日夜，郭军下令全线总攻击。因炮兵早经邹作华暗通

奉军，不能发挥应有的威力。而巨流河河坝又极坚固，以致步兵部队久攻不下，官兵伤亡很大，挫伤了锐气。更重要的是，下级官兵在打到沈阳附近时，都情不自禁地兴起“思家”之感，而在那冰天雪地中作战，军心发生动摇。当时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士气不振已达极点。同时也可看出郭氏在东北军中的威信，还是压不倒张氏父子的。

23 日郭军攻击顿挫后，奉军窥破好机，命令全线出击（放弃阵地），郭军竟纷纷举起白旗自动缴械投降。兵败如山倒，全线在一天之内动摇崩溃，竟致一败涂地，不堪收拾。郭军的军长、旅长如刘伟、刘振东、范浦江、高纪毅等十余人，在一天之内大部被俘，两军胜败之决战，至此已成定局。

23 日，吴俊升骑兵大军由左翼迂回白旗堡后方，包围了郭军总司令部。24 日晨，郭氏在万军混乱中逃出，随征人员四散，郭氏仅偕其夫人韩淑秀及少数机要人员和一部分卫队，坐大车向南逃跑。逃到老达房附近，被奉军骑兵王永清（绰号“天下好”）部所阻截，郭氏夫妇在菜窖内被搜获。林长民中流弹死于车下，殷汝耕、齐世英等逃到新民日本领事馆内避难。

24 日郭氏夫妇被俘后，张作霖原计划解沈阳亲自讯办，旋因杨宇霆等的怂恿，乃改令就地枪决。于 25 日将其夫妇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曝尸 3 日。往观群众，扼腕叹息者多矣。这是郭松龄结束他 43 岁生命的烈剧，也是他反奉一个月的始末。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

郭松龄反奉及其内幕

◯ 荆有岩

1925 年秋，奉系军事集团再次将军队编组，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郭松龄任第十军军长。第三方面军团辖三个军，均系京榆驻军部队，郭仍主持张学良所管的一切军务。10 月初，郭松龄从日本参观秋操归来后，忠于张家的态度遽变，主张和平，不打内战。旋即称病住在天津意大利医院，并且避与张学良会面。11 月趁张学良回沈阳之际，将军团部由天津撤至滦州(即滦县)。笔者当时任军团部军需处被服科长，天气渐寒，带军需数人回沈阳领冬季被服，到沈第二日即发生郭变。11 月 20 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随着发出“养电”以“清君侧”为名，要张作霖下野。当即反戈东向，将第三方面军团部队改为四个军：第一军军长刘振东，辖第六旅、第二十七旅、第三十七旅、炮兵第三团、工兵第二营。第二军军长刘伟，辖第二旅、第十九旅、第三十四旅、炮兵第四团、工兵第三营。第三军军长范浦江，辖第十二旅、第三十三旅、第十四旅、炮兵第五团、工兵第四营。第四军军长霁云，辖第四旅、第五旅、第十六旅、徐英骑兵团、炮兵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工兵第五营。另以魏益三为预备军军长，辖郝梦龄等两个步兵旅和

一个炮兵团，留驻山海关。这五个军中以霁云最为郭所重视，所以隶属有三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郭在讲武堂任战术教官时，霁任技术教官，过从较密。刘振东系郭的老速成同学，刘伟、魏益三为郭陆大同学，范浦江是保定军校毕业。霁、刘、范均为郭任第八旅旅长时的营长。

出关后，郭将军队改称“东北国民第四军”。张学良知郭倒戈，乃于11月24日由沈急赴前方，到绥中受阻，未能前进。乃于25日夜由葫芦岛乘镇海号军舰，在26日晨抵秦皇岛，企图与郭见面。郭令高纪毅用电话告张，拒绝会见。张学良返沈后，在乃父痛责之下，于12月初，率在沈之部属（笔者在内），搭乘专车一列西上，止于兴隆店车站，作孤注一掷的拒战。张乘的专车为清末慈禧所用者，一卧室和一办公室，夫人于凤至同来，秘书朱光沐亦在此办公。部队编组仍用第三方面军团名义，下设参谋、副官两处：参谋处长鲍文樾，有作战、牒报等科，王握前为作战科长。副官处长周濂，下设副官、会计两科，副官科长姜化南，会计科长荆有岩。兴隆店警备司令为郭恩海。军队有王以哲新编的一个团，何柱国新编的一个旅。由于急遽难于招募，虽都有装备，而缺少兵员。这些队伍以辽河东岸、铁路南北为阵地。张在车上说：“郭来了看他能怎样！”不久又逐渐编成几个旅，旅长有教导队队副王端华，第二次奉直战时，在九门口作战被郭撤职的重炮团长陈琛，以及由郭军逃回的团长张廷枢（张作相之子）。郭军将到新民时，团长富双英肩负机枪叛郭来投，亦编为旅长；还有朱继先的预备军。这都是临时编凑的，徒有番号，不能作战，只陈琛旅人数较多。新民县长王煜斌常将郭军情况向张报告。当时辽河冰封，铁路桥梁并未破坏，随处可过。郭军在锦西击破张作相防线后，在锦州逗留数日，因天降大雪，士兵未着棉服，所以前进缓慢。12月21日郭

军有15000人进入新民。22日午后3时,郭同总部人员亦进入县城。郭军在辽河西岸,将入阵地时,团长赵兴荫、董舜臣换便衣潜逃(这二人与郭有亲属关系)。随郭军进入新民的原旅长陈再新,在日本领事馆用电话向张作霖密报郭军情况。郭军发射的炮弹多无"引信",不能爆炸。23日郭在新民开军事会议,因日人阻挠,军队不许在南满铁路线20里内通过,以至崩溃。24日郭见大势已去,乃于上午带青少年卫士数十人向西南逃走。晚间于辽中县老达房佟家窝棚潘家同其妻韩淑秀被捕,25日即被处决。在郭走出后,其参与人员殷汝耕、卢春芳、齐世英、杨梦周、苏士明、何成朴、杨子厚等均避入日本领事馆。24日晨郭将离新民时,炮兵团长段茂奇即乘铁路压道车到兴隆店,向张学良报告。张即令所驻在的列车,于上午10时许开入新民车站。下车后同随行人员步行至郭的总司令部(同和盛大车店)。当时街上并未戒严,渺无一人。张进入大厅时,所有高级将领均垂头侍立,不敢仰视。张说:"你们要戏了一番,该结束了,各归原来职务,该做什么做什么。带队的将部队整顿好,赶快回去。"遂下令邹汝廉复参谋长职,邹作华仍为炮兵司令,霁云任副官处长,傅鑫为副处长,刘伟仍回原第二旅旅长,刘振东、范浦江为咨议。各师旅团长均按滦州以前编制不变动。这次奉系军事集团内部事变,规模之大,结束之快是罕见的。除郭松龄夫妇处死外,并未株连一人。郭被擒时,王永清曾有电报告张学良。张将电令高金山(上将军公署卫队团长)押解郭夫妇时要经过军团部。但电未发出,即接高电话,已于中途将郭处决。这是杨宇霆在张作霖面前使的坏。张学良得到消息,表示很痛惜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很愿见面,以明究竟。"

郭松龄生活朴素,虽任军长,家庭不似豪门。第一次奉直

战后，虽以二、六旅公款投资裕民银号、裕民油坊，仍令军需人员管理，留作公用，究非腐败贪污、官僚气十足者所可同日而语。郭变后，张作相在张作霖面前力主对郭宽大。军团内部以韩麟春为首的，也主张保存元气，不可过多株连，所以张学良仍能统有十数万之众。

郭松龄自从1918年即在东北陆军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很为张学良所器重，言听计从，推心置腹。郭对张也引为知己，鞠躬尽瘁。但是何以骤然倒戈反张呢？总当作是一个哑谜。笔者认为有内因也有外因：

一、内 因

郭松龄为张氏父子建立新军，教育士卒，拔擢干部均一手为之。张学良常在其父左右参赞帷幄，不能以全部精力放在部队，只得一切委任于郭。因而郭大权独揽，笔者常随郭任校阅委员，郭对被校官佐认为应升应黜者，立即写一小纸条随降随补，其手令同委任状一样有效。有时口头告知也是命令。第二次奉直战争胜利后，在北戴河扩编军队，比原有兵力增加3倍，张作霖有些怀疑，迟迟不肯批准。由于张学良的恳请，及扩编委员裴春生、齐恩铭、赵恩臻、高维岳四师长，在张作霖面前代为缓颊乃得成为事实。

士官与陆大保定军官两者派系的矛盾。以张作霖幕府领导人物总参议杨宇霆为首的姜登选、韩麟春等士官派，对郭遇事排挤。郭松龄所任用的骨干多为陆大、保定军官、老速成、讲武堂、军士教导队出身的，自成一个体系。1924年成立陆军整理处，孙烈臣虽为总监，而权在副监姜登选、韩麟春之手。韩虽不屈从于杨，姜亦与其他附杨者不完全相同，但在对郭之崛起

嫉视是同杨沆瀣一气的。张学良为整理处参谋长,张之事郭多谋划,在军事训练、编组上,杨、郭意见时有矛盾。张郭的三八旅几与师的编制相同,对增加预算,补充装备时为杨所阻挠。以三八旅设迫击炮厂为例。该厂为英国陆军上尉沙顿所建设,奉军给沙顿以陆军少将军衔,张学良派炮兵中校团副李宜春协助。初设厂在北大营,后在沈阳西下洼子另建新厂,李宜春升为厂长。所产迫击炮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颇显威慑力量。此厂设立虽为张学良极力主张,但杨宇霆却很不满。因杨兼任兵工厂督办,不许可在大兵工厂之外,部队另设小兵工厂。张学良与张作霖虽系父子,但又是部属关系,不能事事都直接办理,往往为总参议这道关所阻挡。张学良说过"事事受杨刁难"。杨也常流露过:"纵然是你们张家的事,但主管人不答应也办不通。"所以张只得用小言小语以求疏解。第二次奉直战,山海关正面酣战之际,郭松龄、姜登选在会议上发生龃龉,郭拂袖而去,并令军队后撤。姜曾向张学良表示,"茂宸此举有犯军法"。他们的矛盾不是一个人,而是由派系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姜登选住在沈阳钟楼南大红袍胡同,他们聚会常有豪赌,也约郭参加。郭令军需官张振鹭、裕民银行经理王兴让随往计筹。一夕郭负甚钜,非力所及,姜、韩等藉此以窘之。这些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杨宇霆权臣在内,大将难立功于外。是为郭反戈之主因。郭"养电"中所谓清君侧,即系对杨而言。

张作霖的行赏不公。郭松龄自一面坡、佳木斯剿匪初建功勋后,两次奉直战争都亲自督战。榆关、姜女庙炮战中,且为弹片伤及背部。医官鲁承周挽之,郭挥之去,指挥自若。为张氏取威定霸,功不能在杨姜下。第二次奉直战争胜利后,因李景林、张宗昌经冷口进滦州,击败直军,直趋津浦线,据有地盘,在功绩上分别得到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事犹可说。及苏、皖、

沪、宁相继落入奉系势力范围，郭觊觎地盘之心甚切。适有其陆大同学皖南镇守使王普为内应，郭并予遣刘伟第二旅驻蚌埠，推荐彭振国（郭的陆大同学）为皖督署参谋长。郭认为皖督非己莫属，乃张作霖竟令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致使郭大失所望。尤以为杨、姜二人论功在己下，而赏则居己先，因此愤懑不平，难以抑止。姜到皖后，又撤换彭振国，而易以戢翼翘（姜士官同学），郭益为不快。本来张作霖拟以张学良督奉，令郭为帮办，但又虑自己架空，迟迟未作决定。杨、姜到宁、皖不久，均为异己军阀所驱逐。杨仍任总参议幕僚高位，愈增郭之不平。郭后在滦州发第二次通电，历数杨宇霆祸奉罪状，谓："杨之为人，残忍成性，阴险万状；排除异己，妒忌老成。""杨督苏后，遍树私党，滥用职权；苛敛民财，诛求无餍。""返奉后，罔知忏悟，仍积极主战，以冀扫其苏沪之耻。"张作霖明知两人矛盾，不宜再使杨复位；处置不公，更难于平郭之愤。

郭松龄早有闭关图治、移兵开垦之志。第一次奉直战后，欲赴洮南屯垦，寓兵于农，而内战频仍，终未能实现。郭在滦州会议所主张的"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确有此意。其在数杨罪状中亦言："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即率所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看来并非徒托空言。

二、外　因

1925 年秋，郭松龄赴日本观操时，住在东京帝国旅馆，与冯玉祥的代表有所接触。郭在极度愤懑的情况下，受其煽动。回国后住天津意国医院，又与李景林有所勾结。郭加入冯玉祥国民军，编为国民军第四军，并同冯签署协定 7 项，其中有："国民军随意驻扎保大、京汉线，自由出入天津海河口；郭军经

营东北和内蒙古，改造东三省政府，国民军以诚意赞助之，并牵制反对方面；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治理，国民军对热河决不进攻；郭军诚意赞助国民军开发西北，必要时以实力赞助之。”郭倒戈后，冯即资助60万元。

1925年秋，杨督苏，姜督皖的发表，张学良、郭松龄皆不满张作霖的措施。迨郭自日观操返国，杨已回任总参议。郭过沈阳并未停留，即急赴天津军团部。张学良已察觉情形不对，正拟加以安慰，适值被召回奉。此时郭遂将军团部移于滦州。时间紧迫，张学良纵不回奉，亦难有回天之力。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

郭松龄反奉亲历记

◯魏益三 **撰文** 唐永良 **整理**

郭松龄事变，发生于1925年11月23日，地点在河北滦县车站；失败于同年12月23日，地点在关外白旗堡车站。至24日郭松龄夫妇遇害，地点在辽中老达房子。我当时是东北第十军（军长为郭松龄）参谋长兼炮兵司令，亲自参与其事。谨就记忆所及叙述如下，以备近代历史研究者之参考。

一

1925年10月，我部驻扎锦州，接张学良由沈阳发来电报，叫我到沈阳有事面洽。我于是到了沈阳大元帅府内少帅办事处，见到张学良。此时张作霖已发表杨宇霆为江苏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两人并已上任。郭松龄奉命赴日本参观秋操，才由日本返回国内。我见到张学良，张说："老魏，我成立第三军团（共辖三个军，即姜登选的第八军，韩麟春的第九军，郭松龄的第十军），你作参谋长兼炮兵司令（当时的参谋处长是彭振国，上校参谋是鲍文樾，秘书长是刘鸣九）。司令部的同人也都欢迎你来，不过茂宸（郭松龄号）要你去帮他的忙，并且很

坚决。"我说："没关系，到郭那里也可以。"张学良听了我的话后，立即打电话给郭松龄（郭此时在北大营）。张说："魏旅长已来，你同他讲话吧。"郭在电话上叫我迅速到北大营面谈，张于是派汽车送我去北大营。郭松龄见面对我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你不要嫌职位低，无论如何要来帮我的忙。"当时屋内没有别人，郭问我："进关的队伍，去了多少？"我说："已然过半了。"此时第十军军部尚未正式成立，军部驻地已然决定设在天津河北公园。郭说："你的炮兵旅可以找人代理，你先赴天津组织司令部去吧。"八、九、十，三个军的编组都归郭松龄主持，郭对人事抓得很紧，甚至三个军的卫队营营长人选都要经他决定。他悄悄地向我表示："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最反对为少数人去争督军。试想这样谁受害，还不是东北人民吗！"由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郭反对进关争夺地盘，他认为东北有的是事儿做。

在叙述郭松龄事变前，不能不提到直奉第二次战争。直奉二次战争，郭松龄功劳最大。那时郭是奉天第三军的副军长（军长是张学良），张学良驻前所，郭在山海关前线。第二、六旅增援九门口，张学良先到。郭松龄不愿意担任总预备队，要求给他一个正面，往出打。郭说："我自己练的兵，我有把握。"张学良开始不同意他的请求，郭断然地表示，不答应他的请求，他就走。张学良紧紧地追赶，恳切地挽留，答应了他的请求才算回转。郭带队由九门口（九门口原系姜韩部队攻占）出来，一直冲到海阳镇。直军溃退，彭寿莘、田维勤等部都在山海关缴械。这一役郭松龄部掳获步枪 30000 余枝、机关枪 2000 余挺、大炮 200 余门。当时张作霖有电令，胜利后主力在山海关一带构筑工事，以一部追击直军残部。旋郭松龄进驻秦皇岛，郭对直军采取宽大政策，送赠已缴械直军军官大批烟酒衣物，并把

直军编成三团制四个旅。其时张宗昌所带部队(三团制一个混成旅)在滦县附近(张由冷口方面来追击者)亦收编直军四个旅。郭所用高级干部大多数都是二、六旅军官,对韩(麟春)、姜(登选)两部的干部则未选用。张学良对郭松龄一切调度,是"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时一、三联军司令部驻在榆关天泰栈。一天,张学良、韩麟春、姜登选都在那里,姜、韩在一间屋中吸鸦片,情绪极不高兴。张学良对我说:"请茂宸来一下。"郭不久来到,我乘机对郭说:"古人说'功高震主身危,名盖天下不赏'。外边谣言很大,你这样处理直军,对姜、韩太难堪,而且大帅那里能否通过还成问题。你要多考虑,对姜、韩也应弥补一下。"

不久张作霖在奉天召开军事会议,由榆关前往参加者有张作相、张学良、韩麟春、姜登选等人,郭松龄留在山海关。又数日,张作霖有电来到,指令每旅编入补充团一团(即直军编来者),不准成旅。张学良另有长电给我,叫我劝郭听从命令,不要执拗。郭松龄接到电报极不愉快,最后不得不点头承认,并回电表示遵照执行。又不久,张作霖进驻北京顺承王府。张学良的京榆驻军司令部设在天津扶轮中学。我到京去见张学良。张屏去左右说:"大帅在此,各国公使都来谒见,姜登选、韩麟春也不断前来,独有郭茂宸不来。你便中说说茂宸,同时告诉他不要常和李景林、张之江往来。将来他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是时郭松龄和其妻韩淑秀住在北京饭店,我即时去找他。郭正偕其妻准备外出,见我来便返回饭店会客室。郭妻窥出我有密语告郭,遂退出。我当将张学良告郭言语转达,郭闻言后说:"我决不要地盘,我一心就是要练兵。"谈后不久,郭径赴顺承王府去见张作霖。

郭松龄对张作霖及张亲信人物的态度,有另一事也可以

窥见一斑。在郭松龄去日本观操之前，郭在北大营。一天张学良来电话，说大帅为躲避烦嚣，准备赴高山子别墅休养，希望郭去新车站送行。张学良给郭打完电话又给我电话，意思相同。郭当时在电话上表示有事不能脱身，实际情形是郭主张多办实事，不必养成送往迎来这一套官场习气。经我劝说，郭才同我一起去新车站。张作霖旋到站登车，见到郭松龄说，“茂宸你还没走吗?”郭松龄仅向张作霖举手行军礼，对张身后随行的杨宇霆则不予理睬，双方也不谈话。不久车开，郭和张学良随车送到皇姑屯，我则返回沈阳。郭松龄在未赴车站时向我表示:“我到日本准备研究研究学术，到日本陆军大学旁听或到步兵学校学习。”从这一情形也可以看出，郭一方面表示消极，一方面对张作霖及其亲信人物如杨宇霆等人都不满意。

二

1925年11月，我到天津第十军司令部，郭松龄正住意国医院。一天我带领参谋处长尹祖绳和军需处长张振鹭去见郭，郭表示公文尽由我处理，不必送他。我见郭时，发现郭屋内有两个陌生的人，瞬间躲入内室，以后方知这两人是饶汉祥与林长民。同时在司令部传达室发现有熊斌前来拜访遗留下的名片一张。不久第五旅旅长刘维勇前来见我，问我见到郭否?刘当告我:“在前两天一个夜晚，郭曾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一次集会。郭当场讲述不满意奉天方面的所作所为，说不应为争夺关内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使广大东北人民遭殃。郭悲愤激昂，以致痛哭流涕。”刘维勇并说:“刘伟、刘振东、范浦江、霁云等人都盼望你来呢。”后来我在某旅馆见到刘振东，他唉声叹气，情绪极度悲观。不久我又到意国医院去见郭松龄，郭表示

应即组织部队向东开拔(当时部队都集中天津周围)。我返回司令部,筹办输送,当时尚未谈到如何编组,只扼要地说不要使部队分割。经过数日,总司令部开到雷庄。郭找我,我带尹处长到火车客室去见郭,郭严重地说:"我们要讨张!"这一声把尹处长吓得目瞪口呆。郭旋即对我说:"你是全军参谋长兼炮兵司令,研究如何向关外进军。讨张的电报(按系饶汉祥手拟)已然拟好。"我当时曾说,饶电文章太深,最好再拟一个比较通俗的,使能家喻户晓。

郭松龄在滦县附近召开一个有各级主官参加的军事会议,郭妻韩淑秀也参加此会。郭宣布通电大意,并即席发表演说,大意说他反对奉天方面争夺地盘,贻害东北人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演说后,准备花名册一本,请大家签名。随即郭又宣布接受冯玉祥委任为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共辖四个军,即:第一军刘伟,第二军刘振东,第三军范浦江,第四军霁云,我为参谋长兼全军炮兵司令。同时将有嫌疑人员指令退席看押,其中有副军长齐恩铭、高维岳等。有人对邹作华表示可疑,但邹当场表示积极反奉服从郭松龄的命令,故郭对邹未予处理,仍任其为总部参谋长。

进军计划规定:刘振东军沿京榆大道徒步行军向山海关前进,其余大部队由火车输送,刘伟部队先开始行动。此时,山海关驻有张作相军团,锦州驻有朱继先旅,北大营驻有王瑞华旅(朱、王两旅,郭松龄认为是自己人,不料事变后相反)。我当时向郭建议:"山海关关系最大,应当拿到手中。"郭闻言即时下令,说"你任第五军军长,带两个团(十八团,团长杨焕彩;九十团,团长张廷枢,张作相子。)和一个工兵营(营长柏桂林),即时向山海关进发。"我率部搭火车过山海关时,站上稽查人员向我询问,我佯言部队回奉整训。开过山海关后天已入暮,

工兵营开赴兴城。我们到达万家屯车站，等了一夜，未见后续部队到来，遂在万家屯车站及其东北山地构筑工事。翌日上午，驻扎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队忽向我部发起攻击，并有山炮4门向我方射击。同时有6架飞机由东飞来向我方投弹，并撒下传单。传单系九十团团长张廷枢署名，劝九十团归返奉天。我部战至日暮，张作相部队利用夜暗撤往锦州、连山一带。

当郭松龄在滦县发动事变之前，他委派张廷枢任九十团团长，原想要张廷枢持函找他父亲张作相进行劝说，希望张作相合作。在这同时，郭又令齐副军长之子齐家桢劝其父一起反奉。不料这两人首先跑去山海关告诉张作相，说郭松龄反了，因之张作相急离山海关驰往锦州，作了必要的处理，并在连山布防。

奉天空军司令原是张学良，郭于发动事变时改委彭振国担任。实际上，奉天空军在事变刚发生时即扫数由关内飞返奉天。张学良本人原在天津英租界，事变后亦急返奉天。

我率部队退至山海关小河口附近，此时关内仍无后续部队开来。我到柳江矿务局坐轧道车赴昌黎见郭松龄，报告前方情况，并催郭率部迅速前进。郭说十八、九十两团改归总部直接指挥，另拨我吴魁林一个团，野炮兵一个团、工兵一营、骑兵一大连及手枪队一部，仍回山海关。不久郭率部攻下连山（郭攻下连山后又拨我部500余步枪），郭本人在兴城火车上指挥作战。

我去兴城车站时，总部参谋长邹作华叫我看郭给阚朝玺、汤玉麟、于琛澂（3人在义县左近）等人的回电。我认为这件事关系大局，这个回电太不妥当，当劝郭修改，郭不听。原来阚朝玺、汤玉麟、于琛澂等人曾派代表来找郭（阚的代表姓邱），希望合作，但索要黑龙江或吉林地盘。郭回电仅发表阚为总参

议,汤与于为参议,对于所要地盘则置之不理。郭并令霁云部队扫荡奉热边界,对象当然为阚、汤等部属。阚、汤、于等见投郭无望,转而投奉。张作霖对阚等既往不究,并应允加官晋禄。刘振东、高纪毅两人与郭关系较深,他两人亦为此事劝郭,郭仍不听。

阚朝玺有一师一旅,汤有骑兵一师,于有骑兵一师。由于郭松龄对彼等不收纳,不但失去许多帮助,彼等反而在郭军左翼进行破坏活动。郭松龄为人刚愎自用,一切操之过急,以致于坏了大事。

这时姜登选从安徽督军任上被赶回来,准备出关,在滦县被郭松龄扣留,不数日即遭枪杀。

促使郭松龄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三角联盟"的失败。在天津尚未出发时,我曾随郭参加一次三方面会议,地点在天津督署,出席的人是熊斌(代表冯玉祥)、李景林和郭松龄。原来三方面已有协定,内定李景林去热河,但李景林的部队(旅长名张宪),在邯郸左近被国民二军、三军围攻甚急,不能脱身。李景林坐立不安焦急异常,有时热泪满眶,几乎要放声痛哭。大家请熊斌想办法,熊亦束手无策。会议不欢而散。郭遂率部开赴滦县。假使李景林能到热河,郭军左翼可以无忧,而且必要时李景林部队可以迂回长春切断吉黑与奉天之联系[①]。

李景林由于受到国民军的攻击,愤恨至极,适李景林之母由奉天来一长电,说张大帅待人如何之好,劝李投奉,李遂决定归附。当时郭在津寄押人员齐恩铭、高维岳、戢翼翘等人都被李释放。郭一度令我对关内李景林防守,其根源即在于此。

---

① 李景林进关时编为一军,共有一师三旅。后来准备扩编为三师五旅,但未编成。事实上李的兵力已超过一师三旅。据知底者言,李景林舍不得河北,并不愿去热河。

李景林之中途变化，使郭松龄失去了后方，对于粮弹等补给也受到极大影响。

三

郭松龄前进至锦州，我仍驻山海关。一天日本关东军派浦大佐，由旅顺搭汽艇到秦皇岛登陆，到山海关见我，要求会见郭松龄。浦大佐携来关东军通牒一份，经我部中校参谋盛世才等翻译，内容大意是："国奉两军在南满铁路两侧及其两端 20 基罗米达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违者解除其武装。"我派员将浦大佐送往锦州郭松龄司令部。又数日日方又派来一个中佐，更改 20 基罗米达为 12 基罗米达。事实上日军只在限制郭松龄军队的行动，实际上张作霖的部队不但不受任何限制，而且尽量给张军以便利。听说刘伟的部队到达沟帮子，派一个旅去营口，当时营口辽河有奉方鲍英才一个营防御。日本驻营口领事某立即出来干涉。该领事一面宣读关东军的通牒，一面威吓地说："你们不要以为此间只有鲍英才一个营，我们日军在南满有两个师团，在朝鲜有两个师团，随时都能开到……"态度蛮横异常。郭松龄之失败，原因甚多，但主要原因，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

据郭松龄之子郭鸿志谈：郭松龄的中校随从副官赵云飞谈过，在沟帮子郭松龄和日本某大佐开会时，赵担任警戒。当时日方要求割让金复海盖亦即辽东半岛，请郭签字。如果答应日方的要求，日方即予郭军以便利，日方并称张作霖已然签了字。郭松龄严辞拒绝，甚至拍桌，谈判遂决裂。传说，日关东军派兵一旅团在南满线上阻止郭军前进，影响极大。

郭松龄到锦州后，每天有电和后方联系，到沟帮子以及到

新民都尚有电来。某日一个整夜，通讯中断，正诧异间，忽有四个多步兵团突然撤回，即知前方不利。我派彭振国带兵一部乘火车前往联络，并准备适时增援。是时锦州驻有汲金纯骑兵一连，竟将锦州附近铁路破坏，彭振国到沟帮子即不能前进，乃率部下车进行战斗，将铁路修好，部队撤回榆关。不久日本驻榆守备队突然送来郭松龄夫妇殉难像片，至此方知郭军已然彻底失败。我立即布置防务，将锦州以西铁路行车设备暂时予以阻绝，使火车西来为不可能。在那时有宋哲元部一个骑兵旅，由关外匆忙撤进关内。

反奉战争失败后，我当即招集步兵团长及独立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大多数都主张要团结，要继郭松龄遗志，奋斗到底。独炮兵团长李宜春认为祖宗坟墓和父母都在奉天，不愿对奉方作战。我当时说，不愿干者可以由天津返回奉天，决不勉强。即时将李宜春撤换，炮兵团由刘家祺继任。个别人中也有主张过份消极，准备把武器投于海中者，经大家反对未能成为事实。旅长吴魁林态度比较消极，但亦无异议。

不久林长民之子前来见我，我赠他2000元，以示安慰。中校参谋盛世才与郭松龄关系最深（郭曾为盛夫妇主婚）悲痛最切，我赠盛2000元命赴日本陆大上学。

旋张学良派刘伟、高纪毅乘兵舰到秦皇岛，要我前往面谈。我派郝梦龄代表前去。在兵舰上，刘、高表示：少帅恳切希望魏司令带队回去，他保证部队不予分割，东北这点武力最好不要损失云云。郝梦龄代表我答复说：“有杨宇霆在，怕不能相容。对少帅言，我图报于将来吧。”后来刘伟由兵舰走下到附近一别墅中对郝说“干吧！回去干吗?!”

隔数日刘振东骑马带两随从来榆见我，袖出张学良信一封，劝我回奉。我向刘振东说：“我对少帅图报于将来吧。”我并

劝刘留在此处，请他担任榆关警察所长兼蓟榆镇守使。刘说："此地不能久安，奉天必来攻击。"于是刘经天津返回奉天。

我子魏我威任少校团副，在前方被俘后释放，张学良交予一信，劝我回奉。我威在天津把信邮递给我，他径返北京陆军大学上学去了。

郭松龄死讯传出后，冯玉祥派李烈钧和方声涛来山海关会我，冯准备两个职务由我选择，即东北国民军总司令或国民第四军总司令。我以为前者称号太大不相宜，国民第四军称号与目前兵力尚属接近，遂决定接受国民第四军总司令职务，并于1926年1月3日在山海关就此新职。

郭松龄之失败，除上述诸原因外，邹作华的倒戈亦为内部坏事的最大因素。邹为奸险阴毒分子，一贯投机取巧。郭松龄用人不当，致招大祸，诚可惋惜也！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

◯ 鲁穆庭

1925 年 11 月郭松龄反奉时，我正在镇威第三方面军团充任军需处长，出席了他所召集的滦州会议。下面的记述大都是我亲自经历的，间有闻自他人者亦极少。惟事隔 30 多年，记忆可能有所出入，尚望知者加以指正。

一、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关系

郭松龄字茂宸，辽宁沈阳县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在广州军政府当过营长。1918 年经秦华介绍回奉天，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适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因与郭相识。张见郭生活朴素，工作认真负责，且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认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向乃父张作霖推荐，委为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张时任卫队旅旅长，卫队旅番号是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1921 年 8 月扩编军队，郭即升充步兵第八旅旅长。郭就任旅长后，秉承张学良的意志，多方罗致人材，不论军官佐，凡是军事专业学校出身的都收入第三旅差遣队储才备用。遇所属部队各级军官佐出缺，即亲自选拔下一级优秀士官升补。此

外，并设有军需教育班和军士教导队，以培养军事骨干人才。这些措施在提高东北军的素质上取得显著的成绩，因而受到部属的爱戴和张学良的进一步信任。当时三、八旅的事务一般均由郭松龄处理，张对郭是言听计从，军队中连长的任用，多由郭先行酌定或即派充；营长则由郭与张商量后任命，可以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其关系的密切可以想见。

二、郭松龄在东北军中所起的骨干作用

郭松龄对于治军确有一套办法，人们称他：大公无私，量材器使，信赏必罚，甘苦与共。因为这样，没有几年的工夫，三、八两旅成为东北军中的骨干力量。第一次直奉战时，奉军败退，据守山海关使直军不得长驱东进的，便是郭松龄所指挥的三、八旅部队。当时奉军的西路右翼邹汾、张作相等师已溃不成军，纷纷逃散，只有三、八两旅撤退完整，械弹毫无损失，因此，在临（临榆）永（抚宁）一带，才能固守阵地与直军抗衡，最后达成奉直和议。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起，号称 25 万的东北大军分编为三个军：第一军由姜登选、韩麟春任正副军长，第二军由李景林、张宗昌任正副军长，第三军由张学良，郭松龄任正副军长，并将一、三两军组成一个一、三联军司令部作为主力，配置于山海关方面。其基干部队是郭松龄所指挥的二、六两旅（三、八旅改的番号）；姜、韩临时加入联军司令部指挥，并无基本部队。这次直奉战争，奉军取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前线躬冒炮火与直军周旋，一举击溃敌人的，仍是郭松龄及其所指挥的部队。奉军进驻天津后，一、三联军改为京榆驻军，由张学良、

郭松龄任正副军长，所有军中事务仍多由郭松龄来主持办理。

经过两次战争，郭松龄为张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威信也日益增高，便成为东北军中代表张学良新生势力的中坚，不免引起老一辈代表旧人物的嫉妒，虽由于张学良的信任无可奈何，但暗地里隐藏着新旧势力之争。

三、安徽督办发表后郭松龄心怀不满

第二次直奉战奉军取得了胜利，其势力伸入到山东、安徽及沪、宁一带。张作霖论功行赏，发表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李、张二人系奉军的第二军正副军长，在第二次直奉战时，由冷口攻入滦州，树有战功，在郭看来不认为赏过其分，但他觊觎地盘之心甚切。时安徽督办尚未定人，郭便派其师部军需处长张振鹭（时郭任第六师师长）以采购军米为名三下江南，到芜湖、安庆一带，访询地方军政情形和人民生活状况。他以为安徽雄踞长江，扼津浦路要冲，向为兵家所称军事重地，加以财政方面每年约有 2000 余万元收入，确实大可有为。当时督办一席虚悬，暂由吴炳湘护理。郭遂荐彭振国为督署参谋长，调奉军第二旅刘伟部驻皖北，该省原有王普一师驻皖南（彭、刘、王均系郭的陆大同学）。他以为布局既定，安徽督办可以唾手而得，不料后来发表了姜登选，遂大失所望。并且姜到任后，又立即撤去彭振国的参谋长职务。与此同时，张作霖又发表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郭认为数年来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将军，反不如帷幄之内出谋划策的一个参谋，赏罚不公，莫此为甚。忿恨之情，有加无已，乃不顾一切决心反奉。

四、滦州车站军事会议一幕

1925年秋，孙传芳以5省联军的兵力，击溃了沪、宁等地的东北军。杨宇霆狼狈逃回奉天，姜登选也受困于安徽。再加上冯玉祥窥伺天津蠢蠢欲动，奉军占有的地盘日蹙百里。张作霖为挽回颓势，维持残局，遂调遣军队应援安徽。时郭松龄正在日本观操，张作霖乃以急电召回布置军事。并任张学良为镇威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郭松龄为第十军军长，归第三方面军团统率。郭受命后先去天津布置一切。

迨张学良到天津，郭松龄即托病住在意国医院。晤面时间甚少。未及旬日，张被电召回奉天，所有第三方面军团事务照例由郭办理。郭松龄乃将部队和军团部均行东撤，至于因何撤退官兵均不知晓。军团部撤到滦州的次日（11月20日）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凡在滦州的官佐上校以上均行参加，约有百人。会场四周戒备极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会场内的气氛也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佩枪实弹，来回巡视。郭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出席。他发言时首先说："自民十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又说，"以前两次战争（指一、二次奉直战）伤亡官兵为数甚多，恤金一项迄未发下。如王兴文、王盛椿的家属屡屡向我询问，我无言以对。军需处可以宣布其情况。"我当时想到这次会议不同往昔，郭发言的意图也令人不易索解，但仍须将实际情形加以解释。我说："团长王兴文，营长王盛椿的恤金，因为数目较巨，按规定应该分批办理，已于此次出发前发完。其余官兵有因籍隶外省（山东、河南、直隶者

最多),道途遥远,具领手续一时办不齐全,尚有部分未能发放。"郭接着说:"这是我日前面陈张军团长转催始得领下的。在老将(指张作霖)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忌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的,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远胜于阋墙的战争吗?现在拟好两个方案,写在两张纸上,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1)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2)战争到底,武力统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肃静,面面相觑,无一人发言。旋由出席的赵恩臻、齐恩铭、裴春生、高维岳四位军长首先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在第一纸上。签名后,郭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即应声说:"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拭泪。出席官佐均默默无言。郭继续说:"福堂大哥(赵恩臻号)、振东大哥(裴春生号)、佐臣大哥(齐恩铭号)、子钦大哥(高维岳号),你们跟老将多年,对老将是十分忠实的,决不应该背叛他,我也不忍心强拉你们造反。你们四位可暂时休息一下,待我成功之后,绝对请出帮忙,到那时候乐意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说完宣布这四位军长退席,派宋九龄旅长把他们送到天津,并要我开具5000元支票,交宋旅长作为他们的路费。我遂退出会场,乘马回军需处(距会场五六华里),开了支票,归来已经是黑夜时分。碰见邹作华,我问他:"是否散会?"邹面带不悦之色,回答:"已经散会。"我又问,"会议决定了什么?"他告诉我有关人事变动的情况,即邹作华为总参

谋长(因郭对邹向不信任,故将其炮兵司令撤掉),饶汉祥为秘书处长(原任秘书处长李少白调充驻北京代表);军衡处改为政务处,派林长民为处长(是预备当奉天省长的);添设外交处,派王正廷为处长,王未到任前由殷汝耕、齐世英负责;贾席珍为军法处长,其余各处仍旧。又发表刘镇东、刘伟、范溥江、霁云(原均为旅长)、魏益三(原参谋长)为军长。以高纪毅的十九旅为挺进军,抽调该旅的杨德新营长为急先锋,率兵一营,乘火车星夜驰赴沈阳捕捉杨宇霆等。发号施令仍用镇威军第三方面军团长的名义(出关后,改用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名义)。我将5000元支票交与宋旅长。事后得知赵、裴、齐、高四人到天津后即转道回奉天,郭所送的支票并未支取。

五、郭松龄交办的几件事

滦州军事会议后,郭松龄要我办几件事,我即往返于京津间,没有随军团部东下。这几件是:

(1)兑换边业银行纸币。滦州会议的第二天,由北京开赴奉天的快车挂有铁棚车一辆,系天津边业银行赴奉天送账款的包车,有押车宪兵两名,经理郭静斋随车同行。车到滦州被郭的副官马子扶查获,即报请郭松龄责令军需处接收,以充军饷。但车上仅有少数银元和银锭若干(数目记不清)可以使用,余为该行收回的旧纸币和公债账目等。郭认为数百万旧纸币可以设法使用,乃令我押运赴津,把旧纸币存入别家银行另取流通的纸币。同行还有郭的参议谭家骏。车到天津站时,直隶军务督办公署稽查处即派兵监视,不准下车。经谭向督署参谋长潘伯豪解释,说这是郭军军需处来津运取服装的车,始得解

除监视。我们下车后即赴各银行分别试存，但均遭到拒绝，遂原车返回，仅谭家骏从中借去500元留为自用。

(2)请饶汉祥拟通电。我到天津又往英租界访晤饶汉祥，出示郭的亲笔信和支票(大约5000元，确数记不清)，请他代拟通电。饶欣然应允，并说："电稿日内即成，不误使用。"① 看情形似早有准备。据我所知，当时郭松龄的弟弟郭大鸣在津、京一带大肆活动。饶的欣然应允，可能已与郭大鸣有所接洽。

(3)赴执政府探询对郭的态度。我还随同郭的参议谭家骏去北京见段祺瑞执政。段派他的儿子宏业代见。未等我们发言，段宏业即说："郭松龄请求政府罢免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发表他为奉天军务督办，这种举动执政认为如同造反，政府方面为维持纪纲应予制止。但根据目前情况不欲为此无用的表示，只有静观事态的演变。他的请求政府不能照办。"又说："这次不是你们两位来，政府定不接见(段宏业是谭家骏的学生)。今后你们的代表应指定专人，常常更换实非所宜。"段所说的常常更换，可能是指在我们求见之前，郭松龄的弟弟郭大鸣已求见过段祺瑞了。

六、姜登选被杀经过及原因

滦州会议后郭的军部沿铁路前进，留彭振国为后方司令驻滦州。皖督姜登选专车到滦州车站时，彭上车晤姜说："郭军

① 饶汉祥是黎元洪总统的秘书长。自黎下野后即蛰居天津。静极思动，不免见猎心喜，为了东山再起，从天津赶赴前方，屈就秘书处长之职，后升为秘书长。养电的骈四俪六，佶屈聱牙，确是他的手笔。郭松龄在白旗堡失败时，饶徒步到营口，搭船跑回天津。到天津后，向朋友发出安然返回天津的电报。后来张学良到北京，饶汉祥写信给张，说养电不是出于他手，而系旁人所拟他给修改的。有"无伤麾下乔梓，请求谅解"等语。

长现患感冒甚重，不能亲来迎接督办；但希望与督办晤面。”姜说：“茂宸患病，我可到他那里去看看。”他遂与彭同乘备好的汽车进城，进城后即被杀害，埋尸于东门外野地。

按第二次直奉战时，姜充一、三联军军长，郭在战争紧张时，因不满意姜、韩对郭部炮兵营长阎宗周的撤职处分，竟负气撤出军队向后背进，幸被张学良发觉及时劝阻，才未影响战局。事后姜登选曾对张学良说：“茂宸这种举动影响战局甚大，按军法是应当处死的。”郭闻之怀恨在心。又在姜登选到安徽接任督办时，首先撤换参谋长彭振国而易以戢翼翘，此亦极为郭所不满。郭的顿起杀机或即在此。

七、所谓冯、李、郭的三角同盟

郭松龄反奉是与冯玉祥、李景林有联系的。养电发表后，冯寄以很大希望，除馈送大批罐头食物外，并给予现款20万元。边业银行在北京设有分行一处，郭为了筹集军饷，没收张作霖的财产，令我查封该分行，西北军也曾予以协助。我到北京将冯玉祥的协饷20万元领取后，旋即会晤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他当时派人帮同查封了边业银行北京分行。不过该行在北京并无业务，亦无存款，仅有职员三四人，只得在账上盖章封志空库而已。

我在北京事毕去天津，持郭松龄亲笔信，往见李景林，请借款30万元，借子弹80万粒。原来郭松龄在发动军事时，曾打电话给李景林，请他通电声援，以壮声势。李景林回答说：“我的老母现住在奉天，日来已被监视，我心中感到十分不安，若对你再有表示，老人家的危险更大。因此，我是不能有什么举动的。”郭接着说：“我的父母也住在奉天，我是不管这些的。

他(指张作霖)也不敢将我们家眷怎样,你放心吧!”在郭反奉期间,郭、李的家属均未受到任何迫害。这次郭令我向李景林借现款及弹药,也是为了探测李景林的真实态度。

我到天津的次日,便去会晤李景林。李派军长李爽垲代见。我向李军长说:“郭有亲笔信令我交李督办(李景林)”李军长说:“督办因事不能亲自接见,可把信交给我,有事我也可代答代办。”我遂取出郭信,并说明借款、借弹药的来意。李爽垲说:“东北军队粮服弹药向来充足,少帅(指张学良)部队,尤较他人为优。茂宸举事未及一周,亦无大战,哪能就缺弹药?直隶现在腹背受攻(指河南、山西和北京一带的冯玉祥部队),战事一触即发,自顾不暇,焉有余力接济他人?我们是无子弹供给你们的。至于款项问题,可以径找军需课长王维张谈谈,他是否能设法资助你们。”我说:“军长、督办不发指示,军需处怎能借钱给我们呢?”李笑而回答:“军需独立嘛!你可去谈谈。”于是我又找到军需课长王维张,向他说明来意,王说:“我们都穷透了,哪里有钱借给你们,还想从你们借钱呢!”结果,一文一弹也未借到。

时值冬令,军队防寒服装因交通断绝多未送到,郭乃令将冯的协款20万元,在天津制做棉大衣6万套,但服装制成亦因交通断绝,不能运出。另一方面,直督孙岳(时李景林已败走)闻风,派人四出搜寻,有意将该项服装没收。不得已,乃将6万套棉大衣寄存在日商山下株式会社的仓库内,郭失败后才运回奉天。

八、郭松龄反奉的失败

郭松龄原以为张作霖身边无兵,乘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

耳手段，一举攻下奉天。但张廷枢（张作相之子，时为旅长）齐家祯（参谋）在滦州会议后，即向张作相告密。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团驻山海关，所以郭军的急先锋杨德新营一到山海关即受到阻碍，不得长驱直入偷击奉天。又军队的 11 月份薪饷应于 12 月初即行发放，但事前毫无准备，只得以边业银行的银块和沿途征收的捐税发放一部分。又郭的反戈方向，并未向广大官兵宣布回师的意义，绝大多数官兵均莫名其妙，惟听从上级命令。迨军队出关，逾锦州，抵新民，直迫奉天，士兵才知道真象，议论纷纷，说这是以张学良的军队攻打张作霖，真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多数表示：“吃老张家饭打老张家，俺不干了。”当时军心非常涣散。加以军队到白旗堡时，张学良的司令部设于兴隆店，双方距离甚近，参谋长邹作华，旅长陈在新、富双英等，立即率部向张投诚。全军官兵更没有战意。

郭见大势已去，化装偕夫人韩淑秀乘民间大车一辆，带随从三四人往南逃走。行至辽中县老达坊时，奉天骑兵王永清部追击甚急，乃藏于民间菜窖中。旋被发现，遂遭捕获。张作霖本欲将郭解沈阳亲自审讯以泄忿恨，再行处决。张学良也想见郭一面以询究竟。惟杨宇霆以解送怕他途中脱逃，或被外人（指日本人）劫走，遂矫命王永清就地杀害。郭氏夫妇尸体运至小河沿陈尸 3 日，然后令其家属埋葬。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 1 辑〕

郭松龄反奉的军事部署及战斗经过

○ 韩世儒

郭松龄反奉期间，我任第二军参谋长，直接参加了反奉战争，因此知道一些情况。兹将所能回忆的某些史实，概述如下：

1924 年第二次奉直战争，奉军把直军打垮后，奉军长驱入关，势力直达江苏。李景林为直隶督军，张宗昌为山东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杨宇霆为江苏督军。1925 年秋，陈调元、白宝山等以武力赶走了杨宇霆和姜登选。张作霖大怒，非要打他们不可。于是将军队编为六个方面军团。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团长，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团长，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团长，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团长，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吴俊升为第六方面军团长。除李景林、张宗昌、张作相、吴俊升所辖的部队外，所有的部队都编入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军团之内，也就是郭松龄平时所指挥的部队。郭松龄在名义上虽是第三方面军团副军团长，而实际上是两个方面军团的总指挥。

1925 年 10 月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军团的部队集中至天津南北铁路沿线附近，第五方面军团的第九师集中在昌黎附近，第十五、第十六两个师集中在山海关附近。在集中时，郭松龄正在日本参观日本陆军秋季演习。部队集中完毕后，郭松龄

从日本回来，至第三方面军团所辖各部队讲话。首先说："集中完了我来看看你们。再说你们要服从命令，不要听信谣言。"对于为什么要集中，要对谁来作战，一字也没有提。最后是慰问大家。发给每个官长10元钱，每个士兵5元钱的慰劳金。不几天，张学良到天津，郭松龄向张学良透露了反奉意见。数日后，第二旅旅长刘伟亲自向我传述了那次谈话内容。说："郭鬼子说我们打了胜仗（指第二次奉直战争），杨宇霆、姜登选他们去作督军。他们干不好让人家给赶出来，如今又让我们去打，打好了还不是他们作督军。我们这次是不愿意再打了，还是回去好好地整理整理东三省吧。"并且说"我们拥护你来干！"张学良说："那怎么能行呢？"但也没有什么特殊和坚决的表示。最后对郭松龄说："你看着办吧，我走了。"可以说郭松龄的行动，张学良是知道的。

张作霖知道郭松龄率兵返沈，首先大骂"小六子"（这是张学良的小名）不应当重用"郭鬼子"，遂后就骂"郭鬼子"（郭松龄别号）没有良心，看着我大帅府好了，他也要来住一住。他派人找张学良说话，未说以前大骂一顿，因此张学良绝不敢回沈阳。此时跟着张学良的只有鲍文樾、朱光沐、谭海等人。事后，鲍文樾对我说："我们判断'郭鬼子'能够成功，为了避免舆论和伤了父子的情感，张学良准备先到法国去。我们连船票都买好了，只要老帅一走，我们也就出国了。"

张学良由天津走后不两天，郭松龄就下令第三方面军团的部队向后撤退，到滦州附近集中，此时郭松龄反奉的行动已经明朗化了。军队到达集中地后，即召集团长以上人员在滦州开会。郭松龄正式宣布班师回东北，撵走老张、拥护小张、整理东北、开发东北。同时宣布战斗序列和作战计划，将所有军队编为四个军：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负责消灭昌黎、山海关一

带的部队(即第五方面军——第九、第十五、第十六共三个师);刘伟为第二军军长负责占领沈阳并维持治安;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负责锦州铁路沿线的维护;霁云为第四军军长,负责预备队之责。以后编了一个第五军,军长为魏益三,驻山海关附近地区。在宣布反奉的同时,郭撤换了几个与自己不一心的人。如将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调为参谋长,将刘翼飞、陈再新等撤职。

军队行动的计划是第一军徒步开往昌黎、山海关解决第五方面军团;第二军乘火车直趋沈阳;第三军乘火车随第二军之后到达锦州附近地区;第四军暂不动。当这个计划宣布后,几乎一致地认为不妥,并建议第一军应先乘火车到达山海关解决第五方面军团的部队,然后就可以无阻碍地直趋沈阳。因为知道铁路沿线和沈阳附近,除了第五方面军团以外是没有部队的。如果直趋沈阳的第二军先乘火车通过山海关,就必定使人疑心而发生问题,很可能破坏了整个计划,但郭松龄坚决不听。

部队的火车没有按时准备好,如第二军原定上午 6 时出发,直到上午 10 时才有车来,郭松龄焦急万分。适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是杨焕彩团,另一个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团)乘车由蚌埠到滦州,郭松龄就令魏益三率领这两个团先通过山海关占领一个阵地,掩护其余部队通过。这两个团通过山海关时已惹起第五方面军团的注意,当时曾追问为什么向东开部队,到哪里去等等。这两个团到达前所车站即下车占领阵地,并破坏了铁路通信设备。于是第五方面军团全部紧急行动,将这两团击溃,撤到连山占领了既设阵地,阻止郭军东进。

直趋沈阳的第二军在滦州以西的几个车站上车后,已经是深夜了。列车经过滦州时,才知已有两个团通过山海关,尚

不知山海关部队有什么行动。列车到朱格庄站时，站长报告："昌黎第九师司令部有命令，没有得到司令部的许可，东开列车一概不准发给路签。"此时知道情况有变化，但详情还不明了，当即与军长刘伟合计，告诉站长不要路签，继续向东开行。第二天早晨，列车到后封台站，站长报告昌黎后封台间的桥梁已被第九师破坏。我们当即命令站长迅速修复桥梁，令部队下车，准备作战。同时探知第九师的部队已在昌黎城关进入阵地。午间，探知昌黎山海关的部队已东撤，桥梁也修好了，乘车继续向东开行。此时负责解决第五方面军的第一军尚未到达，因此才有连山之战。

郭松龄宣布反奉之日，适姜登选乘专车由蚌埠赴沈阳，车经滦州被郭松龄扣留，于夜间拖到滦州城外给枪毙了。

连山(今辽宁省锦西县)附近的既设阵地，是 1923 年由驻在锦州的第二十七师和驻在绥中的第四旅等所构筑的野堡式阵地，工事相当坚固而完备。这个阵地是奉军准备与直军作战不利时撤退防御之用。

第五方面军团的部队撤到连山即设阵地，以阻止郭军东进，当然就惹起了一次战斗。沈阳当时没有军队，如果郭松龄首先解决了昌黎山海关一带的第五方面军团，直趋沈阳是没有问题的。连山之战给沈阳方面赢得了时间，如调动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的部队，新编了两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并在长山子构筑了防御阵地。这就是郭松龄反奉的第一着失败。

走在最前头的是第二军，军长刘伟原来是第二十七师一零六团团长、京榆驻军第二旅旅长。部队到达阵地前，刘伟认为不用侦查就可以进攻，于是决定由铁路附近以中央突破的方式进行独立攻击。但未能成功，不得已对峙 3 天等待第三军到来。

连山之战是用迂回的方式而成功的。兵力布置是第二军展开于铁路及其以南直到海滨地区，第三军展开于铁路以北地区，主攻方面在第二军。当时曾召集团长以上开会研究怎样进攻。因为当时已是11月下旬，海滨已经结冰，最后决定用两个团夜间由海滨涉水迂回以连山阵地后方，拂晓与正面同时进攻，一举而将连山阵地攻下的。

在连山对峙的第一夜，在第二军所辖的部队内，有富双英团和另外两个营，不听郭松龄的命令，乘夜脱离指挥投到沈阳去了。以后张作霖即以此部队为基干编了两个旅。此事发生后，刘伟曾派我到兴城去报告郭松龄。当时郭与其妻正在列车的一间包房内休息，我将此事报告后，其妻首先说："我说如何。"郭说："这是预料到的，跑点也没什么关系。"此外还谈了些前方战斗情况。由此可以说明郭松龄反奉，军心并不一致。

郭军攻下连山进驻锦州后，停留有一周多时间，各部队都迟迟不愿前进。主要原因是人心厌战，加上天气寒冷，士兵棉衣不全，困难之处很多。由于郭军行动迟缓，使沈阳方面的部队于撤退之后又卷土重来，并将铁路沿线的给水设备加以破坏，因而列车不得开动，迟滞了进军速度。如郭军攻下连山后乘胜前进，很可能是另一种局面。

郭松龄到达锦州后，一般人认为张作霖大势已去。但同时也探知张学良在兴隆店车站，并在长山子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作战。此时热河督统阚朝玺由承德退到朝阳，他认为郭松龄可以成功，特派邱天培到锦州见郭松龄表示愿与郭合作，要求事成以后将黑龙江省给阚朝玺。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不战而成功的好机会，但是郭松龄认为自己的力量强大，拒绝了阚朝玺的要求，未曾征求大家的意见，即下令委阚朝玺为总参议，邱天培不接受即返回朝阳。当时曾有多人向郭建议，郭则一意孤

行，全不采纳，是很大的失策。后知阚朝玺率部队走向沈阳，而郭松龄说："让他们凑在一起，我费一回事就完了。"如果当时阚朝玺率部指向黑龙江，吴俊升保家还恐兵力不足，哪能抽调部队去援沈阳，吉林也就只能自卫。事后知道沈阳各界已准备好专车，就等张作霖一走，他们就到锦州去迎接郭松龄。

由于铁路沿线的给水设备被破坏，部队大部分徒步行军，同时气候已很冷，士兵棉衣不全，士气低落，行动迟缓，约于12月中旬各部队先后到达新民附近。此时部队的态势是第一、二、三军结集于新民附近，第四军为战略预备队担任铁路沿线的守备，第五军驻在山海关一带。

张学良既不敢去见张作霖，也不敢在张作霖未走以前出国，就驻在兴隆店附近，指挥在长山子构筑阵地，以脱离郭松龄指挥的富双英等部队为基干编了两个旅，加上由连山战后退回的第九、第十五、第十六师的残部，以及黑龙江调来一个骑兵师、阚朝玺的部队，约7万步骑兵。另外重组一个炮兵团，雇用200名日本退役炮兵作炮手，使用东三省兵工厂的空炮，在长山子布置防御，准备作战。

郭松龄对于长山子阵地的进攻部署：第二军在铁路以南，第三军在铁路以北，第一军为总预备队，由第一军抽出五个步兵团，归第二军指挥为主攻。第二军军长刘伟曾召集旅长以上干部开会，研究突破点的选定和进攻部署。因为任务是占领沈阳，距离比较远，中间通过南满铁路恐发生问题，加之天气寒冷，士气不够旺盛，最后决定由新民南小岗子附近用一点突破，准备七个步兵团不停止的用锥子战术方式直趋沈阳为目的。但在进攻开始的前夜，第三军方面被敌以两个步兵团施行夜袭而全部溃乱，不得已将准备主攻方面使用的五个团作补充。因此，在开始进攻以后，虽将敌阵地突破而占领第一目标

王家窝棚，但主攻使用的部队未到，不能不停止进攻。此时郭松龄已到达新民，召集各旅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如何处理。郭决定亲率五个步兵团，仍按原来计划明日拂晓实行进攻。郭并亲写手谕传知主攻方面的旅团长。手谕是："亲率部队明早与敌决一死战，虽败犹荣，况有胜利之可期。此致某旅长某团长。"当时我负责主攻方面的进攻，可是等到第二天拂晓，郭松龄并未到来，部队也没有到达。经用电话询问，才知情况有变化，郭松龄已离开部队了。

据事后了解，郭松龄提出反攻意见之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什么第三军方面被夜袭后无法整顿啦！白旗堡车站被袭击后后方联络线中断啦！人心倾向沈阳不愿打啦！通过南满铁路日本人恐有问题等等。郭松龄听了以上情况，说："你们都不愿意打了，现在就是因为我。我走，你们跟沈阳接头就是了。"于是决定乘夜出发离开部队，一场风波宣告结束。

郭松龄带着一连卫士，计划向营口方向出走，以图再举。因为其妻和饶汉祥、林长民等不能乘马，决定乘坐大车。同时拉着元宝（天津东三省官银号的基金向沈阳运回时被截留的）和给养，天明后到达新民南大民屯，遇着了日前袭击白旗堡车站的王永清骑兵旅。郭松龄的部队都是一些十七八岁的青年，没有战斗经验，一遇敌情无法应付，全部被敌击溃。郭松龄夫妇藏在一家菜窖里，被王永清骑兵搜出。王永清当时打电话报告了张作霖，张作霖下令将郭松龄夫妇就地枪决，并将尸体运到沈阳小河沿示众。

郭松龄离开部队后，参谋长邹作华用电话将一切情况报告了张学良。张令："各部队就地不动，各级官兵维持秩序，明日我就到新民去，所有问题见面再说。"第二日午间，张学良来到新民。此时郭军各军长和司令部人员都齐集一处，听候如何

处理。张学良见面即说:"你们说怎么办?"当时每人回答有所不同,而张学良的处理也不同。刘伟说:"造反是有罪过的,如何处理绝无怨言。"结果,仍任第二旅旅长;范浦江说:"这是'郭鬼子'的所做,我是没有办法的。"结果,不予再任军职。此外,凡是郭的老同学、同事而关系较深的,如刘振东、霁云等,均撤职不予录用。当时部队不在新民而在后方的部队长官,以后也均撤职,如旅长马忠诚等。对中下级干部均照常任职,不予追究。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东北的炮兵共有两个旅,全部在郭松龄指挥范围之内,郭也认为是主要力量。但在新民附近之战,因部队紧急出发,官长检查不周,所有引信都忘携带。及至战斗开始才发觉,再运已来不及,又不敢据实报告,只好将无引信的炮弹打出去。阵地炮声虽隆隆,独不见目标被破坏,就连炸裂的声音也没有,如同抛出一个铁球。当时沈阳没有受到损失,可谓莫明其妙。邹作华是郭松龄认为与他不一心的人,事件发生时将邹由炮兵第一旅旅长调任为参谋长,邹当然是不满的。郭松龄失败后,邹作华利用这个情况来邀功,说这是他暗地里给炮兵下的密令,射击时不准安装引信,成为他以后忠实于张家的资本。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郭松龄联合冯玉祥、李景林的内幕

○陈琢如

一、郭松龄在奉的权势和反奉的缘由

郭松龄与我是陆大第四期同学。郭毕业后，充陆军部陆军第二讲武堂教官，又与我同事。后去广东投奔护法军政府任军事教官，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较深。郭在广州不多时，就返回东北，又当东北讲武堂教官兼督军署参谋。

当时张学良已经当了军官，可是缺乏军事学识，多由郭松龄与他讲解。张学良很钦佩郭松龄的才干，因此二人相契莫逆，也很得张作霖的器重。所以张学良任军长，郭松龄副之，郭的声誉权势可称一时之威。但还没有像杨宇霆、姜登选等日本留学生那样占据重要位置。恰张作霖野心勃勃，老想入关执政治枢纽，以杨、姜二人为先锋。此时日本乘机与张勾结，张承允之，因为张要在关内发展势力必须先压倒冯玉祥，也必须用武力压迫西北军。日本看到这一点，提出袁世凯称帝时的“二十一条”为交换接济军火条件，张作霖完全同意，派于冲汉到日签字。在于未到日之先，郭松龄被派赴日参观秋操，同时西北

军冯玉祥也派韩复榘前往参观，韩与郭在日本同住一个旅馆。一天，于冲汉尚未到日本，而日本误认郭此来兼有签字使命。日本参谋本部派来一个重要职员来访问，与郭晤谈不得要领，日本重要职员就走了。此事被郭百般探知，才知道日方供给军火进攻国民军。郭当初对张作霖已不满意，现在又出了张作霖签定"二十一条"的卖国条约为交换军火，于是将此内容密告韩复榘，表示与冯合作之意。

参观日本秋操完毕后，韩急速去包头，将事情向冯报告。此时郭与冯的老参谋长王乃模秘密联系(王是郭的陆大同班同学)，那时王任京沪铁路局局长时常与郭松龄见面，故郭与王二人很亲密，无话不谈，王从中斡旋极有力。韩复榘报告冯后，冯告韩："这事关系太大，不要轻率的乱作主张，必须由郭亲笔写什么东西，派可靠的人来包头见我从长商议。"韩复榘得到冯的面谕，即赶回天津，与王乃模商议，请郭派胞弟郭大鸣携带郭亲笔写的条款，赴包头与冯面商。冯见到真实证据，喜出望外。此密约是黄纸写的条款，主要有下列内容：

1. 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祸国殃民条约进攻国民军，我誓死反对。

2. 如果奉张进攻国民军，我即攻张，我的部队番号拟改为国民第四军或改为东北国民军。

3. 我的部队将来开发东北，决不问关内的事。

冯见此密约后，极为赞同，即签了字。并建议郭的部队可改为东北国民军，当即交郭松龄代表郭大鸣。

当时，我是代西北边防督办署总参谋长，日夜在冯办公室办公。冯见我在旁，即将此密约交给我看，并问我的见解如何。我当时很怀疑，我即答冯：郭松龄与我同学数年，同一讲堂学习，他的性格我颇知道。他在东北有今日的权势，是奉张一手

提拔的，张氏父子对他很器重，他要反对，不近情理。当时，我不知道郭已与韩密商反张，为的是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所以我答的不圆满。冯就对我说：“你的见识太窄。现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祸国殃民条约，即袁世凯称帝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难道郭松龄没有血性，也随张去卖国吗？他应该有大义灭亲激昂意志去保卫国家，才算得一个大丈夫！”听了冯的一番话，我始恍然大悟。但我还有怀疑，怕有阴谋诡计。我又对冯说，总须周详考虑一下，不可大意，我词毕即辞退，冯将此密约交我保存，并告我任何人不许看。我回到办公室妥存箱内。至第二日下午宋哲元、李鸣钟相继来包见冯后，即到我房间要看此密约。我因为受冯命令任何人不许看，我立即去见冯，请求可否给宋、李两都统一阅。冯说：“是我叫他们找你，可以给他们看看。”后来我才知宋、李两都统来包头，就是商议援郭出兵计划。

二、冯玉祥与郭松龄联合反奉的原因

冯玉祥与郭松龄二人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函电来往，二人怎样联合反奉呢？郭松龄必须对冯有一基本了解，才能与冯联合。

在冯与张未合作以前，冯对张是不满的，时常对官兵讲话说，张是一个红胡匪出身，占领东北地盘，日本久想侵略东北，一旦有事，张作霖能否抵御，很难断言。在袁世凯帝制时候，日本对袁氏提出“二十一条”，我们应该警惕，誓雪此耻。每逢国耻时日冯必写出“二十一条”宣告官兵，勿忘国耻。冯说到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声泪俱下，官兵都感动。张则反是，一方面示威不屈服日本，另一方面又勾结日本，与他妥协。但日本对中国

有一定方针，侵略野心始终未死，有机可乘就弄出各种把戏来挑衅，张虽利用杨宇霆等从中拉拢，决不能满足日本侵略野心。冯与张二人本质的对比，决不能联合一起。以后何以冯与张又合作攻吴？其中有一个原因，即是直奉战争风云紧急的时候，冯决心班师反吴，那是因为冯的处境极为困难。冯虽有一师三混成旅兵力，但官兵很穷苦，困在南苑。冯与吴的仇恨非一朝一夕，由陕西冯任督军时阎相文辞职起，直至鲍文瑞被杀止，内中吴、冯嫌隙无法排除。吴总想消灭冯，而冯总想脱离吴，待到直奉战争，二人乘隙的时机已到。吴下令冯所部向开鲁前进，在出征时不设兵站，人粮马食令就地征发。那时东北地区人民自食不足，那里还能够供给军粮。这证明置冯部于死地，并且派王承斌、车庆云等为盟军，用极辣手段来扼制冯。我当时任宋哲元混成旅参谋长是最先头部队，车辆至大小红石梁地方上下坡地行动非常困难，一师三混成旅全由一条隘路前进，不攻自溃。冯心急如火，不得已班师返京，与奉张联合反吴；此举并非真正合作，乃一时利害关系，不得已而为之。

冯与张合作，直吴失败后，曹锟的总统亦随之下台。这时已成无政府状态，不得已拥护段祺瑞为临时执政，黄郛任国务总理。冯的本意是拥护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但必须召开国民会议。而奉张想利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以善后会议名义为运用基础，看形势再开国民会议，其实是阻挠国民会议的召开。此时孙中山先生北上，至天津病势沉重，奉张与段把持善后会议。在名义上虽召集各省区和各军方代表来京开会，另一方面又利用临时执政府各部总长和各党派政客聚集一堂左右时局，内中把戏层出。我当时也是察哈尔都统的代表，列席会议。我看到段与张内中是合作的，对于西北军表面上合作，暗中是排斥的。西北军方面共有 14 人代表列席，多不发言。段与张

两方面的代表夜间在西城区绒线胡同开秘密会议，白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

夜间在绒线胡同开会主持其事者，是段的儿子段骏良，内中有 6 人组织，即段骏良、梁鸿志、吴光新、曾毓隽、姚震、姚国桢等 6 人，中间还有陈宧时常参加。其中 6 人意见也不一致，段骏良要利用贾德耀联冯，贾对冯比较接近，吴光新要利用张而自豪，从中挑拨离间，因此，冯与张的恶感日益加深，善后会议无结果而闭幕。这一段记录是说明冯与张的合作，并非真正的合作，是为个人利害关系，迫不得已的合作。

郭松龄认识到，冯与张的联合非为国家大计，恰遇到张作霖的祸国殃民与日本订立条约。反奉张的时机已到，所以才敢于毕露真情，对韩复榘、王乃模商议反奉的事。冯玉祥方面也认识到张作霖终是我敌，决不能合作到底，所以韩复榘到包头报告郭松龄密约的事信而无疑。冯与郭二人虽然没有晤面倾谈，两心相印，终于成功。当时张作霖派许兰洲也去包头见冯，说杨宇霆、姜登选被孙传芳打败，要求冯派兵帮助他去打湖北，若不允许，就不能谅解。冯受到种种刺激对张十分不满，如果单独反张，力量不够；低头服张，心又不愿。冯在这时心急如火，有郭松龄反奉的建议，立即解决了这个难题。

三、李景林弃信背约和冯与李战争的经过

当初，郭松龄与李景林密商反奉，李一一承允，并说：“二哥你一切放心，我一定帮助到底。”于是郭很放心前进。李景林为什么与郭松龄合作反奉？其中有一个原因，在奉军打败吴佩孚时，派遣李景林骑兵为先锋队，李到天津首先驱逐王承斌省长，霸占省长公署。这不是张作霖意思，于是张大怒要杀李景

林。此时郭松龄对张说，我军才入关，就杀了大将，于军心不利。张允郭之言未杀李。此事李有所闻知，所以这次郭反张，李也赞同。郭因后方无顾虑，星夜挺进关外，节节胜利。何以李景林中途违约?也有原因，当冯与郭签字后，即派王乃模、熊斌到天津与李商议以后援郭计划，希望李部急赴热河，冯借道天津待机援郭。此时国民二、三军不顾大局，逼迫李景林驻保定部队退出保定。李部乃自动退出保定，二、三军又紧迫尾追，致使李景林发生误会。适王、熊到津迫他去热援郭，李以为国民军不是援郭，是来争夺地盘，当时即想扣王、熊二人，后被他左右属员劝阻，李才放王、熊二人回京。但李此时援郭之意已经消除，在杨村以南地区构筑坚固阵地，有德国顾问参加计划，又有日本人从中挑拨离间。而李本心是要保守地盘，将郭所寄押 4 名师长一概放出，李弃信背约已形成兵戎相见。

再说冯见郭送来签字后，冯深信郭必讨张，就由包头移驻张家口，特派绥远都统张之江为前敌总指挥。张就邀我到前方参赞戎机。韩复榘为暂编第一师，过之刚旅暂编第二师，葛金章仍旧为第七混成旅，还有手枪团炮兵营等，准备进兵杨村，通过天津援郭。不料杨村以南地区，已有李景林部队防守阵地，不能通过，于是双方开战。两军相持 20 余日，互有死伤。冯看到这种情况，派刘骥同苏联林总顾问到杨村，与张之江商议撤兵至丰台附近待机援郭。但当时李已误会冯是为争夺天津地盘而战，并非援郭出兵。如果我们这时撤退，李军便会以为我军战败退却，势必尾追，胜负很难预决。因此，我们与张之江总指挥部决定转退为攻，以杨村东南方四海村为总攻击要点，我们是采用最新式密集队形，第一线用手枪队和大刀队轻装进攻，第二线用连纵队之形进攻，第三线随第二线续进，最后用炮兵援助。结果两军伤亡都很大，李军由于无后援，被迫全

线退出阵地，经过天津向德州方向退却，与张宗昌联合。我军占领天津后没有尾追，李到德州附近重整所部，因此才有第二次战争，成为直鲁派系。李景林所余兵力仅万余人，如果没有张宗昌之助，决不能再起。其中有一个原因，国民军第一军占领天津后，国民军第二、三军派人向冯要天津河北地盘。第二次直奉战后，冯曾保荐孙岳为直隶督办，结果被李景林所夺，冯为顾全大局，没有向张作霖索取，孙岳很不满意。这次攻克天津必须给孙。因此，国民一军将部队退出。而国民二、三军训练很差，不能对抗，于是孙岳便急请冯玉祥出兵援助，冯即派鹿钟麟到天津指挥韩复榘、徐永昌两部队反攻，在天津以南地区唐官屯附近相持月余。最后张宗昌方面又派褚玉璞与李景林联合反攻韩、徐两部，由于韩、徐两部作战不能配合，被褚、李击破。因此，西北军节节退却。

冯玉祥这时非常懊恼，攻克天津之日，即是郭松龄败死之时，既不能援郭，又不能击张。虽攻克天津，不免失了与李景林的友谊，而且由于国民二、三军争夺地盘，天津得而复失。冯扪心自问无一得利，惟有下野去苏联，转缓时局为上策，于是将西北边防督办和军队给张之江都统代摄，以待归来。不料南口防守数月，弹尽粮绝，兵心涣散，而韩复榘、石友三等飞扬跋扈，有时不听指挥，继之多伦失守，南口防线危机，不得已，西退包绥一带。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郭松龄反奉期间张作霖与日本的勾结

〇 阮振铎

1925年(民国14年)秋,张作霖部下军长郭松龄在滦州起事,声言反对张作霖军阀统治,率兵出山海关,占据锦州,进攻新民,要求清除侧近(指总参议杨宇霆、代省长王永江等而言)。当时奉天省城(即沈阳市)情况极为紊乱。

那时我在奉天公立医院当院长,王永江兼任医院总裁,因此和他比较接近。现将我目睹和耳闻的一些情形(因事隔30多年,对于年月日时,多有记不清之处),分述于下:

省城内的混乱情况

当郭军前哨已到新民县境巨流河附近的消息传来后,奉天省城内一片混乱。不过一般市民对于这个问题,多不太关心。有的因憎恶张作霖平素的残暴不仁,征车拉夫,搞奉直内战,希望郭军进城,把他们赶走。有的认为他们都是搞内乱,争夺地盘,狗咬狗一嘴毛,与人民无关。也有的害怕军队变乱,自己的财产被抢,特别是有钱阶级都惶恐不安。

各商号对于这个问题,特别重视。有些大的商号,如吉顺

丝房、老天合、洪顺号、萃华金店、鸿兴金店和各银行等，都把贵重物品、钱款等收藏起来，暂停营业。也有些钱庄、粮栈，在开原等地日本交易所里存粮、存金票（日币），乘机捣把。至于一些小的店铺，则都盼望早日有头绪，好做生意。因为当时市内人心惶恐，多不上街买东西了。

张作霖侧近的军署人员和省公署内的行政人员，每天到班都不办公。地位低的小职员，多数坐着看看报纸，打听打听消息，认为谁来也都一样混饭吃。科长、处长以上的人员都感到不安，恐怕保持不住原来的位置。惟有各机关的首脑特别害怕，因为他们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郭松龄到来，对自己大大不利，他们大多数是白天在城里混，到夜晚却跑到日本站旅馆去躲藏。当时日本站里的几家旅馆，如福顺栈、天泰栈、悦来栈等的房间，都被所谓军政要人挤满了。较大的一群官僚，则住日本人经营的旅馆，白天还到军署、省署去，如果见着张作霖或者王永江，则吹捧一阵，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实际他们早已把家小安置在日本站里，晚上到日本站去住宿。还有一些省议会的议员们，则在暗中去拉拢与郭松龄有关系的人，准备作为将来郭松龄取得政权后的进身阶梯。

听王永江说，张作霖在当时已经把他的专用汽车整天地开在帅府（张作霖的居处）的二门以内，准备一旦风声紧急，好登车往日本站逃跑，最后上大连去，依靠日本主子的保护。张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儿烟，又起来在屋内来回走，口口声声骂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混蛋，骂一阵又回到炕上去抽大烟。他废寝忘食，坐卧不安，精神已经错乱，对于一切事物，都不过问了。

这时，张作霖的亲随们如承启处的赵嘏斋等，也多躲避起来。就是张作霖最得意的几名差弁，也都暗中带着便服，捆上

行李，准备逃走。

在平时，帅府的大客厅里候见的人很多，时常满座，这时却空闲着无人行走。每天只有杨宇霆（总参议）、于国翰（又名一之，当时是参议）、袁金铠（秘书长）、周大文（电政监督）和常荫槐、王永江等七八个人。他们挤在一个小客厅里临时办事，也只是把接到前线与郭松龄军队作战的情况传达给吉、黑两省当局，以维持暂时的局面而已。

在这时候，总参议杨宇霆知道郭松龄倒张作霖是以自己为主要对象，所以他每天虽然到帅府去，却整天地仰卧在小客厅里间的一张床上，一声不吱，一筹莫展，遇事竟不作主张了。只是参议于国翰，有时候还发现一些意见，或主张一些事情，也不过是对于各地方请示的事情作答复而已（以上的情况也是听王永江说的）。

王永江代省长，每天上午 10 点钟左右和晚饭后，必到张作霖处去一趟，下午 3、4 点钟到省公署去阅稿，为的是给人们看，表示自己的态度镇静，并没有逃走（当时省城内相传王省长已经走了）。同时，对于各县每天必拍发电报，其电报的内容，多由王省长和陈奉璋警务处长预先秘密拟好，然后由警务处报告省公署，再由省公署分拍发给各县。电报里无非是说叛军（指郭军而言）内部已瓦解，不日即可被肃清等等，作虚伪的宣传，用以安定各地方的人心而维持局势。

王永江在省署虽然每天这样做，可是有的县知事却准备逃走。如铁岭县知事某（姓名忘记了），用一辆马车拉着两个皮箱和一位“太太”，由县公署搬到铁岭日本站内松华旅馆去住。他白天也到县公署露露面，夜晚则偷偷跑到旅馆去宿。这种情形是由当时铁岭县警察局长汇报给奉天省警务处陈奉璋（铁岭县人），由陈奉璋报告给王永江的。王永江得到这个消息后，

立时把这个县知事撤了差，另派省公署科员张戡去接任。这表示省公署尚有权威，省长还办公，用以警告其他县知事。

至于王省长公馆（在沈阳大南门里财政厅后院）的情况，每天晚上都有许多人坐在客厅里，等候王永江由张作霖处带回来一些消息，大家听完消息一哄而散。经常去听消息的，有商埠局总办刘效昆、同善堂堂长王有台、商埠警察局局长张定坤、电话局局长王奎斗、高等法院院长单豫升和奉天公立医院院长阮振铎等，有时候，奉天实业厅厅长张仙舫、奉天市市长曾子敬、纺纱厂厂长孙绳五等也去。这群人在王永江未回来以前，都互相闲聊，一致咒念郭松龄。对于战争问题，有的还把自己在家里扶乩的乩语，念给大家听；也有的把自己卜卦的卦词，念给大家听。所有这些求神问卜的勾当，都是表示自己对时局的关心，也是当时大家的谈话资料。等到王永江由前院（即帅府）回来，对大家约略谈上几句安定人心的谎话以后，大家才散去。但在分散之后，这些人中仍有跑到日本站里去住宿的，如同善堂堂长王有台，被王永江察觉了，在郭松龄事件结束后即被撤了差。

张作霖和日本缔结密约

据王永江辞职后，在金州家里和我闲谈中说出：当郭松龄率兵占据锦州时，郭松龄曾派遣殷汝耕为代表，往旅顺和日本关东军交涉关于郭军通过南满铁路线的问题，又和满铁会社交涉关于由营口到奉天使用满铁火车运兵的问题。

这个消息，在当时由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告诉了张作霖。他就慌了神，沉不住气了，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同日本军事顾问到沈阳日本站满铁地方事务所的楼上，和由旅

顺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日本军官签订了一项密约。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等。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在满铁沿线 20 里内落下一枚炮弹（实际上就是阻挡郭松龄军队开进奉天省城），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当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此外，日方还同意满铁火车不载运郭军，并在满铁附属地内（指沈阳日本车站而言）或日本租界地内（指旅顺、大连而言）提供给张作霖等要人的避难场所等等。

在缔结了这个密约之后，张作霖就把帅府内的大批财产运往日本站满铁地方事务所的仓库里存放，准备逃亡。

在相传郭松龄军队前哨已经到达巨流河附近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日子记不清了），张作霖使用军用大车（在当时奉天还没有军用载重汽车，这些大车都用五六匹马拉着，车夫均穿着灰色的军服）数十辆，满载着东西（所载的是什么东西，看不见，因为都用防水布盖着）。在每辆大车上都坐有一个持枪的大兵，严密地警戒着。这些大车从帅府经由大西关大街驶往日本站满铁地方事务所去，往返 10 多次，一直到晚 8、9 点钟以后才运完。当时沿大西关大街的各商店店员以及行人，都止步观看。我在当天的下午 6 点钟前后，由王永江公馆回医院时，在大西门里就遇见了一批运东西的大车出大西门（当时砖城门还没有拆毁），我等候了约半点多钟，车才过完。

由于张作霖往日本站搬运东西，影响了全城，人心大为动摇。在各关厢，特别是大小北关和边城外，已发生了多次拦路行劫和明火抢劫等事件。听说被害者在当时虽然报到警察分所，警察也置之不理，这时候沈阳城关已陷于混乱状态。

王永江访日本领事馆

在一天的上午 11 点钟左右，我在医院里正给患者看病，由王省长公馆的听差柴殿明给我来电话说："省长请你来，让你在医院里等着，立刻派车去接。"我在当时，想着必是王永江因为连日忙碌，他的心脏病发作了。等我到了他的公馆后，才知道不是为了看病，而是要我同他一起往日本总领事馆去，也不是让我给他作翻译，而是叫我去作旁听。

当日下午 2 点钟，我跟着王永江和从交涉署来的丁鉴修(当时丁是奉天交涉署的科长。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曾历充伪满交通部总长、伪实业部大臣、伪参议，已于 1945 年春病故)，分乘两辆汽车去日本总领事馆(日本总领事馆在小西边门外商埠地三经二纬路)。车至日本总领事馆正门，见有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二三名站立，院内也有日警站岗，显示出警戒森严的样子。王永江下车后，由领事吉田茂(当时的日本总领事是船津，吉田是首席副领事)引导入客厅。坐下后，吉田说话是由总领事馆的日本人作翻译，王永江说话是由丁鉴修作翻译。以下是王永江和吉田茂的谈话概况：

吉田：省长在百忙中，今天来临本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我们船津总领事已去上海，大约几天内可归来，今天由我暂为代理。

王：我早想到贵馆来拜访，因为总脱不开身，所以一直迟延到现在，歉甚。今天特意抽出一些工夫到贵馆来，为的是这些日子郭军闹事，日本方面对我们的同情，张上将军让我来谢一谢(我现在认为这次访问，是在结约之后)。

吉田：省长太客气了。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之

处，我们是尽力而为。

王：好，好。那么，我来谈一谈省城的情况吧！现在省城的治安，我还能够勉强维持下去，但只是依靠着1000多名警察，已感到不敷分配。为了保护贵国人在城里开设的各商号，已占去了相当人数。因之，在各关厢就显得空虚了，确有照顾不到之处。

吉田：对于城里住的日本居留民和商店，我可以派日本警察去保护。如另有需要时，我可以向守备队商量，派些日本军队去协助。

王：这好极了，是我最希望的。至于办法，将由交涉署和贵领事馆商办。

王永江和吉田茂谈到这里，便起身告辞，向吉田说：贵领事很忙，我打扰了半天，很对不起。遂和吉田握手作别。我和丁鉴修跟着王永江一同回到省长公馆后，王永江告诉丁鉴修到省署见王镜寰政务厅长，叫他和交涉署长高清和商量办法。

丁鉴修走后，王永江问我："方才丁科长把我说的话全都翻了么？"我说全都翻了，其中省长说的"关厢"，他还作了解释，是指砖城外和边城内外而言的，其他都和省长说的一样翻过了。话说完，王又用汽车把我送回医院。

第二天我上街，就看见大小西城门都有日本兵把守(大概其他各城门也是一样)，听说日本警察都换上了便服驻在各日本商店里了。

郭松龄事件平息后

日本军警进入省城里约七八天后，郭松龄战败被俘，在途中被杀。张作霖的军队开回省城，守城门的日本兵撤走了，全

城的人心才渐渐安定。

但是，张作霖运往日本站的东西，是怎样运回去的，谁也没有看见。传说是被日本方面扣留了，也有的说是夜间偷偷地运回去了。1943年我在伪满当经济部大臣时，据日人河本大作（是日本退役的陆军大佐，也就是炸死张作霖的凶犯，在伪满时曾充当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八·一五”时听说他在山西）说，在郭松龄倒张作霖时，张作霖欠了日本方面的款子，但在那时日本并没有扣留他的东西抵债，已经由张作霖全部取回去了。究竟是怎样取回去的，所寄存的是些什么东西，河本大作也说不清楚。

关于张作霖和日本缔结的密约中的土地商租权、杂居权问题，在郭松龄事件结束后，并未实现。据王永江在金州和我闲谈说，张作霖和日本签订的密约，在他带回来就交给王看了。在当时王并未表示意见，以后才慢慢地和张作霖解释说：“答应土地商租和杂居，就等于承认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张作霖听后才后悔，让王想办法挽回。

以后，据王永江在金州说，他当时是找省议会议长张成箕（辽阳人，现年70岁以上，在“九·一八”事变后，曾充伪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委员，以后下落不详），主使他招集议员开会反对这些约定。于是，他借词和日本领事商量，把杂居和土地商租问题，推迟下去了。因而一直到“九·一八”事变也未实现。我想这也是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原因之一，因为日本人都说：“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就是指答应他们的问题事后不算了。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

○何柱国 撰文 汪振国 整理

郭松龄反戈，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有远因，有近因。第一个近因是奉军二次入关打败曹、吴时，接着又驱兵南下，抢占苏皖，当时郭松龄即曾极力反对。郭曾向张老将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3000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我们很多将领，都认为郭的意见是值得采取的。由于杨宇霆急于要争取江南鱼米之乡，并为东北军开疆拓土，在老将前力主乘战胜之余威，驱兵南下。当年杨在奉军中是出将入相的"诸葛亮"。张作霖对杨言听计从，结果不出郭之所料，苏皖得而复失。苏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被孙传芳、陈调元所驱逐，损失了3个师的兵力，奉军声名扫地。此次又要挥师入关，争夺直鲁，郭松龄更加反对。郭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之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了，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杨宇霆日本士官出身，所用的人

也以日本留学生为多),请少帅来当家。"郭向张所说的这番话,是郭松龄被处死以后,张学良与我们谈起的。说明郭松龄愤懑不平,要打倒杨宇霆,推翻老将,张学良是知道的,却不料郭动手这样快。第二个近因是受冯玉祥之勾引煽动,说推倒奉张以后,东北就交给郭松龄并委郭为东北国民军总司令。据我的叔岳父贾德耀告诉我:"冯玉祥对东北是早有野心的,而郭松龄也是个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两个有野心的人一结合,这个事变就发动了。"

远因是渊源于东北军将领中派系之分歧。老帅张作霖,少帅张学良都能做到用人唯才,不计亲疏。张作霖常常说:"妈拉巴子,只要你们是人才,不管你们是哪里来的我都用。只要你们好好地干,除了我老婆子以外,什么都可以给你们,我决不亏待你们。"因此各方面到奉军中去的人,只要干得不错,都会得到提拔重用,而且,也能用人不疑。凡是他认为有才干能为他办事的,他都放手让他们去干,很少干预。当年张作霖手下的将领,不外两种人:一种是随他闯天下的旧部;一种是随时延揽的出身军事学校的新进人才,而且以后者为最多。这里面又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士官"派,这些将领中大部分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如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式毅、熙洽、何柱国等。这一派的首领就是杨宇霆,因为杨既是士官出身,而又在老将手下居首辅地位。另一派为"陆大"派,这一派的首脑就是郭松龄,因为郭松龄出身于陆军大学,所以称为"陆大"派。"陆大"派主要成员有: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东等。当年奉军除了张作霖老弟兄行伍出身的吴俊升、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所率领的一部分部队外,主力都是分掌在杨、郭两派手中。杨宇霆身任总参议兼参谋长,是奉系中最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则系

受老将之付托，辅翼少帅。少帅当时所统率的奉军劲旅，举凡部队之训练教育、统率指挥、官佐将校人事上的调动，都是由郭松龄掌握，张学良很少过问。郭反戈前，调进关内的五个师[1]，名义上是由张学良统率，实际都是听从郭松龄指挥。因此郭在奉军中，是仅次于杨宇霆的一个实权人物。杨与郭才略相埒，专横跋扈亦相似，所谓两雄不并立。为了争权夺势，郭松龄与杨宇霆矛盾之形成，为时已久。郭经常说："邻葛(杨宇霆号)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但由于老将对杨之宠信，郭欲去杨，除用非常之手段外，是不可能的。此次入关，重兵在握，又得到冯玉祥之支持，郭认为机不可失，因而决心发难了。

郭松龄发难以前，与张学良率领东北劲旅驻军京榆一带，张为驻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郭为驻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邹作华为炮兵旅长。因此，郭在反戈时，东北炮兵几乎为郭全部据有，关外只存山炮一营。郭当时握有步炮兵6万多人，都是精兵。关外之兵，分驻各地，全无准备。郭在发出的通电中以驱杨倒张、革新东北为号召，以为一举可以成功。电文为饶汉祥、林长民所起草，四六骈体，辞情并茂，颇有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

事变前一天，张学良曾到天津与郭松龄匆匆一面，当晚即乘车出关，可能已看出郭有不稳情况。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驻山海关附近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叫专车直开葫芦岛，登上"镇海"

① 张学良、郭松龄为正副军长的京榆驻军，统辖六个师，即张学良第四师、赵恩臻第五师、郭松龄第六师、高维岳第七师、齐恩铭第十师、裴春生第十二师，约7万余人。1925年秋京榆驻军改编为第三方面军，张学良任军团长，于珍任副军团长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任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任第十军军长。

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军舰上亦已收到。军舰一个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向东开的兵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张在军舰上不断与奉天通电报,军舰开到大连,张即赶回奉天,向老帅报告请示。这时奉天已在作紧急部署,老将已慌了手脚,身边无兵将,不知所措。辽河左岸虽有吉林、黑龙江部队数师,距离遥远,缓不济急,所恃者惟有由热河撤退之骑兵及富双英两个旅。张学良赶往兴隆店设临时司令部,指挥堵击。将富双英两个旅,仅有的一个炮兵营布阵于新民屯附近。把兵工厂里所有大炮都运出来,在巨流河布置炮兵阵地。而骑兵之主力则集结于左翼辽中、大民屯之间。我这时是步兵团团长,手中仅有新兵一营,无能为力。张学良把我叫去,对我说:“这个骑兵指挥官,只有你来干了。”因为在东北军将领中在日本士官学骑兵者,只有我一个人。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向张提出了骑兵作战计划。原来的计划是用骑兵远袭郭松龄的后方沟帮子及白旗堡,我认为不妥。郭松龄是全军挺进,期在必胜,并不需要什么大后方,用骑兵袭击后方,作用不大。而且我们步兵有限,居于劣势,骑兵应作为主力使用,参加正面作战。张学良采纳了我的意见,用部分骑兵袭击白旗堡郭松龄司令部所在地。袭击成功后,即由辽中向北,直捣敌之侧背。我亲自率领一个骑兵师,控制于大民屯左前方,直接参加正面作战。郭松龄亲自指挥大军急进。开始由于官兵不明真相,其势甚锐,很快就占领了山海关、锦州、新民,沿途都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因为双方官兵都是一家人,谁也不肯打,以后知道是要打倒老将,军心一下就哗变了,邹作华首先反戈回击。邹作华在新民打电话给张学良说:“已控制了局势。”

在大民屯巨流河前线，双方接触，死伤总数不过 1000 多人，郭军前线不战自散。郭松龄见大势已去，即偕其妻韩淑秀化装逃走，被我指挥的骑兵（实为黑龙江骑兵穆春师王永清团所俘——编者）在一萝卜窖里搜获生擒。张老将电令就地枪决，将尸体解送沈阳示众。1925 年 11 月 22 日郭松龄自滦州通电，发动军事政变，12 月 24 日，即在新民兵败被擒，为时不过一个月。

事后有人说，郭松龄之败，是由于日本人出兵帮助张作霖打败了郭松龄，这不是事实。但日本人想乘机插手，则是确凿无疑。当郭松龄通电叛张时，杨宇霆曾到大连与日本联系，要利用南满铁路赶运援兵，日本乘机要挟，想进一步攫取南满特权。杨宇霆请示张作霖，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曾口头上答应了日方的要求。但事后，张作霖就不认账，没有履行诺言，这也是皇姑屯炸车的一个伏因。在作战时曾雇了几十个日本炮手，在前方帮助炮兵射击，但决不是日军的援助。

这次事件在军事上虽没有什么损失，但在政治上给奉张带来很大的影响，奉张的声势一落千丈，在内部也留下了很大的政治创伤。事平后，在人事上出现了一次大变动，奉天省长王永江、吉林省长王树翰、黑龙江省长于驷兴，均自动引退。郭死后，杨宇霆就更加专权自恣，这也是导致以后张学良枪毙杨宇霆的一个因素。郭失败后，所有部队均回奉天，只是与郭同班同学（陆大）的魏益三带了 2000 多人投奔冯玉祥去了，奉军的实力并无损失。

郭松龄失败如此之快，主要原因是军心不附。开始听郭说是杨宇霆造反，追部队出关后，知道杨并没有造反，而是出关打老帅，军心就不战而溃。巨流河离奉天省城不过几十里，郭带领的都是精兵，要打进去很容易。事后我曾问官兵为什么不

进城，他们说："进城打谁呢？打老将吗？我们不会这样没良心。"

郭松龄这个人精明干练，事必躬亲，对部队人事抓得很紧，调动一个事务长都要他亲自批准。他对张学良以监护人自居，像周公辅成王一样，什么事都先斩后奏，有时办事也不告知张学良。张因为郭是父帅派来辅翼他的，他也乐得放手不管。经过这次事件，张学良得到教训，大事小事也都自己抓起来了。

我在奉军系统中是属于士官派，是站在杨宇霆一边的，与郭不是一条路。但我对郭还是很钦佩的，不能以成败论英雄。郭松龄虽失败了，但还不失是一个英雄。他对东北军的建制、规划、作战都是有功的，东北军劲旅是他一手练出来的。第二次奉直战争，山海关九门口一战，俘获人枪3万余。这一战，吴佩孚不得不落海而逃，保住了奉张的政权。郭反奉之日，日本人是先有所知，曾与郭松龄接洽，愿意帮助郭松龄推倒奉张。交换条件是在南满特权上满足日本的要求，郭松龄断然予以拒绝，并曾致电日本驻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有关正式条约，照旧遵守；张作霖与日本所订新约，概不承认；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在军事上帮助奉张。如果当日郭松龄答应日本的要求，取得日本之援助，胜败之数尚未可知。这说明郭松龄还是有民族骨气的，非投降卖国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可比。郭松龄挥戈出关时，冯玉祥正在直鲁境内打了个大胜仗，击败了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司令李景林，而占领了天津。如果郭松龄同意日本人给他的支持，败得不那样快，冯玉祥就可以用得胜之师为郭声援，并力前进，郭也许不致败亡。

这一事件，也有人认为并不是不可避免。郭是有雄心的，不甘久居人下，这从他平日之作为是可以看得出的。但如果没

有杨宇霆专断于上，没有冯玉祥引诱于外，奉张不调兵入关参与直鲁战争，这次事件可能不致发生。因为有了外在的因素，结合郭松龄的雄心，导致了这次事件。如果不发生这次事件，郭松龄掌握兵权，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就不敢目无少帅，也许不致自招杀身之祸。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

◯彭景文 撰文 王 曾 整理

一、郭松龄的生活与作风点滴

郭松龄反奉是军阀混战时一次著名的历史事件。对他反奉的评价其说不一：有的说他是争名夺利，有的说他是忘恩负义；还有的说他因为第二次直奉战后没得到地盘而憎怒张作霖，表现心胸狭隘。有人说他是同盟会员，潜入奉军中，积蓄力量培养骨干，以便伺机推翻奉系军阀。后一种说法我认为可信。因为当时国民党员潜入奉军中不止是他一个人。辽宁省国民党党部初建时，在奉军中就有宁武、王瑞五等人是国民党员。因为是潜伏，表面上不露声色，这是可以理解的。韩淑秀写的《奉天郭舜华小传》里就曾说郭松龄在苦恼和遇到困难时，就喜欢低诵一首唐诗："月至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这就是郭的心迹，常以此诗排解愁闷。他在新民发表《告奉天父老书》提出事定后的十项方针，也多是当时国民党的主张。例如：第二项中说："保护劳工，节制资本以灭赤化隐患"，就是一例。从此也可以看出郭不是共产党人，

而且对共产党主张他当时是不理解的。至于对郭松龄如何评价，这是史学家的任务，这方面我不多讲。我只讲讲有关郭松龄的一些琐事。因为这些事情是我的亲历。

一个严肃朴素的人

郭松龄总是穿着他那一身军装，腰挺的很直，腰眼部分的武装带悬空起来能伸进一个拳头。他经常扳着面孔，不轻言笑。从来不骂人不打人，可是他那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谁见他都有点害怕。

他办事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在东三省第三期军士教导队将毕业那年考军官教育班时，王瑞华是主考官。可是郭松龄一直站在旁边，对每个人他都仔细观察，一个不漏。他还有惊人的记忆力，他见过的人就不会忘记，连名字都能叫出来。记得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在前线电话室给张学良打电话，足打了两个小时，安排在沈阳补充团的官职，他能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并指定每个人担负什么职务。他对士兵的熟悉，真是了如指掌。

生活方面更是朴素。他住在水簸箕胡同的公馆是租的。他与韩淑秀不住在正房而住在西厢房北头。室内只有极简单的家具，墙上只挂着他6岁夭折的女儿郭舜华的照片。会客室里只有普通的桌椅，没有豪华的陈设。1923年，张作霖将商埠地领的地号分给军官建房，郭松龄建的小楼还没有一般团长的楼房阔绰，更谈不上与汤玉麟、杨宇霆的公馆相比了。他每餐都和家人在一起吃，从不特殊。每月的薪俸除供养家室外，都用来办教育，供给几十名留日和留法的学生，家里还收养几个小青年，如庞兴汉、相某、张耀军等，郭供他们读书。他也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而他本人的积蓄很少。他父亲主张买点土地，他劝他父亲不要买地，不要为一家人打厚成。

郭是军事教育家

郭松龄在北京讲武堂、韶关讲武堂、奉天讲武堂都当过教官，培养了很多新型的军人，而且他还办教导队和军官教育班等培育军事人才；就连他办的同泽中学(男中)也上军事课和实行军事训练。在第二次直奉战时，我在第三军卫队军士连，随郭松龄到山海关前线打仗。不管战争怎样紧张，每晚军士连都得上课学习。他每次视察前线归来，都去听课，直到下课为止。他十分关心军士连学员的成长，常常向我们讲他的成长过程。他说："我小时家贫给人当雇工，没有念多少书。后来故宫招考站岗的，只要能写出姓名和住址就行，我被录取了。以后陆军武备学堂(奉天陆军速成小学)招生，我也考上了。我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一个人不学习不行。"郭松龄办公认真迅速，公事从不积压。回家以后，也从未看见他有闲着的时候，总是读书看报直到深夜。

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我在卫队军士连学习时，正是第二次直奉战。郭松龄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万家屯车站(山海关外第一站)，我们总是在他的身边，他到前线去也带着我们去。他不带行李，身背两条灰毛毯。也不设自己的厨房，和士兵吃一样饭菜，他那种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作风，深深为士兵所敬佩。更使我们大家惊异的是他的勇敢精神。他到前线亲自督战，在枪林弹雨中行走，如入无人之境。有一次他带我们几个人上前线视察，他仍然骑着高头大马，我们怕暴露目标劝他不要骑马，他说怕什么。那次视察是从姜女庙海边一直视察到角山寺下。直军方面一直在放枪放炮，他毫无惧色，谈笑自若。我那时岁数小，第一次上前线，扛大枪都扛不动，一听枪炮响就担心。可是见到郭军长威

武镇静的样子，我们就跟他到处奔走，也不那么害怕了。

郭松龄有一次在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召集齐恩铭、湿占玉、宋九龄、高维岳等旅长参加。人没到齐，都在屋里等着。这时直军向司令部地区放炮。震得小房直掉土。我们军士连几个人为了躲避炮弹，一会儿从前院跑到后院，一会儿又跑到前院。郭松龄喊住我们说："小孩子不要乱跑，怕什么？"我们一看他，仍然端坐在土炕上办公，一动不动。而那些来开会的旅长和那时军司令部参谋牛元峰、杜振、俞建章、王靖轩等，有的蹲在屋地上，有的躲在炕沿下面。我们都说，郭将军胆子真大，他就不怕死。

当他攻进九门口，在海阳镇一带把直系军队 5 万多人缴械的时候，他也骑着马在投降的敌人中活动，亲自指挥降兵到什么地方交枪，到什么地方集合。我们就担心，万一有一个敌军打冷枪怎么办！可是郭松龄不怕这些。一个无所畏惧的大将风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后当了解放军的师长，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亲临前线，除了党的教导以外，郭松龄的作风给我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下面我谈谈我随郭松龄反奉的事。

二、在郭军反奉的征途中

1925 年 10 月间，东北正是天高气爽的深秋，适于练兵的季节。这时我在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炮兵队学习。一天上午王队长传谕教育长金恩奎的命令：学校停课，学员各回原单位。我回到了第七师五旅八十四团二连（连长是窦希哲，我是中尉连副）。星期天我到郭松龄将军公馆，我向郭问："我们学习很起劲，为什么中途解散了？"郭松龄说："那有什么法子！又

要打仗嘛!”然后他又用爱抚的口吻说:“要好好带兵,要爱护老百姓,要听指挥官的命令!还要记住不要为私人卖命!”

郭军长的话使我很迷惑,我回连队的路上反复思考,也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直到他在滦州宣布讨张,我才清楚他的话对我是一个暗示。他的反奉主张,过去有人恣意歪曲,我想历史学家终会给予公正评价,我不讲了。我这里只讲讲我随郭松龄反奉途中,一路上军民的反映,和巨流河战事情况。

振奋军心的臂章

我所在的八十四团,10月间从奉天出发后到滦州下车,住了3天又乘车到天津西杨村车站下车,然后徒步行军,开到宝坻县驻防,每天照常进行军事训练,当时没有战斗气氛。11月下旬全队出发,我们八十四团沿京榆大道,日行军60里,经玉田、丰润、沙河驿到达卢龙。这时旅长刘维勇集合全团,他亲自讲话。他的讲话使全团官兵十分振奋。我至今还能记其大意。他说:张大帅统治东三省,连年进行战争,不顾东北老百姓的死活,要兵、拉夫、要大车,增捐加税,弄得人民欲死不能,欲生无望,哪有一点为国为民的样子。近来苏皖作战失利,杨宇霆、姜登选先后败归。他们不以为耻,又蛊惑大帅出兵,叫我们卖命去夺回他们失掉的地盘,以便他们到那里当督办,刮地皮。我们是军人,职责是保国卫民,不当他们的看门狗,我们不是哪个人的奴仆。如果外国侵略我国,虽死不辞;叫我们打内战,我们不干!郭军长现在下了决心,前天已经通电全国,主张和平,班师回奉,赶老帅下台,请少帅主持东北,严惩杨宇霆、姜登选、王永江等一班人,还要防止日本干涉。事成之后,每位官兵给奉吉黑边疆地10垧,愿种地的公家给充分资助,使大家安家立业。郭军长的主张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的。我们班师回奉,沿途遇有抵抗,要坚决消灭。又说,郭军长为慰问大家

一路辛苦，每人赏大洋 7 元。

刘维勇旅长的讲话，我团的官兵一致叫好。都说这次要打成功，以后再不当兵了，带着全家种地去。在行军途中士兵编了许多顺口溜，我还记得几首，这里选录三段，以说明当时士兵的情绪。

①张大帅真好战，昨天打老吴，前天打老段，今天打传芳。杨宇霆，王永江，出主意，民遭殃；出花招，耍手段，搂钱财，腰包藏，打起仗来吓破胆，跑回奉天充好汉。

②张作霖土匪王，进关里，抢地盘，为的是想当皇，人民死活可不管。去他的往回反，为民除害，为国除奸。

③郭军长真不善，领着大军回奉天，去大帅，除大奸，解除百姓苦，去掉民艰难，给土地，建家园。不怕天寒与地冻，打不垮老张什么都完蛋！

这时我们的团已被编为第四军五旅。在 11 月 27 日到了海阳镇秦皇岛一带，休整一天，上边发下绿色臂章，上面写的是东北国民军×军××旅××团××营等几个小字，下面用大字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10 个字。这个口号，一语道破了官兵的心，鼓舞了斗志，振奋了精神，虽然天气骤变，下了 3 尺深大雪，气温降到零下 20 多度，而我们没有棉衣，冻得浑身打颤，但是没有一个士兵去骚扰百姓。占领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开拔了。每天行军百里，没有叫苦的，也没有掉队的。我们五旅很快前进到锦州。

老百姓箪食壶浆迎郭军

我们五旅到锦州刚刚休息，接到郭总司令的急电，令第四军立即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沿义县、清河城、大市堡、八道壕向新民前进，目的是为了掩护左侧纵队。据说在锦州时，阚朝玺等来谈判未成，怕他们袭击左侧。当我们行进义县时，城关

四乡都贴出了安民告示，大意是：连年兴戎，民生凋蔽。本司令反奉宗旨是整理内政，开垦屯田，以期富强，共谋幸福。凡我所属部队不准擅动民间一草一木。望民众各安生业。

我们行军中所经过的村镇，百姓都安静如常，没有惊慌的样子，有的烧开水、煮稀饭米汤摆在路旁，供士兵饮用。我们在村中休息的时候，常常听老乡讲他们的心愿。有一个贫苦老乡来问我们："听说你们反奉打老张，郭司令给你们地，象我们这样穷人也能给点地种吗？"我们说："郭松龄司令答应给我们每人 10 垧地，去开发边疆。可能也给缺地户！"

我们也听过许多老乡说："人家当大官的，娶几房姨太太，穿好的，吃好的，咱们穷人连爹妈都养活不起。这几年来，张大帅不是要车就是要兵，要兵没人去就得花钱雇，雇一个兵就得花百八的，出一辆车也得几百，都摊在咱们穷人身上。他没给我们好处，尽给我们灾难。"

老百姓的陈诉，对我们也是一个刺激，因为我们当兵的多是穷人，我们决心要打下奉天。

巨流河会战与郭军失败

第四军在向新民前进途中，打败八道壕、半拉山门的守军，在 12 月 20 日奉命穿过柳河沟越过铁路，向辽中、大民屯方向进攻。以后成为右翼队，参加正面作战。

这时沈阳城内一片混乱。这方面情况已有很多人讲过，我只说明日军确实接管城门的警戒。据我亲戚赵玉昆（他当时是小西门警察所所长）说："吉林、黑龙江两省群众团体曾派代表来沈阳，准备迎接郭军；沈阳商会也筹集了大量现款和物资，准备劳军。可是在 12 月 20 日国民军占领新民以后，日本派军队和宪兵开进沈阳接替八关城门的警戒，我在的小西门也被接替了，弄得人心惶惶。"

在巨流河前线，奉军也是慌恐不安，而且骚扰阵地附近十几里地区的居民。他们还把被褥、门板、火盆以及焦炭、木材搜刮一空，弄到战壕内取暖。他们每过一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做。这一切也激起我们的愤怒。所以我们恨不得一下子打过巨流河，直捣沈阳城。

奉军从12月上旬以来在巨流河做了防守的部署，筑有坚固的盖沟阵地，还有日军参加到炮兵中去。要想从正面突破是有困难的。我们第四军五旅从柳河沟侧面攻过巨流河。郭司令亲来前线指挥。12月20日晨战斗打响，战斗十分激烈，枪声连成一片就像刮风一样，但听呼啸声。国民军几次强攻都未得手，郭总司令命令用炮兵摧毁奉军阵地，但炮弹不炸。郭总司令问参谋长邹作华是怎么回事？邹说，因对方阵地是沙土地，抗力小，故而不炸。其实是邹作华事先告诉在火车上管弹药库的人把炮弹引信抽出来混装一起送到前方，故不炸。奉军方面有日本炮兵参加，每发必中，造成郭军极大伤亡。邹作华的背叛是郭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郭军失败以后，邹作华到兴隆店车站去见张少帅，被定为首功。

我们第四军第五旅，从柳河沟过铁路以后，战斗颇为得手，在12月21日进到前沿阵地；22日拂晓开始从滕夹河一带出击，经两小时激战占领了平安堡。在渡河时吴俊升部将巨流河中间冰层敲破，我们团有很多人落入河里，但士兵仍不顾一切，夺了吴部阵地。上岸后，对面正逢吴俊升的骑兵部队被我们打得仓惶后退。我们八十四团全力猛追，在大民屯将吴俊升的骑兵二十三团全部缴械。部队迅速进到兴隆堡（距兴隆店张军司令部仅10里）。这时后边传来消息说："别打了，已经停战了，"我们不明真相只好停手不打。事后过来两个人问："谁是官？"我说："我是营长。"于是他把我领到新民。在新民各处

都张贴着大告示，内容大意是两军已经讲和勿庸再战。署名竟是邹作华。后来我们军官被收容在一家大油坊院内。这时才知道郭松龄已被杀害，我们都成了"郭逆"，以后一直没有被重用。

事后听说，驻守在山海关的第五军魏益三，因与郭军前线联系中断，正踌躇之间，日本驻榆守备队送来郭松龄夫妇遇难照片。魏知反奉彻底失败，便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大多数人主张要继承郭的遗志，继续战斗到底。以后张学良派刘伟、高纪毅、霁云、刘维勇来说降，都被魏益三拒绝。

冯玉祥在郭松龄遇难后，特派李烈钧、方声涛到山海关，委任魏益三为国民军第四军总司令。魏在 1926 年 1 月 3 日就职。

我被收容以后不久，就被派到奉军四十五旅（旅长戢翼翘）十八团（团长赵秉卿是一个日本陆大毕业的）服务。1942 年我在山东起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

三、怎样看待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是 1883 年生，属羊的，明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在军阀混战中，敢于向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张作霖打第一枪的是郭松龄。虽然他反奉失败了，可是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至于他的功过有待历史学家去评说。我只把当年的有关议论讲一讲。当时有署名铁生者向《盛京时报》投一稿云：

"郭公为改造东三省之伟人，为民请命，奋不顾身，今不幸罹于死难，凡我同胞，同深悼惜。今敬撰挽联一副，以哭当歌，祈贵报刊登之。"上联云："死者不复生，惟有前仆后继，偿我公未了志愿；"下联是："忍哉夫已氏，行将众叛亲离，尽他日依样

葫芦。”

另外还有一个署名“农民”的也写了一副对联：“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那点负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这是对郭松龄的贬词。对这些方面的问题，郭松龄早就料到会有人误解，所以他反奉出师前，即 1925 年 11 月 28 日于滦州致张学良的复信中，对忠孝二字都有过论述：“我公对上将军，固应忠孝兼尽。然孝道莫大于贻亲以安，导亲于义；若徒以顺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义。且尽孝应尽己力所能及，不应以数十万官兵生命，东三省国民膏血。我公明达，当思及此。至于忠之界说，现在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即狭言之，亦当忠于地方乡里，决非忠于一人。”冯玉祥先生写的《我的一生》书中也有记载，这些我就不详谈了。

郭松龄和杨宇霆的矛盾是很尖锐的。郭松龄死后，虽然张作霖命令在小河沿曝尸三天，但他尸首被亲友收殓厝于珠林寺，以后又厝于现在深井子公社国公寨大队，解放后才安葬在东陵东侧七间房墓地，一直保存到现在。而杨宇霆的坟却被群众挖掘。那是 1946 年，我在第一纵队第二师当师长，在法库围攻国民党二〇七师时，中间一段地带正是杨宇霆的墓地。有一天来了七八百人，要挖杨坟，说杨宇霆的父亲外号叫杨二绞杆，对老百姓太残暴了，依靠杨宇霆的势力，霸占土地，欺压群众，坚决要挖他坟以解民恨。我们劝说也不听，他们一齐动手挖土掘坟，但挖到水泥浇注的坟包时，怎么也刨不动；这时国民党又向群众放枪，不准他们掘坟。群众就来找我，央求我用火力把国民党军压住，还要求我派人用炸药包把水泥坟包炸开。我见群众在枪林弹雨中要挖杨宇霆的坟，可见群众对杨宇霆怀恨之深了，便答应他们的请求。后来他们把坟挖开了。从

坟中取出很多银锞子，群众又请求我们给兑换银元。正好我们从地里挖掘出一麻袋私藏的银元，把锞子秤了分量，折合700块银元，兑换下来，群众每人分一元左右，当作纪念。从这件事对比当中，也可看出群众对郭杨两人的评价。

我讲的都不是郭松龄反奉的正史，因为这方面好多人都写过了，我只谈一些亲历的琐事，但愿对了解郭松龄这个人物有所帮助。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

◯ 姜明文

一、第一次见到郭松龄

1925年4月，我来沈阳，本想考文会书院念书，未果。在街上看到“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招考学兵的广告。我当即到北大营报名，经考试被录取，分配到第一营第四连。从此开始了我的军队生活。

当时的教导队队长是由张学良兼任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少帅”，如果能够到教导队当学兵，便于和他发生关系，于个人的前途是有好处的。因此，我就决心进入教导队，不管怎么苦，怎么累，我都咬着牙挺着干。

1925年春，有一天排长（值星官）通知，要把内务特别整理好，院子打扫干净，本来内务、清洁是每天必须严格整理好的，而今天还要好上加好，被垛用绳子拉成线分毫不错，同时告诉大家，郭军长今天来视察，大家听到都很兴奋。因为每天在操场上出操时，都影影绰绰地看到郭军长和两个人抬一挺德国制造的马克沁式重机关枪，和一群人在一起，听指挥人的

口令作前进、跑步、卧倒、射击、利用地形地物等动作。那一群人是军官教育班的学员，他们都是由各部队抽调来的排长以上现职军官，来受训的。我当时很奇怪，一个当军长的还跟学员一样出操，这在那个时代的军队中是没有的事情。不一会郭军长来到我们连里视察，看到他的面孔是微白的，两目炯炯有神，说话声音宏亮而爽朗，穿一身灰布军衣，黑色钩子皮鞋扎绑腿，系武装带，肩上有一付金光闪闪的中将肩章。一个随从参谋（参谋人员的领章上有铜质带竹节的×，表示胸有成竹的意思）夹着皮包，跟在后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松龄。

二、军官教育班

是年8月间，教导队举行期考后，郭又到教导队以营为单位进行点名，凡是期考成绩列在前10名的学兵都挑出去了。我是被挑出者之一。在点名的时候，对每个人都仔仔细细的看一下，并简单地问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什么学校毕业等等，然后集合讲话。他说："看到你们考试的成绩还不错，把你们挑出来，转到军官教育班去念书，希望你们更要好好努力用功……"随后我们各人携衣带物、行李到东山咀子军官教育班本部报到。这时，东大营（即现在的东山咀子）已经建成新的营房，原在北大营的教育班学员也都搬到新营房来，他们编成3个队。由教导队挑去的学兵编成为第四队，由应鸿伦任中校队长，少校队附有邓玉琢、裴焕彩等二人。

教育班是郭松龄一手经办成立的一个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军事教育机构，在军事学教育内容上与讲武堂大致相同，但为二年，比讲武堂还多半年。另外增加英、法、德、日等外语课，准备将来保送到各国去留学。讲武堂学员的领章是两道红杠，

教育班学员的领章中间是一道红杠，学员假日外出时，腰扎皮带，带刺刀，这是与讲武堂学员有区别的地方。

教育班由郭松龄兼班长，彭振国（别名筱秋）少将任教育长负专责，总队长是上校王云汉。教育班举行开学典礼时，郭亲自参加，郭夫人韩淑秀也随同出席。郭讲话时间很长，大意是："当今世界军事学日新月异，武器也随之改进，东北地处两大强邻之间，时时都在窥视我们，执干戈，卫社稷是军人之职责，但必须有新的学识才能担当这个重任，你们都是青年学生出身，具有一般文化，现在既有从戎之壮志，更应努力学好新的军学知识，现在把你们选到军官教育班受军官教育，国家对你们抱有很大希望，你们要好好用功，勤学苦练，服从师长，不要辜负国家培养你们的厚意……。"以后郭经常到教育班来，有时集合讲话，有时到各处巡视，有时抽问学员们生活情况，看不出是一个当中将军长的大官样子。态度是严肃的，但并不令人可畏。在每个同学的思想上无形中产生一种敬佩之意。

入学后在军事学术科方面，开始与在教导队时相同，也是讲典范令、立正、稍息等制式动作，所不同的是增加英、法、德、日等外国语课。我被分配到德语班。我在辽阳文德中学学的是英语，还有一点基础，希望继续学英语，分配到德语班，很不乐意。向队长应鸿伦请求调换一下，应队长说，"分配到哪就是哪，不能随便要求。"碰了一个钉子，但心里总是不安。

三、第一次会见韩淑秀

1925 年 4 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去小河沿魁星楼附近安家鞋铺买"靰鞋"，因为他们做的"靰鞋"坚固耐用。当路经水簸箕胡同西口时，我灵机一动，何不到军长家谈谈去，给见就谈，

不给见拉倒，反正不是犯错误的事。原先也常听别人说过，凡是去军长家的学生他都接见，因此鼓起了勇气。一进门房，传达人就问我："干什么？"我说见军长有点事。传达说："不在公馆，你是哪里的？"我说："是教育班的学生。"正在这时，韩淑秀由上房出来(他住的是四合院没有二门)，问传达他是哪的？传达说："是教育班的学生，要见军长。"韩淑秀说，"叫他进来！"我进了东厢房的客厅。韩淑秀问："你叫什么名字？见军长有什么事？"我报名行礼后说，"我是新由教导队挑到教育班的学生，分我到德文班学德文，我英语有点基础，想继续学英语。"韩淑秀说："现在世界各国的军事学，德国最好，叫你学德文，学好后，准备到德国留学不好吗？你有英文的基础，学德文更容易些，实在不愿意学德文和彭教育长说一声给你改英语班。"就这样，我行礼辞别了韩淑秀，到安家鞋铺买双"靰鞋"回到教育班。我听韩淑秀这一说，学好将来可以到德国留学，我也就没有再请求转英语班了。(当时教德语的教官是齐世英，又名齐铁铮，现在台湾当立法委员)不久，奉军进兵关内，由河北、山东、安徽又进而占领江苏直达上海，这是奉军最盛的时期。军官教育班第一期的学员，也没等到毕业，都纷纷回到原部队任职去了。

四、我留在郭松龄身边

因为军队都纷纷进关，各部队的初级军官需要补充、调换。我们第四队的学生，郭松龄也都挑年龄大的陆续派到部队去当准尉排长，每派一个人，郭事先必须找去详细的问话，然后亲笔写一个 2 寸宽 5 寸长的便条"派令"。也不通过主管人事部门办手续，就拿这个"派令"直接到差。"派令"是这样写

的："兹派某某某为×旅×团×连准尉排长，克日前往报到，并具报，此令。"郭松龄签字，并发给50元钱买指挥刀、军衣罩、武装带、鞋、帽等物，一个个都高高兴兴地前往报到。当时在军中无论办什么事情，只要有郭松龄签字的便条，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也可见郭在奉军中当时的权势了。全军排长以上的军官，郭松龄虽然不能个个都认识，但每个人对郭都有感戴的心情，因此，郭松龄3个字当时在奉军中各级军官的脑海里印象很深。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而造成他倒戈反奉的基础。

"官雨"越下越大。最后一直派到年满20岁的都出去当官了。我那年19岁，填表时，我也把年龄自己长了一岁，填20岁。有一天郭找我，当时认为这回外派该轮到我了。当我到办公室行礼后，郭说："你19岁为什么要报20岁？"我说："20岁不就可以当官了吗？"郭说，"不要急着当官，年龄还小，没有带兵的经验，也没有作战的经验，以后还怕没有官当嘛？"最后剩下17至19岁的学生60多个人，郭松龄集合讲话，说："你们年龄还小，没有带兵的经验，更没有作战的经验，现在军队出发，有战斗任务，就不再往外派你们去当官了。把你们分给"少帅"（张学良）一半，其余的留在我的身边"。随即点名分开了，我分到郭的这边。不久我们随郭松龄去天津。驻在河北大街曹家花园内（系北洋军阀曹锟住宅），我们每天轮流值勤4小时，其余的时间规定看书打球，不准随便外出，有事向队长请假。韩淑秀经常给我们讲些历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讲"楚汉相争怀王立约先入关者王"的故事。有时也问我们每个人家中情况，如问你是哪县的人？父母都在不？家里还有什么人？哥几个？家里有地没有？打的粮食够不够吃等等琐事。她身穿布衣，颜色都是很朴素的，不事装饰，说话很柔和，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

五、滦州车站军事会议

11月初旬，郭松龄因病在天津住意大利医院，韩淑秀随同前往，我们卫士也去了几个，换成便衣住在医院作警卫和传达，每天来往出入的人很多，究竟做什么，说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不久，郭出院。我们由天津上火车，听说是回奉天，大家都很高兴，离家快一年啦，这时可以回老家看看。不料郭的专列指挥车到达滦州站即停下来，在一个火柴公司楼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团、旅长和司令部的高级幕僚，其中认识的有邹作华、王静轩、部汝廉、殷汝耕、齐世英和曾给黎元洪当过内务总长的林长民，当秘书长的饶汉祥等三四十人，韩淑秀也参加会议，调一个亲信的步兵团担任外卫警戒；内卫警戒由卫队担任；会场内外的警戒则由教育班的30多个同学担任；我们每个人都佩有一支短八分的盒子炮，和一挺"巴尔克满"手提式轻机关枪，胸前系有皮子弹袋一条，内装4个"保弹板"，全付武装担任警戒勤务，没有郭的手令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在楼梯间和楼门口都有岗哨。真是里三层外三层，警戒森严。在楼梯间一个小屋内有一位身材矮小的人，年约50多岁，手里拿着旱烟管，倒背着两手，来回踱着慢步，屋里点一支蜡烛，最初不知他是何人，后来听总队长王云汉说，他是姜督办，我们心里想，怎么把督办押起来啦。

在会议开始时，郭首先讲话。讲话大意现在经过仔细回忆有这样一些：历年来战争耗财巨万，致使东北民穷财尽，钱法日益毛荒，去年与曹、吴之战，是我们为保土安民故不得已而为之；此次之战，师出无名，徒为姜、杨争地盘，为上将军谋总统。这种兵连祸结，为少数人谋利益，争地盘而空耗国帑，徒增

民困。此次班师回奉，纯为清除乱源，改革东北政治，不事内争，而以休养生息为目的。上将军年事已高，暂息仔肩，贻养天年，让位与少帅，内修政治整军经武，外御强邻以固边防……。韩淑秀也讲了话，大意是说张作霖多年来穷兵黩武的罪恶事实，把一个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东北家乡，祸害得民穷财尽，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孩子们不能念书，我们跟前这帮孩子就是例子，他们念不起书，才出来当兵，不兴办教育，不培养人才，不开发实业，徒事穷兵黩武给少数人争权夺利……。他(她)们的讲话，我们值勤的人都听得很清楚，真是感人肺腑。会议把部队改为东北国民军，结束已快天明。第二天看到一份油印的很长的通电，历数张作霖历年来勾结日本，签订条约，以大量的金钱购买武器，从事争夺地盘的罪恶战争。这份电文是饶汉祥的手笔，下署"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张学良、副总司令郭松龄。"我们看了这个署名的电文，心里说，儿子倒他爹的戈了。紧跟着一道"升官图"的命令，团长升旅长，旅长升军长，如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等均由旅长升为军长。魏益三初为参谋长，旋即调为第五军军长，参谋长调炮兵司令邹作华升充。邹作华原任东北军炮兵司令，是炮兵界的权威者，郭的反奉倒张，邹在内心不倾服，以此调任参谋长，孰知后来郭军方面将不用命，士无斗志，特别是炮兵部队不发实弹，邹还暗中通款，张作霖向前方部队发出传单，很起作用。郭的失败，这也是原因之一。

六、枪杀姜登选

在滦州会议的当夜，郭将姜登选扣押在火柴公司的楼下一个楼梯间。姜之所以被扣，是姜由天津乘专车返奉路经滦州

时，郭闻姜的专车到达，以请姜氏晤面为名，遂即扣押，但并未见面。会议第二天郭的专列指挥车仍停在滦州车站，升火待发，下午听到把姜督办枪毙了的消息。以后又听到枪毙时经过的情形是：由一个王副官(左手有残疾，外号叫摔爪子)带两名卫士坐汽车以送姜到城里为名(车站距县城八里路)，行经一段沙滩地，车就不走了，王副官向姜说，这是段沙滩地，车子不好走，请督办下车走几步吧！姜即下车前行，王副官在后面，走不几步，王即向姜开始射击，“砰”的一声，姜应声而倒，随后连打两枪。显赫一时当过安徽督军的姜登选，就这样丧生于沙滩。王等收尸体就地掩埋后，即回车复命去了。郭军失败后，张作霖为纪念姜登选，在奉天城西南面风雨坛，修了一座祠堂，名曰“姜公祠”。

七、挥军东进，连山暂停

郭松龄此时已将所掌握的奉军精锐部队(约7万人)编组为5个军，以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刘伟为第二军军长，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霁云为第四军军长，担任第一线攻击部队。以魏益三为军长的第五军(预备军)在九门口、石门寨一带担任后方。当时郭认为奉天所有精锐部队都在自己掌握中，沈阳没有部队，吉林第十五师张作相部曾占据山海关，但不堪一击，黑龙江省虽有两个骑兵旅，但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且鞭长莫及。利用“南满铁路”运输须与日本交涉，拖延时日，如由草道轻骑南来，最快也得两个星期，等待江省骑兵到达而郭军已占据奉天了。因此，郭充满必胜的信心，预定12月20日以4路纵队进入奉天，届时江省骑兵即使到达奉天，也无能为力了。但事情的变化非郭氏始料所能及，竟因江省骑兵迅猛到来

进击郭的左侧背，郭军后路被抄袭，遂致一败涂地。

郭军先头部队进抵山海关，一举将吉林第十五师击溃，猛烈追击继续东进，经过绥中、兴城。先头部队已到达锦州，而郭氏的指挥列车到达连山，时值天气严寒，遂休兵3日等候由天津运来棉服装，第二天棉服装与现大洋都已运到，连夜分发到官兵身上，又发了双饷，都是白花花的银元，官兵领到后全军踊跃，士气大振。据由天津运服装回来的同学李树国说："这次好危险，差点没叫李景林给扣住，服装现洋装车后，刚要开车，李景林的执法队来了，不让开车，这时车已开动，押火车头的人叫快开，他们就向火车开枪，我们(随去的卫队)也还击，这样才跑出来，好危险啦。"部队沿途无阻，迅猛东进，郭的指挥列车，紧随第一线前进。当指挥列车到达锦州时，某日(准确日子忘记)值勤的同学忽然见到殷汝耕秘书陪同几个穿西装的人上车，与郭氏会见。同学们互相私议说，今天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人，个子不高，看样子象日本人，见总司令去了，不知干什么，但不几个钟头就由殷汝耕陪同走了。指挥列车继续前进，最后到达柳河沟车站因机车无水而停止。

八、徒步入新民，化装逃走

部队官兵穿上棉衣，领了银洋，士气高涨奋勇前进。当第一线部队到达新民县以东巨流河一带时，前方情况发生突变。首先表现在炮兵部队方面，据事后曾在炮兵当排长的关荣葛(三洼人，现还健在)说："炮兵打出去的炮弹没有'引信'打到对方不爆炸，步兵部队也迟迟不前进了"当时各部队也都发现了油印的反战传单，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都是自家人，不能给他们当炮灰互相残杀，吃老张家的饭，不打老张家的人。"因

此军心涣散,士无斗志。白旗堡站(现已改大红旗站)以东沿线的水塔,悉被奉军采纳外籍顾问伊亚格(不知是哪国人)的建议,完全炸毁。这时郭的指挥车正停在白旗堡,由白旗堡再东进,机车无水可上。郭令百姓挑水往机车里倒,由于天寒路远,滴水成冰,一担水连洒带冻倒在机车里所剩无几。这样又勉强前进到柳河沟站,这个站又无多少百姓,因此,郭松龄弃车,亲自在前边率领全体幕僚、卫队徒步向新民县前进(柳河沟距新民县 18 里路),郭夫人韩淑秀坐大车,所有马匹都由少数高级幕僚和卫士们骑乘,在后面跟随。到新民县城内已进入黄昏,在一个烧锅院内住下,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这时前线的枪炮声稀稀拉拉的还在响,入夜后火光冲天,弹药爆炸声震撼原野,俄顷传来白旗堡弹药被炸,粮服被烧的消息,官兵心中不安。郭氏夫妇见大势已去,次日天甫黎明,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的皮袍,头带貂绒皮帽,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与部汝廉耳语几句后即出南门,企图奔立山车站上火车赴大连,卫队随后跑步跟上,所有马匹,都由幕僚和卫士们骑着,随在车后前进。

九、走出新民

走出新民县约 20 余里,到一个村子边(村子不大可能叫苏家屯)时,忽由前村发出枪声,初时,认为“联庄会”为防止溃兵而鸣枪,立即派人骑马前往通知说:“是郭总司令来啦!不要打枪。”语甫毕,枪声更密,随之开了迫击炮,卫队们立即利用地形卧倒还击。此时,郭氏夫妇下车,由卫士关庆忠 2 人扶入附近一家菜窨内隐藏,窨口用稻草盖上。随同郭氏前来准备成

功后当奉天省长的林长民中流弹殒命(他留有日本式胡子最容易认识)。饶汉祥由同学王绍华挽扶隐藏起来,事后化装逃亡日本。

当卫队与村内对抗时,由前方村内出来大批骑兵,跃马端枪,冲向卫队而来,嘴里一边高喊"交枪不杀"一边骂骂咧咧地说,这都是"郭鬼子的小白脸子。"卫队员兵素无战斗经验,又无指挥者,当即纷纷交枪,跑到老百姓家烤火取暖去了。骑兵到处搜查,问我们:郭鬼子跑到那去啦!我们说不知道。最后由菜窖中将郭氏夫妇搜出去,随后又挨个搜腰,把新领到手的现大洋都搜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批骑兵就是昨天夜间袭击白旗堡车站,纵火焚烧粮秣弹药新由黑龙江到来的穆春骑兵旅的王永清骑兵团。王永清是胡匪头子,匪号"天下好",投降后改编为骑兵团任团长,归穆春指挥。当时,郭氏夫妇如能乘马突围脱险可以侥幸逃生,但郭氏顾虑夫人韩淑秀不会骑马,而自己骑马纵然逃出围困,陷夫人于死地于心不忍,所以,甘愿同归于尽。

当张作霖听到郭松龄倒戈的消息后,此时沈阳已无兵可调,吉林十五师由山海关败退下来,已溃不成军,江省骑兵虽以急电来援,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在这种焦急的情况下,一方面急派教导队上校队附王瑞华为补充旅少将旅长,克日编组新军;一方面将珠宝细软物资完全运到日本站托日方保险,同时将"帅府"周围,遍置煤油桶,准备一旦郭军入城即纵火焚烧使成焦土。张作霖当时说:"他妈拉巴子郭鬼子来时,给他剩一把掉嘴的茶壶和三个茶碗还有一个掉把的,别的你别想(听大帅府的家人说的)。"可见张作霖是决心要烧掉一切。待张学良由天津乘"海圻"兵舰到营口,登陆返沈后,除受乃父痛骂外,督令王瑞华加速编组新军阻郭东进。王瑞华以教导队官兵为

基干，派中校教育副官邵文凯为上校参谋长，韩光第、范先炜、王以哲3个营长分别升任补充旅第一、二、三团上校团长。开赴兴隆店、巨流河布防，阻止郭军前进。

十、押解老达房夫妇遇害

王永清将郭氏夫妇由菜窖内搜出后，立即报告穆春。并押解到辽中县老达房烧锅院内。穆即直接报告给张作霖（按例穆春是吴俊升所属的旅长，应先报告给吴。由吴再转报张作霖，而穆没有这样做，使吴俊升吃醋，以致后来遭到吴对穆处处不满）。张作霖接穆春电话报告时，以手加额说："他妈拉巴子可把郭鬼子捉住了，把他给我送沈阳来，我亲自枪毙他。"继而一想，又给穆春打电话说："把郭鬼子给我看好，我这边派人去取他。"随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等侍卫官20多人，乘两部大汽车准备前往老达房押解郭氏夫妇。杨宇霆怕郭氏到沈阳后与他有影响。遂矫张命在老达房就地枪毙。高金山到达后，遂宣布处死刑的命令。韩淑秀对郭说："我为君死，君为我亡，先毙我吧。"高金山问郭，你还有什么话说么？郭没有说话，就在屋内执刑。尔后用棉被裹上尸体，装到大汽车内运回奉天，在小河沿曝尸3日以泄恨。市民观者如堵。以后由其亲友将尸收殓。

当郭氏由新民县出走后，第二天张学良进入新民，其随员即住在郭氏前一晚的房内，听到郭氏被俘的消息后，欲令穆春先将郭送到新民县，打算把他放走。这个想法商诸于随他到新民县的亲信幕僚、机要秘书刘鹤龄（即刘鸣九），刘说这个事情你可要好好考虑，"老将"（指张作霖）这样震怒，能行吗？话是有这么一段，但未得实行而郭氏夫妇已被杀。

1926年奉军进关。张学良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两军团合署办公。当时冯玉祥的西北军部队在京汉铁路沿线，正面是国民第二军岳维峻部。奉军当时派有于珍、荣臻、赵恩臻3个军（当时称为三臻下河南）与岳维峻作战。当时河南老百姓到处都有"红枪会"的组织，由于奉军纪律坏，行动野蛮，到处遭到"红枪会"的袭击，再加上岳维峻的反攻，结果三个军几乎全部覆没。适张学良与韩麟春都在火车上听到这个败耗，张学良痛哭说："假若郭茂宸在，不会遭到这样惨败。"尔后还不止一次的这样说，使韩麟春十分难堪和憋气。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思慕之情与信任之深了。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忆郭松龄之整军训练

○ 刘海波

郭松龄出生于辽宁沈阳，字茂宸，外号“郭鬼子”。清末由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曾任朱庆澜部连长、营长。民国建立后，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1916年毕业后，到广州参加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任韶关讲武堂教官。1918年回沈阳，翌年春被聘为东三省讲武堂教官。郭在任教期间，深为当时的学生张学良所尊信。1920年张学良由讲武堂毕业后，即调郭任卫队旅参谋长兼团长。1921年奉军扩编，张学良任奉军第三旅旅长时，郭则任第八旅旅长。第一次直奉战后，东北三省陆军划一军制，三、八旅改称二、六旅。两旅事务统由郭全权处理。郭则劳怨不辞，对部队的训练整顿苦心经营，力事革新，于时称为东北军的模范旅。而张对郭更是言听计从，尊信备至。1924年冬，奉直战起，张任第三军军长，郭任副军长。榆关一战，吴佩孚兵败，奉军乘胜入关。1925年春，张学良进驻天津，任津榆驻军司令，郭仍任副司令。其军部驻天津河北蔡家花园。记得当时直辖的东北军有6个步兵师及骑炮工辎各旅团。张作霖为扩大其子张学良的权势，特将奉军的劲旅都划归指挥。郭松龄依靠张学良的信任，乃大刀阔

斧贯彻其整军训练的计划。仅就其对东北军有重大影响者数项述之于下。

一、厉行考试制度，树立学术风气

1925年春，郭代表张学良对津榆驻军进行了约半年的校阅，严厉执选取他一贯主张的考试制度。因团长以上的高级将领皆由张学良父子所指派，不加考试。对团附、营长以下各级军官，都凭校阅时的学术成绩评定去取。其成绩优异者，立即升级，其不及格者均调沈阳北大营军官教育班受训。虽均保留原级原薪，但多怕淘汰，人怀凛惧。

校官的学科考试为4大教程，即战术、武器、筑城、地形。尉官则为典范令。术科考试，尉官考连排的制式教练战斗教练。校官考试都由郭亲述课题。被校阅部队的师、旅、团长，则在旁陪同校阅尉官的术科考试，由校阅委员两人合考一人，共同评分，以示公允。学科试题，都由校阅委员会商编拟，临时由郭圈定。记得在锦州校阅时，我们提出了校官的学科试题，郭都未选用，竟临时自出新题。并令所有校阅委员一律参加应考。我们都大出意外，互相嘲笑说："这真是现世现报，考人者也被人考了。"试卷的评阅，限当日必须看完。并指派复阅官复查，而郭更加抽查。他的抽查办法很巧妙，只把试卷之得分相等者拿出，比较其答卷内容是否相同，或找出答卷内容相同者，是否得分相等。稍失公平立遭申斥，并限令再交互审阅。由此校阅委员也都戒慎恐惧，惟恐有失公平。校阅时间一个团也只三四天。评卷核分后，随即依据成绩评定升降。虽其直属师旅长，也无敢代为求情。人事调动命令下达后，都限令一星期内交接完毕，不准拖延。因此

都说我们的校阅是在“下官雨”。凡学术优良者都庆得升迁。但行伍出身者则多怨声载道。记得校阅到秦皇岛时，曾接到一封匿名信。信内大骂“郭鬼子”太缺德，偏私不公平，只重用学生，忘记老粗们的功劳、苦劳等语。郭看后并无怒容，只将原信交我，转送张学良而已。

东北军经过郭的这次校阅，彻底扫除了凭私人关系而升撤的陋习，树立了崇尚学术的风气。尔后一遇缺出，都照例推行考试制度。因此东北军中的学术见气勃然兴起。在郭倒戈失败后，考试制度仍沿行未改。因此，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改归蒋政权统辖时期，虽遭种种排斥歧视，但以学术优良，仍多保有相当职位。特别是在陆军大学和教育训练机关，尤占较多人数。

二、建立人事制度，保障安心工作

东北军的人事制度，使人人能安心工作，是其内部能巩固且持久的主要原因。东北军官中，一般在思想上都认为只要好好干，职位、工作就有保障。升官全凭学术能力，凭战功，不能靠人情。这种人事保障制度，是由郭的多年苦心而逐步树立起来的。我随郭任其机要参谋时，曾亲见郭自写的人事机密手册，并曾交我替他抄写过。见其册内按部队编制记有校尉军官姓名。每个姓名的右上方，分别记有○×、的记号。经我仔细研究，知道凡画“○”者是记其成绩优良应遇缺升迁者。画“×”的则是犯过错误应予停升的。画“、”者则记原级任职年数。有两点者，即原级已两年。

由于郭的亲自掌握，严格执行，就彻底树立了人事保障制度。郭常说：“在军队中，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风气必须去掉。

任何师旅长的调动，只准带秘书、副官一、二人，其余一概不准调动。这样人人工作才能安心，军队才能巩固。”因此，直属上级都没有对属下直接升降之权，只有报请惩奖之责。所保荐或惩罚的，也多转调他部。因此也有的怕调走，而不肯保升的流弊。郭常说：“凡平日升官心切的人，就是战时最怕死的人，平日钻营门路的人，就是轻弃职守的人。”因此在东北军中也逐渐扫除了托人情钻门路的坏风气。

在抚宁校阅时，郭曾对较亲信的参谋幕僚说，他要在每个团的校官内安排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至少两人，作为训练和作战的领导核心。他的经验认为，凡保定军校出身的军官，比其他出身的军官，一般较为纯正稳重，能够识大体而不偏激。此外，师旅的参谋长及中校团附，限定必须是陆军大学或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因而也建立了军令的指挥训练系统。

对后勤业务的军需军政人员，由于郭的坚强领导，也建立了独立的人事系统，其直属主官都无权加以更动。凡凭私人关系而非本科专门出身的，多被裁汰或转调他职。因此，国内外的军需军政学校毕业生多赴东北工作。东北一时人才之盛，此亦其原因之一。

三、严禁打骂恶习，乐育青年人才

旧日奉军，上级打骂军官之恶习根深蒂固。郭则严加禁止。记得当时第七师师长高维岳最喜欢打骂军官，人因叫他“高二打爷”。他驻防北镇时，曾对其中校团附孙铁龄拳打脚踢。郭闻之，气忿至极，当即亲拟严禁打骂军官的通令，交我送呈张学良画行印发。我曾劝阻说：“高师长新来指挥，应给他稍留面子，最好当面劝告。”郭稍沉思后说：“你就打电

话叫高师长来。”尔后就传说“高二不再打爷了”，人人大为称快。奉军打骂军官之风，由郭而得到大力纠正，这也是其深得人心之一。

郭的个性刚直倔强，不苟言笑。对营团长以上军官，尤为严肃。稍有过错即当面申诫，不稍宽假。偶遇青年官员则慈爱异常，且乐加培养教育，尝选优秀青年调充其副官或卫士。经其短期教育考察后，即保送军官教导队或讲武堂深造。郭对军官的教育训练尤为热心，由他选送北京陆军大学和外国留学者，为数甚多。

四、注重作战训练，创立后勤机构

在郭松龄的倡导推动下，东北军部队对作战训练开始重视。1922年成立有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专掌训练整军事宜。其总监为孙烈臣，副监为姜登选、韩麟春，参谋长则为张学良。每年秋季都举行混成旅以上的官员对抗演习。在演习中除对部队给以实战锻炼外，对后勤业务的交通通信、辎重行李等也不惜劳费，认真演习。唐生智曾说：“第二次直奉战役东北军的胜利，在后勤业务上的组织完善，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国军之有正规的后勤业务，实自东北军开始。”此外还规定团的参谋旅行，每年举行一次，至于部队的团营对抗演习则随时举行。

记得在一次旅对抗的实员演习中遇有小河，按实战要求应行徒涉。郭即不顾冰冷亲自下河，多数幕僚也不得不随之下水，致马靴内均灌水成冰，人人暗中叫苦。到宿营地后，都急于换靴易袜，而郭则仍坚持工作，在其副官催促下他才换了靴袜。郭之苦干硬干精神可见一斑。

在实战指挥上，他也专好打硬仗。如1924年直奉战争时，郭指挥第三军两个旅，在山海关正面强攻时，受到挫折。姜登选指挥第一军的两个旅，在九门口方面由黄土岭迂回得胜，要求张学良将总预备队一个旅投入胜利方面，扩大战果。郭因其正面受挫坚欲将预备队使用于正面。张学良曾在电话中力说，也遭郭之抗拒。张乃邀郭到姜的军长指挥所（在山海关北之石门砦）研究向秦皇岛包围敌后的计划。在会议中姜的副军长韩麟春说："胜利已有把握。应使正面的第三军也沾沾光，派出兵力参加右翼的出击。"沾光之语大触郭怒，郭忿然出走，坚持定由正面进攻。经张学良的亲自往追，才把郭婉劝而回，终得按原议执行。在郭一怒出走时，姜曾对张说："这样的不听指挥，违抗军令，该当何罪！"这句话可能事后为郭所闻知，因而有人怀疑郭在滦州之杀姜也或种因于此。

1925年11月，津榆驻军改称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张学良、姜登选为军团长，郭松龄、韩麟春为副军团长，实际上仍由郭大权独揽，统一指挥。在张学良召开的天津会议后，郭松龄回师滦州，突然通电倒戈。其倒戈原因及经过，我因那年夏季被调为第四师的营长，驻天津小站，远离军部，莫明真相。尔后随军移动打回关外，到锦州东之沟帮子，突患了重伤寒，被送入锦州后方医院。在病院中传闻郭在白旗堡失败被俘。到1926年初张学良进驻锦州，安抚叛军，召我仍为少校参谋。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郭松龄死前一昼夜之谈话

◯房书溪 **撰文** 武育文 **整理**

1925年我充东北骑兵第十四师中校参谋兼作战科长，该师师长是穆春，所辖两个骑兵旅，第一旅旅长徐永和，第七旅旅长王永清。第十四师奉命进驻热河的赤峰县，作驱逐冯玉祥的准备。时已初冬，忽接张作霖的急电，称郭松龄造反，大兵已向奉天行进中，命第十四师取道平泉、凌源、朝阳之线，用急行军至义州（今义县）待命。同时热河督统阚朝玺亦接同样的电报，率所部集结义州，及十四师到达义州后，郭松龄已将山海关外之红螺岘张作相的防御部队击溃，复又进驻锦州。此时十四师又接急电，速回奉天。时已仲冬，雪深盈尺。到奉天后参加布防，即停留于防线的左翼，准备迂回郭军之右侧。郭军在锦州休息一个阶段后，即东进攻击沈阳以西之奉军防御阵地。西来的郭军缺乏防寒装备，手脚冻坏的不计其数（据战后的统计轻重冻伤7000余名）。士兵又见到了家乡，斗志全无，遂造成瓦解崩溃之势。此时骑兵十四师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施行围剿，并悬有30万元的赏额生擒郭松龄。

我部第一日前进到新民县的老达房子，第二日拂晓折向

西北推进，行军序列是第七旅在前，师部同第一旅在后。因第七旅旅长王永清系绿林出身，有勇无谋，师长派我协助指挥。前卫行至离老达房子10里之罗障子村，忽然枪声大作，旋闻迫击炮声，战斗约半小时即停止。我同王旅长亦赶到罗障子，见有尸体六七具，俘虏30余名，据当时俘虏言，尸体中有林长民（老外交家）在内，身中迫击炮弹，尸体四分五裂不能辨认。并称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此间早已逃跑。这些抵抗的士兵是郭的卫队，全是教导队毕业的青年学生，问他们郭的下落，都说早已西去。我们就决定在罗障子吃午饭，然后再搜索前进。少时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说，他家萝卜窖有个老头、老婆在里藏着。王旅长立即派副官持枪入窖，搜出了郭松龄夫妇两人。郭穿青缎棉袍，夫人穿青布旗袍。

我在讲武堂第四期学习时，郭充二、六旅旅长，曾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战术教官，一般都称他为老师。我见到他后开口说："因何老师不走呢？"他说："这样大的雪，我如何能走？"王旅长见了他仍执部下礼甚恭，即用一辆拉弹药的骡车送回老达房师部。到达后天已黑了。师部驻在一家大烧锅院内，有通沈阳的电话。师长穆春即向大帅府张作霖打电话，报告擒住郭氏夫妇的经过。这时张作霖喉咙已哑了，当时他还不甚相信，接着王旅长又向他报告说，是千真万确，绝无错误。他才兴奋地说："他妈拉巴子的（这是他骂人的口头语），我得叫他来，问问他。你们好好地看着，别叫他寻了无常，等天亮我派人去弄他来城里。"说完电话之后，师长对我说："你们是师徒，你带卫队连负责看着他，借此问他点口供。"于是，我就回到看管他的屋子去，叫人给他烧热了炕，做的白肉酸菜粉条火锅子，吃罢之后，我对他说："大帅来电话，要你上

奉天，你可要作些准备。”他点了点头。我继续问他这次倒戈是什么动机？他太太韩夫人抢着说：“这事不怨你老师，是别人鼓动的他。”郭忙说：“你不要瞎说，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主张嘛！”我又问他从什么上起的动机？他说：“原因很多，主要就是为杨宇霆一人，我对张氏父子并无嫌隙。去年二次奉直战成功后，我对大帅上了多次建议，我们决不要进关争夺地盘。东三省地上地下，物资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本的田中义一继承伊藤博文的大陆政策，矛头是对着东三省的。朝鲜、旅大就是进攻东北的根据地。我们全部力量进关，日本一旦发难，东北三省非我所有矣！那时我们必然弄成进退维谷的局面。当时大帅颇首肯吾言，过了两天，我又去见大帅，他对我说：杨总参议不同意你的建议，他的见解比你高。我们打下关里的地盘，绝不能让别人享受，终归我们派人，四个督办，一个都统。”郭又说：“这次和关里打仗，都是杨宇霆的主谋。因为他掌握着东三省兵工厂，十几年来未交过一次帐，自己出不来多少武器，全靠向外国去买枪炮，一动即几百万元，内中有30%的回扣，尽入杨的私囊，这回上江苏去当督办，少帅先商量叫我去，我不干，才叫杨去的，不到一个月就送上了二三个师跑回来了。姜登选去接安徽督办同样狼狈逃归。李景林、张宗昌督直督鲁，到任就刮地皮，并把奉天的力量带走不少，弄得关内人民提起奉军就感头疼，孰得孰失呢？我这次主要讨杨以清君侧，对张氏父子仍然是尊重的。事已至此也就不必讲了。”他还说：“要叫大帅能辨别是非，了解局势，除非送他到外国留学3年。”他又说：“在天津日本大使去见我，要帮助我进奉天，主要条件是沿南满路再划几处租界地，并让与吉会路的路权，我未答应他。”我看他夫妇疲劳的样子，就叫他二人拥被假寐了一个时间。我

回到师部，师长对我说，适才大帅又来电话，天亮派人来枪毙他。后来才知道这全是杨宇霆的主意，说怕过南满路叫日本人劫了去，其实是怕与张作霖见了面，揭发他的私弊。天刚拂晓，我回到郭的屋子，对他说："老师今生的事业到此结束了，有什么遗嘱将来我可替你办理一下。"他说："我明白，你可拿张纸来。"我给他准备了纸笔。他在纸上写：

一、汉卿弟：兄为国为民而作战，不幸至此，倡首兄一人，勿罪部下；

二、我之动产与不动产问二军需官尽知，除偿还余之私债外，悉数捐入同泽中学（此校乃张学良与郭氏夫妇所办）；

三、……。

写到此处，奉天的两辆大卡车到了，来执行任务的是张作霖的干儿子高金山，那时当宪兵团长，满脸大烟灰气，一进屋就叫砸上刑具（带来做好的两付木狗子），钉好之后，将郭夫妇抬上汽车，开到老达房村外，同时枪毙的，然后又把尸体用汽车拉到奉天，在小河沿曝尸3天，任人观看。

后来我与王仁山谈起此事（王曾任郭的参谋处长），据他说，在天津酝酿反奉时，是与冯玉祥、李景林取得协定。冯部有开至迁安者，声言助郭出关。李景林保境安民，严守中立。后来冯见郭已出关，遂发动驱逐李景林，夺得平津一带的地盘。郭出关击败了张作相的防守部队，前进到锦州补充了半月有余。这时他的战略过于藐视奉军。郭曾说："等张作霖把奉、吉、黑三省的杂牌队伍全部集中后，一击成功，免去东征北讨，战事延长。"郭在滦州截杀姜登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怕姜到奉天，是个指挥人才；第二是为报复第二次直奉战时，在山海关九门口之积怨。郭在天津出动时，王问他到奉天后如何对待张氏父子呢？他说："我们是讨杨以清

君侧，当然仍是张家的天下。”后来到了锦州，他感觉进奉天是有了把握。王又问他将来对张氏父子的态度，他变了口吻说：“那得听地方上的处理了。”这段话，是王仁山亲自对我讲的。

后来我把郭的谈话写成笔录和他那不完整的亲笔遗嘱，在柳河沟车站的专车上交给了张学良。张看罢之后，又问了一番郭被擒住的经过，长叹了一口气。

1927年东北军在河南与蒋介石的北伐军作战，这时我充张学良的上校随从副官。有一次我随张学良从郑州回到北京，韩麟春来电说，漯河失利（韩、张同是三、四方面军团长）。张在急遽回郑州的途中对我说：“今天郭茂宸若还活着，我们吃不了这个亏。”这是对郭的缅念，也有不满韩麟春的意思。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忆郭松龄被杀的前前后后

○ 肖兆麟

1925年11月，李景林、冯玉祥、郭松龄等在天津召开秘密会议，议定李景林占天津以东以南，冯玉祥占北京以西，郭松龄率部回东北驱逐张作霖，占据东北。议定后分途进行。郭松龄在冀东滦州召集上校以上军官会议。在会场上，将那些老牌师长如赵恩臻、齐恩铭、裴春生、高维岳等均扣押起来，送至天津交李景林看押，当时编了4个军，由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等分担。在滦县集中誓师后，即沿京奉铁路东开，原拟直达锦州、沈阳。不料在万家屯车站附近被阻。万家屯车站驻军是吉林军队张作相部第十五师，当该部听到郭军在滦县誓师倒戈后，即在万家屯附近破坏了一段铁路，就地布防，郭军遭到抵抗，双方开火。

我当时是东北骑兵军穆春师的上校参谋处长。11月初，骑兵军由郑家屯开往热河赤峰县集结待命。12月4日，接到张作霖十万火急电报："赤峰骑兵师穆春师长，郭松龄部倒戈反奉，在万家屯车站与吉军第十五师对战中，该军星夜驰赴高桥锦西增援。"

穆春奉电后，即时回电准备出发，派骑兵第一旅徐永和

部为前进部队，星夜向锦西高桥一带前进。军部同王永清部骑兵第七旅跟进。1925 年 12 月 7 日，骑兵军抵锦西红螺岘，即在红螺岘布防。午后 10 时，吉林军队第十五师由高桥南海滩一带溃退下来，途经红螺岘。情况紧急，时值隆冬，构筑阵地不易，因之骑兵军也不能不随时撤出阵地，向新民一带转进。郭军抵锦州后，整顿了半个月才继续东进。穆春部骑兵抵新民后，即在高台子一带集结待命，把大车送回了郑家屯原防去。闻郭松龄有意在锦州停留，他说等候吉江两省部队到达后再行进攻，一鼓歼之，也好办善后。这是郭松龄的豪语，也是他失败的原因。郭军既未即时东进，于是张作霖调来了黑督吴俊升，带骑兵第八军万福麟部增援，同时吉军第十五师，经过半个月的收容调整补充，又重新建立起来了。此外，张作霖以沈阳军士教导队为基础，以该队教育长王端华为首，编了一个旅（以王以哲、邵文凯为团长），用兵工厂的新武器装备起来；从郭军倒戈过来的富双英团被扩编成一个旅。他们在巨流河构筑阵地，拒之郭军东进。而吴俊升所指挥的穆春和万福麟两个骑兵军，在铁路以南新民、辽中一带活动。

郭松龄所部在锦州经休息整顿后，继续东进。士兵多数未穿棉衣，天气日寒，雪降的又大，士兵中被冻伤的很多，兵力大减。及抵达新民一带，又遇到严阵以待、火力制胜的敌人和大部骑兵的侧袭，破坏了后方的交通，又听到日本人要出兵的威胁，鹤唳风声，军心慌慌，人无斗志。又逢张学良奉张作霖令到前方来指挥作战，并招抚郭部官兵，重新改编，而郭军将士表示愿意接受张学良的招抚。因此，双方部队刚一接触，战事即告结束。郭松龄本人为避免张作霖的处分，不得已接受部下的劝告，离开队伍，随带卫队一连，与他的夫

人韩淑秀，还有饶汉祥、林长民、邓秘书等人，由柳河沟乘坐两辆东北骡马大车，向南满线出奔，以便乘南满路车转往他处。

1925年12月23日，穆春率部（两个骑兵旅）袭击郭军后方交通线白旗堡车站，烧毁弹药车两辆，破坏铁路一段，任务完成后，退到辽中县属老达房。第二天拟再次袭击柳河沟车站，派第七旅王永清部为先遣部队。第七旅派骑兵第二十五团郭宝山部为前卫，他们走错了路，到小苏家屯去了。他们远远地发现了敌情，遂开始向小苏家屯进攻。郭松龄的卫队没有重武器，连步枪都很少，都是些手枪和白尔格满手提机枪，打的不远。而二十五团的骑兵用的是迫击炮轰击，郭部卫队不得不交枪投降。

战事结束了。林长民（福建人）当场阵亡，饶汉祥由另一个换了便衣的卫士保护逃走了。郭松龄夫妇藏到一个萝卜窖里。二十五团的骑兵进村后，见有两辆大车，拉的东西很多，都去抢东西，在一个箱子里翻出很多兴业银行钞票，打开行李有带上将肩章的军服，他们已判定这是郭松龄的总部，追问俘虏郭松龄那里去了，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骑着马向南跑了。这时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也来到了小苏家屯，根据情况，派郭宝山团全部向辽阳方向追去。王永清说："如果郭松龄真个往南跑了，团长一定能追得上，旅部可以在此休息。"随后，他便命令给师长写报告。

王永清的一个卫士在一个村妇口中得知后院萝卜窖内进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女的。王永清听到报告后，即带几个卫士去搜萝卜窖。在窖口喊：里面的人快出来！里面不答应，遂叫来一个老百姓，下去看看是否有人，老百姓说有两个人。王永清又喊窖里的人快上来！这时郭松龄夫妇一看藏

不住了，只好上来，王永清看到郭松龄夫妇上来后给郭敬个礼说："军长请到房子里坐吧。"郭说："好，走吧。"

穆春接到王永清的第一个报告后，师部即向小苏家屯前进。可是我们当天的任务，是袭击柳河沟，在师部未到小苏家屯前，在路上又接到王永清的报告，说郭松龄夫妇已被抓住了，因此改变了进攻柳河沟的任务。在师部中，我是首先来到小苏家屯的。我进到一家民房后，见到郭松龄夫妇均在炕上盘膝坐着呢！他们都穿着便衣。我向郭行礼后，问军长怎么走到这里来了，他说仗也不打了，那些军长们非叫我走不可，因此在此地与你们的骑兵遇上了。说了几句之后，我即到外边处理旁的事务去了。我看到一个院子外边，有两具死尸，外面的衣服已被剥掉，只有一套白单衣还穿着，有人说是日本人。据一个俘虏说，那个瘦的是林长民部长。我请示穆师长怎样处理，穆说要是日本人恐惹起外交来，把他消灭了吧。于是我派人把两具死尸拖到村外，用老百姓的秫秸倒上一瓶火油烧化了，把骨头散开埋了。

午后3时，穆春到小苏家屯后，不便与郭松龄见面，便召集王永清和骑兵三团高团长，并有我在内，大家商议怎样处理。我的意见是仍回老达房，那里有一家大烧锅，院墙高大，四面均有炮楼，地方是很安全的，并且还通电话。穆春同意我的意见，乃把郭松龄夫妇交给高团长，用原来的大车，叫他负责带到老达房交给军部。

午后5时，我同穆师长回到老达房烧锅院内，随后高团长也到了，把郭松龄送到师部，即住烧锅柜房里面的一个单间，是经理的住室。穆春派我招待他，同时派了一连卫队在门口守卫。

穆春到达老达房后，即向沈阳张作霖打电话报告情况，我

在一旁听着。接通后，张作霖开口就说："你是穆春么？不行就拉倒吧。"穆春说："报告大帅，郭松龄夫妇已经叫沐恩把他抓住了，现在老达房押着呢。"张说："真的么？"穆春说："真的，沐恩不敢说谎。请大帅命令怎样处理？"张说："我可不要活的呀！好啦，等一会再说吧。"一小时左右，电话兵报告沈阳大帅府来电话，请师长接电话。穆春接电话，张作霖说："你是穆春吧？你把郭松龄毙了没有？"穆说："没有，等候大帅命令。"张说："没毙就不用毙了，你把他的脚腕根割了，我明天派人去接，你们这次的赏额是 20 万哪，派人来领吧。"

1925 年 12 月 25 日午前 8 时，张作霖的上校副官高金山带了 12 名卫士和 30 名卫队，乘 5 辆汽车和 1 辆小汽车，来到老达房。高金山见穆春后说："大哥，夜里没事吧？"穆春说："我们这里有这么些队伍还能出什么事，大帅说怎么办？"高金山说："早晨出来的时候，还说要活的呢，把他带到沈阳去审问；等到我们路过辽中县时，接到大帅一份电报，说是不要活的。大哥你看怎么办好？"穆春说："你们既来了，我把郭松龄夫妇交给你们，你们愿怎么办就怎么办。"高金山说："那也好，我看这么办：你交给我们之后，把他带出老达房三四里地，在辽河沿上把他枪毙了，我们再带尸首回沈阳，你看好不好？就这样办吧！可是你们问了口供没有？"穆春说："我们没问，兄弟你现在问问他好了。"高说："好，我去问问，你们赶紧准备交差吧。"

这时郭松龄夫妇正在吃早饭，给他做的大米饭，炒了 4 盘菜。郭听到外边汽车响，知道是沈阳来接他们的，吃了半碗饭就不吃了。少时，高金山进屋来到郭松龄面前。郭夫妇在炕上坐着，我和高金山都在地下站着。高金山问："军长这次

反奉的理由是什么?”郭说:“我反对为少数人想当督军而带兵进关打仗,致使东北人民受到穷困,奉票毛荒,给东北人民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东北三省,地面辽阔,物产丰富,如果不进关打仗,好好建设,是立国有余。而雨帅不事建设,穷兵黩武,以东北的民脂民膏作孤注一掷,进关打仗,争夺地盘,为少数人利益连年作战,我曾一再反对,而张不听,反遭一场辱骂。因此带兵退回东北,请张下野,不再进关,而共同建设东北。”高说:“好了,请军长准备回沈阳吧。”高金山即退出。郭松龄由炕上下地,要纸笔。我当时向烧锅柜上要了一张毛头纸,将笔砚取了过来,搬把椅子,郭坐在柜子旁边,拿起毛笔写道:“汉卿弟:兄夫妇愿速死,请按左项办理:(一)兄为国为民而战,主倡一切,勿罪部下;(二)兄历年所经营之动产和不动产请由“鲁”(鲁穆庭)、“沈”(沈振荣)、“张”(张振鹭)三位军需官核清,除还债外,尽数捐同泽中学;(三)……”这时高金山和他带来的卫士们催促叫他上车,不叫他写了。郭在纸上写了一个三字,放下笔就说:“我的后事,我需要交待一下。”我在一旁说:“军长写吧,不要听他们催。”郭说不写了,站起来又说:“我向你们要求一件事,在我未死前,不要扒我的衣服;但我死了以后,就不管了。希望行刑时,要往头上打。”我在旁边说:“只要有我们在眼前,无论到什么时候,一定能遵照军长指示办。”郭说:“那你们看着办吧。”这时高金山等催促,叫我们绑好交差。于是穆春的卫队连长拿来两条绳子,先绑郭松龄,郭的夫人韩淑秀说:“他的身体不好,绑他干啥,他还跑得了吗?”不上绑,高金山不收。我在旁边叫卫队连长松点绑,取个形式就行。把他夫妇绑好后,交给沈阳来的卫队。他们接收后一看绑的过松,又重新大绑起来,这时我们就无权说话了。绑好

后，一出里屋门，到了堂屋，地下放一个"浦草垫"，叫郭松龄坐下，将两腿伸出来，给他装上"木狗子"刑具，上面钉好了，再翻过身来趴在地下钉后面。这时韩淑秀手扶郭的头说："死倒没什么，我看你受罪，实在难过。"韩即哭了。给郭钉完木狗子后，又给韩淑秀也钉上了一副。郭站起来，当时就不能走路了，两个卫士把他抬到车上。我跟到车上，问郭还有什么话和事情快告诉我，保证能给你传达到。郭说等路上再说吧。我说："我不去，有话就在这时候说吧。"他想了一会，说："没有话了。"这时，把韩淑秀也抬到车上，与郭对面而坐，外面就喊开车。司机已踏着了火，跟车的卫队都上了车。我即下车。把郭松龄写的那张纸交给了穆春，请他转交张学良。这时车已出动，穆春带着军部少校副官姜永生乘小汽车一同赴沈阳去了。

穆春的少校副官姜永生随穆师长由沈阳回到师部后，我问他对郭松龄的处理经过。他对我说：12 月 25 日午前 10 时，押解郭松龄的汽车由老达房开出后，约 10 分钟，到了辽河沿停车，请郭军长夫妇下车，宣布死刑。郭的夫人韩淑秀要求："先打我。"卫队开枪先打韩淑秀，两枪毙命；郭松龄一枪即被揭掉半个头骨。执行完了，即把两具尸体拖到车上带回沈阳。穆春将捕获郭松龄夫妇的经过及执刑情况面报张作霖。张按已宣布的赏额发给穆春部奉票 20 万元；同时吴俊升提万福麟部怎么办？张作霖向穆春说："把那 20 万给万福麟 10 万好了。"穆春又说："另外还有一个秘书姓邓，是湖南人，怎么办？"张说："这都是些老国民党，把他交给高金山吧。"张对高金山一拱嘴，高即走了。大概是把邓秘书拉出去枪毙了。郭松龄夫妇的尸体运到沈阳后，即在小河沿广场曝尸 3 天，任人观看，并照有像片。姜副官曾把像片带回军部给我看，我

当时心里很觉难过。

郭松龄夫妇被逮捕带到老达房后，穆春命我招待他。我在 1925 年 12 月 24 招待了他一整夜，谈了一夜。我问他的话，他也一一回答了。仅将其重要的谈话叙述如下：

我问他此次带兵东归的动机？郭松龄说：张雨帅这个人是过于刚愎自用，一意穷兵黩武，不顾东北人民的疾苦，把大部分民脂民膏投入兵工厂，制造杀人武器打内战，为少数野心家争夺地盘。在去冬，打败了吴佩孚也就够了。既以李景林督河北，张宗昌督山东，为什么又要为杨宇霆来夺江苏，为姜登选攻取安徽，使关内人民恨奉军入骨。连年战争，何时了局。现在东北地区是奉票贬值，物价上升，田地失耕，民不聊生。我在沈阳市也曾用书面申诉战争的害处，而得到的只是一顿臭骂，令人难堪。东北土地辽阔，土壤肥沃，山川秀丽，出产丰富，措施得当，是立国有余。如果好好建设起来，人民是幸福无量，并可做到国富兵强，不受外国欺凌。我是一个东北人，不能坐视不理，我此次率部东归，我是考虑成熟的计划。张家父子对我很好，但是我对他们也决没有恶意，我准备到沈阳后，请老张通电下野，把他安置一个最好的地方，叫他休息和享受，除了不叫他问事外，其余均可自由。我将同汉卿及我们的同僚以及东北父老兄弟把山海关的大门关起来，共同建设我们的东北。我已经有东北建设计划，将来你们也许能够看得见。

我问为什么要杀姜登选和扣押赵恩臻？

郭松龄说："姜登选得了安徽督军，被人家赶了回来，仍想坚固他的席位，回东北去见老张，研究新的部署。他们这些行动，正是我平日所痛恨的行为。在我今天发动把东北军撤回东北，来建设东北的时候，他还想去当安徽督军，因之

我在滦州扣留了他并把他毙了。至于扣押赵恩臻等人，因为这帮人都是老张的爪牙，他们为虎作伥，为自己升官发财，不顾其他。不扣押他们，叫他们倒张，那是做不到的。现在我的计划失败了，但我也不图恢复，事不成只有一死。张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他绝不会对我有什么宽宥和采纳我的计划，我也不抱这种幻想，只求速死。……”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

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见闻

○朱铭轼 口述 席 亭 整理

1926年夏天，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时候，我适在大元帅府军事部参谋署任秘书，并时常调入大元帅府内军事办公处，从事临时工作。因此对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始末，大元帅府所辖各院部组织概况，重要负责人姓名，张作霖个人的重要言行等有所见闻。

一、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经过

张作霖相信宿命论，迷信武力。如聘算命瞎子包秀峰为常年顾问，专备占卜休咎。他常说："法律是人造的，怎能约束我呢？"又常说："什么是外交？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与外国人办事。"张作霖自从掌握东北三省军政大权以后，野心越来越大，羡慕历史上刘邦、朱元璋，以布衣起家，称王称帝。所以张作霖整军经武，延揽人才，不分畛域，时时图谋向关内发展，以求其政治野心的实现。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他引为奇耻大辱，发誓重整旗鼓，图谋大举。1924年秋，江浙齐卢之战爆发，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两个

军阀相拚，这是直皖战争的继续，是段祺瑞阴谋打倒曹、吴所策动煽起的战争。中原多事，曹、吴有了内顾之忧，张作霖认为时机已到，事先为了要彻底打垮曹、吴，求得必胜，曾密派郭瀛洲、张树森等，几次奔走接洽，以巨金买动冯玉祥。并由奉天世合公银行，开出支票一纸，计奉小洋100万元，在北京某银行支取，折合现银元100万元。冯得金后，即蓄谋伺机倒戈，推翻曹、吴。1924年秋，奉直第二次战争起时，冯玉祥适经曹、吴派为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出古北口，向北进军。冯玉祥因被张作霖用金钱买动，别有所图，接派后行军极缓。师至热河之滦平，忽得直军将领彭寿莘、王承斌部在山海关和九门口失败的确讯，冯玉祥即刻班师，以后队改为前队，折回北京。事出人人意料之外，所以未鸣一枪即占领北京，将总统府包围，把曹锟软禁于总统府延庆楼内。直系内部发生这种惊人的巨变，不攻自垮，张作霖遂大获全胜。津、京、直、鲁全归奉系掌握。张作霖乘大胜余威继续南下，在京汉路上，进占了郑州和开封，窥视武汉；在津浦线上，一直延伸到安徽、江苏、上海。张作霖随之进驻天津，图谋上台，在当时形势下，直接取曹而代之，固属易事，但大总统需要通过国会选举，不会自己随便可以当的，也不是别人随便可以拥护的，因此不得不捧一个有资望的人，来做个过渡。张作霖因此就和冯玉祥等拥护段祺瑞在北京组织政府，捧段上台为临时执政，此举也适中段怀。于是段祺瑞在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势力卵翼之下，便做了傀儡执政。自1925年，张、冯破裂，奉军又打退了冯玉祥，进占了察绥、晋北，张作霖的势力更加扩展。1926年夏天，段祺瑞终于被迫下台，颜惠庆临时出任摄政内阁总理，维持了几天，张作霖便在黑龙江督军吴俊升领衔，吉林督军张作相、河北督办褚玉璞、山东

督办张宗昌、热河都统汤玉麟、察哈尔都统高维岳、绥远都统汲金纯等十七省军政首脑联合通电拥护下，就任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二、大元帅府组织概况

张作霖的陆海军大元帅诞生以后，即在北京组织大元帅府，地址在中南海前大总统府旧址。大元帅府内重要负责人为杨宇霆。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以后，杨即随之入府，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当时有杨宇霆是张作霖的灵魂之说。秘书长为任毓麟，秘书长帮办为娄翔春，以下为各处，计有：秘书处、参谋处、交通处、电务处、财政处、军法处、粮食处、被服处、军医处、军械处、承启处、副官处等，国务院总理为潘复。院下各部计有军事部，部长为何沣林（前上海淞沪护军使）；内政部部长为沈瑞麟；财政部部长为阎泽溥；农商部部长为莫德惠；教育部部长为刘哲；外交部部长为王荫泰；交通部部长为潘复兼；司法部部长为姚震。因为张作霖认为武力万能，只有武力才能统一中国，巩固政权，所以军事部组织特别庞大，以前的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以及航空署均划入军事部内，下设4个署，即陆军署，署长为杨毓；海军署，署长为温树德；参谋署，署长为于国翰；航空署，署长为赵延绪。同时为了各署联系方便，采取了集中办公，在大元帅府内成立军事办公处，地址在中南海纯一斋。处内工作由军事部长何沣林负责，陆、海、参、航四署，由署长杨毓询、温树德、于国翰、赵延绪4人主持。参谋署第一司司长陈钦若，第二司司长侯晶白，第三司司长李铨，第四司司长胡颐龄，及秘书王景阳、朱铭轼等。直辖于大元帅府的还

有军政执法处，处长为阚朝玺，系前热河都统。

三、在居仁堂的一次讲话

1925年张作霖和冯玉祥破裂以后，入关占据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一帆风顺。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不甘心失败，开始联合各方面倒张。1927年春初，倒张计划已经成熟。阎锡山首先发动，一方面在太原扣留张作霖的代表于济川；一方面密派傅作义一师人，袭击京汉线上的涿州城以后，负隅坚守。京汉线上的东北军，南北的联系，顿受威胁，围攻涿州月余未能夺下。同时北京西郊，沿门头沟一带，又发现晋军便衣队进行扰乱，因此北京震动，群情惶惑。加之各部门工作人员，八折发薪，复不能按时发给，人心愈益不安。张作霖为了安定人心，维持统治，在居仁堂召集各部门科长以上人员讲话。这次讲话，没有用秘书预备稿子，讲话表现出他的个性和思想。

开口第一句话"我叫张作霖"，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作张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指未跟他来的人说）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局势发展，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现在你们大家都要好好干，人家都说我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是我当二十七师师长的时候，积累了20万两银子。因为我善于经营，才积累了几个钱。可是我现在已经拿出来垫补军费啦，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

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我现在对于军事还忙不过来。潘馨航（国务总理潘复别号），关于政事，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你不要事事都靠我，找我。你们有收入的各部，如交通部、财政部等不要光顾自己，有钱要大家匀着花一花。你他妈拉个巴子，闹什么鬼，我不知道，不过我这几年脾气改了罢了。现在有人闹什么革命（指李大钊等），想把俄大鼻子那一套拿中国来，叫什么共产共妻啦，你们大家想一想，什么都可以共，个人的老婆孩子也可以共吗！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四照堂院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赶快消灭这些坏蛋（指反对他的人而言，如当时阎、冯等），我就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不然的话，就凭我这块臭色（东北土话，凭我这个样子之意），在中南海里呆着，算干什么的！你们大家记着，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要了。我张作霖决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四、不记旧恨　大力援孙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不仅津、京、直、鲁悉归奉系掌握，同时乘战胜的余威，沿津浦线向南延伸，一直到长江下游。奉军邢士廉师进驻上海，丁喜春师进驻南京。自 1925 年 8 月间，北京政府即段祺瑞执政府，先后发表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奉军势力日盛。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两省地盘。惟恐奉军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乘其不备，给奉军以意外打击，以巩固

自己的地位。因此一面派代表和张作霖虚与委蛇，使其不疑，疏于防备；一面派代表赴张家口，联络冯玉祥，牵制奉军后方（当时张、冯已发生裂痕）；同时还联合陈调元协作，相机行动。时有人向杨宇霆提醒，注意孙的行动。杨宇霆狂傲自居，漫不经心，认为奉军正盛，三五年内绝无人敢向奉军挑战。万没有料到孙传芳竟突然率部向奉军驻地猛烈袭去。奉军因事前毫无防备，邢士廉师一触即溃，丁喜春师未战先退，杨宇霆仓惶出走，仅以身免。督苏两月，得此结局，姜登选亦因杨宇霆溃败被逐，不得已弃皖北返，此役奉系丢人失地，损兵折将。

但此事仅隔一年之后，于1926年秋，孙传芳在江西九江之役，惨遭失败，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逃回南京。为了挽回颓势，以抵制国民革命军的北上，孙遂进行联段联吴，但均无结果，不得已掉头来，想乞援于张作霖。时张作霖正驻在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及派代表奔走接洽，得到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的帮助，允为向张作霖疏通。张宗昌向张作霖疏通后，张作霖亦认为孙传芳尚有一部分实力，在长江一带，可以利用抵抗国民革命军北进，因而允许与其合作，不追往事。

孙传芳得信后，即微服潜赴天津，同张宗昌晋谒张作霖于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时以晚辈礼，向张作霖行大礼，并卑词谢罪，连说对不起大帅。张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当时询悉孙传芳的实力，除直辖部队约有5万余人外，尚有联军20余万人。张即发表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时张为安国军总司令。次年夏季，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时，孙传芳又赴北京亲诣大元帅府，请张作霖发给粮饷械弹。杨宇霆是时适在大元帅府，得报告乃极力劝张乘机杀之，以泄旧恨，根绝后患。张杨言，并对杨说："你的气量

要放大些，不打不成交，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号）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张对孙传芳恩礼优加，大量支援孙传芳的粮饷械弹。孙传芳得到张作霖的援助后，曾与张宗昌等联合反攻，一度打过长江，占领南京，后国民革命军反攻，孙失败逃回，仍依附张氏，不断来往。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吴联合反冯与南口战役

〇 刘翼飞

反张联盟的成立及垮台

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以后，率领残兵败将，辗转各地，最后逃到湖南岳州，在他的旧部葛豪家暂住。但是，由于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未醒，仍思卷土重来，誓与张作霖再决雌雄。再说冯玉祥，虽然发动北京政变，挖了吴佩孚的墙角，吴受挫失败，但他并未得到实惠，却给张造成了扩大势力的机会，很不得劲，也决心伺机再起；至于张作霖，则乘胜利之余威，直下宁沪，严重威胁了浙督孙传芳的地位，激起反张情绪。吴、冯、孙3人同病相怜，不谋而合，经过一度酝酿，便于1925年9月间，分别派遣代表：靳云鹗、张之江、蒋方震齐集汉口开会，放弃前嫌，言归于好，共同合作，结成反张三角同盟。首先由孙部发难，进攻皖、苏境内的东北军；随后，由豫督岳维峻部的国民第二军进击豫东、鲁南，牵制驻鲁奉军南下增援，策应孙军的进攻；直隶方面则以国民第一、三两军张之江和孙岳所部，合力解决直隶奉军李景

林及张学良的关内部队。这一协议和作战部署达成后，由肖耀南领衔通电讨伐张作霖。吴佩孚则由岳州到达汉口，通电全国，就任讨伐军总司令。孙部很快就击溃了东北军。先后进占沪、宁及蚌埠各地。苏皖两督杨宇霆、姜登选相继逃走。鲁军张宗昌部南下援助，但被孙部所阻，无能为力，孙部乃进驻徐州。

奉张见此形势，大为震动，拟率东北军南下收复失地，但因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自顾不及。国民第一军张之江部乃乘虚进军天津，逐出了直督李景林。与此同时，国民第二军孙岳率部出击保定、大名一带。李景林求救于张宗昌，以直隶地盘让与鲁军为条件，组成了直鲁联军，张为总司令、李副之，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统率大军向津、京方面猛扑。战事方兴，以日本驻北京公使为首的八国公使团，向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提出声明："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附近作战。"因此，国民军张之江即率所部于1926年4月由天津向南口方面撤退。褚玉璞部跟踪追击，进入京畿。之后北京政府根据奉张意见，免去李景林的直督职务，以褚玉璞代之，褚部为第七方面军，并与张宗昌的第二方面军团合组为联合军团。张、褚分任军团长。

吴佩孚与冯玉祥的关系既经破裂，化友为敌，部下离心者日甚一日，又兼指挥不能如意，经其左右之劝说，吴佩孚来个180度大转变，与张和好，联张讨冯，旋又免去了靳云鹗的本兼各职，由田维勤继任。孙传芳大为不满，反对吴认敌为友，反对吴对靳的苛薄无情，也与吴分裂。从而昙花一现之三角同盟，即告解体。吴佩孚随即偕同张其锽、蒋雁行、齐燮元和张志潭等，统率田维勤部等4旅兵力北上，与张作霖协力讨冯，国民第一军退居南口。

战前双方的战斗布署

当褚玉璞率部进驻北京时，即令其军长王栋率部沿京绥路向南口方面前进，到达怀柔县境，与西北军小有战斗。西北军退南口，王部奉命在南口附近的京绥路两侧，占领阵地，采取监视态度。李景林部荣臻、胡毓坤两军长率部进驻北京西苑附近待命。

冯玉祥目睹当前形势日非，乃通电下野，前往苏联考察。所有西北军均由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统一指挥，张坐镇张家口将其主力部队向察绥地区撤退，借以保存实力，巩固察、绥、陕、甘等省地盘。并企图入侵山西，将西北连成一片，以鹿钟麟任前敌总指挥，驻怀来县城内，留守在延庆的佟麟阁师长，口北镇守使谭庆林的骑兵旅，以及在南口的刘汝明、陈希圣和郑金声等师，均归他节制。南口系山丘地带，居高临下，部署军队既可少用兵力，进行纵深配备，又便于就地征发京绥路物资——铁板、枕木、洋灰及铁丝网等构筑坚固工事，可攻可守，伺机观察，以图再举。

1925 年 12 月下旬，张作霖讨伐郭松龄战事结束，即令郭部军长刘伟统率陈在新（原系穆春骑兵旅的参谋长，郭失败逃走时，他首先在新民用电话报告张作霖，被升为旅长，尾追郭部残余魏益三部至关内，肃清了滦河一带的少数魏军）部等 3 个步兵旅，即逐步向津京进军。

1926 年 4 月，西北军撤离津京时，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团张学良、韩麟春亲率第十军于珍部、步兵第四旅刘翼飞部、步兵第三十七旅赵鸣皋部及野炮一团；第十一军赵恩臻部，刘伟（兼副军长）的步兵第六旅、富双英的步兵第十二旅、陈琛的步兵第四十六旅及武汉卿的骑兵第六旅；军团部

直辖的炮兵司令邹作华部野炮两团，山重炮各一团、工兵司令柏桂林部和辎重司令牛元峰以及吴荫棠的坦克车大队等，或由京榆大道徒步，或由京奉铁路乘车，先后由奉天省境内出发，直抵北京，分驻于城内和四郊，以及南、北、西苑等处，对南口的西北军施加压力。

军团部命令所属第九军军长高维岳统率所部两个步兵旅，第二十七旅王瑞华部、第三十四旅刘震东部，及骑兵第八旅郭希鹏部，由关内向察哈尔延庆的西北军进攻。并以奉天义县至昌黎的第十军副军长戢翼翘兼带的步兵第二十九旅配属骑兵一营，组成支队，向延庆的四海城等地进军，截击南口的西北军。此外，镇威军总司令部还令万福麟部第二十九师的骑兵第五旅马占山部、骑兵第六旅张殿九部和穆春的骑兵师，以及第十五军汲金纯部；步兵第十四旅徐永和部及步兵第三十六旅，均由黑督吴俊升统一指挥。骑兵通过四洮路，步兵由阜新出发，分向热河的开鲁、林西等地前进，转向察哈尔的多伦猛扑。各路大军出动后，热河都统宋哲元虽曾频电告急，但西北军无力援助，只得率部向多伦方面逃窜。东北军对南口之国民军，采取了三面大包围的优越形势。

我旅是随同军部和赵旅由锦州乘火车到北京的。军部和赵旅驻德胜门外黄寺附近。我旅除派第一团团长王辅予率部进驻昌平县境的海青落村，派出军官侦探搜索南口的敌情外，留富保衡的第二十五团、姜凌云的第三十九团及旅部驻北苑。

临战前夕奉军内部之异动

张作霖调兵遣将，对南口配以重兵，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但迟迟不下攻击令，使固守南口的西北军有充分时间构筑坚

固的阵地，这是为什么呢？据我回忆原来吴佩孚于 1926 年 5 月 30 日，由武汉北上至长辛店，张作霖是 6 月 5 日到达天津的。张的亲信杨宇霆、郑廉与直系要人张志潭、张其锽几次洽商后，6 月 28 日，张、吴正式会晤于北京中南海，一扫前嫌，结为金兰之好，并决定协力讨伐西北军。这时，吴部田维勤师及陕军高桂滋部已先后进驻北京附近。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所属少数部队也进驻北京。国民革命军即将出师北伐，吴乃离京由长辛店南下，返抵武汉。

临战前夕，直鲁联军李景林部荣臻、胡毓坤两军均驻西苑附近。由于褚玉璞当了直隶督办，李景林心怀不满，时思脱离东北军，另谋出路，一天夜里李景林召集所部将领秘密会议，主张单独行动，脱离东北军。但因胡毓坤和荣臻等主要将领都不赞成，会议未获协议而散。胡部司令王竞成（河南人，驻三家店一带，王是我的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经我介绍在胡部任支队司令的。）认为李不可靠，倘有变乱，南口西北军出击，东北军将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在散会后，行色仓惶来我旅告密。当即前往黄寺军部向于珍军长转报，于急令我找胡毓坤前来面询真相。我以前方任务重要，不能稍离岗位，乃召陈在新旅长（陈、胡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约胡到军部相见。胡在见于时表示，决不背叛桑梓（胡是东北人），愿为东北军效命，于深为感动，当即偕同胡陈等到天津会见了张学良军团长，详述胡等深明大义，关怀桑梓，决不协同李景林作乱；并面陈他们部队的械弹、粮饷和服装等均感无着的困难处境等等。张学良在惊喜之余，除了倍加慰勉以外，并即日率领胡毓坤和荣臻至奉天晋见张作霖总司令，汇报了事实经过情况。张作霖对他们深表嘉许，优礼相待，并准予收编荣、胡所部为第十六、七联合军，仍由

二人分任军长，待遇与东北军同，隶属于第三、四方面军团，由张学良、韩麟春两军团长指挥。当时，我因前方任务重要，无暇与荣、胡联系，即由陈在新旅长经常在北京西单花园饭店和他们联欢，以巩固感情，并向军团长汇报情况。从此，荣、胡所部取得了东北军的嫡系地位。而反复无常的李景林，先为张宗昌的座上客，不久又转投蒋介石了。

南口之役

1926 年 8 月，南口战役打响了。

直鲁联军在张宗昌和褚玉璞的统率下，以王栋军长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在京绥铁路左侧占领阵地，向当面之敌攻击。我第十军在京绥铁路右侧（包括铁路在内）得胜口之线占领阵地，进攻当面的西北军。我旅当即派第二十五团富保衡部，扫清了龙山、虎山和影壁山的少数敌人后，便令姜凌云的第三十九团左翼与赵鸣皋联系，向蜡笺山之敌进攻；第二十五团向正面之敌进攻；另以第二十五团的一部向老爷岭之敌分别进攻，并以第一团王辅予部，进驻得胜口附近为预备队。

当我第十军开始向敌进攻时，军团部曾令我全线炮兵集中火力猛射，以掩护步兵前进。由于西北军阵地坚固，障碍物比比皆是，我部曾多次仰攻到山腰，占领一道防线，逼近了敌军阵地，但终因火力密集被阻不能前进，伤亡颇重，一度形成了对峙胶着状态。

1926 年 8 月 12 日夜间，张、韩两军团长率高级幕僚周亚卫等，到前方某一指挥所，召集旅长以上及各独立部队长等开会，说明战况：吴俊升、高维岳和戢翼翘等部进展顺利，宋哲元已放弃热河，率部仓惶逃往多伦，延庆之敌已见动摇，吴

部等即将到达预定地点，西北军被包围，处境危险等情。1926年8月13日拂晓，我东北军向西北军发起总攻。以吴荫棠坦克车大队为前导，邹作华部炮兵集中开炮，掩护步兵前进；以步兵第二旅陈在新部和第十二旅富双英部为总预备队，控制沙河通道，敌军力不能支，纷纷退却，即由陈旅阻击追至张家口。

我奉军部命令，率王辅予的第一团进入得胜口，出敌不意，攻占马耳山，以扼居庸关的险要。负责正面进攻的赵鸣皋旅，在我方炮火支持下，跟踪多数担克车向敌阵地猛攻，官兵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战况极为激烈。战斗进行了将近两昼夜。8月14日夜间，敌方由南口全线总退却，遗弃了迫击炮、重机枪、弹药和粮秣甚多。

南口战役结束后，张作霖在南苑举行了一次陆军大检阅，对参战部队慰勉有加。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河南战役亲历记

○刘翼飞

全国政治形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湖南，吴佩孚由京到保定主持军事。8月抵武汉，率部抗击北伐军，因战事不利，乃起用靳云鹗为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与北伐军周旋。10月中旬，北伐军克武昌，吴佩孚北逃河南郑州。9月间，冯玉祥由苏联回国，自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在五原誓师，对抗吴佩孚。并利用吴的内部矛盾，暗拉靳反吴。但靳虚与委蛇，仍为吴准备反攻收复武汉。未几，冯就任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准备出兵潼关，向河南进军。奉张为了先发制人，当即向吴要求假道河南讨冯，并收复武汉。吴同意，但靳却坚决反对。因而吴于1926年12月免去靳的本兼各职，以靳部田维勤继任副总司令兼援陕总司令。吴的这一措施，激起了靳部将领的反对，任应岐、刘培绪公开通电反吴，投靠北伐军，使吴佩孚处境日趋困难。

国民革命军北伐将抵武汉时，河南士绅代表、卸任的河

南省长王印川及前陕西督军陈树藩曾先后到达北京，要求张作霖派兵入豫（河南），阻止国民军北上并讨伐冯玉祥。张作霖即决心先发制人于前，又经王、陈怂恿于后，便于1927年2月，命令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统率所部4军兵力，分别由北京和冀南一带出动，向河南推进。从此揭开了东北军与直军、东北军与国民革命军战争的序幕。

当时，吴佩孚进退维谷，即由靳云鹗任河南保卫总司令，以高汝桐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后退，诱东北军深入河南后，再以河南地方军队米振标部为内应，进行反攻。吴佩孚被迫西走四川。

东北军大举下河南

张作霖命东北军第十军于珍部戢翼翘（副军长）之二十九旅、赵鸣皋部第三十七旅和我部第四旅3个步兵旅，随同军部由北京附近沿京汉线徒步西进，3月上旬，到达黄河北岸黑岗口渡河，沿陇海路向郑州方面前进。

第十六、七军荣臻、胡毓坤部之丁喜春、秦永义、应振复和刘某（名字忘记了）4个师以及南口战役结束后，新编的第八军万福麟部、王瑞华（副军长）的步兵第二十七旅，黑龙江部队之韩光第步兵旅、骑兵第五旅马占山部、骑兵第六旅张殿九部，均先后奉命由京畿一带出动，或乘火车或徒步行军，于3月初旬，也分别到达黄河北岸詹店车站，在荥阳县境集结。

原驻冀南大名、顺德（邢台）一带的东北军第十一军赵恩臻部3个步兵旅、富双英（副军长）部第十二旅、刘伟部第六旅、陈琛部第四十六旅和骑兵第六旅武汉卿部，向豫鲁

边境河北岸前进。军团部直属部队部汝廉的步兵旅，曾先期到达黄河北岸，由东明渡河后，即归我第十军指挥，沿黄河堤向荥阳方向前进。

在上述进军中，除了我第十军已由黑岗口渡过黄河以外第十一军在京汉路东方，第十六、七军及第八军均在京汉路附近伺机渡黄河，以便向黄河南岸的高汝桐等部进攻。

第十军开封失利

1927 年 3 月，我旅从黄河北岸黑岗口渡河，当日赶到开封，即往见于珍军长。于军长令我旅立即开往中牟，接替已在那里占领阵地的戢旅左翼，布阵准备战斗。迨我旅开到后，我即赴戢旅司令部，向戢报告中牟附近的敌情和其右翼郜旅已在黄河南岸之线，进攻准备等情况。这时，戢旅前方有少数枪声可闻。次晨，我旅第三十九团姜凌云部营长杨运筹正率部西进中，突为南来的高汝桐部马吉第部袭击，杨营长阵亡。未见，旋又奉军部命令，撤至某线（忘记其名）占领阵地。迨撤到该线，工事尚未构成，再奉命撤退。正在后退行踪未定时候，紧接着又接到第三次撤退令，命我部撤至开封的南郊、西郊沿城外土围占领阵地。我问于军长："为什么接连三次撤退，这不影响士气吗？"他说："郜旅已于昨晚不告而退了，而驻在距此 50 里朱仙镇的小张二扁担（米振标的一部）所部，已与靳云鹗联合向开封挺进，威胁我军左后背；同时，寇英杰的态度不明，因而不得不接连撤退。现在军团部无线电台也叫不通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此刻，戢旅也同时撤到开封西郊，正在构筑工事，对中牟东进之敌以迎头痛击。

当夜 10 时左右，城外埋伏的敌军鸣枪放火，驻在城内的

米振标部即将城门关闭。当时，米振标之子米国贤率有一师之众守城，虽已归附东北军，但我们认为他的态度不明，深恐发生变化。于是，于军长、戢旅长和我决定派联络军官通知各部队及王辅予团长，令他率部掩护我军当夜沿开封东黄河堤向兰考方面背进。我军撤退后，敌军虽未跟踪追击，但于、戢二人却于天亮后，不告而走，乘船到了黄河北岸。当时，我心情激动，既恨连年作战的一再失败，又感大敌当前，竟被上级遗弃，便召集参谋长刘晓云和团长王辅予等，嘱咐他们好自为之，服从军长指挥，我是不能再干了。乃回抵天津家门。不久，接于军长电催速回开封。同时，我旅刘晓云参谋长等联名电告，内称：旅长职务上级迄未派人代理，现在所有旅部事务均由他们共同核办，全旅官兵热望及时回旅视事。云云。

我怀着惭愧的心情，回到了开封旅部。这时，我才了解：当第十一军由冀鲁边境渡过黄河时，我第十军已由开封撤退，十一军当即奉命向开封猛扑。到了3月中旬，第十一军所属第四十六旅陈琛部收复了开封，并将米振标部缴械，陈琛升为中将旅长。

张学良将军一席话

我将旅部事务稍加安排，即承军长指示，前往郑州见张、韩两军团长报告军情，张对我说："你们部队从开封撤退之时，正是军团部第十六、七军等乘火车到达郑州之日。原来，高汝桐和马吉第部在你军向兰考背进以后，即于3月中旬先后占领了中牟和开封，并于3月24日，高乘铁甲车率部攻到郑州市郊，我们被围攻了两昼夜，几乎被俘。高的铁甲车向我

们铁甲车队猛撞，正在双方车辆已经接触，并将挂钩搭上企图拉走我们铁甲车时，幸好我方铁甲车大队司令曹耀章及时发炮射击，炮弹洞穿了敌军铁甲车，炸死他们10余人，高汝桐也当时毙命，敌军立即溃退，我们才得脱险！你军的撤退完全是由于联系不确实，彼此情况不了解所造成的。现在已经明确责任所在，对于人事不能不有所调动，以维持我军的纪律。”我说：“这全是我们没联络好，也是对友军（指米振标、赵倜、米国贤而言）不相信的原因，所以这个责任应由我们共同负担，不可都归咎于军长。”张对我未责一言，又说：“于军长是一定要调动的，我想以王树常继任。他是于军长的同学，也是你在镇威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工作的参谋处长，我看很相当。第三十七旅旅长赵鸣皋和你旅的王辅予团长等也得更换，因为他们都有责任。不过，杨宇霆屡次来电，让我维持于军长和赵旅长的位置，这事怎能办到呢！你劝劝于军长吧。”还说：“第十军在南口战役结束后，人员、械弹都没有补充完备，我原来不想让他部前来，可是于军长却在老将面前坚决要求南下，希望当河南督办。”随后，韩军团长也以不同情于军长的态度，随声说了一些，因为他也垂涎河南督办！张接着又说：“第10军攻下南口后，有一天老于鬼鬼祟祟地拿着个纸包见老将于怀仁堂。我正在那里，他没有给我看，我就躲在别的屋里。他走后我才知道，他交给老将的是南口战役的讨赤纪念册，其中第1页是老将的照片，第2页是老于的。其余为你军旅团长和 敌军阵地全景，有一部是用铁路器材构筑的坚固阵地以及掳获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等照片。我和老韩及其他各军的照片一张也没有，难道攻下南口的只有你们第十军吗！真是岂有此理！”随后，我即回开封见于军长，关于他的调动消息，他似亦早有所闻。我当面

向他表示："这次撤退都是因为我们没做好，连累了军长，深感惭愧，请军长遵令而行吧。"不久，军团部发布命令：第十军军长于珍另有任用，遗职由王树常继任。第三十七旅旅长赵鸣皋另调他职，遗缺以第二十九旅参谋长何柱国升充。王树常就职不久，张学良军团长偕同炮兵司令邹作华及高级幕僚多人到开封。在我们彼此谈话中，我说："士兵屡次补充，未经训练，即开往前线进行背水战，似有考虑的必要，这次的失败就是个教训啊！"张说："起初，老将和杨总参议都主张过黄河，我并不同意。现在，我和韩军团长即将去北京，重新研究一下，然后再决定一个方案吧。"

东北军撤退强渡黄河

1927年3月中旬，第八军万福麟部及第十六、七军荣臻和胡毓坤部先后渡过了黄河。万部骑兵军向洛阳方面挺进，阻击冯玉祥部东下。卸任陕西督军陈树藩追随万的左右，参与对冯部的军事活动。

荣、胡部受命击溃高汝桐部以后，即南向漯河及郾城一带推进。第十一军军长赵恩臻待第十军重返开封接防后，即统率所部富双英、刘伟、陈琛的3个步兵旅，武汉卿的骑兵旅，段茂琪的野炮团及王德新的工兵团等全军兵力，由开封通过朱仙镇及尉氏县南进。4月初，攻占了鄢陵，并俘掳敌军守将刘培绪、马德岗和齐兰3人。

同年4月中旬，第十一军攻下了鄢陵不久，即向漯河及逍遥镇之线前进。这时由于陈琛率部攻下了开封，曾晋升为中将旅长，对副军长富双英影响很大，急于求功。富即率步兵第十二旅攻占上蔡后，召集团长会议，当场指示徐英的第

四十六团向汝南挺进；第五十四团王某所部及第九十团苏锡祚部均驻守上蔡，与国民革命军唐生智所属张发奎和黄琪翔部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战事不利，徐苏两团长各率残部向上蔡北方退却。富双英指挥王团在上蔡竭力支撑，并向军部告急。军部命陈琛和刘伟两旅长驰援，但陈旅迟迟其行，刘旅也援助不力，以致富旅一部竟被包围缴械了，并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师，以富为师长，开到武汉不久，富即只身逃回了北京。在富被俘后，陈琛将所部摆出一线长蛇阵，逐渐投入战斗，致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几乎溃不成军。因此，第十一军被迫撤至鄢陵以南布防，被击败，逐步撤退。经过这次战斗，第十一军所有野炮大部遗失，段茂琪、王德新均被俘。在押解途中，段逃走被击毙，王幸免逃回了东北军。

军团部为了增援第十六、七军，命令我军第十军军长王树常，统率所部由开封向郾城进军。我旅留驻郑州为军团总预备队。后因漯河及逍遥镇一带的战况紧张，曾抽掉我旅的王云汉驰赴前线增援，归第十军直接指挥，迨撤退黄河北岸后，才恢复原建制。

有一天，张学良军团长偕同我和邹作华由郑州乘专车到许昌，赵恩臻军长带领参谋长杨政治赶来见张，报告有关陈琛的失败情况。不久，即见杨赶来向张报告：已将陈琛枪决了。同时枪决的还有陈旅的团长甘宗逊。这时，我才知道，这次许昌之行是为处理陈琛而来的。陈琛不但驰援友军不力，而且有伙同甘宗逊阴谋投向革命军的企图。陈的旅长职务由杨政治继任。

自上蔡战事失利后，冯玉祥乘机东进洛阳。奉军驻洛骑兵第八军万福麟部骑兵，曾与冯部小有接触，并未发生剧战，旋即由洛阳退驻巩县。5 月 27 日，洛阳被冯军占领。

自第十一军撤自鄢陵南方以后，战况日趋恶劣。在漯河及郾城一带第十六、七军及杨政治旅等，均遭到张发奎和黄琪翔等部的猛攻。何柱国（与黄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同学）旅曾参加这一次战斗，虽经我第十军继续增援，全力以赴，但因士气沮丧，节节败退；原来估计晋军不至发动进攻，此刻，已参加了战斗。因此，军团部即于5月28日被迫发布了总退却令，并责成我旅在黄河南岸芒山一带占领阵地，掩护各友军安全撤退。在我旅撤出郑州时，军团部令工兵将郑州车站的水塔破坏，以阻北伐军的追击。随后，我旅即进入芒山阵地。

由于我方事前毫无撤退准备，黄河铁桥虽通火车，但骡、马、大车不能通过。这个铁桥是由比利时代为兴建的，已超保险期，平时火车通行不能超过四五节车辆，由郑州车站常住一比国工程师监督，以免发生意外。但当我撤退时，情况紧张，迫不及待，尽管该工程师一再警告，谁还能听他那一套呢？于是，满载军团部及其附属小部队的官兵、武器列车，有如长蛇阵，接连不断地通过了。军团部过河，退驻新乡。

我第十军其他各旅，第十六、七军各部及第十一军赵恩臻部等，分别由黄河铁桥、黑岗口和东明等处渡过黄河，集结于邯郸、顺德及保定一带。第八军由汜水渡河后，奉命在温县集结。留赵有光旅镇守黄河北岸，其余各部队也向后方撤退了。

军团部撤到了新乡，曾派工兵营长王某到旅部对我说："俟各部队撤完时即将黄河铁桥炸毁，阻国民军通过，并派工兵一连由你指挥。"各部即将撤完，张学良军团长召我到军团部，面令我旅、杨政治旅、王以哲旅（卫队旅）、赵有光旅，坚守北岸黄河桥附近地带，以阻国民军北上。他说："只要坚

守几个月，就有办法了。”我问道：“这是攻势防御还是守势防御？如果采取攻势防御，可不放弃芒山阵地的天然桥头堡。这样，不但便于再度前进，且可避免国民军渡河的危险。”张答：“这是守势防御，那个阵地已没有保留的必要。”

我方部队已经全部安全搬到黄河北岸。我即率部渡河，终将黄河铁桥炸毁了两节。随后，即遵令执行任务，在长达三四百里防线中，配备了4个旅的兵力，其防御力如何可想而知了。

河南战役的尾声

1927年6月初，东北军除留4个旅扼守黄河北岸外，其余各部队均撤至冀南一带休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将东北军各旅均改为师，以张声势。对各将领给予官衔并奖给勋章，以资鼓励。师分甲乙2种，甲种师为3团制，师长为中将级，乙种师为2团制，师长为少将级。我第四旅改为第十师，除原有步兵3团以外，增加了卫队、重迫击炮、骑兵、通信和担架各一连，直属于师部。

黄河北岸的防御重点在京汉铁路两侧，对黑岗口、黄河铁桥及温县对岸的巩县等渡口，严格戒备，多派步哨，以防万一。赵有光师的大部警戒面在温县，我师王宝田团警戒该县的一小部分。在此长达数百里的防线中，各团间隔很远，所谓警戒徒有其名。同时，士兵每届换班时，必须徒步走过深水区，加以天气炎热，日久则腿胖肿，眼生病，影响健康，士气沮丧，因而团、营长多有要求换班者，但又无兵可换。就这样防守了数日，终于在官兵长期麻痹的情况下，冯玉祥部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率部突于1927年8月初的一个夜间，由

巩县的黄沙峪渡口偷渡到黄河北岸，并将赵有光师某营长俘虏了。我获得王宝田这一报告后，即令他集结兵力驰援，并及时报告军部。军部便令赵师及王团分别撤至詹店车站，随即乘大车退到新乡附近后，军部发令全线开始总退却。我和团长们都感到诧异，此时军团部已由新乡撤至北京。第十军军部暂在新乡，我即驰赴军部，见到王村常和万福麟两军长，他们对我说："已经接到军团部命令，深恐晋军由娘子关出击，威胁我军后侧背，且有截断退路的危险，因而及时全部撤到河北省全境。"又说："奉军团部命令，将赵师防守不力的某团长枪决，你师的团长王宝田也在枪决之列。"后经电请张学良军团长，对王宝田从轻处理，将王宝田降级为中校团长，戴罪立功。这次总退却，全军都是乘火车输送的，除了赵师的一营与敌军进行了激战遭受严重伤亡以外，其余各部队均缓缓撤走，既无追兵，也无战斗，从而结束了河南战役。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的真相

○王之相 **口述** 武育文 **整理**

1927年4月，李大钊避居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兵营时，夜间工作，写文章，作报告，有声音，被隔壁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发现，法国使馆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外交次长吴晋（亲法派），同时也和日本使馆进行了联系。日本使馆位于御河桥东边，并发现苏联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但不了解夜间的情况。在法日两国支持下，吴晋和当时的警察总监陈兴亚、宪兵司令王琦，还有军法处的单处长，共同搜查苏联兵营。

带人去搜查的是吉世安，他曾在译学馆学英文，毕业后，分配在警察厅做外事工作。去搜查的人不穿制服，不带武器。每个人均穿中式样斜大襟蓝褂子，长及膝下，打扮得象个仆人似的。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以资识别。共有20余人，进去10个人，是跳墙进去的，其余的人在外面巡风。巡风的人，装做在马路边上晒太阳。搜查是在1927年4月8日早上8点多钟开始的。外国人进出一律不加阻拦，中国人则一个不准进去。刚闯进时，屋内正在烧文件，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起火，没有烧透，所以火扑灭后查出很多带有烧痕的文件。最后，有一个人承认是国民党员，做

革命工作，这就是李大钊。当时，所以看重此案的原因，不仅是捕到李大钊，而是找到了许多文件，有中文的也有俄文的。我记得有的是军情报告，如王树常在哈尔滨驻军，共有兵力多少，还有其他军队驻扎情况。政治方面也有些材料。

吉世安搞外事工作，我是外交部的秘书，我们见过面，我跟他熟识，上述情况是他告诉我的。

李大钊被捕后第 3 天，外交部参事朱鹤翔叫我以外交部名义参加翻译搜查来的文件，但不参加审问。我到了警察厅，陈兴亚见到我说：我们是熟人，你俄文很好，你是搞俄文工作的，请你参加翻译工作。随后，他就谈了搜查苏联兵营的情况。他还说：我们没有损害苏联大使馆，只是搜查了兵营，抄出很多书籍和文件，捕了多人。他没详细谈，只谈有一个名叫李大钊的承认是国民党员，做国共合作的工作。他说，要我领着几个人，把文件尽快地翻译出来。他还说，搜查过后，吴晋次长才向张作霖报告，说国民党的北伐军是由苏联派的鲍罗廷组织共产党人参加的军队。他们要消灭北京政府，搞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由南方派人来，潜伏在苏联兵营内。要组织暴动，现已搜查到很多文件，又捕获到潜伏在苏联兵营中企图搞暴动的李大钊等很多人，张作霖听后。就叫吴晋把在张家口交涉总署的张国忱调来北京，负责俄文文件的翻译工作。

张国忱来京后，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下分二组，每组各 5 人。张是第一组组长，我是第二组组长。我们日夜加班翻译，搞了一个多礼拜，没有发现有组织暴动的计划。张国忱无奈，就利用夜晚陪张作霖吸鸦片烟时向张做假报告，说这么重要的事，哪能很快搞完。大约在一个月后，印出了 4 本《苏联阴谋文件汇编》。送给张作霖的是特制的一

套线装的，用黄缎子做书面，书套也是黄缎子的。张作霖一看人证物证俱全，很高兴，批准用绞刑杀死李大钊。最后，经宪兵司令王琦和警察总监陈兴亚以及军法处单处长等人决定立即执行。我听说，李大钊烈士在绞刑面前毫无惧色，当他泰然自若地走向绞刑架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不怕死的高贵品质。

关于对李大钊的处理问题，我在外交部听说，法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主张杀；英美则说不够判处死刑的条件，因为，没有发现有搞军事暴动的材料，可以从轻处理或释放。

我听说，英美使馆不同意这种搜查行动。英美曾抗议说：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有治外法权保护，无论是穿制服或是便服，去搜查苏联使馆的兵营中的文件，就是破坏了多年的传统、常规、定例，违反国际法。要求中国外交部认真查清搜去的文件中是否有外交文件。如果有，外交文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事在外交部内部也议论纷纷。外交部如何答复的，我就不知道了。

最后，捕杀李大钊，当然张作霖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法、日帝国主义假手军阀杀害共产党人的一面，这与推行“以华制华、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殖民政策”并无二致。这个历史教训，我们也不能忘记。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忆涿州之战

○ 常玉林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时，冯玉祥倒戈，由冷口（长城的关口）退袭北京。曹琨被囚，冯玉祥电请天津的段祺瑞来北京执政，这时东北军打败了直军，破关直入，张作霖与冯玉祥早有密约，张乃直至北京。1927年，坐镇山西的阎锡山，见东北军长驱直入，势不可挡，中央政权非张莫属，山西距北京近在咫尺，兵祸所及，只在旦夕。阎锡山与东北军素有宿怨，于是立即派一个加强师，任傅作义为师长，在某日突入涿州，在傅军进涿州城的当天，东北军所派的军队是王之祐旅，也开往涿州。晋（即阎锡山）军进涿州西门，而王之祐旅的高占山团则进涿州东门。两军在城里稍事接触，东北军被推出城外。王之祐的旅部，乘火车已到涿州车站，晋军已占领城里。此时东北军第十七师奉命南下，以火车输送，我八十团的列车，于晚9点行抵涿州车站时，王之祐旅长将我团列车扣留待命。次日上午9时许，傅作义派出步兵一团，由东门向火车站攻击，其目的是要占领火车站，隔断铁路交通。这时我团迅速下车应战，因情况太急，我团伤亡很大，团长房贵斌负伤，不能继续指挥作战。我是第一营营长，只好代

理团长指挥全团作战。北京张作霖得知情况万分着急，频繁向涿州火车站来电话，寻问战况。我营部在火车站接北京电话。下午4时许，已将晋军压到涿州城内，我团协同高占山团，把涿州包围，经两天激战，得知旅长王之祐早已逃跑。

涿州距北平只100华里，又是大军南下的必经之路，因此北平指挥部决心要把涿州拿下，命令第八军军长万福麟，率所部（第十七师）并配属炮兵及工兵等参与作战。围攻涿州的指挥人员有：第八军军长万福麟，参谋处副处长谢珂，上校参谋张文铸，十七师师长苏炳文、十七团代理团长周福成、八十团团长房贵斌，八十五团团长王逌卿，炮兵司令邹作华、工兵司令柏桂林。

时值1927年秋末冬初，经过5次围城战斗，才得以攻克。东北军第一次攻涿州城，以云梯为爬城工具，三面围攻。涿州城高3丈6尺，而云梯仅高1丈，立一个不能上，三四个接一起，事前没做好衔接，又在敌前炽盛火力之下，是办不到的。由拂晓到日出，各营连伤亡很大，也没有一个能爬上城墙。

第2次攻城，命令每个士兵拿一捆谷草，打算垛成草垛，然后爬城，岂知进攻到一定距离，遭到敌方火力的拦阻射击，谷草丢得到处都是，草垛未能垛成，伤亡很大，攻城又一次失败。

第3次攻城，用炮兵集中火力轰炸城墙一点，企图炸成豁口，以便冲击。但炮弹只能把城墙上垛口炸平，一发炮弹只能炸成碗大个坑，轰炸一天，白白浪费了炮弹，城墙也没炸倒，攻城又告失败。

第4次攻城，用坦克车，把炸药送到城墙跟前，炸药集束，然后用电发火机发火。由于坦克驾使员技术不高，无作

战经验，把炸药丢得满地都是，无法集束，也不能发火。坦克被打坏两辆，这次攻城又告失败了。

第5次攻城，派工兵三营，在涿州的东、南、北三面，各作坑道。南面的坑道由工兵第八营袁营长亲自指挥，这坑道正在我营阵地中间，因我营阵地后有条隘路，坑道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装有30多吨炸药。上级命令我营为攻城先头部队，爆破后由爆破口冲入城内。我营以一、二、三连为攻城部队，第一连为先头连，工兵将南面坑道爆炸成功。城墙豁口约有20米，地面爆破口约有10米。只因坑道装药太多，松土太深，先头连官兵不能前进。这时城内守军全部堵击爆破口，其他城墙上的守军，也左右支援，一时炮声四起，我第一连只剩连长和3名排长以及8名士兵。此时守城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死守了80多天，万军长派少将参议魏××（是傅作义的同学）进城劝降。那时城里官兵，由于没有军粮，官兵都吃酒糟，无法继续死守了，只有投降。投降条件是无论官兵一律不能杀害。达成协议后，于阴历十二月傅作义出城受降。受降后把晋军的官兵全部送黑龙江部队，傅作义送军团部处理。

受降后，十七师师长苏炳文，率全师的团、营长，进城参观傅作义的守城设施。四面城墙，都作有散兵及机枪掩体，城垛口下边，在城墙凿有射击孔，各掩体都有交通壕。城内设有铁工厂，专造手榴弹。商店粮栈空无所有，见到他们士兵的厕所里，粪便都象猪粪。参观后东北军将领都很赞誉傅作义的守城设施及其在里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苦守孤城80多天的精神。

傅作义投降后，美国电影公司到军部联系，请求拍照这次战斗的经过。经军部批准，苏师长派我营重演攻城，其内

容不外云梯爬城、炮兵集中火力轰炸城墙，坦克输送炸药，工兵坑道作业，冲入爆破口双方激战等过程。而后给傅作义以及参加重演的官兵都照了像，最后电影公司给十七师每营5口猪，军师部都有，以示感谢。

傅作义逃回山西后，仍任师长。以50万元收买涿州战役的影片，买后都烧毁了。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4辑〕

张作霖与阎、冯、蒋、李战争纪略

◯ 鲁穆庭　王理寰　谢　珂

1927 年秋，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连续打垮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蒋介石为满足个人的欲望，叛变了革命，与汪精卫合流，投靠了帝国主义。蒋当时取得优势地位，声势较为浩大。冯、阎两个军阀，各在新败之余，企图重整旗鼓，借拥蒋以自重。蒋介石复利用欺骗手法与李宗仁达成了团结，并改编了一些他系军队归自己掌握。1928 年 4、5 月间蒋仍冒用革命军“北伐”之名，以作号召，开始向东北军阀张作霖所占领的直隶、山东等地进攻。

张作霖于 1927 年曾派兵赴豫、鲁支援吴佩孚和孙传芳，但均未得到成功，因此缩短战线，把军队撤到燕、鲁南端，尚保有燕、鲁、热、察各地，积极补充备战。张作霖并于是年 6 月 18 日在北京组织军政府，自称陆海军大元帅。由顺承王府移驻中南海怀仁堂，收罗北洋时代的官僚政客，摇旗呐喊，以保持和巩固旧有的势力。

双方面的冲突，有如山雨欲来，又如箭在弦上，无法制止，终演成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

大战前夕双方的军事形势

蒋介石的联合军方面，是外线作战，各路均采取攻势。1928年2月间，蒋在徐州开会，继续进行所谓北伐进军，把几方面的军队编成4个集团军。蒋担任全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沿津浦铁路进攻。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沿京汉铁路及其以东地区进攻。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娘子关及京绥铁路进攻。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沿京汉铁路集结为总预备队，另派白崇禧为总指挥，率一部军队北上，应援京汉铁路方面的军事。这4个集团军，以蒋介石的力量为最大，冯、阎次之，李宗仁意在保存实力，并未以全部参加大战。

张作霖方面，是内线作战，总的方略是：对津浦铁路方面采取守势，对冯、阎方面采取攻势。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发表了几个战略大单位。任孙传芳为第一方面军团长，孙在龙潭败后，即依奉军的支援，在山东济宁一带防守。任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团长，在鲁南一带采取守势，不令进攻。褚玉璞为第七方面军团长，在大名和鲁西一带防守。令张学良、杨宇霆所部三、四方面军团担任对冯、阎两方面的作战，采取攻势，并相机击破其主力。任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担任晋北方面对阎的作战。该部所属，大部是由三、四方面军团临时拨给指挥的。任吴俊升为第六方面军团长，为全军的总预备队。

阎锡山突袭奉军

先是1927年春，阎锡山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和扩大地盘，以两面派的手法，派赵戴文到南京、武汉奔走联络，表示愿服从南方革命政权，最终与蒋介石妥协。6月6日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并悬挂青天白日旗。张作霖认为不利于已，派参谋处长于国翰代表赴太原见阎，表示好感，阴以窥探阎的目的和今后的动向。于与阎系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劝阎与张合作，并代表张邀请阎接受军政府副元帅的职务；阎未允，表示今后仍坚决反共，并说明挂旗是为了自保，不意味与张对敌，托于转张致意。于返京后，对阎的真象亦未得出结论。韩麟春是当时北京军政要人之一，一天在孟公府（韩住宅）召集军团处级以上的人员对阎的态度进行研究，鲍文越、邹作华等均在座。韩判断阎绝不敢单独向奉军作战，并说明阎素性谨慎，不致冒险单干。韩与阎系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许多人以为韩对阎的为人知之较深，大家无何异议。因此，在京人士多关以为阎不致单独与奉军作战，故当局对阎的防备亦未十分注意。

是年8月间，张作霖为了准备应付今后的局势，特命张学良、韩麟春对所部积极补充训练，一旦局势恶化，便于应付。该军团部设在北京光明殿，军队一部驻京绥铁路沿线（第九军、第十二军），其大部在京汉铁路的保定、新乐、石家庄与河间、任邱、博野一带驻防。张、韩奉令后，为了整饬军容积极补充训练起见，临时编成3个校阅委员会，分头进行校阅，8月中旬一律出发。第一组由于珍（军团中将参议）率领，赴察西、丰镇、平地泉校阅高维岳第九军。第二

组由谢珂（军团参谋处副处长）率领，赴保定校阅万福麟第八军和王树常第十军。第三组由栾云奎（军团部参议）率领，赴新乐、东长寿校阅荣臻、胡毓坤第十六、七军。另派一部人员赴河间、任邱、博野等县，对戢翼翘第二十九军进行一次视察。

于珍等经过大同到丰镇校阅郭希鹏骑六师，又到平地泉校阅董怀卿骑三十五师和孙德全步十八师（该师等属于第九军）。校阅完了，由该军参谋长刘维勇陪送返回大同。大同镇守使李生达奉令突然将于、刘和校阅委员等扣留，并转送太原。于是晋北呈现紧张形势，奉、晋两方接近的驻军，不时小有冲突。张、韩闻讯，下令所属各部严加戒备，并令各校阅人员停止工作，即时协同所在部队担任军事任务。同时张、韩率参谋长鲍文越和各处部分人员开赴保定，以光园为指挥部，对阎锡山拟出作战计划，开始调遣部队应战。

阎锡山自挂青天白日旗后，日夜筹谋，如何利用山路秘密进军，乘奉军不备，以迅雷之势把奉军击溃。表面上与南京诚意合作，骨子里还是同床异梦，其真正的企图，是想单独打垮奉军以后，独领京、津，扩大自己的地盘，再向蒋介石要求平分天下。先是阎派南桂馨常往天津与日寇驻屯军司令新井来往，暗中得日寇支持，对奉军有些轻视。阎的计划是一面积极扩军补充训练；一面考虑相当时机驱逐奉军。但自扣留于珍以后，对奉军维持和平的假象毕露，所谓图穷而匕首见，只好即时与奉军开火。

9月中旬，阎令徐永昌为右路总指挥，与孙楚率步骑炮10余师，星夜用火车输送，到获鹿以西下车，经平山渡滹沱河后，猛向新乐、东长寿的奉军袭击；另派一部打退了汲金纯部，攻占了石家庄。当时驻防新乐、东长寿的十六、七军，未

加戒备，突然遭优势敌人的奇袭，战斗失利，退守望都。阎军当即推进，占领了定县，并继向望都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形成互相争夺的肉搏战。张、韩急令驻河间、任邱、博野的戢翼翘军星夜兼程并进，向定县对阎军侧击。戢军到达后，经三昼夜的激战，阎军不支溃退，同时进攻望都的阎军亦被迫撤退。这时十六、七军与二十九军会师，另由保定又派来一部增援，一同乘胜向阎军追击。阎军经平山、获鹿退守娘子关，石家庄方面同时亦撤退。阎部王东海骑兵降奉，改编为骑兵师。奉军即前进占领平山、获鹿和石家庄等地，一部逼近井陉。这次战斗，时间虽只有半月，两方损失不小，而阎军损失更重，由于需要休息补充，遂形一时的对峙形势。

在徐永昌出击京汉铁路奉军的同时，晋北方面，阎派商震为左路总指挥，与张荫梧、李生达率军沿京绥铁路出击，高维岳第九军稍事抵抗即行后撤。商军前进到达宣化，经张作相、汤玉麟率军还击，又因京汉路方面败退，商震等奉令退守大同，缩短战线，暂时放弃绥远，固守雁门关阵地。奉军当即进驻天镇、阳高等地，封锁晋军，亦形成了对峙形势。停战不久，阎锡山为讨好奉军，即将于珍等送还北京。

傅作义守涿州是当时奉、晋战争中有名的一个局部战争。傅以一师兵力，固守3个月，最后因食粮缺乏，陷于孤立无援的苦境，不得已而缴械，一时获得善守的名誉。

欧战后，有些军事学校的教官们，在讲课中常强调大战以后，兵器特别发达，飞机、重炮、坦克等无坚不克，认为中国的城墙在防御上已毫无据守的价值，防守者应该抛弃旧城，另选适当阵地构筑新式堡垒。这次傅作义防守涿州，牵制了奉军四五倍的兵力，时间又有3个月之久，因此，研究战术的，对中国旧城在防守时又有新的估价。

当阎锡山两路突袭奉军时，另外又派有两个挺进队，一是傅作义的第四师，一是李服膺的第十四师。他们的任务是乘晋军两路进攻时，向京汉铁路截击奉军。该两部出发是由晋北广灵县再经过直隶蔚县，分头向京汉铁路方面前进。李服膺率队向北京前进，到门头沟后，遭于芷山部迎击，撤回山西。傅作义第四师附炮兵曾团山炮一营，经易县山路直向京汉铁路前进，中途与晋军失去通信连络。10月上旬部队到达涿城附近，此时两路晋军已败退一星期左右。为了达成任务，急向涿城进攻。当时防守涿城和车站的是于芷山部王之佑旅，该旅两个团，驻防分散，意外遇优势敌人进攻，抵抗不力。车站先被占领，随后傅作义亲率大部军队由涿州西门攻入城内，王旅溃散，涿州城遂由傅部完全占领。

在傅部先头进攻涿州车站时（10月上旬，准日不记），正值谢珂携带战胜阎军的"战斗报告"赶京见张作霖。专车抵涿站时，亲闻站外枪声四起，当令火车急开前站，不久通涿站的电话断绝，涿站即被傅军占领。谢珂抵京后，先见总参议杨宇霆，然后与杨同见张作霖，随将涿站所见向张报告。张立电张学良、韩麟春速派大军限期收复涿州。

张、韩接电后，即派万福麟向各部抽调4个步兵旅围攻涿州，调邹作华率重炮、野炮各一团，与万协议进攻。又调工兵一营，坦克一队开到涿州，归万福麟统一指挥。另外派曹耀章带铁甲车一列当晚与部队协同攻下涿州车站，不久交通即行恢复。

傅作义遭奉军大部压迫，令城外部队退入城内，固守待援。不时以山炮向车站列车射击，一时交通受阻，火车须在夜间开行，经邹作华以重炮几次压制，傅始对车站停止炮击，火车即照常通行。

奉军当时围城的部队，南面为苏炳文旅，东面为安锡嘏旅（由直军改编共两团），西面为王以哲旅，北面为黄师岳旅。在西南与东北城角数里以外，各设有炮兵主要阵地。万、邹商定，每次攻城开始前，先用炮兵集中射击，次用工兵的坑道作业轰炸城墙，然后利用破坏的洞口，或选守兵薄弱的地点，分头进攻。经过几次战斗，有时部分士兵登上城墙，因伤亡较多，未获成功。最后一次，是用多数炮兵集中向西南城角附近射击，并由工兵用预装的大量炸药爆破城墙。当炮兵停射后，工兵将城墙南面偏西的一部炸倒一大段，在尘土飞扬中，奉军敢死队开始进攻，但因炸城的浮土难登，行进迟缓，傅作义乘机集中兵力，亲自督战，才巩固了防线，这次奉军亦未得攻入城内。

奉军在围城时，顾虑使用飞机投弹炸伤居民，仅使飞机向城内投放几次劝降传单。攻打了3个月，城内粮食净尽，人心恐慌，士兵以酒糟充饥，最后酒糟亦无（傅在保定亲说）。奉军知其内容，乃派人入城劝降，于翌年1月上旬，傅始率部缴械出城。部队徒手开赴黑龙江改编，傅作义本人被送往保定军团部。张学良不以敌人看待，令傅住在鲍文越家眷宿舍中，并按月给以生活费用，出入亦不加限制（当时谢珂亦住鲍宅）。

1928年4、5月间，奉军与冯、阎两方作战，后方控制的军队均赴前线，保定派鲍文越留守，傅当时仍住鲍宅。值前方战事紧急，傅以宿娼为名，时常夜不返寓，以作试探，鲍亦未予监视。因此，傅得乘机潜赴天津。张学良闻讯后，对鲍严加申斥，并记大过一次。

张作霖对蒋、李、阎、冯的作战方略

张作霖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后，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成立了军政府。府下设有几个部，其中有关军事的为军事部，部长为何丰林，部内参谋次长为于国翰，陆军次长为杨毓珣。部以下尚设有参、陆、海、空4署，参谋署长由于国翰兼，陆军署长由杨毓珣兼，海军署长温树德，航空署长赵延绪。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电复职。2月间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各方军队为4个集团军，并开始动员所谓北伐。

张作霖为应付当前的局势，在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其作战方略有下列的决定（综合研究所得）。

（1）张学良、杨宇霆所部三、四方面军团，大部开赴邯郸以南，向安阳的冯玉祥军进攻。以一部对娘子关、五台方面的阎锡山军进攻，并相机向山西内部推进，击破其主力。

（2）张宗昌所部应固守鲁南，不可出击，布置纵深配备，步步防守，抵抗敌军北进。

（3）孙传芳所部在济宁一带防守，与张宗昌部切实联系，固守鲁南。

（4）褚玉璞所部在大名一带防守，与右翼的张、杨部队切实联系，阻敌北进。

（5）张作相所部应配合三、四方面军团作战，向平型关、大同进攻，并相机攻入晋北内部。

在最高会议中，有人提议，津浦线敌人是蒋介石，兵力较强，可由三、四方面军团抽出两个或三个军，开到山东中部协助防守。张宗昌以为自己的兵力很多，足以保住山东，拒

绝此议（此段是杨宇霆在石家庄准备撤退时，向军官们说的）。

当张宗昌溃败中，正是三、四方面军团战胜冯、阎取得进展时，张作相方面也攻占了大同在进展中，皆因天津吃紧，后路危险，不得不全部后撤。

奉军主力三、四方面军团的编组和实力

第一次直奉战后，奉军成立了陆军整理处，积极整顿旧军和编练新军，其中成绩最优的是张学良、郭松龄所带的二、六旅。在这个基础上扩编为一、三联军。第二次直奉战中，奉军得到胜利，一、三联军起了主导作用。郭松龄反奉，是因为临时指挥了这支劲旅。反奉平息后，这支部队仍回到张学良的掌握。奉军三次进关以前，把这支军队扩编为三、四方面军团，逐步成为奉军的主力部队。张作霖首派张学良、韩麟春任军团长。该军团的全衔当时是“镇威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以后把“镇威军”改为“陆军”二字。军团部只有一个，军团长是两个，并未分正副，各人的职权亦无明文规定。但中级以上的带兵官升迁调动和较大的财政数字，必须由张学良亲自批准；次要的事件，由韩麟春批阅；例行公事，通常交由参谋长代划。张学良如此重视人事和财政，据说是受郭松龄反奉的教训而引起的。

该军团进关以后，统属的军队更多，几乎管辖了奉天全部的武装，所属各部的薪饷和军需物品，由军团直接发给，武器装备均比他部精良。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军事学校出身，或受过短期军事训练的。这次张作霖与蒋、李、阎、冯的作战，该军团实负担 2/3 的任务。估计当时所属部队（海空在

外），约有140余团，兵员不下50余万人。

1927年秋，阎锡山突袭奉军遭到失败，一时不敢再犯。奉军亦正在补充训练中，此时韩麟春突患半身不遂症，回京治疗，旋又请准长假返奉疗养；据当时内幕传说，韩先前认为阎绝不致单独对奉作战，而后来阎竟出击，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故请辞去职务以便疗养。所遗军团长缺，张作霖选派了杨宇霆继任。杨自江苏被逐以后，仍任张作霖的总参议，虽然言听计从，得到无比的信任，但仍是有名无实的职位。杨本人也愿遇机施展才能。韩走后，张学良一人指挥许多部队，也很吃力，必须得到一个适当的人选共同担负巨艰。在张作霖左右的人员，除杨宇霆外，尚无适当人选。因此，杨宇霆继韩任军团长最为适当。杨奉令后于1928年2月中旬，带随从副官高凤歧等到保定视事，北京派周濂为留守司令，负责向各方担任联络任务。

三、四方面军团对冯、阎军的作战

一、对冯军作战的经过：

冯玉祥于1928年2月间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议后，开始调动军队，派鹿钟麟、韩复榘两军，沿京汉铁路向安阳（彰德）出发，鹿为总指挥。冯的总部设在新乡，派副参谋长秦德纯到安阳帮鹿指挥军事。鹿3月底到安阳，即派兵占领丰乐镇，并准备北进对奉作战。

张作霖侦知蒋、李、阎、冯等在徐州开会，准备进攻，亦在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并制定作战方略。张学良、杨宇霆参加会议后，于3月上旬由京返保，准备与冯玉祥作战，作战各部门，限于本月26日以前到达指定防地。各部命令到后，

即开始行动，其调动情形，略述如下：

于学忠二十军（内邱）、戢翼翘二十九军（顺德）由火车输送向磁县出发。于军在铁路以东，戢军在铁路以西（铁路线上属戢军），集结待命。

富双英十一军（北京）由火车输送，除派一旅暂驻邯郸外，其余开赴磁县，下车后左翼与戢军联接，向西10余华里集结待命。

王以哲第十九师（保定）预备军姜向春第三旅（北京）由火车输送到邯郸为预备队。两部暂编为第一梯队，派王以哲为梯队长。

窦联芳率骑一军第二十二师向武安县以东地区前进，掩护我第十一军右翼的安全。马占山率骑二军第十七师向成安县以西地区前进，掩护我第二十军的左翼安全。

邹作华率炮兵第二旅与重炮兵一团，由火车输送，到磁县以北集结待命。

曹耀章率铁甲车两列并工兵两营开赴邯郸待命。

4月1日张、杨率参谋处及各处部分人员乘专车由保定开赴邯郸，并在邯郸设前进指挥部，派参谋处长谢珂负责。保定为后勤总站，运输接济，关系甚重，派参谋长鲍文越负责，并派邹致权为保定运输司令。张、杨到邯郸后，暂驻火车上办公。邯郸警卫由王以哲第十九师担任。

张、杨到邯郸后，除召集前方将领指示方略外，又电邀大名第七方面军团长褚玉璞到邯郸会面，商讨联防事宜。4月4日，褚玉璞带卫队一连乘汽车到邯郸，随来的有于世铭少将及上校副官数名，到邯郸后，即到火车上休息。褚全身佩带武器，有步枪1支，盒子枪1支，另有手枪与子弹带等，不下五六十斤。张学良对他说："大哥，何必自己带这些武器？"

褚说:“老弟，你不知道，遇紧要关头，非自己动手不可。”褚进入车内，将所带武器子弹卸下，令3个上校准备烟具过瘾。3人各把所带假温水瓶打开，取出3套烟具，开始放置3处，用流水作业方式，烧打烟泡。褚倒在床上，喷云吐雾约过半小时，然后坐起，与张、杨秘商联防事宜，饭后，返回防地。

南开各部队于3月底前数日均按照指定命令到达防地。4月2日，张、杨在邯郸召开军事会议，令于学忠、戢翼翘、富双英及骑兵第一、第二两军，以戢翼翘军为中心，开始前进，于4日拂晓向丰乐镇一带的冯军进攻。炮二旅以主力在戢军后方，以一部在于军右后方，协助奉军进攻，务期集中火力毁灭冯军，各骑兵军要确实掩护奉军翼侧，并发挥包围打击冯军的威力。铁甲车沿铁路前进掩护奉军进攻。王以哲率第十九师于3日推进到磁县附近待命。另派作战科长夏鹤一乘军用飞机每日作空中侦察，协助前方搜集情报，便利指挥。

奉军进攻一昼夜，冯军不支，5日退守漳河南岸。冯军派孙连仲军增援，两方隔河炮击，冯军暂取守势。事后侦知，5日炮战中，射中冯军司令部，将少将李炎击毙，部分房屋起火。

在进攻前，关于使用兵力，参谋处认为左翼地形平坦，敌人容易进攻，主张在于军后方配备相当的预备队，右翼系山地，比较坚固，可少配预备队。杨的主张，于军系收编部队，可令独立作战，预备队应放在戢军后方。争论许久，服从了杨军团长的意见。在4日进攻中，于军损失很大，又因骑二军掩护不甚确实，冯军一个骑兵支队竟由于军左翼绕到磁县以北的马头镇，把兵站烧了一部，幸有铁甲车保护，临时另由邯郸派汽车队载援兵出击，始把冯的骑兵打走，兵站损失不大，经过这次教训，才派步兵一团控制到于军后方。

二、对阎军的作战经过：

自1927年10月间，阎锡山袭奉失败后，奉军对阎军进行了封锁战，形成两军长期对峙的形势。1928年2月间阎锡山参加徐州会议后，开始调动军队与奉军挑战，但因奉军兵力较优，始终不能采取攻势。奉军在未正式发动攻势以前，第十六、七军已逼近了井陉，第八军在石家庄以西，与十六、七军遥为策应，威胁娘子关右侧。第十军在阜平龙泉驲一带逼近五台。第五方面军团由平型关起包围了晋北，已进占了大同。绥远有汲金纯第十五军，偏关有郑泽生三十一军。匪军王英、满泰也被汲军收编，这些军队虽然力量不大，对于阎军均为不利。

张、杨由京返保后，除将对冯的军队动员外，同时亦下令对阎各军开始总攻。4月上旬，第十六、七军占领了井陉，阎军退守娘子关。第八军亦开始前进，赞皇场派黄显声二旅（新编）掩护万军左翼。张、杨因进攻冯军已得到胜利，于4月6日乘专车赴石家庄，对攻阎部队进行视察。张、杨亲到井陉和石家庄西方前线，指导方略后，于10日返回邯郸。据密报，阎锡山有抽调大部骑兵绕攻万军左翼并袭京汉铁路的情事。军团为了确保京汉铁路中段的安全，决定在万军左翼增派军队。张学良当召谢珂面授机宜，令携带命令即日到井陉与荣、胡两军长商量，抽调丁喜春师到赞皇万军的左翼布防，并编为第二梯队，将黄显声旅归入梯队。派丁喜春为梯队长，谢珂为总指挥兼梯队参谋长。荣、胡两军长当下令丁师即日开拔到赞皇，并担任掩护京汉铁路的任务。梯队部暂驻赞皇城内，军队开到赞皇西20余里布防。关于邯郸指挥部的任务，交由参谋处副处长徐祖贻负责。

三、四方面军团4月中旬对冯、阎战况

戢军已经由丰乐镇渡过漳河，驱逐了安阳城北西的冯军。于军占回龙集、三台镇等处渡河，逼近安阳城东面，奉军重炮向安阳射击。冯军孙连仲部溃退，被俘1500余人，安阳指日可下。奉军右翼富双英部队有绕攻安阳城西的准备。第十九师一部推进，准备增加前方。

十六、七军连日来猛攻娘子关，阎军已呈动摇之势，据当时情报，有准备撤退的形势。晋北奉军在占领大同后，正乘胜在前进中。第十军一部已逼近五台。

津浦方面奉军溃败的情况

5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被革命军打败后，于1927年春，全部撤退到长江北岸，总部设扬州。开始与张作霖拉拢合作，张予以有力的支援，从事于补充扩军。是年秋，孙又渡江进袭南京，损失甚重，率残部退到山东济宁一带整顿，旋受张作霖任命为第一方面军团长，与张宗昌共守鲁南。1928年4月上旬，孙再攻徐州，在前进中，后路济宁被孙良诚、方振武两军袭占，不得已回军驰援。济宁虽一时收复，而张宗昌部许琨失守韩庄，而孙军陷于孤立，乃命令全部向济南方面撤退，4月中，孙与张宗昌退入济南，4月下旬，泰安、界首相继失陷，孙、张逃离济南。孙到京见张作霖，商妥率部出关。孙的临时总部设在直隶大城县，当召开将领会议，其部属郑俊彦、李宝章等已被蒋方拉拢，反对出关。孙见众叛亲离，只得只身随奉东退，直到张学良枪毙杨、常以后，孙才

回到天津，假托信佛隐匿，不问政治，不久被仇家施剑翘在居士林刺杀。

1927年秋，张宗昌、褚玉璞为了应援孙传芳军，皆在鲁南、徐州一带与蒋、冯两军作战，因战斗失利，张作霖下令张宗昌退守鲁南韩庄一带布防，褚玉璞退守河北大名一带布防。1928年4月1日，蒋介石到徐州，9日发布北进的总攻击令，率14个军北进。13日拂晓，刘峙所部攻占了韩庄，许琨溃退。张宗昌命令各部在泰安、界首两地布防。27日蒋军攻占了泰安，29日又攻占了界首，败军纷纷溃退，无法制止，张宗昌与孙传芳由济南北退。蒋介石5月1日进入济南，日寇借口保侨，事前早有预谋，见蒋军入济南，即时由胶济路出兵，3日入济南，把交涉员蔡公时绑走，并加以杀害，遂发生"五三惨案"。日师团长福田提出通谍，要蒋军不准在济南胶济路两旁20华里以内进军，同时并向贺耀组军进攻，军民当时死伤四、五千人。因此，蒋军北进迟滞，津浦铁路一时亦中断。

褚玉璞在大名防守中，仅与冯军小有冲突，并未发生主力战斗。4月下旬，因张宗昌败退，三、四方面军团北撤，褚即下令所部，经南宫、武强等县，向天津以东撤退。

奉军全部撤退的经过

鲁南自韩庄失守后，军事部令于国翰筹划第二道防线，于当派参谋署第四司司长李铨（子衡）带课长苏小云等，并会同李端浩（陆大教育长）、吴毓林（讲武堂总队长）及部分讲武堂学员，到滦东5县（滦县、乐亭、昌黎、卢龙、抚宁）构筑重点防御工事，并沿滦河架设桥梁，以便军队通过。5月上

旬，津浦方面的败军纷纷北溃，京、津震动。奉军虽然对于冯、阎两方面的军事均有胜利，倘天津失陷，这两方面的奉军，撤退无路。因此，张作霖决定下令三、四方面军团和晋北第五方面军团，速向滦东5县和关外逐步转移，以保实力。济南“五·三惨案”发生，蒋介石的攻势稍缓。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佳电，主张息战对外，以作谈和的试探。但蒋、李、阎、冯联合军方面，认为张系缓兵之计，且当时胜利在望，不肯言和，蒋反下令阎、冯和白崇禧的部队，急向京津推进。蒋军亦绕离铁路北进。张作霖见主和无望，决即准备出关，以图再举。根据可靠内幕消息，张在出关以前，5月中旬有日本公使芳泽晋见一次，并携有秘密文件，如张允可签订，日本可以出兵相助，阴止南军北进。张不愿作此卖国行为。严词拒绝。并于6月2日通电全国。大意谓：“不忍再穷兵黩武，爰整所部退出京师，此后政治问题，听国民裁决。”3日午后，张乘专车出关，另派有压道车一列先行。翌晨专车开到皇姑屯南满铁路桥洞时，轰然一声，被日军预置的巨型电发炸弹炸伤，到家不久，因伤重死去，由山海关迎接登车的吴俊升亦遇难身死。

4月下旬，张、杨以津浦失利，天津危急，又奉到北京命令，将全部移转滦东集结。张、杨遂制定撤退计划，下令各部遵照施行。第一期，把攻打冯军安阳一带的部队先撤到保定附近，然后由铁路输送到滦东各县。第二期，把攻打阎军的石家庄、娘子关部队撤到保定以南，先掩护由安阳方面撤退的各部安全通过保定之线。以后掩护部队，再以军为单位，按照计划经过京、津中间地带，向滦东一带撤退，集结待命。

军团部于4月30日，派姚东藩旅护送，由邯郸向北京输送，炮兵、工兵由铁甲车向北京输送。攻冯军的各部队接到

命令后，于 4 月 30 日以前，以军为单位，向后方撤退，脱离战场后，分别沿京汉铁路两旁转进 。到达保定附近后，再由火车输送。

张、杨当命令在邯郸下达完了，于 28 日乘专车到石家庄，召集攻阎的营长以上的干部开会。由杨传达此次撤军的原因，以及津浦张宗昌失败前后经过，并令第二梯队丁喜春师，在撤退后即归还建制，黄显声旅归军团部直接指挥，谢珂派到万福麟第八军代理参谋长。

第一期各部队，在 5 月上旬先后通过保定开滦东一带；第二期各部队在 5 月上旬先后撤到保定以南布防；中旬由保定经过津浦中间地带向滦东撤退。第二期各部队撤退时，第八军在最后掩护，转进中有冯军郑大章骑兵一路尾追，系扰乱性质，仅有些小冲突，并无激烈战斗。

王树常第十军，5 月中旬由阜平龙泉驲奉令向滦东后撤。当各军渡过滦河时，因多处预先建有桥梁，均得以顺利迅速通过。

张作相奉到北京命令后，于 5 月底将所属各部分别向热河、京东一带撤退；十二军退承德，第九军退滦平，第三十军除派鲍毓麟四十七旅留在北京办交代外，其余向马兰峪一带撤退。张作相于 6 月上旬，率吉林第十五师由火车输送到关外。汲金纯在第五方面军撤退前，于 5 月中旬已奉令向热河境内凌源一带后撤。

5 月中旬，张、杨由保回京，杨住九爷府，张住万字廊。张、杨每天分别到光明殿军团部处理公文。6 月 4 日上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当日北京一般尚无所闻。是日正值张学良的生辰，当时各方面的事务，非常忙乱，高纪毅、鲁穆庭军团处长等到万字廊，张亦未予接见。翌日报纸登出张作霖在

皇姑屯被炸消息，在京的东北各部人员，闻之更觉震动。京奉铁路载运的部队和机关列车，头尾联接，长达一二十里，但无一西行列车。迨5日军团部列车行抵芦台时，见有西行车一列，系阚朝玺所乘。车停止后，召集军团部处科级人员讲话，当时有鲁穆庭等在车上。阚向鲁等说："张大元帅遇炸，并不甚重，正治疗中，不日即可痊愈。"说完，每人发油印品一张，系张作霖"告前方将士书"。内容大意是，"余不幸归途遇险，臂部受伤，经医治疗，想不久当可痊愈。希望我前方将士袍泽同人，务依照余佳日息争通电，努力和平，促成统一，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幸勿以余个人为念。"阚讲完话以后，即时开车赴京，向张学良报告。关于张作霖被炸实情，想必向张密报了。6号张、杨专车由京开赴滦县。军团部各处暂住滦县城内（滦河西），张、杨住滦河东的北山大觉寺内，该寺距滦河约2公里。警卫方面是第十九师团长刘多荃的部队，专车即停在山旁。以后有罗文干、汤尔和、孙传芳等也先后到达大觉寺。滦河附近当时已派十六、七军负责警戒。

蒋、李、阎、冯到京会议

奉军全部东撤和张作霖被炸以后，东北局势尚称稳定。军队除直鲁联军比较混乱外，其余各部军纪尚称良好，而实力亦无甚损失。张学良离京前，已派定三十军鲍毓麟旅临时维持地方治安，并负移交阎军的任务。最后撤离的武装，是东北讲武堂分校学生数百人，由教育长张厚琬率领，并担负收容零星撤出的人员。北京当时已推出王士珍等人临时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

奉军撤退时，阎军以近水楼台，边退边接，即时占领了

石家庄、保定等重要据点，收编了安锡嘏的一师，并获得不少兵站遗弃的物资和军用物品。白崇禧军于5月中旬亦到石家庄，随阎军北进。6月8日，商震、徐永昌军进占了北京。冯军韩复榘部，急于参加获得战利品，派汽车载军队一部随阎军到北京，分缴了一部军械。蒋介石因“五·三惨案”，军队迟滞了前进。阎军到京最先，实力亦大，自然承担了全部的接收责任。

蒋介石于7月下旬约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李济琛等到京，在西山碧云寺开军事会议。主要因红军已在井岗山恢复了根据地，并从事发展。决议即派军队急速剿除。对张学良问题，认为张尚有相当的实力，用兵困难，为迅速完成统一，决定以政治手段处理，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对于张宗昌、褚玉璞到芦台、唐山的溃兵和孙传芳的残部（投降的除外），决用武力解决。当场指定白崇禧所部为解决张、褚的主力，另由阎军派部协助。会上蒋介石并说，今后尚须开编遣会议云云。

北京改为北平，派阎锡山兼平津卫戍司令，派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南桂馨为天津市长。直隶改为河北，派商震为河北省主席，杨爱源、徐永昌分任察哈尔、绥远主席。平、津和北方的大权，均落到阎锡山的手中，预伏不久将再次发生军阀大混战。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辑〕

皇姑屯炸车案前后

◯王家祯 **口述** 武育文 **整理**

1928年至1929年底东北当局对日外交方面的事情，张学良将军完全委托给我办理。

张作霖在1928年初与日本订立关于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的借款密约，条约商定日本借给张作霖600万日元。日本由“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出面。张作霖对这项密约并没有爽快地签应，并附加个条件，须在一年之内同地方政府商定后才有效。日本方面主张把这项密约，作为政府间的正式协定，张作霖则坚决不允。因此，日本认为张作霖缺乏诚意，大为不满，日本国内的舆论，有强调惩戒张作霖的论调。

日本公使芳泽暗示张作霖，如果铁路问题能够圆满解决，支持张作霖的地位不致动摇。芳泽还警告张作霖：“当战乱发展到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张作霖因为受到北伐军的压力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的严重警告，于1928年6月3日凌晨，不得不携同他重要官员及侍卫队，乘坐一列专车撤离北京，返回奉天，当专车出发时，车站中挤满了送行的文武官员，在军乐声中，张作霖登上了火车。当列车

徐徐开动时，他拉开窗帘，向送行的官员们致意，这是张作霖在北京留下的最后形象。这一天可以说是北洋军阀政府寿终正寝的日子吧！

6月4日中午，东北军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就传出了皇姑屯炸车的消息。这一天正是军团长张学良将军的诞辰，晚上在中南海给张学良祝寿，设有丰盛的酒宴。大家因为听到被炸消息，颇为惊慌，没有祝寿欢宴的气氛。不过据奉天来的电报，好象情形并不十分严重。电报大意说："大元帅平安无恙，奉天地方秩序安谧。"又过了两三天，我们就跟随张学良将军共乘3列火车撤出北京。火车开得很慢，每站必停很长的时间。过了天津，我们才知道沿途火车水塔大部分被破坏了，我们这列火车是最后撤退的，显然是在我们以前撤退的列车所为。经查问才知道，在我们之前是交通部次长兼京奉铁路局局长常荫槐所坐的撤退专车。沿途水塔的破坏是常氏所为，所以大家对常氏的居心，颇多猜疑，这恐怕是常氏后来被杀的最初伏笔。

我们这一行列车走了两天多，在离滦县车站不远的滦河铁桥边上停了下来，在这儿共停留十来天。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将头发剃光，素衣素帽，状甚凄然。以后才知道，这时张学良已知道他父亲被炸死的真实消息，原来张作霖乘坐专车经过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桥，被炸身死。随张作霖专车撤退的还有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少将、町野大佐等，他们全在天津站借故下车了。只有仪峨诚哉少佐没下车，他也负了微伤（仪峨是随张学良三、四方面军团的顾问）。后来了解到他们日本军人内部有矛盾，故意未通知仪峨在天津下车。

当时情况，一般人都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的政权是日本政府极力维护的，如郭松龄反奉时倘无日本人公开阻止郭军前

进，恐怕张氏早就下台了。不久前，张作霖的北京政府若不是日本出兵济南，阻北伐军北上，恐怕也早就支持不住了。

为什么同一个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的田中义一内阁竟阴谋炸死张作霖呢？这是因为，日本认为在满蒙为确保日本的既得权利，张作霖要比郭松龄可靠得多；北京政府比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更有利得多。从这方面看，日本要维护张作霖政权。可是田中义一要实行他的奏折上所计划的侵吞满蒙的时候，张作霖就不能不是它的障碍了。日本政府借口北伐军节节胜利，发表声明说："一旦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维护治安，将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同时命令旅顺的关东军进驻奉天（1928 年 5 月 18 日），另一方面还训令驻北京的芳泽公使，劝告张作霖撤回关外，巩固在"满洲"的地位。张作霖对此未加理睬，并且在济南事件爆发时，还通过新闻记者声明，愿意南北合一，共防外侮。因为撤回关外就意味着完全沦为日本关东军的傀儡，在民族运动高潮面前张作霖是不甘心做卖国贼和傀儡的。几经交涉，日本最后恐吓张作霖说："如果不听劝告，同国民党军队继续冲突，失败后想退回满洲时，日本军队可能在山海关予以拦击。"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张作霖才决定撤出北京重返东北。日本政府当时谋杀张作霖的计划基本上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日本妄想制造满洲独立，然后进行吞并。

田中内阁从 1927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初，连日召开了有外务、陆海军、大藏等省参加的' 东方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答复美国用警告式的口吻所提出的日本是否要对中国东北采取某种积极行动的照会，以及对于剑拔弩张，候令出动的关东军如何发出指令的问题。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事实上的外务相，因田中义一自兼外务大臣）对于从出兵山

东到济南事件期间时常发出动摇的田中首相，不断进行鼓励，甚至还扬言说："田中如果不听说，就让他辞去总裁职务。"森格以后和他相勾结的军部当时策划的阴谋，就是企图使用军事力量来使满洲独立，然后吞并之。然而当时日本内阁的政策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加之外受美国的压力，所以 5 月 25 日夜，田中首相断然决定停止一切行动。于是进驻奉天的关东军也不得不迅速恢复平时状态。但是军部特别是关东军并未完全符合内阁决定的精神，竟在 6 月 4 日将张霖炸死，但也未再扩大事态的范围。

1927 年 7 月田中义一就代替民政党掌握了政权，在他执政的前后，他制定了有名的田中奏折，在这个奏折里阐明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八纮一宇的精神，要征服全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蒙。皇姑屯炸车阴谋，就是田中义一执政后实行其征服世界的第一步。日本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的阴谋打算，就是想乘东北军队大部分都在关内，张作霖以下的重要人物全在车上，一下子炸死这帮人。这样奉天必陷于混乱，关东军可以借口保护日侨和其特殊权益，而一举占领奉天，再组织傀儡政权。当时关东军司令部和它的两个师团全驻在奉天，然而田中内阁的如意算盘却未能实现，是有以下几种因素在发生作用。

（1）当时日本政府这种阴谋行动，是一种独吞满蒙的侵略行动，英、美列强觉得若让这种侵略行为得逞，不但列强在华均势遭到破坏，甚至它们的在华利益也要遭到损失。所以皇姑屯炸车案件发生后，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差不多同时发出强烈指责。由此可知，当时英、美两国政府对日本政府不能不有所警告。

（2）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政

党轮流执政，差不多也有 20 多年了，它们对局势的控制比较有把握。另一方面军人法西斯组织当时在初步形成中，羽毛尚未丰满。所以，实则奉田中内阁的命令，表面上看是关东军的鲁莽行动，因此遭到元老重臣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强烈反对，而田中义一也就不得不随风转舵，改变其初衷了。

（3）当时留守在奉天的东北当局（省长刘尚清、参谋长臧士毅）对于炸车这一突然爆发的大事，没有张惶失措，小心谨慎地应付横逆之来。使得日本军警想寻衅都找不到借口，奉天当时并没有一点混乱现象。另一方面对张作霖和吴俊升被炸的情形也保持了极严格的秘密。直到半月之后，正式发表张作霖治丧的消息，日本人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真相。町野顾问在此期间，曾数次向我探询真情，表现出很焦急的样子。

我们这一列车在滦州车站附近呆了十来天，才开出关外，到离奉天不远的兴隆店车站又停下来。在这儿大概停了两三天，忽然传令叫我同军团长张学良先行进城。我准备好了，不知因为什么没叫我同行。张学良自驾一部小汽车。朱光沐、李应超等均坐在后座，张学良穿着一身普通士兵衣服，径自开入奉天城内，时间是 1928 年 6 月 18 日上午。我们这一列车上的人们，随后也全部进入奉天。我记得在奉天有相当一段时间非常沉闷，听不到任何消息，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一直等到张作霖和吴俊升死去的消息公布，同时张学良被推定为东北保安总司令，我被任命为保安总司令部的外交秘书主任，才开始活动（日期是 7 月上旬）。

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的公报发表后没有几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冈村长太郎中将就要求正式拜会张总司令。当时因为大帅府（张氏全家的住宅，也是总司令部）正为张作霖举办葬事，不便有外宾出入，所以就借用离大帅府不远

的奉天城内“南满铁道公所”为接见场所。照约定时间迟约30分钟，我陪张学良到了“满铁公所”，这时冈村长太郎已先到场了。张学良见了冈村长太郎，未及寒暄，就痛哭失声，不能说一句话，冈村戎装直立，状甚尴尬。我立即向冈村说："张总司令和他父亲感情甚笃，现在他父亲还停尸堂上未殓。他哀痛异常，连夜没睡好觉，今天看见贵司令官，想起他父亲多年与日本人的亲密关系，悲从中来，是可以想象的。"冈村很不自然地说了几句应酬话，就结束了这次会见。会见中张学良始终没能说一句话。我在归途汽车中和张学良说："你看见杀父仇人，还须和他握手言欢，其悲恸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值得深切的同情。但是这种悲恸感情，若不化为具体的力量，这仇是没法报的！"张学良听了我的话，表情很激动。

当时在东北的南部，即所谓“南满”，日本的势力实在太大了，它不但有占领地如旅大关东州，还有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的完全统治权，还有庞大的军队、警察及一切数不清的特权。就是在文化宣传方面，日本也差不多独占一切。仅奉天一地，就有日本人办的中日文报纸3份（中文的《盛京时报》、日文的有《奉天日报》、《奉天每日新闻》）。中国人办的报纸虽然有两份，也全是采用日本通讯社或日本报纸的消息。所以皇姑屯炸车案，人人皆知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出这件事。我当时想：用什么方法将这件大事宣传一番呢，但在东北是不容易办到的。所以我委托南京的旧友龚德柏写了一本通讯小册子，揭露日本人如何谋杀张作霖。龚德柏接受了我重金报酬，很快就写了一本“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的小册子，大约有10万字，在南京出版。在东北销售了五六百本，给日本军部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日本宣传机关为蒙蔽其国内人民及世界舆论，一直硬说皇姑

屯炸车是南方便衣队干的。该书刺到了日本的痛处，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连续发来照会谓：

> 题为“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的书籍，系前上海申报记者是龚德柏所著述。其内容极为荒唐杜撰，更诬我前田中首相为惨案之主谋者。卷首揭有田中氏之照片等情，此徒刺激贵我两国人之感情，国交上甚属无趣，即希转饬该机关禁止发卖上述之书籍，并此后对于发卖该种书籍，请加以严重取缔为荷。此照会辽宁交涉署长王。
>
> 驻辽宁总领事林久治郎
>
> 昭和四年八月十七日。

在我开始工作不久，我就物色了一位得力的人员台湾籍华人蔡智堪驻在东京，替我搜集一些有关日本侵略东北方面的情报，发表一些照着我们的宣传原则的文章，联络一些对有关系的新闻记者。这个人做了不少事，象我们译出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金谷范夫的《国防论》等秘本，全是经蔡智堪之手弄到的。我给他的经常报酬的确不低。但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民族意识很强，有爱国的热情，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他能这样辛勤劳动。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皇姑屯炸车事件始末

○浦　素

1928年6月4日5时许，张作霖兵败撤回奉天，行至南满铁路和京奉路交叉点皇姑屯桥洞，乘车被炸，身受重伤，不久死去，时年54岁。这就是当时使中外惊诧的皇姑屯炸车事件。

一、必死之阵

1928年初，张作霖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绝境。日本关东军不断调动军队。只等日皇下达命令，便要将败退的奉军缴械，一举解决所谓“满洲问题”。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觉得事体重大，还想保留虽败未溃的奉军退守东北，与南京分庭而治，并以张作霖作为谈判对象，谋求进一步夺取东三省。同时，列强环伺，对日本能否同时应付几个对手，也颇有顾虑，因此迟迟做不出决定，直到张作霖从北京撤退，日皇敕旨仍未下达。关东军首脑人物怒不可遏，他们很不满意田中的“老谋深算”，主张田中应该下台，决心加速消灭张作霖。

关东军司令官冈村，曾秘密派遣竹下义晴少佐，到北京

去和驻华使馆武官建川联系，组织杀张的行动。河本大作在《我杀死了张作霖》自白中说："有人认为，假华北日军之手，便能轻而易举地干掉他，因而派遣竹下参谋为密使，前往华北。"指的就是这件事。竹下义晴向河本透露要去北京，河本察觉他言语间神情紧张，遂邀竹下吃饭。席间在河本追问下，竹下讲了奉命到北京执行杀张的任务。河本是侵华的急先锋，他一向把张作霖视为日本侵华的障碍，称之为"癌性肿瘤"，他认为张作霖受过日本的救命之恩，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是"最大的眼中钉"，只有除掉他，此外没有第二条解决满洲问题的道路。河本与竹下交谈之后，觉得竹下的办法是"轻举妄动"，失败了不好交待。他认为在北京没有如此大胆能干这种冒险勾当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在各国众目睽睽的环境里，也不容易办到。他要竹下把这项任务交给他，竹下很为难，说他不能不执行司令官的命令。河本解释说：作为司令官亲自参与这种事是不恰当的，有他河本也就够了。最后说服了竹下，由河本主持杀张的任务。他派竹下去北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据河本后来供称，他们权衡了袭击火车和炸毁火车的利弊，如果袭击火车，很快会被发觉是日军所为，只有炸车才可以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万一爆炸失败，他又拟定了第二套方案：用脱轨机使火车翻车，由埋伏在附近的冲锋队冲上去刺杀。至于炸车地点，原定在巨流河大桥。因中国军队戒备森严，难以得逞。必须选择一处可使日军活动较为方便的地点，最后确定在南满路和京奉路交叉点的铁桥桥洞。"在这里满铁线走在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①]负责埋置炸药的是一名调

①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陈鹏仁译本第29页。

来支援的驻朝鲜工兵中尉。装置炸药用了4小时，直到6月3日10时左右才竣事。此人技术高超，工作结束后，河本称赞他“不愧为专家”。炸车前两周，铁路守备日军就禁止华人通过。独立守备队的东宫铁男，在500米外瞭望台上操纵电力触发装置。此外，河本还分别派遣石野芳男大尉在山海关，武田丈夫等两名中尉在新民，掌握张作霖列车通过的准确时间。而新民距奉天较近，在监视地点中十分重要。它可以最后确认车厢序列以及张作霖所乘车厢的准确位置。在北京则有建川美次郎、竹下义晴、田中隆吉等人负责报告张作霖启程时间，河本总其大成，就这样为张作霖布下了必死之阵。

列车原定4日凌晨3时30分到达，但误点两小时，4日5时23分终于驶抵桥洞，埋置的炸药起爆，全桥崩塌，据说按预定时间只迟了一秒钟。张作霖所包车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两个车轮还算完好，铁轨象麦芽糖般弯曲。河本说：“与轰隆的炸声之同时，黑烟飞扬200米上空。我以为张作霖的骨头也飞上天空了。”① 由奉天专程到山海关迎张的吴俊升头贯铁钉，当场身亡。同车的六夫人、张景惠等均受轻伤。张作霖奄奄一息，被送到帅府，上午9时气绝。和张作霖同车被炸死的共17人。

二、不解之谜

炸车事件发生后，舆论哗然。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加以掩饰，而且断言这起杀人事件，“恐怕将来永远成为一谜”②。

日本陆军当局在当天10点30分，抢先发表声明，以示

①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陈鹏仁译本。
② 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第30页、403页。

清白。但中外报纸都报导炸车事件背后有日人参与，日本方面又没有否认的证据，疑问越来越大，日本陆军部又被迫在一周后的6月12日，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嫁祸于国民军便衣队。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声称责任在于中国方面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他们为掩盖真相，逮捕了10余名无辜居民，并制造假现场：刺杀了两名中国人，留下几颗炸弹和信件，诬称他们是南方派出的杀人凶手。

1928年6月4日上午8时，中日双方共同进行调查。日方单独编造了一份歪曲事实的报告，中国方面拒绝签字。

据交涉员署科长关庚泽呈交署长高清和的现场调查报告说：张作霖专列共20辆。被炸车厢在中部，即第9—12辆。第9辆车厢上部及门窗，均被石块、枕木所毁，后部尤重，车身向北倾斜，后左轮脱轨。车厢内发现男尸一具，查明系参谋长于国翰的车夫。第10辆大包车，是张作霖、吴俊升等所乘，车身几乎全被毁坏，仅剩前门框，后部车轮脱落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在这里又发现焦尸一具查明系山海公司饭厅仆役。第11辆是饭车，破坏最重，所有机轮都已损坏，又遭火焚。车前方北侧有女尸一具。第12车厢为睡车，前部损坏较重，也遭火焚。上述情况证明：凶犯们操纵爆炸时间，十分准确地结束了张作霖的生命。

关庚泽报告勘验桥洞被炸的情况是：轰落铁桥一座、副桥两座、南北两侧护桥石垛都被崩毁。现场证明是用炸药爆破的，从破坏力估量，决不是用手投掷所可办到的。装置炸药地点，在石质桥座上方或铁桥桥脚与桥座连接处，引爆使用电流。同时又查看了所谓南方便衣队员的尸体。关庚泽发现尸体除刺刀贯通伤痕外，还有注射吗啡的针眼甚多，说明

他们的“体格似非健全”①。现场破绽百出，手段实在拙劣。

6月5日、7日、12日，中日双方互致照会。中国方面质问：中方曾要求与日方共同警戒满铁路桥，为日方拒绝，日方表示负完全责任。当时桥上由日军警戒，桥下由奉军警戒。爆炸来自满铁路桥，日军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方面严正指出炸药装置地点和爆发时间，恰在张车通过桥洞之时，“布置之周密，技术之精巧，断非无此种技能之人所能办”。英国路透社曾派专人到出事地点调查，也认为埋放地雷、安放引信等，需要四五个工兵，工作至少需要6小时。如此众多的工兵，如此长久的时间，守备日军竟毫无察觉，确是一桩怪事。日方对此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日本侵略者虽然矢口否认杀张的罪责，事实却陆续被揭露出来。8月，东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外国报纸，都纷纷刊载了认为是“日军人行动”的报导，“神密的帷幕”终于被拉开了。“不解之谜”的真相大白。

三、轩然大波

炸张事件与日本军人有关的消息，在东京迅速传开。河本被调回东京接受审查。河本百般狡辩，在陆军部、参谋部首脑人物包庇下过了关。田中义一要陆军部、外务部、关东厅共同调查此事，但外务部亚洲局长坚持不介入。不得不改派宪兵司令官峰幸松出马调查，峰幸松也弄清了一些事实，如炸药是从关东军兵器部领出来的等等。日本政府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在10月23日第二次委员会上，关东军大场事务官

① 上引均见外交部特派员奉天交涉员署档案，4483/842—843。

比较详细地报告了这起由河本等策划的谋杀事件。

真相既已查明，围绕是否公布真相以及如何处理有关人员，日本统治者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田中冥思苦想，在元老西园寺督促下，决定要将有关军人提交军法审判，并上奏日皇说："杀张似与帝国军人有关。"

但是陆军大臣反对处分河本，公然表示他对田中"非常不高兴"。参谋总长铃木则说：应该"尽量斯文地处理这件事"。关东军司令官冈村要求军部团结一致，反对处罚。甚至有人认为河本此举，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忠勇可嘉。日本内阁诸大臣都反对公布真相，赞同陆军的主张。支持田中义一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田中所属的政友会，也担心反对党借机生事。因为如果按军法从事，就必然要公开事实，这样一来，内阁也不能逃避责任。其后果不是被迫引咎辞职，就是被反对党倒戈。所以也力劝田中含糊了结。田中终于屈服，于是内阁决议：日本人和杀张无关。关东军只有守备责任。对有关人员只给予行政处分；关东军司令官冈村编入预备役；参谋长斋藤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被斥责；河本停职。处分文件中公然写道，"这只是关东军在警备上的一种疏忽"，"警备上有遗憾之处"①，不了了之。

反对党抓住这一时机，吵吵嚷嚷，大倒其阁，要求田中辞职，使田中更加狼狈。

田中最后以"张案调查，关东军幸告无罪"，上奏日皇。日皇很不满意田中前后矛盾的说法，使田中颇感惶恐，7月2日向日皇呈递了辞职书。这个以"田中奏折"闻名于世，不遗余力鼓吹侵华"积极政策"的田中义一，在情绪仰郁中因

---

① 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63页。



心绞痛发作，于 9 月去世。

皇姑屯炸车 9 年之后，即 1937 年 6 月，伪满洲国成立 5 周年，日伪要人为张作霖举行了葬仪，那时他的遗骨尚厝于奉天东关之竹林寺，日本侵略者不同意安葬在修筑未竣的元帅林，也不同意在张作霖的家乡海城建墓，被送往锦西石山站葬于驿马坊张母墓侧。日本侵略者当然借给张作霖迁墓的机会，为自己涂脂抹粉，他们吹嘘：这是出于“东方道义精神”，表明“满洲帝国”是真正的“王道国家”云云。

河本大作，抗战期间在我国山西。日本投降后，继续留在山西帮助阎锡山反共打内战。直到 1949 年 5 月山西解放，为我军逮捕。他供认张作霖是由他指挥关东军参谋人员杀掉的，“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①。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 22 辑〕

① 《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5 日。

张作霖之死

◯温守善 口述 胡 滨 整理

1928年6月3日凌晨2时，张作霖由中南海秘密到前门车站登车返奉，当时留在北京的四十七旅旅长鲍毓麟到车站送行。我是张作霖的校尉处长，跟随左右，也一同登上了火车。

张作霖乘坐的是当年慈禧太后用的专车。一同上车的还有潘复、鲍贵卿、莫德惠、刘哲、日本顾问荒木。潘复、鲍贵卿坐在专车前节蓝皮车厢，到天津后就下车了。莫德惠、刘哲、荒木坐一车厢。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是坐压道车先走的，六太太岳夫人和张作霖同行，坐在张作霖车厢后面的一节车厢里，张作霖的卫队团长于恩贵和卫队营姜营长在前节车厢里。我当时在专车里负责照料。

火车到达山海关，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已在车站等候，上车后说他是代表东北各方迎接大元帅回奉天的。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张景惠、刘尚清等在那里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张作霖和迎候人员招呼后，专车继续前进。当时，只有张景惠上车同行，但也没和张作霖坐一个车厢。

距皇姑屯车站约200米处是老道口，为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归属日本人的警戒线。

火车离开皇姑屯车站，张作霖坐的那节专车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我。由于当时正是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都望着车窗外晨光和庄稼，边看边谈。当这节专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烟尘滚滚，沙石纷飞，把车厢炸碎。吴俊升脑袋被扎进一个铁钉子，躺在车厢里，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约3丈远。我也受了伤，被尘土和碎板碎铁皮盖在下面，不知是谁给救了出来的。我醒来后，全身都是血，一摸身上带的4支枪都没有了，急忙爬起来走到张作霖的跟前，一看，张作霖当时没死，内里伤看不见，只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我用一个大绸子手绢给堵上，然后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抬到赶来接张的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汽车上。看样子张作霖非常难过，神志虽然模糊，但还能说话。他头一句话就问："逮住了吗？"我诳他说："逮住了。"张问："哪的？"我说："正过问呢。"张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意为离开人世）！"当时都以为张由于严重脑震荡，说的是呓语。

给张作霖理发的陈蛮子被炸后烧死了。校尉高其祥、会计高维周都受了重伤，骨头被炸断炸碎。张景惠受轻伤。六太太岳夫人被炉子把脚烧了，呼喊救命，被人们抢救出来。日本顾问荒木在前节车厢里。当时正往张作霖这节车厢走，脚刚搭上车厢边就爆炸了，也埋在下面，但没有受伤。卫队团长于恩贵虽然没有受伤，但也吓懵懂啦！寿夫人坐压道车已先到大帅府。张作霖到大帅府，留守臧式毅、刘省长二人在帅府二门迎接。那时张作霖可能不会说话了，用担架把张从

车上抬了下去，当时杜医官也到了。张作霖被抬到帅府花园小楼。小楼是寿夫人住所，张平日总在寿夫人小楼抽烟吃饭。寿夫人看张仍神志不清，用大烟喷、打强心针、灌白兰地酒，都无济于事。不久，就断气了。以后由杜医官用药给消毒。

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深感责任重大，到帅府仪门前跪在地上大哭，骂自己有罪，没保住大元帅，请求杀了他，寿夫人说："业已啦（即已经死啦），难怪一人，起来吧！"

帅府早就存有阴沉木料，把木工找来做棺材。木工吃住都在帅府，不准外出，防止消息外露。

日本町野顾问想知道真情，找刘省长探听，可刘省长对他说："大帅精神很好，饮食喝牛奶。"日本的松井、本庄繁、荒木等顾问都来过问，也都如此回答。当时，张学良正在前方作战，接到电报后，化装潜回奉天。他没有直接到大帅府，而是先到的北大营，从园得楼出去后到的大帅府。张学良到大帅府，守卫不认识，没让进。张学良说："你把里边人叫出来。"守卫把里边人找出来认出是张学良后才让进去的。俟张学良回帅府后，一切安置就绪，才正式发丧入殓。张作霖死后穿的寿衣是北京永增寿衣庄做的，用做祭庙时穿戴的黑色、金线绣龙，帽子前齐后圆，带穗。我因受伤，退出帅府，欲到日本人开的守田医院治疗，可能是听到张作霖被炸消息，我去后不接待，只好回家治疗。以后张作霖的丧事由张学良主持，因我离开帅府，再无往来，以后的事就不得而知了。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作霖被炸所闻

◎张华民 口述 张培心 整理

1928年4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沿津浦路攻打奉军，直逼京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于陇海、津浦西线，逼使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节节败退。阎锡山的晋军又猛攻龙泉关，致使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军处处失利。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决意撤兵据守关外。是年5月9日，张作霖向全国发出"佳电"，表示要"罢兵息争"，同时又指派杨宇霆等人，策划和指挥退却事宜。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又发出了回奉通电，表示今后政治问题由"国民公议"解决。他又部署了：政治交国务院；代行军事由各军团长负责；北京治安由王士珍组织维持会负责。他又命令许兰洲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卷宗，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奉天。

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黄色钢制汽车出发，同行4辆汽车，张坐第二辆。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中开往火车站。随行回奉的除"大元帅府"的官员和卫士外，还有张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学曾及日籍顾问町野等。

张乘的专列共有22节，他的80号包车在中间，是过去

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车。专列在丑时从北京出发。它的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奉天省长刘尚清，曾在6月2日，对铁路沿线各县发出密电，通知沿线各地，事先妥为警备，毋稍疏懈。

张的这次返奉，随行人员都替他担心忧虑。因为在此前不久，张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那是5月17日晚上，张作霖和梁士诒、李宣威等人正在打麻将，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前来相访。梁、李随即起身告辞，张挽留他们说："我和芳泽没啥谈的，没多工夫，你们等等！"可是，张和芳泽谈了很长时间也没出来。只听到张气冲冲地说："我这'臭皮囊'（指张的身躯）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咱们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接着就气呼呼地走出客厅，弄得不欢而散。致使有些人很担心，得罪了日本人，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由于张、日关系紧张，有的随行人员，惴惴不安，恐怕在山海关出事，甚至私下准备了药布、饼干，以防万一。

在张作霖决定返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就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在构筑什么工事，就此曾密电给张，请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可是张对齐的提醒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张对这次返奉的路线，也不是一丝未考虑过。他曾想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后因怕公路坎坷不平才又决定改乘了火车。在返奉日期上他故弄玄虚，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3日离开北京。

张作霖的专列在下午4时抵山海关。这时，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专程赶来迎接，晚11时专列抵达锦州。车到新民时，沿路两旁，皆有步哨站岗，戒备森严。当车到日军管辖地区

的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地点时，就没有哨兵了。

专列预定4日上午3时30分到达北宁路奉天站（沈阳北站）停驶，但按车的实际运行时间，已经晚点两个小时。

当专列通过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的三洞桥时，正是早上5点半，突然两声巨响，所有列车一起震动，有的脱轨，有的起火，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更为惨重，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当即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昏倒在血泊之中，张的六太太受了轻伤。

张受重伤，但知觉尚存，还能说话。齐恩铭等将他扶入汽车急回帅府，但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于当日上午9时死去。在张奄奄一息时，还向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张作霖死后，当时还有20万东北军尚在关内。为了安定人心，稳定局势，经当时在奉天的一些要人会商，决议封锁消息，密不发丧。与此同时，还部署军警，实行戒严，并发布"安民告示"等等。

由于保密严谨，一些日本要人前来帅府门前求见，以"慰问"为句探听实虚，均被婉言谢绝。

在帅府内部，也绝对保密。直到张学良接到密电回奉，善后诸事就绪后，于6月21日才正式宣布死去的消息。

关于谋杀张作霖事件，日本历史《昭和的军阀》一书写道："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执行爆杀张作霖计划，为把爆炸者打扮成是国民政府方面所为，预先备下犯人尸体，其后去南满铁路桥墩上部放置炸药，导火线一直引到离桥南部约200米处的日方监视棚内。1928年6月4日晨5时23分，张作霖所乘的专列通过陆桥下，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东宫铁男大尉引爆，列车爆炸。"

从此记载看，历史早已证明，谋杀张作霖是日军为占领东北而蓄谋已久的大阴谋的前奏。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作霖被炸之后

◎孟庆云 **撰文** 孟繁第 **整理**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东北各界都议论纷纷，忧虑将有战事来临。臧式毅和奉天省长刘尚清等商议，决定派奉天兵工厂几个俄国工程师会同地方军政官员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我当时任奉天兵工厂秘书，与张作霖有世交关系，所以也跟俄国工程师一道前往，为首的俄国工程师叫罗米托夫。我们是在出事的第二天到的现场，我看到这列蓝钢车前面的六七辆全都炸坏了。车厢顶棚和车厢木板飞得满地都是，有的飞到铁路以外很远的地方，大部分都成了劈柴。枕木也烧得像一根根黑炭，附近的电线已全被炸断。张作霖所坐的车厢损坏得特别厉害，车厢的底盘都歪歪斜斜，已经被震得不成样子了。

被炸的地点是在铁桥下面。铁桥下南头涵洞的上面右方石壁，炸了很大的两个窟窿，大的直径约有5米，小的也有2米多，桥下钢筋水泥做的墩柱，也多被震动破坏。爆炸物的装置一定是悬在桥下的东侧，倚在石壁上的，而且肯定是两处，因此涵洞的石壁方炸成那样的两个窟窿。铁桥也全被炸塌，南满铁路轨曲折下垂在京奉路的路基上。

据罗米托夫估计，在这两个地方装置的炸药，至少有800磅，才有这样猛烈的爆炸力。并说中国的兵工厂还不能够制造这种高烈炸药。

当时我们到现场调查的人，大多心中有数，早都预想到这是日本人所为，虽说日本人已经采取很多的措施掩饰，经现场巡视，还是证实了我们的预想。

第一个重要证据是：在这座铁桥南边，大约离桥450米处，有一个专门预备瞭望的小木楼。据经常往来这里的人说，从前没有见过，显然是临时搭起来的。判断炸车的导火线，可能就是装在这个瞭望楼里的。

第二个证据是：日本人自以为能掩人耳目，把两个老百姓打死了，在无辜惨死的百姓身上，塞进一封所谓证明文件，说他们是国民党北伐军派来行刺的凶手。事实上欲盖弥彰，日本人认为的这一有利证据，恰好变成了炸车案的反证。

第三个罪证：根据当时俄籍工程师及同去的人们判断，炸药斜椅着桥梁安装在涵洞的石壁上。这是相当复杂的工作，完成这种装置要五六个小时，而这个地点完全处在日本警备队的控制之下。不能设想，一个普通人能进入这一地区连续工作数小时之久，况且也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

日本人做贼心虚，报纸上连皇姑屯的名称都不敢提，标题仅为“满洲某重大事件”。

当时奉天当局已判断这是日本人的阴谋，是他想借此出兵东北以滋扰乱。而当时张学良、杨宇霆等尚留在关内，近20万奉军部队尚未撤回关外。为了避免日本关东军借机挑衅，故对张作霖之死严守秘密，未予公布。同时也顺水推舟，说是北伐军便衣队干的，一直等到奉军完全撤到关外，张学良化装回到奉天，这才发表张作霖的死耗。

1940年春，因战争混乱，我避居天津法租界。那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一个叫落合重吉的日本人，他是曾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的儿子，我伯父孟宪彝做辽东道和吉长道尹吉林巡按时，和落合谦太郎时有往来，因此我从小就和他的儿子落合重吉熟识。这样，我们在天津有时就聊聊闲天，知道他已退伍，在天津做买卖。另外一个日本人叫小竹的，他原是日本财阀大仓组的职员，这时在三井洋行工作，也是从前在东北认识的，他与落合也时常往来。有一次曹朴（曹汝霖的儿子）请我们吃饭，落合酒喝得过多，醉了。散席之后，非要我送他到日租界须磨街他家里去不可，他东拉西扯，说起来没有完。

落合重吉介绍了他在军队时，刚升到大尉没两月，因为犯了“不敬罪”倒了霉，还坐了一年多监狱，后来就退伍不干了。他又说起“九·一八”及张作霖被炸的事。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皇姑屯炸车案，都说是日本人干的，不错，是日本人干的。实际计划指挥的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和石野少佐。在南满铁道桥下装置炸药是当地守备队东宫队长和中野少尉指挥进行的。在炸车案发生的前几天，山海关、锦州、新民屯，都派有专人侦查张作霖的行踪，随时用电报报告河本，我（落合自称）当时就在锦州。因为张作霖无视日本的亲善好意，老早就想把他干掉。当时关东军预料奉天一定会出现纷乱局面，没想到奉天当局在出事后这样镇静。这是河本等没有料想到的。

落合重吉能够说出这样极为秘密的轰动中外的炸车案真相，我听了不禁骇然。据我揣测，一则是落合因受过处分不满，从说话中听到他有厌战情绪，故而泄露这个机密。或者是真正的酒醉，所谓酒后吐真言。不管出于哪种动机，在日

本占领之下，我的处境非常不安，怕他出来觉察到如此重大的机密泄露于我，会把我害了，故从此我就躲避，不敢再同他见面了。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大帅府赴丧见闻

○ 于治瀛

皇姑屯事件发生半月后，张作霖的亲家——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的于氏一家才得知这个消息。经商讨，便由我的伯父于凤翥、父亲于凤瑞和母亲及二位兄长一行 5 人，以亲属的名义前往奉天大帅府赴丧。据兄长于兆瀛回忆，当时他们乘火车至奉天后，租汽车奔赴大帅府，待侍卫通报后，我姑母于凤至亲自出迎至后院内宅。并给他们分发佩有张作霖半身像的像章和白花，作为出入大帅府的物证。而后又与张家人一一引见。当时，我姑父张学良将军因事务繁忙，仅以点头示意，张学铭由当差的搀扶着，已哭成泪人。张家人悲痛已极，无心交谈，就由我姑母陪同来至灵堂吊唁致哀。灵堂设在大帅府的北侧一座灰色楼房下，室内停放着张作霖的灵柩，棺材是用当时稀少而珍贵的阴沉木（又名万年蒿）制做的。由于当时的天气闷热，怕尸首腐烂，就用布匹沾桐油缠裹棺木数层，还以冰块镇之。灵堂肃穆，布有黑纱挽帐，灵堂中央悬挂着张作霖的大照片。前来吊唁的人来往如梭，有当时驻奉天的各国领事馆的使节和各省、市政府派来的官员，来人都依次在灵前鞠躬哀悼。帅府还设有乐队，整天哀乐不

止，令人心碎，唯有后院内宅还算安静些。这场丧事前后共操办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于氏5人没有在大帅府留宿，而是分别住在本族家中，我的伯父和父母住在当时任奉天铁路稽查处处长于凤诏伯父家，两位兄长住在长兄于冠瀛家，其时他任县长。他们都是由我姑母推荐而重用的。他们的府邸距帅府约两华里。于氏5人经常出入帅府内外，直把张作霖的灵柩送走后，才返回故乡。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东北海军的建立与壮大

〇 张凤仁

张作霖统治东北的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曾达到长江流域，遍及关内五省（河北、河南、江苏、山东、安徽）。当时张坐镇北京，称陆海军大元帅，叱咤风云，大有投鞭断流，席卷全国之势。他在军政、财经、文教方面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系统。在军事上，不仅有一定数量的陆海空军，还建立了相应的训练机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全部退到关内，在国民党军事集团中，也保持了固有的力量。参加过抗日战争，也参加过反人民的战争。至于原东北海军，在国民党海军中，一直占有相当的地位。我于1922年冬由奉天省立第二中学毕业，翌年春考入东北海军学校（当时称为东三省航警学校）航海将校学生班（第一期）。1926年9月毕业，即服役于东北海军。1945年日寇投降，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前夕，东北海军仅有的一个总队（当时是海军教导总队）被蒋消灭，我身陷囹圄年余。全国解放后，走向革命，参加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10余年。现在响应党的号召，把过去20年在旧东北海军内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一、吉黑江防舰队的成立

东北海军的创立，是由哈尔滨吉黑江防舰队开始的。1919年，在防俄反共的前提下，北洋政府通过了加强吉黑江防的建议。由闽人王崇文任司令，设江防公署于哈尔滨。由上海海军总司令公署拨“江亨”、“利捷”、“利绥”、“利川”四炮舰为吉黑江防舰队。其中最大的炮舰为“江亨”，是“四江”①之一，日本造，装有4.7英寸口径的舰首主炮一门，3英寸口径舰尾炮一门。舰的吨位为550吨，是平底、低舷，航行于长江内的浅水炮舰，续航力和耐波性极差。其余“利捷”等3艘，也是长江内航行的浅水炮舰，据说是德国的侵略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我国接收改编的，吨位比“江亨”还小。这4艘炮舰，当时由上海航驶到哈尔滨，据说是用“封舱”的办法，趁好天航行，1919年7月离沪，经过月余的断续航行，才由黑龙江入海口的庙街，进入黑龙江，经过伯力驶入松花江，抵达哈尔滨，实属不易。根据当时黑龙江的航行权，舰只仅允许进入，如驶出还得另行交涉。事实上，直到东北沦陷，这些舰只也未能重新航行到海面上来。

不久，因吉黑江防线太长，4舰不够分配，又将松花江商船3只及中东铁路局炮舰1只，改装编入江防舰队，命名为“江平”、“江安”、“江通”、“利济”。至此，江防舰队包括“江亨”等8艘炮舰。但商船改装的炮舰，多系两舷明轮的船只，速度、威力都很差。

吉黑江防舰队直隶于北京海军部，因而上海海军总司令

① “四江”系指“江元”、“江亨”、“江利”、“江贞”四舰。

公署对该舰队的军需、军械和人员，均不补给。而当时北京海军部又是个空头机构，无权无钱，连薪金都发不出来，实在顾不上吉黑江防舰队。因此，江防舰队的生活已难维持，补充训练无从进行，才由东北当局接办。这就是东北海军的开始。

二、东北海防舰队的成立

东北海军创始人沈鸿烈，字成章，湖北天门人。清朝末年在湖北新军充当文书，由两湖总督张之洞选派赴日学习海军。当时中国海军大权掌握在闽系手中，舰上服役的也全系福建人，外省人不得染指。福建系海军受英国的影响颇深，舰队训练学英国，学校教育学英国，海军留学亦必去英国，舰上的一举一动也都英国化，连一切口令都是中英杂凑，如放出舢舨叫“cut 出去”，收进来叫“in 进来”，真是非驴非马。因此，东洋留学的海军军官就不能上舰队服役，多在北京海军部候补；补上就是参谋人员，在部里当幕僚。由低级至中级都如此，等到当舰长、副长的时候，连航海的实际本领都没有，更谈不到指挥舰只了。而当时北京的海军当局，随着内阁的变迁，动荡不安。从 1916 年到 1921 年，5 年中换了 10 次内阁，海军方面很受影响。当参谋幕僚的更无出路，甚至连维持生活的月薪都领不到，日子非常不好过。吉黑江防舰队成立，沈鸿烈回国后即到该舰队任中校参谋。当时吉黑江防舰队编制很小，只有参谋 2 人，副官 2 人，书记官长 1 人，书记官 1 人，课长 1 人。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在京奉路的山海关内外，均暴露在北京政府海军大炮射程下，后退极为困难，白

天不敢通行，夜车不敢明灯，深感无海军不能控制海面的痛苦。因此，张作霖退出关后，自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势必加强海防。沈鸿烈趁此机会献策，竟被采纳，并被委任为航警处少将处长。于是沈纠集同学，创办海军。当时沈的同学先后来东北的有凌霄、方念祖、谢刚哲等20余人。航警处办理正规海军业务，并未办航警的事；用航警的名义是一种权宜的办法，恐办海军不成而遭到非议；因当时办海军的困难是很多的。

沈鸿烈手腕灵活，对当时的军阀善于投其所好，应付裕如。他跟张作霖的左右磕头拜把子，平时祝寿、送礼，过从甚密。沈又把家眷接来东北，在法库买地落户，以免除张作霖对他的疑虑。因而获得信任，大权独揽。沈从中校参谋一跃而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后改镇威上将军公署）八大处之一的航警处少将处长。海军军官如此破格提升，还是空前的。

沈鸿烈任航警处长后，先撤江防舰队司令王崇文的职务，以“江亨”舰长闽人毛钟才代之。到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因毛钟才有迎郭的嫌疑，又以“利绥”舰长尹祖荫接替。至是，闽人在东北海军的领导权彻底被排除，进一步巩固了沈在海军中的地位，得以专注于东北海防舰队的建立。首先，在葫芦岛设立了东三省航警学校，训练海军军官。因为海军军官要掌握海军全面基础知识，中学毕业程度考入海军学校，需学习4年、见习1年，才能任海军少尉，担任舰上一个战斗部门的助手，如航海三副、枪炮三副、鱼雷三副等。当时的中央海军还招收高小毕业生，学习8年之久。后来，东三省航警学校先后改名为东北航警学校、东北海军学校。东北沦陷后，迁到青岛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在抗日战争中又迁到

宜昌，最后迁到万县，办到第五期，直到1943年，才在海军派别倾轧下停止招生，改为特种兵器研究所而告终。这所学校在葫芦岛创办时，包括学校和练营双重任务。因为海军士兵也不能滥竽充数，必须在练营中经过一年的基本训练，才能到舰上充当练兵。后来学校迁到青岛时，才和练营分开。当时航警学校校长是海军上校凌霄，教育长是海军中方念祖，佐理官是海军中校陈华森，学监是海军少校戴修鉴。以下设有兵学教官，分任航海、船艺、枪炮、鱼雷、轮机、气象、海洋以及海战术、炮战术等科；另有大学数学、物理、化学专业教官。学生队有队长、班长，学兵队也有队长。在1921年冬，先招考海军学兵、水兵队和轮机兵队各200名。有陆军出身的上尉队长张赫炎、张可大任陆上的军事教练；另有海军的老军士长、上士班长任海军士兵的舰上科目教学。1923年春，在沈阳招考航海将校学生班（第一期），报名学历限定中学毕业或具同等学历者；考试的科目：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英文、国文、地理、历史、制图等。考试3天，10天后，在镇威上将军公署门前出榜，录取者限10天内到葫芦岛校本部报到。当时正值军阀混战之际，一般学生均不愿报考军事学校，所以报名的不多，约500余人，录取40名，实际报到的38人，其中只有4名系外省籍的，其余全是东北人。后来又由学兵队录取2名，凑足40名额数。时浙江督军卢永祥与张作霖有同盟的密契，于1924年选派丁其璋等7名来东北学习海军，故这期共为47名。在校期间死4名，卢永祥下台后退学3名，毕业时仍为40名。回家去向不明的5名；在海上生活不适宜的8名，被派往哈尔滨航运局江运部充商船船员；在海防舰队服役的只剩27名。这便是东北海军学校训练出来的第一期最基层的航海将校学生。用了4年的时间，

只训练出27名基层军官，海军建设非易，可见一斑。

在成立海军学校的当时，海防舰队连一条军舰都没有，而向外国购买又非易事。乃于学校成立后，着手改装商船。当时向烟台政记轮船公司张本政接洽，购入2500吨级的商船“广利”1艘；向日本洽购2500吨级的废商船“佳代丸”1艘。每船装4.7英寸口径海军炮两门，3英寸口径的陆军炮4门。“广利”命名为“镇海”军舰，“佳代丸”命名为“威海”军舰，这是以镇威上将军名义命名的。把商船改装成军舰，必须在造船厂进行；可是当时东北沿海连一个根据地都没有，根本谈不上有造船厂，只得到旅顺口日本的海军基地改装，但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竣事的。此外，海军军官学生还得4年以后才能上船，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因此，又召集中央海军烟台海军学校的八年制学生，来东北海军服役。这一班是海军总长粤人程璧光举办的，在全国招生，按各省分配名额，从1915年至1923年，在校学习8年。1917年，程璧光率舰队南下护法，在粤被刺，海军大权就落在闽系手中。该期毕业的外省籍学生，均遭到闽系的排斥，在舰上很难补上三副。因此，该班毕业同学陆续来东北，计有王天池（江苏人）、王之烈（山东人）、吴敏（广东人）等30余名。这些人都做了东北海军的最基层军官。这样既补充了东北海军人员的不足，也缩减了训练的时间，节省了许多经费。当时中、上校级以上的军官全是沈鸿烈的同班同学，中、少尉级的是烟台海校的同学，至于中级的上尉、少校级，仍无法补充。下级既不能越级，上级又不能迁就，才又邀请烟台海校前期毕业而遭到闽系排斥的学生，来东北海军服役。至此，东北海军海防舰队的中上级军官以及下级军官就都有着落了。1923年“镇海”军舰正式成军，第一任舰长由上校凌霄充任（海军校长

由上校刘田圃继任），副长由少校盛建勋充任，轮机长为少校张振舣。

三、东北海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的发展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当时直奉双方的陆军在山海关及长城的九门口等地展开血战。这时，程璧光南下护法时率领的舰队，已由山东人温树德于1922年4月在广东黄埔夺取了领导权。温与直系吴佩孚有同乡之谊，取得联络以后，乃率舰队北归到青岛，名为渤海舰队。直奉战争爆发时，吴佩孚乘温树德海军少将的旗舰——“海圻”巡视秦皇岛、葫芦岛一带海岸，并策应山海关的陆军，在葫芦岛发炮100余发。当时葫芦岛的防务，只有第一期海军学生40余名及第二期学兵400名。武器有东炮台4.7英寸口径的海军炮1门，炮座不牢，是为教练用的；西炮台也是有同样口径的炮1门，炮座较牢固，并有隐蔽的火药库；学兵有步枪400支。并有教练使用的“甫福式”的小口径山炮2门及机关枪两挺。由学生和学兵临时组成海岸防御队。这支海岸防御队毫无战斗经验，由现在佐理官戴修鉴及枪炮教官张楚材指挥学生、学兵作战。为了安定大家的情绪，乃大肆宣传渤海舰队战斗力薄弱：军舰太老，速度太慢，甲板年久失修，经不起大炮射击的震动；舰炮不能齐放，齐放就会造成自己的爆烈；等等。因此同学们都满有信心，非常镇定。我们为了避免暴露目标，隐蔽得较好，把仅有的一座帐篷也拆倒了。事实上，当时如被“海圻”发现目标，几个齐放就能把葫芦岛的防务完全摧毁。渤海舰队当时对葫芦岛外菊花岛一带的海面情况，并不熟悉，也不知道哪些小道能通行大型的巡洋舰。所以“海

圻”根本就不能航行到菊花岛这一方面来，只能在东山头海外8000米处盲目开炮轰击，当时我在东炮台任射手，弹着都超过东炮台落到山后去了。“海圻”由晚饭时开始发了100余炮，直到晚9点钟，连续用探照灯探照后始离去。我们一炮未发，也未遭到一点损失。“海圻”在返航时，把我们营口渔业局的护渔炮舰“绥辽”掳去。这时海防舰队“镇海”军舰刚刚成军，竟冒险独自开赴秦皇岛，发出还我“绥辽”的旗号，向渤海舰队索船，真可谓勇矣。据说鲁系海军有不愿与东北海军结怨的心情，不忍海军内讧，伤及无辜，并认为“镇海”军舰不值一击，因此，“海圻”军舰连炮衣都未揭，使“镇海”军舰得以安全返航。

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班师，张宗昌突破冷口，奉军获得全胜。沈鸿烈在战前向张作霖所作的“海防无虞”的保证，得以侥幸成功。从此，张对沈更是言听计从。参加这次战役的海军同学，均获得八等国徽勋章的荣誉。以后张作霖更重视海军的建设，不久“威海”军舰也继续成军。又将在塘沽接收的1000吨级的俄国破冰船命名为“定海”军舰；还购入300吨级的日本旧鱼雷艇，命名为“飞鹏”军舰。至此，东北海防舰队就以“镇海”、“威海”、“定海”、“飞鹏”4舰组成。凌霄升任代将①舰队长，方念祖任“镇海”舰长，宋式善任“威海”舰长，冯涛任“定海”舰长，谢渭清任“飞鹏”舰长。沈鸿烈升任中将司令。

1925年冬郭松龄反奉时，“定海”军舰在塘沽改装尚未竣工，即逃回葫芦岛转赴旅顺口。郭松龄部队在连山受阻，我校员兵先背海待敌，后退到“镇海”、“威海”两舰上开赴旅

① 东北海军军衔，介于上校与少将之间者。

顺口。直到郭松龄失败，才返回葫芦岛复课。到 1926 年 9 月 20 日毕业，在秦皇岛“威海”军舰上举行登舰式，才开始军舰上的见习生的生活。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东北海军虽拥有江、海防两个舰队，以及一所海军学校，但实力还很薄弱。海防的 4 艘舰艇中，没有一艘正式军舰。海军的战斗单位是同型军舰组成的。所谓同型军舰，就是说战斗力、续航力、巡航速度和回转性都一样；但海防 4 舰大小不一，老少俱全，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东北海军的年青官兵却是刚生的犊儿不怕虎，老一辈的又有同闽系海军斗争的决心。因此，异军突起，发愤图强，使闽系海军望而却步。在东北海军解决渤海舰队之后，终于形成与国民党统治下的闽系海军分庭抗礼，南北对峙的局面，使对方不敢北航巡弋达 10 余年之久。

四、东北海军的全盛时期

东北海防舰队成立后，面前劲敌是渤海舰队。这支舰队是由护法舰队蜕变来北方的，拥有“海圻”、“海琛”、“肇和”巡洋舰 3 艘，“永翔”、“楚豫”炮舰两艘、“同安”鱼雷艇 1 艘，是一支实力坚强的正式海军，东北海军根本不能望其项背，更谈不到与之抗衡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海上的行动决定于陆军的胜负。当吴佩孚败退到湖北武汉时，渤海舰队不得不蛰居于山东青岛，成为无根之木，这就为东北海军瓦解和吞并渤海舰队造成了机会。

（1）“海圻”军舰归附东北。渤海舰队蛰居青岛时，饷银无着，欠薪达 3 个月之久。舰上大权落在排闽的鲁系军士长手中，太阿倒持，军令废弛，舰长命令不能出后舱一步。时

各舰均靠在青岛大港 3、4 号码头，士兵天天放假，无所谓训练。军官则困居岸上，在青岛山东路南段的海军联欢社聚赌。军舰失修，速度锐减，舰底蚌壳附着物厚达尺余，因此必须解决修船的问题。但北方除旅顺口外，没有大型船坞能容“海圻”等巡洋舰，“海圻”乃于 1927 年到旅顺口修理。时东北舰队“镇海”军舰也在旅顺口修理。两舰隔坞相望，对比鲜明：一个是根深叶茂，欣欣向荣；一个则是无源之水，干涸立待。因此“海圻”军舰归附东北是人心所向，水到渠成。在上校舰长袁方乔（山东荣城人）、协长张衍学（山东烟台人）和航海大副上尉曹蓝亭（山东荣城人）率领下，于舰只修好刚出旅顺口时，即通电归附东北。全舰官兵无比欢腾，并很快领得 3 个月的欠薪，袁方乔升为代将舰队长，“海圻”军舰即奉命驻泊里长山列岛东北海军的根据地。

“海圻”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巡洋舰，是甲午战争后四年由英国购入的新舰，其同型姊妹舰“海天”，在清朝末年由刘冠雄担任舰长，于雾天触大戢山沉没。辛亥革命前，“海圻”军舰曾为了庆贺英皇加冕去伦敦，然后应华侨的要求访问美洲，辛亥革命后才回国。“海圻”在速度和武器装备方面都很优越，被称为“海上王”。因此，该舰一归东北，对东北海军来说是如虎生翼。当“海圻”归附东北后，据说南京海军部长陈绍宽曾问其部下：“如果东北海军南下，你们作如何打算？”部下答曰：“最好不遇见。”因此，东北海军南下的电波，就可战胜敌舰。

（2）东北海军第一次南下。1927 年 3 月，“海圻”、“镇海”两舰第一次南下，行动非常秘密。由长山岛出发时，只说是海上演习，然后去青岛；但转过成山头后，即径向南航行。航行时“海圻”领先，“镇海”殿后，趁潮通过铜沙浅滩，

进入长江，直驶吴淞口。当时闽系舰队的“海筹”（与“海琛”为同型姊妹舰）巡洋舰、“应瑞”（与“肇和”为同型姊妹舰）巡洋舰，泊吴淞口，“靖安”运输舰泊鸭窝沙。“海圻”、“镇海”两舰到吴淞口时，太阳尚未升起，江面晨雾朦胧，“海圻”即以排炮射击“海筹”。当时“海筹”舰长陈训泳被吓得面无人色，不能指挥；副长抢先到指挥台，急令弃锚逃走。“应瑞”动作迅速，在“海圻”炮击“海筹”的一刹那间，即弃锚上驶。“海圻”怕落潮后不能通过铜沙水道，因之未竟全功即行返航。“镇海”未看清“海圻”的返航旗号，以为“海圻”变换方向后，还能再打上一个回合，因此，未即退出。后来见“海圻”已远去，“应瑞”又追出，“镇海”才驶离吴淞口。这时吴淞口炮台也发炮应战，弹着离“镇海”军舰很近。当“镇海”通过鸭窝沙时，闽系“靖安”运输舰尚高悬当夜归队随航的旗号。这时出来追击的“应瑞”舰，与“镇海”舰的距离由15000米缩到7000米，顺流而下，速度很快，炮火已超越“镇海”，因而保护了“靖安”舰回航上驶。“应瑞”见“靖安”安全无恙，也就停止追击了。“镇海”舰行至长江口，即见大戢山洋面驶来一舰，在晨雾中看出舰型庞大，两个烟筒。“镇海”当即用舰上两门炮攻击。但该舰仍不顾一切，向长江口内直驶。这时“海圻”也发炮攻击，该舰才南返，直趋舟山群岛，拟利用浅水及岛屿逃避。这时，已辩出该舰是“四江”之一的“江利”炮舰。但“海圻”的速度和火力均超过该舰，炮弹击中，穿过6层舷板。该舰即悬白旗投降。抛锚后，用舢舨将炮闩及枪支送到“海圻”舰上。“海圻”派航海大副孙英奇少尉、枪炮副杨超仑少尉，“镇海”派航海大副汪积慈上尉及一部分水兵和轮机兵，登上“江利”，起锚随行北上。抵长山岛后，发予“江利”舰官兵

薪饷一月，宣布凡愿留者在舰按原职服务，愿去者也不强留。当时只有一个军士长未走，其余均欣然而去，所有私人物品均未扣留。

这次战斗之后，海军部长陈绍宽曾通电全军，电文中有“东北舰队深入腹地，毁我精锐，殊堪痛惜”之句。这次东北舰队南下，除舰长级军官外，其余官兵均不知道：及至长江口外，“海圻”伪装为意大利3个烟筒的同型舰，“镇海”则按商船的样子在两舷中间漆上船名“大昌”两字。因此，敌方通报为“有意大利军舰一只和商船‘大昌’一只进口”。这次战斗，敌人毫无准备，打了个措手不及。东北海军则炮击“海筹”和截获“江利”，而未损一兵一卒，遂使军威大振。

（3）解决渤海舰队。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奉军陆上势力已伸至直、鲁、苏、豫、皖5省，而渤海舰队仍循迹青岛，在东北军的势力范围之内不能不加以解决。时沈鸿烈拥护山东督军张宗昌为海军总司令，自居海军副司令。把原来东北海防舰队及“海圻”、“江利”两舰编为海防第一舰队，舰队长为袁方乔少将，驻泊长山岛。以渤海舰队为第一舰队，委凌霄少将为舰队长。凌只带一两个幕僚就到渤海舰队的“肇和”军舰升起少将旗接任。当时“镇海”军舰在4号码头补充煤炭，“江利”在青岛游内山航道附近抛锚，“威海”军舰在小青岛附近抛锚，“海圻”当时另有任务未在青岛。渤海舰队的“海琛”军舰在青岛前海，“肇和”、“永翔”、“楚豫”、“同安”等舰均在青岛后海。凌霄到“肇和”军舰后即被软禁，“海琛”军舰也在夜间私自行动，集中到后海，并禁止东北舰队的“镇海”军舰驶离码头。海面戒严，前后海不通，形势十分紧张。沈鸿烈急去济南搬张宗昌来青岛，到“肇和”舰上，集合官兵讲话。东北海军葫芦岛系统的学生和学兵伪装

陆军，充张宗昌的卫队，随张同登“肇和”舰。当“肇和”全体官兵集合在后甲板上听训时，这些“卫队”就分别占据了炮位和火药库。张宗昌讲话很简单，首先问：我是总司令，你们服从我不？回答说：服从。张就说：既然服从，我命令你们集合到岸上去听候改编。就这样，渤海舰队便被解决了。

原来渤海舰队司令为温树德，1927 年 6 月温调任军事部海军署长，张宗昌委部将毕庶澄任司令。后毕转任上海护军使，打算把舰队带到南方去。不料消息泄露，张宗昌便将他枪毙了，又以扬州人吴志馨海军少将为司令。1928 年春，张宗昌以吴与北伐军有勾结，把吴扣压在济南。4 月从济南撤退时，把吴枪毙了。解决渤海舰队时，被捕的军官有：上校赵梯昆舰长、何汉澜舰长、中校参谋徐国杰、上尉副官程鼎圻等，还有一些军士长级的，如炮首[①] 王文泰那时已升为陆战队的营长，也被捕。以后除个别军士长级的被沈鸿烈秘密处死（听说是用麻袋将人装起，夜间由“江利”军舰上投入大海）外，舰长级的被释放了。

渤海舰队被解决后，东北海军进入了全盛时期。沈鸿烈为海军中将司令，直辖江防舰队。海防第一舰队，包括“海圻”、“海琛”、“肇和”、“镇海”、“威海”、“同安”等舰，以海军少将凌霄为舰队长，驻青岛。海防第二舰队包括“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舰，以海军少将袁方乔为舰队长，驻长山岛。陆上机关有海军学校、陆战队、造船所、海军航空队、海军医院等。这样，就与福建海军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

东北海军的全盛时期，拥有大小舰只 21 艘，约 32200 余

① 炮首是当时舰上枪炮上士和军士长的通称。

吨，舰队官兵约3300人，还有陆战队两个队以及海军航空队等。这时全国海军舰只约42000千吨，官兵（不包括陆战队）约有5400人。东北海军所占的绝对优势可想而知。

五、东北海军对北伐军的战斗

东北海军第一次南下和解决渤海舰队之后，重新调整人事和军舰的编队，驻泊青岛和长山岛，加强训练，积极护渔、护航，掌握了制海权；并对山东沿海的陆军残兵败将和大小股匪，也进行了积极的清剿。如在利津河口、龙口及海州以北的石臼所一带，对刘黑七等股匪，均进行过陆海空协同进剿。在1927年到1928年，北伐军北上和北方军阀溃退中，也曾出征过不少次。兹就重要的几次回忆如下：

（1）“海圻”、“海琛”、“肇和”南下，封锁北伐军的海上接济，抓意大利运军火的商船。当时确定“海圻”分担广东、香港海面，“海琛”、“肇和”分担江、浙海面的封锁任务。这次南下遭到大风浪，驶出青岛两天，“肇和”即被迫离队，作“之”字航行，以后又因无线电天线损坏，失掉联系，向东南大海飘泊了三天三夜。后来在黑暗中以探照灯照明摸索驶回舟山。适值“海琛”正在舟山东面避风，“海圻”由香港回航，亦在舟山补充蔬菜。“海琛”在原地抛锚，“肇和”由“海琛”拨给一些煤炭。舰队在舟山停泊约10余日，俟海上、岸上均无阻碍时，才安全返航。这次出征为时一月有余，毫无所获，只不过是在大风浪中进行一次海上训练而已。这时如果闽系海军利用近海岛屿，集合舰队倾巢出击，真不知鹿死谁手。

（2）“海圻”、“镇海”进长江，“威海”军舰到大洋山岛

海面，使用水上飞机空袭上海高昌庙、江南造船所，投弹两枚，落于郊外，并无损害。

(3)“海圻”、“海琛”、“肇和”三舰，偷渡吴淞，进攻江阴炮台。吴淞要塞司令许康未能发觉，“海圻”等三舰在长江中停留一日。返航时，吴淞要塞虽已发觉，但未敢发炮攻击。三舰过黄浦江口时，仅受到南岸陆军炮兵攻击。“海圻”被击中一炮，把舰尾右舷打了一个凹坑，其他毫无损失。

(4)“威海”军舰单袭海州，俘获“三江”商船、没收“三民主义”书刊数万册以及北伐军的被服等物，还有押运的军官三人，被俘解往北京。

(5)“镇海”军舰炮击浙江镇海县的招宝山，直到1947年笔者带商船到镇海县招宝山时，还发现有残存弹着点的遗迹。

这时的东北海军，真可谓枕戈待旦，三天两头南下。闽系海军龟缩在长江以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制海权完全掌握在东北海军手中，使得北伐军不能利用海运，海上的国外接济也被阻止。因此，闽系海军才不顾一切舆论压力，在日本定购了“宁海”军舰。该舰2500吨，装有双联6英寸口径炮塔三座，速度在20海里以上，系以“海圻”为假想敌而制造的一艘巡洋舰。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海军没有变动。所谓东北海军，实际上都驻泊在山东沿海，东北陆军既奉命不抵抗，海军也就无出击的必要；尤其是那时的海军，在实力上对外根本不能成比例，也就更谈不到在海上同敌人争雌雄了。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海军除损失了江防舰队外，葫芦岛海军学校和沈阳海军司令部迁到青岛，其他就没有遭到损失。

六、关于东北海军的军制等问题

（1）海军军官。东北海军军官由东北海军学校毕业的共两期，57 人，连同沈鸿烈的同学及烟台海校同学，高、中、初三级的军官总计不过 116 人。军官的级别分三等九级，即将、校、尉三等，每等又分上、中、少三级；另海军还有代将一级，介于上校与少将之间。这个制度与中央海军一样。在薪金方面，由上尉到上校，每级又分三级：即三级、二级、一级。三级最小，一级最高。军官又分舱面和轮机两大部门，轮机军官的待遇比舱面军官的待遇还多一成；另外，军医、无线电官和书记官，均为同级的官佐。

（2）东北海军的薪金。薪金以大洋为计算单位。学兵每月 3 元；二等练兵 9 元，一等练兵 13 元；三等兵 18 元，二等兵 19 元，一等兵 21 元；下士 26 元，中士 31 元，上士 37 元；准尉二级副军士长 66 元，准尉一级副军士长 77 元，少尉正军士长 88 元；学生 6 元；见习生 33 元；二级候补副 66 元，一级候补副 77 元；少尉 88 元，中尉 110 元；上尉三级 132 元，上尉二级 143 元，上尉一级 154 元；少校三级 176 元，少校二级 183 元，少校一级 209 元；中校三级 231 元，中校二级 264 元，中校一级 330 元；上校三级 418 元，上校二级 460 元，上校一级 480 元；将官 700 元到 1100 元。

（3）东北海军的军服。军官冬季着海蓝呢暗扣丝编带袖章的常服，夏季是白马银金色明扣带肩章的常服；帽檐由少校起有单层金色嘉禾，到将官则有双层金色嘉禾。

士兵由下士起就不穿翻领的水兵服了，帽子有帽檐，军服有明扣。

袖章：东北海军不论舱面或轮机军官，袖章均有嘉禾圈；轮机军官只在表示军阶的金线空地上，填有紫色的呢，以资区别。袖章的区别是：准尉是2.5分金线1条；少尉是5分金线1条；中尉是1.5分和5分金线各1条；上尉是5分金线两条；少校是2.5分金线1条，5分金线两条；中校是5分金线3条；上校是5分金线4条；代将是1吋金线1条；少将是5分金线和1吋金线各1条；中将是1吋金线1条，5分金线两条；特将是1吋金线1条，5分金线4条。

肩章：本地，尉官3条窄金线，校官两条宽金线，将官全金。线上装有五角金、银星（金星是轮机官兵，银星是舱面官兵），准尉、代将无星，上、中、少级以1、2、3个星为区别，校官在星的上边还加银色单锚一个，将官加银色双锚一个（轮机校、将官用金色），特将是4个星。

（4）海军的附属机构。东北海军学校从1929年创办直到1943年在万县停止招生，共毕业了五期学生，其中第三期有一部分是由哈尔滨商船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转到葫芦岛海校补学海军课程的，为期很短；第四期有30余名幼年生，在校8年，其他均系四年制。在校班次，除第五期合并了广东黄埔二十三、二十四期及江阴电雷学校第三期，班次较多些以外，其他各期均系一个班。第二期为轮机将校学生，第五期航海、轮机全有，所以毕业的人数不多。航海军官约320人，轮机军官约130人，总计不到500人。除东北海军学校外，还有深造训练和辅助教育单位。有由高级军官组成的海军高级班，当时聘请法国炮术教官代将雷维尔、法国潜水艇上校教官雅斯巴专教海军战略、战术等课。还有专学鱼水雷的教练所，对象为鱼雷专科军官及士兵，专教鱼雷发射及调整，为期一年，由日本教官秋山安、西岛丑太郎、丰冈重明等任教，翻译官

为海军轮机中校吴建。初级军官训练班，主要培养士兵学习浅近的海军专业知识，为士兵升军官打基础；根据规定，东北海军士兵可升到上尉，以后还有升到少校的，中央海军士兵则只能升到少尉正军士长。

海军航空队由中校王寿南任队长，聘有俄籍航空军官霍梅可夫、航空机械军官板克夫任教官。还有以张赫炎、朱子明为首的海军陆战队，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发展为旅的编制。

其他附属机构有哈尔滨航运处，由沈鸿烈兼董事长，没收俄国的江轮，均在该处航运。还有“编译局”，由刘华式担任局长，出版《四海》、《海事》等定期刊物，并翻译有《日俄海战史》。修造机构有青岛海军工厂，厂长是轮机上校高风华；还有江防海军修理所。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3辑〕

东北航空军建立始末

◯ 孙继先　**口述**　罗正难　**整理**

一、东北建设航空军的动机

东北航空军是中国航空史上比较早的一支空军武装力量。中国开始建立空军是在 1912 年前后，北洋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在留法回国的航空员姚锡九建议下，向英国购买了一批飞机。1917 年使用这批飞机，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军的战斗，空袭过复辟军占领的北京，轰炸过紫禁城。1920 年北洋军阀直系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打垮了段祺瑞，奉、直两系掌握了北京政权，瓜分了段祺瑞的家底。张作霖分得的物资中，就有一批飞机，计大威梅双翼 360×2 马力（双发动机）旅客运输机 4 架，小威梅单翼 360 马力侦察教练机 4 架（段的另一些飞机为吴佩孚所得）。此外，还有克虏伯 15 厘米榴弹炮 6 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从德国买来的）。同时，还跟随来航空人员姚锡九和王立序（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等人。后来，张学良又从大沽造船厂等地调来技工赵鸿起、宋茂臣等 22 名。这样，

就为东北航空军搭成了班底。

东北建设空军是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条件的。在客观上，由于1921年左右，我国北方处在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成败存亡决定于军事实力。一个军阀为了战胜敌手，就必须加强和充实自己的军事实力，增设现代化的兵种和武器。于是，空军的建设就成为军阀扩张军事实力的必要步骤。在主观上，张作霖建立空军的愿望也是很早就有了的，当民国初年国内只有段祺瑞手下有几架飞机的时候，他就有了建立空军的念头。1917年段氏讨伐张勋复辟军，以及帝国主义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在战斗中低空对地扫射和投弹轰炸所起的既歼灭敌人又涣散敌人军心、瓦解敌人战斗力的现实作用，更促进了张作霖建设空军的意图。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他无时无刻不在幻想有几架飞机。但是没有机会，一时弄不到手。段垮台后，他马上就伸出手贪婪地接收了段氏大部分家底。后来奉系一、三联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先后去日本参观访问，看到日本陆军和空军的装备优良、训练有方、航空技术的先进，大受感动。回国后，仿效日本的装备和训练方法，加强陆军；于1925年3月在沈阳成立了东北军官教育班，招收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分设三个步兵队，一个炮兵队，聘请陆大教官进行教练，并开设外文科目。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就急速地张罗购买飞机，训练航空人员，积极建设空军，以实现多年来的宿愿，适应与群雄角逐的需要。

二、航空军的诞生和成长

军阀混战的客观形势，加速了张作霖建设空军的步伐。

1921年1月设置航空处，派参谋长乔赓云（字汉章）为处长。就沈阳东塔农业试验场旷地修建飞机场，筑造厂房、仓库、宿舍、办公室等，并开始招生，训练飞行人员。1923年调整机构，乔赓云去职，张学良兼任航空处总办，把原设的一科（主管文书总务）、二科（主管材料）、三科（主管机械）、卫队连、维修工厂、修理技工组等单位，划为总务、机械两处，分掌事务和机务。以高纪毅为总务处长，周培炳为机械处长。同年3月附设航空学校，作为训练航空人员机构。航空学校直属总办，并由总办兼领校长。当时教官有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赵延绪、王立序等，还有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有译为布列的）等十数人。至此，东北的航空军包括飞机、机场、维修工厂、机械设备、航空人员、地勤人员、机械人员以至训练机构、教官等，才粗具规模。

第一批训练的航空员，一方面因为他们年龄较大，另一方面又因为学校本身设备条件较差，技术水平不高，不论是驾驶或战斗技术都感不足。这时，奉派正与直系作战，对空军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于是，张学良又从陆军军官中选拔一批人员，计有徐世英、陈洪露等12名，送往法国留学。他们于1925年毕业回国。但是，又因年龄过大（有的30余岁），受身体条件限制，驾驶、战斗技术水平也都不高，仍不能满足军事上的需要，也不能使张作霖心满意足。

接受上次训练教训，在1925年张学良再次选送学员出国训练时，特别重视体格和年龄条件。这次是从郭松龄和张学良亲手建立起来的东北军官训练班的1000余名学员中，挑选年龄小、体健壮的青年，计有葛世民、白景丰、王常立、朱长凯等28名，他们的年龄全在20岁上下。我当时还是个17岁的小伙子，也在教育班被选上了。

这次送往法国留学的总人数为35名。除去28名学航空之外，还有学陆军的2名（李健勋、尚业昌，由陆军中挑选来的），学机械的3名（杜采林、于天民等，由北京工科和中法专门学校挑选的），翻译2名。我们于1925年3月，从上海坐轮船出国，由驻法武官姚锡九担任留学生总监。到法国后，所有和法国政府联系事项，全由他负责。我们在马赛登陆后，即到巴黎，休息数日上航校。

东北航空处原来的计划是把28名航空人员全送到毛兰纳航空学校（巴黎市内）训练，但因这个学校招收学员条件非常严格，尤其是对体格的要求，稍差一点就不收，结果只送去18名。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是最新式的，使用的教练飞机也是最好的，是毛兰纳工厂制造的，分为两种：（一）风冷旋转式120马力双座教练机；（二）双座180马力重型教练侦察机。学习的科目有：机械、驾驶、实习、法文等。与此同时，余下的10名则在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训练。学习科目有：机械、战斗、轰炸、无线电联系等。学习时间都是8个月。毕业后，两部人员都获得国际航行驾驶证，具有初级航空人员资格。1926年秋，两部分学员都转入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训练，学习驾驶和战斗，结业后又转到里昂的法国正规航空军三十五团，参加实际战斗见习。实习的项目有：轰炸、投弹、瞄准、扫射、空中战斗、无线电联系等项。还参观了欧战的遗迹。1927年初，结束全部训练项目，启程回国。

我们在法国学习期间，国内对这批未来空军的新生力量，真是众目睽睽，各派系都想争取为自己所有。巴黎中文版东方日报馆每天派人给我们送报，报上经常报道我们的学习情况，号召我们要为祖国为庶民效劳，不为军阀卖命。湖北某

军阀派到法国购买飞机的人员也积极拉拢我们。结果，留学生中亲张派把他殴打了，并请求法政府将他驱逐出境。另外，巴黎国民党部派一个专人经常和我们联系，后来这个人还送我们归国，企图渔翁得利，打算争取一些人在香港下船，报效国民政府。同样，东北当局更担心我们翅膀长硬，高飞远走，自己落个“为人作嫁”，因此采用了既笼络又监视的两面手腕。在学习期间，破格地将全部人员都由出国时的准尉提升为中尉阶级；回国后不几年，全部都相继提升到少校乃至中校。所有这些，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只要能为他出力卖命，在阶级、金钱、生活待遇上，都可以给你满足。回国时，特派机械处长徐世英（东北航空军成立后为副司令），代表张学良远道到香港去迎接。从表面上看，对我们很重视，很欢迎，实际是进行监督，怕我们中途被人拉走。

我们在赴法国学习时（即1925年），东北航空处已有60多名飞行人员（沈校一期已毕业），50多架飞机。遂正式建立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5个航空兵队，张学良兼飞鹏队长，其余是：飞龙队长章斌、飞虎队长赵延绪、飞鹰队长皮恩良、飞豹队长赵翔陆。飞豹队成立不久即调到济南，归张宗昌指挥；飞虎、飞鹏、飞鹰3个队，曾在1925年秋组成东北空军司令部（战时编组），由张学良兼司令，冯英为参谋长。郭松龄反奉事件结束后，将司令部裁撤。1926年，飞虎队参加对西北军的战争，1927年飞鹰队参加肃清直系的河南等战役。东北空军经过几年的军阀混战，战斗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1928年我们全班人马回到东北，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以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将航空处缩编为东北空军大队，任徐世英为大队长，并将原飞龙、飞虎等队改称为第一、二、三、四、五5个队。第一队队长陈鸿陆，第

二队队长姜兴成，第三队队长葛世民，第四队队长雷根，第五队队长聂恒玉。到1930年初，大队改称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任司令，徐世英为副司令，并以军事参议官张焕相驻部，称代司令。部内一切组织人员如大队。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支拥有现代技术装备和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空军。

1928年，飞豹队（在山东由张宗昌扩编为航空司令部）全班人马从山东回东北。1929年春，又由军事学校和讲武堂挑选40名学员，进行航空训练，但因“九·一八”事变没有完成。

三、飞机来源和飞机场的修建

东北空军飞机的来源有三。其一，是从垮台的军阀手中接收来的，计有：1921年从段祺瑞手中接收的8架；1926年又接收吴佩孚的大威梅2架；1927年在北京清河航空学校又接收冯玉祥的意大利式3架；1928年飞豹队从山东带回德国制容克300马力约10架，总计为20多架。其次，是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1925年从法国购买布兰盖14号水冷旋转式300马力双翼教练侦察机10余架，每架以10万元代价购得。1925年又从法国购买保代士式400马力26架。同年又因请日本教官，以120万元大洋高价，向日本政府购买依斯巴诺300马力牛包尔式4架。1930年又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孟士双座单翼教练机40架。这批机件未待启封安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前后共购买大约80余架。再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飞机访问中国时转赠的，计有：1929年春，美国飞机从西海岸不着陆横渡太平洋访问中国，经苏联赤塔着陆后，转飞来沈阳东塔机场。这架福特号大型运输机美国政府

就赠送了东北航空军。同年，法国又效仿美国不着陆飞行，访问中国，在海拉尔被迫降落，修复后飞来沈阳。这架布兰盖19号，法政府也赠送了东北航空军。综合以上三处来源，计有百余架。

东北航空是以沈阳东塔机场为大本营的。这个机场是在1921年修建的，面积约有200来万平方米，修建很粗糙，没有固定滑道，也没有混凝土地基，只是类似跑马场般的一大块平地。这是因为当时的飞机，航行速度很慢，一般的起飞只要有300多米长的平地就可以自由地上升了；降落时也只要在平地上滑走700米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对机场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的。1925年秋，又利用锦州东大营炮兵操场修一机场，比沈阳东塔机场稍大。除此以外，再没有固定机场了。

四、几次主要的战斗

从民国初年到北伐完了为止，是军阀连年混战时期。张作霖自1924年(即第二次直奉战)联合冯玉祥皖系打垮曹锟、吴佩孚以后，除据有东北四省之外，其势力已由京奉、津浦两线发展，一直伸张到南京。1926年8月张作霖战胜了冯玉祥，1927年冀豫区混战，打垮了吴佩孚部将靳云鹗后，自称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地盘日见扩大，大有统一全中国之势。作为奉派扩张势力工具的东北航空军，在军事上虽然只能起侦察、对地扫射、小规模投弹轰炸等作用，但是张作霖却善于发挥自己的所长、攻敌人之所短（多数军阀尚无飞机），充分地发挥了飞机的作用。于是，这支空军就连年投入战斗，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不下数百次。仅我一个人在攻击郑泽生的战役中，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出击过30余次之

多。根据记忆所及，最主要有以下数次参加过的战事。

（一）1927 年，奉张和吴部靳云鹗在河南作战，曾出动 30 多架飞机，对打垮和消灭靳军起了一定的作用。此次战役航空员死亡 3 名，伤 4 名，毁机 7 架。

（二）1931 年春，组成 12 架的战斗队入关，在北京设司令部，参加了平定石友山叛乱的战斗。由于空军对地扫射，投弹轰炸，配合地面部队歼灭敌人，不到十几天，就把石友山军打垮了。

（三）1927 年，阎锡山的郑泽生山西骑兵军，迂回于张家口和古北口之间，威胁北京。东北航空军每天出动 2、3 架飞机监视敌人行动。上午向敌军散发传单、扔报纸，下午送两枚炸弹。为时达一个多月，钳制敌军寸步难移，使他们无法向北京挺进。结果，全军向奉军投降。

（四）1926 年对西北军的南口战役，曾出动四五架飞机参战。1927 年和阎锡山作战，飞机着火，毁 1 架，死驾驶员 2 名。同年，又参与对傅作义晋军涿县战役。

五、东北航空军的结局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分为直系、皖系和在东北独树一帜的奉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曹锟、李纯、吴佩孚等皆为主要人物。曹、吴等人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一向是走日本路线的。日本帝国主义虽想以支持张作霖作为侵略中国的阶梯，但对张的势力是有所顾忌的，因而密切地注视着东北航空军的动静。1929 年，日本就派两名上尉、两名中尉、两名军士钻入东北空军，名义上充当教官，实际上是搜集军情，搞特务活动的。“九·一

八”事变时，证实了这一国际间谍行动。根据事变最后逃出机场的高志航口述，日占领军的首领和向导，就是当年冒充教官之一的日人雷耿。高志航被扣留时，就是得到雷耿以“师生之谊”批准释放的。至于这些冒充教官的所谓教练，真是可笑之极，教的全是一般普通的驾驶知识和技术。每逢涉及重要的驾驶和战斗技术知识，就狡猾而又骄傲地声称“天皇保密”，不能讲解。其实他们所谓“天皇保密”的东西，并非高不可攀的奥妙技巧。我们在法国时，大部分人都已学到、学会。情况虽然如此，可是东北军的将领们，既没明察这些冒牌教官的国际特务活动，反认为他们来东北是帮助我们教练，是好心好意。于是，毕恭毕敬，奴颜婢膝，殷勤招待。教练结束时，连同他们带来的 4 架飞机（只是起暂时寄存作用），奉送给日本政府 120 万元大洋，作为报酬。这种认敌为友的作法，实为中国航空史上一大污点。

“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航空军已拥有 100 余架飞机，近百名航空员，成为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新式空军。事变前数日（9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借口“中村事件”，将以武力占领东北的消息传来，航空军全体人员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摩拳擦掌，要出动飞机轰炸日寇。迨事变爆发，参谋长陈海华（这时副司令徐世英已调到长官公署任职，代理司令张焕相也不在司令部）请示住在北京的张学良后，即指令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此时群情愤激，莫可言喻。最后始知命令出自所谓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授意。我们就各自分散，离开多年来驾驶的飞机和起落的机场。

18 日夜，日本军攻入北大营，次晨即遣 100 余人占领机场。他们原以为这是军事设防的机场，将会发生战斗的。在离大门数百米外，即作好战斗准备，向机场扫射达一小时之

久。待发现没有回击，全军才大摇大摆地开入。于是，东北空军在不抵抗的命令下，不费一刀一枪即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占有了。根据我的记忆，被敌人掠夺的军事物资有：飞机一百余架，从捷克购来尚未启封安装的四十余架成套的机件，四五台发动机，8辆坦克，以及附设工厂的全套设备。

鹊巢鸠占之后，我们这批失去巢穴、没了翅膀、无家可归的孤鹰，遂陆续会集于原北京东北航空军司令部，赋闲了三四个月；后来连同原平定石友山的12架飞机，一并改属国民政府。但由于蒋介石对东北空军的歧视，待遇不平等，降薪降级使用，只有高志航、杨相林、孙钟华等六七十人前去南京。其余分道扬镳，各投其主。张念匀等六七十人前去西北，投盛世才；另有二人去四川投刘峙；徐世英等计10余名（我也在内）在北京赋闲。至此，东北航空军从1921年经过航空处、空军大队、空军司令部前后10余年时间，终成为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而告结束。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辑〕

东北空军的诞生和发展

◯ 徐则林

一、航空处与航空学校

张作霖统一东三省后，正值北洋军阀当政；大小军阀各据一方，互相火并，连年内战不止。张作霖雄据东北一隅，拥有丰富资源，整军经武不遗余力。1921 年命其参谋长乔赓云筹办东三省航空处，聘赵延绪等南苑航空学校毕业学员十几人和法国退伍飞行员布列等为教官；先后买到英制爱夫罗教练机和法制高德隆练习机 20 架；利用沈阳东塔原农业试验场旷地辟作机场，招中学生 50 名，成立东三省航空学校，开始培训飞行人员。

派留学生赴法

1922 年第一次奉直战，奉军失败，北洋政府免去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职。张作霖遂宣布自治，自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为了报仇雪耻，奋力图治，在整军方面，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吉林省督军孙烈臣为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并以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张

学良主管航空处后，广延人材，添购飞机。1923年又由当时东北新军第二第六两旅（旅长为张学良、郭松龄）选送青年初级军官11人，和军佐徐世英一名留法学航空。这12人在法国昂瑞夏航空学校学习；因有3人不适宜于航空，改学坦克；1人在毕业考试，长途飞行中烧死；只有8名学会驾驶术；也学些侦察知识和轰炸术。1925年春回国，皆派为东三省航空处上尉队员。

编队建兵种

这时，东三省航空处已有60多名飞行人员，40几人是航校一期毕业。1924年同教官们参加过第二次奉直战。飞机已陆续装好300马力布列克和180马力高德隆等50几架。张学良因之正式编成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5个队。当时东三省航空处的编成是：总办直辖参谋室、总务处、机械处、航空工厂、航空学校、航空兵队。

队的编制：

上中校队长　1人

中少校队附　1～2人

少校上中尉队员　8～10人

中尉副官1人、上尉军需1人、上尉军医1人。

张学良并兼任飞鹏队队长，我任飞鹏队队附；其他4位队长，飞龙章斌，飞虎赵延绪，飞鹰伊里布、皮思良，飞豹赵翔陆，都是航校教官升充的。航空工厂厂长邢契莘兼工程师。

张学良队长是1923年间学的航空驾驶术，他很爱飞，得到航空员的钦佩。1925年夏季，航空处发生两起突出的事故：一天上午，张作霖突然出现在机场上，为他紧忙组成的表演组，在最末编队飞行项目中，两架邻机相撞了，驾驶员李坦

当场殒命，曾学泽腿折，后年余也死去；隔不多时，三伏天中午，炸弹库爆炸，两位库员和几名士兵殉难，附近家屋受殃者不少。

组司令部建军种

1925 年秋，张学良鉴于国内局势动荡，调飞虎、飞鹏、飞鹰三队组成东北空军司令部，张自任空军司令。参谋冯英（冯庸）为参谋长，全军进驻河北昌黎；并调飞豹队飞济南，归张宗昌指挥。

二、空军参加内战的尝试

先是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起，奉军打败直军，趁胜入关，一齐占据冀、鲁、苏、皖四省，以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分任四省督办。1925 年，自恃功高的郭松龄，在滦县发起“清君侧”的军事政变，大军向关外开动。我们空军在昌黎见情形不对，冯英驾起飞机到滦县探询，回来即下令：能飞的即飞回锦州，不能飞的赶紧上火车。我们这群不明真相的，驾起飞机全飞到锦州东大营操场降落。风大天冷，无一点设备，一夜间，30 几架飞机皆有伤损。第二天张学良过锦州，我们上专车见他。冯英把飞机的实况说了。张学良温和地说，并写个便条交给冯英。“飞机是三省民脂民膏，留着吧，不必焚毁。”专车到兴隆店，张学良揆度形势，决定在巨流河线抗击郭军，叫我们回沈阳，把能飞的飞机带来助战。

我们回到沈阳，航空处的高级人员一个也见不着了。他们有的逃到大连，有的避入南满站。在这群龙无首的时候，张作霖找航空处负责人。等到我们回沈，冯英应该去，但他听到流言说他存意助郭军，不敢见老将，也避难于南满站。最

后我去了，承启领我到帅府大厅。张作霖正在向杨宇霆大骂郭松龄，他看见我，愣一愣，遂即说："他妈的！航空处也跑光了。我哪点亏负你们？王八蛋！都随了郭鬼子；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也不叫我爹了。好！你娶个外国老婆，钱老是不够花，来人！拿大洋！钱是好汉用的。"我在他自慰的一刹那，把张学良决心守兴隆店，飞机即到前方作战的情况说了。"好！兴隆店。"他发出喜悦的语调。现洋掷堆满眼前。他火爆地叫喊，叫我拿钱。我两手各握两卷，他还不依，抓起两卷就向我衣兜里塞。

张作霖这个人是极端主义者，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在他的正负两极，可都不好受。他的统御技术，也就止于此了。

空军整理好8架飞机，我领飞虎队到前线，在巨流河东岸一个独立家屋南方飞起来，每日侦察、撒传单，张学良三个字真灵，中下级军官佐和士兵们，知道他在兴隆店，也明白了真实情况。巨流河的守军，日日多起来，郭的回军攻势有同雪花一样消散。但铁路两侧的僵尸，冻死的多于打死的，成堆的尸体像围在一起取暖一样。

兵燹中的老百姓，没人管他们死与活。

事件结束，空军复员，航空处把遗在昌黎的器材，锦州的伤机，陆续运回沈阳修理。航空处代理总办是机械处长周培炳。他是一个老官吏，长于采购，仓库总是满满的。我们飞行人员瞧不起他，也不很听他的话。

张冯争雄空军扩编

由于奉郭事件，冯玉祥乘机崛起，张作霖为恢复先时势力，镇威军再度入关，飞虎队随张学良的镇威军第三、四方面军团经锦州、昌黎、天津、北京节节前进，迫使西北军

（冯玉祥的泛称）出走廊坊，让出北京。在进攻南口等战役中，飞虎队皆参加过；胜利奖金，飞行人员获得独厚。钱多了，坏事也多了，娶女人，吸大烟，花天酒地，军风纪因以下降。

战事在潜伏着，飞虎队在清河机场学习大维梅机。秋初，张学良总办命我回沈阳，接机务处长，并嘱加以整理。

1927 年初，留法二期学员航空毕业回国，让我到香港欢迎。原因是带他们出国的姚锡九造谣言，说他们不回东北了。他们何曾有人不回东北？而是姚个人打掩护，自身背叛东北了。这期学员是 1925 年航空处从东北各军事学校选送的。有 28 人学航空，4 人学机械，2 人学陆军。学航空的是在易士特航空学校毕业。他们穿着崭新的 7 扣军装，到北京三、四方面军团部谒见张学良总办。总办对他们有好感，全委为少校队员；并叫我以他们为基干，扩编飞鹰队。因飞鹰队在南口作战时调来北京，老队长皮思良患了病，我接过飞鹰队；并调飞虎队一部，组成有 3 个支队的飞鹰队。支队是：飞行人员 10～14 名，飞机 8～12 架，机械士按机种分配，平均每机约 3～4 人。飞机性能是侦察轻，轰炸重，若有敌机，也得用它战斗。

冀豫地区混战

西北军撤离河北，东北军占据京津一带。1926 年底，张作霖称起安国军大元帅来，一面挥师南下，争夺河南，一面接收北京航空署，留任刘光克为航空署长，赵延绪为军事厅工，邢契莘为机械厅长，沈振荣为经理厅长。东北航空人员操纵了北京航空署。

三、四方面军团南下，张学良调飞鹰队，由昌黎随军南下。我率 3 机先到郑州直军机场上，那里有 3 个大席棚，满藏着飞机和器材，20 多位技工和士兵，同一位军官看守。他

们说："好几个月没发饷，人都饿跑了。"我从兜子里拿出中交票，交给他们分用，并嘱咐他们好好看管。这时，那位军官靠近我，小声说："城里有便衣队，要小心。"韩军团长麟春专车到，我接他时，遂把这消息报告了。"也许他们想闹事，你把飞机带回去。"韩军团长话音刚落，一位参谋插言了，顶好组织些队伍示威，明早增援部队到来，就好办了。这夜韩军团长自己玩着骨牌，沉静地坐镇郑州城。我们唱歌跑步，机场上大街上玩个够。后来枪声逐渐逼紧，传来"黄河桥断了"，"敌人甲车撞过步兵线"。恰好军团甲车赶到，及时顶上去，我们一位炮手射术真高，一炮打穿了他们三辆甲车，300多人全震死。

算是我们战利品吧，郑州机场上三个席棚物资，全运归沈阳航空处。空出的席棚，飞鹰队利用上。曹琨贿选当总统，向英借款买的飞机，到此全部落到东北军手。

不能自存的曹、吴残部，分投南北两阵营，武汉、东北两极端拼头了，飞机天天有任务，一部分并推进漯河。这时候，航空处代总办周培炳，在北京得到杨宇霆支持，成立了空军司令部，周为司令，皮思良为副司令。皮一人到郑州与我住些日子，因高血压加重，回北京故去。司令部也取消了。"少帅"亲自训练的空军，也有人起念头，打主意，可见当年争权夺利是无止境的。

飞鹰队在郑州阶段，出过几次伤亡事故，有些日子找不到逃窜的敌人，任务达不到，队员们一冲动全低飞，接近地面，在飞扬的尘沙海里搜索，栾敬孚遭到步枪射击，一粒子弹从下颏打入口腔。他坚持飞回出发地。我们把他拖出机座，用飞机送北京医治。三个月后，他配只假眼，带着笑容，又与我们见面了。白振林低飞，误撞到树梢，牺牲了。赵泮桥、

王普泽同机烧死，人与机齐成灰烬。

战况随时有变化，入上蔡的全部作了俘虏；在漯河的未见敌人，即自动弃炮焚机的陈琛，被军团长正法（陈是炮兵旅长漯河指挥）。西北军出潼关，过洛阳，飞机侦察明确，军团部作出战略调动，飞鹰队调回保定。

这时间，飞龙队也调来保定，补充飞鹰队。随之，飞鹰队奉命改名为镇威军第三、四方面军团航空大队。为什么改名更隶属呢？我们没去想，反正，军团长是张学良，航空处总办也是张学良，后来听到留沈航空人员与我们闹意见，军团才这样安排的。我们想起前些日子代理总办所以来队查帐的原故。当时东北空军全在前方，人力物力耗用得相当大，难免没有猜忌，可是影响到后勤供应，大队感到许多不利。

阎锡山看出有利可图，不捧张作霖了，参加了蒋冯的反奉战争。正当蒋张酣战之际，晋军傅作义窜入涿县城，震撼北京，牵掣保定；奉第三、四方面军决定先消灭他。于是步炮齐攻，张军团长驾飞机亲往视察，见到涿县城一片尘沙，死沉沉无一点生气，一再指令大队不得投炸弹。及解围后，傅作义留在保定很长时间，受到优异的款待。至于被围困的涿州百姓，走死逃亡，却无人过问。

冬季一个夜里，保定西面打起来了。大队在城东方，听到枪声，急急探问。军团部参谋长回电话，叫大队预备好两架飞机待用。这夜大队在机场周围放出几个防御据点。天亮明白了，是万福麟军的一部来保定，未联络好，惊动了守兵闹出的事故。

三、东北空军还师和整顿

1928年春，奉军形势不利，张作霖通电息争，率军出关，空军有的直飞昌黎，有的坐火车向山海关进发。投入山东的飞鹰支队，在聂恒玉领导下也飞回来，在滦县向军团部请示，我也还师待命。

大队编组：

大队长　上校一

大队附　上中校三　职司技术制造，军事参谋

下设副官、军需、军医、军械、编译五处

原飞龙、飞虎等队名称，一律改为番号。

第一队　重轰炸队，队长中校陈鸿陆

第二队　侦察轰炸队，队长中校姜兴成

第三队　侦察轰炸队，队长中校葛世民

第四队　侦察队，队长上校雷根

第五队　战斗队，队长上校聂恒玉

第三队队长不久由中校王聚有补充。重轰炸机是以360×2HP大维梅航运机改装，侦察轰炸和侦察队用包代之、容克、布列克等双座机，战斗队用司巴特、福克等单座机，航空学校改为教育班。不久归军事教育系统，名为东北讲武堂航空教育班。教育长上校陈海华，大队长兼教育班总队长。高射炮连由原属卫队统带部拨归空军建制。连长炮兵上尉高某，航空工厂派空军中校王维祥为厂长；原厂长周德鸿调升上校大队附，领导技术制造。周是老留日工专生，当时算是能手。探照灯队、摄影班、卫兵连各仍原组织。

将级的空军前辈，和上校级的事务人员，全安排在当时

独立状态的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里。后来换旗，成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时，在参谋处设一航空科。

东北空军在连年混战中，业务废弛，军风纪下降，甚至飞行人员有20几人吸大烟。后勤部分（原航空处）养成上班画到，不做实事的官僚作风。陈品残机堆满库棚，大队发动全力，把仓库机棚翻了个身，修配好10多架可用的飞机，也作废好多全身是锈的部件。

大队经费说是6万元，实际是缘航空处例，实报实销。大队把机场向南向东扩展，并添修机棚，才够跑道、贮机之用，费了好多钱。张学良总办创办航空刊物和航空俱乐部，大队也把它重新办起来。

1928年冬，航空处采购的法国制450马力包代之飞机，末批运到，并随来法籍技师1人，帮助装配。这批飞机当年算是第一流，速度快，续航力强，我们很珍爱它，拿出4架练习，其余20架分交二、三两队保管留用。

1929年春，各队正学习得起劲，飞行员潘大同带徒弟练习大维梅机，失速撞到地面起火，把偷自乘坐的技工和家属6人，烧成焦炭。潘大同第二天死去，仅沈德玉学员甩出机外，被机场救护车抢救得活。事故责任，应由第一队长直接负。练习时一向不准别人搭乘，因搭乘加机荷，失速，出事故，责任更严重。可是，当年组织性不强，惩罚不生效，麻痹大意，兔死而狐不悲……并不认真追究原因，把过错全推在死人头上。飞机失事，当事者决不自愿，虽有的艺高胆大，遑能疏忽，不遵守飞行纪律，或者技术差些生出事故，究属例外。主要是机器出故障，涉及装修保养各方面，不管哪个环节，哪个工序，一不小心，未能确确实实操作，即易出漏洞。当年飞行人员伤亡率高，大队始终得不出降低办法

这时，航空教育班学员毕业，他们20人学驾驶，16人学机械，全派在大队见习。1927年送日本学航空侦察的姚东焕、李笑天等4人，也毕业回队。大队请准司令长官，在人事调整下，以水陆两用机10架，编成水面飞机队，在葫芦岛训练，后拨归东北海军，在青岛舰队服务。秋，司令长官嘱大队赴日参观。我们12人包括各职各业，走马观花，看过日本发动机制造厂、机体制造厂、航空学校、航空联队，归来由周大队附主编个参观小册子——“赴日参观记”，留作参考，但实际上起了夸耀日本帝国主义空军的作用。

1929年冬初，司令长官公署指令大队即派飞机两队，到中东铁践线，参加防俄之役。第二队归东路丁超指挥，第三队归西路胡毓坤指挥。东北空军应当早有防寒设备，当年军阀尽想打内战，抢地盘，对北满极寒地区不注意。旅长韩光第阵亡了，飞机冻结了，飞不起来。司令长官知道了，叫我即时到前方察看。我先到东路下城子，把隐在秫稭垛里的飞机，在掘成的地窖里搞好开车起飞了。丁超很起劲，大请客。我转到兴安岭，夜里在一个地下室，找到西路指挥部，听到军队防寒服装不够，手脚多冻坏了。第三队还好，完成几次任务。当我回经车站，接到由东路转来的司令长官电报，“各队驻原防，汝即回沈”。这是因我在下城子酒后说大话，丁超怕惹事，报告上级，才有这个电令。

这年秋季，南京航空署长张惠长单机来沈，司令长官亲到机场欢迎。当面叫我飞宁回访。我们为了夸示，准备3机编队前往。练习几次，总也未得到出发命令。蒋介石的分化毒素正在东北起作用。

四、东北空军的结局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边防军即连年受蒋驱使，到1930年夏，边防军又受到整改命令，陆军把旅改为中央番号，把空军大队部改为东北边防空军司令部，张学良兼任司令，副司令是徐世英，参谋长是陈海华，又派一位中将参议官张焕相。我们尊重他称他代司令（并无明文），其余一切都同大队时一样。张焕相是老留日步兵生，任哈尔滨行政长官时，被吉林督军张作相驱除，他把空军看成是自己的政治资本。我与他见地不同，工作上常起摩擦。他想拢络，我想约束，部署起了分化情绪，以致各队组成的学习单位教导队。秋季演习时，他在长春向我耍起“武士道”风。我年轻哪能忍耐，闹到司令长官那里，把我押在卫队统带部。1931年初，我调为司令长官公署军衡处长，自此永远脱离了自认为是终身职业的空军。

空军司令部添聘几名日本教官，把学法国的皮毛，又涂上一层日本式的假色。“九·一八”日寇一到，空军象它紧邻的兵工厂一样，全盘交与日本兵。飞行员同一般流亡者一样挤火车，逃到北京。1932年70多位飞行员全都移交南京航空署；一部派在苋桥航校当教官，一部改委地勤工作。

东北空军1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到当时居全国各空军的首位，张学良有一定的功绩。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

东北讲武堂

○ 李传玺

东北讲武堂是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干部最多的一个军事教育机构。旧东北军的各级干部，绝大多数出身于此。它对东北军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主要作用；也是东北军事集团张氏父子团结部队，统治东北的一个有力支柱。它与云南讲武堂，保定军官学校和后来的黄埔军校，并列为国家正式中等军事教育机关；有参与陆军大学考试资格的 4 个学校之一。

笔者毕业于这个学校的第七期，关于七期以后的情况，多为亲身经历；至于七期以前的情况，则系与先期毕业同学谈话所记。

一、东北讲武堂的沿革

东北讲武堂创办于 1906 年即清光绪三十二年。那时赵尔巽任奉天将军，为造就陆军初级军官才设的。当时奉天的旧军队，改为巡防营制，分中、前、左、右、后五路，由巡防营务处领导。讲武堂设立后，以接收巡防营选送的学员为主，间亦有由各协（新军相当于旅）挑选或由旗务处选送的八旗

武员入学肄业者，训练期为一年（先为 8 个月）。原名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地址在奉天老将军府，附于陆军小学院内。

1910 年（宣统二年）革命军兴，该堂即行停办。民国元年，巡防营改为陆军师，为整顿军队，又继续成立，分为军官团、军士团两部，归讲武堂总办统一领导。至 1915 年（民国 4 年）中日交涉起，复行停办，是为东北讲武堂的前身。

迨 1919 年（民国 8 年）2 月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因增编陆军混成旅需要干部，以原 27 师军官为基础，重新设立讲武堂，定名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并将总办改为堂长；另设监督一职，由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堂长一席，先由巡阅使署参谋长张作相兼任，并指派该署参谋处长熙洽任教育长，任命张厚琬为总队长，校址在小东边门外，原军官团旧址；学员名额，定为 200 名（计奉天省 140 名，吉、黑两省各为 30 名）。旋以开学数月后，吉林省学员迄未送到，张作霖又令再招学员 50 余名，是为第一期。于 1920 年（民国 9 年）2 月毕业，毕业时共有学员 228 名。东北将领张学良、鲍玉麟、高胜岳、张廷枢等均于此期毕业。

第一期毕业后，即续招第二期；于 1921 年（民国 10 年）2 月毕业，共有学员 352 名。第三期于 1921 年（民国 10 年）5 月开学，1922 年（民国 11 年）4 月毕业，共有学员 391 名。第四期学员于同年 4 月中旬入校，于 1923 年（民国 12 年）9 月毕业，共有学员 335 名。该期教育长改由萧其煊担任。1923 年底，第五期学员入校，1924 年秋，因直奉战起，讲武堂暂行停办。所有学员仍回原部队随军出发。到 1924 年底，奉直战争结束，始返校复课。于 1925 年秋毕业，共有学员 406 名。当即召集第六期学员入校，由朱继先任教育长，于 1927 年 6 月毕业，共有学员 406 名。

讲武堂由第一期至第六期，除第四期和第五期招考少数文学生外，其余都是召集部队的现职军官。1926年冬，张吴联合讨赤（吴指吴佩孚，赤指冯玉祥）入关作战，由于战事节节胜利，军队大量扩充，中下级军官感到十分缺乏，乃在北京设立讲武堂分校（即第七期）。在沈阳和北京两地招收、招考中学以上毕业学生960名。北京分校教育长，先是杨正治，不久改由本校教育长朱继先兼任。1927年6月，朱继先被张作涛（张作相之弟）打死，改由张厚琬继任。第六期毕业后，在沈续招第八期学员，仍由各部队选送现职军官。1927年9月14日开始上课，并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改称为东北陆军讲武堂。1928年3月，因东北军统辖范围扩大，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又将“东北”二字取消，改称陆军讲武堂。以上各期名称虽迭有变更，但总不出陆军范围。是年东北军在关内作战失败，放弃北京，部队撤至滦州以东，北京分校第七期归并沈阳本校；8月间在沈毕业，毕业人数共968名。同年12月1月，第八期毕业，学员共559名。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张学良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年末改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缩编东北部队，将编余军官1500余名送入讲武堂第九期（最初称为第九期第一总队，至毕业时才将第一总队4字取消）训练，至1930年4月毕业。与此同时，在黑龙江成立东北讲武堂分校。1928年夏，在沈阳招考文学生1000余名，送入东北教导队入伍。当年冬入伍生，入讲武堂第十期（最初称为第九期第二总队，在第九期第一总队毕业时，改为第九期，将第九期第二总队，改为第十期），第十期的学生还有于1927年秋成立的东北陆军模范队（招考高小以上毕业的文学生）和第十九师（师长王以哲）的学生队（也是招考高小毕业的文学生，训练将近两

年）共1500余名，第十期于1930年8月毕业。第九、第十两期同时在校，校址在沈阳城东山嘴子营房。监督仍为张学良，因张作霖已死，堂长一职即行取消。教育长先为鲍文越，1929年冬改为周濂。1930年8月第十期学生毕业后，张学良将所有东北军事教育机关归并于东北讲武堂之内，他仍兼任监督，由副监督周濂负全责。

1930年年末，召集第十一期学员（召集部队现职军官）入校。全期共有学员700余名，由王瑞华任教育长。1931年春，王瑞华他调，由副监督周濂兼教育长。

“九·一八”事变，第十一期尚未毕业，东北讲武堂无形取消。

东北讲武堂由1906年创办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止，有20多年历史；培养近万名的初级军官，所以说它是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军事干部最多的一个军事学校。

二、东北讲武堂的组织系统

东北讲武堂在堂长之下设有教育长，实际负教育训练之责。在教育长之下，有的期设有总队长，协助教育长，督促教育训练的进行。先后任总队长的有：张厚琬、林家训、吴玉琳、王静轩等。

讲武堂各期每个兵科都设有科长1人，分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并按兵科人数编成若干个队，每队有学员（生）120名；每队又分为2～3个分队，队为最小的教育训练单位。在不足一队的兵种分队，则以分队为最小单位。队设队长1人，队副3人，特科还配有助教2～3人。关于学员（生）的生活管理和术科教练等事宜，均由队长队副负全责。

第九、第十两期，由于学员（生）人数过多，在队以上又设大队，设大队长1人。大队辖4个队，第一、二、三大队为步兵科，第四大队为骑、炮、工、辎重科，这是以前各期所未有的。

学科教育，则由各专属教程教官担任；如战术、兵器、地形、筑城、交通等，每种教程设主任教官1人，下设教官若干人，分别担任各种军事教程和补助学科的讲授。

为办理总务、卫生、军械、军需等业务，校务部还设置有关处（科）。

东北讲武堂也与东北军一样，无党派组织与政治活动，因而不设政治部，没有政治课程。有关训育事项，则由各级领导担任之。

三、东北讲武堂的教育概况

1. 讲武堂本校及分校

本校和分校的教育，大体上分为学科与术科两部分，有关训育事项不列入教育计划之内，而由教育长、总队长以及队长、队附等利用早晚集合点名或其他课余时间，做一般训话（俗称精神讲话）或指示，把校内最近发生的问题和学校当局的决定与要求等，向学员（生）宣布之。有时堂长、监督来校视察时，亦多集合学员（生）进行训话。

讲武堂中心思想教育，只以师生、同学、同乡等封建道德观念，来维护团结，巩固统治，如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曾手书“民之良干”4字，悬于堂本部，以示鼓励。又第九期教育长周濂，以“良心”二字作为校训，勉励学员要“不为势屈，不为利诱，毅然决然认真去做”，告诫学员：扣盗饷械可耻，

为爵禄来可耻，品行恶劣可耻，见地不高可耻，能力不如人可耻，作战无勇气可耻。以这些封建道德来勉励学员，要求学员。

学科部分

甲　军事教程

学科的主要课目为军事教程，计有战术、兵器、军制、筑城、地形、交通等，一般叫做六大教程。另外还有卫生学，军队教育学等，均由专属教官担任之。

乙　各种典范令

各种典范令是术科教练的基本教材，由队长、队附及助教分别担任之。所谓典范令，即指各兵科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筑城教范、通信教范、体操教范、劈刺教范、陆军惩罚令、卫戍勤务、内务规则等之简称。这些都是训练的基本教材，所以都由队长、队附、助教担任之；一边讲授，一边使学员操作。

术科部分

主要科目是操场教练和野外演习，先由各个班、排、连教练，以至营、团教练；其中包括制式教练、射击教练、阵中勤务、筑城作业、通信作业等。这是战斗的基础，均由队以上军官担任之。另外个别术科，如劈刺、技术、体操、马术等，则由各专属教官担任。

野营演习

每期学员（生）在毕业之前，要举行一次野营演习，把全期所学的理论，在现地加以实地演习，由专属教官及队以上军官共同担任之。如现地战术则由战术教官担任，测图实施、野战筑城及通信作业等，则由地形、筑城、通信等专属教官领导实施之。至于战斗、行军、宿营及阵地彻夜演习等，

则均由队以上军官担任之。演习时间通常为一个月左右。

教材及教官

讲武堂各期所用的教程和各种典范令等，大部采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及日本士官学校的课本，逐期翻用，而教官、队长、队附等，都由正式军官学校毕业者（如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和留日回国的军官）担任。

学员（生）的生活管理

讲武堂学员（生）的生活管理很严，学员入学后，一律住校，除星期放假外，其余时间都不准外出。平时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内务规则和陆军礼节的规定；如有违犯，则按陆军惩罚令惩处。校内设有禁闭室，尤其在星期外出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回校，否则关禁闭，甚至体罚，如打戒尺、军棍等。学校按规定有寒、暑假，但有时因为时局关系或课业紧张，常有缩短假期及完全取消假期者。

2. 高等军学研究班

高等军学研究班创办于1928年2月，召集曾在正式军官学校（如保定军官学校与东北讲武堂）毕业之现职参谋，入班肄业；研究高深的军事学理，授以陆军大学的主要课程，学习期为2年；原隶属于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司令部，后改归讲武堂领导。其主要课程如下：

（1）战略战术课目

有基本战术、图上战术、现地战术、要塞战术、航空战术、大兵团战术以及沙盘、兵棋、阵地攻防、与战术教育法等。

（2）战史课目

有日俄战史、普法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拿破仑战史等。

（3）参谋业务课目

有参谋业务、谍报勤务、辎重勤务、兵站勤务、铁路输送、船舶输送、动员学、高等司令部勤务、作战计划、军队教育、演习计划、兵要地理等。

（4）一般兵学课目

有军制学、军政学、地形学、马政学、交通学、野战永久筑城学、兵器学、航空学、战车学、化学战、陆军经理学、军队卫生学、海军学等。

（5）辅助学课目

有国学、历代兵略、国际公法、政治学、外交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经济学、外语等。

（6）野外演习课目

有筑城实施、实兵指挥、参谋旅行、战史旅行、高等司令部业务演习等。

（7）见学及队附勤务

有各种兵种研究班见学、航空见学、海军见学、各特种部队见学等。各兵种互在军队队附勤务，另外还有马术。

在开办时，聘请日本大佐浦澄江等 4 员为兵学教官，以后由本国及日本陆大毕业之军官授课，辅助学科则多请文学校的讲师、教授等兼任之。

3. **各兵种研究班**

各兵种研究班，当时有航空教育班、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工兵研究班等。这些研究班，都是一些专门学校性质，是仿照日本各专科学校的形式而创办的。招收讲武堂或各军官学校毕业的，并在部队任职一年以上的现职军官入班肄业。其所授之课目，基本上与日本各专科学校相同，并由日本各专科学校毕业之留学生担任教官等职务；如炮兵研究

班就是仿照日本横须贺野战炮兵学校创办的；主持该班的吴克仁（教育长）、战术教官陈昶新、射击教官何宏远等都是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并有日本教官仓岗繁太郎，担任炮兵战术。他也是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各兵种科研究班主要教育课目虽各不同，但总不出该兵种范围，其概略如下：

（1）该兵科战术

有图上战术、现地战术、沙盘、兵棋等。

（2）该兵科战斗教练

有实兵指挥、实弹射击、野战筑城和各兵种联合演习等；如炮兵研究班，为了给学员练习射击指挥，在学员入班前，即为每人准备各种炮弹 100 发，以为训练射击指挥之用。各研究班均设有教导队，作为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之用。1930 年 4 月，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航空教育班、工兵研究班，举行步、炮、空、工联合攻防对抗演习，以培养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能力。

（3）另外还有一些补助课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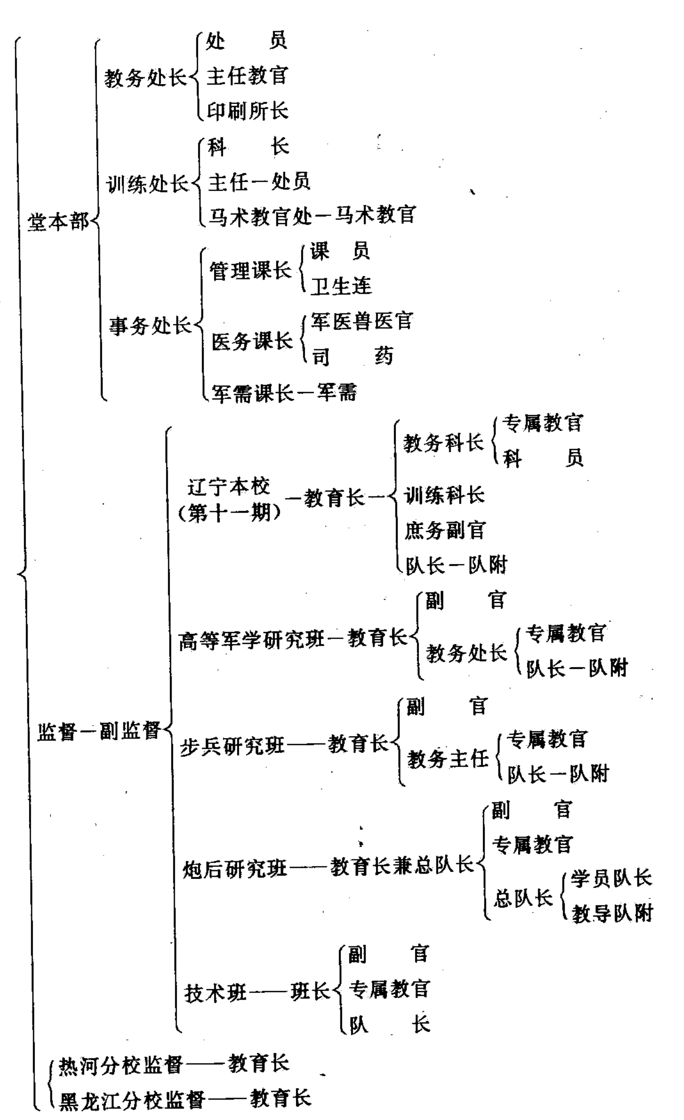
如通信、测图、测地、马术、兵器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

（4）见学

航空见学、兵工厂见学以及到其他研究班见学等。

（5）各兵科研究班的学习时间均定为一年。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 6 辑〕


东北讲武堂组织系统
堂本部
教务处长
处　员
主任教官
印刷所长
训练处长
科　长
主任一处员
马术教官处一马术教官
事务处长
管理课长
课　员
卫生连
医务课长
军医兽医官
司　药
军需课长一军需
监督一副监督
辽宁本校（第十一期）一教育长一
教务科长
专属教官
科　员
训练科长
庶务副官
队长一队附
高等军学研究班一教育长
副　官
教务处长
专属教官
队长一队附
步兵研究班——教育长
副　官
教务主任
专属教官
队长一队附
炮后研究班——教育长兼总队长
副　官
专属教官
总队长
学员队长
教导队附
技术班——班长
副　官
专属教官
队　长
热河分校监督——教育长
黑龙江分校监督——教育长

东北讲武堂

○郑殿起

东北讲武堂是指张作霖于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为了整顿和训练东北三省的军队，于1919年3月所成立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奉军（以后称东北军）自办的培养陆军军官的军事学校。是在解放前被称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黄埔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之一。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13年中共训练了11期学员、生8900余名，在东北军中上自最高统帅张学良，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笔者在1926年冬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七期（即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于1928年8月毕业，毕业后被留校在第十期当队附（即区队长），以后又在第十一期时任教，直至“九·一八”事变。对于东北讲武堂的历史，比较了解，在第六期以后的是亲身经历，在第五期以前的则闻听于各前期同学，现将还记忆的往事，概述于后。

东北讲武堂与清末统治东三省所在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所设的讲武堂不是一个系统。在张作霖于1919年3月成立东北三省陆军讲武堂之前，从清末至民初赵尔巽和徐世昌

曾先后在奉天设立了两个讲武堂：奉天讲武堂、东三省讲武堂，当时张作霖是驻奉天省的巡防营统领和第二十七师师长，并非东三省的统治者，所以那两个讲武堂与以后的东北讲武堂，毫无联系。但至今还有人将二者混为一个系统。为了澄清历史事实，光将先于东北讲武堂成立了两个讲武堂的情形，概述之。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赵尔巽任奉天将军时创立了奉天讲武堂，调训各巡防营的在职军官，一年毕业，只办一期。

1907 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时，因东三省驻军除巡防营外，又成立了陆军，为了调训陆军各镇（后改为师）和各巡防营的在职军官，将奉天讲武堂扩大，改为东三省讲武堂，地点在沈阳小东边门外老龙口烧锅东侧。每期学习期定为六个月。第一期由田中玉任监督，下设教育处、副官处、军机处、军医处和教官室、区队长室。以后由刘洪魁和周福磷先后继任监督。辛亥革命曾停办，1912 年恢复，办至第三期停办。曾在陆军第二十七师任旅长、团长的孙烈臣、汤玉麟、张作相等，都先后由东三省讲武堂毕业。

徐世昌对东三省讲武堂很重视，他亲写“民之良干”4 字匾悬于讲武堂的本部正厅内。以后经历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各期及东北学生队，至“九·一八”事变时，该匾仍悬在原处。

一、东北讲武堂的名称及本分各校

东北讲武堂三易其名

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于 1919 年 3 月

成立的，地点在沈阳小东边门外老龙口烧锅东侧，最初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东北军的第一所军官学校，张作霖兼任堂长。

1925年随着奉系军队改称为东北陆军，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也相应地改称为“东北陆军讲武堂”。并在堂长之下，增设监督一职，由张学良兼任。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后，张学良统率东北军。讲武堂第七期学生和第八期学员，于当年8月和12月先后毕业。在当年冬缩编东北军的同时，张学良将东北军所办的各种军事学校，统统归属于“东北讲武堂”之内，将原来的东北陆军讲武堂，改称为“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期别仍按前期继续排列，不设堂长，仍由张学良兼任监督，并将校址迁到沈阳东郊东山咀子营房（也叫东大营，即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学院）。

东北讲武堂设立分校的情形

1926年以前，东北讲武堂只有设在沈阳小东边门外的本校一所，校址是利用原奉天讲武堂和东三省讲武堂的旧址，房屋仅二三十间，庭院不大，仅能容纳三四百名学生。第一期至第六期和第八期的学员，均在此训练的。

1926年东北军进到关内，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军队由直隶（即现在的河北省）、山东进至黄河以南，军队扩编，深感初级军官不足，于是张作霖决定在北京成立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校址在安定门外黄寺大楼。最初由在讲武堂第四五期当过队长的杨正治任教育长，负责筹备，北京分校只训练一期学生，即第七期。于1928年6月随东北军在关内被北伐军击败，返回沈阳讲武堂本校内，北京分校不复存在。

在1928年冬，东北陆军讲武堂改为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

的同时，张学良将原黑龙江省自办的黑龙江军官养成所改为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先后由王劲修、赵锡庆任教育长，“九·一八”事变前已调训了两期学员，“九·一八”事变后停办。

在黑龙江省成立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之同时，热河省也成立了东北讲武堂热河分校，但仅有名义，并未正式训练学生。也令吉林省将原吉林陆军军官教练处改为东北讲武堂吉林分校，但吉林当局并未执行，仍保持地方独立性的原陆军军官训练处。

原黑龙江省自办的军官养成所和吉林省自办的陆军军官教练处，因训练的时间少于讲武堂，师资也逊于讲武堂，所以未被认为正式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只能在本省的部队中任职。

二、各期学员、生人数训练时间及主要干部姓名

第一期

第一期是1919年5月开学的，学员均是调训部队团长以下在职行伍出身（即未受正式军官学校教育）的军官，共220名，其中有张学良和他的姐夫鲍育才及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由熙洽任教育长，负教育全责，孙旭昌任总队长，下设4个区队，分为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高展任步兵科区队长，郭希鹏任骑兵科区队长，朱立罕任炮兵科区队长，马龙图任工兵科和辎重科区队长，郭松龄任战术教官，郭尔珍任筑城教员。学习期定为一年半，但只学习一年于1920年4月即行毕业。

第二期

第二期于1920年4月第一期毕业后继续召集的，教育长仍是熙洽，总队长为张厚琬。学员仍是调训部队在职行伍出身团长以下的军官，共356名，分为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编为9个区队，步兵科5个区队，高展、王德印、本得辆、洪大光、张岩奇为区队长，骑兵科一个区队，郭希鹏为区队长，炮兵科一个区队，阎宗周为区队长，工兵科一个区队，马龙图为区队长，辎重科一个区队，陈海涛为区队长。郭松龄、郭尔珍仍为战术和筑城教官，第二期学员于1921年5月毕业。

第三期

第三期于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继续召集的，学员的来源与第二期同，共390名，仍分为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教育长、总队长、区队长，教官等。均是第二期的原班人员未变动。第三期学员于1922年5月毕业。1949年在重庆被蒋介石杀害的黄显声，即是这期毕业的。

第四期

第四期是1922年10月召集的，组织体制和主要领导人以及学员召集办法，均有所改变。在堂长之下增设一监督，由张学良兼任。教育长由肖其煊继任。将原来的9个区队改为3个中队，下辖10个分队，取销总队长一职，增设步、骑、炮、工、辎各科，由资深的中队长兼任术科教官。中队长先后有罗恩凯、戴联玺、杨正治、牛元峰，战术教官有郭松龄、王静轩、何柱国等，学习时间明确规定为一年。第一、二、三期的学员全部是调训部队在职团长以下行伍出身的军官，文化程度较低，很少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对于接受六大教程课有困难，所以在召集第四期学员时，张学良接受郭松龄的建议，在社会上招考一部分中学生，同时还从东三省陆军军士

教导队第一期学员中，考选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学兵110余名，联同从部队调训的在职行伍出身的军官共335名。规定凡由社会上招收的中学生和由教导队考选的学生，毕业后须先到部队当3个月见习军官，然后才能任少尉军官。

第四期干部的质量比前三期好，教育长肖其煊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各中队长和部分教官是聘请在保定陆军学校任教多年的军官，如杨正治、戴联玺、何柱国、毛福成等，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第四期不但学员、生的素质优于前三期，教学质量也优于前三期，第四期学员、生于1923年10月毕业。

第五期

第五期于1923年10月入校，学员、生的来源与第四期同，但从教导队考选的学生中，文化程度有的低于第四期。第五期共有学员、生324名。教育长以下各级干部多为第四期的原班人员，只是将各兵科术科教官改为步、骑、炮、工、辎各科科长。

1924年9月发生第二次奉直战争，第五期临时停课，各学员回原部队参战。在第二次奉直战争结束后，学员于1925年4月回校复课，于当年10月毕业。

第六期

第六期学员是在1926年7月召集的，校名改为东北陆军讲武堂，校址未动。教育长肖其煊因参加郭松龄反奉去职，由朱继光任教育长，原来的干部大多数调到部队当带兵官。将原来的3个中队改为3个队，队长先后为李振彪、刘瑞、王纯章等。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科长为韩世儒、曹秉森、林家训、吴玉琳、单长胜。还增设了六大教程主任教官。

第六期共有学员406名，全是调训部队在职团长以下行

伍出身的军官，其中有部分是以前郭松龄所办的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的学生，文化程度普遍较高。

第六期由于教育长朱继光在1927年初又兼任新成立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教育长，长期在北京主持分校工作，所以本校校务则由工兵科长吴玉琳负责。当年的端午节朱继光在北京西单花园饭店被张作相（吉林省督军）的弟弟张作涛打死后，由张厚琬继任讲武堂本分两校教育长。第六期于1927年6月毕业。

第七期

第七期是在东北军于1926年秋在北京成立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训练的，最初由杨正治任教育长负责筹备，校址在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楼。于当年冬先后在北京和沈阳招考中学生千余名。其中有从东北陆军军官教导队第五期学员中考取约百名。先在张学良（镇威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的军团长）的部队（在北京旃坛寺入伍，称为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军官候补生队，简称入伍生队）。训练的内容是体验学习部队士兵的生活和工作。入伍生队分为两个营，每营辖三个连，营长（第1营长杨林兰、第2营长王秉越）和六个连长（沈景伯、樊光普、赵大中、常恩多、高建勋、夏永佩）都是杨正治从部队选调讲武堂第四、五期毕业的。

入伍生们的训练由部队队长王以哲负责、排长是由部队中调用的，全是教导队毕业的。1927年3月入伍期满，经过甄别考试，共录取918名，正式升入讲武堂第七期。教育长先为朱继光，后为张厚琬，总队长先为林家训，后为王静轩。

第七期分为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编成8个队，第1至第5队为步兵科，共有学生573名，第6队为炮兵科，有学生118名，第7队为工兵科，有学生113名，第8队为

骑兵科和辎重兵科，有学生114名。队长先后为杨林兰、阎克铭、赵有耆、唐忠信、王秉越、金殿荣、金锡珍、高玉堂、高峻岭、刘焕章、佟荣甫、王纯章。

第七期学生按照教育计划应在1928年7月毕业，因北伐军于当年的6月初进至京津附近，张作霖率东北军向关外撤退，第7期学生也仓促跟着撤离北京，回到沈阳讲武堂本校，于当年8月毕业。学生毕业后留校72人（其中有笔者），任下期干部，其余的均分派到部队。按规定在部队先当三个月准尉见习军官，然后方能任少尉军官。

第八期

第八期是1927年9月召集的，学员全是调训部队在职的行伍出身的军官，文化程度与第六期学员相同。因为教育长张厚琬长期在北京分校主持校务，于是本校增设一总队长，由工兵科长吴玉琳升任，本校的校务完全由总队长吴玉琳负责。步、骑、炮3个兵科的科长是韩世儒、曹秉森、郑庭轩，工兵和辎重两科未设科长，改为术科监督，分别由程恒式和林炘担任。将原来的3个队扩编为4个队，由李振彪、穆宝堂、韩梦月、白续良任队长。1928年夏，孙传芳随东北军退到关外，带来两队他所办的金陵军官学校学生（每队120人），将其中学期将满的一个队，拨入讲武堂第八期，编为第5队，由薛式如任队长。5个队共有学员生617名。

第八期前四队的学员，于1928年4月，因东北军与北伐军作战，部队需要干部，临时停课，大部分学员各回原部队参战，工兵科的学员在滦河东岸指挥民夫修筑防御阵地。当年的8月，战事结束，学员又回校复课，于当年的11月毕业。

第九期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张学良统率全部东

北军。当年的 11 月，东北军缩编，被编余的各级军官数千名，将其中具有中学或高小文化程度行伍出身的各级军官 1600 余名，送到讲武堂受训，是为第九期。

1928 年冬，张学良将东北陆军讲武堂改名为“东北讲武堂”，并将东北的各种军事学校，均归并于东北讲武堂之内，在原来的各种研究班和教导队名称之上，冠以东北讲武堂，使东北讲武堂成为东北军的各种军事学校的总称。但各种研究班和教导队的人事经理，仍直辖于张学良的长官部。

从第九期起称为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第九期，由于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扩大，将校址移到沈阳东郊东山咀子营房。

第九期与第十期同时开学，教育长先为鲍文樾，1928 年冬鲍文樾调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警务处长后由周濂继任，校附韩世儒，教育处主任徐传楹。

第九期和第十期均设有总队长，第九期最初称为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第九期第一总队。总队长吴玉琳，全总队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科分为 4 个大队，步兵科 3 个大队，特种兵科 1 个大队，每大队辖 4 个队。共有学员 1875 名，其中有孙传芳带来的金陵军官学校学生 120 名。第九期的大队长是李振彪、关如青、洪大光、林炘。队长有高建员、赵有耆、郭良、赵龙韬等。按照教育计划第九期学员应在 1930 年 6 月毕业，因为张学良准备派大军入关，调解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所谓中原大战，为充实部队干部，令学员提前于 4 月毕业。由于学员的来源不同于第十期（入校时叫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第九期第二总队），故在毕业时，将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第九期第一总队，改为东北讲武堂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期学生是 1928 年末入校的学生的，来源复杂，大部

分是1927年冬按照第七期招生的办法，在沈阳招考的中学生，在沈阳北大营教导队入伍一年，其余是东北学生队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300名，东北陆军模范队的学生约400名，炮兵教导队的学兵约200名。这些学生在招考时，虽规定须具备中学文化程度，但因考试不严，只认名而无像片，有部分是冒名顶替的和从后门进来的，所以高小毕业的也不少。在送到讲武堂以后，经过二三次甄别考试，淘汰了一部分，共录取学生1600余名。分为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编成4个大队，步兵科3个大队，每大队辖4个队，特种兵科1个大队，下辖5个队。

第十期与第九期同时在校，教育长与第九期同，总队长是王静轩，大队长是吴澍滋、孟际衡、周少铭、宋学礼。队长是朱式勤、张景翼、高玉堂、庞家声、王景索、高世禄、王承绪、孟庆典、关超羽、沈景阳、苏正铨、王纯章、刘墨林、张庆第、李述培、刘作柱。

第十期学生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教育后，有少数文化程度太低（不够高小的文化程度）的，接受不了六大教程的课程，于是在1929年冬淘汰了150余名，送到教导队继续学习。

第十期学生按照教育计划，应在1930年6月毕业，因张学良当时不在沈阳，指示将毕业时间推迟，待他回沈后亲自主持毕业典礼，于是延至9月初才毕业。毕业时共有学生1478名，毕业后按规定到部队先当3个月准尉见习官，然后任少尉军官。

第十一期

1930年9月第十期学生毕业后，讲武堂辽宁本校范围缩小，东山咀子营房空出一部分，于是张学良将讲武堂辽宁本校校本部改为东北讲武堂堂本部，将在辽宁省的各种军事学

校，除东北学生队外，均迁到东山咀子营房。当时有高等军学研究班、步兵研究班、步兵教导队、炮兵研究班、炮兵教导队和技术训练班等。张学良除仍兼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外，增设一副监督，由原来的辽宁本校教育长周濂升任讲武堂辽宁本校教育长一职，由新撤销的东北讲武堂教导队教育长王瑞华继任。

讲武堂堂本部设教务、训练、事务3处，教务处处长王静轩，训练处处长高胜岳，事务处处长韩世儒。教务处主管教育计划和学科教育，下设战术、兵器、地形、筑城、交通，军制各教程主任教官。训练处主管术科训练，下设步、骑、炮、工、辎各科科长。事务处主管全堂人事、经理、卫生等事务，下设总务、军需、军医各科科长。至此，东北的各种军事学校，除吉、黑、热三省以外，均集中于一处，并且人事、经理完全直辖于讲武堂本部，这时“东北讲武堂”才名副其实地为东北各种军事学校的总称。

第十一期学员是1930年末召集的。原计划只召集千余名，由于各部队行伍出身的军官，感到没受过讲武堂或其他正式军官学校教育，学识落后，今后难于在部队存在，纷纷要求到讲武堂学习，因此各部队送入第十一期的人，超过原计划一倍。在此之前，吉、江两省送入讲武堂各期学习的人很少，但在召集第十一期时，吉、江两省虽然分别设有陆军军官教练处和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但争取到第十一期受训的人增多，其中还有部分文职人员。经过入学考试，共录取约2000名，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3级，于1931年3月开学。甲级的编为步兵科7个队，骑兵科1个队，炮兵科1个队，工、辎兵科共1个队，共有学员1200名。按照第6、第8期的教育计划进行训练。乙、丙两级的编为步兵3个队，

骑兵1个队，炮兵1个队，共有学员700名。乙、丙两级的学员，增加学习时间半年至一年，除教授军事学术外，并授以初中、高中和高小的文化课程。至“九·一八”事变时，甲级学员完成了教育计划规定课程的一半，乙、丙级学员刚开始学六大教程课。

当年的夏季教育长王瑞华调任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警务处长，由副监督周濂兼任教育长。

“九·一八”事变时，副监督兼教育长周濂置讲武堂学员于不顾，个人化装跑到北京（当时叫北平），学员由教务处长王静轩带到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处。这时锦州以东地区，大部沦陷，为了行动方便，将学员化整为零，到北平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报到。不久，绝大部分学员先后到达北平，于当年的11月间，在北平提前毕业，各回原部队任职。

三、讲武堂对东北军的贡献

从1919年3月成立讲武堂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停办，在13年中共训练11期学员、生8900余名。在第十期学生毕业以后，东北军每连的干部中，至少有二名是讲武堂毕业的，因而提高了部队的质量，增强了战斗力。

在1926年以后，又先后成立了相当于陆军大学的“高等军学研究班”和相当工兵学校的“工兵研究班”，相当于炮兵学校的“炮兵研究班”，相当于步兵学校的“步兵研究班”。调训已在讲武堂毕业的各级军官，进行深造。从1928年夏张学良统率东北军至“九·一八”事变，东北讲武堂是全国最大和最完备的综合性军事学校，受到各方的赞许。“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所成立的陆军步兵学校教育长王俊，在其

筹备期间，曾将东北步兵研究班的全部教育计划和教材要去，作为蓝本。

1928年秋第七期学生毕业时，主管海军的沈鸿烈调去了20余名，作为训练陆战队的主要干部。1930年秋第十期学生毕业时，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成立税警总团，除请张学良从东北军中介绍当总团长的温应星外，又调去第十期毕业生百余名任排、连长。1930年冬成立步兵研究班时，四川刘湘派遣5名军官入第一期学习。刘湘还向第十期送训过学生，曾在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在四川绥靖公署当过参谋处长的万里，就是东北讲武堂第十期步二队的学生。

四、训练的内容及时间

东北讲武堂训练的内容，基本是采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材和训练方式，主要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项，时间各占全部教学时间一半。

学科

学科又分为六大教程，即战术、兵器、地形、筑城、交通、军制，除军制外，全是翻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材。除六大教程外还有典范令，即各兵科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陆军礼节，内务规则，陆军惩罚令等，此外还有卫生学，马学。六大教程占学科全部时间的8/10，典范令占学科全部时间的2/10。

术科

术科又分为基本教练（即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包括阵中勤务）。在第六期以前，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各占术科全部时间的一半。从张厚琬任教育长后，重视战斗教练，将战

斗教练的时间增多，占术科全部时间的 2/3。

五、学员、生的素质和干部的质量

讲武堂各期因学员、生来源的不同，称谓也不同，凡在职军官入学的称“学员”，凡由社会上招考的文学生称“学生”，训练军士的教导队称“学兵”。

学员、生的素质

本文所述的学员、生素质是指文化程度而言。在调训部队在职军官的各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其中仅有少数是中学生，绝大多数是小学文化程度，在第一、二期的学员中，还有部分未读过小学的所谓的老粗。第四、第五期时，曾在社会上招考部分中学生，第六、第八两期学员素质较好，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比第五期以前都好，其中多是郭松龄所办的军官教育班的学生。第七、第十两期学生，名义上是招考的中学生，但真正在中学读过书的（且不说中学毕业）只有半数，其中还有高小未毕业的，特别是由张学良卫队中硬送入第七期的几十人，其中只有一、二人是中学生。

干部的质量

张作霖和张学良对于讲武堂很重视，除兼任堂长、监督外，对于负教育全责的教育长，除个别以外，都是东北军中的佼佼者。第四、五期的教育长肖其煊，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第六、七期的教育长朱继光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和日本骑兵学校毕业的。继他任第六、七、八期教育长的张厚琬，是早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1927 年 8 月在他由张学良亲自送到讲武堂北京分校任教育长时，张学良向我们（第七期的师生）介绍说：“这位是新任讲武堂本分两校的教

育长张厚琬，你知道他是谁的后人吗？他是清末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孙子，是将门之子，曾在讲武堂第二、三期当过总队长，不但有很好的教育经验，并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是文武双全的将军。”张学良很器重他，经常代表张学良到同泽储才馆讲军事课。第九、十两期的教育长鲍文樾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的，曾是张学良任军团长时的参谋长。

讲武堂从第四期起，为了提高教学的质量，更换了一些干部，特别是队职军官，新聘请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教的杨正治、戴联玺、何柱国、毛福成等，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有丰富的教育经验。由于东北军不断扩充，讲武堂的各级队职干部陆续调升到部队带兵，为了补充干部，从第四期起，在毕业的学员、生中，成绩优良将留校任教，如第四期的张政枋、杨林兰、赵秉衡、张景翼等，第六期的许赓杨、魏如微、黄炳寰、郭毅、韦献琛等，第七期留校的学生最多，有 72 人（笔者是其中之一），第八期的富冠英、陈兆麟等。

六、单纯的军事教育，不讲政治

讲武堂的教育只讲军事，没有政治课，没有政工人员。虽然张作霖、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是讲武堂的堂长和监督，他俩即很少到讲武堂来，在讲堂和操场上也很少很少听到干部提到他俩的名字或职称。可见张氏父子最讨厌人家对他们的奉承。

张作霖虽然重视讲武堂，但很少到讲武堂来，仅在个别期的开学或毕业典礼时与学员、生见见面。张学良从第四期兼任监督后，有时到讲武堂视察讲话。特别对第七期，因为

在北京分校，张作霖正在北京当陆海军大元帅，张学良所统率的军队正在关内，又兼第七期不同于前六期，是招考的文学生，所以张学良经常到分校视察讲话，表示特别关心和重视，在1927年秋的一次讲话中，他谈"中国要富强，不受外国人的侵略，首先必须团结统一，现在的分裂割据，自己打自己，是自取灭亡。所以我有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并不一致。"我们学生听到他的讲话后，感到他所说的心里话，令人钦佩。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对讲武堂学生不如对留日学生的重视，例如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人，开始即任上尉，而从文学生考入讲武堂的，毕业后则仅任少尉，二者都由文学生入学的，并且学习的时间也基本相同，只是背景不同（送到日本陆军学校的人都有后台，而考入讲武堂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他有一次对第七期的学生讲话时说："你们毕业后，3年内不能当上尉。"

1930年秋，东北的各种军事学校都集中在沈阳东山咀子营房，第十一期学员是人数最多的，堂本部训练处曾派人到南京中央军校参观过，感到讲武堂不能单纯只讲军事，也得讲讲政治，但是仅学到了喊喊口号，由训练处拟了4句口号在每天早晨点名后，令学员共同喊口号喊了半年东北就沦陷了。口号是："国势衰弱，沦亡在即，我等军人，理应努力，潜心向学，锻炼身体，食民脂膏，誓以身许"。

七、讲武堂的各种研究班

1928年冬张学良将以前各自独立的各种研究班，均归属于东北讲武堂之内，东北讲武堂成为训练高、中、初级军官

的综合性军事学校。关于各种研究班的情形，分述于下：

高等军学研究班

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长时，所辖各军、师司令部，缺乏优秀的参谋人才，乃于1928年2月，决定在北京成立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陆军高等军学研究班，培养高级参谋军官。于当年的3月25日在部队考取具有中学文化并已在国内外军官学校（包括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在职军官56名，于当年的4月1日开学，是为第一期。借用陆军大学空闲的校舍和设备，授以陆军大学学员所学课程。高等军学研究班，由陆军大学教育长李端浩兼任监督，王慎保任班长，除由陆军大学的教官兼任教官外，并聘有日本大佐浦澄江等4人任教官。授课月余后，进行甄别考试，淘汰6名。当年的6月，东北军撤离北京时，由李端浩率领迁至沈阳工业区裕民油房院内，改名为“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简称“高研”。学习时间定为2年，李端浩改为教育长，王慎保改为总队长，不久由高胜岳任总队长。

1928年冬东北缩编后，各级司令部仍缺乏参谋人才。于1929年1月，按照第一期的规定，由部队招考第二期学员50名入学，因第一第二两期时同在校，除教育长，总队长外，又增设教务主任1人（周庄）。训育主任1人（孙遇洪）。教官有宁士毅、苏焕宗、董志杰、蒋希斌等，另有日本教官永重雄、滨本、汤田忠三斋，雄野夫以及入中国籍的白俄多马赛夫斯基。

第一期学员于1930年3月毕业。当年4月招考第三期学员40余名，这期有由吉林、黑龙江和热河驻军考来的学员。当年10月，全班迁至东山咀子营房东院，一切人事经理直辖于东北讲武堂堂本部。当年12月第二期学员毕业。

1931 年 2 月招考第四期学员 40 余名入学，“九·一八”事变时，第三、第四期均在校，事变后高等军学研究班停办，各学员均回原部队。

步兵研究班

步兵研究班是 1930 年 9 月成立的，由杜长龄任教务主任。在此之前，杜长龄曾为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办过步兵研究班，训练了百余名学员，成绩优良，旅长王以哲报告了张学良，于是张学良决定在讲武堂内成立步兵研究班。

步兵研究班以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为样板，每期学习时间定为 1 年，学员必须已在国内外正式军官学校毕业并在部队任职 2 年以上在职的校尉级军官。学习内容，主要有应用战术（师以下的图上战术，现地战术以及沙盘、兵棋）、团以下的实兵指挥和各种步兵器的使用等。第一期于 1931 年 3 月开学，有学员 82 名，其中有四川刘湘送训的 5 名军官。

1931 年 5 月，杜长龄调任张学良的卫队步兵总队第一队队长（相当于团长），由董舜臣继任教务主任。

1931 年 6 月至 8 月还召集一期校官班（仿照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佐官班的训练方式），调训各步兵旅的中校团附（即副团长），学习内容是统一部队的训练计划和部队各级军官的教育内容，并见习正期班学员的实兵指挥。

第一期学员按照计划应在 1932 年 2 月毕业，因“九·一八”事变中途停办。

步兵研究班附设一个步兵教导队，是步兵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用的演习部队，队长马镇夷。下辖 3 个步兵连，1 个机关枪连，1 个步兵炮连（平射炮和迫击炮各两排），1 个通信排。学兵是调训部队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中、下士班长共 650 余名，于 1930 年 12 月入校，“九·一八”事变时是全讲武堂

唯一整队到达北平的部队，受到张学良的嘉奖。学兵于当年12月毕业后，各回原部队。

炮兵研究班

炮兵研究班是以日本陆军炮兵学校为样板调训部队有正式出身的校、尉级军官，是培养中、高级指挥军官的学校，每期学习1年左右，原由炮兵部队自办。从1929年4月，归属于东北讲武堂。当时有学员35名，是为东北讲武堂炮兵研究班第1期，地点在沈阳东陵营房，由吴克仁任教育长，1930年1月毕业，继召第二期学员40余名，当年9月迁至东山咀子营房，于1931年2月毕业，毕业后曾选送部分学员到空军侦察班进修炮空协同作战战术。

1931年3月继续召集第三期学员40余名，其中有东北海军司令部从海军各舰选送的海军初级军官20名，专学炮兵射击技术（因防俄战争失败，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感到单一军种作战落后，必须与陆军协同，所以送海军军官入班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炮兵研究班停办。

炮兵研究班附设一个炮兵教导队，辖加农炮营和山炮，野炮各一连，是炮兵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演习部队，陈昶新任队长。学兵是调训部队的中、下士班长，训练时间与炮兵研究班学员相同，每期与炮兵研究班学员同时开学、同时毕业。

工兵研究班

工兵研究班以日本陆军工兵学校为样板，于1927年成立，由郭尔珍任教育长，地址在沈阳北大营南侧无线电台附近，是培养高、中级工兵指挥官的学校，最初直辖于东北陆军工兵司令部（工兵司令柏桂林）。1928年冬归属于东北讲武堂，称为东北讲武堂工兵研究班。1930年春东北军在沈阳附

近举行一次步、炮、工、空规模较大的联合演习，该班学员指挥防御阵地的编成及修筑和渡河等课目，曾得到好评。1930年9月停办。

技术训练班

技术训练班是1930年12月成立的，由曹玉成任主任，辖两个队，共有学生240名，讲练的内容主要是壁刺和体操，其次是连以下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每期1年毕业。师资多是前北京边防军教导团毕业的，均在讲武堂各期任过教。“九·一八”事变后解散。

军需研究班

1928年冬东北军缩编后，为了培养军需人材，在沈阳草仓胡同原清朝八旗学堂旧址，成立东北讲武堂军需研究班，召集部队编余的年龄在25岁以下，具有中学或高小文化程度的尉级军需240余名进行训练。分为两个连，学习期定为2年。由温润芳和荆有岩先后任教育长。学员于1930年9月毕业，只办一期即行停办。

军医、兽医教育班

1928年冬东北军缩编后，将原来的军医和兽医教育班，拨归东北讲武堂领导，班址在沈阳小北关万寿寺胡同原卫生院，当时有军医和兽医两个班，军医班是调训部队未受过正式医学教育的校、尉级军医，学习期定为一年，兽医班是招考的中学生，学习期定为一年半。军医班每期学员40名左右，至“九·一八”事变时已毕业两期，第三期学员还未毕业。兽医班每期学生约40名，至“九·一八”事变时，只毕业一期，第二期学生还未毕业。

教导队

教导队成立于1922年冬，初名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

地址在沈阳北大营，招考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的高小毕业生，训练半年后毕业，分发到部队当中、下士班长，由张学良兼任队长，第一、二、三期由魏益三任队附，负教育全责。教导队训练的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两项。学科讲授典范令，术科有连以下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等。

第一期有学兵1300余名，分为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于1923年2月毕业。

第二期于1923年4月开学，学兵人数与第一期相同，各连增设了班长，由第一期毕业的学兵担任。第二期学兵于当年10月毕业。

第三期比第一二期扩大了编制，步兵扩编为3个营，每营辖4个连，炮兵也扩编为营，辖两个连，骑、工、辎重3科仍与第一期同。全期共有学兵2000余名，营长为金恩奎、陈殿英、李端浩和李鸿达。第三期学兵于1923年12月开学，于1924年8月毕业。

第四期改名为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于1925年4月开学，学兵人数与第三期相同。队长仍由张学良兼任，王瑞华任队附。营长为黄师岳、韩光第、范先炜、王以哲、吴克仁。第四期学兵于当年11月毕业。

第五期因为调训部队在职行伍出身的中、少尉军官和上士，并有直鲁军的一部军官送训，并招考百余名中学生，所以改称东北陆军军官教导队，共1700余名，分为3个步兵营(每营辖3个步兵连和1个重机枪连)和1个工兵连以及电信连。队长仍由张学良兼任，队附李德言，营长为尚秉垣、韩麟徵、米金波。第五期按照教育计划应在1927年4月毕业，因增编部队需要初级军官，提前于1927年2月毕业。

第六期于1929年1月开学，改名为东北讲武堂教导队。

分为军士班和深造班两级。军士班是调训部队的军士和上等兵，共有学兵1400余名，编为一个总队，辖3个大队，每大队辖4个连。深造班共有学员464名，是1928年冬东北军缩编时编余的行伍出身军官，因为文化低而未能进入讲武堂第九期的，编为1个总队，辖6个队，学习内容，除初级军官应具备的军事学术外，并加授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等。

第六期教导队因隶属于东北讲武堂，将原负教育全责之队附改称教育长，由王瑞华担任。军士班的总队长为曾广麟，所辖的3个大队长先后为薛传善、于宗业、侯松涛、朱逢源。深造班的总队长为刘荫厚。第六期的学员和学兵于1930年1月毕业。教导队撤销，干部拨归讲武堂安置。

宪兵教练处

宪兵教练处是培养宪兵军官和训练宪兵士兵的军事学校，成立于1923年5月，地址在沈阳大东关二道沟江浙会馆胡同，分为军官研究班和士兵补充班两个班。军官研究班和士兵补充班的学习时间为8至10个月。

军官研究班是调训宪兵部队在职的校尉级军官和招考的中学生。士兵补充班是选调陆军各部队优秀上等兵、一等兵和招考的高小毕业生。宪兵司令陈兴亚兼教育长，总队长吴郁文。1929年初改隶于东北讲武堂，仍由陈兴亚兼教育长，吴郁文任总队长。在改隶东北讲武堂以前共训练八期，毕业学员、生和士兵1252名。在改隶东北讲武堂以后至“九·一八”事变，又毕业第九、第十两期学员、生和士兵共209名，在校未毕业的205人。“九·一八”事变后停办。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33辑〕

东三省兵工厂

○ 沈振荣

一、东北兵工厂创办缘起

1916年，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驱逐了奉天督军段芝贵。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袁世凯，忙于称帝无暇顾及，只得授张以镇威将军称号，督理奉天军政事务。

张窃奉权得志，复望吉黑。于丁巳、己未又相继夺权吉黑两省军政大权，统一了东北。但其野心犹未满足，极思乘直皖角逐之机入关，逐鹿中原。欲逞其野心，解决军火来源是当为首要。向外订购军火终非久计，一旦有事，不免受制于人，非自办兵工厂莫解。动机既萌，遂决计改组奉天军械厂为兵工厂。

惟兵工厂地简陋窄小（原在小河沿），不敷应用，必须另寻相当的厂址。1919年春，张偕参谋长乔焕章、实业厅长谈保隍亲到大东边门外东塔农业试验场踏勘，见该场面积约有2700余亩，可资利用。不久即明令宣布，农场停办，基地拨归航空处建筑兵工厂使用；东塔以东约800余亩归航空处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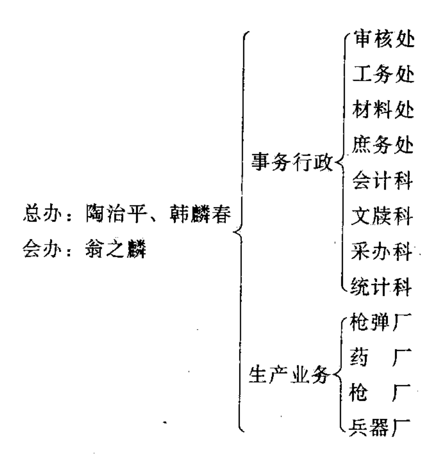
飞机场占用；东塔以西约1800余亩为兵工厂基址。即东至东塔，西至大东边门，南至新开河，北至马路。路南划归市政管理处作为筹建宿舍住宅、公园、俱乐部、兵工医院、学校等用地基既定，旧机构名称，已不能沿用，遂命名为东三省兵工厂（以下简称为兵工厂）。

二、兵工厂的建设和人员概况

兵工厂的建设，大体可分两个时期：1919年8月到1924年，为初建期；1924年后为扩建期。其概况简述如下：

1919年秋，派原奉天省军械厂厂长陶治平负责主持建厂筹备工作。陶奉命后，除利用奉天造币厂房外，另选大东边门外空地，首先成立工程处，建无烟药厂、枪弹厂和枪厂等3个厂及办公处所等。所需机器工具交由文德公司（丹麦）承办。为了加速生产，迅速安装，至1921年始建成。委陶治平为兵工厂总办，到1923年陶去职由韩麟春继任。1924年韩转任他职，遗缺由督军署参议杨宇霆兼任，改称督办（因杨一度曾任江苏督军，资历较高）。杨接任后毅然整顿和扩建。1929年杨被杀，由臧式毅接任，不久，臧调任辽宁省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兵工厂遂被日军占领。

陶治平等筹办兵工厂阶段，生产管理，皆系草创，制度未臻完善。其组织编制列表如下：



工务处
- 制造股
- 机械股
- 建筑股
- 核算股
- 训育股
- 水道股
- 蒸汽所
- 发电所

审核处
- 第一股——主管改良、设计、绘图
- 第二股——主管产品检验造样
- 第三股——主管材料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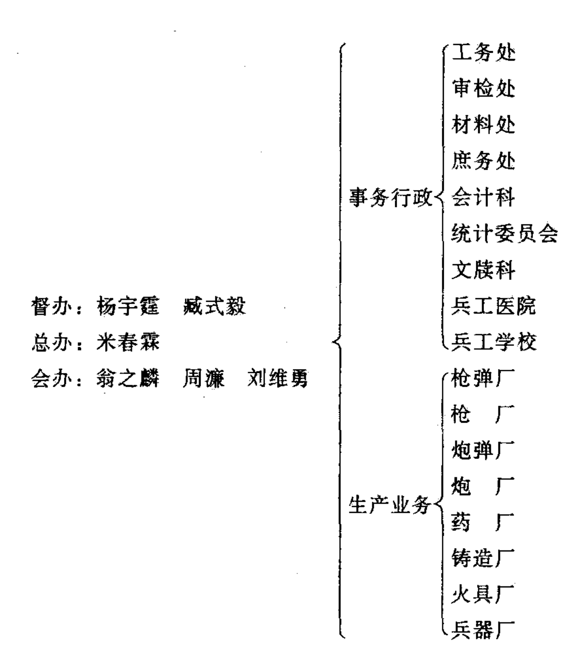
材料处
- 木工所——专制枪托
- 第一股——收发保管材料
- 第二股——采购
- 第三股——核算统计

庶务处
- 第一股
- 第二股
- 第三股——食品贩卖所、粮栈、印刷所
- 稽查所
- 消防队
- 卫生队

各厂大体相同
- 第一股　第一所　第一班
- 制　造　第二所　第二班
- 第二股　第三所
- 事　务　第×所

1923年陶去职韩麟春接任总办后，厂内扩建，规模扩大了，增添新炮弹厂，筹设发电厂。但其职务除新添会办一职外，裁去采办和统计两科办，它的组织编制与初建时基本没有改动。

1924年韩麟春转任副军长职，兵工厂督办一缺由杨宇霆任职。杨任职后又大力扩建，先后添设炮厂、火具厂、铸造厂、制酸厂、木工所，并都增添了设备，达到建厂的最高峰。在管理上也有别于初建时期。计有8厂、4处，以及统计委员会、兵工学校、兵工医院等17个单位。其组织见下表：



东三省兵工厂建厂达13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全厂占地约3200余亩，建设基金达3亿余元（银元），实际还不止此数。据魏朝璋说：枪弹厂第二批机器是买日本的，日金90余万元，以张作霖名义付的款，未走兵工厂账。全厂职员由百余人，增加到千余人，生产工人由300余人，最多增加到25000余人，经常在20000人以上。

三、聘请外籍技术人员

由于建厂、设计、安装需要，势非聘请外籍技师不可。在聘外国技师中有日、德、奥、俄、瑞典等国人。主要负责安装各种机器、设计制造和配件工具样板，以及对技术人员的

指导等工作，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都起过不少作用。但因国际关系成分复杂，因而也常发生过质量事故。试举两例说明：

①炮厂技师哈德曼设计的七生的七的野炮射程，按设计要求应达1万米，而东北炮兵指挥部在营试射时，只达到8500米。哈借口炮弹厂日籍工程师松井常三郎没有按照规定弹型制造，又说当时严冬气温过低，射程难期准确，推诿责任。后来经技术人员调查研究，和从兵器常识推断，始找到其中原因：七生的七的野炮原系奥国第一次大战时的武器，它的射程为1万米，初速为500米，膛压加到3200气压，显已改变了原来的设计。火炮射程的远近，初速是一个决定因素，哈德曼竟将膛压加高缩小初速。膛压加大，遂达不到标准射程。他轻视厂中无人懂得规定，只要打响了就行。这是国际关系无信义的十足表现。

②枪弹厂技士天也信一（日籍），是枪弹厂扩建时入厂的。据魏朝璋了解，"九·一八"事变时，就是天也信一带领日军进入兵工厂的。此人纯属日本打入的间谍，由于缺乏警惕，实可痛心。

③东三省兵工厂外籍顾问技术人员表

服务单位	职别	姓名	国籍	出　身
全　厂	顾问	白兴	奥国	奥国格兰斯工科大学毕业
审检处	技师	李傅士	瑞典	瑞典三家工科大学毕业
枪弹厂	技师	章克稼	德国	德国柏林工科专门学校毕业
枪　厂	技师	佐藤勇之助	日本	日本士官及炮工学校毕业
炮弹厂	技师	松井常三郎	日本	日本士官及炮工学校毕业
炮　厂	技师	哈德曼	奥国	奥国陆军工程师、奥京工科大学毕业
药　厂	技师	顾必克	德国	德国兵工厂化学工厂工程师
药　厂	技师	明石东次郎	日本	日本炮兵学校毕业

服务单位	职别	姓名	国籍	出　　身
炮　厂	技师	山内善太郎	日本	日本陆军工科学校毕业
铸造厂	技师	聂维斯克	俄国	莫斯科工科学校、米尔斯勒炮兵大学毕业
枪弹厂	技士	天也信一	日本	日本大坂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
枪弹厂	技士	平木政次	日本	日本陆军工科学校毕业
炮弹厂	技士	中原寺一翁	日本	日本大坂高等工业机械科毕业
炮弹厂	技士	祝仙三郎	日本	日本大坂府东云学校毕业
炮弹厂	技士	北条纪太郎	日本	日本大坂中三岛工业学校毕业
炮　厂	技士	罗竞太	奥国	奥国京城工科学校毕业
炮　厂	技士	松坂善兵卫	日本	日本陆军工科学校毕业
药　厂	技士	拉力果夫	俄国	俄国米海斯勒炮兵大学毕业
药　厂	技士	毕得罗斯克	俄国	俄国陆军中等学校毕业
药　厂	技士	余斯达阁夫	俄国	俄国陆军中等学校毕业

四、机器设备概况

全厂动力设备：有发电所、蒸汽所、水道所。其水电安装有新型大锅炉（铸造厂自造的）蓄水库滤水池，足供各厂生产单位使用，以及事务行政各处科等办公的需要。电力方面：有发电机共3部，除供应各厂外，尚有剩余售与电灯厂供应市区大小东关一带民用。这3个系统隶属工务处领导，各单位需用的水、电费用，均按原材料作价加入成品内核算，符合成本会计制度。尚有专门制做枪托的木工可供应枪厂使用，隶属材料处领导。铸造厂的出品是供业务生产的7个厂需要。药厂出品是供应其中枪弹、炮弹、火具3个厂。设备完全机械化自动化。各种各式的大型机器制造复杂灵活、工序连锁衔接（一条龙）均系特殊专用装备。例如：枪弹厂设备是1919年秋由沪（上海）、德县兵工厂借用技术人员吴伯琴向上海兵工厂定购制造的。时厂址尚未勘定，机器运到沈阳，乃先假

中央造币厂2部作厂房，进行安装。至1920年4月1日正式开工制出成品，日产1万发，达到机器最高能力。1922年，东塔一部分新厂房建成，又由日本购到日产10万发机器，雇用日籍工人10名，代为安装试车，出品后，由老厂技工接收，投入生产。1924年扩建厂房，再向德国订购一部制造七九尖弹机器，生产能力较高，可日产10万发以上。制造工序：可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熔铜碾片，初用砖砌地炉，产量甚低。后改用电炉、超额生产，足敷六五、七九两部应用。第二步铜壳工作，由舂盂、引长、压底车口收口钻孔等等，铜弹工作，由舂盂，引长，舂尖装铅心、包边、平底等等。第三步：装药装弹，即达最后完成。工作过程，自始至终无一不用机器。此种设备，既完善又最新，其准确性能，亦细致精密，非片言所能详尽。全部安装完毕，枪弹产量可达日产30万发。药厂装备由借调员工叶禾主任等来沈设计，制造机械化以化学工作为主体，机械化操作为副，出产无烟火药、安装炸药、黄色炸药等。枪厂设备：亦由借调员工王兰生厂长主持规划。至于炮厂、炮弹厂、铸造厂等，都是大型最新的装备，如钢材纵断、切削、车光旋膛，装配零件等操作过程，完全机械化、自动化。炮厂尚有制造十生的五大口径大炮的机器，尚未安装完成。火具厂仅制造电管、信管设备比较简单。铸造厂添设炼钢熔炉，中级钢料已能自制；其他普通工具，如车床、刨床、铣床、钻盘、钳台等均能制造，即复杂的机器亦能仿制，小型工具如样板桩模配件，各厂均有制造所，随时可以制造补充，无须外购。全厂装备，综合大小机器约计在万台以上，可谓应有尽有，种类齐全。

五、生产制造能力及作用

枪弹厂的生产能力，大概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1920年4月至1923年12月，六五、七九步枪弹由日产1万发，扩充到10万发。第二期1924年，日产15万发。第三期1925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止，日产30万发。第二期比第一期年产300万发，增长15倍。第三期年产9000万发，比第一期增长30倍（一年365天，除星期、节假例外，按300工作日计算）。炮厂制造能力，能制造3生的7的日式平射炮，7生的5的日式野炮及炮车，7生的7的奥式野炮，10生的的奥式榴弹炮，15生的的日式榴弹炮，以及24生的的日式榴弹炮等。炮弹厂出产品种如13式及克氏7生的5的山野炮钢性铣榴弹，15生的的榴弹炮钢性铣榴弹及穿甲弹、7生的7的山野炮钢性榴弹。枪厂制造品种如13式七九米厘口径，17式六米厘五口径和13式七米厘九重机枪等。枪弹厂制造品种如六五和七九枪弹等。药厂制造品种，如无烟火药、安全炸药、黄色炸药等。酸类如硫酸、硝酸和以脱等。铸造厂制造能力，如工作母机，修理机关车等。

产品种类和生产能力列表如下：

品种	名称	数(每月)量	附注
枪类	13式7.9mm口径步枪 17式6.5mm口径轻机枪 13式7.9mm口径重机枪	400到4000支 每月高产量40挺 每月高产100挺	最初每月产400支后增到4000支，所谓一三式一七式系指民国13年和17年开始制造的式样。

品种	名称	数(每月)量	附注
炮类	3.7cm 日式平射炮 7.5cm 日式野炮 7.5cm 日式山炮 7.5cm 克氏山炮 7.5cm 日式高射炮 7.5cm 日式追射炮 7.7cm 奥式野炮 10cm 奥式榴弹炮 10.5cm 日式加浓炮 15cm 日式榴弹炮 24cm 日式榴弹炮	370 门 108 门 72 门 1 门 4 门 11 门 300 门 300 门 12 门 21 门 2 门	民国 13 年至"九·一八"事变共造数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炮	13 式克氏 45cm 山野炮钢性铣榴 150cm 榴弹炮钢性铣榴及破甲弹 30cm 平射炮钢性榴弹		于民国 12 年各开始制造 13 年出品，初制钢性铣榴弹作改钢质榴弹，因同时制种类很多，且以口径与工作难易不同故每月产量颇难决定。
弹类	克氏 7.5cm 钢性榴弹 7.5cm 山野炮榴霰弹及燃烧弹 10.5cm 加浓炮钢性铣榴弹 10cm 榴弹炮钢性榴弹 7.7cm 山野炮钢性榴弹		自制钢性榴弹后，因力求增加产量，对于钢性铣榴弹日渐减少
枪弹类	6.5mm 枪弹 7.9mm 枚弹	9000000 粒到 15000000 粒	扩建后最初每月产量 9000000 粒到最后月产量 15000000 粒
火药类	无烟火药 安全火药(TNT) 黄色炸药	2 吨到 24 吨 12 吨到 120 吨 3 吨到 30 吨	民11年到20年最初每月产 2 吨后每月增产 24 吨 同　上
酸类	硫　酸 硝　酸	100 吨到 300 吨 100 吨到 250 吨	民 15 年到 20 年最初每月 100 吨后增至 300 吨 同　上
依脱	依　脱	30 吨到 50 吨	同　上
机器	工作母机 修理机关车	每月产 10 部 每月修 3 台	

根据上表来看，东三省兵工厂从成立到“九·一八”事变止，确实生产了大量的军火武器，都是国内其他各厂所未生产过的品种，这虽然是个创举，但确消耗了大量资金，而且助长了奉军入关的气焰。

据后期会计科长肖正卿说，该厂每月生产费用除职工工薪50万元左右外，其他购料成本经常费用150万元左右，而基建设备费还不在内。

枪械子弹生产的多寡，对军事行动也颇有影响。1923年前，每月生产枪弹炮弹数量不大，对于内战尚无鼓动作用。从1924年到1929年间兵工厂扩建高潮时，也是二次直奉战和中原混战炽烈时期，也是生产量最高时期，枪弹日产30万发尚不敷应用，至扩大到日产40万发。奉军入关混战，军火供应多仰赖兵工厂制造，可见东三省兵工厂对鼓动内战发挥了很大作用。适张学良于1928年子继父业，力主阻兵，倡导和平统一，虽有冯阎之争，奉军入关，主和平解决，未用武力，故该厂也就不再发生作用。

六、发展兵工厂的主要措施

1. 用人唯“专”不怕花钱：张作霖于民国11年（1922年）督奉取得政权后，一心一意要巩固政权和扩展地盘，首先创办了兵工厂，当民国13年，奉省政治、财政稍有好转时，就派杨宇霆充兵工厂督办，他在扩展兵工厂方面不遗余力，从不受兵工预算限制。杨同时又是督军署总参议，代拆代行，对兵工厂想怎样扩充，就怎样办，花钱多少，在所不计。为此竟把王永江气走了（时王永江主财政兼省长）。而张作霖对杨宇霆扩建计划并未稍加阻止，反而倍加鼓励，这不能不说张

氏对建厂用人之专。在此之先，1923年，韩麟春任总办去沪洽办厂务的时候，某日晚间打来电话，张直接传见药厂负责人叶禾和枪弹厂负责人吴伯琴，当面鼓励他们好好干，并当场开给他们二人各5万元支票。此款他们未敢擅自动用。当时存到大西门里世合公钱号，杨氏就任兵工厂督办时，他们才把此款取献。这说明了张作霖之所以逞其志者，一是专，二是赏，不过这种专赏是为逞其军阀争夺地盘实现个人野心而已。

2. 培养技术人员：我国当时无有专门培养兵工人员的技术学校，为了培养技工和技术人才，设立了兵工学校。学员分为初中、高中、专门3部，采三三制，初中毕业后派到厂充任三等技手服务3年。高中毕业，派厂为练习生，可升一等技手。专门部毕业等于大学毕业，任一等技手或技士。此外，还加强科学研究活动。民国17年成立了科学研究会，各厂厂长和技师、技士都为当然委员，每星期集会一二次，视为俱乐部。自杨氏改革后，派药厂厂长洪中为会长，各厂厂长技师技士等为委员，集中人才研究兵工和兵工有关的科学技术，介绍各国学术上的新发明和尖端技术经验等，以增进会员研究兴趣，收到改进技术之效。例如铸造厂对于枪筒钢，从前向由外国进口，初炼失败后，改由电炉试炼，经过几十次的反复试炼，终于成功，经检验钢的质量和化学物理性能，均合乎标准。从此，枪筒钢就由厂内供应了。此后，不仅枪筒钢，炮筒钢也逐渐开始试制。如10.5生的口径炮钢正在试制时，因“九·一八”事变而中止。人事方面，掌握技术的中国人逐渐增多了。如枪厂厂长汪寿康，枪弹厂厂长魏朝璋，炮厂厂长王国香，药厂厂长洪中……等。并未由于外籍技师减少在技术方面停止不前，反有相当的进步。此系自力更生

培养技术人员的结果。

3. 调济材料来源：制造枪炮火药，主要原料有枪炮身钢，紫铜、白铅、镍、硝石、硫磺、生铁、煤等。从前，国内供应不足，多向欧洲、日本购买。英德奥远隔重洋，运输稽延时日，长途运输，成本又高，故多购自日本。唯有炮身钢，规格要求严，多购自德国克虏伯钢厂，硝石多购自智利。生铁来自本溪煤铁公司，煤来自日本控制的千金寨。

后来，由于核算成本，又考虑材料来源受控制，决定采取措施。如燃料用煤，千金寨煤质固佳，火力亦强，虽系我国矿产，但为日本把持。遂改用西安八大壕煤矿产品来代替。生铁也有同样情形，后改由大冶铁矿供应。枪厂使用的枪身钢亦系大宗原料，起初铸造厂仅能炼制炭素钢，几经数十次反复试炼，最后试炼出合乎规格标准的材料。枪身钢既改由铸造厂供应。至于锋钢工具钢和高速合金钢等，铸造厂也进行了研究试制。药厂应用的硝石、硫磺，亦改变方针，采购国内河北山西各省提炼的产品。惟枪弹炮弹两厂需用的大宗紫铜白铝和镍用量甚大，尚无代替办法。后利用该两厂剩余的下脚料，铜末，铜屑，亦有相当的数量。收集起来，熔化再生复制亦是很好的废物利用的办法。提炼后，尚有余裕，分销商场。

4. 技术革新：

A 1922 年韩麟春就任总办时，因他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历任军职多年，对于武器构造，颇感兴趣，时思有所改革，任职间，研究七九步枪零件将枪机上加一大盖试制成功，既能防尘，射程又准确，火力更属优良。因此将韩麟春革新的步枪简称“韩氏七九步枪”。俗称“韩麟春造”。这是建厂后第一次技术革新。

B　枪弹厂改装电炉熔钢，加速碾片工作，使第一段工序与第二段工序配合连接。

C　六五、七九枪弹，原系仿日德两国制造，但内装药初速压力不足，初制未合规格，不能用于轻重机枪连续发射，经研究改正钢壳弹头公差后，亦能用于轻重机枪连续发射，不出障碍，此后机、步枪子弹均可通用。

D　铸造厂炼制中等钢材——合金钢，初炼时因渗钞调质不匀，淬火未能合度，结果失败，屡经挫折后，提高淬火技术，加强化学物理调质研究，制出样品，审检处用引伸拉力机纵断，检视断面，经再检查，质力均匀精细合格，锰钞融合不见晶粒，已能符合枪身钢规格要求。由于钢炼制成功，解决了一向必须向外国厂采购的困难，并降低成本 10%以上。

E　对他如炮和各种机关枪等，最初仅能修理，后即依照日本式 6.5 机枪，均能按厂的规格生产。制炮方面首先仿制日本式 7.5 生的山野炮，3.7 生的平射炮，1.5 生的榴弹炮，10.5 生的加浓炮，均能在短期内试制成功。继又仿制奥式 7.7 生的野炮，一切性能均优于日式 7.5 生的野炮，它的威力大，射程远，炮架固定方便，仰角不必掘坑，即可达到 45°（日式 7.5 生的野炮仰角 17°如再加高即须掘坑）。奥式 10 生的榴弹炮，亦较日式为佳。制造奥式所用机器工具及工作方法，均比日式精密灵便。大口径 24 生的榴弹炮正在试制，尚未完成，因“九·一八”事变中止。炮弹方面：为了急需，开始要求工作简便迅速，首制钢榴弹，但因该项钢坯，系委托沈阳市大连机械会社代铸，运交殊多不便，以后即由铸造厂制造，工作正常后，又增造钢质榴弹和榴霰弹，以后又曾制 24 生的钢质榴弹。引信方面：制着发引信，瞬发引信，复动引信，并

研究机械引信（未完成）。炸药制造：无烟火药，黄色炸药等。

七、清 理 整 顿

1929年，兵工厂曾面临一度极其严重的难关。杨宇霆被杀，厂方积欠材料价款600万元未付，中外商人惴惴不安，逐日组织索款团包围督、总、会办公室，坐索不去，各厂又因材料不能按时买进，停工待料，业务几陷瘫痪状态。员工莫知底细，群情惶惑，讹言朋兴。工厂上层多为杨氏引用，尤为不安，甚至有避匿不敢露面者，事务行政亦诸多停顿。张学良为安定人心计，首先安排人事，健全组织，然后再进行整理业务。当时应该提前解决的问题，对清付材料价款一事，最感棘手。库空如洗，不清还价款，兵工厂行政不能推动，清还，库款奇拙，无法应付，变通办法，只有向金库国家银行透支，惟须担负银行透支利息。张认为杨在任时期经手人订购材料难免有不实不尽之处，拟先从事审查核减，而后清付。以减付之款，偿还透支银行利息或可相抵，议定后即将这任务交材料处处长沈振荣、会计科科长肖正卿去执行。（杨被杀后，张派沈振荣、马炳南、肖正卿等清查兵工厂，以后又加委沈、马、肖三人为该厂材料处、庶务所、会计科处科长）通过盘点清理，原材料清理还欠，商人认可者即与审查，价高者与以核减，中国商人均无异议，惟外商坚拒不受审查，时兵工厂注册外商日、德、奥、英、瑞典等国均有，其中日商尤属多数，他们纠集外商，一面声言兵工厂须履行合同，少付一文也不认可，一面鼓动各国驻奉领事馆出来为他们撑腰，催付欠款。函电交驰，声势汹汹。臧式毅督办觉得难以应付，委我处理。次日各国商人即蜂拥材料处来索款，经我分析情

况，详加开导说明，各国外商觉得如果再坚持下去，闹成僵局，价款得不到手，外汇日涨，将来会计科即是有现款照数清还，亦得不偿失，始同意和中国商人同样办理。当日分3组审查核减完毕，各商签字散去，事毕总计核减120万元，由此足证该厂当时经手人有回扣之说可以确信无疑。此后，再购材料完全采取公开投算办法，会同各用料单位标明规格，不得指定各国工厂名牌，以免为外商把持，由是各厂生产恢复常态。库房原材料盘查工作，经历18个月之久，雇用临时壮工过磅整理，仅工资一项，即耗费2万多元，旧任人员，设清理股，清理盘点核对账簿表册亦费一年多的时间，方使清理就绪，可见各厂储备的原材料，浩如山海，盘存结果，发现历年堆积下来的呆滞原料数量颇巨，整理后，列表通知各厂需要单位，可尽先划拨应用，不再采购，各厂备料有许多可以通用，即持续供应，一时不再采买，业务也从此顺利开展。其他生产有出路可以扩展的，也就着手试办。1930年在沈阳大西关设立东升源售品处，凡属工厂或民用的五金材料，锅炉暖气片，水泵机器，工具家具等等，均可通过东生源向兵工厂订购，同时由铸品厂，木工所制出样品目录，陈列该处，以备顾客选购。开幕之日，各界参观者，均极表欢迎。出品多利用厂下脚料制造，以便减少成本费。如无缝钢管，用枪弹厂弹壳下脚料，家俱用木工所下脚料（枪托木），余可类推。当时尚有建议兵工厂可以改为民用工厂，如制造汽车、拖拉机等。经张学良将军派王卓然等出国考查，未及实现而"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但兵工厂全部被夺，库存大量武器也为日本所占有，计有各种步枪9.5万余支，各种机枪2500余挺，手枪2600余支，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弹1.8亿余发，各种炮弹50余万发。还有军用物资甚多。总计价值32996

万余元。由于蒋介石卖国不抵抗政策，使办厂12年资敌于一旦。

1929年，杨宇霆被杀后，张学良决心把兵工厂改为民用工厂，制造汽车和拖拉机，彼时社会心理崇拜英美，张学良也不例外，经研究认为拟请外国技师来帮助改造事项，当时正赶上张派吴琨（张作霖在北京主政时外交次长）、赵铨、沈迪家去欧美考查实业，兼宣传日本侵略东北情形，实际上就是拿东北的钱到外国逛逛而已。张乃又增派王卓然、叶弼亮两人，专门接洽外国专家来改建东三省兵工厂事宜。王叶两人于1929年2月初经西伯利亚铁路先到欧洲，于6月去美国，在纽约经人介绍一个美国工程公司斯通与阜伯斯特订了一份合同，约定该公司派技师先到厂进行研究和改造设计，经张核准后，该公司有优先投标权，这个草约经张复电同意，王与叶八月回到东北，向张报告，张乃开一名单，临时设一个“东北经济委员会”，以当时省长臧式毅（前兵工厂督办）为主任委员，还有财政厅长实业厅长和有关厅长为委员，王与叶也包括在内，美国工程公司派一名技师胡欣来兵工厂，委员会也开过几次会。是年九月，因中东路问题与苏联开战，和议后，又有石友三之叛变，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个兵工厂未得改造即被日人夺去。张学良虽存心改革兵工厂，但他的理想等于画饼终未实现。

“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兵工厂被日本占领损失如表：

品　种	数　量	品　种	数　量
13式65机关枪	48挺	30年式　马枪	197支
沪造79手提机枪	1挺	79套筒枪	196支
大沽造马克沁79机枪	14挺	79单筒步枪	9932支
79手提式机枪	20挺	79长筒新式步枪	1568支

品　　种	数　量	品　　种	数　量
丹麦式机枪	5 挺	79 短筒新式步枪	7932 支
俄式仿马克沁 79 机枪	1 挺	13 式 79 步枪	72679 支
11 年式机枪	11 挺	79 毛瑟马枪	200 支
骑兵机关枪	55 挺	连珠步枪	1000 支
手提式机关枪	1 挺	68 毛瑟步枪	284 支
新式机关枪	2 挺	意造 65 步枪	120 支
呢鸦式机关枪	1 挺	8 米厘曼利页马枪	102 支
79 捷克式机枪	2000 挺	79 曼利夏步枪	146 支
伯尔格罗机关枪	412 挺	10 响毛瑟步枪	144 支
38 式步枪	2500 支	单响毛瑟步枪	67 支
38 式马枪	45 支	斯边谢尔马枪	323 支
17 式机关枪	153 支	来福枪	1150 支
20 式步枪	900 支	洋台枪	7 支
79 捷克式马枪	450 支	7.5 生的 31 式射山炮	12 门
自来得手枪	350 支	6 年式 7.5 生的山炮	4 门
8 音手枪	1516 支	7.5 生的汉口造 10 式退山炮	1 门
唯布列手枪	2 支	沪造 7.5 生的山炮	38 门
7 音手枪	500 支	江西造 7.5 生的山炮	2 门
6 响手枪	214 支	乙字迫击炮	1 门
5 音手枪	16 支	法造 7.5 生的山炮	1 门
13 式 3 生的七平射炮	189 门	克鲁伯 7.5 生的山炮	1 门
13 式 75 野炮	13 门	负克斯 7.5 生的山炮	1 门
38 式 0.5 生的野炮	55 门	格鲁森 5.7 生的山炮	15 门
3 生的 7 金陵造山炮	8 门	湖北造 5.7 生的山炮	17 门
14 式 7 生的野炮	147 门	3.7 生的格轮式山炮	6 门
4.7 生的江南造退山炮	7 门	俄式 7.5 生的山炮	31 门
10 生的克氏加浓野炮	2 门	金陵造 7.5 生的山炮	2 门
7 生的 31 年式速射野炮	21 门	丙字迫击炮	1 门
7.5 生的光绪二十九年造野炮	15 门	迫击炮	24 门
克鲁伯 7.5 生的野炮	2 门	丁字迫击炮	1 门
俄式 7.7 生的野炮	13 门	5.7 生的克鲁森野炮	10 门
克鲁伯 7.5 生的野炮	11 门	65 机关枪弹	9489746 粒
意国造野炮	17 门	79 机关枪弹	9511931 粒

品　　种	数　量	品　　种	数　量
自来得机关枪弹	4423 粒	单响毛瑟枪弹	120500 粒
79 机关枪弹	1269349 粒	唯布列手枪弹	31441 粒
丹麦式机关枪弹	407916 粒	8 音手枪弹	241759 粒
303 机关枪弹	1553290 粒	7 音响手枪弹	370444 粒
骑兵机关枪弹	1540 粒	6 响手枪弹	847 粒
手提机关枪弹	71515 粒	5 响手枪弹	910 粒
汤木森机关枪弹	26050 粒	自动养枪弹	11820 粒
65 轻机关枪弹	416630 粒	小 6 响手枪弹	17740 粒
79 新式尖枪弹	105218024 粒	3 号 8 音手枪弹	1600 粒
79 旧式尖枪弹	3569057 粒	小 5 风手枪弹	485 粒
79 元式枪弹	16776021 粒	大 6 响手枪弹	22420 粒
79 燃烧枪弹	780050 粒	甩轮 6 响手枪弹	14420 粒
77 连珠枪弹	9019824 粒	13 式 7.5 生的野炮榴弹	51240 粒
68 毛瑟枪弹	1351552 粒	13 式 3.7 生的平射炮弹	210621 粒
意造 65 枪弹	1902550 粒	13 式 7.5 生的榴霰弹	7850 粒
8 米厘曼德夏枪弹	85500 粒	意造 7.5 生的野炮榴弹	7400 粒
6.5 米厘曼德夏枪弹	1744375 粒	乙生的高射炮榴弹	5010 粒
6.5 日造枪弹	45088 粒	8 米厘块利夏炮弹	1600 粒
10 响轻毛瑟枪弹	27 粒	65 阻击炮弹	2100 粒
哈制开斯枪铝弹	162724 粒	格鲁森 5 生的榴弹	2231 粒
门板兰枪铝弹	13758 粒	格鲁森 5 生的榴霰弹	1198 粒
抬枪子弹	2233 粒	晋造 7.5 生的山炮大炸榴弹	150 粒
自来得手枪弹	4032356 粒	12 生的重炮榴弹	70 粒
14 式 15 生的重炮榴弹	5716 粒	沪造 7.5 生的克氏野炮	2500 粒
14 式 15 生的重炮破甲弹	2178 粒	14 式高射炮榴弹	915 粒
14 式 7.5 生的野炮榴弹	126630 粒	乙字燃烧迫击炮弹	1478 粒
14 式 7.5 生的山炮榴弹	42178 粒	丙字燃烧迫击炮弹	162 粒
14 式山炮榴霰弹	18527 粒	7.5 生的化学炮弹	2690 粒
10 生的轻榴弹	1200 粒	7.5 生的化学炮头	18998 粒
克氏 7.5 生的野炮弹	10091 粒	乙字化学迫击炮弹	730 粒
克氏 7.5 生的野炮榴霰弹	760 粒	丙字化学迫击炮弹	1386 粒
克氏 7.5 生的野炮大炸力弹	126 粒	丁字化学迫击炮弹	100 粒
克氏 7.5 生的山炮榴霰弹	484 粒	晋造手榴炸弹	1349 粒

品　种	数　量	品　种	数　量
克氏 7.5 生的山炮榴弹	14315 粒	50 磅地雷	18 粒
克氏 7.5 生的野炮大炸力弹	76 粒	1 号地雷	11 粒
俄式 7.7 生的山炮榴弹	212 粒	2 号地雷	377 粒
俄式 7.7 生的野炮榴弹	150 粒	3 号地雷	334 粒
俄式 7.7 生的野炮大炸力弹	163 粒	4 号地雷	45 粒
沪造 7.5 生的山炮榴弹	1186 粒	俄式手榴弹	120 粒
15 式手榴炸弹	497847 粒	地雷手榴弹值洋	1356672 元
飞机燃烧炸弹	5516 粒	各种火药值洋	1100000 元
飞机掷下弹	6378 粒	各种机器及工具值洋	140000000 元
68 磅飞机烧弹	116 粒	各种建筑物值洋	100000000 元
各种火药	440000 元	各厂办公器具值洋	100000 元
马步、炮手枪机枪值洋	4108975 元	库存各种材料值洋	12000000 元
各种枪弹值洋	18166321 元	各厂房半成品材料值洋	12000000 元
各种炮位值洋	16254020 元	库存款类及银行存款	80000 元
各种炮弹值洋	18976306 元	总计约值洋	329962294 元

注：以上损失概况表详载陈觉《国难痛史》第一卷 57—59 页。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 8 辑〕

辽宁陆军粮秣厂事略

○ 温滋泉

辽宁陆军粮秣厂只有10年的历史。在这10年中，我做了最后一任厂长。对该厂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幸有在这个厂成立时，即在那里工作的郭英年同志提供了不少资料，内容得以充实，特致谢意。现将该厂情况简忆如下：

奉军军需制度的改革

奉军的军需（后勤）制度改革较早，包括粮秣厂工作在内的军需业务也较先进。这都是借鉴于日本陆军经理（军需）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它所以采用日本陆军经理制度实有其根本原因的。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东北军事当局总结这次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除某些客观因素外，主要是各部队的军官佐大多是不学无术，固步自封，不懂现代军事的庸人。他们任人唯亲，极端轻视军事专业人才，特别是军需人员。如果他不是主官（旅、团、营长）的称之为“三爷”（姥爷、舅爷、姑爷）的人，就别想染指军需。因为军需是掌握部队的财物

大权的人。任用非裙带关系的人，则不便于主官的贪污。贪污的办法，主要是吃空额饷。或在军事开支上弄虚作假，以少报多，上级批准了，即将多报的款项纳入自己腰包。这都是主管发财之道，怎能让陌生人去插手呢？在军官方面多是没有军事专业知识的人。他们在平时愚而好自用，在战时又任意瞎指挥。他们总结这次战争的失败，归结为军事专业人才太少。

张作霖为了再度进关，复仇雪耻，曾千方百计地加强军事，整军备战。1922 年下半年，在沈阳成立了陆军整理处，以吉林督军孙烈臣为总监，韩麟春、姜登选为副监，并请张学良任参谋长。还宴请各种高级专业人员，如姜登选、林震青，赵全兴等人，分别成立了训练、军事学识研究、军医、军需业务的改进等科组，并分别做出计划，逐步实施。

陆军整理处的工作得到了张学良、郭松龄二旅长的赞助，凡经该处钻研的成果，认为可行的即由三、八两旅首先试行，有效后再到其他各部队推广。因这两旅整编后的军官佐，大多是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容易接受新事务，边整理，边试行，收效很大。

林震青是由日本东京陆军经理学校高级班毕业的留学生，曾在北京军需学校当过教官。赵全兴是林的得意高足，曾毕业于北京军需学校第二期学生班。林在赵的帮助下，对奉军旧有的军需制度参照日本陆军的经理法规，大加改革，形成新的体系。按新的军需制度规定，凡各师或独立旅军需人员的任免均须由督军署军需处去审核推荐，由督军署的命令发表之，使之军需另成一系统，以免各部队任用私人，并决定以团为一个经理单位，军需集体办公。原来是步兵每团 3 营，每营设一上尉军需，团部设一少校军需官，分别在团部

和各营部办公。现在改为各营军需集中在团部，由一少校军需官领导。下设上、中、少尉军需各一员，同各连直接联系，营部则不设军需了。这是仿照日本陆军经理制度改进的，既加强了人力，又节约了经费，一举两得，当时称之为“军需独立”。

为适应军需改革的需要还计划成立粮秣厂，实行粮饷分开。粮秣以供给现品为原则，柴、菜则发给代金；士兵饷项由上级派人到部队实行点名发放，杜绝中饱流弊。这也鉴于奉军在过去援湘、援陕时，部队虽不多，但因筹办粮秣困难，影响军事。尤其是直皖战争时，奉军进关人数较多，粮秣得不到及时供应，这些都是所以要建立粮秣厂的基本原因。

辽宁陆军粮秣厂的诞生

1923年间，奉军当局根据陆军整理处的计划，在沈阳小东边门里，成立了奉天陆军粮秣厂，任命王大中（字仲樵）为总办，兼办奉天被服厂事宜。并以葆康（字健之）为会办，协助总办，处理粮秣厂日常业务。王大中曾留学日本，东京陆军经理学校高级班毕业，他和葆康均是少将军衔。当时叫奉天陆军粮秣厂。

1. 厂内组织：设总会办公室，以下有总务、粮秣、补给、检验4科。科长都是上校级。还设有上校级总稽核1人，有如参谋长。各科按业务情况设股。股长为上尉或少校军衔。还在厂内设一碾米厂，当时用畜力湿碾秫米（高粱米），以供给当地驻军领用。碾米厂设一少校主任负责，还有办事员几人，办理业务。

本厂成立不久，奉军为了加强战备，便于军事行动，还

计划预制能携带的食品。因此在厂前空地又兴建了饼干和罐头厂，以及蒸米车间。饼干厂主任先是夏某，事由刘殿襄负责。具体制造则由监工员张文华领导。罐头厂是由技师潘某负责设计、领导和制造的。张思玉主任领导蒸米车间生产。但因生产时间不长，产品不多，在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时即已停产了。各厂产品均交由总仓库收存。除牛肉罐头生产很少不计外，饼干、蒸米的月生产能力可供应全省军队半个月的用量。饼干每小包10片，重半斤。蒸米每袋7两，都是每人每餐的定量。这些东西携带方便，有利于军事行动。但以后没继续生产。

2. 厂外机构：总仓库和军草场均设在沈阳京奉路车站附近。仓库主任为中校，军草场负责人为少校。以下均设有办事员若干人。此外在铁路沿线一些车站还设有粮秣厂办事处。这些车站有新民、北镇（设在沟帮子）、锦州、绥中、兴城、榆关（山海关）、昌黎。每处设有少校或上尉主任1人，办事员数人，协助主任办理粮秣运输和供给当地驻军的给养工作。还在通辽、洮南县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分别筹措供应驻在那里的部队的给养。例如：于芷山、张海鹏及其他骑兵部队，所需要的粮秣大都就地购发，以免长途运输，增加费用。

3. 粮秣定量（平时官佐不发）

士兵：每人每日秫米1.5斤（现品）；
　　　菜代金0.020元；
　　　柴代金0.014元；
马骡：每匹每日谷草10斤；
　　　料粮2.5斤；
　　　豆饼或麸皮2.0斤；
马骡饲料有时发给代金。

为了改善士兵生活；还规定每月可用秫米换发二日份的细粮。

上述的粮秣定量是平时的，战时主食概为细粮。主要是面粉，大米较少，都是由就近兵站处直接拨给。

4. 粮秣的筹备：在 20 年代里，陆军主食一般都是秫米。原料多由当地粮栈购买。

军草（主要是谷草）的供应是靠收购来解决。每年秋收后，即由督军署军需处通知省政府，让其转令县署，指定某些村镇，在一定的期限内，向粮秣厂军草场送交谷草若干。价格虽说是公平交易，但往往低于市价，无异增加人民负担。

军草一般要收购一年的用量，为数很多。军草场为了减少长年存放的损失，收草时总想方设法多收少算数，因此常起纠纷，招致农民的反感。这里也有很多弊端，一是收草人常换；二是收草都堆放在一起，数字不清，无法分清责任。因此常常发现收草人偷卖草条子的贪污行为。每年所收购的军草，概多数量不足，常出纠纷，谁也不愿当这个军草场主任。

本厂成立后所供应粮秣的部队约有 10 万至 30 万人，马骡 1 万至 3 万匹。奉军的增长是在 20 年代里逐年实现的，每年增加多少不定。供应的粮秣也无法事先做出预算，只好现来现准备，然后实报实销，上级也没有编造预算的指示。奉军人马数字的增加，大体可分为 3 个时期：1. 奉军进关前，张作霖任第二十七师长时，奉军只有二十七和二十八两个完整师和一些地方的巡防部队，总计人数不到 5 万，马骡有限。2. 是奉军在秦皇岛劫械后，增编了 6 个混成旅，兵马数字骤增，到第一次直奉战前已增加到 10 万人以上，马骡 1 万余匹。3. 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即 1924 年秋，奉军士兵近 30 万人，马骡达 3 万之谱（不包括吉、黑二省和热河特别区），这时奉

军达到了最高峰。

我任厂长后的粮秣厂

1929年4月间，荆有岩，熊毅烈和我已由日本东京陆军经理学校高级班毕业，回到了沈阳，晋见张学良总司令和总司令部军需处长苏全斌（宜范），他们都表示欢迎。荆有岩被任为东三省官银号会办，我为东北陆军讲武堂附设军需教育班的上校教育主任、熊毅烈为这个班的少校教官。同年8月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东北当局曾经组织防俄部队两个军，任命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我为第二军兵站处上校处长。9月间，我又被调升为奉天陆军粮秣厂少将厂长。当即返回沈阳，面承张张学良总司令，勖勉有加，感到兴奋，9月23日，由副厂长吕东荃陪同下，与前任厂长葆康洽谈，正式接收了这个厂。吕是当年二六旅在北大营创办的军需教育班的学生，我在那里当过教官，旧识相逢，倍感亲切，他对我的帮助不少。

我到粮秣厂后，即和副厂长吕东荃及其他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如何精简人事，节约开支，提高工作效率问题。厂里除保留4个科外，当即取消了总稽核一职。原来的4个科长，除总务科长薛敬时曾毕业于北京军需学校学生班留用以外，其他都是年老多病，工作能力较差，已随前任厂长离职了。他们的遗缺分别以杨起坤（载厚）、张寰超（北海）、邵金铎（仙洲）补充为粮秣科、补给科、检验科的上校科长。他们都是军需专业人员，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和经验。我们还把多余的员工淘汰了一些，调整了内部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将没受过军需教育的各级职员组织起来，学习军需业务常识，由

副厂长负责，气象为之一新。我们把这些做法上报后，很快就被批准，并获得了好评。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后，奉天省为辽宁省，北京市改为北平市，京奉铁路改为北宁铁路，奉天陆军粮秣厂改为辽宁陆军粮秣厂。1930年底，东北军第5次进关，占据了平津两市，并在北平西长安街成立了陆海空军副司令部。张学良亲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部分文武官员，进驻北平。东北军也陆续调到关内。原粮秣厂沿北宁路线设立的办事处也逐渐恢复起来。还在北平前门外西河沿成立了辽宁陆军粮秣厂北平分厂。由副厂长吕东荃负责，供给关内东北军粮秣。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购置委员会的设立

长官公署为了统一解决各厂需要的原材料，当即组织各有关单位（长官公署军需处，辽宁省财政厅，东三省官银号，兵工厂、被服厂、粮秣厂和迫击炮厂）成立了购置委员会。这个会的委员有：军需处长苏全斌、财政厅长张振鹭、官银号总办鲁穆庭、兵工厂总办米春霖及其材料处长沈振荣、被服厂长赵全兴、粮秣厂长温芳（笔者）和迫击炮厂长李宜春等8人。并推选米春霖为委员长。会内工作人员分别由军需处、财政厅和兵工厂调用，不另开支，另还有3名雇员协助工作。

购置委员会成立后，在有关卖买方面都有详细规定。比如：交往厂商的登记、成交合同内容的记载、样品的保存、交易的方式、验收的手续，都须按照规定办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会的各厂都愿由会代购所需要的物资，既能杜绝流弊，又可节省时间，大受欢迎。

1931年上半年，粮秣厂曾委托购委会，代向日本的大连厂商订购一套干脱皮的高粱米机。这是粮秣厂急切盼望得到的新机器，这样可以解决高粱米的保存问题。遗憾的是这套新机器还没交货，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一希望竟成了泡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20日早晨我赶到车站，从开着的车窗挤上了火车。我到北平后，吕东荃陪我晋见了张学良副司令，面承指示，决定将总厂迁到北平与分厂合并，继续供应东北军粮秣。后来，总厂的员工陆续来平。这时购置委员会也迁到北平，尽管委员不全，但仍能执行购置任务。粮秣厂供应各部队的给养也继续委托它给订购，进行顺利。不料，于同年11月间，购委会曾在天津给代购一批次面粉，价廉而物不美，发给各部队后，做成的馒头色黑、质粘，微有苦辣和霉气味。各部队师旅长大为不满，纷纷手持馒头面见副司令，大家都认为应追究责任。张学良副司令即派宪兵司令陈兴亚，副司令部军法处长颜文海、军务处长周廉3人，共同查办这一案件。

经长期间详细彻查结果，这批面粉是经购委会委员沈振荣通过军需处派在该会工作承启康的介绍，并经该处委员苏全斌的同意成交的。承启康是苏全斌的弟弟，最后已承认有贪污受贿不讳。依法将承启康判处徒刑，苏全斌撤职。同时副司令部发令，撤销辽宁陆军粮秣厂，所有工作人员，听候任用。并从1932年1月起对各部队改发粮秣代金，自行购置给养，各部队长皆大欢喜，诞生将及10年的辽宁陆军粮秣厂竟致这样的夭折了。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2辑〕

张作霖种植鸦片筹措军费

〇 马恕知

1926年张作霖进关北京，出任陆海军大元帅。为维护其统治势力，相继在东北和关内招募新兵，扩编军队十数万人。这样一来，其军费开支越来越庞大。为此除继续在东北三省和关内所统治的地区施行横征暴敛外，又和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总参谋长杨宇霆，以及翟文选等人决议，在奉天省57县施行种植鸦片政策。当时的奉天省区域较大，包括现在的内蒙洮南、突泉、瞻榆和吉林省四平、西安、辽源、通化、东丰等地。从1926年秋开始筹办成立奉天全省"禁烟总局"，在57个县设立"县禁烟局"，县以下各区设立"禁烟检验所"。名义上是实施禁烟政策，实则是公开让百姓大量种植、吸食和贩卖鸦片。

禁烟总局共有职员200多人。禁烟总局总办是马义魁（敬图）；会办是马世显；秘书长是赵子秀。

下设4个科，各设科长1人。

县"禁烟局"有局长1人、副局长1人、股长1人、稽查队长1人、副队长1人、稽查若干人。

县以下设检验所，各所设正副所长各1人，办事人员数

人。

禁烟总局设全省督销处，掌管各官膏店销售鸦片及烟具事务。督销处设主任：(杨佐君)、副主任(阎文阁)。

奉天全省禁烟总局直属大元帅府管辖，与奉天省政府是平行而不是隶属机关。禁烟总局下设57个县局，县局下设5至7个禁烟检验所。同时在各城乡镇附设鸦片官膏店，负责收购老百姓手中的零销鸦片，再制成大烟卖给百姓吸食。各检验所还负责发放种植和吸食鸦片的许可证，并统一贩卖吸食鸦片的用具。各县局、所分设有稽私队，用稽查人员监督百姓种植鸦片的土地面积、产量，并对私种、私卖、私吸者，进行取缔、罚款、收税。同时公布了一系列规章条款，用来管理、压榨百姓。

由“禁烟局”部署百姓进行登记，种植鸦片。每种1亩地鸦片，可以收10两烟膏，“禁烟局”只征收9两，余1两给老百姓自己吸食或自行贩卖。“禁烟局”收购价格较低，同时要纳种植税金。老百姓自己留用的鸦片，只允许卖给官膏店，不准私自贩卖。对违犯规章条款者，罚以重金。大元帅府通过各级“禁烟局”和禁烟政策，搜刮了大量财富，填补了张作霖招兵买马扩张其统治势力的庞大军费开支。当时大量种植鸦片的多数是地主、富农。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而且可以大批雇工。因为种鸦片比种庄稼、蔬菜收益大，来钱快，都纷纷登记种烟。

当时我们抚顺地区有抚顺、新宾、清原三县，地处辽东山区，土质肥沃，种植的鸦片比其他市县产量高，又有大型工矿区，利于贩卖。当时抚顺地区还有一部分朝鲜人和日本浪人，在千金寨及矿区附近开设烟馆、吗啡馆，引诱一些人吸食鸦片和扎吗啡。有很多人吸毒成瘾，大量土地因种植鸦

片而荒芜，粮食大量减产，加之奸商们趁机高抬粮价，使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

当时抚顺、新宾、清原三县的“禁烟局”在征收鸦片与征收税金方面，是全省收缴量多，“成绩”最好的县局。县禁烟局长就受到过“禁烟总局”及大元帅府的奖赏。

各县“禁烟局”收征鸦片及税金等，除汇总上报“禁烟总局”外，同时如数上交奉天省财政厅入国库验收。又由奉天省财政厅将所征收之鸦片，转售给奉天市南站日本国经营的小奇洋行，按价兑换现金及军火，枪支弹药，送交大元帅府，做军需应用。

1927 年奉天全省即收购鸦片 200 余万两，加上禁烟各种税金罚款等，折合银元 10 余万元。

1928 年照样施行种植鸦片政策。这一年比前一年全省所种植鸦片的土地面积，又增加了 35%。这一年所种植的鸦片尚未收获时，张作霖即从关内败退，在其退回关外之前急需用款。因此，决定将奉天全省“禁烟总局”撤销，改为东三省筹借局，由当时奉天省大财阀张惠林接收，张惠林任筹借局总办。他按 1927 年所收征鸦片及税金等，折价先自己拿出钱来垫款交给大元帅府急用，把这一年征收的鸦片及各种税金，由他收回补偿垫款。张作霖死后，这个筹借局也就取消了。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 22 辑〕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无线电建设和通信状况

〇 陈先舟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无线电事业，无论在设备规模方面，或在通信能力方面，都居全国第一位。国内可以直接与新疆和云南通报，国外可与欧美直接通报。国内发往新疆和欧美各地的电报，多由北京、上海、武汉和天津拍发沈阳，由沈阳无线电台转发。其所以发展这样快，一则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一则由于张作霖具有扩大地盘的野心。现将其发展原因和状况，就个人所知略述如下。

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电信主权的侵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帝俄失败后，和日本缔结朴茨茅斯和约，帝俄政府将东清铁路支线长大段[①] 及与之相关联的一切"特权"，转让于日本。日本无时无刻不在想贯彻其大陆政策，以遂其囊括满蒙的野心，所以东北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受到日本的干涉和侵犯，电信通信方面当然

① 中俄合办的东清铁路支线长春至大连、旅顺段，即后来的南满铁路。

也不能例外。1908 年中日缔结电信协约，1909 年 3 月，日本在营口、辽阳、奉天（今沈阳）、铁岭、长春、安东 6 处，建立了日本电报局，并和当地的中国电报局之间架设线路，接转两方的电报。这样，日本侵犯中国的电信主权，又由协约的缔结而合法公，言之至堪痛心。另外，日本攫取长大支线后（南满铁路），又修筑安奉铁路（安东至沈阳）铁路沿线的电信主权，亦为日本所侵夺；例如本溪设立无线电台以前，没有中国电报局。东北无线电总台为挽回电信通信权利，设法建立了本溪无线电台，本溪县才有中国自己的电报通信机关。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九·一八”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东北地区电信权利的情况。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状况下东北地区的电信通信就不可能有个完整的通信系统。再就电报干线来说，内沈阳通长春等北满干线，由沈阳通安东的干线，由沈阳通旅大的干线，均设在南满铁路沿线，平时维护查修，动辄遭受日人的无理限制，电报通信就得不到保障。东北电信通信在这样支离破碎的局面下，对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也是无能为力的。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建有自己的完整的通信网。但是有线电通信网的建设，因条件所限，一时难以实现，只有从事于无线电通信网的建设。1928 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加剧之时，也是东北无线电通信建设突飞猛进之日。所以说东北无线电通信建设之快，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加剧分不开的。

二、“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内部的形势变化

1916 年，张作霖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加盛武将军衔以后，逐渐统一了东三省。1922 年 4 月，第一次直奉战起，奉

军失败，张作霖退出关外，宣布独立，自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奉军战胜。1925年春，奉派势力达于长江流域。1926年，东北军大举入关，张作霖自封为安国军总司令；以16省区“劝进”就陆海军大元帅。从1916年以来，东北内部处于比较稳定的局面，有条件从事于军备扩充；无线电通信随着军备的扩充也就日益发展。

东北无线电总台创办于1923年，以后逐年都有增建。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已揭开“九·一八”事变的序幕。张学良承继父业，掌东北军政大权，时东北局势已处于危在旦夕的情况中。同年末东北易帜，统一于国民党政府，又增加了蒋介石集团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东北的因素。但是在这个期间，东北一切问题，都是针对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此，东北无线电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迅速发展阶段。

自1928年至1929年新装的东北无线电台，已通信者有15处，正在装设中者有5处，在1929年上季计划安装的电台有12处。这些电台建设的特点是，大部分都处于边远地区和大中城市的要冲，例如辽宁省的长白等地，吉林省延吉等地，黑龙江省黑河等地。有的已在通信，有的正在装设，有的计划已定。“九·一八”事变后，这些电台对抗日战争贡献很大。

三、“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无线电台的发展

经过两次直奉战争，张作霖的势力伸入长江流域，各地的军阀政客和他有了接触的机会。张作霖为笼络各方面人士，也愿与他们建立关系。一部分与军阀有联系的搞军事通信的人士，纷纷来东北搞无线电通信。张宣在1924年，由东北陆

军整理处工务处长转任东北无线电台监督，他组织了吴梯青、耿季和等人来东北，开办无线电及电报、电话通信事业，借着机会营私舞弊，大发其财。因此，他们把持了电信事业，除自己派系以外，别人希望参加无线电工作是不能见容的。我个人就曾遭到了他们的拒绝。1923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东北学生，掀起收复旅顺、大连运动，回国到各地作宣传。在宣传活动中，体会到不用军事力量是达不到目的的。因此，我拟将个人所学，在军事上有所贡献。自己所学的是电气科学，于是回到日本以后，对于无线电通信作了积极的钻研。1924年卒业归国，一心一意想到无线电通信部门工作；持教育厅介绍信，屡次往东北无线电监督处接洽，他们始终不予接见。自己找不到私人关系，不得已到奉天市政公所，参加有轨电车工作。1925年经过许多曲折，弄到了张学良的介绍信，持介绍信前往，蒙一位科长接见，仅允许到山东庙无线电学校讲授电话课，仍不能参加无线电工作。在讲课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学无线电的学生，后来做无线电工作的时候，得到这批学生的帮助很大。

1924年成立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在1929年由高纪毅负责，对于东北的交通事业多所发展，电报、电话、无线电均隶属于该会。高纪毅颇重视这方面的事业，对于那些营私舞弊分子，垄断把持的人们，采取逐渐清洗的方针。当时我在交通委员会工作，有机会参与有关东北无线电台问题。首先向高纪毅建议，撤消东北无线电监督处，由东北无线电总台管辖东北区的无线电通信。当时派我担任东北无线电台总台长职务。这样，精简了机构，清洗了一些贪污分子。1931年2月又向高纪毅建议，将东北电报、电话和无线电各自分立的局面统一起来，设东北电信管理处。在中国用电信字样，把

电报、电话和无线电合并一起管理还是个创举。东北电信管理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建设无线电通讯网，一方面整修电报、电话线路，并对经营管理方面也大加整顿。东北电信交通局面为之一新。

总的来说，在1928年前，东北无线电建设着重在对内扩张地盘方面。在1928年后，东北无线电建设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方面。

四、“九·一八”事变前无线电台建设与通信情况

1923年，东北无线电台创立，仅在沈阳故宫院内装设马可尼收发报机，与东北各大埠通信，传递官报。1924年春，又在故宫院内装设一较完备的收发报机，可直接收受欧美各国电报，称为世界收信处。并与德国无线电交通社，订有单方通信合同，凡欧洲拍来中国之电报，均能接收代送。并收有国外新闻，分送各机关，使东北人得知世界大势，这是中国与欧美直接通信之开端。同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建设国内通信发报台，装设德国西门子公司真空管长波发报机1部，电力为10千瓦。到秋间装竣正式通报，适值直奉第二次战争，在传递官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后除传递官报外，还逐渐开展商报，营业日见发达。10千瓦发报机与迪化（今新疆的乌鲁木齐）、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上海、北京等电台通报，也能与河内电台通报，通信效率很强。

1925年1月，又与法国巴黎无线电总公司订立单方通信合同，开放我国全国官商电报。1926年4月增设1千瓦发报机一部，专供东三省境内通信。1927年4月，装设德式10千瓦发报机1部，与德国柏林无线电海外交通社重订双方通信

合同，年底正式开始互相通报。中国无线电台与欧洲直接通信，这是开端。在这以前，我国过去出国电报，向为大东及大北两水线公司① 所垄断；自此以后，所有京、津、沪、汉各地出国电报，都由沈阳电台转递。对挽回电信方面的权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28 年间装设德式短波发报机两部，专为与东北电台通信之用。1930 年又装德式 20 千瓦短波发报机 1 部，德国式 1 千瓦发报机 1 部，美国式 20 千瓦发报机 1 部。由德国人罗希士和傅立志（译音）两人先后担任工程师，中国工程师是李继唐、王家誉、王鸿志等人。此时，沈阳电台有 20 千瓦短波发报机两部，10 千瓦长短波发报机各 1 部，1 千瓦短波发报机两部、长波发报机 1 部，500 瓦短波发报机两部。其建设规模在国内居第一位。同时在东北几个重要地区，同样积极增建和改建无线电通信能力。

1925 年在长春设置德式长波真空管发报机 1 部，电力为两千瓦。在 1930 年至 1931 年上半年，新装美式短波发报机 1 部，电力为 200 瓦。

1924 年在哈尔滨装德式真空管发报机 1 部，电力为 5 千瓦。1929 年至 1930 年装设一千瓦美式短波发报机和 150 瓦美式短波发报机各 1 部。

在齐齐哈尔，1924 年设置美式短波发报机一部，电力为 150 瓦。营口因地处港口，关系与船舶互相通信，在原设的 1.5 千瓦的火花发报机外，又于 1930 年添装美式短波发报机 1 部，电力为 200 瓦。

在完成以上无线电台建设后，则东北的内外无线电报通信，基本上建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通信体系。除上述电台

① 大东是英国的，大北是丹麦的。

之外，1930年至1931年上半年新装竣通信的电台，在葫芦岛、吉林、富锦、满洲里、萝北、黑河、漠河、鸥浦，呼玛等地，都是美式短波发报机，电力为200瓦或150瓦。正在装设中的无线电台有奇乾、安东、临江、密山、室韦等5个电台。在1931年上半年计划装设的无线电台，有乌云、佛山、抚远、虎林、绥芬河、珲春、延吉、长白、抚松、依兰、通辽、海龙等12个电台。另外在兴安屯垦区内，洮安、洮南、索伦等地，亦均设有电台，作军事通信之用。

无线电话方面，仅限于无线电广播，当时的东北广播电台只有两处，一处设于沈阳，一处设于哈尔滨。沈阳的广播电台是在1927年创建的；哈尔滨广播电台亦在1927年创建，于1928年春正式开放。广播电台的主要业务是报告时间、气象、商情、新闻和播送音乐、戏曲等，其中商情广播颇受欢迎。当时曾拟在东北各省每县酌设收音机一二个至三四个，以供宣传之用。

五、无线电通信能力和情况

在国内通信方面，1924年后，除供给拍发官电外，逐渐兼营商报，商报数量日益增多，营业也日益发达。同时又能与新疆和云南直接通报，向需月余可到的电报，乃得于日内即可传到，商民称便。哈尔滨电台，通信能力可达全国。齐齐哈尔电台专司东北北部的官报，并与边境各台联络通令长春电台可供东北四省通信之用。营口电台可与船舶互相通信。

在国外通信方面，前文已经讲过，不再赘述。

总的说来，通信能力可达国内外各地，营业收入亦颇可观，每月收入不下3万余元。1930年上半年5个月的时间已

经转亏为盈，6月份一个月就盈余两万余元，估计全年盈余可在25万元以上，迅速形成转亏损为盈余的局面。

以上是通信能力和经营管理的概况。尤其重要的是，1928年后，东北无线电台的建设，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确起到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作用。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当时，沈阳东北无线电总台还与各台联系通信。次日总台失去通信自由，于是黑龙江电报，均由哈尔滨电台代转，哈尔滨电台代替沈阳总台当时的通信任务。不久，东北电信管理处转到北平（今北京），设立电台一个。东北无线电工作人员一部分转移到天津的华北无线电总台。因此，关于东北抗日通信任务，即由天津华北无线电总台和北平电台联络通信，始终保证了抗日通信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满洲里电台并于海拉尔，台长为孙宝廉。海拉尔电台这时担负起了前方通信的重要任务。

当黑龙江省城沦陷后，省政府移设黑河，黑河电台成为黑龙江的中心电台，台长是王家誉。当战事紧张时期，该台由省政府直接指挥，所有关内外电报均由黑河电台转交天津的华北无线电总台及北平电台。天津无线电总台收到马占山抗日活动的电报，当即抄送各有关方面的抗日团体。同时也将全国人民支援马占山抗日的热情和捐献的物资电知马占山，这对鼓励全国人民抗日情绪，增强马占山抗日信心和决心，都起到应有的宣传作用。直至1933年1月马占山离开东北，才告一段落。

当黑龙江誓师总动员时，省政府命令黑河电台采取临时措施，调动呼玛电台，随军南下抗日，该台台长桂黄携带全部机器和人员随军至海伦。当时前方电报，可以随时与黑河

电台通信。桂黄台长以后在随军抗日中牺牲。

另外为抄收国内外新闻，省政府命鸥浦电台移设黑河附近，由该台台长韩蕴五及报务员苑文海抄收，送达有关各方面。遇有战争胜利的消息，由黑河电台张贴通告，广事宣传，以鼓励群众抗日情绪。

在日军向黑河进犯时，郎官普代理主席，经常与住在海拉尔的苏炳文司令，通电磋商有关抗日事宜，电台保证了这种联系。海拉尔撤退后，黑河电台台长王家誉在郎代主席指示下，还与当时留在海拉尔的电台台长孙宝廉，在深夜通过打暗语等办法，保持了一个时期的联系。直到1933年1月，日军势力到达黑河，黑河、鸥浦两电台人员绕道苏联转赴天津的华北无线电总台报到。东北无线电台服务于抗日战争的工作，亦告一段落。

自从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当政，由于国恨家仇，怀有励精图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心愿，在交通事业中的无线电台的建设整顿上，表现得也比较显著。“九·一八”事变前所建设的电台，也的确起到了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作用。还应说明，尽管有无线电台的建设，如果台长和报务员没有抗日的决心，电台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的功绩，更不能忘记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电台工作人员的爱国主义精神。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3辑〕

张作霖与东北铁路

○王贵忠

东北铁路起源于清政府洋务派李鸿章修建山海关内外铁路，又名京奉铁路。1894年，中日战争之前关内外铁路修到中后所（绥中）65公里。这是东北地区第一条铁路。以后干线延长至沈阳北站，京奉干线经过30年才完成。

1920年，东北铁路营业里程（起止地点）共计3651.4公里。其中有日本政府独资经营的南满路和安奉路，中俄共管的中东路，中日合办的溪碱路和通裕路（锦西大窑沟），中国国有京奉路、吉长路和四郑路。东北官商合办的齐昂路，从齐齐哈尔至昂昂溪29公里（窄轨），仅占东北铁路0.8%。张作霖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筑了打通路、沈海（奉海）路、呼海路、鹤岗路、吉海路、锦朝路，昂齐和齐克路（张学良继续完成），张家父子支持修建的开丰路等，加上张学良创建的洮索铁路共计10条铁路，营业里程总长1521.7公里，投资现大洋8000余万元，占1931年东北铁路营业里程总长的25%，占全中国铁路里程总长10%以上，自建铁路的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奉系自建铁路，打破了外国资本独占东北铁路运输的局面，把日俄英三大系统变为日本独资经营、中苏

共管、东北地方当局自建自营东北铁路的三大系统。其中有两个系统张作霖有监督管理权。

张作霖也征调铁路利润作为军饷，征用车辆用于军事运输。但也把京奉铁路利润用于修建铁路，还用东三省财政收入投资铁路。京奉铁路关外段干支线总长 889.9 公里，其中张作霖修筑的就占 363.9 公里，占 40%。张作霖自建铁路完成了打虎山至通辽和齐齐哈尔的西干线，奉天至吉林的东干线，东三省从此有了纵向的三条大干线。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营业里程总长为 6225.9 公里。1920 年至 1931 年这 12 年间增长 2600 公里，有外国资本关系的增长了 1081.8 公里，占增长总长度的 41.55%。其余张作霖用三省政府和部分商民投资修筑 1521.7 公里，占增长总长度的 58.45%，占东北铁路总长的 25%，占全中国铁路总长的 10%以上。而当时全国铁路的总长 85%是有外国资本关系，只有 15%的本国资本，其中有 2/3 是东北地区官府和民众的投资。

张作霖在他统治时期内，借用日本满铁资本修筑了洮昂和吉敦铁路，营业里程共长 430.6 公里。中日合办天图铁路 111 公里，中俄官商合办穆棱铁路 58.9 公里。这四条铁路共计 600.5 公里。1925 年以后，张作霖全力注重自建自营东北铁路，不再借用外国资本，中日在铁路交涉中矛盾日益深化。

一、修建虎濠铁路与夺取京奉铁路关外段管理权

虎濠铁路是张作霖使用京奉铁路资金修建的运煤铁路，源起于八道濠煤矿。这是张作霖修建东北铁路的开端。

八道濠煤矿在黑山县西北 18 公里，是张作霖个人投资开

办的煤矿。日产煤可达300吨。张作霖和奉天矿务局总办阎廷瑞计划自办窄轨距铁路运煤,煤炭主要用于供应京奉路。张作霖与京奉铁路局协商,使用路局资金和技术修一条支线,从打虎山（今大虎山）站至煤矿28公里称虎濠铁路。

该路于1921年9月开工,因第一次奉直战争影响一度停工。

京奉铁路归北京交通部管辖，是中国国有铁路干线，营业收入和利润逐年增长。1918年收入突破2000万元大关,利润达到1398万元。偿还英国债务后,每年还余1000万元。这笔收入被北京政府主要用于直系军响。北京政府每年从东北收缴国税还提取30%拨给其他军阀,而张作霖自己每年需军费2000万元,也主要靠东三省地方税补充,所以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在财政上有矛盾。

1922年1月，张作霖扣留京奉路收入款42万元。4月，第一次奉直战争爆发。5月5日奉军战败退至天津、滦州。12日，张作霖在滦州通电，宣布东三省独立自治。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独立，实行联省自治。张作霖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把京奉铁路山海关以东干支线划归奉天省长管辖，省长设立奉榆铁路局管理铁路。关内段仍称京奉局(天津)。奉榆局继续修成虎濠铁路,1922年12月19日初步完工，12月26日开始运输八道濠煤矿的煤炭。

东三省独立自治之后，京奉路关外每年的利润，营口盐务稽核处所收的东北盐税，以及三省财政收入全归保安总司令部。东北兴建铁路和东北大学有了资金，奉军的军饷来源也增多了。

二、修建锦朝铁路与夺取京奉铁路关内段管理权

京奉铁路局每年有1000万元利润，关外段每年从开滦运煤用于运输燃料。1921年4月4日，锦朝铁路在锦州开工，计划修至北京煤矿，以后再向朝阳县修路。10月铁路工程修至义县。1922年春，第一次奉直战争爆发，京奉路车辆用于军运，无法运输建筑材料，锦朝铁路工程停工。奉军战败，直系军阀不供应关外铁路用煤，张作霖遂令奉榆铁路局继续修建义县以北工程，通向北票煤矿。1923年7月19日。大凌河铁桥完工，1924年末，义县至北票煤矿铁路完工。

1924年9月，第二次奉直战争中，奉军占领天津，控制铁路关内段。1925年初，张作霖任命常荫槐为京奉铁路局长，京奉路关内外合并，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管辖，总务仍设天津，并设奉天办事处。奉系军阀夺取了京奉铁路全部管理权，使用路局的利润作为军饷和铁路建设资金，用路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东北铁路事业。经过常荫槐的认真整顿，京奉路收入不断增加，由1926年的2300万元，增加到1927年的3472万元，利润达2000万元以上。1931年，京奉铁路总收入达到4275万元，利润达2065万元，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三、张作霖自建铁路计划与设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

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计划修建东北的铁路大干线。由于日本南满铁路纵贯东三省腹地，自建铁路干线只能在南满路两侧修建。1922年下半年，奉军参

谋长杨宇霆建议修建奉天至吉林铁路，孙烈臣和吴俊升建议修建打虎山至通辽和齐齐哈尔的铁路，经张作霖同意，制定了东干线和西干线计划。即用本国的资本和技术力量修建自奉天省城（沈阳）至吉林省城（吉林市）的东干线，同省办铁路连接一起；用京奉铁路等国有铁路修建打虎山经通辽至齐齐哈尔的西干线，把北京政府借日本资本修筑的四洮铁路纳入西干线。同时支持商民自建铁路。

张作霖自建铁路干线有军事目的和经济目的，当时主要是从军事目的出发的。有了自建自营的铁路，可以摆脱日本关东军和满铁的控制，可以随时调动奉军。可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驻军使用中东路军运，南端只能到长春，还得缴纳运费，或记账后，在年末分得的利润中扣除。长春以南被日本控制运输，只有奉天通往山海关有自己的京奉路，奉天以东、彰武以北就得依靠南满铁路。

满铁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大本营，关东军利用南满铁路控制奉军行动。除了当场交付运费之外还有种种附加条件：

一、奉军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部批准之后才能乘车。必须临时解除一切武装，枪支弹药另行托运。关东军和铁路守备队有权监督。

二、奉军的军事物资，必须得到关东军司令部批准才给运输。

三、日本方面随时可以拒绝张作霖的奉军运输。

张作霖鉴于外国资本控制东北铁路有损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心自建铁路摆脱日本控制。

张作霖自建铁路计划，自建自营铁路，就是想不用外国资本和技术，防止外资控制东干线和西干线，享有自主权。但是，由于缺乏西干线的资金，借助了四洮铁路。所以曾借用

日本资金修建了洮昂铁路，为防止日本控制运输管理权，只留给日本对洮昂的财务管理权。

自建铁路的经济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吸收关内大量移民开发地方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来源，同时人口增长可以增加兵源。二是经营铁路可以获得大量利润，用铁路利润作为奉军的军饷。

1924 年 5 月，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这是东北交通事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用此取代北京交通部在东北的交通监督管理权。奉直战争期间东三省实行区域自治，把京奉、吉长、四洮等国有铁路以及邮电航运企业统归交通委员会管辖。尤其是中苏共管的中东路，张作霖和交通委员会代表中国参加共管，取得中国方面应有的一切权利。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规划和执行自建国有铁路支线、省有铁路和支持商民兴办铁路使东北铁路修建和管理面目一新，省办铁路在这个时期有很大发展。

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设委员长 1 人，由奉天省长兼任，主持日常工作。委员计 15 人，由三省的省长、东三省和奉天省军政官员兼职。委员由保安总司令任命，交通委员会直接受保安总司令张作霖领导。

各省铁路建设由督军和省长具体负责，重大外交事务和铁路计划由三省首脑联席会议决策，外交事务由杨宇霆和王永江具体处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是东北地区交通最高的决策机关，也是执行机关，东北三省最高领导人都是交通委员会委员，实际权力仅次于保安总司令部，能够对东北所有的即保安总司令部所属的军政机关直接下达命令。

张作霖和交通委员会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建的国有铁路支线只有锦朝路和打通路，商办铁路只有开丰铁路一条。自

建铁路采用的主要形式是政府与商民合办的省有铁路，即官商合办。省有铁路在开办初期都是官商合办，奉海、呼海和鹤岗三路最后仍然是官商合办。吉海和齐克因商股数额少而改为省有官办。昂齐路和洮索路从开办时就是官办的国有铁路。

采取官商合办主要是因为奉军的军费开支庞大而缺少筑路资金，吸收商民资本可补充官股不足。后来影响商民投资的因素主要是东北金融不稳，奉票等纸币跌价。1927 年吉海路筹资和 1928 年齐克路筹资时期，商民投资明显减少。

四、修建打通铁路

打通铁路是张作霖修建的京奉路支线，是虎濠铁路的延长线。它是东三省西方干线的南段，北接四洮、洮昂和昂齐铁路，通向齐齐哈尔。

打通铁路又称大通铁路，从京奉路打虎山（今大虎山）站经过新立屯、彰武，终点至通辽，营业里程长 251.7 公里，用资金 700 余万元。该路从 1921 年虎濠铁路开工起，1927 年修至通辽完工止，中间经过 7 年时间。这条铁路记录了自建铁路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中日铁路交涉中的矛盾日益深化过程。

1925 年，常荫槐出任京奉铁路局长，代表奉系军阀管理京奉路。张作霖和杨宇霆重视京奉路入关线路，指令常荫槐把沟帮子至奉天的旧轨换成新轨，把旧轨分段用于打通铁路。1925 年 8 月，虎濠铁路延长至新立屯，继续向彰武施工。为了防止日本阻挠自建打通路，张作霖等人让常荫槐以京奉路局名义向北京交通部请示修路。9 月 13 日，在《交通公报》公

布了打通铁路计划。

1926年8月，延长工程向彰武施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训令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向张作霖、杨宇霆询问打通路计划，阻止延长工程，日本政府不能默认这条平行线和竞争线。8月30日，吉田茂在杨宇霆来访时质问打通路计划，杨宇霆对日本的干涉表示不满。还否认中日不平等条约中有所谓南满路平行线问题。

9月9日，吉田茂访问张作霖又质问此事，张作霖说："东北当局没有这项计划，即使有计划也没有筑路资金。"含混其词，回避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拖延时间争取工程进度。9月17日，吉田茂代表日本政府用照会抗议，称打通路是日本南满路"平行竞争之路"，张作霖违背中日条约，"实帝国政府（日本）所预想不及之事"，"不能默视"，10月27日，张作霖复照日本："此项铁路现在并无计划敷设之事。如将来为开发奉省起见，经官府或人民提议兴修，事关内政，届时自当斟酌情形为之。贵国政府对于奉省地方事业夙抱开发之意，贵总领事必能乐于赞助，似无干预之必要也。"

12月28日，代理总领事蜂谷辉雄见杨宇霆，要求东北当局停止彰武以北的计划。杨说："奉天省政府没有彰武至通辽计划，彰武铁路快完工了，京奉路局把奉天以西换下的旧轨用于何处，这些都与奉天省无关。一切听京奉路和交通部决定，东北当局并未参与打通路计划。"当时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杨宇霆还说："东三省自建铁路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日本政府不应该只考虑满铁会社的经济利益，而阻碍东北铁路连成干线，更不应该向东北当局提出无理抗议。"蜂谷说："东北当局必须尊重中日之间的条约和一切协定，才能保持双方友好关系。"杨回答说："理由已如上述，这些问题不是本人专

职负责，我本人一切听从张作霖上将军指示，今天争论的重大问题，东北当局不能按日本要求答复。至少，我不能答复。”蜂谷说：“鉴于以往您是张作霖集团中的决策人物，您不答复实在令人费解，帝国政府要求张作霖答复。”蜂谷当场拿出带来的抗议照会交给杨宇霆。照会口气强硬，中日矛盾达到尖锐化程度。可是张作霖和杨宇霆仍然不顾日本抗议和威胁，同时筹办吉海铁路，加快了打通铁路彰武以北的工程进度。1927年初，吉海路工程在中日交涉中进行，张作霖对日本抗议打通路不再回答。日本政府于1927年5月4日训令吉田茂总领事：鉴于东北自建铁路达到高潮，对张作霖和杨宇霆抗议无效；吉田茂建议切断京奉路经过满铁附属地一段军事运输等其他施加压力的作法也不见得有效；日本政府只提到严重抗议程度。

1927年10月打通铁路基本完工。10月24日，奉常荫槐命令，打通路与四洮铁路在通辽接通轨道。11月15日，打通铁路正式营业。奠定了自建西干线的基础，发挥了军事运输和开发地方经济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货运方面起到了与日本南满路竞争的重要作用。

五、官商合办奉海铁路

奉海铁路，又称沈海铁路，它是奉系军阀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建的东北第一条官商合办的铁路干线。自奉天大北边门外（今东站）起经过抚顺、清原，终点至海龙县城（今海龙镇）。以后干线延长至朝阳镇（今辉南），全长263.5公里；梅西支线自梅河口（今莲河）经东丰至西安（今辽源煤矿），计73.6公里。

1922年下半年，杨宇霆建议修建本国投资的东干线。王永江积极支持和筹备修建奉海路。可是，奉海路干支线全被日本不平等条约占据借款权和修筑权，中日满蒙五路和满蒙四路占据东干线预定线修筑权。张作霖和杨宇霆责成王永江与日本交涉，收回修筑权，以一条模范铁路，发展东北的本国铁路。

王永江自1923年1月与满铁交涉，希望日本方面放弃借款权。经过两年交涉，最后奉天省用借款修筑洮昂铁路作为妥协条件，日本政府在签订洮昂合同的当时，声明放弃奉天经海龙的铁路借款权和修筑权。1925年春，王永江在八王寺设立筹备处。5月14日成立奉海铁路公司，奉天政务厅长王镜寰为公司总理，原四洮路总务处长、技术人员陈树棠为技术长（总工程师）。

奉海铁路公司是奉系军阀设立的第一个官商合办的铁路公司，修建第一个官商合办的铁路干线，具有开创性和典型性。因为财政困难，决定招收商民投资。暂定本国资金为奉大洋2000万元，官商各投资一半。官股由奉天省政府财政厅投资，由官银号支出。商股由各大银行、各地银行和各商民个人募集。商股不足额，或整个投资不足，由省政府随时垫支，保证了筑路资金来源。明确规定，公司股票只准中国人持有，不准抵押或转汇给外国人。

奉海干线于1925年7月开工，1927年8月奉天至海龙线完工，1928年8月延长至朝阳镇。支线于1927年5月开工，12月完工，第二年延长至矿山。奉天省财政厅与东三省兵工厂、奉海铁路公司三方联合兴办西安煤矿，把中日合办的西安煤矿收回自办，为兵工厂和铁路供应煤炭，解决了煤炭供应，摆脱了满铁抚顺矿的控制。奉海铁路的施工过程损

失于奉票毛荒资金，由省政府垫付大量资本终于修成铁路，共用资金现大洋1600万元，官股占其中2/3，商民股金占1/3。1931年资产超过2000万元，营业利润逐年增多，官商合办企业获得成功。

在技术方面，奉海路是用本国技术力量修成的。全是本国工程师主持一切设计和施工。王永江从四洮铁路局调来一大批技术人员，陈树棠任技术长（总工程师），工程师温维湘、韦允裕、齐占一、蓝田、邹登明，见习工程师齐荫棠负责具体设计和施工。还任命工程师张国贤为工程课长（科长），工段长史通等4人都是技术人员，聚集了一批铁路工程人才为东北自建铁路的骨干力量。奉海路线路工程比日本技术修建的洮昂路和吉敦路质量好得多，而且比日本节省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资金。日本原估价奉海路至少用3000万元，而陈树棠设计的方案较日本估价的同质量铁路节省1000万元。

六、修建吉海铁路

吉海铁路是张作霖自建东干线计划的北段。奉海路开工时吉林省缺乏资金没有同时筹备。1926年，吉林省财政收入达1800万元，年结余400万元。10月，吉林省商务会和教育会等团体向省议会要求修铁路，当时吉林省境内有中东路和南满路，还有吉长路和正在修建的吉敦路，这4条铁路都有外国资本关系。张作霖和张作相决心修建本国投资本国管理的吉海干线。10月23日，张作霖和交通委员会批准吉海计划，26日张作相任命李铭书为总办，成立筹办处。

日本政府于1913年满蒙五路条款和1918年满蒙四路条款占据吉海路借款权。但是，1924年中日奉海和洮昂路交涉

中，日本已经放弃海龙及其延长线的借款权，这次还想用吉海借款权限制自办东干线的完成。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驻吉林总领事分别向张作霖和张作相抗议，还利用东京报刊和在东北报刊宣传吉海路是南满路的并行线和竞争线。11 月 15 日，吉田茂会见杨宇霆向东北当局提出口头抗议。杨回答说："吉海路是奉海路的延长线，奉天省政府已经用借款洮昂路为妥协条件，经松冈洋右代表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奉海及其延长线的借款权，当时并未规定不准延长，日本没有理由再抗议。"吉田茂无法回答，临走时拿出抗议张作霖的照会抗议张作霖和东北当局"藐视条约之规定，擅自修筑我方特别重视之铁路计划，实为我方所难谅解"，必须"将该计划中止"。

11 月 28 日，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在奉天专门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奉天省长莫德惠、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等人根据杨宇霆的主张，决定迅速筹建吉海路，不能让日本把东三省看成是殖民地朝鲜一样而干涉内政。1927 年 1 月张作霖和张作相在答复日本的照会中，驳斥了日本无理抗议，指出日本政府于 1924 年已经放弃借款权的事实。张作相更进一步否认中日秘密交涉签订的满蒙四路条款，认为北洋政府出卖吉林省权利，现在吉林省不承认。2 月，日本方面提出延长吉敦铁路至图们江，或是借款修筑长春至大赉（今大安）铁路作为交换条件，都被张作霖拒绝。2 月 18 日，满铁大藏公望理事从东京至大连，带来日本外务省决定：鉴于张作霖和东北当局与日本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日本对吉海铁路采取消极态度，即坚持抗议和拒绝协助运输材料，不干涉开工也不提出交换条件。以后由日本政府与张作霖一起交涉东三省各项交涉悬案。

吉海铁路原定官商合办，但商股资金很少而改为省政府

投资，不用外国资本。1930年秋，吉海用资本吉大洋2390万元，以后又增加资本达2700万元（约折现大洋1800万元），由省库拨款，工程质量比其他自建铁路都好，一切桥梁全是永久性的，车辆和材料全是购买美国的新产品，所以资金花费较多。

吉海铁路于1927年6月开工，1929年6月，朝阳镇至吉林总站完工，9月吉林东站完工。全长183.9公里，因连接奉海铁路，故名吉海铁路。吉海筹备期间，正是奉海、打通和呼海铁路施工期间，东北境内技术力量都用在这3条铁路建设。吉海路局仿效奉海经验，并且从京绥铁路局（即原京张铁路局）聘请一批技术人才担任工程设计和施工。吉海路局还有突出的特点，以技术人才为主体组成路局，技术人员数量多，待遇高于国内其它局。聘请了原京绥局总工程师赵杰任吉海总工程师兼工务处长。本局有工程师、副工程师和帮工程师16人之多。可谓人才济济、精英聚汇。

七、自建呼海铁路

呼海铁路是黑龙江省政府和商民合资修筑的省有铁路，自松花江北岸哈尔滨对岸马家船口起，经呼兰、绥化终点至海伦，全长220.1公里。起点属于呼兰县，故名呼海铁路。1925年10月开工，1928年12月完工。1928年8月至1929年曾改为官办，1929年11月恢复官商合办。呼海路营业利润较多，仅次于奉海铁路。表明自办铁路成功。

呼海铁路计划最早起于清末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本国投资的黑龙江铁路计划。可是20年来一直有使用外国资本的种种方案。一直到1925年，张作霖、王永江和吴俊升最后摒弃与

外商合办的方案，确立自建自营方针。

1914年，沙俄政府于灭亡前夕，曾向北洋政府提出用俄国资本修筑哈尔滨至黑河铁路。1916年北洋政府与俄亚银行签订合同，沙俄攫取了借款权和修筑权。以后，俄亚银行擅自与日本合作，竟把借款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企图把侵略势力伸向黑龙江省，因遭中国人民反对而停止这项计划。1922年，吴俊升采用了与俄商官督商办的形式，与俄商谢结斯兄弟签订合同。合同规定谢结斯兄弟出资修筑呼海铁路，不得外借资本与转让修筑权。张作霖知道俄商已经向日本借款，否定了这项合同。1925年3月，日本满铁乘机向张作霖和吴俊升提出借用日本资本。王永江和交通委员会主要成员一致反对，张作霖同意王永江的意见决定自建呼海铁路。7月，张、王、吴以及黑龙江代省长于驷兴在奉天决策自办省有铁路。

8月28日，吴俊升在齐齐哈尔设立官商合办的本国投资的呼海铁路公司，任命高云昆为公司总经理。预定资金现大洋1000万元，官商各半。官股由省财政厅投资500万元，省库拨款，民股由广信公司垫支500万元，向省内官僚和商民募集。1929年末，资金用了大洋1149万元，官股占49%商股占51%。

呼海路绥化以南的材料和少量车辆购自日本满铁，这与奉海和吉海路在市场上公开招标选购略有不同。1925年8月21日，吴俊升与伊万诺夫协议，因资金不足而借用中东路材料和车辆，如果按这个协议用中东路车辆，两轨之间距就得与中东路同宽（5英尺）。日本方面多年攫取呼海铁路权利屡遭失败，东三省北部没有日本控制权，无法公开阻挠自办铁路。然而，日本反对吴俊升与中东路合作，担心修成宽轨距不利于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动。另外，日本还想乘机用贷款方

式控制和吞并呼海路。

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向张作霖提出为呼海路贷付材料和车辆，张作霖为了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同意日本要求。9月1日，杨宇霆给吴俊升发电报，说明了他和张作霖同意购买满铁的材料和车辆。这就暗示轨道改成标准轨距。9月9日，镰田弥助去齐齐哈尔见吴俊升，并带去张作霖信。吴俊升依张、杨意见办理，既买满铁材料和车辆，又同意修成中日在东北相同的标准轨距（1.435米）。但是，张、杨、吴，以及黑龙江省政府在签合同的事项中只是暂借材料和车辆，按期还清欠款而使日本不能控制铁路任何权利。因此，不损失铁路权利。

1925年和1926年两次合同，共计购买260余万元材料和车辆，1925年第一次合同属于短期借用，分3年还清60余万元。省政府及时还清债务。1926年第二次合同在交货当时就付现金，完全变为购买材料的一种方式，日本更不能控制呼海路。1927年以后，呼海路在市场上公开招标购买材料和车辆，大部分购买美国和捷克产品。

另外，呼海路在中东以北，修成标准轨距也不与日本南满路连接，恰与中国轨距相同。张、杨同意修成标准轨并不意味着有利于日本，却有利于本国自办铁路连成铁路网。呼海可以西连齐克和西干线，还可以连接自办的东干线。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有关奉海铁路的回忆

◯谷茂菊

"奉海铁路"创建于1925年，为中国人在东北的第一条民办铁路，是现在沈吉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建成时名为"奉海铁路"，张学良接替张作霖主政东北与南京合作后，改称"沈海铁路"。

笔者在60多年前曾经亲自参加过奉海铁路的创建工作，任该铁路始发站——奉天站（即现在的沈阳东站）第一任站长兼工程列车临时车长。

一、创建过程点滴

命名的由来。因为起点为奉天站（后改为沈阳东站），具体地点是奉天市大北边门外5里左右的荒芜旷野桑家坟，终点站为地处奉天省与吉林省交界处的海龙县朝阳镇，故名奉海铁路。全称为"奉海铁路公司"，公司地址设在奉天市大北边门八王寺附近。

筑路资金、材料的来源。该路资金完全来自民间，按土地摊的股票。枕木是采自沿线山上的柞木，钢轨购自国内工

厂，机车是从捷克斯洛伐克“斯柯达”工厂购进的，车辆是租自四洮铁路。

人事关系。总经理是由当时的奉天省政府厅长王明宇兼任的。这对于取得沿线各县政府在招募民工等方面的支持，以加快建设速度，甚为有利。车务课长高元策，工务课长陈明轩，机务、电务、材料等课的负责人，均系由四洮、北宁等老铁路延聘的。站务、机务从业人员通过考试录取。笔者就是在第一期考试中成绩名列前茅而被派往四洮铁路实习的，实习归来即被任命为奉天站第一任站长。第二期、第三期录取的人员就都在本站实习了。

总之，这条铁路所有的资金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完全都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在这里应当提到一个在当时铁路上独一无二的事例，就是在各站的名牌上只用中国字而不用外国字，摒弃了国有铁路站牌都兼写外国文字的做法。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外国人到中国来就应当尊重中国字。如果我们到巴黎去旅行，在法国铁路站牌上并没有写着中国字，我们照样能在巴黎下车。我们的民族要独立，铁路要独立，为什么站名要写外国字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做法反映了爱国的、民族独立的热情。

二、艰苦的建路工作

那时，我们是边修路边做非正式运输的。就是说，路轨铺到哪一站，就把车通到哪一站。先不修站舍而是租用民房办公。为了便民，我们还利用工程列车办理简单客运。旅客坐在石碴车上面，我们到车上去售票。一开始没有正式车长，是由站长兼任的。车长（即站长）既要在车上来回作业，跨

过车钩奔走于各车辆之间；又要在机车前面，做信号引导，有时须登上机车。一开始，路基松软，钢轨歪歪扭扭，试运时是很危险的。笔者曾身临其境。但我们终于在艰难的条件下把一条铁路创建起来了。

铁路沿线的桥梁以木桩架设为主。就是将桥桩打入河下，固定在岩石上，浇以水泥加固后，上面再架钢梁。记得当时公司最高领导筑路知识很少，求成心切，在桥桩工程进行一半，尚未打到固定岩石上时，就要求强行通车，工程人员无奈只得停止打桩，从上面截齐，在梁架上通车。冬季尚好，到了夏季河水上涨，有的桥梁全被冲垮了。经过这样的惨痛教训，后来才决定改用水泥桥墩。到1928年秋，我们的列车已通至山城镇车站，那一带是奉天东部粮仓。我们自己的农产品通过我们自己的铁路，开始源源运出，经由营口出港，从此，铁路收益日渐增多，业务走向正轨，车站也逐步修齐了。

该路的行车制度，是由笔者参考四洮、京奉的经验，摸索制定的。一开始完全使用手信号，为引导式。建成第二个车站时，开始使用路签（又名保安器），其形如短棒，一端安装不同形状的突击角，作为钥匙，放进保安箱内。当时铁路是单线的，相邻两站共用一个路签，路签持有站有发车权。例如向同一方向连开两趟以上列车，即共行几列车使用路票。路票是用厚纸制的车 card，该路票在保安箱内，以路签钥匙开箱取出。最后一列车使用路签。未持有路签的路，如欲发车，必须请示调度所，由调度员下达命令券发车。无论何种情况，使用保安器前，必须向对方站商洽，得到对方站承诺后，方能从保安箱内取出路签，交付司机开车。这些设备大都使用

四洮铁路的旧设备，与现在的电气化保安设备，不可同日而语。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作霖与东三省实业留学生

○王家栋

1917年春，东三省驻日本东京留学生监督处负责人李济东向张作霖提出建议，由东北三省选送官费留日实业学生若干名。并指定他们专攻各种工业技术，待学成回国参加工业建设，以期把东北三省的落后状况转变过来，免受外国欺侮。张作霖当时也感觉到东北人才缺乏，助理无人。所以当即通令奉天省和吉黑两省，对各省的中学毕业生，在各县城举行初试，在各道尹公署举行复试，以盼慎重。各县考取名额规定为2至3名。留学费用，先仅发给补助食宿学费每人每月25元，一俟考上日本官立大学，再按国家规定发给留学费用每人每月54元，所有费用由各县负担，一直到大学毕业回国工作时止。

记得我们辽沈道各县于7月间，分别在各县城举行初试，于9月初到营口市辽沈道尹公署举行复试。各县所考送的学生，除少数外，几乎全被录取。然后令回县里听候办理赴日手续，准备起身东渡。不意当时天津发大水，道尹荣厚去天津助理水灾粮务工作，直到年末，他才由天津回来。着手办理我们出国手续。12月，我们接到出国通知，齐集奉天。乘

火车经由朝鲜釜山，抵下关直达东京，时值1917年末。我们100余人到东京后，早有东边道、洮昌道先到东京的同乡，帮我们安排了食宿，并办理入东亚高等日语预备学校，学习日语等手续。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国内经过选拔考试，于1917年秋，先后到东京的。东边、洮昌两道共计100余人。其中有罗振邦、陈先舟，徐箴、马象图、李儒林、夏儒聘、王寅滋等人，以后还有旅大先去的日本留学生谷次亨、安祥等人。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经营的胶济铁路和青岛港口，出兵占领。进而得寸进尺，又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要求签订中日共同防敌的“陆军军事协定”和“海军军事协定”，以期进一步可以随时出兵中国境内。也就是说仅山东一省权利，尚不能满足它的侵略愿望，最后它是要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保护国、殖民地，吞并满蒙。国内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起来反对签订这个协定。当时我正在东京，所有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就在东京中国青年会馆和大手町学生会馆等处集会，反对签订“军事协定”，掀起了抗日活动。并与国内北京、上海等处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采取一些行动，同时还选出学生代表，回国参加“救国会”和“铁血团”等活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激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东京警察对当时参加会议的留日学生进行大逮捕，当即带走学生代表30余人。当时奉天省留日学生，亦选出代表回国去北京参加学生联合会。但途经奉天时，被奉天当局阻止，不准参加抗日运动，同时禁止在奉天城内逗留，各旅馆也不准留宿，迫令解散。回到奉天的留日学生代表，不得已就各还家乡，提前过暑假，其时在6月下旬。

从1923年到1924年，这批留日的学生均陆续学成回国，参加建设。有的自己创立工厂，有的到各工厂搞技术工作，有

的参加铁路基本建设工作和铁路运输管理工作，有的到兵工厂制造兵器。例如杜重远在奉天城北二台子创立肇新窑业公司（奉天陶瓷工厂）；陈楚材、康遇韶在小东门创立东兴染织厂；王泽民、卢广惠、陈玉璞等参加奉天纺纱厂的技术工作；徐箴、陈先舟、张圣恩等进奉天市政府，搞市内有轨电车和市内公共汽车基本建设工作；张国贤、夏儒聘、张继周、曹承宗等参加沈海铁路基本建设工作；于景陶、王应麟、王德全、王金川参加洮昂铁路和齐北铁路基本建设工作；吴英元进四洮铁路充任工程师，王奉瑞进北宁铁路充任车务处处长。我同其他数十人经奉天省教育厅谢荫昌厅长推荐进入东三省兵工厂，从事各种兵器制造工作。我被分配到炮弹厂，1924年转入炮厂，担任机作所所长（即机械车间主任）。可是我去日本留学的目的，是为的实业救国，制造杀人武器，并非我的志愿。所以于1925年末，经沈海铁路张国贤科长推荐，转到沈海铁路公司内充任机务工程师、机务主任、机务段长。于1928年又调到吉林铁路局充任机务工程师、机务科长兼电务科长，从事机务电务基本建设和管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铁路被满铁接管，我就离开铁路去长春电报电话局搞通讯工作，吉海铁路局不久即被全部取消，并入吉长铁路局。

沈海、吉海、洮昂、齐北、洮索五条铁路，共计1420公里，从基本建设直到通车运输管理等工作，几乎全部由留日学生负担。建成通车后，对满铁形成一个包围圈，使满铁营业收入大受影响。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

张作霖统治时期的东北金融概略

○王瑞之

一

1916年4月，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段芝贵奉令进京，遗缺派27师师长张作霖护理。嗣以督理军务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张遂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他在莅任之初，即以整顿金融为急务，委王树翰为财政厅长，刘尚清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一面发行官币，一面勒收私贴。

当时东省纸币复杂，钱法紊乱，就记忆所及，本国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现大洋票；兴业银行所发行的奉小洋票（后改债券），东三省官银号也发行奉小洋票。外国方面的有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银本位币谓之钞票；朝鲜银行发行的金本位币谓之金票。又有帝俄经营的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钞票谓之羌帖。在吉林则有永衡官银号发行的吉林小洋票和永衡官帖；在黑龙江则有广信公司（后改官银号）发行的广信公司官帖和四厘债券，都在各省境内行使。惟羌帖一种，初流通时，比现大洋价格稍高。后因欧战影响，无力兑现，遂

逐渐贬值。当时中国人贪图便宜，多大量买存，以为欧战结束时，羌帖必能恢复原价。张作霖也曾令兴业银行给他买了200万元。不料欧战后，俄国起了革命，帝俄经营的华俄道胜银行荒闭，这项羌帖竟等于废纸，买存者都吃了大亏，当时谓之受枪伤（枪、羌同音）。这些纸币非常杂乱，兑换率参差不一，因用途关系，需要买卖，一出一入，势必贴水，便有赢余可找。财力大的，并能操纵行情。于是各银号钱庄，都以此为业。官营行号多发行纸币，争相牟利。外国银行为进行经济侵略，破坏我国钱法，在市场上大肆竞争。但东三省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发行的奉小洋票，尚充分兑现；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也照常兑现行使，所以奉省的物价金融，一时尚称稳定。

惟1916年袁世凯称帝，贿买各省军阀，运动国会议员，一些庞大的开支，都由中、交两行垫付，以致纸币信用大落，挤兑风潮遍及全国。东北中、交两行纸币，流通年久，额数也大，遍及各大城市，如一停兑，势必影响地方商业。张与秘书长袁金铠计议，命令该两行照旧兑现，商民都没吃停兑之亏。同时又召集中、交两行行长到署，查询所存现款，并饬该两行速将出贷于外的款项收回，对尚未运到的现款，催令速运，以备兑现应急。经过这番维持，奉天金融的情况，尚称良好。但为时不久，因受欧战金贱银贵的影响，奉小洋票竟发生了挤兑的风潮。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欧洲参战各国，多到亚洲来购买物资。他们都是金本位制的国家，而亚洲大半是银本位制；这

样，必须卖金买银才能交易；以致当时金价大落，银价暴涨。小银元是银质，一加熔化成块，换取黄金，便可得到大利。加以奉票兑现，也需用现小银元。正常办法是：通过东汇（日金）把款调到津、沪，再由津、沪运回现小洋来沈，作为兑换的准备金。但以如此周折，有时缓不济急，不得不用高价在市场内收买。有以上两种原因，奉小洋票就酿成了挤兑形势。这时满铁用地的日本浪人，勾结中国钱商，每天凑集奉票几万元，向官银号兑现以取厚利；输流而来，应接不暇，官银号的损失了无止境。

奉小洋票本是十足兑现的纸币，流通向无阻滞。此次挤兑中国钱商虽知有利可图，尚有些顾忌。惟日本钱商一面图利，一面积极破坏我国金融，挤兑无情，实难应付。张作霖乃令商务会会长杨玉泉与日本商业会议所洽商，议定每日仅兑1万元。张又令中、交两行将所存现货查明，并筹集现银送造币厂鼓铸现大洋以资接济。又令官银号发行一种5角小票流通市面，补助现银，并把10元的大票，陆续收回，以防挤兑。

1916年5月间，张以挤兑情势仍不稳，又饬奉天商务会邀同各银行号与日本商业会议所协议限制兑现办法，双方议决条件3款：

（1）中国、交通、官银号、兴业银行、殖边银行、黑龙江官银号等6家，每一周间，合出现大洋24万元，交由银行团（后改银行公会）代行兑换。

（2）兑换时间，每日下午1时起至3时止。

（3）兑换期限，自6月12日起至8月11日止。

至于来兑的手续，须到日本商业会议所送验现款，经日本总领事发给许可证，始准到银行团兑取。又以条件内载有

不满百元之款，仍赴各银行号兑换等语。日人就有持 99 元赴各银行号兑现者，每日不下数百人，统计兑出总额约 20 余万元。各银行号乃邀集公会人员，同往日本商业会议所，要求重订条件，结果决定每日由银行公会出兑 6 万元，各银行号概不兑现。

奉小洋票兑现，经与日方屡次协商，尚无大窒碍。惟以奉天现小洋缺乏，兑换常感束手，各银行号每日兑出现小洋不下万元，市面金融恐慌，乃由银行公会与日人交涉。经奉天商务会与日本商业会议所，议定协约如下：

（1）奉天小银元缺乏，官银号发行之小洋票，以大银元或奉天大银元票及日本金票、钞票和羌帖等货币代替之；

（2）各银行号纸币，仍在各该银行号兑换。

此约于 1916 年 8 月 18 日议定，21 日实行。但此项办法，试行仍有窒碍，后来乃有发行一二大洋汇兑券的办法。

1916 年 10 月间，奉票被挤兑日见严重。张作霖为表现其声威，拟使用一种惊人的非常手段，召来官银号总办刘尚清，告以欲毙兴业银行副理刘鸣岐等 5 人。刘正以挤兑无法应付，极表赞同，退出帅府，即到作新印刷局，敲窗唤我，告以张拟镇压钱商之事。我说按理应该归法院讯办，刘不谓然。他说，法官拘守律条，恐涉宽纵，并说即便判以死刑，也不如肆诸市朝的能以警众。越日果闻把刘鸣岐等 5 人，在大西边门外枪毙。

此案之原起，是因刘鸣歧与阎廷瑞①私动庆畲祥②库款，捣把兑现，以致庆畲祥破产，事被张作霖查悉，先找来经理杨玉泉（名占山），究询庆畲祥营业情形及赔累事故。杨左右

① 阎廷瑞字泽溥，张作霖称陆海军大元帅时任过财政总长。
② 张作霖私人的钱号。

其辞，不吐实情。张怒不可遏，乃将杨看押，并派熟悉账簿的司书前去查账。检查数日，提杨质讯，庆畬祥之赔累，实系刘鸣岐盗用库款兑现牟利所致。只刘鸣岐个人就得十几万元的好处。阎廷瑞是兴业银行的稽查员通同作弊。又与瑞昌恒金店和瑞昌恒钱庄有捣把兑现的行为（瑞昌恒有阎的股本5000元），查究结果，情节极重。惟以庆畬祥是自己的生意，经理杨玉泉为素所信任。而瑞昌恒是阎廷瑞的合资生意。张又派会计鼓贤查瑞昌恒的账。议定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侵吞公款并致庆畬祥赔累倒闭的事情。阎廷瑞是兴业银行的稽查员，与刘鸣岐及瑞昌恒东西两号的执事人等有勾结外人兑现的行为。张闻悉此情，想杀一警众，其时初掌政权，心目中尚有法律。经与秘书关海清（字果忱，时兼法政学校校长）讨论办法。关主张归法厅惩治。并介绍我（我时任高等审判厅推事）代拟呈状，面谕彭贤与我接头。我是关秘书的学生，难于推辞。但日久无消息，彭也未来接头。旋即听说有枪毙钱商的惊人事件。我见关探询，始知张因兑现的情势险恶，非猛烈镇压不可，拟对刘鸣岐等5人治以扰乱金融妨害治安罪名，军法从事，其他人等送法厅判决。

决议后张即于11月10日午后，将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及瑞昌恒金店执事黄献廷，瑞昌恒钱庄执事吕兴瑞3人，并尚有贩运现洋的蓬莱洋行执事齐瑞及管库的解中道2人，一并提案复供后执行枪决，其案内有关系的兴业银行行长兼庆畬祥经理杨玉泉及兴业银行稽查员兼瑞昌恒两号的董事长阎廷瑞，都情节重大。阎并有在达尔罕王蒙荒局任副局长时受达王贿5000元的嫌疑（夏季开办，秋即停丈）。于是全案连人犯，一齐送高等审检厅审理。当时我新由书记官长调刑庭推事，始知前奉张命，烦我与彭贤联系写状惩办阎廷瑞一事，

就属于枪毙钱商的一部分。同时推事检察官等纷纷议论，认为奸商破坏金融，按法律正应全案送法厅讯究，今一案两办，当轴未免目中无法，无怪报纸上对张痛责。此案审判结果，杨得免刑，只判令赔偿庆畲祥的损失（兴业库款为杨、阎私动兑现牟利）30几万元，查抄家产尚不及半数，押追多日，有商会几家会董到高等厅请求保出措办赔款，厅方未予批准（时杨是商务会会长）。后来有商董数人帮凑一些，免予全追；得张同意，始予开释。阎廷瑞处徒刑9年，褫夺公权全部终身。其兴业柜伙王殿臣、刘亚周、刘福忱、孙进仁、王月亭等5人，在警务处看押多日，后经处长王永江讯明均系柜伙，于兑现事并无主动关系，乃请准开释。这是张作霖维持钱法的第一次非常手段。虽能镇压于一时，但这并不是救济挤兑的根本办法。

三

1917年11月，官银号总办刘尚清，日夜筹划解救挤兑办法，以钱商求兑，多借口调拨汇款，若用开汇票的方式，把款汇出，备他们购货使用，他们便无词在沈阳索兑了。不过这是给特定人使用的，不能普遍流通，用途甚狭，对解救挤兑的效用也不大。苦心焦思，想到山西票号的汇票，有时持票人以信用关系，彼此周转，这不也类似纸币吗？乃与号内经理们一再研究，就想发行这样的汇兑票；惟以向外埠汇款，须论大洋，不适合奉天使用小洋的习惯，反复协商，不得要领。一日刘到作新印刷局，在客厅小憩，忽又敲窗唤我，见面就说我有一事要与你们印证印证。于是详细谈出他的意见。当时我只说“票”字不如用“券”字。至于大洋、小洋的问

题，并未作何表示。作新经理刘仲三说："大洋1元抵7钱2分，若小洋12角，能不能抵得上？"刘恍然大悟："仲三这话正合吾意。"刘次日到号，即作为他的妙计，说是他一时的灵机，经理们均赞许，遂决定以小洋为基础，定12角作大洋1元，即名之日一二大洋汇兑券。其办法是储置现银于上海，以为汇本，别发新券，每元折合现银7钱2分，任商民在上海购货，就地划拨现银，惟不得在沈阳索兑。官银号的小洋票，不准在沈阳市通用，因而这种汇兑券，也就替代了奉小洋票，在东三省境内一般通用了。

至奉天兴业银行发行之小洋票，则改称债券，每年付利息二次，仍照常流通市面，不兑现也不汇兑。一二大洋汇兑券，于1917年计划呈准，至1918年7月始发行，它对缓和金融危机，平抑挤兑风潮，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个时期张作霖维持奉票和中、交票，采取各种措施，未容其毛荒，物价还比较稳定。

四

1918年秋，张任东三省巡阅使，政治权力扩张；金融自一二大洋汇兑券发行，挤兑之风也稍戢。1919年8月，官银号总办刘尚清辞职，暂以彭贤代理，1920年委亲日分子于冲汉为官银号总办。借日币400万元，应付兑现。再加王永江整顿捐税，丈放官地等等开辟财源，省库稍形充裕。一二大洋汇兑券，一时也尚平稳。张以三省钱法，各自为政，应该有一联合的机构，以收金融灵活之效。于是筹设东三省银行于哈尔滨。委刘尚清为总办，于1920年秋正式开幕。发行1元、5元、10元、50元之哈尔滨一二大洋汇兑券，名为哈券，

一般呼为哈大洋。旋以50元者额面太大，亦改为10元券。复因一二汇兑券，非大银元性质，又改为哈尔滨现大银元兑换券，十足兑现。1920年7月，直皖战事起，拨哈币150万元，在背面加盖“津奉兑现”字样，以为奉军入关之需，名为“津奉券”。又因对蒙用兵，拨哈币100万元，在背面加盖蒙文，名曰“蒙文券”；至第一次直奉战后，即停止发行。因军事影响，曾有时限制每人只兑5元，虽未失其流通效用，但价值已逐渐跌落。

1922年，直奉第一次战争，军事失败，张作霖退守滦州，各法团入关迎迓回奉，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张任总司令；委王永江兼代省长。张为雪战败之耻，极力扩充军备。当时扩军情形，表面说缩编，实际各师、旅、团、营都充实兵额，比前几乎增加一倍。至军器方面，一面扩充兵工厂加紧制造枪炮和弹药，一面向德商百禄洋行批购大炮108门。这批武器总价不知多少，因军事机密在“帅府”(即张的住所)，军需处只凭张的手谕或条子拨款。军需处等于张的账房，有正式预算的开支，可以随时登簿备案；特别的临时拨款，如购买军火或付给日本顾问用款数目很大，均不知是何用途，也不敢过问。兵工厂的开支最大，有预算也不能作准，其他如迫击炮厂、粮秣厂、被服厂，也是如此；每年的支出都是巨万。所有这些庞大费用，主要由东三省官银号筹济，点金乏术，只好多发纸币，以应付缓急。奉天如此，吉、黑二省也难例外；不过该二省军阀，无任意扩军的大权，祸害比较稍轻而已。

由于两次直奉战和东北政局的变动，奉票也就起了急剧波动。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开始，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为止，奉票价格逐步下跌。在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

就由158元（即奉小洋158元换现大洋100元）骤落到234元；1926年2月王永江辞职，又落到270元。王永江掌奉天财政七、八年，一时号称理财能手。1926年2月，因反对张作霖进军关内，愤而辞职，返回金州故乡，托言养病，当时对外报记者有一段谈话：

“郭松龄举动，种因于两次直奉之战，混战之结果，毫无所得，徒耗糜了巨额的款项。目前奉票已到270元，真是闻所未闻。”“有人说，个人一回省，钱便能好，这是大错误。”又当他辞职时，对张具有签呈，亦谓“起初奉省岁入不过千万，自民国6年度支得以日裕。至十一年秋，更节用剔弊，岁入达3000万以上，几至4000万。至近日而卒因军事之牵动，致金融紊乱，民生日蹙”。王之谈话和签呈所反映奉票毛荒之情况及原因，可谓真实切当，足以取征。此签呈在他行前，即抄送盛京时报发表。张作霖见之，认为王永江有意暴露他的缺点，曾说：“郭松龄以枪杆倒戈，王永江以笔杆倒戈。”一时极为愤懑。

王永江去职后，由莫德惠继任省长。为维持钱法也曾作过计划。先拟发行现大洋公债，使商民以奉票应征，商定年息6厘，然以当时财竭民疲，募集不易。又计划鼓铸现大洋，定纯银量每元6钱4分8厘，每天限造5万元，继又增至10万元。但后来造了多少，是否移作别用，则不得而知。

五

1926年2月20日张作霖召集吉林督军张作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以及各军民长官金融当局，开金融会议。讨论结果，认为市面呆滞，应先救济入口商家，便利他们汇款。于

是东三省官银号和中国、交通两行协商，并经张的同意，决定在官银号内，设立公共汇兑所，专门办理汇兑。当即拟定规则八条：

（1）每天以出售天津现大洋上海规银两种汇票，以规银10万两为限。按市价为标准，如市价过涨，该所不随之超过原价。

（2）承汇者以采办入口货各商号为限，不准牟利，否则一经查出，送官惩罚。

（3）每早9点到11点开办。

（4）每号以规银1000两为限。

（5）上海规银汇票，由官银号开给，天津现洋汇票，由汇兑所填给凭证，持赴中、交两行领换汇票。

（6）承买汇票，须送印鉴纸，盖用坐图（正式图章），否则无效。

（7）外埠办理入口货之商号，有正当用途，来沈作汇，须经总商会证明。

（8）该所以7个月为限，至9月22日截止。

这是救济办入口货各商家困难的措施。乃各商反以限制太严，来所作汇者很少；其后提高到每家日汇3000两，并赖报纸的宣传，作汇者稍多。然5月以后，奉票毛荒日甚，公共汇兑所无力支持，遂于5月19日，中止公布公定行市而停办。距2月23日开办，不过两个多月，能发生什么效用？并且对于一般的兑换也无办法。

在开会时，讨论时间很久，张不耐烦，慨然自认出洋1000万元，购买金票和现洋，低价出售，以维持奉票信用。随着吴俊升也说愿出1000万元；不过是虚张声势，画饼充饥。

此次会议后，未过半年，奉票跌落更甚。奸商在第一次

镇压后，虽慑于张氏之淫威，一时销声敛迹。但他们不在城内捣贩，而潜往满铁用地内钱钞取引所[1]交易。张作霖据报告，派密探四出搜捕。是年8月间，突入公主岭满铁用地内，检查天合盛账簿，得悉该号捣贩的金票最多；又查悉奉天省城会元公也在取引所有大宗交易。天合盛财东毋姓，以日本为后台，没把中国官宪放在眼里。会元公是已故吉林督军孙烈臣的企业，还仗有军阀的余威。此外尚有许多钱商在取引所兴风作浪。张一怒之下，连续捕了280多人，陆续交军法处严讯。其情节重大的是天合盛奉号执事人李墨轩，长号执事人刘善庆，哈号执事人冯浚川，会元公执事人杨向宸、李继武等5人。张为杀一警众，乃于8月19日召集各银行号及经营钱业的店员负责人训话：略谓"近来奉票暴落，商民感受痛苦，全是由于奸商捣贩所致。此等奸商在我镇压刘鸣岐等5人以后，已不多见；不料日人蓄意破坏我钱法，又利用他们铁路用地内的钱钞取引所，勾引中国钱商捣乱。我近日抓来不少人，交军法处审讯明白，其中以天合盛、会元公两家的情节为重大，我今天要毙他们几个执事人，以示儆戒。这并不是我好杀，为维持钱法，不得不这样做。日后如再有犯的，我也决不宽容"。会后即将这五个钱商，拉到大西边门外枪决了。其他情节轻微的，都由军法处取保开释，未多株连。这是又一次的非常手段。

此际日本关东厅（驻旅顺），认为中国官宪压迫满铁用地内的钱商交易，且以暴力迫害中国店员，以致奉天、长春、公主岭等处的取引所中止交易，有关日商之利益。特行文奉天总领事，向中国提出交涉，希望中国官宪请求根本方策等情。

---

① 即钱钞交易所，带有投机性。

张作霖对日本总领事的照会，并未作何答复。取引所依然存在，而投机捣把之风，也未消灭。为时不久，张就去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旋进入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到1918年6月，张退出北京，归途至皇姑屯被炸。他给东北金融造成的混乱局面，并未因他逝世而消失，反之更陷于混乱状态。

六

张作霖被炸以后，奉票毛荒日益严重，苦无收拾办法。1928年11月某日，我随张学良乘专车前往葫芦岛参加航警学校毕业典礼。还有胡若愚、朱光沐、高纪毅、沈鸿烈、宋式善等。车经皇姑屯老道口，张与随行人员，咸存戒心，驶过老道口，才安然就座。在闲谈中，涉及东北币制问题。张先表示恼丧。继谓“奉票暴落真是无法挽救”。有人说应当募集现洋公债，再以此公债为准备而发行新币，收回奉票；也有说发行债券的，以官产为准备，发行有利息的债券，兑回奉票；还有认为应从根本上着手，改发新币。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在此一段谈话中，看出张有意改革钱法。不料计划尚未成熟，而奉票价格竟一日数跌，严重影响到广大人民和一般公务人员的生活，张学良对此甚为焦虑，但亦无充分准备，想不出彻底办法。奉省金融当局几经计议，为救济眉急，乃仿照北京大陆、金城、盐业、中南4行准备库的章程，成立一联合发行准备库。于是由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四家组成联合准备库。联合准备库的业务，专办理兑换券的印刷和发行。兑现准备金的保管，不作其他营业。同时为应付市面急需，发行纸币一时来不及，就暂时借用边业银行旧存的美制票券，加印联合发行准备库戳

记及监理官印章，正式发行。票面有10元、5元两种，决定发行总额为1500万元。截至1930年，共发行10元券1000万元，5元券400万元。其准备金是现金七成，有价证券三成。发行后充分兑现，颇著信用。

在此同时，张学良复向南京财政部磋商，发行辽宁省卷烟统税库券3000万元，得到现款2700万元，连同官银号动产、不动产，共约计七、八千万元，作为准备金，遂将此商民久经受害日益跌落的奉票，按当时市面行市，作定奉大洋50元顶现大洋1元的价格，在各地流通（当作价时市面奉小洋价格为61元有零即合大洋50余元)。一方面又由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现大洋兑换券，借以收回奉票；和由联合准备库时所借用边业银行的票券。此种办法施行后，因充分兑现，故东三省官银号的现洋券，流通甚畅，人民乐于使用。迨张学良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时，此项现洋券不但东三省畅通，即关内也能行使。至此东北币制始走上稳定和正常流通的道路。惜为时甚暂，即爆发“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改革东北币制的措施，随着东北的沦陷而付诸流水。

在奉票长期跌落和突然定价时期，商民倾家荡产者不在少数；而预知机密乘机捣贩大发其财者亦所在多有。

总的说来，奉票毛荒，固然由于日本经济侵略；特别是在金融方面多方破坏所致；但连年内战，增筹军费，购买军需物资，实为其主要原因。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5辑〕

张作霖时期的东北金融

◯ 刘世荣

从 1916 年起，张作霖在掌握东北军政大权的十几年中，先后发动了 8 次内战，特别是两次直奉战争，耗尽财力，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经济萧条，金融事业萎缩。

一、发行和流通的货币

张作霖主政期间，东北地区银行林立，货币发行权极不统一。其中有以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热河兴业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有外国在东北开设银行发行的纸币；由外国发行的纸币也流入东北境内流通。当时东北发行纸币银行之多、纸币品种之繁、券种之杂全国少见。

当时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有：东三省现大洋票（兑换券）7 种、奉哈大洋票（有监理官印）8 种、铜元票券等 5 种、准备库券（兑换券）2 种。

边业银行发行的纸币计有：边业银行现大洋票（兑换券）14 种、边业银行哈大洋票 12 种。

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纸币有：吉林官帖7种、吉林大洋票10种、吉林小洋票7种、吉哈大洋票（有监理官印）6种。

黑龙江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有：黑龙江省哈大洋8种、黑龙江省官帖9种、黑龙江省大洋票15种、黑龙江省4厘债券3种。

中国银行发行过大洋票，哈大洋票汇兑券及小洋票等4种纸币。1919年，东三省当局命令将有："吉黑"和"长春"加印字样的小洋票收回。同年4月20日中国银行奉天分行正式发行汇兑券性质的大洋票辅助券6种，发行哈大洋票辅助券7种。

交通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与中国银行相同，有现大洋票、哈大洋票、汇兑券、小洋票等4种纸币。1919年4月20日，交通银行奉天分行也正式发行汇兑券性质的大洋票5种。发行哈大洋票7种。

热河兴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有：大洋票3种、小洋票10种、铜元票5种。

1931年5月，热河兴业银行发行新规汇兑券，即壹元、伍元、拾元券和壹角、贰角、伍角辅助券等6种。在票面印上"天津分行即付通用国币"字样。

东三省银行于1920年11月在哈尔滨傅家甸发行哈大洋票壹元、伍元、拾元3种，并加印上"兑换现大洋"字样。以及发行伍角、贰角、壹角、半角4种辅币券。

1924年6月19日银行与东三省官银号合并。

1913年7月，奉天省议会决议将农业银行改为兴业银行，官商合办。当年发行的小洋票690万元。1917年8月1日发行伍元、拾元、伍拾元汇兑券。10月1日发行四厘债券

12 万元。12 月发行小银元票和农业票。1923 年，兴业银行合并新东三省官号。

东三省流通的金属硬币有铜元（分新、旧两种）、银元（分大银元、小银元两种）、银锭。

虚位货币有海关平（银两）……海关金，汇兑银、奉天银等。

外国银行在东北流通的硬币有日本银元、日本金属硬币、俄国金属硬币、俄国金币、墨西哥银元等。纸币有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大连字样的壹元、伍元、拾元、百元 4 种旧券；壹元、伍元、拾元 3 种新金券和 4 种圆银券；发行有“哈尔滨”字样壹元、伍元、拾元、百元等 4 种券。1917 年，横滨正金银行停止发行金票权，将发行权移交给朝鲜银行。朝鲜银行发行壹元、伍元、拾元、百元券 4 种，俗称老头票。

俄国发行羌帖在东北境内有 4 种。美国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于 1921 年发行的银元券纸币，也在东北流通。

二、货币贬值的对比

张作霖主政东北时期，货币贬值相当严重，尤其是奉票价值暴跌突出，黑龙江和吉林官帖也随着形势变化而下跌，使东北人民深受苦难。其与日本金票对比贬值率如下：

奉票是指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通称。以 1916 年奉票价值以 100 为基数，由 1917 年至 1920 年略有升值，4 年平均升值率为 27.23%。1921 年以后，张作霖扩充军备，东三省银号是军费惟一筹措机关，所以发行巨额奉票，使奉票价值逐年大跌。若以奉票与日本金票相比，1916 年金票 100 元可换奉票 124.43 元。到 1928 年 2509.65 元奉票才能换 100 元

金票。奉票贬值20倍。

吉林官帖是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纸币，流通吉林省。1921年以后，吉林官帖下跌幅度较大，加之吉林省财政困难和永衡官银钱号的附属事业的扩大，因而只得滥发纸币，造成吉林官帖价值逐年下跌。1916年1元金票可兑换吉林官帖1.4824万吊。到1928年吉林官帖18.0013万吊才能兑换1元日本金票。吉林官帖贬值20倍。

黑龙江官帖是黑龙江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流通省内。由于受俄国滥发羌帖的影响，而官帖价值逐年大跌。1920年以后，张作霖为了统一东三省币制，整顿金融，成立了东三省银行并发行兑换券纸币，迫使黑龙江官帖价值大跌更为严重。若以黑龙江官帖与日本金票对比，1916年1元金票可兑换黑龙江官帖1.7201万吊，而到1928年需35.5096万吊才能兑换日本金票1元。官帖贬值20倍。

哈尔滨哈大洋票是由中国、交通两行和边业银行、东三省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等6行号发行的纸币。在纸币上印有发行地“哈尔滨”字样。从1922年至1925年价值比日本金票高。从1926年起，由于受张作霖筹集内战军费和日本金票在哈尔滨地区流通的影响，哈大洋价值下跌。若以哈大洋与日本金票相比，哈大洋100元，1921年可兑换104.84元金票。到民国1928年只能兑换73.27元金票。哈大洋下跌43%。

三、货币贬值的原因

（一）扩充军备，穷兵黩武。1921年5月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别区，负责征蒙。为扩充兵

力，奉天省增设第八、九、十混成旅，右路巡防改编为第十一混成旅，吉林省添编第五、七混成旅，黑龙江省添编第三、四混成旅。1925 年 3 月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东三省国防军取消混成旅名义，改编为 18 个师，统称东北军。后又增加十九、二十两个师，合计 20 个师编制。1926 年建立海军，成立东北海军司令部，并开办讲武堂，聘国外留学生当教官，培养军事人才。到张作霖死前，东北的陆、海、空军的兵力和装备，均占全国首位。由于军事力量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膨胀，对东北金融事业不稳定有直接的影响。

（二）大办军事工业，增加军费开支。张作霖为了巩固东北政权和扩大地盘，于 1921 年正式建东三省兵工厂，工人 3 万多人，下设枪厂、枪弹厂、炮弹厂、炮厂、药厂、铸造厂、机器厂等 8 厂。并设工务、审核、材料、庶务等 4 处，以及统计委员会、文牍科、兵工学校、兵工医院等 17 个单位。还聘请日、德、奥、俄、瑞典等国外技术人员 20 余名。杨宇霆任督办时从不受兵工预算的限制，当时曾遭到奉天省省长王永江的反对，而张作霖不听劝阻，反而倍加鼓励，大肆扩充兵工厂，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大军火工厂。

（三）连年内战，耗资巨大。1919 年吉奉战争，吉林督军孟恩远被迫下台，张作霖独霸东北一直到 1928 年。10 年间共发生 8 次内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 年郭松龄反奉及于 1928 年与北伐军蒋、阎、冯、李 4 个集团军的抗拒。张作霖在内战中财力损失巨大，东北金融由此受到很大影响。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使东北人民生活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四）滥发纸币，货币贬值。张作霖主政时期，取得货币发行权的就有 9 个行号（见前页）。另外，各县公署、商务会、

金融救济委员会等有财力的商店也滥发行私帖，因此东北货币发行极不统一。上述 9 个行号发行纸币达 31 种，印种达 197 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 6 亿元；哈大洋票 2050 万元；大洋票 350 万元。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发行官帖 3 亿吊；吉林大洋票 700 万元；哈大洋票 500 万元。黑龙江省官银号发行官帖 4 亿吊；哈大洋票 800 万元。中国银行发行奉票 340 万元；哈大洋票 450 万元。交通银行发行哈大洋票 950 万元。中交两行发行大洋票 800 万元。热河兴业银行发行大洋票 236 万元。边业银行发行大洋票 1025 万元；哈大洋票 1250 万元。公济平市钱号发行铜元票 6000 万枚。由于货币发行机关的不统一，造成滥发纸币，这是东北货币贬值主要原因之一。

（五）外国银行滥发纸币，扰乱东北金融。

1. 日本在我国东北开设 13 家银行，有纸币发行权的是横滨正金银行，据统计 1916 年—1928 年共发行 4671 余万元。该行在大连、牛庄、奉天、长春、开原、哈尔滨等 6 地还设有支店和办事处。日本除在我国东北设有银行以外，还设有信托公司、金融组合、交易所、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及当铺等金融行业用以控制当时东北金融事业。并经常利用这些金融事业与中国不法商人合谋扰乱金融，造成数起挤兑风潮。这也是影响东北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2. 朝鲜银行原为 1909 年成立的韩国银行。1911 年 3 月 3 日日本政府颁布《朝鲜银行法》后，改组更名。总行设在朝鲜汉城，当年即在我国丹东设办事处。1913 年起，又陆续在东北奉天、大连、旅顺、长春、哈尔滨、营口、辽阳、铁岭、开原、四平、傅家甸等地设支店和办事处。据统计 1917 年至 1928 年，纸币发行额为 14 亿日元。在我国东北流通的纸币数

量，估计为14亿余元，占发行额的31%。朝鲜银行是日本政府提出的利用纸币对我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银行，成了“银行中的银行”。

3. 华俄道胜银行创建于1895年，总行设在俄国彼得堡，1898年在哈尔滨设立了分行。是在我国东北最早建立的一家外国银行。道胜银行在我国东北吉林、长春、奉天、营口、大连设分行。并发行了国家帝俄银行的卢布纸币，民间俗称“羌帖”(即罗曼诺夫帖)。纸币卢布以金卢布为单位，每金卢布含纯金0.77423克。纸币卢布可以随时兑现。同时在市面还流通少量银币卢布。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沙皇下令纸币卢布停止兑现。以后帝俄为了筹措战费，滥发纸币，卢布日益贬值。十月革命胜利后，沙皇及临时政府统治时期的卢布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东北存有卢布的商民为此倾家荡产，饱受其苦。1918年哈尔滨道胜银行又奉东清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之命，发行霍尔瓦特卢布2000万。由于东北人民的反对，只是在铁路范围内强制流通。1927年6月10日苏联远东银行在哈尔滨设立分行，原帝俄远东银行撤消。

4. 英国汇丰银行，该行在大连、奉天、哈尔滨设分行；英国麦加利银行在哈尔滨设分行；美国花旗银行在大连、哈尔滨、奉天设分行和支行；犹太庶民银行和远东犹太商业银行在哈尔滨设分行；中法实业银行在奉天设分行。

四、货币贬值对政局的影响及稳定金融的措施

因张作霖连年内战，消耗财力巨大，所以造成东北金融处于极度混乱之中，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因

而引起东北局势不稳。东北工人罢工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1916年至1928年12年间共发生85起工人罢工事件。

因奉票贬值引起商业萧条。1919年哈尔滨因钱币贬值，道外50余家商贾破产倒闭。1928年又因奉票价值暴跌而引起奉天省城5089个工商业被迫停业。1919年哈尔滨商业罢市，居民上街，抗议羌帖作废，经过斗争，答应逐渐兑换羌帖，市面才平静，史称“江日风潮”。同年9月，吉林滨江县各校教员因钱币毛荒，所得月薪不抵从前半数，全体辞职。1924年奉天出现教员罢教，主要是因减少工资而引起的。

1924年3月因奉票暴跌，物价昂贵，奉天士兵要求增饷。1926年5月奉天省驻西丰骑兵旅团，反对以奉票发饷而发生哗变，在城内焚烧劫掠事件，给当局很大震动。

张作霖为维持政局，大量滥发纸币，造成货币贬值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稳定东北当时金融，他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一）采取镇压的手段，稳定金融。从1916年张作霖主政东北开始，就出现挤兑风潮。据同年1月4日《中国银行报》称：奉天、营口两地掀起挤兑风潮，一月之内竟兑出现洋200余万元，其中日商“十居八九”。随之东北各地挤兑现洋现银的风潮愈演愈烈，每日兑现洋达70余万元。同年11月10日，张作霖将勾结日人进行挤兑活动的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恒”金店执事董献廷等5人处决，以示镇压。1925年7月，日本以朝鲜银行金票扰乱金融，奉票大幅度贬值。张作霖枪决了参加投机倒把活动的3个银号、钱庄的经理，借以挽救奉票危机。同年10月，日本人在奉天操纵钱商，扰乱金融，奉天当局逮捕钱商首恶分子，遭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抗议。1926年8月，张作霖先后逮捕各地钱商287人。张

作霖又在奉天省城召集各银号业主训话，并将在满铁附属地钱钞交易所倒卖金票的天合盛，奉天、长春、哈尔滨3个执事人及奉天会元公两个执事人枪决，又遭到日本驻奉总领事的抗议。

（二）张作霖借外债缓和东北金融危机。1916年两次向朝鲜银行奉天办事处借款300万日元，用以整顿奉天各官办银行，并以奉天省城电话、电灯两局资产，烟酒契税等为此抵押担保。1918年又向朝鲜银行借款300万元，以本溪湖煤铁公司中方官股为担保。1926年张作霖派赵伯欣去日本筹借500万元，名为整理奉票，实为购买军火。

（三）1923年12月，东三省当局制定金融整顿办法，通令三省实行。（1）现洋和金票，禁止买卖，必要时按法定价格买卖；（2）现洋禁止携带出境和购入贮藏，违犯者严重处罚；（3）各地滥发的纸币禁止通用，今后发行官帖和其他纸币必须报请审批；（4）东三省各地方提倡铜元通用，以官帖和其他纸币收买之；（5）各银行和金融机关严禁贷出款项；（6）东三省官银号不可随意向分号提出贷款；（7）东三省官银号钱钞业务不准贷出或从事其他投机事业营利；（8）东三省官银号行员不准多额领取奖金；（9）东三省官银号的多余人员进行整顿。同年12月15日张作霖电令哈埠，严禁外国银行在哈兑换哈大洋，以免现洋外流。

（四）1924年为推行货币整理法，将东三省官银号、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合并。东三省官银号和中国、交通两行发行的汇兑券成为奉天省本位币，公济平市钱号的铜元票为辅币。原各行号发行的大洋票和小洋票收回，这样汇兑票和铜元票称“奉票”。

（五）1926年2月，张作霖召集吉林督军张作相、黑龙江

督军吴俊升等人开金融会议，决定在各官银号内设立公共汇兑所，为入口商办汇兑，加强对外金融管理。同年5月，张作霖在东三省发行整理金融公债大洋5000万元，强令各地认购。8月，张作霖在奉天省城召开整顿善后会议，制定了整顿金融条例。规定：禁止银行钱号存储现洋金票子及买空卖空；携带现洋出境以50元为限，严禁贩运现洋、金票等。10月13日，张作霖亲自到日本总领事馆访晤日使芳泽，请日方协助“整理”东三省金融，勿令奸商在南满铁路附属地操纵的要求。

(六)1928年2月，奉天当局下令禁止商人拒用奉票及抬高物价的措施。为了防止哈大洋的价值下跌，东三省官银号、交通银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广信公司等代表在奉天省城开会，决定将各自发行的哈大洋票收回三成，计收回1170万元，用以稳定哈尔滨金融。

(七)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奉票下跌更趋严重，因此决定收回纸币发行权。

1929年5月17日，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等在奉天城成立辽宁省城4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发行现大洋的准备库券（又叫现大洋兑换券）1400万元。同年6月，发布“奉票维持办法”和“东三省官银号汇兑章程”，收回奉票。规定各地不准拒用奉大洋票，奉大洋维持办法是：(1)奉大洋50元相当现大洋1元的固定比价，由官银号相应充分配合兑汇详细办法分别制定；(2)凡是省库所属征收机关的一切赋税收入以现洋征收，奉票一律按上述规定现洋比价收交；(3)凡商民的交易和私人的买卖均以官价专用奉票；(4)为充实汇兑资金的目的，辽宁省政府发行第一次卷烟统税公债现大洋2000万元，收回奉票的条例和细则另

制定。从此，奉票的价值渐渐稳定，市场价格和法定价格接近，奉票贬值趋向好转。

〔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